

# 建国以来 重要文献选编

(第十册)

92261

97784

150  
29

# 建国以来 重要文献选编

(第十册)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200048625\*

中央文献出版社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JIANGUO YILAI ZHONGYAO WENXIAN XUANBIAN**

**第十册**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

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北京1740信箱)

新华书店发行 北京新魏印刷厂印刷

---

850×1168mm 32开 22.125印张 430,000字

00,001—15,000册

1994年9月第1版 1994年9月第1次印刷

---

ISBN 7-5073-0215-6/D·62 定价 26.00 元

## 目 录

- 建设规模要和国力相适应 .....陈 云 ( 1 )  
(一九五七年一月十八日)
- 中央军委关于裁减军队数量加强质量的决定 ..... ( 12 )  
(一九五七年一月)
- 中共中央批转中央组织部《关于县、区、乡的组织形式和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的报告》 ..... ( 16 )  
(一九五七年二月七日)
- 中共中央关于一九五七年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指示 ..... ( 26 )  
(一九五七年二月八日政治局通过)
- 中共中央关于今后干部工作方法的通知 ..... ( 43 )  
(一九五七年二月八日)
- 中共中央批发中央统战部《关于继续发挥工商业联合会的作用的意见》 ..... ( 48 )  
(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五日)
- 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讲话提纲) .....毛泽东 ( 54 )  
(一九五七年二月)



-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泽东 (61)  
 (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
- 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结束语  
 提纲……………毛泽东 (105)  
 (一九五七年三月一日)
- 粮食问题不可掉以轻心……………李先念 (108)  
 (一九五七年三月四日)
- 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毛泽东 (110)  
 (一九五七年三月十二日)
- 中共中央关于民主办社几个事项的通知…………… (128)  
 (一九五七年三月十五日)
- 中共中央关于传达全国宣传工作会议的指示 …… (131)  
 (一九五七年三月十六日)
- 坚持艰苦奋斗，密切联系群众 ……………毛泽东 (135)  
 (一九五七年三月十八日、十九日)
- 在军事检察院检察长、军事法院院长会议上  
 的讲话 ……………董必武 (139)  
 (一九五七年三月十八日)
- 中共中央关于处理罢工、罢课问题的指示 …… (154)  
 (一九五七年三月二十五日)
- 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活一点有好处 ……………周恩来 (164)  
 (一九五七年四月六日、十二日)

中共中央关于研究有关工人阶级的几个重要问题的通知 .....	(166)
(一九五七年四月七日)	
今后的主要任务是搞建设 .....	邓小平 (174)
(一九五七年四月八日)	
关于中小学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问题 .....	刘少奇 (183)
(一九五七年四月八日)	
外出视察的报告 .....	朱 德 (202)
(一九五七年四月十八日)	
国务院关于消灭血吸虫病的指示 .....	(209)
(一九五七年四月二十日)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 .....	(222)
(一九五七年四月二十七日)	
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	刘少奇 (227)
(一九五七年四月二十七日)	
关于香港问题 .....	周恩来 (243)
(一九五七年四月二十八日)	
中共中央关于继续组织党外人士对党政所犯错误缺点展开批评的指示 .....	(246)
(一九五七年五月四日)	
关于高级党校学员整风问题的谈话 .....	刘少奇 (248)
(一九五七年五月七日)	

- 中共中央关于各级领导人员参加体力劳动的指示**…………… (259)  
 (一九五七年五月十日)
- 事情正在起变化** ……………毛泽东 (264)  
 (一九五七年五月十五日)
- 中共中央关于对待当前党外人士批评的指示** …… (272)  
 (一九五七年五月十六日)
- 中共中央批转李富春、薄一波《关于解决目前经济建设和文化建筑方面存在的一些问题的意见》**…………… (274)  
 (一九五七年五月十九日)
- 中共中央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 …………… (284)  
 (一九五七年六月八日)
- 这是为什么?**…………… (287)  
 (一九五七年六月八日《人民日报》社论)
- 不平常的春天** …………… (291)  
 (一九五七年六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社论)
- 政府工作报告** ……………周恩来 (298)  
 (一九五七年六月二十六日)
- 中共中央关于在一两个月后吸收一批高级知识分子入党的通知**…………… (358)  
 (一九五七年六月二十八日)

- 关于一九五六年国家决算和一九五七年国家  
预算草案的报告 ..... 李先念 (360)  
(一九五七年六月二十九日)
- 在科学规划委员会第四次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 聂荣臻 (409)  
(一九五七年六月)
- 关于一九五六年度国民经济计划的执行结果  
和一九五七年度国民经济计划草案的报告  
..... 薄一波 (425)  
(一九五七年七月一日)
- 军事建设概况 ..... 彭德怀 (467)  
(一九五七年七月十六日)
- 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 ..... 毛泽东 (484)  
(一九五七年七月)
- 关于我国民族政策的几个问题 ..... 周恩来 (495)  
(一九五七年八月四日)
- 中共中央同意中央组织部、宣传部《关于为  
抽调干部加强大、中学校及科学研究机关  
的领导向中央的报告》 ..... (522)  
(一九五七年八月五日)
- 中共中央关于向全体农村人口进行一次大规  
模的社会主义教育的指示 ..... (528)  
(一九五七年八月八日)

- 国务院关于由国家计划收购(统购)和统一收购的农产品和其他物资不准进入自由市场的规定 ..... (531)  
 (一九五七年八月九日国务院全体会议第五十六次会议通过, 同年八月十七日发布)
- 中共中央批转中央手工业管理局、全国手工业合作总社筹委会党组《关于召开省、市、自治区手工业改造座谈会的报告》 ..... (536)  
 (一九五七年九月一日)
- 中共中央关于整顿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指示 ..... (551)  
 (一九五七年九月十四日)
- 中共中央关于做好农业合作社生产管理工作的指示 ..... (556)  
 (一九五七年九月十四日)
- 中共中央关于在农业合作社内部贯彻执行互利政策的指示 ..... (562)  
 (一九五七年九月十四日)
-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今冬明春大规模地开展兴修农田水利和积肥运动的决定 ..... (567)  
 (一九五七年九月二十四日)
- 关于劳动工资和劳保福利政策的意见 ..... 周恩来 (573)  
 (一九五七年九月二十六日)

- 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的讲话提纲……………毛泽东 (591)  
 (一九五七年十月九日)
- 做革命的促进派……………毛泽东 (597)  
 (一九五七年十月九日)
- 中共中央关于《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的通知 …… (613)  
 (一九五七年十月十五日)
- 国务院关于统一管理农村副业生产的通知 …… (618)  
 (一九五七年十月二十二日)
-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 (622)  
 (一九五七年十月二十二日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八十一次会议通过)
- 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  
 (修正草案)…………… (633)  
 (一九五七年十月二十五日)
- 建设社会主义农村的伟大纲领…………… (658)  
 (一九五七年十月二十七日《人民日报》社论)
- 国务院关于改进工业管理体制的规定…………… (664)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八日国务院全体会议第  
 六十一次会议通过, 同年十一月十四日第  
 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八十  
 四次会议原则批准, 自一九五八年施行)
- 国务院关于改进商业管理体制的规定…………… (672)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八日国务院全体会议第

六十一次会议通过，同年十一月十四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八十四次会议原则批准，自一九五八年起施行)

国务院关于改进财政管理体制的规定…………… (676)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八日国务院全体会议第六十一次会议通过，同年十一月十四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八十四次会议原则批准，自一九五八年起施行)

新中国坚持反对制造“两个中国”……………周恩来 (682)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五日)

必须重视和加强山区建设……………朱 德 (690)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八日)

国务院关于正确对待个体农户的指示…………… (694)

(一九五七年十二月十三日国务院全体会议第六十五次会议通过，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发布)

# 建设规模要和国力相适应\*

(一九五七年一月十八日)

陈 云

我就财政经济问题讲几点意见：第一，一九五六年的财政经济情况；第二，如何解决目前财政经济方面的问题；第三，建设规模要和国力相适应；第四，要重视研究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

## 一九五六年的财政经济情况

一九五六年，我国无论在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取得了全面的胜利。全国的职工、农民、公教人员在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高潮中，大大提高了积极性，开展了广泛的劳动竞赛，涌现出大批的模范工作者。知识分子参加各种科学规划工作和向科学进军，表现出高度的热情。在农村，由于农民在合作化以后更加紧张的劳动，虽然自然灾害并不小于一九五四年，

\* 这是陈云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



而粮食和其他农作物（除棉花外）的产量，比丰收年的一九五五年还有增加。工业的总产值和基本建设完成的投资额也有很大的增长，工业生产已经提前一年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总产值指标，基本建设四年累计已经完成五年计划投资总额的百分之八十以上。这些情况说明，一九五六年的经济建设，成绩是主要的。

一九五六年在财经工作方面，也发生了一些缺点错误，这主要表现在：

一、在财政和信贷方面多支出了近三十亿元。这三十亿元包括以下三个项目：（1）基本建设投资多用了十五亿元以上。基本建设投资大都是用得恰当的，但是在中央各部门，在各地方，都有一部分用得不适当，用得多了。（2）工资多开支了六七亿元。一九五六年是需要增加工资的，缺点是增加得太多。去年各个方面招收的人员，比原计划的八十四万人多了一百多万人，这里还不包括高等学校、中等专业学校、技工学校和技工训练班多招收的人员。一部分人员工资增加得过多，机关、企业人员的升级面宽了，有些奖金制度也不适当。这三笔钱，再加上附加工资，合计约有六七亿元。（3）贷款多了一些，农贷和其他贷款多支出了五亿多元。以上基本建设、工资、贷款三项，共计多支付近三十亿元。

二、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供应都紧张。基本建设和生产所需要的原材料，如钢材、木材、竹子、煤炭等，人民生活需要的许多消费品，都出现了严重的供不应求的现象，以致有些地方在搞以物易物。钢铁是基本建设和

工业生产的重要物资，去年用空了七十万吨的库存（其中双轮双铧犁和锅驼机就多用了二十万吨）。由于缺少原料，手工业者到处抬价抢购废钢铁；有的地方竟发生手工业者抢去供销合作社的竹子的事。日用消费品供应紧张的现象也比较普遍，个别商品（如自行车）出现了投机倒把的“黄牛”〔1〕。看来，任何一种物资必须保有一定的社会周转量，如果少于这一数量，便会发生供应紧张，甚至会出现黑市买卖和囤积投机的现象。

我们知道，钞票是物资的筹码，发行钞票必须有可以相抵的物资。按物资的数量来说，一九五六年比一九五五年是增加了，但是却发生了供应紧张的现象，原因就在于财政和信贷多支付了近三十亿元。

如前所说，一九五六年经济建设工作成绩是主要的，但缺点错误确实存在。经验不是一朝一夕可以积累起来的，过去有缺点错误，今后也还难免。摸索革命的规律，我们花了二十多年的时间；建设的经验，也必须有两三个五年计划的时间，才可积累下来。我们的缺点错误是前进中发生的，是容易纠正的。目前有些物资供应紧张，我们只对少数物资实行了定量供应，但就全局来说，市场仍然是稳定的，黑市和“黄牛”并不多。我们认为，粮食、植物油、布匹等将会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供应紧张，其他的物资，只要在两年内不发生大的自然灾害，并且采取适当的措施，供应紧张情况是可以缓和下来的。我们要有计划地使社会购买力增长的速度放慢，使它低于消费品增长的速度，在两年的时间内填补供应不足的差额，使购买力

和物资供应大体上得到平衡。

## 如何解决目前财政经济方面的问题

解决财政经济方面所发生的问题，主要有以下三个办法：

一、开展增产节约运动。在增产方面，农业和有销路的副业产品，应该大大增产；有原料、有销路的工业和手工业产品，也应该尽量增产。在节约方面，无论是基本建设或者是生产，无论是企业、事业单位或者机关、团体、学校，无论是中央或者地方，除了保证必需的费用以外，都要节省一切可以节省的开支。

二、适当压缩基本建设的投资额。这样做的目的，是使一九五七年基本建设的规模，适应于国家财力和物力的可能。这样，基建工作量和财政支出将比原来发下去的控制数字降低，至于降低多少，要看财政收入和钢材、木材等原材料供应的可能。投资额减少以后，是削减主要项目还是削减次要项目，要加以分析。如果有些主要项目不推迟，不减“骨头”只减“肉”〔2〕，这样下去，将来还会出现紧张的局面。

三、有计划地控制社会购买力增长的速度。今后两年，工资总额只能小量增加；农产品的收购价格，除了收价太低因而破坏生产的以外，一般不能提高。这样，就可以使购买力的增长在计划的控制之下。劳动工资方面要注意的是，除安排大学和中专毕业生以外，各部门一般不

增加人员，必须增加的单位由内部统一调剂；升级加薪一般要停止两年。同时，还要增产消费品，推销公债，奖励储蓄。用这些办法来使消费品的供应量和社會购买力恢复平衡。

我们采取上述三项措施，就是为了既保证经济建设的一定规模，又逐步使原材料和消费品供应紧张的状况缓和下来。也就是说，既要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建设任务，又要保证市场稳定。这样做，无疑要遇到许多困难。比如，若干基建项目推迟后要进行妥善处理，多余的职工要加以安排，对于不能升学和分配工作的中学毕业生，也要做好工作。

## 建设规模要和国力相适应

建设规模的大小必须和国家的财力物力相适应。适应还是不适应，这是经济稳定或不稳定的界限。像我们这样一个有六亿人口的大国，经济稳定极为重要。建设的规模超过国家财力物力的可能，就是冒了，就会出现经济混乱；两者合适，经济就稳定。当然，如果保守了，妨碍了建设应有的速度也不好。但是，纠正保守比纠正冒进要容易些。因为物资多了，增加建设是比较容易的；而财力物力不够，把建设规模搞大了，要压缩下来就不那么容易，还会造成严重浪费。在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薄一波同志在发言中，讲了国民收入和积累、国民收入和国家预算收入、国家预算支出和基本建设投资三种比例

关系，我很同意他的研究。他所提出的比例数字可能会略有出入，但寻找这些比例关系，是完全必要的。我现在想从另一个角度，即从其他方面试图寻找一些制约的方法，来防止经济建设规模超过国力的危险。我认为下列各点应该注意。

一、财政收支和银行信贷都必须平衡，而且应该略有结余。只要财政收支和信贷是平衡的，社会购买力和物资供应之间，就全部来说也会是平衡的。一九五〇年到一九五五年财政收支平衡和物资供需平衡的状况，从正面证明了这一点。一九五六年，由于财政上有了赤字，物资供应就不平衡，又从反面证明了这一点。这是极为重要的一个问题。同时还应该指出，财政收支略有结余是必要的，因为我国的经济建设规模日益扩大，便需要逐年增加物资的周转量，也就是要适当地增加库存量。所谓财政结余，并不只是结余钞票，主要是结余相应的物资。当然，财政结余并不是一点也不能使用，在保证必要的周转量和储备量的情况下，是可以使用的。一九五六年因为动用得太多，便发生了问题。

二、物资要合理分配，排队使用。应该先保证必需的生产和必需的消费，然后再进行必需的建设。像钢铁、木材等原材料的供应，应该有分配的顺序。原材料的供应，宽裕时不发生问题，紧张时便必须有分配的顺序。在原材料供应紧张的时候，首先要保证生活必需品的生产部门最低限度的需要，其次要保证必要的生产资料生产的需要，剩余的部分用于基本建设。先保证生产、后供应基

建这种排队的必要，主要是为了维持最低限度的人民生活的需要，避免盲目扩大基本建设规模，挤掉生活必需品的生产。在财力物力的供应上，生活必需品的生产必须先于基建，这是民生和建设的关系合理安排的问题。应该看到，基本建设搞多少，不决定于钞票有多少，而决定于原材料有多少。关于人民生活必需品的生产，我所以说应该保证它们对原材料最低限度的需要，是因为今年的生产指标不可能在去年已经很高的基数上再增加多少。去年农业歉收，今年像棉纺织这样的轻工业生产不能不受到限制。还必须看到，今天把原材料的供应限于最低限度的生产的需要，挤出一点力量用于基本建设，正是为了将来生产的发展。

三、人民的购买力要有所提高，但是提高的程度，必须同能够供应的消费物资相适应。构成购买力的主要部分，是职工的工资和农民出售农产品的收入，以及其他人的收入。目前购买力提高过快，是由于工资总额的增加以及农产品的提价。至于因农产品增产而增加购买力，不但并不可怕，而且是件大好事情。现在要注意的是农产品提价的问题。提价的范围，只能限于那些收购价格过低影响生产发展的农产品。这是必须严格掌握的原则。经济作物的提价，必须考虑粮食和经济作物的比价，防止经济作物提价过多而挤了粮食，以至被迫再提高粮价，造成轮番提价、全面提价的危险。否则，农产品提价多了，便要减少建设投资，同时增加市场供应和货币回笼的困难。在这一方面必须十分慎重。

生产消费品的原材料的来源，一是农产品，二是用出口农产品换回的原料，三是重工业部门生产的原材料。这三个来源，都受一定限制。人民购买力提高的程度必须和消费品增长的程度相平衡。

四、基本建设规模和财力物力之间的平衡，不单要看当年，而且必须瞻前顾后。财力物力就是指投资、机器设备和原材料、消费物资、外汇四个方面。一九五六年安排基本建设的时候，只和当年财力物力勉强平衡，既没有瞻前也没有顾后，结果造成基本建设投资猛长，在一九五七年不得不减下来。这是一九五六年计划执行的重要教训之一。国家经委曾经试算过，如果一九五七年基本建设投资为一百二十六亿元，照此推算，一九五八年要投资一百六十二亿至一百八十一亿元，这是当年财政支出所不可能负担的。再看过去几年基本建设的投资情况：一九五三年是六十五亿元，一九五四年是七十五亿元，一九五五年是八十六亿元，而一九五六年则陡升到一百四十亿元。一九五六年是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第四年，许多建设项目的设备进口和机器安装都集中在这一年及下一年，因此基本建设投资比往年应该增加得多一些，但是一下子增加了五十四亿元，这就太多了，结果无论财力方面和物资方面都不能平衡。由此看来，年度计划要摆平，就必须瞻前顾后，前后衔接，避免陡升陡降，造成损失。

五、我国农业对经济建设的规模有很大的约束力。我国农业经济比重很大，农业生产和财政收入有很大关系。据国家经委估算，在国家财政收入中，与农业有关的

收入,大约占百分之四十五。当然,以农产品为原料的工业品中有工人创造的价值。所以,不能说农民向国家的缴纳占国家财政收入的百分之四十五,而只是说明,国家收入与农业有很大的关系。我国农村人多地少,农业生产增长率不高。一九五六年农业总产值五百八十三亿元,如果按增长百分之五计算,只增加二十九亿元。而农村人口以增加百分之二计算,一年即增加一千万人,每人每年消费六十元,一年便要消费六亿元,余下的只有二十三亿元。虽然新增产的一部分经济作物经过工业加工后,还可以增加国民收入,但是这部分经济作物占农产品的比重并不大。每年新增加的购买力和增加出口的很大部分,就要依靠这二十多亿元农产品去抵补。我国国民经济中工业所占的比重将来会增加,农业生产也要发展,但是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农业对经济建设规模的约束力是很大的。一九五四年和一九五六年农业歉收,都使第二年的工业生产、财政收入和基建投资下降,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 要重视研究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

第二个五年计划的编制,应该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编制有所不同,计划工作的水平要有所提高。编制第一个五年计划时,首先着眼于新的基建项目搞多少,只求新的建设和财力的平衡。现在情况已经大不相同,已经建成的和正在建设的项目已经大大增加了,如果不认真研



究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必然造成不平衡和混乱状态。而研究合理的比例关系，决不能只依靠书本，生搬硬套，必须从我国的经济现状和过去的经验中去寻找。既要研究那些已经形成的比较合理的比例关系，更重要的是研究暴露出来的矛盾。我还没有这方面的知识，需要有关部门的同志共同努力。我现在只就已经暴露了的矛盾提出一些看法。

一、重工业、轻工业、农业的投资比例，应该根据毛主席在《论十大关系》中所提出的方针加以安排。重工业投资当然仍占多数，但轻工业和农业投资的比重要增加，为轻工业和农业生产服务的重工业的投资也要增加。这样，工业建设的速度一时看来似乎是慢了，但实际上不会慢，可能加快。

二、煤、电、运输等先行工业部门，已经暴露出过去投资不够的问题，先行成为落后，这种状况要很快加以改变，否则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很不利。

三、钢铁工业和机械工业的关系，在发展先后和投资多少的问题上，也暴露了一些矛盾，要研究解决，使两者彼此配合，互相促进。

四、民用工业和军用工业的关系要处理好。发展军用工业是完全必要的，要有一些专门生产军用品的工厂。但军用工业不能孤立发展，必须建立在强大的民用工业的基础之上。

五、大厂和小厂、先进和落后的问题。大家喜欢建大厂，掌握先进技术。但从目前我国实际情况来说，应

该是有无第一，先进落后第二。钢铁工业应该有大厂，但更多的应该是中、小工厂。这样，发展快，品种多，可以满足各方面的需要。煤炭工业建设斜井、小立井比建设大立井时间短，收效快，可应急需。我们必须建设若干大厂，但外汇不足，设备不能全靠进口，要以自力更生为主。

六、正确处理建设中的“骨头”和“肉”的关系。过去我们对于处理这个关系没有经验，重视了“骨头”，忽视了“肉”。对于新建一个工业城市或工业基地的困难程度和投资数量，也估计不足。这些问题，应该及早注意，妥善解决。

七、公私合营的企业必须停止合并。已经合并而不适当的，应该退回去。要打破认为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大厂合理”的迷信。把许多原来单独核算的小厂勉强合并在一起，实行统一核算，不见得合理。我国旧的工厂多，这样的工业基础，在组织形式上不适宜于大合大并。

根据《陈云文选》（一九五六——一九八五年）刊印

## 注 释

〔1〕“黄牛”指抢购物资，高价出售，以此牟取暴利的人。

〔2〕“骨头”和“肉”是计划部门在分配基本建设投资时划分项目类别的一种形象化的说法。“骨头”一般指工业、交通建设项目。“肉”一般指配合生产和适应职工生活需要的各种设施，如科研、文教、卫生、商业服务网点、职工住宅和城市公用事业等。

# 中央军委关于裁减军队 数量加强质量的决定

(一九五七年一月)

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根据对于国际国内形势的正确分析,指出全党和全国人民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动员一切积极因素,尽快地把我国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社会主义工业国。为了实现这个伟大的历史任务,我们必须集中更多的资金投入经济建设事业,而集中建设资金的一个最有效的方法,就是进一步削减军政费用。因此,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具体地提出,把军政费用在国家财政开支中的比重,从第一个五年期间占32%,降低到第二个五年期间占20%左右。这是完全正确的,我们应当坚决执行。

根据上述指标,在第二个五年期间,预计国防费用将降低到占国家财政开支的15%左右。在军费大量削减的情况下,尽量设法合理的使用有限的军费,以保证完成党给予我们保卫祖国安全加强国防力量的任务,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大问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从各方面节约军费的开支,提倡勤俭建军,提倡少用钱多办事,把一切可用可不用的经费节约出来,都是极为必要的,但是这样还远不能弥补军费的不足。因此,我们必须坚决采

取更有效的重大措施,大量缩减军队员额。只有这样,才能够更多地节减军费开支,用于国家经济建设和保证军队的重点建设。如果不采取大量缩减军队员额的办法,就不能达到上述目的,甚至维持军队现状也有很大困难。因此,军委决定:在裁减军队数量加强质量的原则下,把我军现有的员额裁减三分之一,即从×××万人中裁减×××万人左右,保持×××万人或者更少一些的常备军队。

这次裁减的特点是数量多、范围大,涉及到各个方面、各个系统。因此,在工作上必须通盘考虑、周密计划,根据重点裁减、逐步完成的原则,通过裁撤、合并和转为平时编制的各种方式,达到裁减数量加强质量的目的。裁减的重点应当是:陆军部队(包括公安部队);技术兵种中尚未装备起来或者使用陈旧装备的部队;各种平时没有迫切需要的勤务部队;军队可以不办的和举办过多的学校;工作任务重迭或者不必单独设立的机关部门,以及全军中的其他非必需的单位 and 人员。除了在上述几个方面有重点的裁减之外,全国战斗部队必须由战时编制转为平时编制。缩减具体人员的原则,又应当是:士兵多减、干部少减,没有技术的多减、有技术的少减,没有战斗经验的多减,有战斗经验的少减。裁减的步骤,必须采取逐步实现的办法。在全军范围内,要求在1957年内缩减到×××万人,在1958年内缩减到×××万人,然后再根据国际形势的进一步好转(如果那时确有进一步好转的形势的话),把全军缩减到×××万人或者更少于这个数

目。各地区,各系统也必须根据统一规定的缩减数字,定出全面计划,逐批缩减。

在裁减军队数量之后,加强军队质量具有更重要的意义,在财政上对军队重点建设也可以给予更好的保证。根据现代战争的需要,我们必须加强技术兵种的建设,特别是空中力量和防空力量的建设。必须在全军范围内加强军事技术和军事学术的研究工作,适当地加强军事技术、学术的专门研究机构和设备,提倡全军官兵在实践中的研究和创造精神。必须努力提高指挥员的质量,加强技术干部的培养,加强全军的训练工作。加强预备役的组织和训练。只有这样,才能更有效地应付可能发生的突然事变。

实行裁减军队数量,加强质量的方针,从当前国际国内形势和我军实际情况来说,都是必要的和可能的。目前的国际形势,总的说来,是朝着缓和的方向发展的。整个社会主义阵营拥有世界上三分之一以上的人口,在地理上连成一片,反殖民主义的民族解放运动正在更广泛的地区继续高涨,世界人民的和平运动正在发展扩大;帝国主义侵略阵营,特别是美英之间,对于发动侵略战争的问题仍然存在着分歧。所有这些因素,都使帝国主义侵略集团发动新的大战增加了顾虑和困难。因此,在今后若干年内,国际间保持和平局面就有了很大的可能。当然,帝国主义侵略集团今后还会要继续制造紧张局势,战争的危險也还没有消失,我们还必须保持高度的警惕,特别是我们军队,更不能放松这种警惕,必须准备随时应付

可能发生的突然事变。在这种情况下，继续保持现有庞大数量的军队，显然不是应付突然事变的最好方法。只有坚决裁减军队数量，我们才有可能节省出经费加强国家的工业建设和军队的重点建设。即使战争一旦爆发，我们可以利用保留的骨干迅速扩充更多的军队，战胜敌人。如果我们对当前有利的国际形势认识不足，在裁减军队问题上，犹豫不决，执行不力，就将犯坐失时机的错误。从我军的实际情况来说，由于数量庞大，组织编制不合理所产生的人力、财力的浪费，都是很严重的。实行大量裁减，不仅完全有可能，而且对于改进工作，提高战斗力，也是有好处的。

这次裁减军队，是我军当前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也是一件极端复杂的工作，各级领导机关对此必须给予高度重视。既要进行细致的组织工作，又要进行深刻的思想动员工作。任何草率从事的态度，都可能造成混乱和引起不良的后果，在整编中对于所有的编余军官和士兵，必须进行妥善的处理和安置。使他们有工作做，有学校住，生活有保证。对其中大批的转业人员尤须慎重处理，事先和地方党政部门商妥，取得他们的领导、帮助和支持。这样，才能够保证这一重大任务的顺利完成。

军 委

一九五七年一月

根据中央军委办公厅提供的原件刊印

# 中共中央批转中央组织部《关于县、区、乡的组织形式和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的报告》

(一九五七年二月七日)

各省、市委，自治区党委：

现将中央组织部关于县、区、乡的组织形式和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发给你们，供参考。

关于现有乡干部的工薪待遇问题，中央不作统一规定，由各省、市委，自治区党委根据当地具体情况作出决定，报告中央备案。一般说来，大乡应具有区级领导能力（人数应少于原来的区级），大多数干部应该是原有的区级各种干部，他们的待遇一般应该是原来的区级各种干部的待遇。小乡则应按原有多乡干部待遇，这种乡干部的待遇应当比照当地农民经济情况去规定，不可超出当地农民收入过多，以免使乡干部脱离群众。各地应根据本地实际情况对于乡干部的成分和待遇进行适当的调整，并教育乡干部在实际生活上与群众打成一片，同甘共苦，在工作方法上注意克服命令主义，密切联系群众，警戒脱离群众的危险。

撤销区级机构，扩大乡的范围，是为了减少领导层

次，加强乡级领导能力，充实农业生产合作社领导骨干。因此，凡撤销区级机构的县，应将区干部下放到乡，乡干部下放到社，而不是上提，在必要时应从县、地两级抽出适合到乡工作的干部放到乡去，使乡一级至少具有原来区级的领导能力。

撤区后，县直接领导的单位增多，县委和县人民委员会如何领导乡级工作，这是一个新问题，目前尚无成熟的经验，希望各地随时注意总结这一方面的经验，报告中央。

中 央

一九五七年二月七日

## 中央组织部关于县、区、乡的组织形式和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的报告

(一九五七年一月十七日)

近两年来，随着农业合作化的发展，各地对于县、区、乡的组织形式和领导方法都已经作了不少改进，并且积累了一些经验。但在改进过程中，由于缺乏经验，也带来了一些问题。我们在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底召开的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组织部长会议上，对于这方面的问题进行了讨论。由于县、区、乡的组织形式和领导方法问题牵涉面很广，问题很复杂，这次会议除反映了一些情况外，只对其中若干问题作了初步研究，提出了一些原则性的意



见。现报告如下：

## 一、关于并乡撤区问题

一九五五年冬季以来，全国许多地区进行了并乡撤区工作。到目前为止，有些省并乡工作已经基本结束，有些省正在进行，只有少数省没有进行。根据一九五六年九月底的统计，全国已由二一八、八三五个乡镇并为一二三、八一四个乡，估计现在全国乡数约为十万多个。一般地平均三个乡并为一个乡。农村区级组织也已经撤销了很大一部分，山西、湖南两省已经全部撤销了区级机构，河北、河南、湖北、江西、陕西、浙江、吉林、黑龙江、内蒙古等省和自治区，已将大部分或绝大部分区撤销，甘肃、青海、新疆、广东等省和自治区，已经撤销了一部分区，山东、江苏、安徽、辽宁、四川、云南、贵州等省，已经进行了撤区的试点工作，只有广西、福建两省没有进行撤区工作。目前全国尚有农村区九、〇〇〇个，较一九五四年全国原有一九、〇〇〇个区减少了一〇、〇〇〇个（其中约有四、〇〇〇个是合并掉的，约有六、〇〇〇个是撤销了的）。按各省、自治区原来的计划，有的乡还拟继续并大，有些区还要继续撤销。

并乡撤区工作是加强农村工作的一项重大措施，这项工作进行得妥当与否，对于当前以至今后农村工作有着深远的影响。根据各地的经验来看，在基本上实现农业合作化的情况下，适当扩大乡的管辖范围，并且有条件

地逐步撤销一部分农村区级机构，对加强县和乡的领导是有好处的。但是，有些地方的乡划得过大了，区级组织撤销得过多过急了。并乡后，有一部分乡管辖的人口多达二万至三万人，乡人民委员会所在地离边沿村庄有远达几十里的。由于乡大事繁，乡的工作难以深入，乡下往往又得分片设点。在撤区工作上，有些地方不看具体条件，将一些深山地区和大县的区也全部撤销了。这些地方撤销区后，由于地区辽阔，交通不便，乡距县过远（有远达二、三百里的）或县领导乡的单位过多（有的多达五、六十个甚至七、八十个），以致有些县又不得不在县乡之间长期建立中间组织（如工作队、指导组、中心乡等）来领导乡的工作。

经过讨论，各地同志认为，在目前条件下，乡不宜划得过大，每个乡领导社的单位不宜过多。乡管辖的范围过大，领导社的单位过多，对于深入工作、联系群众和群众监督乡的工作都是不利的。至于乡的范围究竟以多大为宜，不可能在全国范围内作统一规定，应该由各地根据具体情况确定。但原则应该是从有利于乡的领导 and 便于群众出发，而不应该仅从农业生产的远景规划和减少县的领导单位出发。目前尚未并乡或正在进行并乡的地方，应该吸取各地并乡的经验，对原定的划乡计划再加以审查；已经结束了并乡工作的地方，确实并得过大的一些乡，可以适当划小，一般的应当稳定一个时期，以免变动频繁，影响工作。

对于撤销区级组织问题，应该分别不同情况确定。一

般说来，在一些交通方便、地区不太大、乡的单位不太多的县（撤销了区的县领导乡的单位一般以不超过三十个为宜），可以撤销区的机构，但在步骤上应该稳当一点，经过试验，取得经验，然后分期分批逐步进行。在交通不便、地区辽阔、管辖的人口和乡的单位过多的县，以不撤销区为好，或者只撤销县城附近的区，保留离县城较远的区。在一些边防地区和情况复杂、工作基础薄弱的地区，一般应该保留区的机构。有些山区和大县，撤销区后工作上困难很大的，也可以经过慎重考虑后恢复一部分区。

对于保留的区，应按党章规定作为县的派出机关，它的任务可以根据各地不同情况来确定。一般地说，原来区担负的许多日常事务，应该尽量下放到乡，使它经常深入基层检查和帮助工作。区的机构应该精干。

## 二、关于乡的领导问题

在实现农业合作化和扩大乡的区划以后，乡的任务较前繁重复杂了。如何进一步提高农村党的基层组织的领导水平，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对农村各项工作的统一领导，已成为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近年来，随着乡的扩大，各地对于加强乡一级组织已经采取了一些措施。但是，目前乡的领导上存在的问题还很多，乡干部的领导水平还不能适应当前任务的需要，不少地方程度不同地存在着忽视和削弱党的领导的现象。要改变这种情况，除了继续加强对农村党员干部的培养教育外，还需要从组

织制度上采取一些改进措施。

关于农村党的基层组织形式问题。现在很多乡在乡的党委或总支下面都已经按照农业社建立了党的组织。但是还有少数地方的党组织不是这样建立的，如有的乡采取几个社联合建立支部的办法，有的乡在乡以下按村或生产队建立支部，而在社一级却没有建立党的组织。这样，就使党对农业社的领导发生困难。为便于深入工作和加强对生产的领导，我们的意见，农村党的基层组织的层次，一般以建立两层为好。在设立乡党委的地方，社一级只建立支部，不建立总支，只有在党员人数很多，不建立总支确实不便于活动的大社，才在社一级建立总支，总支下面再按生产队建立支部。在乡里的财经、文教单位，也应该根据党员多少，单独或联合建立党的组织。对于这些单位党组织的领导，现在各地有几种不同的作法：有的归县领导，有的归乡领导，有的由县和乡双重领导。这几种作法各有利弊。讨论中，一般都认为这些单位是为群众的生产、生活服务的，目前乡一级党组织也已经加强，有必要和可能对这些单位进行领导和监督，同时这些单位比较分散，党的工作由县直接领导也有困难。因此，这些单位的党的工作以交所在乡领导为好（业务工作则由上级业务部门领导）。至于有少数单位（如中等学校），它们的工作性质和农村关系不大，乡级党组织也确实难以领导的，则可以由县直接领导。对这些财经、文教单位的党组织究竟以如何领导为好，需要继续研究，总结经验。

并乡撤区以后，不少地方已经从县、区干部中抽调了一批强的干部去担任乡的领导职务，在目前农村工作日益繁重复杂的情况下，这样做是完全必要的。这对于建立乡的领导核心，培养提高一般乡干部有着重要的作用。但是有些地方还没有注意这个问题，乡的领导骨干较弱，工作很被动。在讨论中大家一致认为，在撤销区的地方，应该抽调一些强的干部下放到乡，有的地方将全部或者大部分区干部调到县级机关，或者长期组织工作队的办法，是不妥当的。在不撤销区的地方，也应该考虑从上级机关抽调一批强的干部去加强乡的领导。但下派干部的数量也不宜过多。

并乡以后，原有的乡干部不宜全部做为脱离生产干部，其中一部分应该回到生产中去。现在由于乡大、干部多，有少数乡已开始滋长着机关化的作风：建立办公机构，规定办公时间，依靠开会和发文件进行领导，甚至规定社对乡的定期书面汇报制度等等，这是很值得注意的。我们的意见，乡干部太多的地方，应该减少一些。但减多少，如何减，需要进一步研究。

目前有许多地方农业社的支部书记太弱，有的是由农业社主任兼任，这样就很难实现党对农业社的领导和监督作用。我们认为，农业社支部书记的质量必须加强，一般应该同社主任大体相当（不宜兼任社主任）。因此，可考虑在精简行政机构时，抽出一批乡干部去担任农业社的支部书记。

在讨论中，有的地方提出农业社的支部书记误工比

较多，应该改为脱离生产干部，由社负担。我们认为，除了某些特别大的社以外，社的支部书记一般不宜脱离生产，以免增加社的负担、脱离群众。但在必要时，可以采取兼任社的政治副职或监委会主任，由社补助一定的工分的办法。

### 三、关于改进县的领导问题

目前撤销了农村区的县，在全国已占相当大的比重。但是撤区以后如何加强县对乡的领导，各地的经验还不多。

由于撤销区后县直接领导的单位增多，不少地方都在县、乡之间设立了各种不同形式的中间组织。采取通过中间组织来领导乡的工作的办法，在撤区不久，作为一种暂时的过渡办法，或者为了突击完成某些紧急性的任务是可以的，但长期采用这种形式进行工作，则是不好的。这些中间组织问题较多，它的职责、任务以及与各方面的工作关系常常纠缠不清，也很容易包办下边的工作；同时，这些干部也不安心，下边对他们也不大欢迎。

根据一些地方的经验，撤销区后，改进县对乡领导的根本办法，是加强县对乡的直接领导，依靠乡级组织进行工作。为此，必须加强乡的领导骨干，培养乡级组织的独立工作能力，并且适当扩大乡的职权（凡是可以由乡来处理的工作，应该交给乡去管理）。各项工作应该由县直接布置到乡，县级机关的干部，应该经常深入基层指导工

作。为了加强对工作的检查与研究，县委可以设置少数质量较强的巡视员来帮助进行工作。

在讨论中，各地普遍反映，在县的领导方面，党的政治思想工作薄弱，以党代政的现象很严重，亟需加以纠正。近几年来，县委普遍地实行了分口领导的制度，一般是按生产合作、文教卫生、财经、政法、武装、党群分若干口，由县委常委委员分工负责。县人民委员会的党组很多是按口建立的，由县委部长担任党组书记。有的县只有分口，不成立党组。这种分口领导的制度，对于加强党对政府工作的领导曾经起了很大作用。但由于县级工作比较具体，加以领导经验不足，分不清哪些问题应该由县委讨论决定，哪些问题应该由政府直接处理，同时政府领导干部一般较弱，实行分口领导以后，普遍存在着党委包办政府日常工作的现象。结果是党委忙于行政事务，放松了政治思想工作和对重大问题的深入考虑和讨论；同时，政权作用也不能发挥，在县政权部门工作的党员干部有意见，党外人士，非党干部也很不满意。这一问题应该加以解决。但解决这个问题需要有一个过程，不可无准备地骤然改变。解决的办法，首先是要把政权干部配备强一些。对党委分口领导的制度也要加以改变，党委各部应该贯彻执行党委一定部门对政府一定部门工作实行监督的制度，而不应该包办政府的行政工作。政府的日常工作，应该由县长、副县长分工管理。县人民委员会可成立统一的党组，有关政府工作的重大问题，经党组研究后，再提交县委讨论决定。这样做，目前还缺乏经验，这次会

议上确定各地可进行典型试验。

各地反映，目前县一级机构的设置有些多、有些乱。县级行政部门一般已增至三十多个（党群部门十几个，政府部门二十几个），最多的有四十个部门。县级行政编制一般有三、五百人，最多有达八〇〇人的。县委机关一般有五、六十人至一百多人，最多有二〇〇多人的。机构分设过细，就分散了领导力量，增加了办事手续，容易形成对区、乡领导多头。由于机构多编制大，机关事务和会议、文件、表报也随着大量增加，助长了官僚主义、文牍主义的作风。讨论中各地一致认为，县是直接领导基层的一级组织，机构不宜分设过细，很多上级业务部门不根据各县实际需要强调上下对口，是不适当的。现在县级有些机构应该适当合并，编制多的应当进行精简。今后对于县级机构的设置，上级不宜规定过死，应该给县以因地制宜的权力。

中央组织部

一九五七年一月十七日

根据中共中央文件刊印



# 中共中央关于一九五七年开展 增产节约运动的指示<sup>(1)</sup>

(一九五七年二月八日政治局通过)

## 一

一九五七年是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最后一年。这一年的经济发展，不但要保证完满地实现第一个五年计划，而且要为第二个五年计划准备巩固的基础。因此，必须在一九五七年大力地开展增产节约运动，保证一九五七年度的国民经济计划和财政收支计划的顺利实现。

增产节约是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扩大社会主义积累的基本方法。为了达到增产节约的目的，不仅需要由政府作出正确的计划，而且主要地需要人民群众进行积极的努力。因此，开展群众性的增产节约运动，是一个经常性的任务。在一九五七年，开展这一运动尤其具有特殊重大的意义。

我国的国民经济在一九五六年发生了根本的转变，表现了巨大的高涨。我国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已经基本上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建设完成的投资额，比一九五五年增长了百分之五十七，四年累计已经完成五年计划总投资额的百分之八十点五。工业总产值

预计比一九五五年增长百分之二十六，超过原定一九五七年指标的百分之五。农业虽然遭受严重灾害，但是粮食、油料、糖料、烤烟等仍然超过了一九五五年的产量，其中粮食、烤烟等并且超过了原定一九五七年的指标，棉花产量仍然保持了一九五五年丰收的水平。工人职员收入比一九五五年有了比较多的增加。除灾区以外，绝大多数农民的收入也有所增加。全国各阶级的广大群众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在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事业中，发挥了巨大的积极性。他们对于自己所取得的胜利表示满意。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在一九五六年迅速发展，说明反对右倾保守观点的斗争是必要的。

对于一九五六年工作中的这一切巨大的成就，必须给予足够的估计。对于干部和群众的热情，必须加以珍惜和保护。否则，我们就将犯严重的错误。

但是一九五六年的年度计划也有进展过快的缺点，并且在计划执行的某些方面放松了应有的控制。首先，基本建设发展的速度过高，摆的摊子过多。基本建设发展的速度超过了钢材、木材等建设物资生产增长的速度，也超过了财政收入增长的速度。这一情况，使一九五六年物资的供需之间和现金的收支之间发生了一些不平衡的现象。事实证明，这样的发展速度是不能够继续的，不作适当的调整就不可能克服目前经济生活中那些不正常的状态。其次，职工人数增加过多。一九五六年原计划增加职工八十四万人，但是由于中央放松了控制，据九月

底统计，实际到达人数比原计划多增加了一百二十多万人。同时，高等学校、中等专业学校、技工学校 and 技工训练班，也招收了过多的学生。人员增加过多的结果，不但使企业的工资开支和国家的财政开支增加过多，而且使劳动生产率下降，城市人口增加过快，城市建筑的需要也增加过快。第三，一九五六年提高了全体职工的工资标准，一般地说来这是完全需要的，但是由于同时增加了过多的职工，并且过多地扩大了职工的升级面，不适当地支付了一部分福利费用和奖金，一部分人员的工资也增加过多，这就使工资总额和福利开支增加过多过急，据估计这项开支比一九五五年增加约达二十八亿到三十亿元。此外，一九五六年所发放的农业贷款，大部分是必要的，但是也有一部分并不必要，以至贷款的增加也突破了原定的计划，比一九五五年增加二十亿元之多。因此，社会购买力的增长就大大超过了消费物资的增长，造成了市场上特别是城市中消费品供应的紧张局面。

除了上述的严重缺点以外，一九五六年的农业生产的年度计划由于遭受自然灾害没有能够完成，这个事实，对于一九五七年国民经济各方面的发展，特别是对于消费物资的生产和供应，以及财政的收入，也有不利的影响。

为了和缓物资供应和财政支出的紧张局面，使经济战线在一九五六年巨大的进军以后，转向稳步前进并且作必要的休整，必须在一九五七年对建设的规模和速度作适当的调整，必须用更大的努力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群

众性的增产节约运动。

## 二

从一九五六年经济工作所发生的问题中认真地吸取教训，统一全党同志的思想认识，是顺利地开展一九五七年增产节约运动的必要条件。

一九五六年的经验证明，建设的速度和规模不但决定于国家的财政力量，更重要的是决定于建设物资的供应力量。建设物资的生产必须想尽一切办法去积极发展，但是这种发展的速度仍然有一定的限度，不是单纯地由主观愿望所可以决定的。一九五六年基本建设的规模定得过大，正是因为编制和执行计划的时候，过多地偏重了需要，而没有足够地考虑建设物资供应的可能。而且由于在考虑建设需要的时候，往往脱离我国当前经济发展的水平，盲目追求现代化，贪新贪大，不注意物力财力的精打细算，不注意投资效果的充分发挥，从而更加扩大了建设需要和物资供应之间的矛盾。为了避免在今后重复发生基本建设规模超过建设物资供应能力的危险，各个年度基本建设规模的确定，不但要充分考虑到投资的可能，而且必须有建设物资的确实保证。对于某些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都需要的物资，在分配的时候，应当首先使人民生活最低限度所必需的物资得到供应，然后按物资的多少，确定建设的规模和速度。

一九五六年的经验又证明，人民生活改善的速度主

要决定于消费物资的供应力量。如果仅仅增加工人的工资，增加对于农民的贷款，或者提高农产品的收购价格，而不能相应地增加消费物资的供应量，那么，就必然造成市场的紧张，甚至造成物价上涨，因而也就不能达到改善人民生活的目的。在生产发展和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基础上，逐步地适当地改善人民生活是必要的，而要改善人民生活，就必须积极地发展农业和轻工业。但是农业的发展速度有一定的限度，轻工业的发展又主要决定于农业的发展，因此，人民生活改善的速度也是有一定的限度的，只能是逐步的。同时，还必须注意城乡人民生活水平的距离不要超过正常的限度，以免引起农村人口盲目流向城市。

除了以上两方面的教训以外，目前的情况还表明，国家机关和工作人员中铺张浪费的倾向，虽然经过了一九五二年“三反”运动的打击，但是在过去三年中又有了新的滋长。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要求我们对行政费用和管理费用实行最大限度的节约，以便不断地降低这些费用在财政支出中的比重，而使每年能够有更大量的资金用之于经济和文化的建设事业。这不但在经济上是必须的，而且在政治上也是必须的，因为不如此，党和政府的工作人员就会脱离广大的人民群众。这是中央历来关于增产节约运动的指示中所曾多次强调的。但是由于一九五二年“三反”运动的重点是反贪污，一九五五年反浪费的重点是在纠正民用建筑的造价过高方面。因此，不少同志对于勤俭建国、勤俭办企业、勤俭办合作社、勤俭办一

切事业的方针，仍然没有深刻的认识。相反，在有些干部中间，在最近时期还滋长了爱排场、好享受、计较名誉地位、只能升级不能降级、只能为官不能为民、不愿亲自动手、不肯精打细算、不能艰苦朴素、不能与群众同甘共苦、不爱护国家财物的情绪和作风。这种趋势如不加以纠正，是极端危险的。因此，今年的增产节约运动，除了在经济上的任务以外，还必须负起政治上的严重任务，这就是要坚决地纠正许多国家机关和企业管理机关组织庞大、人浮于事、工作松懈的现象，坚决地纠正一部分工作人员待遇过高、生活特殊、铺张浪费的现象，并且采取适当步骤，坚决地消灭在一部分工作人员中的贪污行为，借以使党和政府同人民群众的联系，进一步巩固起来。

### 三

为了缓和目前经济生活和财政收支的紧张局面，必须适当地调整一九五七年度基本建设的规模，并且根据迅速发挥投资效果、合理调整各经济部门之间的比例关系和照顾第二个五年计划发展等方面的要求，具体安排一九五七年度的基本建设计划。

中央各部门和各地方对于原定在今年开工建设的项目，应当进行具体分析，重新排队，把那些在今年和明年都有可能和有必要施工的项目，列入年度计划；把那些今年虽有可能施工、但是明年没有可能继续施工的项目，从年度计划中取消；把那些需要建设、已经设计、但是目前

限于物力和财力、还不可能施工的项目，列为预备项目。同时，对于去年已经施工的项目，也应当进行排队，把那些在今年还有可能和有必要继续施工的项目，列入年度计划；把那些今年没有可能施工的项目，推迟进度、缩小规模或暂时取消。对于这类推迟进度、缩小规模或暂时取消的项目，必须妥善地安排多余的人员，合理地利用和注意维护已经建成的厂房和其他建筑物。

各部门和各地方对于列入一九五七年计划的新建和续建的项目，特别是那些新开工建设的项目，在不妨碍建设进度和生产发展的条件下，应当实事求是地再一次审查设计文件，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克服某些项目的安全系数过大、建筑标准过高、经济技术定额过宽等缺点，以尽可能地减少物资、资金和人力的耗费。对于那些没有列入一九五七年计划的项目，应当组织必要的设计人员，和经济工作人员，抓紧时间，实事求是地进行全盘的审查，使这些项目的设计在经济上和技术上更加合理。对于改建和扩建的项目，必须充分利用原有的设备和建筑物，切实纠正盲目地追求先进水平而任意废弃旧设备旧建筑物的偏向。

在一九五七年，除了十分迫切需要的职工宿舍、学校校舍等以外，一般的民用建筑物应当一律停止建设。军队营房除少数必需的以外，大部分也应当停止建设。一九五六年已经开始建设而还没有完工的民用建筑物，必须经过国务院有关单位和省、直辖市人民政府审查批准以后，才允许续建。不论是新建和续建的民用建筑物，都

应当根据适用和经济上合理的原则，适当地降低建筑标准，纠正那种在一九五六年又重新抬头的追求豪华和标准过高的偏向。国家建设委员会应当按照实际情况，分别拟定各个地区、各种类型的民用建筑物的标准，经国务院审定以后予以公布。任何部门、任何地方和任何单位的建筑，都只允许低于这个标准，不允许高于这个标准。

在城市规划和城市建设中，目前存在着规模过大、标准过高、占地过多、求新过急的严重现象。国家建设委员会和各省、直辖市应当重新审查所有改建城市和新建城市的建设方案，适当地节减和合理地使用城市建设的投资，首先解决人民和企业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坚决地纠正上述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的不良偏向。今后旧城市的改建和扩建，应当在原有基础上逐步进行，充分利用原有的建筑物、道路和其他公用设施，尽量不拆城市原有房屋，严禁不必要地和过多过早地拆除民房。应当制止那种把大城市和附近的中、小市镇连成一片的做法，制止在离原有城市很远的地方修建医院、学校、办公场所等等的做法，以免增大附属设施和公用设施的建设费用。新城市的建设，应当照顾到当地农村的生活水平，严格控制建设规模和建筑标准，并且尽量少占耕地。

在一九五七年施工的所有单位，应当认真改进管理工作，依靠全体职工，保证工程的质量和完成工程的进度，严格节用建筑材料，努力降低建筑成本。中央决定全国所有施工单位在一九五七年必须在保证质量的条件下至少降低建筑成本百分之五。



## 四

在工业、农业的生产中，在运输、邮电和商业的经营中，都必须想尽一切办法，广泛地开展增产节约运动。

在原料和市场允许的范围内，一切工业企业都必须为增加产品的数量和品种、提高产品的质量、降低产品的成本而斗争，继续坚决反对和防止那种认为增产已经“到了顶”的保守倾向。

冶金、燃料、电力、木材和其他建筑材料等原料工业部门，应当尽可能地提高生产指标，并且深入发动职工群众，开展劳动竞赛，从提高技术、改善工艺规程、改进定额、改善管理制度等方面，寻找增产的有效办法，推广先进经验，采取最能见效的技术组织措施，尽最大的努力超额完成国家计划。

为了迅速地增加金属和燃料等的生产，应当在通盘考虑大、中、小型厂矿的经济效果之后，抽出适当的物资、资金和工程技术人员，并且根据资源等可能条件，积极恢复和适当扩充原有小型的煤矿、金属矿、炼铁厂、水泥厂和电站；在必要的时候也可以新建这类的小型厂矿。对于这类小型厂矿的恢复、扩建和新建，地方工业部门应当加以充分注意，有计划地进行。

原材料的节约是一九五七年工业节约的主要任务。机器制造、化学、纺织、食品、造纸、医药等制造工业部门，必须在保证质量的条件下，大力降低原材料消耗定额，建

立和健全材料管理制度,并且加强企业之间的协作,以减少原材料的耗损而增加生产。机器制造部门尤其应当注意金属的节约,并且注意制造为社会所需要的零星产品、部件和零件。

所有制造部门都应当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广泛采用代用原料,充分地利用废料,开辟新的原料资源,增加生产。

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应当提高技术,合理利用原料,消除浪费原料的现象,努力增产为人民群众需要的日用消费品。

原料供应部门必须努力收购工业原料,尽量满足生产企业的要求。努力完成收购棉花的任务,对于一九五七年的轻工业生产和市场供应有重大的关系;有关的各地方党委对于这个迫切任务必须抓紧时间,认真负责地加以完成。在原料缺乏和生产任务不足的某些工厂和手工业合作社中,应当抓紧时间检修机器,多招揽机器修理、农具修理和其他人民生活用品的修补业务,并且可以试制一些用料不多、费工较大的优质优价的新产品。某些接近农村的工厂和手工业合作社,在农忙季节还可以支援农业生产。

不论是原料生产部门或加工制造部门,也不论是生产资料部门或消费资料部门,它们在增加生产和厉行节约的时候,都应当努力提高产品的质量,降低次品率,减少以至消灭废品。各部门和各地方应当对所属企业的产品质量提出具体的要求,并且规定制度,严格检查,保证

实现。

增产和节约都必须防止各种不正常的办法，例如只顾数量、不顾质量，只顾生产、不顾安全，或者放松设备检修、浪费资源、忽视均衡生产等等，坚决避免任何名义上是增产节约、实际上反而造成巨大浪费的现象。

某些地方不适当地合并公私合营工厂，不仅妨碍了生产的增长，而且造成了多方面的浪费。因此，凡是现在还没有合并的公私合营工厂，不要勉强合并；凡是合并得不适当的，应当加以调整。不宜于统一核算的分散的工厂，应当采取各负盈亏的办法。应当恢复这些工厂原有的产品品种、协作关系和供销关系，并且纠正盲目扩大管理机构和随意增加非生产人员的现象。

在农业方面，应当充分利用农业生产合作社已经初步巩固的有利条件，领导广大农民群众继续开展农业增产运动，为积极争取一九五七年的丰收而斗争。各级党委必须坚决贯彻执行一九五六年九月十二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关于加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生产领导和组织建设的十一项指示，并且根据一九五七年一月全国省、市委书记会议关于农业工作的讨论，根据当地一九五六年发展农业合作化的经验和发展农业生产的经验，加强对农业生产的具体指导。应当推行去年行之有效的各种增产措施，发展粮食、棉花和其他经济作物的生产，发展畜牧业和农村副业的生产，发展土特产的生产，以争取农业生产的全面高涨。

进一步巩固农业生产合作社，是顺利推行各种农业

增产措施以增加农业生产的决定性的环节。各级党委应当组织足够的力量,由负责干部亲自领导,深入农村,发动广大群众和合作社干部检查上一年的工作,发扬民主,肯定成绩,纠正错误,调整社内外的关系,认真实施社员代表大会制度,进一步提高他们办社和增产的积极性。应当切实帮助合作社干部作好一九五七年的增产计划和各项生产准备工作。去年许多合作社发生过不计算成本、浪费劳动力和浪费资金的现象,在今年的工作中应当加以克服。

一切农业生产合作社应当继续执行“勤俭办社”的方针。应当提高社员和干部爱护公共财物的观念,反对贪污、浪费和不关心公共财物的行为;应当加强经营管理工作,在生产上做到精耕细作,精打细收;在基本建设上做到合理使用资金和贷款,充分发挥投资效果;应当合理地组织劳动力,提高劳动生产率,并且使合作社的集体经营和社员的家庭经营形成正确的分工合作,发展多种经济。

铁路、公路、水路、航空和邮电各部门,都应当采取切实的措施,提高设备和人员的效率,加强调度工作,以增加运输和通讯的能力。运输各部门还应当努力节约燃料的消耗。各托运单位应当加强计划性,改善物资调拨制度,平衡季度之间的运输,克服各种浪费运输能力的现象。

各个商业部门必须继续努力降低商品流转费用。应当按照商品流转方向,减少流转环节,合理调整批发和零售的机构,通过最经济的路线输送商品,克服商品调拨中

货不及时和迂回运输等缺点。应当简化统计、财务和会计等方面的制度，精简非业务人员，充实营业人员。同时，应当发挥职工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推行各种合理的有效的办法，保持商品的质量，减少商品的损坏，特别是减少鲜活商品的损耗，减少以至消除商品在储存、保管、包装和运输中的损失和浪费现象。

## 五

在今年的增产节约运动中，必须大量节减各行政部门、事业单位和企业单位的行政管理费用，严格限制人员的增加，合理调整现有的机构和人员，逐步改变某些不合理的工资福利制度，并且彻底地消灭铺张浪费现象。

第一，所有企业单位、事业单位和人民团体必须严格控制人员编制。一九五七年劳动计划中规定增加的人员，只能在原有人数以内统一调剂，一律不准自行招收。各部门的中等技术学校、技工学校和各企业附属的技工训练班所需要的新生，只准首先在现有机关、部队、团体、企业、事业单位的多余人员中招收。如果确需另外招收新生，必须由劳动部审查批准。地方企业单位所需要的初级技术人员，应当从中央各部门所属技术学校多余的毕业生中调配。

第二，认真执行精减上层、加强下层的方针，合理调整现有的机构和人员。无论是行政单位、企业单位和事业单位的管理机构，都应当进行精简。但是在精简机构

的时候,对于被精简的人员,必须作好安置,否则不允许裁减。为了精简机构和改进工作,各方面业务的主管人员,应当按照业务的分工,分别地深入下层,调查机构庞大、手续繁多、办事迟缓的实际情况,亲自了解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和形式主义给下级机关和基层单位所造成的困难和恶果。同时,应当普遍发动所属单位的职工群众,认真讨论简化手续、减少表报、提高效率、改进工作的有效办法。然后由主管单位根据调查结果和群众意见,进行综合研究,拟定调整机构、合理使用人员的具体方案,加以实施。

第三,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企业单位和事业单位的职工,在一九五七年除个别调整以外,一般地不增加工资,也不提高级别。一部分人员工资过高的,应当适当予以降低。在全体工作人员中,应当大力地提倡同群众共甘苦的作风。企业职工的附加工资和奖金,机关人员的福利费开支,都必须进行整理,凡是标准过高的,都应当适当降低;凡是不合理的,都应当采取适当步骤,逐步加以废除。各部门和各地方自定的有关职工的工资、福利和奖金等制度,有关技工学校学生的助学金制度,应当一律报送劳动部统一审查整理。

第四,加强经济核算,降低企业单位和事业单位的管理费用。各部门应当会同工会组织研究如何吸引广大职工来监督企业单位和事业单位中降低管理费用的办法和制度,经过试点,取得经验,并且提出普遍推行的方案。所有企业单位和事业单位,都应当改善经营管理,节减事

业费开支,节约流动资金,并且克服物资的损失和浪费的现象。

第五,对于机关、团体、部队、学校、企业和事业单位的集体消费,应当有系统地加以节减。为此就必须严格地节约行政费用,降低供应标准,取消某些不合理的特殊供应办法,停止购置家具、汽车和自行车等用品,整顿和减少各部门和地方的内外刊物,减少办公杂支,除特定场合外严禁请客、送礼,并且克服在开会方面、文娱活动方面以及对外活动方面的浪费现象。凡是市场上供应不足的商品,对于机关、团体、部队、学校、企业和事业单位的供应,应当分别情况加以调整。例如煤炭、纸张、副食品等,应当大大地降低供应标准,公用布匹则应当停止供应。

第六,在群众中广泛开展储蓄和认购公债运动。这是减轻市场供应紧张的重要方法之一,应当大力地号召群众在自愿的原则下积极进行。

第七,努力节约粮食。所有机关、部队、团体、学校、企业和事业单位,在一九五七年,平均每人每月应当节约一斤粮食。同时,应当在城市和农村的人民群众中提倡粮食的节约。

## 六

一九五七年增产节约运动的任务是很艰巨的。要完成这一任务,必须充分地发动群众和依靠群众。各单位

有关增产节约的方案、具体措施、各项制度和办法，都应当由负责人员在群众大会上进行动员，有领导地组织广大群众酝酿讨论，做出决定，并且由群众监督实行。

动员群众的中心问题，是要使群众对于增产节约的斗争不但充满热情，而且充满对于前途的信心。由于一九五七年的建设规模将要有所调整，在经济生活中将遇到某些暂时的困难。例如：某些基本建设单位多余的工人需要安排，某些工厂不能充分开工，市场的供应还会继续紧张，等等。必须向群众进行有系统的解释工作，指出这些暂时的困难在经济落后国家的建设初期是难以避免的。同时必须指出：在一九五六年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取得巨大胜利，许多生产指标和建设项目提前完成一九五七年计划以后，为了巩固这种胜利，总结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经验，准备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实行，一九五七年的建设事业在前进的道路上，适当地放慢一些脚步，是完全必要的。这对于我们下一步的发展，不但没有妨碍，而且有很大的利益。最重要的是要告诉群众，从整个说来，我国的国民经济在一九五七年仍然是向前发展的，而且发展速度仍然是快的。在一九五七年，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取得的胜利将会进一步得到巩固；工农业生产将继续增长；物资的供应将相应地增加；财政的收支将恢复平衡；除了少数指标以外，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将超额完成。目前工农业生产和市场供应方面的一些暂时的困难都是可以克服的。只要我们想尽一切办法，一面增加原材料的生产，一面节约原材料的使用，那么，原材



料的紧张状况就可以好转。只要我们控制职工人数和工资的增长,节减集体消费,开展储蓄运动,市场的紧张状况就可以好转。现在许多地方的增产节约运动已经开始收到成效。一切增产节约的好经验,都应当大力地加以宣传和推广。只要我们坚持贯彻增产节约的方针,现在经济上的一些困难情况,在几个月以后,就一定可以有显著的好转。任何忽视成绩、夸大困难的倾向都是错误的,有害的。全党同志应当同人民群众团结在一起,为开展一九五七年增产节约运动,全面地完成一九五七年的国民经济计划而积极奋斗。

中央要求国务院各部门党组、各省市党委和军委根据这个指示,结合实际情况,作出本部门本地区增产节约的具体方案,在三月底以前报告中央。方案中应当包括开展运动的办法、步骤和增产节约的初步指标,鉴于过去增产节约运动中财务混乱的情况,责成财政部研究制定有关增产节约的财务计算办法和各种财务管理制度。

根据中共中央文件刊印

## 注 释

〔1〕 中共中央于一九五七年二月十五日将这一指示发往上海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西藏工委,中央各部委,国家机关各党组,人民团体各党组,总政治部,国家机关党委。要求各地收到指示后,立即转发各地委,各县委,城市的区委,军队的团委,并在党内刊物上发表。

# 中共中央关于今后 干部工作方法的通知

(一九五七年二月八日)

一、在过去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在根据地工作中，我们党培养和训练了大批的革命工作干部，这是我们赢得革命战争的胜利和在胜利后组成新的国家的重要条件。在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前后，中国革命处在一个飞跃发展的时期。在这个时期内，我们彻底地摧毁了国民党的旧的全部国家机构，建立了新的国家机构，紧接着我们就进行了伟大的民主改革，并在以后又进行了伟大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建立和发展了很多社会经济、文教事业及其他事业。在这个时期，我们需要很多具有革命意志和一定工作能力的干部，我们在伟大的革命斗争中也迅速地培养和提拔了大批这样的干部，因而我们能够胜利地完成这个时期革命和建设的伟大任务。在这个时期，我们采取的干部工作的方法，是大批地迅速地培养和提拔，许多从群众运动中产生的积极分子，只经过几个星期或者几个月的训练，就派到工作中去了，另有许多人则完全没有经过训练，就从群众运动中提拔起来作为干部，各种干部中较为优秀的，他们的职务也迅速地往上提升，有一年提升一次甚至几次者。这样

的干部工作方法，在革命飞跃发展的时期，是正确的，必要的，不这样作，就不能适应当时工作发展的需要。这样作，使我们广大的干部在伟大的群众斗争中受到了很好的锻炼。但是，这样的干部工作方法也包含着重要的缺点。这就是对于这些干部还来不及进行认真的审查和教育，多数干部对于他们所担负的工作没有充分的准备，又因调动太快，干部很难积累起工作的经验，在他们的思想中也还存在着大量的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没有清除。因此，我们的多数干部对于他们所担负的工作，还不能说是完全称职的，还是不熟练和没有很多经验的，也还有一些人对于他们所担负的工作是不适当的。这些缺点，必须在以后的工作中认真地逐步地予以克服。

现在，我国革命飞跃发展的时期业已过去。我国已经进入建设时期，即经常发展的时期。我们新的国家机构和各种事业机构业已组织起来，这些机构现有的干部人数已经不是过少，而是有些过多。当然，我国的各种事业在今后是会不断有所发展的，但是不会有突然的大量发展。因此，我们今后的干部工作的方法必须有一个根本的改变，就是要从过去大批地迅速地提升干部职务的方法改变为稳定干部职务、提高干部能力的方法。自然，根据经常时期对于干部的需要，今后还是要提升一些干部的职务的，某些干部所担负的职务也还要进行一些调整，此外，在干部职务不变的情形下，由于他们的工作年龄的延长，思想、政治领导水平的提高和业务熟练程度的增进，也应该增加他们的劳动报酬。对于这些，都需要

在今后规定一些相应的制度。但是,无论如何,在今后建设时期,不能再像过去革命飞跃发展时期那样大批地迅速地提升干部的职务了,而稳定干部的职务,提高干部的思想、政治领导水平和业务工作能力,应该成为今后干部工作的基本方法。同时,也必须采取这样的干部工作的方法,才能使我们的多数干部克服上面所说的那些缺点,并且称职地担负起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各种繁重任务。这就是说,必须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使干部的职务稳定起来,使干部的工作专业化,避免不必要的调动,以便他们在相当长时期的工作中积累经验,增加知识,成为有经验有能力的熟练的工作人员。

在基本上稳定干部职务的条件下,应该采取一些措施来提高干部的思想、政治领导水平和业务工作能力。关于这些措施,请中央各部门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加以研究,并提出意见,以便在不久以后能够定出相应的计划。

二、目前我们的国家机关和企业、事业机关脱离生产和非生产的工作人员已经过多,这在经济上是极为不利的,并且助长官僚主义的发展。现在对于生产人员脱离生产的道路还没有加以限制,而脱离生产的人员回到生产中去的道路也还没有开辟,这种情况必须迅速地加以改变,否则将造成严重的错误。为了改变这种情况,必须实行以下各项:

1、各级党政机关和群众团体,应该按照国务院关于国家机关停止增设机构和扩大编制的通知,一律停止增设机构和增加人员。所有企业、事业机关的非生产人员

必须严格地加以限制。

2、今后生产人员脱离生产，必须严加控制。各地基本上不应该再从农村中提拔脱离生产的干部，如有个别机关确实需要提拔，须经省委或省委指定的机关批准；工矿企业、事业机关如果需要提拔工人当干部，须经市委批准。

3、所有党政和群众团体的机关以及企业、事业机关脱离生产和非生产的工作人员，凡是可以让他们回到生产中去、而他們又能够回到生产中去，应该尽量动员他们回到生产中去；暂时不能回到生产中去，也应该创造条件使他们在以后的适当时机回到生产中去。

4、从上级机关抽调一批强的干部到乡去担任工作，以便动员一部分乡干部回到生产中去。

三、基层单位的工作是很重要的，各级党、政、群众团体和经济机关应该十分注意加强基层单位的工作。这里所说的基层单位，在农村是指农业生产合作社和国营农场，在城市是指工厂、矿山和手工业生产合作社，这是最多最基本的两类基层单位；此外，还有交通运输方面的基层单位，商业方面的基层单位，以及学校、机关等等。这些基层单位，是我国整个社会和国家的基础。所有的群众，都生活在这些基层单位中。我们所有的思想、政治、经济、文化工作都应该以这些基层单位的工作为基础。基层单位的工作做好了，一切工作就有了坚实的根基；基层单位的工作做不好，一切工作就不能做好，社会秩序就不容易安宁。在目前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基本上完

成，几乎所有的群众都已经组织起来，从事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基层单位的工作较之过去任何时候都更为重要了。因此，所有党、政、群众团体和经济机关都应该切实加强基层单位的工作，都应该派强的干部到基层单位中去工作，而不应该把强的干部从基层单位抽走，削弱基层工作。对于重要的基层单位，如大的工厂、矿山、学校，大的农场或农业生产合作社等，更应该如此。这样，一方面加强了基层单位的工作，同时也是培养锻炼干部的一种最重要和最好的方法。所有的领导干部，都必须有基层工作的经验。没有这种经验的，应该设法取得这种经验，已经有了经验的，也应该经常联系基层，了解基层工作中的情况，研究基层工作中所提出的问题。

四、干部工作方法的这种改变，关涉到很多干部的切身问题，并且同一部分干部目前的思想状况有抵触。望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地委、县委，中央各部门，中央国家机关和人民团体各党组，根据这个通知进行讨论，并且有领导地提到各机关、企业的干部中进行讨论，一方面，很好地向干部们进行解释，另一方面，广泛地向干部们征求关于今后干部工作的意见，引导干部集中注意地去努力提高自己的思想政治领导水平和业务工作能力，而不要集中注意地去追求职务的提升，使多数干部在现在的职务上安下心来，努力学习，而不要引起失望和消极的情绪。各地讨论的意见，请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和各党组汇集起来，在本年四月上旬以前报告中央。

根据中共中央文件刊印

# 中共中央批发中央统战部 《关于继续发挥工商业 联合会的作用的意见》

(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五日)

上海局,各省、市委,自治区党委:

中央同意中央统战部《关于继续发挥工商业联合会的作用的意见》,兹发给你们,请研究执行。

中 央

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五日

## 关于继续发挥工商业 联合会的作用的意见

(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二日)

中央:

### (一)

几年来,工商业联合会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在反映工商业者的意见、代表他们的合法利益、团结教育他们接

受社会主义改造、指导他们改善生产经营、组织他们学习和参加爱国运动等方面做了不少的工作。在全行业合营高潮中，工商联在协助清产定股、人事安排和经济改组等方面，也发挥了积极作用。

为了进一步调动工商界的积极因素，组织、推动工商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和协助政府继续完成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我们需要工商联继续工作，一方面代表工商业者的合法利益，反映他们的意见和要求，对党和政府的工作进行监督；另一方面组织和推动资产阶级分子进行自我改造和参加社会主义竞赛。工商联的发挥上述两方面的作用，不仅为国家所需要，而且也是符合工商界的要求的。因此，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工商联仍然需要存在，并且需要进一步发挥它的积极而有效的作用。

## (二)

关于今后工商联的性质，它仍然应该是以原来的私营工商业者为主体的、各类工商业者联合组织起来的人民团体。

工商联的工作，过去是、今后仍然应该是以资产阶级分子为主要对象。大、中城市的工商联有一些过去对小商小贩和手工业者的工作有所忽视，这是不恰当的。今后应该在继续加强对资产阶级分子工作的同时，加强对小商小贩和手工业者的工作；县和集镇的工商联则应该



主要对小商小贩和手工业者进行工作。

今后工商联的基本任务应该是充分代表工商业者的合法利益，向有关国家机关和业务部门反映他们的意见和要求，并提出批评和建议，提高他们工作和自我改造的积极性，并发挥他们对党和政府工作的监督作用；大力推动工商业者积极参加社会主义竞赛，发挥他们的技术和专长；组织工商业者进行学习，组织工商业者参加爱国运动和社会活动；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和业务水平，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此外，全国工商联和一些主要省、市工商联还应该参加必要的国际活动工作。

### (三)

工商联现有组织形式基本上不予改变，但可以根据工商业者的要求和工作的需要，作必要的调整：

一、除保持原来的企业会员外，可以依照自愿原则吸收原来从事私营工商业的个人为会员。由于企业合营后许多原来的企业负责人在合营企业中的地位已经有所变更，他们中有一部分人并且已经在国营企业和国家机关担任工作，由于工商联的工作今后将日益以资产阶级的改造为主，这种改变是必要的。个人会员包括：国营企业、公私合营企业、合作社、合作性质的企业中原来的私营工商业者、其他私营工商业者；不在职的资本家；以及其他与工商界有关的政治代表性人物。

二、同业公会是工商联的专业性组织，是工商联的

组成部分；它应该继续保留并发挥作用。同业公会应该成为专业公司(或者局)进一步改造私营工商业者的有力助手。它应该着重代表本行业工商业者的合法利益，反映他们的意见和要求；推动本行业工商业者积极参加社会主义竞赛，并协助本行业改进公私共事关系。它的机构可以根据工作的需要和工商界的要求适当地进行精简或调整，但是原有人员都应该得到适当的安置。

三、大、中城市的区工商联一般应该保留。区工商联在市工商联的领导下进行工作，它应该着重对于原私营工商业者进行政治教育，推动他们参加爱国运动和社会活动。

四、县工商联应该保留，集镇的工商联组织一般也应该加以保留。县和集镇工商联应该着重对小商小贩和手工业者进行工作，代表他们的合法利益，反映他们的意见和要求，组织他们进行政治和文化学习，并帮助他们搞好生产经营。

县和集镇供销合作社和手工业合作社的负责人应该积极参加工商联的工作。

#### (四)

工商联机关干部是国家干部的一部分。对于他们的政治待遇和物质待遇应该同国家干部一视同仁，不应有所歧视。工商联应该把他们的机关干部认真地管理起来，加强对他们的教育和培养，并给予应有的关怀和照

顾。对于这一方面的工作，各级党委统战部应该加以指导和协助。

工商联机关中的党员干部，在参加党的会议，听党内报告，看党内文件，参加党内学习等方面，应该和同级党员干部享有完全同等的待遇。

## (五)

为了充分发挥工商联的积极作用，必须进一步加强党对于它的领导：

一、各级党委统战部应该在党委领导下改进和加强对于工商联工作的领导。对于工商联要给予信任，尊重它的组织独立性，充分地发挥它的积极作用，放手让它去处理它的日常会务。过去有不少地方对于工商联的工作往往包办代替、事事干涉，以至采取组织控制的办法，或者使它成为一个单纯的“办差”机构；这必然会损害工商界和工商联组织的积极性。对于工商联应该加强政治领导，反对采取任何组织控制的办法。有关工商联工作的方针、政策等重大问题，统战部必须管，但要通过适当方式同工商联的负责人进行协商，不能强加于人；至于它的日常会务，则一定不要干涉。政府的行政和业务部门对于工商联（包括同业公会）提出工作上的要求，应该同它的负责人协商处理。

二、目前各地工商联党组，由于成员多系各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他们本身工作忙，因而许多工商联党组开

不起会，不能实现集体领导，个别地方至今还未建立工商联党组。为了便于进行工作，工商联党组可以由负责领导和实际参加工商联工作的负责党员干部组成；一般地可以吸收经常领导工商联工作的党员副主委或者常委、工商联机关中的党员负责干部、党委统战部管理工商联工作的负责干部参加。工商联党组对于工商联工作中有关方针、政策性的重大问题应该加以讨论；日常会务和具体工作，则应该由工商联自己处理。工商联召开会员代表大会或者举行规模较大的活动的时候，如果需要，可以吸收有关部门的负责党员同志临时组织大会党组，以加强对这些大会或活动的领导。

三、工商联机关中的党员干部，应该努力团结非党干部发挥他们的工作积极性，防止和克服包办代替的工作作风。目前担任工商联秘书长的党员，一般可以撤回，担任副秘书长的，可以根据具体情况酌予保留。在工商联工作的某些作风不好，同工商界人士关系搞得很不好的党员，应该坚决撤回。

四、为了充分发挥工商联的积极作用，应该帮助它加强上级工商联组织对下级工商联的领导，密切它们之间的关系。

中央统战部

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二日

根据中共中央文件刊印

## 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讲话提纲）<sup>〔1〕</sup>

（一九五七年二月）

毛 泽 东

（一）两类矛盾：敌对阶级之间，人民内部之间性质不同，处理方法不同。

首先，分清敌我，分清是非。

人民日报的文章<sup>〔2〕</sup>，说的是国际方面。

专政制与民主集中制。

大民主与小民主。

早一点取消专政吗？

专政所适用的范围。

民主是目的吗？没有抽象的自由，只有阶级的具体的自由。

思想问题，人民内部的问题不能采用粗暴的方法——行政命令的方法和武断压制的方法。

民族资产阶级放在哪一类？

新问题：马恩，列，斯大林。

本来容易混淆：右的——不分敌我，认敌为我；“左”的——过分强调敌我，又将第二类误为第一类。

1942年提出的“团结——批评——团结”方针，后来推广于党外，逐步发展到整个人民内部，发展到解除武装的敌人，1956年五月十大关系。

## (二)肃反

比较起来，我国做得最好，比苏联，比匈牙利。

有反必肃，有错必纠。

过火与漏斗都有。

群众肃反与公安部肃反。

今年和明年应来一次大检查，全面总结一次。中央由人大常委与政协常委主持，地方由省市人委与政协主持。

还有反革命，但是不多了。

是否应当大赦？

## (三)社会主义改造——合作化

合作化没有优越性吗？

应支持农民，反对歪风。

争取五年内巩固合作社，接近或达到富裕中农水平，习惯于集体生活。

生活已有改善——七年增产1,400亿斤，平均60元。

还有百分之几到十几的缺粮户，有的地方已无缺粮户。

几年内不增加征购量，逐步取消农村统销，粮、肉、油自给(一般)。

## (四)资本主义改造

也有一股风，说是资本家不改造了，工人也有两

重性。

工人、资本家已经一样了吗？

(五)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

有很大进步，也有歪风——波动，怪议论，想杀人，想学匈牙利，要大自由，讨厌马克思主义，只钻业务赚薪水。

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进一步改造自己。

(六)增产节约，反对铺张浪费

四年来，歪风又发展了。

(七)统筹兼顾，适当安排

这是战略方针——例如：救灾、统销、安排工商就业、统战安排等。

从六亿人口出发，节育。

去年就业近三百万。

广州、上海等处还有一些人失业。

百分之四十、四百万、八十万、九万人不能入学和安排就业问题。

(八)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

两方面的斗争。

毒草不是香花，教条主义也不是香花。

老干部不能批评吗？

新老干部的关系：一视同仁，又不能一视同仁，领导核心。

种牛痘。

北京不能批吗？

钟惦斐、陈沂、陈其通、马寒冰〔3〕。

马克思主义是和它的敌对思想作斗争发展起来。历史上的香花开始几乎均被认为毒草，而毒草却长期被认为香花。香毒难分，马、列、达尔文、哥白尼、伽利略、耶稣、路德、孔子、孙中山、共产党、孙行者、薛仁贵。

马克思主义还要发展，如何发展？

从存在出发：六亿人口；小资产大王国，顽强地表现自己，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长期耐心的教育。

许多人实际上不赞成这个方针。

文章要有说服力，不能用形而上学的方法。

人民日报何时答复四个人〔4〕？似乎毫无准备，也不请示。

这是一个人民内部教育自己和发展自己事业的方针。“无产阶级要解放自己，必需解放全人类”，“在阶级斗争中，改造剥削者，同时也改造了自己”。治病救人。

统一战线，长期共存，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治病救人，反对形而上学、教条主义——联系起来。

(九)如何处理罢工，罢课，游行示威，请愿

(十)闹事，出乱子，都不好么？

罢工、罢课、游行、请愿、闹事的二重性。

匈牙利事件的二重性。

批判斯大林事件的二重性。

反苏反共事件的二重性。

生人死人的二重性。

美国不承认我们的二重性。



出现几篇错误文章的二重性。

没有大作品、好影片的二重性。

物极必反，不及则不反。

中国人穷与愚(不识字)的二重性。

外国人富与智(文化高)的二重性。

如果打三次世界大战，也有二重性。

国际间互相影响、互相渗透。

向坏处着想，打大战，怎么办？打败仗怎么办？**打败仗就是打胜仗。**

目前一个长时间内还不会，可能有十几年，可能更长。

主要矛盾是帝国主义互争殖民地，互争亚非。

(十一)少数民族与汉族民族问题，西藏问题

(十二)中国可能在三、四个五年计划内，初步地改变面貌

工业化的道路，可以和苏联有些不同。

重、轻、农的比例是否可以六比一？重工业还是优先，但走新的道路是否比苏联那样(二十一年内增加1,400万吨钢)工业化速度反而快些？如果给我们二十一年(从1950—1970)，是否可以基本上工业化，而不止1,800万吨钢(由90万吨开始)？

这个问题我们还缺少经验，总之要有广大市场，要看六亿至八亿人口。

还是要学习苏联。苏联不好吗？别国也要学，但谁给装备和技术呢？

## 十大关系：

- (一)重与轻、农关系
- (二)沿海与内地关系
- (三)经济与国防关系
- (四)国家与生产单位(工厂、合作社)与个人关系
- (五)中央与地方关系
- (六)汉族与少数民族关系
- (七)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及其他人关系(长期共存)
- (八)敌我关系
- (九)人民内部关系(是非关系)，一家与百家关系(百家争鸣)
- (十)中国与外国关系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 注 释

〔1〕 这是毛泽东写的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讲话的提纲，题目为《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后来在这篇讲话的记录整理稿上，毛泽东将题目改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2〕 指《人民日报》一九五六年四月五日登载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二十九日登载的《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

〔3〕 钟惦棐，当时任《文艺报》编委兼艺术部主任。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十五日，他以“本刊评论员”名义在《文艺报》第二十三号发表了《电影的锣鼓》一文。陈沂，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化部部长。陈其通，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化部副部长。马寒冰，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化部干

部。一九五七年一月七日，陈其通、马寒冰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化部干部陈亚丁、鲁勒联名在《人民日报》发表了《我们对目前文艺工作的意见》一文。

〔4〕 指陈其通、陈亚丁、马寒冰、鲁勒。

#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 内部矛盾的问题<sup>(1)</sup>

(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

毛 泽 东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是一个总题目。为了叙述的方便，分为十二个小题目。在这里，也要说到敌我矛盾的问题，但是重点是讨论人民内部的矛盾问题。

## 一 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我们的国家现在是空前统一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以及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迅速地改变了旧中国的面貌。祖国的更加美好的将来，正摆在我们的面前。人民所厌恶的国家分裂和混乱的局面，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我国的六亿人民正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下，团结一致地进行着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但是，这并不是说在我们的社会里已经没有任何的矛盾了。没有矛盾的想法是

不符合客观实际的天真的想法。在我们的面前有两类社会矛盾，这就是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这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类矛盾。

为了正确地认识敌我之间和人民内部这两类不同的矛盾，应该首先弄清楚什么是人民，什么是敌人。人民这个概念在不同的国家和各个国家的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拿我国的情况来说，在抗日战争时期，一切抗日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日本帝国主义、汉奸、亲日派都是人民的敌人。在解放战争时期，美帝国主义和它的走狗即官僚资产阶级、地主阶级以及代表这些阶级的国民党反动派，都是人民的敌人；一切反对这些敌人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在现阶段，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一切反抗社会主义革命和敌视、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社会势力和社会集团，都是人民的敌人。

敌我之间的矛盾是對抗性的矛盾。人民内部的矛盾，在劳动人民之间说来，是非對抗性的；在被剝削阶级和剝削阶级之间说来，除了對抗性的一面以外，还有非對抗性的一面。人民内部的矛盾不是现在才有的，但是在各个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在我国现在的条件下，所谓人民内部的矛盾，包括工人阶级内部的矛盾，农民阶级内部的矛盾，知识分子内部的矛盾，工农两个阶级之间的矛盾，工人、农民同知识分子之间的矛盾，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同民族资产阶级之

间的矛盾，民族资产阶级内部的矛盾，等等。我们的人民政府是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府，是为人民服务的政府，但是它同人民群众之间也有一定的矛盾。这种矛盾包括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同个人利益之间的矛盾，民主同集中的矛盾，领导同被领导之间的矛盾，国家机关某些工作人员的官僚主义作风同群众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也是人民内部的一个矛盾。一般说来，人民内部的矛盾，是在人民利益根本一致的基础上的矛盾。

在我们国家里，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属于人民内部的矛盾。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一般地属于人民内部的阶级斗争，这是因为我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有两面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它有革命性的一面，又有妥协性的一面。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它有剥削工人阶级取得利润的一面，又有拥护宪法、愿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一面。民族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地主阶级、官僚资产阶级不同。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存在着剥削和被剥削的矛盾，这本来是对抗性的矛盾。但是在我国的具体条件下，这两个阶级的对抗性的矛盾如果处理得当，可以转变为非对抗性的矛盾，可以用和平的方法解决这个矛盾。如果我们处理不当，不是对民族资产阶级采取团结、批评、教育的政策，或者民族资产阶级不接受我们的这个政策，那末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就会变成敌我之间的矛盾。

敌我之间和人民内部这两类矛盾的性质不同，解决的方法也不同。简单地说起来，前者是分清敌我的问题，

后者是分清是非的问题。当然，敌我问题也是一种是非问题。比如我们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这些内外反动派，究竟谁是谁非，也是是非问题，但是这是和人民内部问题性质不同的另一类是非问题。

我们的国家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这个专政是干什么的呢？专政的第一个作用，就是压迫国家内部的反动阶级、反动派和反抗社会主义革命的剥削者，压迫那些对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破坏者，就是为了解决国内敌我之间的矛盾。例如逮捕某些反革命分子并且将他们判罪，在一个时期内不给地主阶级分子和官僚资产阶级分子以选举权，不给他们发表言论的自由权利，都是属于专政的范围。为了维护社会秩序和广大人民的利益，对于那些盗窃犯、诈骗犯、杀人放火犯、流氓集团和各种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坏分子，也必须实行专政。专政还有第二个作用，就是防御国家外部敌人的颠覆活动和可能的侵略。在这种情况下出现的时候，专政就担负着对外解决敌我之间的矛盾的任务。专政的目的是为了保卫全体人民进行和平劳动，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谁来行使专政呢？当然是工人阶级和在它领导下的人民。专政的制度不适用于人民内部。人民自己不能向自己专政，不能由一部分人民去压迫另一部分人民。人民中间的犯法分子也要受到法律的制裁，但是，这和压迫人民的敌人的专政是有原则区别的。在人民内部是实行民主集中制。我们的宪法规定：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宗教信仰等等自由。我们的宪法又规定：国家机关实行民主集中制，国家机关必须依靠人民群众，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必须为人民服务。我们的这个社会主义的民主是任何资产阶级国家所不可能有的最广大的民主。我们的专政，叫做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这就表明，在人民内部实行民主制度，而由工人阶级团结全体有公民权的人民，首先是农民，向着反动阶级、反动派和反抗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分子实行专政。所谓有公民权，在政治方面，就是说有自由和民主的权利。

但是这个自由是有领导的自由，这个民主是集中指导下的民主，不是无政府状态。无政府状态不符合人民的利益和愿望。

匈牙利事件发生以后，我国有些人感到高兴。他们希望在中国也出现一个那样的事件，有成千上万的人上街，去反对人民政府。他们的这种希望是同人民群众的利益相违反的，是不可能得到人民群众支持的。匈牙利的一部分群众受了国内外反革命力量的欺骗，错误地用暴力行为来对付人民政府，结果使得国家和人民都吃了亏。几个星期的骚乱，给予经济方面的损失，需要很长时间才能恢复。我国另有一些人在匈牙利问题上表现动摇，是因为他们不懂得世界上的具体情况。他们以为在我们的人民民主制度下自由太少了，不如西方的议会民主制度自由多。他们要求实行西方的两党制，这一党在台上，那



一党在台下。但是这种所谓两党制不过是维护资产阶级专政的一种方法，它绝不能保障劳动人民的自由权利。实际上，世界上只有具体的自由，具体的民主，没有抽象的自由，抽象的民主。在阶级斗争的社会里，有了剥削阶级剥削劳动人民的自由，就没有劳动人民不受剥削的自由。有了资产阶级的民主，就没有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民主。有些资本主义国家也容许共产党合法存在，但是以不危害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为限度，超过这个限度就不容许了。要求抽象的自由、抽象的民主的人们认为民主是目的，而不承认民主是手段。民主这个东西，有时看来似乎是目的，实际上，只是一种手段。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民主属于上层建筑，属于政治这个范畴。这就是说，归根结底，它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自由也是这样。民主自由都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都是在历史上发生和发展的。在人民内部，民主是对集中而言，自由是对纪律而言。这些都是一个统一体的两个矛盾着的侧面，它们是矛盾的，又是统一的，我们不应当片面地强调某一个侧面而否定另一个侧面。在人民内部，不可以没有自由，也不可以没有纪律；不可以没有民主，也不可以没有集中。这种民主和集中的统一，自由和纪律的统一，就是我们的民主集中制。在这个制度下，人民享受着广泛的民主和自由；同时又必须用社会主义的纪律约束自己。这些道理，广大人民群众是懂得的。

我们主张有领导的自由，主张集中指导下的民主，这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说，人民内部的思想问题、是非的辨

别问题，可以用强制的方法去解决。企图用行政命令的方法，用强制的方法解决思想问题，是非问题，不但没有效力，而且是有害的。我们不能用行政命令去消灭宗教，不能强制人们不信教。不能强制人们放弃唯心主义，也不能强制人们相信马克思主义。凡属于思想性质的问题，凡属于人民内部的争论问题，只能用民主的方法去解决，只能用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而不能用强制的、压服的方法去解决。人民为了有效地进行生产、进行学习和有秩序地过生活，要求自己的政府、生产的领导者、文化教育机关的领导者发布各种适当的带强制性的行政命令。没有这种行政命令，社会秩序就无法维持，这是人们的常识所了解的。这同用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人民内部的矛盾，是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为着维持社会秩序的目的而发布的行政命令，也要伴之以说服教育，单靠行政命令，在许多情况下就行不通。

在一九四二年，我们曾经把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这种民主的方法，具体化为一个公式，叫做“团结——批评——团结”。讲详细一点，就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使矛盾得到解决，从而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按照我们的经验，这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一个正确的方法。一九四二年，我们采用了这个方法解决共产党内部的矛盾，就是教条主义者和广大党员群众之间的矛盾，教条主义思想和马克思主义思想之间的矛盾。“左”倾教条主义者从前采用的党内斗争方法叫做

“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这是一个错误的方法。我们在批评“左”倾教条主义的时候，就没有采取这个老方法，而采取了一个新方法，就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分清是非，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这个方法是在一九四二年整风的时候采用的。经过几年之后，到一九四五年中国共产党召开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时候，果然达到了全党团结的目的，因此就取得了人民革命的伟大胜利。在这里，首先需要从团结的愿望出发。因为如果在主观上没有团结的愿望，一斗势必把事情斗乱，不可收拾，那还不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那还有什么党的团结？从这个经验里，我们找到了一个公式：团结——批评——团结。或者说，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我们把这个方法推广到了党外。在各抗日根据地里，我们处理领导和群众的关系，处理军民关系、官兵关系、几部分军队之间的关系、几部分干部之间的关系，都采用了这个方法，并且得到了伟大的成功。这个问题，在我们党的历史上，还可以追溯到更远。自从一九二七年我们在南方建立革命军队和革命根据地开始，关于处理党群关系、军民关系、官兵关系以及其他人民内部关系，就是采用这个方法的。不过到了抗日时期，我们就把这个方法建立在更加自觉的基础之上了。全国解放以后，我们对民主党派和工商界也采取了“团结——批评——团结”这个方法。我们现在的任务，就是要在整个人民内部继续推广和更好地运用这个方法，要求所有的工厂、合作社、商店、学校、机关、团体，总之，六亿人口，都采用这个方法去解决

他们内部的矛盾。

在一般情况下，人民内部的矛盾不是对抗性的。但是如果处理得不适当，或者失去警觉，麻痹大意，也可能发生对抗。这种情况，在社会主义国家通常只是局部的暂时的现象。这是因为社会主义国家消灭了人剥削人的制度，人民的利益在根本上是一致的。匈牙利事件所表现的那种范围相当宽广的对抗行动，是因为有内外反革命因素在起作用的原故。这是一种特殊的也是暂时的现象。社会主义国家内部的反动派同帝国主义者互相勾结，利用人民内部的矛盾，挑拨离间，兴风作浪，企图实现他们的阴谋。匈牙利事件的这种教训，值得大家注意。

许多人觉得，提出采用民主方法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是一个新的问题。事实并不是这样。马克思主义者从来就认为无产阶级的事业只能依靠人民群众，共产党人在劳动人民中间进行工作的时候必须采取民主的说服教育的方法，决不允许采取命令主义态度和强制手段。中国共产党忠实地遵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这个原则。我们历来就主张，在人民民主专政下面，解决敌我之间的和人民内部的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采用专政和民主这样两种不同的方法。这个意思，在我们党的过去的许多文件里和党的许多负责人的言论里，曾经说得很多。我在一九四九年所写的“论人民民主专政”里曾经说过：“对人民内部的民主方面和对反动派的专政方面，互相结合起来，就是人民民主专政”，解决人民内部的问题，“使用的方法，是民主的即说服的方法，而不是强迫的方

法”。我在一九五〇年六月第二次政治协商会议上的讲话里，又说过：“人民民主专政有两个方法。对敌人说来说是用专政的方法，就是说在必要的时期内，不让他们参与政治活动，强迫他们服从人民政府的法律，强迫他们从事劳动，并在劳动中改造他们成为新人。对人民说来说则与此相反，不是用强迫的方法，而是用民主的方法，就是说必须让他们参与政治活动，不是强迫他们做这样做那样，而是用民主的方法向他们进行教育和说服的工作。这种教育工作是人民内部的自我教育工作，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就是自我教育的基本方法。”过去我们已经多次讲过用民主方法解决人民内部矛盾这个问题，并且在工作中基本上就是这样做的，很多干部和人民都在实际上懂得这个问题。为什么现在又有人觉得这是一个新问题呢？这是因为过去国内外的敌我斗争很尖锐，人民内部矛盾还不像现在这样被人们注意的原故。

许多人对于敌我之间的和人民内部的这两类性质不同的矛盾分辨不清，容易混淆在一起。应该承认，这两类矛盾有时是容易混淆的。我们在过去工作中也曾经混淆过。在肃清反革命分子的工作中，错误地把好人当坏人，这种情形，从前有过，现在也还有。我们的错误没有扩大化，是由于我们在政策中规定了必须分清敌我，错了就要平反。

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认为，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的根本规律。这个规律，不论在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们的思想中，都是普遍存在的。矛盾着的对立面又统一，又斗争，

由此推动事物的运动和变化。矛盾是普遍存在的，不过按事物的性质不同，矛盾的性质也就不同。对于任何一个具体的事物说来，对立的统一是有条件的、暂时的、过渡的，因而是相对的，对立的斗争则是绝对的。这个规律，列宁讲得很清楚。这个规律，在我国，懂得的人逐渐多起来了。但是，对于许多人说来，承认这个规律是一回事，应用这个规律去观察问题和处理问题又是一回事。许多人不敢公开承认我国人民内部还存在着矛盾，正是这些矛盾推动着我们的社会向前发展。许多人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还有矛盾，因而使得他们在社会矛盾面前缩手缩脚，处于被动地位；不懂得在不断地正确处理和解决矛盾的过程中，将会使社会主义社会内部的统一和团结日益巩固。这样，就有必要在我国人民中，首先是在干部中，进行解释，引导人们认识社会主义社会中的矛盾，并且懂得采取正确的方法处理这种矛盾。

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同旧社会的矛盾，例如同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是根本不相同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表现为剧烈的对抗和冲突，表现为剧烈的阶级斗争，那种矛盾不可能由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来解决，而只有社会主义革命才能够加以解决。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是另一回事，恰恰相反，它不是对抗性的矛盾，它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地得到解决。

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不过社会主义社会的这些矛盾，同旧社会的生产关系和生

生产力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质和情况罢了。我国现在的社会制度比较旧时代的社会制度要优胜得多。如果不优胜，旧制度就不会被推翻，新制度就不可能建立。所谓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比较旧时代生产关系更能够适合生产力发展的性质，就是指能够容许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因而生产不断扩大，因而使人民不断增长的需要能够逐步得到满足的这样一种情况。旧中国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下，生产力的发展一直是非常缓慢的。解放前五十年间，全国除东北外，钢的生产一直只有几万吨；加上东北，全国的最高年产量也不过是九十多万吨。在一九四九年，全国钢产量只有十几万吨。但是全国解放不过七年，钢的生产便已达到四百几十万吨。旧中国几乎没有机器制造业，更没有汽车制造业和飞机制造业，而这些现在都建立起来了。当人民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之后，中国要向那里去？向资本主义，还是向社会主义？有许多人在这个问题上的思想是不清楚的。事实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促进了我国生产力的突飞猛进的发展，这一点，甚至连国外的敌人也不能不承认了。

但是，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还刚刚建立，还没有完全建成，还不完全巩固。在工商业的公私合营企业中，资本家还拿取定息，也就是还有剥削；就所有制这点上说，这类企业还不是完全的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生产合作社

和手工业生产合作社有一部分也还是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完全社会主义化的合作社在所有制的某些个别问题上，还需要继续解决。在各经济部门中的生产和交换的相互关系，还在按照社会主义的原则逐步建立，逐步找寻比较适当的形式。在全民所有制经济和集体所有制经济里面，在这两种社会主义经济形式之间，积累和消费的分配问题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也不容易一下子解决得完全合理。总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它是和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的；但是，它又还很不完善，这些不完善的方面和生产力的发展又是相矛盾的。除了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发展的这种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以外，还有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和法律，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这些上层建筑对于我国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劳动组织的建立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它是和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即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但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存在，国家机构中某些官僚主义作风的存在，国家制度中某些环节上缺陷的存在，又是和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相矛盾的。我们今后必须按照具体的情况，继续解决上述的各种矛盾。当然，在解决这些矛盾以后，又会出现新的问题。新的矛盾，又需要人们去解决。例如，在客观上将会长期存在的社会生产和社会需要之间的矛盾，就需要人们时常经过国家计划去调节。我国每年作一次经济计划，安排积累和消费的适当比例，求得生产和需要之间的平衡。所谓



平衡，就是矛盾的暂时的相对的统一。过了一年，就整个说来，这种平衡就被矛盾的斗争所打破了，这种统一就变化了，平衡成为不平衡，统一成为不统一，又需要作第二年的平衡和统一。这就是我们计划经济的优越性。事实上，每月每季都在局部地打破这种平衡和统一，需要作出局部的调整。有时因为主观安排不符合客观情况，发生矛盾，破坏平衡，这就叫做犯错误。矛盾不断出现，又不断解决，就是事物发展的辩证规律。

现在的情况是：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但是阶级斗争还没有完全结束；广大群众一面欢迎新制度，一面又还感到还不大习惯；政府工作人员经验也还不够丰富，对一些具体政策的问题，应当继续考察和探索。这就是说，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有一个继续建立和巩固的过程，人民群众对于这个新制度还需要有一个习惯的过程，国家工作人员也需要一个学习和取得经验的过程。在这个时候，我们提出划分敌我和人民内部两类矛盾的界线，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以便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界开战，发展我们的经济，发展我们的文化，使全体人民比较顺利地走过目前的过渡时期，巩固我们的新制度，建设我们的新国家，就是十分必要的了。

## 二 肃反问题

肃清反革命分子的问题是敌我矛盾的斗争问题。在

人民内部，有些人对于肃反问题的看法，也有一些不同。有两种人的意见，和我们的意见不相同。有右倾思想的人不分敌我，认敌为我。广大群众认为是敌人的人，他们却认为是朋友。有“左”倾思想的人则把敌我矛盾扩大化，以至把某些人民内部的矛盾也看作敌我矛盾，把某些本来不是反革命的人也看作反革命。这两种看法都是错误的，都不能正确地处理肃反问题，也不能正确地估计我们的肃反工作。

为了正确地估计我国的肃反工作，我们不妨看一看匈牙利事件对于我们国家的影响。匈牙利事件发生以后，在我国一部分知识分子中有些动荡，但是没有引起什么风浪。这是什么原因呢？应该说，原因之一，就是我们相当彻底地肃清了反革命。

当然，我们国家的巩固，首先不是由于肃反。我们国家的巩固，首先是由于我们有经过几十年革命斗争锻炼的共产党和解放军，有经过几十年革命斗争锻炼的劳动人民。我们的党和军队是在群众中生了根的，是在长期革命火焰中锻炼出来的，是有战斗力的。我们的人民共和国是经过革命根据地逐步发展起来的，不是突然建立起来的。有些民主人士也受过不同程度的锻炼，同我们共过患难。有些知识分子经历过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动势力的斗争的锻炼，许多人经历过解放以后的以分清敌我界限为目标的思想改造。此外，我们国家的巩固，还由于我们的经济措施根本上是正确的；人民生活是稳定的，并且逐步有所改善；我们对于民族资产阶级和其他阶级的

政策,也是正确的;等等。但是,我们在肃清反革命方面的成功,无疑是我们国家巩固的重要原因之一。由于这一切,我们的大学生,虽然还有许多人是非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子女,但是除了少数例外,都是爱国的,都是拥护社会主义的,他们在匈牙利事件时期没有发生波动。民族资产阶级也是这样。更不要说工农基本群众了。

解放以后,我们肃清了一批反革命分子。一些有严重罪行的反革命分子被处了死刑。这是完全必要的,这是广大群众的要求,这是为了解放长期被反革命分子和各种恶霸分子压迫的广大群众,也就是为了解放生产力。我们如果不这样做,人民群众就会抬不起头来。从一九五六年以来,情况就根本改变了。就全国说来,反革命分子的主要力量已经肃清。我们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有些人不了解我们今天的政策适合于今天的情况,过去的政策适合于过去的情况,想利用今天的政策去翻过去的案,想否定过去肃反工作的巨大成绩,这是完全错误的,这是人民群众所不允许的。

我们的肃反工作,成绩是主要的,但是也有错误。过火的,漏掉的,都有。我们的方针是:“有反必肃,有错必纠”。我们在肃反工作中的路线是群众肃反的路线。采取了群众路线,工作中当然也会发生毛病,但是毛病会比较少一些,错误会比较容易纠正些。群众在斗争中得到了经验。做得正确,得了做得正确的经验。犯了错误,也得了犯错误的经验。

在肃反工作中，凡是已经发现了的错误，我们都已经采取了或者正在采取纠正的步骤。没有发现的，一经发现，我们就准备纠正。原来在什么范围内弄错的，也应该在什么范围内宣布平反。我提议今年或者明年对于肃反工作全面检查一次，总结经验，发扬正气，打击歪风。中央由人大常委会和政协常委会主持，地方由省市人民委员会和政协委员会主持。在检查工作的时候，我们对广大干部和积极分子不要泼冷水，而要帮助他们。向广大干部和积极分子泼冷水是不对的。但是发现了错误，一定要改正。无论公安部门、检察部门、司法部门、监狱、劳动改造的管理机关，都应该采取这个态度。我们希望人大常务委员、政协委员、人民代表，凡是有可能的，都参加这样的检查。这对于健全我们的法制，对于正确处理反革命分子和其他犯罪分子，会有帮助的。

目前关于反革命分子的情况，可以用这样两句话来说明：还有反革命，但是不多了。首先是还有反革命。有人说，已经没有了，天下太平了，可以把枕头塞得高高地睡觉了。这是不合事实的。事实是还有（当然不是说每一个地方每一个单位都有），还必须继续和他们作斗争。必须懂得，没有肃清的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是不会死心的，他们必定要乘机捣乱。美帝国主义者和蒋介石集团经常还在派遣特务到我们这里来进行破坏活动。原有的反革命分子肃清了，还可能出现一些新的反革命分子。如果我们丧失警惕性，那就会上大当，吃大亏。不管什么地方出现反革命分子捣乱，就应当坚决消灭他。但是就全国

来说，反革命分子确实不多了。如果说现在全国还有很多反革命分子，这个意见也是错误的。如果接受这种估计，结果也会搞乱。

### 三 农业合作化问题

我国有五亿多农业人口，农民的情况如何，对于我国经济的发展和政权的巩固，关系极大。我认为，情况根本上是好的。合作化完成了，这就解决了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同个体农业经济之间的大矛盾。合作化迅速完成，有些人耽心会不会出毛病。幸好，毛病有一些，不大，基本上是健全的。农民生产很起劲，虽然去年的水旱风灾比过去几年中那一年都大，但是全国的粮食仍然增产。现在有一些人却在说合作化不行，合作化没有优越性，吹来了一股小台风。合作化究竟有没有优越性呢？今天会场上发的文件里面，有一个关于河北省遵化县王国藩合作社的材料，大家可以看一看。这个合作社所在的地方是一个山地，历来很穷，年年靠人民政府运粮去救济。一九五三年开始办社的时候，人们把它叫做“穷棒子社”。经过了四年艰苦奋斗，一年一年好起来，绝大多数的社员成了余粮户。王国藩合作社能做到的，别的合作社，在正常情况下也应该能做到，或者时间长一点也应该能做到。由此可见，那些说合作化不好了的议论是没有根据的。

由此也可看出，合作社一定要在艰苦奋斗中建立起来。任何新生事物的成长都是要经过艰难曲折的。在社

会主义事业中，妄想不经过艰难曲折，不付出极大努力，总是一帆风顺，容易得到成功，这种想法，只是幻想。

积极拥护合作社的是些什么人呢？是绝大多数贫农和下中农，他们占农村人口百分之七十以上。其余的人，大多数也对合作社寄予希望。真正不满意的只占极少数。许多人没有分析这种情况，没有对合作社的成绩和缺点以及缺点产生的根源作全面的考察，把局部和片面当成了全体，这就在一些人中间刮起了一阵所谓合作社没有优越性的小台风。

要多少时间合作社才能巩固，认为合作社没有优越性的议论才会收场呢？根据许多合作社发展的经验来看，大概需要五年，或者还要多一点时间。现在，全国大多数的合作社还只有一年多的历史，我们就要求它们那么好，这是不合理的。依我看，第一个五年计划期内建成合作社，第二个五年计划期内合作社能得到巩固，那就很好了。

合作社正在经历一个逐步巩固的过程。它还存在着一些需要解决的矛盾。例如，在国家同合作社之间，在合作社内部，在合作社同合作社相互之间，都有一些矛盾需要解决。

我们必须经常注意从生产问题和分配问题上处理上述矛盾。在生产问题上，一方面，合作社经济要服从国家统一经济计划的领导，同时在不违背国家的统一计划和政策法规下保持自己一定的灵活性和独立性；另一方面，参加合作社的各个家庭，除了自留地和其他一部分个体

经营的经济可以由自己作出适当的计划以外，都要服从合作社或者生产队的总计划。在分配问题上，我们必须兼顾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对于国家的税收、合作社的积累、农民的个人收入这三方面的关系，必须处理适当，经常注意调节其中的矛盾。国家要积累，合作社也要积累，但是都不能过多。我们要尽可能使农民能够在正常年景下，从增加生产中逐年增加个人收入。

许多人说农民苦，这种意见对不对呢？就一方面说来是对的。这就是说，由于我国被帝国主义者和他们的代理人压迫剥削了一百多年，变成一个很穷的国家，不但农民的生活水平低，工人和知识分子的生活水平也都还低。要有几十年时间，经过艰苦的努力，才能将全体人民的生活水平逐步提高起来。这样说“苦”就恰当了。就另一方面说来是不对的。这就是说，解放七年以来，农民生活没有改善，单单改善了工人的生活。其实，工人农民的生活，除极少数人以外，都已经有了一些改善。解放以来，农民免除了地主的剥削，生产逐年发展。以粮食为例，一九四九年全国产粮只有二千一百几十亿斤，到一九五六年产粮达到三千六百几十亿斤，增加了将近一千五百亿斤。国家征收的农业税并不算重，每年只有三百多亿斤。每年以正常价格从农民那里购粮也只有五百多亿斤。两项共八百几十亿斤。这些粮食销售在农村和农村附近的集镇的，占了一半以上。由此看来，不能说农民生活没有改善。我们准备在几年内，把征粮和购粮的数量大体上稳定在八百几十亿斤的水平上，使农业得到发展，使合作

社得到巩固，使现在还存在的农村中一小部分缺粮户不再缺粮，除了专门经营经济作物的某些农户以外，通通变为余粮户或者自给户，使农村中没有了贫农，使全体农民达到中农和中农以上的生活水平。至于简单地拿农民每人每年平均所得和工人每人每年平均所得相比较，说一个低了，一个高了，这是不适当的。工人的劳动生产率比农民高得多，而农民的生活费用比城市工人又省得多，所以不能说工人特别得到国家的优待。有少部分工人的工资以及有些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工资是高了一些，农民看了不满意是有理由的，斟酌情况作一些适当的调整，是必要的。

#### 四 工商业者问题

我国社会制度的改革，除了农业合作化和手工业合作化以外，私营工商业改变为公私合营企业，也在一九五六年完成了。这件事所以做得这样迅速和顺利，是跟我们把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当做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密切相关的。这个阶级矛盾是否完全解决了呢？还没有。还要经过相当的时间才能够完全解决。但是现在有些人说：资本家已经改造得和工人差不多了，用不着再改造了。甚至有人说，资本家比工人还要高明一点。也有人说，如果要改造，为什么工人阶级不改造？这些议论对不对呢？当然不对。

在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过程中，人人需要改造，剥削



者要改造，劳动者也要改造，谁说工人阶级不要改造？当然，剥削者的改造和劳动者的改造是两种不同性质的改造，不能混为一谈。工人阶级要在阶级斗争中和向自然界的斗争中改造整个社会，同时也就改造自己。工人阶级必须在工作中不断学习，逐步克服自己的缺点，永远也不能停止。拿我们这些人来说，很多人每年都有一些进步，也就是说，每年都在改造。我这个人从前就有过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马克思主义是后来才接受的。我在书本上学了一点马克思主义，初步地改造了自己的思想，但是主要的还是在长期阶级斗争中改造过来的。而且今后还要继续学习，才能再有一些进步，否则就要落后了。难道资本家就那么高明，反而再不需要改造了吗？

有人说，中国资产阶级现在已经没有两面性了，只有一面性。这是不是事实呢？不是事实。一方面，资产阶级分子已经成为公私合营企业中的管理人员，正处在由剥削者变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的转变过程中；另一方面，他们现在还在公私合营的企业中拿定息，这就是说，他们的剥削根子还没有脱离。他们同工人阶级的思想感情、生活习惯还有一个不小的距离。怎么能说已经没有了两面性呢？就是不拿定息，摘掉了资产阶级的帽子，也还需要一个相当的时间继续进行思想改造。如果认为资产阶级已经没有了两面性，那末资本家的改造和学习的任务也就没有了。

应该说，这种意见不仅不符合工商业者的实际情况，也不符合工商业者大多数人的愿望。在过去几年中，大

多数工商业者都是愿意学习的，并且有了显著的进步。工商业者的彻底改造必须是在工作中间，他们应当在企业内同职工一起劳动，把企业作为自我改造的基地。但是经过学习改变自己的某些旧观点，也是重要的。工商业者的学习，应当以自愿为基础。许多工商业者在讲习班里学习了几十天，回到工厂，同工人群众和公方代表有了更多的共同的语言，改善了共同工作的条件。他们从亲身的经验懂得，继续学习，继续改造自己，对于他们是有益的。刚才所说的那种认为不需要学习，不需要改造的意见，并不能代表工商业者中大多数人的意见，只是少数人的意见。

## 五 知识分子问题

我国人民内部的矛盾，在知识分子中间也表现出来了。过去为旧社会服务的几百万知识分子，现在转到为新社会服务，这里就存在着他们如何适应新社会需要和我们如何帮助他们适应新社会需要的问题。这也是人民内部的一个矛盾。

我国知识分子的大多数，在过去七年中已经有了显著的进步。他们表示赞成社会主义制度。他们中间有许多人正在用功学习马克思主义，有一部分人已经成为共产主义者。这部分人目前虽然还是少数，但是正在逐渐增多。当然，知识分子中间有一些人现在仍然怀疑或者不同意社会主义，这部分人只占少数。

我国的艰巨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需要尽可能多的知识分子为它服务。凡是真正愿意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知识分子，我们都应当给予信任，从根本上改善同他们的关系，帮助他们解决各种必须解决的问题，使他们得以积极地发挥他们的才能。我们有许多同志不善于团结知识分子，用生硬的态度对待他们，不尊重他们的劳动，在科学文化工作中不适当地干预那些不应当干预的事务。所有这些缺点必须加以克服。

广大的知识分子虽然已经有了进步，但是不应当因此自满。为了充分适应新社会的需要，为了同工人农民团结一致，知识分子必须继续改造自己，逐步地抛弃资产阶级的世界观而树立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的世界观。世界观的转变是一个根本的转变，现在多数知识分子还不能说已经完成了这个转变。我们希望我国的知识分子继续前进，在自己的工作和学习的过程中，逐步地树立共产主义的世界观，逐步地学好马克思列宁主义，逐步地同工人农民打成一片，而不要中途停顿，更不要向后倒退，倒退是没有出路的。由于我国的社会制度已经起了变化，资产阶级思想的经济基础已经基本上消灭了，这就使大量知识分子的世界观不但有了改变的必要，而且有了改变的可能。但是世界观的彻底改变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我们应当耐心地做工作，不能急躁。事实上必定会有一些人在思想上始终不愿意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愿意接受共产主义，对于这一部分人不要苛求；只要他们服从国家的要求，从事正常的劳动，我们就应当给他们以适

当工作的机会。

在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中间，最近一个时期，思想政治工作减弱了，出现了一些偏向。在一些人的眼中，好像什么政治，什么祖国的前途，人类的理想，都没有关心的必要。好像马克思主义行时了一阵，现在就不那么行时了。针对着这种情况，现在需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不论是知识分子，还是青年学生，都应该努力学习。除了学习专业之外，在思想上要有所进步，政治上也要有所进步，这就需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学习时事政治。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过去的思想改造是必要的，收到了积极的效果。但是在做法上有些粗糙，伤了一些人，这是不好的。这个缺点，今后必须避免。思想政治工作，各个部门都要负责任。共产党应该管，青年团应该管，政府主管部门应该管，学校的校长教师更应该管。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要提倡勤俭建国。要使全体青年们懂得，我们的国家现在还是一个很穷的国家，并且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根本改变这种状态，全靠青年和全体人民在几十年时间内，团结奋斗，用自己的双手创造出一个富强的国家。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给我们开辟了一条到达理想境界的道路，而理想境界的实现还要靠我们的辛勤劳动。有些青年人以为到了社会主义社会就应当什么都好了，就可以不费气力享受现成的幸福生活了，这是一种不实际的想法。

## 六 少数民族问题

我国少数民族有三千多万人，虽然只占全国总人口的百分之六，但是居住地区广大，约占全国总面积的百分之五十至六十。所以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一定要搞好。这个问题的关键是克服大汉族主义。在存在有地方民族主义的少数民族中间，则应当同时克服地方民族主义。无论是大汉族主义或者地方民族主义，都不利于各族人民的团结，这是应当克服的一种人民内部的矛盾。在这一方面，我们已经做了一些工作，在大多数少数民族地区民族关系比较从前大有改进，但是仍然存在着一些尚待解决的问题。在一部分地区，大汉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都还严重地存在，必须给以足够的注意。经过各族人民几年来的努力，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绝大部分都已经基本上完成了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西藏由于条件还不成熟，还没有进行民主改革。按照中央和西藏地方政府的十七条协议〔2〕，社会制度的改革必须实行，但是何时实行，要待西藏大多数人民群众和领袖人物认为可行的时候，才能作出决定，不能性急。现在已决定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不进行改革。在第三个五年计划期内是否进行改革，要到那时看情况才能决定。

## 七 统筹兼顾、适当安排

这里所说的统筹兼顾，是指对于六亿人口的统筹兼顾。我们作计划、办事、想问题，都要从我国有六亿人口这一点出发，千万不要忘记这一点。<sup>〔3〕</sup>为什么要提出这样一个问题，难道还有人不知道我国有六亿人口吗？知道是知道的，不过办起事来有些人就忘记了，似乎人越少越好，圈子紧缩得越小越好。抱有这种小圈子主义的人们，对于这样一种思想是抵触的：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并且尽可能地将消极因素转变为积极因素，为建设社会主义社会这个伟大的事业服务。我希望这些人扩大眼界，真正承认我国有六亿人口，承认这是一个客观存在，这是我们的本钱。我国人多，是好事，当然也有困难。我们各方面的建设事业都在蓬勃地发展着，成绩很大，但是，在目前社会大变动的过渡时期，困难问题还是很多的。又发展又困难，这就是矛盾。任何矛盾不但应当解决，也是完全可以解决的。我们的方针是统筹兼顾，适当安排。无论粮食问题，灾荒问题，就业问题，教育问题，知识分子问题，各种爱国力量的统一战线问题，少数民族问题，以及其他各项问题，都要从对全体人民的统筹兼顾这个观点出发，就当时当地的实际可能条件，同各方面的人协商，作出各种适当的安排。决不可以嫌人多，嫌人落后，嫌事情麻烦难办，推出门外了事。我这样说，是不是要把一切人一切事都由政府包下来呢？

当然不是。许多人，许多事，可以由社会团体想办法，可以由群众直接想办法，他们是能够想出很多好的办法来的。而这也就包括在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方针之内，我们应当指导社会团体和各地群众这样做。

## 八 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长期共存、互相监督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这几个口号是怎样提出来的呢？它是根据中国的具体情况提出来的，是在承认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各种矛盾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是在国家需要迅速发展经济和文化的迫切要求上提出来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是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争论。利用行政力量，强制推行一种风格，一种学派，禁止另一种风格，另一种学派，我们认为会有害于艺术和科学的发展。艺术和科学中的是非问题，应当通过艺术界科学界的自由讨论去解决，通过艺术和科学的实践去解决，而不应当采取简单的方法去解决。为了判断正确的东西和错误的东西，常常需要有考验的时间。历史上新的正确的东西，在开始的时候常常得不到多数人承认，只能在斗争中曲折地发展。正确的东西，好的东西，人们一开始常常不承认它们是香花，反而把它们看作毒草。哥白尼关于太阳系的学说，达

尔文的进化论,都曾经被看作是错误的东西,都曾经经历艰苦的斗争。我国历史上也有许多这样的事例。同旧社会比较起来,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新生事物的成长条件,和过去根本不同了,好得多了。但是压抑新生力量,压抑合理的意见,仍然是常有的事。不是由于有意压抑,只是由于鉴别不清,也会妨碍新生事物的成长。因此,对于科学上、艺术上的是非,应当保持慎重的态度,提倡自由讨论,不要轻率地作结论。我们认为,采取这种态度可以帮助科学和艺术得到比较顺利的发展。

马克思主义也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马克思主义在开始的时候受过种种打击,被认为是毒草。现在它在世界上的许多地方还在继续受打击,还被认为是毒草。在社会主义国家里,马克思主义的地位不同了。但是就是在社会主义国家,还是有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存在,也有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存在。在我国,虽然社会主义改造,在所有制方面说来,已经基本完成,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但是,被推翻的地主买办阶级的残余还是存在,资产阶级还是存在,小资产阶级刚刚在改造。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在这一方面,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无论在全



人口中间,或者在知识分子中间,马克思主义者仍然是少数。因此,马克思主义仍然必须在斗争中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在斗争中才能发展,不但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将来也必然还是这样。正确的东西总是在同错误的东西作斗争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真的、善的、美的东西总是在同假的、恶的、丑的东西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当着某一种错误的东西被人类普遍地抛弃,某一种真理被人类普遍地接受的时候,更加新的真理又在同新的错误意见作斗争。这种斗争永远不会完结。这是真理发展的规律,当然也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规律。

我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谁胜谁负的斗争,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才能解决。这是因为资产阶级和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的影响还要在我国长期存在,作为阶级的意识形态,还要在我国长期存在。如果对于这种形势认识不足,或者根本不认识,那就要犯绝大的错误,就会忽视必要的思想斗争。思想斗争同其他的斗争不同,它不能采取粗暴的强制的方法,只能用细致的讲理的方法。现在社会主义在意识形态的斗争中,具有优胜的条件。政权的基本力量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劳动人民手里。共产党有强大的力量和很高的威信。在我们的工作中尽管有缺点,有错误,但是每一个公正的人都可以看到,我们对人民是忠诚的,我们有决心有能力同人民在一起把祖国建设好,我们已经得到巨大的成就,并且将继续得到更巨大的成就。资产阶级分子和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都是爱国的,他们愿

意为蒸蒸日上的社会主义祖国服务，并且懂得如果离开社会主义事业，离开共产党所领导的劳动人民，他们就会无所依靠，而不可能有任何光明的前途。

人们问：在我们国家里，马克思主义已经被大多数人承认为指导思想，那末，能不能对它加以批评呢？当然可以批评。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科学真理，它是不怕批评的。如果马克思主义害怕批评，如果可以批评倒，那末马克思主义就没有用了。事实上，唯心主义者不是每天都在用各种形式批评马克思主义吗？抱着资产阶级思想、小资产阶级思想而不愿意改变的人们，不是也在用各种形式批评马克思主义吗？马克思主义者不应该害怕任何人批评。相反，马克思主义者就是要在人们的批评中间，就是要在斗争的风雨中间，锻炼自己，发展自己，扩大自己的阵地。同错误思想作斗争，好比种牛痘，经过了牛痘疫苗的作用，人身上就增强免疫力。在温室里培养出来的东西，不会有强大的生命力。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并不会削弱马克思主义在思想界的领导地位，相反地正是会加强它的这种地位。

对于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应该采取什么方针呢？对于明显的反革命分子，破坏社会主义事业的分子，事情好办，剥夺他们的言论自由就行了。对于人民内部的错误思想，情形就不相同。禁止这些思想，不允许这些思想有任何发表的机会，行不行呢？当然不行。对待人民内部的思想问题，对待精神世界的问题，用简单的方法去处理，不但不会收效，而且非常有害。不让发表错误意见，

结果错误意见还是存在着。而正确的意见如果是在温室里培养出来的,如果没有见过风雨,没有取得免疫力,遇到错误意见就不能打胜仗。因此,只有采取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说理的方法,才能真正发展正确的意见,克服错误的意见,才能真正解决问题。

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他们的思想意识是一定要反映出来的。一定要在政治问题和思想问题上,用各种办法顽强地表现他们自己。要他们不反映不表现,是不可能的。我们不应当用压制的办法不让他们表现,而应当让他们表现,同时在他们表现的时候,和他们辩论,进行适当的批评。毫无疑问,我们应当批评各种各样的错误思想。不加批评,看着错误思想到处泛滥,任凭它们去占领市场,当然不行。有错误就得批判,有毒草就得进行斗争。但是这种批评不应当是教条主义的,不应当用形而上学方法,应当力求用辩证方法。要有科学的分析,要有充分的说服力。教条主义的批评不能解决问题。我们是反对一切毒草的,但是我们必须谨慎地辨别什么是真的毒草,什么是真的香花。我们要同群众一起来学会谨慎地辨别香花和毒草,并且一起来用正确的方法同毒草作斗争。

我们在批判教条主义的时候,必须同时注意对修正主义的批判。修正主义,或者右倾机会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潮,它比教条主义有更大的危险性。修正主义者,右倾机会主义者,口头上也挂着马克思主义,他们也在那里攻击“教条主义”。但是他们所攻击的正是马克思主义

的最根本的东西。他们反对或者歪曲唯物论和辩证法，反对或者企图削弱人民民主专政和共产党的领导，反对或者企图削弱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取得基本胜利以后，社会上还有一部分人梦想恢复资本主义制度，他们要从各个方面向工人阶级进行斗争，包括思想方面的斗争。而在这个斗争中，修正主义者就是他们最好的助手。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两个口号，就字面看，是没有阶级性的，无产阶级可以利用它们，资产阶级也可以利用它们，其他的人们也可以利用它们。所谓香花和毒草，各个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也有各自的看法。那末，从广大人民群众的观点看来，究竟什么是我们今天辨别香花和毒草的标准呢？在我国人民的政治生活中，应当怎样来判断我们的言论和行动的是非呢？我们以为，根据我国的宪法的原则，根据我国最大多数人民的意志和我国各党派历次宣布的共同的政主张，这种标准可以大致规定如下：（一）有利于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而不是分裂人民；（二）有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而不是不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三）有利于巩固人民民主专政，而不是破坏或者削弱这个专政；（四）有利于巩固民主集中制，而不是破坏或者削弱这个制度；（五）有利于巩固共产党的领导，而不是摆脱或者削弱这种领导；（六）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国际团结和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国际团结，而不是有损于这些团结。这六条标准中，最重要的是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两条。提出这些标

准,是为了帮助人民发展对于各种问题的自由讨论,而不是为了妨碍这种讨论。不赞成这些标准的人们仍然可以提出自己的意见来辩论。但是大多数人有了明确的标准,就可以使批评和自我批评沿着正确的轨道前进,就可以用这些标准去鉴别人们的言论行动是否正确,究竟是香花还是毒草。这是一些政治标准。为了鉴别科学论点的正确或者错误,艺术作品的艺术水准如何,当然还需要一些各自的标准。但是这六条政治标准对于任何科学艺术的活动也都是适用的。在我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里,难道有什么有益的科学艺术活动会违反这几条政治标准的吗?

以上所说的观点,都是从我国的具体的历史条件出发的。各个社会主义国家和各国共产党的情况各不相同。因此,我们并不认为,它们必须或者应当采取中国的做法。

“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这个口号,也是我国具体的历史条件的产物。这个口号并不是突然提出来的,它已经经过了好几年的酝酿。长期共存的思想已经存在很久了。到去年,社会主义制度已基本建立,这些口号就明确地提出来了。为什么要让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民主党派同工人阶级政党长期共存呢?这是因为凡属一切确实致力于团结人民从事社会主义事业的、得到人民信任的党派,我们没有理由不对它们采取长期共存的方针。我在一九五〇年六月第二次政治协商会议上,就已经这样说过:“只要谁肯真正为人民效力,在人民还有困难的时

期内确实帮了忙，做了好事，并且是一贯地做下去，并不半途而废，那末，人民和人民的政府是没有理由不要他的，是没有理由不给他以生活的机会和效力的机会的。”这里所说的，也就是各党派可以长期共存的政治基础。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这是我们的愿望，也是我们的方针。至于各民主党派是否能够长期存在下去，不是单由共产党一方面的愿望作决定，还要看各民主党派自己的表现，要看它们是否取得人民的信任。各党派互相监督的事实，也早已存在，就是各党派互相提意见，作批评。所谓互相监督，当然不是单方面的，共产党可以监督民主党派，民主党派也可以监督共产党。为什么要让民主党派监督共产党呢？这是因为一个党同一个人一样，耳边很需要听到不同的声音。大家知道，主要监督共产党的是劳动人民和党员群众。但是有了民主党派，对我们更为有益。当然，各民主党派和共产党相互之间所提的意见，所作的批评，也只有在合乎我们在前面所说的六条政治标准的情况下，才能够发挥互相监督的积极作用。因此，我们希望各民主党派都能注意思想改造，争取和共产党一道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以适应新社会的需要。

## 九 关于少数人闹事问题

一九五六年，在个别地方发生了少数工人学生罢工罢课的事件。这些人闹事的直接的原因，是有一些物质上的要求没有得到满足；而这些要求，有些是应当和可能

解决的，有些是不适当的和要求过高、一时还不能解决的。但是发生闹事的更重要的因素，还是领导上的官僚主义。这种官僚主义的错误，有一些是要由上级机关负责，不能全怪下面。闹事的另一个原因是对于工人、学生缺乏思想政治教育。一九五六年，还有少数合作社社员闹社的事件，主要原因也是领导上的官僚主义和对于群众缺乏教育。

应该承认：有些群众往往容易注意当前的、局部的、个人的利益，而不了解或者不很了解长远的、全国性的、集体的利益。不少青年人由于缺少政治经验和社会生活经验，不善于把旧中国和新中国加以比较，不容易深切了解我国人民曾经怎样经历千辛万苦的斗争才摆脱了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压迫，而建立一个美好的社会主义社会要经过怎样的长时间的艰苦劳动。因此，需要在群众中间经常进行生动的、切实的政治教育，并且应当经常把发生的困难向他们作真实的说明，和他们一起研究如何解决困难的办法。

我们是不赞成闹事的，因为人民内部的矛盾可以用“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去解决，而闹事总会要造成一些损失，不利于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我们相信，我国广大的人民群众是拥护社会主义的，他们很守纪律，很讲道理，决不无故闹事。但是这并不是说，在我国已经没有了发生群众闹事的可能性。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应当注意的是：（一）为了从根本上消灭发生闹事的原因，必须坚决地克服官僚主义，很好地加强思想政治教育，恰当

地处理各种矛盾。只要做到这一条，一般地就不会发生闹事的问题。（二）如果由于我们的工作作得不好，闹了事，那就应当把闹事的群众引向正确的道路，利用闹事来作为改善工作、教育干部和群众的一种特殊手段，解决平日所没有解决的问题。应当在处理闹事的过程中，进行细致的工作，不要用简单的方法去处理，不要“草率收兵”。对于闹事的带头人物，除了那些违犯刑法的分子和现行反革命分子应当法办以外，不应当轻易开除。在我们这样大的国家里，有少数人闹事，并不值得大惊小怪，倒是足以帮助我们克服官僚主义。

在我们社会里，也有少数不顾公共利益、蛮不讲理、行凶犯法的人。他们可能利用和歪曲我们的方针，故意提出无理的要求来煽动群众，或者故意造谣生事，破坏社会的正常秩序。对于这种人，我们并不赞成放纵他们。相反，必须给予必要的法律的制裁。惩治这种人是社会广大群众的要求，不予惩治则是违反群众意愿的。

## 十 坏事能否变成好事？

如像我在上面讲过的，在我们的社会中，群众闹事是坏事，是我们所不赞成的。但是这种事件发生以后，又可以促使我们接受教训，克服官僚主义，教育干部和群众。从这一点上说来，坏事也可以转变成为好事。乱子有二重性。我们可以用这个观点去看待一切乱子。

匈牙利事件不是好事，这是大家清楚的。但是它也



有二重性。由于匈牙利的同志们在事件的发展过程中间处理得正确，结果匈牙利事件由坏事转变成了一件好事。匈牙利现在比过去巩固了，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也都得了教训。

同样，一九五六年下半年发生的反共反人民的世界性的风潮，当然是坏事。但是它教育了和锻炼了各国共产党和工人阶级，这就变成好事。在许多国家里，有一批人在这个风潮里退出了党。一部分党员退党，党的人数减少了，当然是坏事。但是也有一方面的好处。那些动摇分子不愿意继续干下去了，退走了，大多数坚定的党员更好团结奋斗，为什么不好呢？

总之，我们必须学会全面地看问题，不但要看到事物的正面，也要看到它的反面。在一定的条件下，坏的东西可以引出好的结果，好的东西也可以引出坏的结果。老子在二千多年以前就说过：“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日本打到中国，日本人叫胜利。中国大片土地被侵占，中国人叫失败。但是在中国的失败里面包含着胜利，在日本的胜利里面包含着失败。历史难道不是这样证明了吗？

现在世界各国的人们都在谈论着会不会打第三次世界大战。对于这个问题，我们也要有精神准备，也要有分析。我们是坚持和平反对战争的。但是，如果帝国主义一定要发动战争，我们也不要害怕。我们对待这个问题的态度，同对待一切“乱子”的态度一样，第一条，反对；第二条，不怕。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出了一个苏联，两亿

人口。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出了一个社会主义阵营，一共九亿人口。如果帝国主义者一定要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可以断定，其结果必定又要有多少亿人口转到社会主义方面，帝国主义剩下的地盘就不多了，也有可能整个帝国主义制度全部崩溃。

矛盾着的对立的双方互相斗争的结果，无不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在这里，条件是重要的。没有一定的条件，斗争着的双方都不会转化。世界上最愿意改变自己地位的是无产阶级，其次是半无产阶级，因为一则全无所有，一则有也不多。现在美国操纵联合国的多数票和控制世界很多地方的局面只是暂时的，这个局面总有一天要起变化。中国的穷国地位和在国际上无权的地位也会起变化，穷国将变为富国，无权将变为有权——向相反的方向转化。在这里，决定的条件就是社会主义制度和人民团结一致的奋斗。

## 十一 关于节约

我想在这里谈一下节约的问题。我们要进行大规模的建设，但是我国还是一个很穷的国家，这是一个矛盾。全面地持久地厉行节约，就是解决这个矛盾的一个方法。

在一九五二年“三反”运动中，我们反对过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而着重在反对贪污。一九五五年提倡过节约，重点是在非生产性的基本建设中反对了过高的标准，在工业生产中节约原料，成绩很大。那时，节约的方针还

没有在国民经济各部门中认真地推行，也没有在一般机关、部队、学校、人民团体中认真地推行。今年要求在全国各方面提倡节约，反对浪费。我们对建设工作还缺乏经验。在过去几年有很大的成绩，同时也有浪费。我们必须逐步地建设一批规模大的现代化的企业以为骨干，没有这个骨干就不能使我国在几十年内变为现代化的工业强国。但是多数企业不应当这样做，应当更多地建立中小型企业，并且应当充分利用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工业基础，力求节省，用较少的钱办较多的事。在去年十一月中共二中全会更着重地提出了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的方针以后，几个月来已经开始发生效果。这一次节约运动必须彻底地持久地进行。反对浪费，同批判其他缺点错误一样，好比洗脸。人不是每天都要洗脸吗？中国共产党、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知识分子、工商业者、工人、农民、手工业者，总之，我们六亿人口都要实行增产节约，反对铺张浪费。这不但在经济上有重大意义，在政治上也有重大意义。在我们的许多工作人员中间，现在滋长着一种不愿意和群众同甘苦，喜欢计较个人名利的危险倾向，这是很不好的。我们在增产节约运动中要求精简机关，下放干部，使相当大的一批干部回到生产中去，就是克服这种危险倾向的一个方法。要使全体干部和全体人民经常想到我国是一个社会主义的大国，但又是一个经济落后的穷国，这是一个很大的矛盾。要使我国富强起来，需要几十年艰苦奋斗的时间，其中包括执行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这样一个勤俭建国的方针。

## 十二 中国工业化的道路

这里所讲的工业化道路的问题，主要是指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关系问题。我国的经济建设是以重工业为中心，这一点必须肯定。但是同时必须充分注意发展农业和轻工业。

我国是一个大农业国，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以上，发展工业必须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工业才有原料和市场，才有可能为建立强大的重工业积累较多的资金。大家知道，轻工业和农业有极密切的关系。没有农业，就没有轻工业。重工业要以农业为重要市场这一点，目前还没有使人们看得很清楚。但是随着农业的技术改革逐步发展，农业的日益现代化，为农业服务的机械、肥料、水利建设、电力建设、运输建设、民用燃料、民用建筑材料等等将日益增多，重工业以农业为重要市场的情况，将会易于为人们所理解。在第二个五年计划和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如果我们的农业能够有更大的发展，使轻工业相应地有更多的发展，这对于整个国民经济会有好处。农业和轻工业发展了，重工业有了市场，有了资金，它就会更快地发展。这样，看起来工业化的速度似乎慢一些，但是实际上不会慢，或者反而可能快一些。经过三个五年计划，或者再多一些时间，我国的钢产量仍然可能由解放前最高年产量，即一九四三年的九十多万吨，发展到二千万吨，或者更多一点。这样，城乡人民都会感到

高兴。

关于经济问题今天不准备多讲。经济建设我们还缺乏经验，因为才进行七年，还需要积累经验。对于革命我们开始也没有经验，翻过筋斗，取得了经验，然后才有全国的胜利。我们要求在取得经济建设方面的经验，比较取得革命经验的时间要缩短一些，同时不要花费那么高的代价。代价总是需要的，就是希望不要有革命时期所付的代价那么高。必须懂得，在这个问题上存在着矛盾的，即社会主义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和我们主观认识之间的矛盾，这需要在实践中去解决。这个矛盾，也将表现为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即比较正确地反映客观规律的一些人同比较不正确地反映客观规律的一些人之间的矛盾，因此也是人民内部的矛盾。一切矛盾都是客观存在的，我们的任务在于尽可能正确地反映它和解决它。

为了使我国变为工业国，我们必须认真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苏联建设社会主义已经有四十年了，它的经验对于我们是十分宝贵的。大家看吧，谁给我们设计和装备了这么多的重要工厂呢？美国给我们没有？英国给我们没有？他们都不给。只有苏联肯这样做，因为它是社会主义国家，是我们的同盟国家。除了苏联以外，东欧一些兄弟国家也给了我们一些帮助。完全不错，一切国家的好经验我们都要学，不管是社会主义国家的，还是资本主义国家的，这一点是肯定的。但是主要的还是要学苏联。学习有两种态度。一种是教条主义的态度，不管我国情况，适用的和不适用的，一起搬来。这种态度不

好。另一种态度，学习的时候用脑筋想一下，学那些和我国情况相适合的东西，即吸取对我们有益的经验，我们需要的是这样一种态度。

巩固同苏联的团结，巩固同一切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这是我们的基本方针，基本利益所在。再就是亚非国家以及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我们应当巩固和发展同它们的团结。有了这两种力量的团结，我们就不孤立了。至于帝国主义国家，我们也要团结那里的人民，并且争取同那些国家和平共处，做些生意，制止可能发生的战争，但是决不可以对他们怀抱一些不切实际的想法。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六〇年出版的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刊印

## 注 释

〔1〕 这是毛泽东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不久，毛泽东对讲话记录作了修改和补充，于六月十九日在《人民日报》上公开发表。

〔2〕 指一九五一年五月二十三日在北京签订的《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共十七条。见本书第二册第283—287页。

〔3〕 关于计划生育的问题，在原始记录中记有毛泽东这样一段话：我们这个国家有这么多人，这是世界上各国都没有的。要提倡节育，要有计划地生育。我看人类是最不会管理自己了。工厂生产布匹、桌椅板凳、钢铁有计划，而人类对于生产人类自己就没有计划了，这是无政府主义，无组织无纪律。这样下去，我看人类是要提前毁掉的。中国六亿人口，增加十倍是多

少？六十亿，那时候就快要接近灭亡了。我今天不着重谈节育问题，因为我们邵力子先生是专门的名家，他是大学专科毕业的，比我高明。还有我们李德全部长，也很注意这个问题。关于这个问题，政府可能要设一个部门，或者设一个节育委员会，作为政府的机关。人民团体也可以组织一个。因为要解决技术问题，设一个部门，要有经费，要想办法，要宣传。

# 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 (扩大)会议结束语提纲

(一九五七年三月一日)

毛 泽 东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要普及,要提高,京戏原来是地方戏,将来也可能转化。

散花野草也有用处,其中有些可能转化为香花,香花也可能变得不香了。

共产党也总有一天变得无用了。

马克思主义应当宣传,不能强迫人们相信。以工人阶级、共产党、马列主义为领导,是否不妥?

匈牙利要两年至三年才能恢复。错误:官僚主义,脱离群众,工业方针错误,工人减薪,资本家简单地被打倒,知识分子未被改造,反革命分子没有镇压。

批评问题。不要怕,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马克思主义是不怕批评的,应允许互相批评,批评政府不犯罪。老干部不怕批评。

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没有安排,安排不够。

大民主,小民主——一般适用小民主,局部(不实行



小民主地方)允许大民主。

罢工、罢课、游行示威、请愿。

在法律范围内(不允许行凶,毁物)。

纪律,为了增进纪律——我们人民是很守纪律的。

以军队民主为例。

尊师爱生。

局部的,个别的,不是一般提倡。

作为克服人民内部矛盾、调整社会秩序的一种方法,  
因为官僚主义存在。

发至县级<sup>[1]</sup>,还要研究。

官僚主义——橡胶。

以工人阶级、共产党、马列主义(指导思想)为领导,  
是否不妥?

曲折、波浪式、螺旋形的前进。

科学。橡胶 50—60 年。

对唯心主义是否可以批评?问题是要有说服力。

发行参考消息 40 万份(2000, 30 万)<sup>[2]</sup>, 蒋介石选  
集<sup>[3]</sup>。

不要泼科学家的冷水。参观科学院。

控制在六亿人口(控制一个时期少增长,以待条件  
具备,再作适当增长)。

单纯技术观点抬头。

美国经济危机,美国同各国的矛盾。

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耻!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 注 释

〔1〕 指将毛泽东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发至县级。

〔2〕 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的结束语中说,《参考消息》的发行,准备由二千份扩充到三十万份,发到县一级。

〔3〕 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的结束语中说他赞成出蒋介石全集,但不公开发行。

# 粮食问题不可掉以轻心\*

(一九五七年三月四日)

李 先 念

去年有一个时候,有些同志有这样的说法,粮食在我国已经不成为大问题了。我认为,这种说法未免言之过早。合作化以后,粮食状况有所好转,这是总的趋势。可是,那种认为粮食生产赶不上需要增长的矛盾,在合作化以后就可以一下子解决的想法,是过分天真了。合作化只是解决了生产关系问题,即所有制问题。随着合作社的巩固和发展,粮食会不断增产,但不可能马上就增产出几千亿斤粮食来。把农业发展纲要中设想的经过若干年努力才能达到的粮食指标,就是黄河以北亩产四百斤,黄河以南、淮河以北亩产五百斤,淮河以南亩产八百斤,当作合作化完成后就能达到的产量,把今后十二年的事当作眼前的事,那就是思想超过了实际。去年粮食收购完成得不很好,销售压不下去,都和这种思想有一定的关系。

在粮食问题上,我们应该肯定,实现合作化包含有粮食状况好转的可能性。但请同志们记住下面三条:

---

\* 这是李先念在全国粮食厅局长会议上讲话的节录。

(一)生产和需要之间存在很大矛盾，这不是短期可以解决的。我们的耕地面积少，要大量开荒不仅资源有限，而且资金困难。这几年我国的耕地不仅没有增加，每人平均还少了二分地。防止水旱灾害，要靠多年的努力，要花许多投资，才能逐步见效。所以粮食及其他农产品的生产和需要之间的矛盾，是经常存在着、长期存在着的。

(二)人口增长得太快。以前一年增加一千二百万人到一千五百万人。每人每年要五百斤粮食，按一千五百万人计算，一年就是七十五亿斤。所以，节育成了政治问题。以前不敢宣传，怕人说是马尔萨斯主义。现在对节育要公开宣传，人口生育不能无计划。

(三)增产粮食和发展副业生产有相互促进的一面，也有很大的矛盾。如多养猪，可以多积肥，农民收入多了还可发展其他副业。不养猪，不发展“三坊”<sup>〔1〕</sup>，农民收入减少，肉食供应减少，城乡人民都有意见。猪是必须发展的，“三坊”也要发展，但都需要粮食。现在城乡人民对猪肉等副食品的需要大为增加，对粮食的需要也要增加而不能减少，这种趋势我们要估计进去。

总之，我国人多、地少、生产技术还落后，增产粮食是件头等大事，不能掉以轻心。

根据《李先念文选》（一九三五——一九八八年）刊印

## 注 释

〔1〕“三坊”是农村豆腐坊、粉坊、油坊等农副产品加工作坊的统称。

# 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 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五七年三月十二日)

毛 泽 东

各位同志！这次会议开得很好。会议中间提出了很多问题，使我们知道了很多事情。我现在就同志们所讨论的问题讲几点意见。

我们现在是处在一个社会大变动的时期。中国社会很久以来就处在大变动中间了。抗日战争时期是大变动，解放战争时期也是大变动。但是就性质说来，现在的变动比过去的变动深刻得多。我们正在建设社会主义。有几亿人口进入社会主义的改造运动。全国各个阶级的相互关系都在起变化。农业和手工业方面的小资产阶级和工商业资产阶级，都发生了变化。社会经济制度变化了，个体经济变为集体经济，资本主义私有制正在变为社会主义公有制。这样的大变动当然要反映到人们的思想上来。存在决定意识。在不同的阶级、阶层、社会集团的人们中间，对于这个社会制度的大变动，有各种不同的反映。广大人民群众热烈地拥护这个大变动，因为现实生活证明，社会主义是中国的唯一的出路。推翻

旧的社会制度，建立新的社会制度，即社会主义制度，这是一场伟大的斗争，是社会制度和人的相互关系的一场大变动。应该说，情况基本上是健康的。但是，新的社会制度还刚刚建立，还需要有一个巩固的时间。不能认为新制度一旦建立起来就完全巩固了，那是不可能的。需要逐步地巩固。要使它最后巩固起来，必须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坚持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还必须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进行经常的、艰苦的社会主义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教育。除了这些以外，还要有各种国际条件的配合。在我国，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斗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斗争，还要经过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但是，我们大家都应该看到，这个社会主义的新制度是一定会巩固起来的。我们一定会建设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是我要讲的第一点。

第二点：关于我国知识分子的情况。中国究竟有多少知识分子，没有精确的统计。有人估计，各类知识分子，包括高级知识分子和普通知识分子在内，大约有五百万左右。这五百万左右的知识分子中，绝大多数人都是爱国的，爱我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愿意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的国家服务。有少数知识分子对于社会主义制度是不那么欢迎、不那么高兴的。他们对社会主义还有怀疑，但是在帝国主义面前，他们还是爱国的。对于我们的国家抱着敌对情绪的知识分子，是极少数。这种人不喜欢我们这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他们留恋旧社会。一遇

机会，他们就会兴风作浪，想要推翻共产党，恢复旧中国。这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条路线，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路线中间，顽固地要走后一条路线的人。这后一条路线，在实际上是不能实现的，所以他们实际上是准备投降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人。这种人在政治界、工商界、文化教育界、科学技术界、宗教界里都有，这是一些极端反动的人。这种人在五百万左右的人数中间，大约只占百分之一、二、三。绝大部分的知识分子，占五百万总数的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都是在各种不同的程度上拥护社会主义制度的。在这些拥护社会主义制度的人的中间，有许多人对于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如何工作，许多新问题如何了解，如何对待，如何答复，还不大清楚。

五百万左右的知识分子，如果拿他们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来看，似乎可以这样说：大约有百分之十几的人，包括共产党员和党外同情分子，是比较熟悉马克思主义，并且站稳了脚跟，站稳了无产阶级立场的。就五百万的总数来说，这些人是少数，但是他们是核心，有力量。多数人想学习马克思主义，并且也学了一点，但是还不熟悉。其中有些人还有怀疑，还没有站稳脚跟，一遇风浪就会左右摇摆。在五百万总数中占大多数的这部分知识分子，还是处在一种中间的状态。坚决反对马克思主义、对于马克思主义抱着仇视态度的人，是占极少数。有一些人虽然不公开表示不赞成马克思主义，但是实际上不赞成。这种人在很长的时间内都会有的，我们应该允许

他们不赞成。例如一部分唯心主义者，他们可以赞成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但是不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宗教界的爱国人士也是这样。他们是有神论者，我们是无神论者。我们不能强迫这些人接受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总而言之，可以这样说，五百万左右的知识分子在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状况是：赞成而且比较熟悉的，占少数；反对的也占少数；多数人是赞成但不熟悉，赞成的程度又很不相同。这里有三种立场，坚定的，动摇的，反对的三种立场。应该承认，这种状况在一个很长的时间内还会存在。如果不承认这种状况，我们就会对别人要求过高，又会把自己的任务降低。我们作宣传工作的同志有一个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任务。这个宣传是逐步的宣传，要宣传得好，使人愿意接受。不能强迫人接受马克思主义，只能说服人接受。如果在今后几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内，在我们的知识分子中间能够有比较多的人接受马克思主义，能够有比较多的人通过工作和生活的实践，通过阶级斗争的实践、生产的实践、科学的实践，懂得比较多的马克思主义，这样就好了。这是我们的希望。

第三点：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我们的国家是一个文化不发达的国家。五百万左右的知识分子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大国来说，是太少了。没有知识分子，我们的事情就不能做好，所以我们要好好地团结他们。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主要的社会成员是三部分人，就是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是脑力劳动者。他们的工作是为人民服务的，也就是为工人农民服务的。知识分子，就大多



数来说,可以为旧中国服务,也可以为新中国服务,可以为资产阶级服务,也可以为无产阶级服务。在为旧中国服务的时候,知识分子中的左翼是反抗的,中间派是摇摆的,只有右翼是坚定的。现在转到为新社会服务,就反过来了。左翼是坚定的,中间派是摇摆的(这种摇摆和过去不同,是在新社会里的摇摆),右翼是反抗的。知识分子又是教育者。我们的报纸每天都在教育人民。我们的文学艺术家,我们的科学技术人员,我们的教授、教员,都在教人民,教学生。因为他们是教育者,是当先生的,他们就有一个先受教育的任务。在这个社会制度大变动的时期,尤其要先受教育。过去几年,他们受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教育,有些人并且很用功,比以前大有进步。但是就多数人来说,用无产阶级世界观完全代替资产阶级世界观,那就还相差很远。有些人读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书,自以为有学问了,但是并没有读进去,并没有在头脑里生根,不会应用,阶级感情还是旧的。还有一些人很骄傲,读了几句书,自以为了不起,尾巴翘到天上去了,可是一遇风浪,他们的立场,比起工人和大多数劳动农民来,就显得大不相同。前者动摇,后者坚定,前者暧昧,后者明朗。因此,如果认为教人者不需要再受教育了,不需要再学习了,如果认为社会主义改造只是要改造别人,改造地主、资本家,改造个体生产者,不要改造知识分子,那就错误了。知识分子也要改造,不仅那些基本立场还没有转过来的人要改造,而且所有的人都应该学习,都应该改造。我说所有的人,我们这些人也在内。情况是在不断

地变化,要使自己的思想适应新的情况,就得学习。即使是对于马克思主义已经了解得比较多的人,无产阶级立场比较坚定的人,也还是要再学习,要接受新事物,要研究新问题。知识分子如果不把自己头脑里的不恰当的东西去掉,就不能担负起教育别人的任务。我们当然只能是一面教,一面学,一面当先生,一面当学生。要作好先生,首先要作好学生。许多东西单从书本上学是不成的,要向生产者学习,向工人学习,向贫农下中农学习,在学校则要向学生学习,向自己教育的对象学习。据我看,在我们的知识分子中间,多数人是愿意学习的。我们的任务是,在他们自愿学习的基础上,好心地帮助他们学习,通过适当的方式来帮助他们学习,而不要用强制的方法勉强他们学习。

第四点:知识分子同工农群众结合的问题。知识分子既然要为工农群众服务,那就首先必须懂得工人农民,熟悉他们的生活、工作和思想。我们提倡知识分子到群众中去,到工厂去,到农村去。如果一辈子都不同工人农民见面,这就很不好。我们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文学家、艺术家、教员和科学研究人员,都应该尽可能地利用各种机会去接近工人农民。有些人可以到工厂农村去看一看,转一转,这叫“走马看花”,总比不走不看好。另外一些人可以在工厂农村里住几个月,在那里作调查,交朋友,这叫“下马看花”。还有些人可以长期住下去,比如两年、三年,或者更长一些时间,就在那里生活,叫做“安家落户”。有一些知识分子本来就是生活在工人农民里面

的，例如工业技术人员本来就在工厂，农业技术人员和乡村学校教员本来就在农村。他们应该把工作做好，和工人农民打成一片。我们要把接近工农群众这件事，造成一种风气，就是说要有很多知识分子这样做。当然不能是百分之百，有些人有各种原因不能去，但是我们希望尽可能有比较多的人去。也不能一下子大家都去，可以逐步地分批地去。让知识分子直接接触工人农民，过去在延安时期曾经这样做过。那时候，延安的许多知识分子思想很乱，有各种怪议论。我们开了一次会，劝大家到群众里面去。后来许多人去了，得到很好的效果。知识分子从书本上得来的知识在没有同实践结合的时候，他们的知识是不完全的，或者是很不完全的。知识分子接受前人的经验，主要是靠读书。书当然不可不读，但是光读书，还不能解决问题。一定要研究当前的情况，研究实际的经验和材料，要和工人农民交朋友。和工人农民交朋友，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现在也有一些人到工厂农村去，结果是有的有收获，有的就没有收获。这中间有一个立场问题或者态度问题，也就是世界观的问题。我们提倡百家争鸣，在各个学术部门可以有許多派、许多家，可是就世界观来说，在现代，基本上只有两家，就是无产阶级一家，资产阶级一家。或者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或者是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共产主义世界观就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它不是任何别的阶级的世界观。我们现在的大多数的知识分子，是从旧社会过来的，是从非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有些人即使是出身于工人农民的家庭，

但是在解放以前受的是资产阶级教育，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他们还是属于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这些人，如果不把过去的一套去掉，换一个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就和工人农民的观点不同，立场不同，感情不同，就会同工人农民格格不入，工人农民也不会把心里的话向他们讲。知识分子如果同工农群众结合，和他们做了朋友，就可以把他们从书本上学来的马克思主义变成自己的东西。学习马克思主义，不但要从书本上学，主要地还要通过阶级斗争、工作实践和接近工农群众，才能真正学到。如果我们的知识分子读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书，又在同工农群众的接近中，在自己的工作实践中有所了解，那末，我们大家就有了共同的语言，不仅有爱国主义方面的共同语言、社会主义制度方面的共同语言，而且还可以有共产主义世界观方面的共同语言。如果这样，大家的工作就一定会做得好得多。

第五点：关于整风。整风就是整顿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共产党内的整风，在抗日时期进行过一次，以后在解放战争时期进行过一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又进行过一次。现在中共中央作出决定，准备党内在今年开始整风。党外人士可以自由参加，不愿意的就不参加。这一次整风，主要是要批评几种错误的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一个是主观主义，一个是官僚主义，还有一个是宗派主义。这次整风的方法同抗日时期的整风一样，就是先研究一些文件，每个人在学习文件的基础上检查自己的思想和工作，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揭发缺点和

错误的方面，发扬优点和正确的方面。在整风中间，一方面要严肃认真，对于错误和缺点，一定要进行认真的而不是敷衍的批评和自我批评，而且一定要纠正；另一方面又要和风细雨，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反对采取“一棍子把人打死”的办法。

我们的党是一个伟大的党，光荣的党，正确的党。这是必须肯定的。但是我们还有缺点，这个事实也要肯定。不应该肯定我们的一切，只应该肯定正确的东西；同时，也不应该否定我们的一切，只应该否定错误的东西。在我们的工作中成绩是主要的，但是缺点和错误也还不少。因此我们要进行整风。我们自己来批评自己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这会不会使我们的党丧失威信呢？我看不会。相反的，会增加党的威信。抗日时期的整风就是证明。它增加了党的威信，增加了同志们的威信，增加了老干部的威信，新干部也有了很大的进步。一个共产党，一个国民党，这两个党比较起来，谁怕批评呢？国民党害怕批评。它禁止批评，结果并没有能够挽救它的失败。共产党是不怕批评的，因为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真理是在我们方面，工农基本群众是在我们方面。我们过去说过，整风运动是一个“普遍的马克思主义的教育运动”。整风就是全党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来学习马克思主义。在整风中间，我们一定可以更多地学到一些马克思主义。

中国的改革和建设靠我们来领导。如果我们把作风整顿好了，我们在工作中间就会更加主动，我们的本事就

会更大，工作就会做得更好。我们国家要有很多诚心为人民服务、诚心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立志改革的人。我们共产党员都应该是这样的人。在从前，在旧中国，讲改革是要犯罪的，要杀头，要坐班房。但是在那些时候，有一些立志改革的人，他们无所畏惧，他们在各种困难的条件下，出版书报，教育人民，组织人民，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给我国的经济和文化的迅速发展开辟了道路。我们的政权的建立还不过短短几年，人们可以看到，不论在经济方面，在文化、教育、科学方面，都已经出现了空前繁荣的局面。为了达到建设新中国的目的，对于什么困难我们共产党人也是无所畏惧的。但是仅仅依靠我们还不够。我们还需要有一批党外的志士仁人，他们能够按照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方向，同我们一起来为改革和建设我们的社会而无所畏惧地奋斗。要使几亿人口的中国人生活得好，要把我们这个经济落后、文化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富裕的、强盛的、具有高度文化的国家，这是一个很艰巨的任务。我们所以要整风，现在要整风，将来还要整风，要不断地把我们身上的错误东西整掉，就是为了使我们能够更好地担负起这项任务，更好地同党外的一切立志改革的志士仁人共同工作。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我们希望一切同我们共同奋斗的人能够勇敢地负起责任，克服困难，不要怕挫折，不要怕有人议论讥笑，也不要怕向我们共产党人提批评建议。“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我们在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而斗争的时候，必须有这种大无畏

的精神。在共产党人方面，我们要给这些合作者创造有利的条件，要同他们建立同志式的良好的共同工作关系，要团结他们一起奋斗。

第六点：片面性问题。片面性就是思想上的绝对化，就是形而上学地看问题。对于我们的工作的看法，肯定一切或者否定一切，都是片面性的。这样看问题的人，现在在共产党里面还是不少，党外也有很多。肯定一切，就是只看到好的，看不到坏的，只能赞扬，不能批评。说我们的工作似乎一切都好，这不合乎事实。不是一切都好，还有缺点和错误。但是也不是一切都坏，这也不合乎事实。要加以分析。否定一切，就是不加分析地认为事情都做得不好，社会主义建设这样一个伟大事业，几亿人口所进行的这个伟大斗争，似乎没有什么好处可说，一团糟。许多具有这种看法的人，虽然和那些对社会主义制度心怀敌意的人还不相同，但是这种看法是很错误的，很有害的，它只会使人丧失信心。不论是用肯定一切的观点或者否定一切的观点来看我们的工作，都是错误的。对于这些片面地看问题的人，应该进行批评，当然要以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态度去批评，要帮助他们。

有人说，既然要整风，要大家提意见，就必然要有片面性，提出克服片面性，好像就是不让人讲话。这种说法对不对呢？要求所有的人都不带一点片面性，这是困难的。人们总是根据自己的经验来观察问题，处理问题，发表意见，有时候就难免带上一些片面性。但是，可不可以要求人们逐步地克服片面性，要求看问题比较全面一

些？我看应该这样要求。如果不是这样，不要求一天一天地、一年一年地有较多的人采用比较全面地看问题的方法，那末，我们就停滞了，我们就是肯定片面性了，就是同整风的要求背道而驰了。所谓片面性，就是违反辩证法。我们要求把辩证法逐步推广，要求大家逐步地学会使用辩证法这个科学方法。我们现在有些文章，神气十足，但是没有货色，不会分析问题，讲不出道理，没有说服力。这种文章应该逐渐减少。当着自己写文章的时候，不要老是想着“我多么高明”，而要采取和读者处于完全平等地位的态度。你参加革命的时间虽然长，讲了错话，人家还是要驳。你的架子摆得越大，人家越是不理你那一套，你的文章人家就越不爱看。我们应该老老实实地办事，对事物有分析，写文章有说服力，不要靠装腔作势来吓人。

有人说，发长篇大论可以避免片面性，写短篇的杂文就不能避免片面性。杂文是不是一定会带片面性？我在上面讲了，片面性往往是难免的，有些片面性也不是不得了。要求所有的人看问题都必须很全面，这样就会阻碍批评的发展。但是，我们还要求努力做到看问题比较全面，不管长文也好，短文也好，杂文包括在内，努力做到不是片面性的。有人说，几百字、一二千字一篇的杂文，怎么能作分析呢？我说，怎么不能呢？鲁迅不就是这样子的吗？分析的方法就是辩证的方法。所谓分析，就是分析事物的矛盾。不熟悉生活，对于所论的矛盾不真正了解，就不可能有中肯的分析。鲁迅后期的杂文最深刻有力，



并没有片面性，就是因为这时候他学会了辩证法。列宁有一部分文章也可以说是杂文，也有讽刺，写得也很尖锐，但是那里面就没有片面性。鲁迅的杂文绝大部分是对敌人的，列宁的杂文既有对敌人的，也有对同志的。鲁迅式的杂文可不可以用来对付人民内部的错误和缺点呢？我看也可以。当然要分清敌我，不能站在敌对的立场用对待敌人的态度来对待同志。必须是满腔热情地用保护人民事业和提高人民觉悟的态度来说话，而不能用嘲笑和攻击的态度来说话。

不敢写文章怎么办？有的人说，有文章不敢写，写了怕得罪人，怕受批评。我看这种顾虑可以消除。我们的政权是人民民主政权，这对于为人民而写作是有利的环境。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对于科学和艺术的发展给了新的保证。如果你写得对，就不用怕什么批评，就可以通过辩论，进一步阐明自己正确的意见。如果你写错了，那末，有批评就可以帮助你改正，这并没有什么不好。在我们的社会里，革命的斗争的批评和反批评，是揭露矛盾，解决矛盾，发展科学、艺术，做好各项工作的好方法。

第七点：“放”还是“收”？这是个方针问题。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是一个基本性的同时也是长期性的方针，不是一个暂时性的方针。同志们在讨论中间是不赞成收的，我看这个意见很对。党中央的意见就是不能收，只能放。

领导我们的国家可以采用两种不同的办法，或者说两种不同的方针，这就是放和收。放，就是放手让大家讲

意见,使人们敢于说话,敢于批评,敢于争论;不怕错误的议论,不怕有毒素的东西;发展各种意见之间的相互争论和相互批评,既容许批评的自由,也容许批评批评者的自由;对于错误的意见,不是压服,而是说服,以理服人。收,就是不许人家说不同的意见,不许人家发表错误的意见,发表了就“一棍子打死”。这不是解决矛盾的办法,而是扩大矛盾的办法。两种方针:放还是收呢?二者必取其一。我们采取放的方针,因为这是有利于我们国家巩固和文化发展的方针。

我们准备用这个放的方针来团结几百万知识分子,改变他们现在的面貌。像我在上面所说的,我国绝大部分的知识分子是愿意进步的,愿意改造的,是可以改造的。在这里,我们所采取的方针有很大作用。知识分子的问题首先是思想问题,对于思想问题采取粗暴的办法、压制的办法,那是有害无益的。知识分子的改造,特别是他们的世界观的改变,要有一个长时期的过程。我们的同志一定要懂得,思想改造的工作是长期的、耐心的、细致的工作,不能企图上几次课,开几次会,就把人家在几十年生活中形成的思想意识改变过来。要人家服,只能说服,不能压服。压服的结果总是压而不服。以力服人是不行的。对付敌人可以这样,对付同志,对付朋友,绝不能用这个方法。不会说服怎么办?这就要学习。我们一定要学会通过辩论的方法、说理的方法,来克服各种错误思想。

百花齐放是一种发展艺术的方法,百家争鸣是一种

发展科学的方法。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个方针不但是使科学和艺术发展的好方法，而且推而广之，也是我们进行一切工作的好方法。这个方法可以使我们少犯错误。有许多事情我们不知道，因此不会解决，在辩论中间，在斗争中间，我们就会明了这些事情，就会懂得解决问题的方法。各种不同意见辩论的结果，就能使真理发展。对于那些有毒素的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也可以采取这个方法，因为同那些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进行斗争，就会使马克思主义发展起来。这是在对立面的斗争中的发展，是合于辩证法的发展。

人们历来不是讲真善美吗？真善美的反面是假恶丑。没有假恶丑就没有真善美。真理是同谬误对立的。在人类社会和自然界，统一体总要分解为不同的部分，只是在不同的具体条件下，内容不同，形式不同罢了。任何时候，总会有错误的东西存在，总会有丑恶的现象存在。任何时候，好同坏，善同恶，美同丑这样的对立，总会有的。香花同毒草也是这样。它们之间的关系都是对立的统一，对立的斗争。有比较才能鉴别。有鉴别，有斗争，才能发展。真理是在同谬误作斗争中间发展起来的。马克思主义就是这样发展起来的。马克思主义在同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思想作斗争中发展起来，而且只有在斗争中才能发展起来。

我们主张放的方针，现在还是放得不够，不是放得过多。不要怕放，不要怕批评，也不要怕毒草。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真理，不怕批评，它是批评不倒的。共产党、人民

政府也是这样，也不怕批评，也批评不倒。错误的东西总会有的，并不可怕。最近一个时期，有一些牛鬼蛇神被搬上舞台了。有些同志看到这个情况，心里很着急。我说，有一点也可以，过几十年，现在舞台上这样的牛鬼蛇神都没有了，想看也看不成了。我们要提倡正确的东西，反对错误的东西，但是不要害怕人们接触错误的东西。单靠行政命令的办法，禁止人接触不正常的现象，禁止人接触丑恶的现象，禁止人接触错误思想，禁止人看牛鬼蛇神，这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当然我并不提倡发展牛鬼蛇神，我是说“有一点也可以”。某些错误东西的存在是并不奇怪的，也是用不着害怕的，这可以使人们更好地学会同它作斗争。大风大浪也不可怕。人类社会就是从大风大浪中发展起来的。

在我国，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还会长期存在。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建立。我们已经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改造方面，取得了基本胜利，但是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方面，我们还没有完全取得胜利。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谁胜谁负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我们同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还要进行长期的斗争。不了解这种情况，放弃思想斗争，那就是错误的。凡是错误的思想，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应该进行批判，决不能让它们自由泛滥。但是，这种批判，应该是充分说理的，有分析的，有说服力的，而不应该是粗暴的、官僚主义的，或者是形而上学的、教条主义的。

长时间以来，人们对于教条主义作过很多批判。这是应该的。但是，人们往往忽略了对于修正主义的批判。教条主义和修正主义都是违反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一定要向前发展，要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不能停滞不前。停止了，老是那么一套，它就没有生命了。但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是不能违背的，违背了就要犯错误。用形而上学的观点来看待马克思主义，把它看成僵死的东西，这是教条主义。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这就是修正主义。修正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想。修正主义者抹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区别，抹杀无产阶级专政和资产阶级专政的区别。他们所主张的，在实际上并不是社会主义路线，而是资本主义路线。在现在的情况下，修正主义是比教条主义更有害的东西。我们现在思想战线上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开展对于修正主义的批判。

最后一点，第八点：各个省、市、自治区的党委应该把思想问题抓起来。这一点是在座有些同志希望我讲的。现在许多地方的党委还没有抓思想问题，或者抓得很少。这主要是因为忙。但是一定要抓。所谓“抓”，就是要把这个问题提到议事日程上，要研究。我们国内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但是还有阶级斗争，主要是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阶级斗争，而且还很尖锐。思想问题现在已经成为非常重要的问题。各地党委的第一书记应该亲自出马来抓思想问题，只有重视了和研究了这个问题，才能正确地解决

这个问题。各地方要召开像这次宣传会议一样的会议，讨论当地的思想工作和有关思想工作的各方面的问题。这种会不但要有党内的同志参加，而且要有党外的人参加，要有不同意见的人参加。我们这次会议的经验证明，这对于会议的进行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根据《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刊印

# 中共中央关于 民主办社几个事项的通知

(一九五七年三月十五日)

为着继续巩固农业合作社制度，争取今年农业的大丰收，中央认为坚持民主办社的方针是很重要的。就现在的情况来看，应该注意以下三个主要事项。

**第一，农业合作社要按时公开财政收支。**其中包括产品的分配、在银行的存款、国家的预购款、国家的贷款和它的用途、生产资料和用具的购置、干部的补贴、社员的预支、国家救济款的处理，等等。所有这一切财政收支，都同全体社员的切身利益密切相关，因此，都必须按时公布（有的随时公布，有的定期公布），让全体社员知道，由群众参预评议，而不能由少数干部独揽支配的大权，以便避免各种营私舞弊的行为，保证社干部的廉洁，消除社员对于财政问题的疑虑。必须知道，凡是没有这样做的合作社，社员们对于财政问题是存在着很大疑虑的。

**第二，社和队决定问题要同群众商量。**例如关于生产的布置，农业技术的改进，耕作制度的改变，新种子的采用，合作社的基本建设，经营管理，等等问题，都应该由干部和群众共同讨论，既要照顾国家的计划和政策，又要因地制宜，按照当地的土地条件、季节条件以及其他经济

条件，反复研究几次，稳步前进。凡是当地已经行之有效的办法，必须采取积极的态度，继续加以支持和推广。但凡是还没有经过实地典型试验的，则应该采取很慎重的态度，充分注意老农的意见。老农虽然有些保守的缺点，但他们有很多的经验，如果有些办法是多数老农不同意的，不要草率从事。各农业合作社可以考虑组织一个技术顾问委员会，吸收有经验的老农参加，各生产队也可以考虑请本队中一个有经验的老农当顾问，以便充分利用老农的有益的合理的经验，特别是关于精耕细作、细打细收的经验。

**第三，干部要参加生产。**农业合作社的社长、副社长以及其他干部都应该利用一切可能的时间做到这点。大社的事情多些，但干部们争取一部分甚至大部分的时间参加生产，也还是可能的。最近有些地方的合作社在作了多少程度不等的整顿之后，干部纷纷下地参加生产，在社员群众中引起了很好的影响，大大地刺激了社员们的生产积极性。这个经验有普遍性的意义，很值得各地注意。这种作法使社干部的生活不必完全由社补贴，可以只由社补贴那些因公误工的部分，因而能够减少社员的负担，同时也使干部们能够联系生产的实践，了解生产中的具体问题，对于领导社和队的生产有很大好处。为此，县、区、乡各级党委在领导方法上也应该相应地有所改进，例如减少一些不必要的会议，不要时常调集社干部到县区开会，有问题时，由县区干部分头下去传达和解决，以便减少或避免社干部在时间上和经济上的



浪费。

中央认为实现上述三项措施，将会大大地改善各农业合作社干部同群众的关系，加强干部同群众的团结，促进今年农业生产的高潮。希望省、市、县、区、乡各级党委根据各地合作社的具体情况，加以适当处理，并使这些措施长期坚持下去，成为习惯。

（此件发到乡支部）

一九五七年三月十五日

根据中共中央文件刊印

# 中共中央关于传达 全国宣传工作会议的指示

(一九五七年三月十六日)

各省(市)委、自治区党委、解放军总政治部、中直党委、国家机关党委：

中央在一九五七年三月六日至十三日召开了全国宣传工作会议。这次会议吸收了党外科学、教育、文学、艺术、新闻、出版等文化人士约一百六十人参加(占全体参加人数的五分之一)。会议首先听取了毛泽东同志在最高国务会议扩大会议上所作的“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报告录音。在会议期间，毛泽东同志分别和宣传、教育、文艺、新闻出版、高等学校、科学等方面的几十位党内外代表人物举行了六次座谈，并亲自向大会作了讲话。

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胜利，使我国的社会性质和社会面貌发生大变动。几万万人口进入社会主义这事实，必然会在人们的思想意识中引起反映。现在，大规模的群众行动的阶级斗争已经结束，人民内部的矛盾开始表露出来。我国有大约五百万知识分子，他们在教育、文艺、科学、技术、新闻、出版等事业中和党、政、军的机关中工作，他们是人

民之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人，是教育人民的人，离开了他们就不能建设社会主义。他们可以分为三个部分：极少数是反对社会主义的，他们之所以反对社会主义，是因为他们受剥削阶级的影响甚深；有少数人（大约百分之十左右），包括党内党外，是不但很积极地赞成社会主义制度，而且掌握了共产主义的世界观，他们是马克思主义者，是先进人物；最大部分的人，即百分之八十以上，是愿意接受社会主义的制度，但是他们的世界观还不完全是马克思主义的。在上述的百分之八十以上的这部分的知识分子中，有的是唯心主义者，是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的；有的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抱着怀疑态度的；有很多是略为知道些马克思主义，也想学习马克思主义，但是他们只愿意在自愿的基础上，在别人善意的帮助之下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而对于用粗暴态度强制学习则抱有反感。知识分子的这种情况，将会长期存在。各种不同的知识分子，表露自己不同的观点，是很自然的事情。

在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的时候，党中央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这个政策的目的是用说服的方法，用自由辩论的方法，而不是用粗暴的方法，向知识分子进行长期的、耐心的、细致的马克思主义的宣传，促进我国的科学文艺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迅速地繁荣起来。党认识到，必须把在敌我问题上和是非问题上两种不同的矛盾加以严格的区别。人民内部的矛盾，特别是思想上的问题，只能根据“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斗争，以便在新的基础上达到团结”的原则。我们必

须采取正确的方法，帮助知识分子学习马克思主义，和接近工农群众。我们要做到在一个长时期（比如说十五年）内，使全国的知识分子，从学习和实践中，从同工农群众的接触中，有更多的人（比如说三分之一）能够领会和掌握马克思主义。

现在，党与知识分子的关系中，存在着一些不正常的状态。这种不正常状态的原因，是党内存在着两种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就是教条主义和右倾机会主义。教条主义，用粗暴的而不是说服的办法，用斥责而不是说理的办法，用强迫而不是自愿的办法，来对待知识分子，对待思想问题，对待学习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有教条主义思想的同志，他们对于我们过去的工作肯定一切，只看到成绩，没有看到缺点，骄傲自满，害怕批评，懒于说理，对于不同的意见，要求采取简单的压服的办法。很多的同志实际上不赞成或不完全赞成“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政策。右倾机会主义，则对于我们过去的工作否定一切，只看到缺点，没有看到成绩，因而丧失信心，把伟大的革命和建设事业描写为漆黑一团。右倾机会主义者实际上做了资产阶级的应声虫。必须在党内党外，反对这两种错误思想，反对这两种片面性，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政策。

这次宣传工作会议的一个重要经验，是党员和党外人士一起开会，这不但对于密切党员与非党员的团结有好处，对于了解情况，听取意见，讨论和研究问题，贯彻党

的方针、政策，也是很有好处的。

中央认为这次会议对今后的思想工作有极重要的意义，各地必须组织深入的传达和讨论。各省（市）应该同样召开宣传工作会议，并且像中央召开的这次宣传工作会议一样，吸收党外的教育、文艺、科学、技术、新闻、出版界人士参加，开会时间一周左右即可。此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各方提出的问题有一百数十条之多，这些问题，都由到会的人带回各地，以便继续讨论。你们的宣传工作会议，除了继续讨论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中提出的问题以外，还应继续收集和讨论新提出来的宣传工作中的问题。并且应当充分发扬民主，特别要让党外人士讲出内心的话。中央认为，各省（市）委的第一书记必须亲自领导思想工作，并指导会议的进行。这种党内党外一起参加的宣传工作会议，今后每年在中央和省市均应举行一次或两次。各省（市）应该尽量吸收地县（市）委书记听取关于毛泽东同志讲话的传达报告。

中 央

一九五七年三月十六日

根据中共中央文件刊印

# 坚持艰苦奋斗，密切联系群众\*

(一九五七年三月十八日、十九日)

毛 泽 东

—

我们党现在准备开展一次整风运动。整风是用批评和自我批评解决党内矛盾的一种方法，也是解决党同人民之间的矛盾的一种方法。这次整风，就是整顿三风，整顿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要经过整风，把我们党艰苦奋斗的传统好好发扬起来。因为革命胜利了，有一部分同志，革命意志有些衰退，革命热情有些不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少了，过去跟敌人打仗时的那种拼命精神少了，而闹地位，闹名誉，讲究吃，讲究穿，比薪水高低，争名夺利，这些东西多起来了。听说去年评级的时候，就有些人闹得不像样子，痛哭流涕。人不是长着两只眼睛吗？两只眼睛里面有水，叫眼泪。评级评得跟他不对头的时候，就双泪长流。在打蒋介石的时候，抗美援朝

- 
- 这里的（一）是毛泽东一九五七年三月十八日在济南党员干部会议上讲话的一部分，（二）是毛泽东一九五七年三月十九日在南京党员干部会议上讲话的一部分。

朝的时候，土地改革的时候，镇压反革命的时候，他一滴眼泪也不出，搞社会主义他一滴眼泪也不出，一触动到他个人的利益，就双泪长流。听说还有三天不吃饭的事情。我说，三天不吃饭，没有什么要紧，一个星期不吃饭就有点危险了。总而言之，争名誉，争地位，比较薪水，比较吃穿，比较享受，这么一种思想出来了。为个人的利益而绝食，而流泪，这也算是一种人民内部的矛盾。有一出戏，叫《林冲夜奔》，唱词里说：“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伤心处。”我们现在有些同志，他们也是男儿（也许还有女儿），他们是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评级时。这个风也要整一下吧。有泪不轻弹是对的，伤心处是什么？就是工人阶级、广大劳动人民危急存亡的时候，那个时候可以弹几滴眼泪。至于你那个什么级，就是评得不对，你也要吞下去，眼泪不要往外头流，要往里头流。世界上是有许多不公道的事情，那个级可能评得不对，那也无须闹，无关大局，只要有饭吃就行。革命党嘛，以饿不死人为原则。人没有饿死，就要做革命工作，就要奋斗。一万年以后，也要奋斗。共产党就是要奋斗，就是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要半心半意或者三分之二的心三分之二的意为人民服务。革命意志衰退的人，要经过整风重新振作起来。

## 二

我们要保持过去革命战争时期的那么一股劲，那么

一股革命热情，那么一种拼命精神，把革命工作做到底。什么叫拼命？《水浒传》上有那么一位，叫拼命三郎石秀，就是那个“拼命”。我们从前干革命，就是有一种拼命精神。每一个人有一条生命，或者六十岁，或者七十岁，或者八十岁、九十岁，看你有多长的命。只要你还能工作就多多少少应当工作。而工作的时候就要有一股革命热情，就要有一种拼命精神。有些同志缺乏这种热情，缺乏这种精神，停滞下来了。这种现象不好，应当对这些同志进行教育。

全党都要加强政治思想工作。今天军队的同志到会的很多。军队里头怎么样？平时的政治工作跟战时的政治工作是不是有些不同？在战时，要密切联系群众，要官兵打成一片，军民打成一片。这时候，我们有一些缺点，人民还谅解我们。现在是平时，又不打仗，就是训练，如果不坚持密切联系群众，人民对我们的缺点很自然地就难于原谅了。现在实行了军衔制度和其他一些制度，但是，上级跟下级还是要打成一片，干部跟士兵还是要打成一片，还是要准许下级批评上级，士兵批评干部。比如开个党代表大会，给他们一个批评的机会。陈毅同志在“三反”的时候讲得好，他说，我们发号施令多少年都可以，现在让下级批评我们一下，批评一个星期，可不可以？他的意思是说，应当是可以的。我赞成这个话，就是让下级批评我们一个星期。在大家批评之前，先准备一下，作一点报告，讲一讲自己有什么缺点，无非是一二三四，有那么几条。然后同志们发言，补充一些，批评一下。群众是公



道的，他们不会把我们的历史丢掉。连排长也要给战士们一个批评的机会，最好一年有这么一回，开这么几天的批评会。军队里头的这种民主，我们曾经搞过，结果是有益的。不要因为有了军衔制度和其他一些制度，而使上下级、官兵、军民、军队同地方的密切关系受到损害。毫无疑问，上下级的关系应当密切，应当是一种同志的关系。干部跟战士的关系应当密切，应当打成一片。军队跟人民、跟地方党政组织的关系，也应当是密切的。

我们的同志应当注意，不要靠官，不要靠职位高，不要靠老资格吃饭。说资格老，多少年革命，这个资格也是可靠的，但同时我们不要靠它。你资格老，几十年，那是真的。可是，你有一天办了一些糊涂事，讲了一篇混帐话，人民还是不谅解你。尽管你过去做过多少好事，职位有多么高，你今天的事情办得不好，解决得不对，对人民有损害，这一点人民就不能原谅。因此，我们的同志不要靠老资格吃饭，要靠解决问题正确吃饭。靠正确，不靠资格。靠资格吃不了饭，索性不靠它，等于还是什么官都没有做，就是不摆老爷架子，不摆官僚架子，把架子收起来，跟人民见面，跟下级见面。这一条，我们的干部要注意，特别是老干部要注意。一般来说，新干部没有这种包袱，比较自由。老干部对新干部要处在平等的地位。有很多东西，老干部不如新干部，要向他们学习。

根据《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刊印

# 在军事检察院检察长、 军事法院院长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五七年三月十八日)

董 必 武

这次会开得很好，总结了一九五六年的工作。在过去的一年里，你们的工作是有成绩的，这些成绩应当巩固下来，并加以发扬。工作中间也有过一些缺点和错误，这些缺点和错误，有的已经改正，有的正在改正。经过这次会议以后，我们军队中的司法工作将会做得更好。这是很有意义的一次会议。这次会议可以称是研究性质的，每年都应该举行一次这样的会议。

我们军队中的司法工作，不是现在才有的。从我们军队建立的时候起，军队中的司法工作也就开始有了萌芽。它是军队工作的一个组成部分，有助于军队纪律的巩固。没有它，军队的建设就是不完备的。我们的军队是逐步发展起来的。全国解放以后，军队正规化了。军队中的司法工作、法律工作也要正规化。我们军队的司法工作与法律工作，根据国家法律组织起来的时机已经成熟了。

你们这次会，是在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后召

开的。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不仅总结了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我们党领导人民民主革命斗争的经验，并且总结了全国解放以来，我们党在领导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经验。这些经验，应用到军队司法工作方面来，有其特殊的意义。

对待我们过去所做的工作，要有历史的观点，要从解放生产力的观点来看我们过去所做的工作。过去我们为了解放生产力，就要搞群众运动。群众运动是什么性质的呢？群众运动是一种风暴式的革命运动，它主要是依靠群众的直接行动，而不依靠法律。过去土改、镇反、三反、五反，都是依靠群众运动，不是先有了法律才搞起来的。我们的法律是从群众运动中产生的，例如土地改革法、惩治反革命条例、惩治贪污条例，都是在群众运动中总结了群众斗争的经验才制定出来的。当时党估计到不这样搞，就不能解放全国的生产力。土地改革如果不是从上而下、从下而上地开展群众运动，彻底推翻地主阶级的统治，农民的生产力就无法解放。镇压反革命也是这样。在解放初期，有些地方反动势力仍然很大。像北京天桥那个地方，有四个大恶霸，号称“四霸天”，实际上统治着那一带的人民，老百姓有事情，得先向他们打个招呼，他们说动，老百姓才敢动，他们说不动，老百姓就不敢动，一切事情全听他们摆布。那时有些地方的工厂里面，还有封建把头在剥削压迫工人。对这些反动势力，如果不发动群众起来把它们扫荡掉，那么生产力就无法解放。当时老百姓有句话：“解放只翻了一半身，镇反才真正翻

了身。”在老百姓头上压着的反动势力大得很，不搞群众运动是不行的。

过去依靠群众运动把这些妨碍生产力发展的障碍扫除了。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我们为扫荡那些东西，就要用排山倒海的力量，一下子把它搞垮。它是一阵风，总是八级以上的风，大得很。要解放生产力没有群众运动是不行的，而法律就没有这样大的力量。搞群众运动是完全必要的。现在情况变了，国家的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发展和保护生产力。我们要保护群众运动的果实，要保护和发展生产力，就必须进一步健全人民民主法制，这在八大的决议中已经明确地向我们指出来了。我们国家在过去不是无法，开国之初有一个《共同纲领》，一九五四年，又在《共同纲领》的基础上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这是根本大法。另外还有一些法律。我们现在的法律是不是完备呢？应该说是不完备的。为什么我们还没有完备的法律呢？因为法律不可能一下子完备起来，只能随着革命事业的发展逐步完备起来。没有法律或法律不完备是不是就不能办事呢？当然不是这样，像我在上面说过的，过去我们依靠群众运动做了许多事情，取得很大的成绩。群众运动是个法宝，是创造法的。但不能经常搞运动，因为震动太大，八级以上的风，刮一阵是自然现象，经常刮就受不了，把树吹倒了，人不能出门，经常刮是不行的。情况变了，我们的工作方法也要随之改变。

在近代国家里，只有国家立法机关有权制定法律，其他机关只可以发布决议、命令。从广义来说，法令、命令、

决议也是法律一类的东西。另外，我们通常说依据党和国家的政策办事，这里所指的政策也起着法律的作用。我们已经有了宪法和其他一些法律，但是，有些必要的法律，如刑法、民法、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人民政府组织法等，现在还没有，要依靠我们在工作中创造和积累经验去制定。从历史上来看，任何法的制定，都是要经过相当长的时间的。我国保留下来的古代的成文法，较完备的首先要算唐律，叫永徽律，这个法律是经过唐朝高祖、太宗、高宗三个朝代历时三四十年的时间才制定出来的。苏联十月革命后，那是一个新的情况，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全苏联的刑法到现在还没有。他们好的地方是十月革命后，马上公布了一个刑事指导大纲，有一二十条。我们在这方面有单行法，如镇反条例、惩治贪污条例。但没有刑法指导大纲。我们并不是没有在这方面做工作，在宪法公布前，法制局草拟了一个刑法指导大纲的草稿，以后经各方面努力，搞成一个初稿，还不能作为一个草案。所以创立法律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有人问，究竟什么叫做法制？现在世界上对于法制的定义，还没有统一的确切的解释。我们望文思义，国家的法律和制度，就是法制。什么叫制度，制度就是在一个国家里面，不仅国家而且社会的组织，大家都要遵守的一定的秩序。制度有的是成文的，有的是不成文的。譬如我们军队，从红军、八路军到现在的人民解放军，都规定有一定的制度，否则就成为乌合之众，无法打仗了。中国共产党的党纲、党章，也就是党的活动的准则和制度。法制

这个东西，是人制定的，不是天生的。你们看，宪法不是我们制定的吗？国家是统治阶级的工具，法是统治阶级的意志。现在中国是人民占统治地位，对帝国主义分子、封建地主、官僚资本家实行专政。过去是他们统治人民，人民受他们的压迫剥削，他们的法律，都是不利于人民的。我们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工农联盟为基础组成的国家。我们的意志，就是工人阶级为领导、工农联盟为基础，团结一切赞成、拥护社会主义的阶级、阶层和其他爱国民主人士，来建设社会主义。这在我们的宪法中大家都可以看到。

我们的法制体现了我们国家最大多数人的意志。法制有什么作用？没有它行不行？上面说过没有它是不行的。中国二千多年以前有位大贤，叫孟轲，他曾说过：“上无揆道也，下无法守也，朝不信道，工不信度，君子犯义，小人犯刑，国之所存者，幸也。”又说：“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这个道理对不对？我看很有道理。人类从进入文明社会以后，说到文明，法制要算一项，虽不是唯一的一项，但也是主要的一项。简单地说，国家没有法制，就不能成为一个国家。法制不一定要有成文，无成文法也可以。有些国家到现在还没有成文宪法，但不是没有法制。当然，有了成文法法制更完备。是不是有了成文法就说明那个国家的文明就高一点呢？这倒不一定。

我在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发言中提到，目前我们法律工作方面的问题，一个是法律不完备，一个是有法不遵守。这两者哪一种现象较严重呢？应当说有法不

守的现象比较严重。为什么说有了法就要守呢？我上面说过，法是统治阶级的意志，我们立法是表达了我们的意志。我们自己制订的法律，自己不守，怎么叫别人守呢？现在不守法、不依法办事的是社会上一般公民多呢？还是国家机关干部多？我看是机关干部较多。在国家机关工作的人如果不守法，问题就更加严重。有法不依，法就是空的东西，起不了作用。中国历史上有个商鞅变法的故事，商鞅从卫国到了秦国，在都城的南门口放了一根三丈长的木杆子，说谁如果把这木杆子从南门移到北门去，就赏以十两金子。人们听了很奇怪，不知他是什么意思，不敢去移动。他又说，谁能移去，就赏五十两金子。后来果真有一个人把木杆子从南门移到北门去了，他真的赏了五十两金子。这个故事说明什么呢？他的意思表示说了就算数，赏罚严明。有法不依就等于无法。没有法，做事情很不便。有了法，如果不去了解法律条文的精神实质，在处理案件的时候又不去深入地研究案件的具体情况，只是机械地搬用条文，也是不能把事情办好的。在依法办事的时候，还要注意防止形式主义。司法活动要具备一定的形式。世界上任何实质的东西，没有不以一定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大至山和海，山有山的形式，海有海的形式；小至原子、电子，都有它一定的形式。形式主义与形式是两回事。所谓形式主义，就是不问实质，只讲形式，不管条件如何，硬要来搬弄一套形式。官僚主义者也会把依法办事当成挡箭牌，借口说这也不合法，那也不合法，不给老百姓真正解决问题。依法办事有许多好处，但

是，如果思想不对头，做得不得法，也可能犯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错误，这是值得引起我们注意的。

上面是讲的国家、法制、法制的作用、依法办事等等。现在来讲讲人民解放军的法制问题。

过去在军队中没有单独设立惩罚机关，违反纪律由政治部处理。有时是开个会批评一下，顶多是坐禁闭。这种作法解决简单的问题是可以的。现在部队正规化了，如果不按照法制的要求单独建立惩罚机关就不行了。因此，部队里要设置军事法院，它的作用在于巩固人民解放军。当然，要使我们的部队更加巩固，主要是依靠政治工作的说服教育和全体指战员政治觉悟程度的提高，但有了惩罚机关，效果会更好。几百万人的部队，不发生问题是不可想象的。发生了问题，如果没有惩罚机关来处理，也是不行的，因为有些问题是不能单靠说服教育来解决的。要巩固人民的武装力量，就要巩固纪律，巩固已经公布的一些条例、决议、法令，保证它们的贯彻执行。有了法律，没有惩罚机关保证执行是不能设想的。

我们人民解放军是从人民中间产生的，和人民的关系很好，但有没有个别的与群众关系不好的呢？还是有的。有了惩罚机关以后，当然不能根绝这个别现象，但可以保证少犯或不犯。彭德怀同志和谭政同志在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上讲过，我们的官兵关系依靠民主生活，违犯纪律要说服教育，但是说而不服，最后仍要惩罚。因此，为了巩固人民解放军的纪律，军事审判机关也要按照宪法和人民法院组织法的规定进行审判活动。法院是唯一的



审判机关，别的机关不能审判。为什么呢？因为国家的审判权没给他们，只给了法院。有审判权的机关是特定的机关，国家任命一些人代表国家进行审判。别的机关不能作判决，因之法院和别的机关处理问题不一样。法院主要的工作就是审判活动。

顺便讲一讲，许多法院工作人员还不十分了解审判工作的重要，也不了解法院工作主要是搞审判。我曾经对一些人讲过，法院主要是搞好审判。公开审判是审判活动的重心。什么叫公开审判呢？有人把公开审判理解为公审大会。公审大会是审判过程中可以采用的一种形式，但不是法定的形式。法律规定的形式是公开审判，开庭要公开，准许旁听，要传唤当事人到庭，事先要把案情通知当事人，让他准备公开的辩论。就刑事案件来说，被告人有的逮捕，有的不逮捕，先要经过预审。预审和公开开庭不同，预审不是公开审判。预审庭主要是解决犯罪事实是否已经弄清楚，证人提的证据是否充分，是否传唤证人到庭，等等。对于决定交付审判的案件，法院就要通知当事人，并在法院门前贴出公告，说明本院于某月某日审判某某一案，可以旁听。旁听不像看马戏一样，开庭有开庭的规矩，如果不经过一定的程序，就把案子判了，那么这个判决就是违法的。法院的工作是审判，而审判工作的重心就是公开审判。军事法院的案件与一般法院有所不同，它常常涉及国家机密，法律规定不公开审判的案件当然不公开，但依法应该公开审判的案件，必须公开审判。审判机关的工作不是以惩罚为目的，应与教育工作

相辅而行，惩罚是作为教育工作的最后的一个手段。同时，通过公开审判，可以进行法制宣传教育，使当事人知道犯了什么罪，为什么犯罪，使旁听的人深刻认识犯罪行为的危险性，从而警觉起来，预防犯罪。法院有责任教育人民遵守法律，这就要多吃一些法制宣传工作，可以结合部队首长的讲话进行宣传教育工作。法制宣传工作要结合具体事例，就更生动，更富有教育意义。有许多事情在平时不算犯罪，可以处理得轻一些，而在战时就算犯罪，处理得就可能重一些。也有些事情在地方上可能处理得轻一些，在军队里就可能处理得重一些。因为有些犯罪在军队里危害更大。当然不是说任何犯罪在军队里都要从重处理。军队里面需要法制，法制的作用在于巩固军队纪律。军队中的审判机关(法院)是惩罚机关，惩罚机关必须与教育机关(政治部)互相配合起来做工作。在公开审判的同时，可以配合进行法律的宣传教育。

在会议讨论中，大家普遍提到我们过去审判工作质量不高的问题。这个毛病不仅在军事审判机关有，普通法院也同样存在。要提高审判工作质量，主要的是提高审判人员的政治思想水平。审判工作质量不高，有好几方面的原因，政治方面、思想方面和业务方面，主要应该从政治和思想两方面来解决。当然这并不否认业务的重要性。

大家已经听到过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主要讲的是怎样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主席教导我们，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是性质完全不同的

两种矛盾，处理这两种矛盾，要用不同的方法。过去，我们在肃反斗争中，个别搞错了的是有的，把人民内部矛盾当作敌我矛盾来处理，这就是政治思想不高的缘故。错案不能光按百分数计算，因为错案虽然只占法院全部案件的百分之几，但是对每一个被冤枉的当事人来说，则是百分之百的错了。判错了案就是对敌我关系和是非关系没闹清楚，就是政治问题。

怎样提高我们的思想呢？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有很要紧的几句话，值得我们很好的领会。他说：一切问题都要想到我们是一个六亿人口的大国，不要自己想什么样子就是什么样子，要想到六亿人中间有各式各样的想法，所以对事情不要凭自己主观猜想，认为大概是这个样子吧！必须把客观情况了解清楚，然后加以分析、研究。我们要学会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来分析问题。纵然是很复杂的问题，经过正确的分析，也总会分清敌我与是非关系的。对反革命要镇压，如果是人民内部的是非问题，就不能用这种办法。对人民群众的意见，要采取各种办法使他们能够表达出来。我们可以采取各种办法征求大家的意见，总不要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不管怎样，总要给群众表达意见的机会。我们认真考虑群众的意见，哪些做得通，哪些做不通，做得到的事情就要做，做不到的事情要向群众说清楚，只要做到这一点，问题总是可以获得解决的。

我们目前在业务方面的困难是没有现成的刑法、军法。但是，有了刑法、军法，是不是就不会犯错误了呢？彭

真同志在第三届全国司法工作会议上讲过“事实是根据，法律是准绳”，对事实要分析，要用脑筋。不然，有了法也依然要犯错误。当然有了法更好些，更便利我们作为准绳。拿判刑的畸轻畸重来说，与我们没有刑法是有关系的，在这方面不能过多地责备同志们。但在同一个法院里，处理情节相似的两个案子，一个判十年，一个判三个月，这样畸轻畸重是不能一般地以没有法律根据来推脱的。总结审判经验是一项很好的方法，我们总结的审判经验可作为考虑问题的尺寸。所以，要提高审判质量，就要把总结审判经验和经常的业务学习重视起来。对于已经公布的法律、法令、条例要很好地阅读，正确地应用。总之，提高审判质量，要从政治、思想、业务这三个方面努力。

审判工作不仅是惩罚，也有教育作用。审判工作人员要把法制宣传教育工作担负起来。要宣传教育别人，首先自己应该是遵守法纪的模范。党决定还要搞一次整风运动，这次不是疾风暴雨，而是和风细雨。在我们目前的审判工作中，要反对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思想上的主观主义在司法工作中的反映，常常表现在办案中对待被告人总要差一点。至少认为“你是被告，怎能无罪”。有的审判人员往往注意对被告不利的方面，不注意对被告人有利的方面，甚至删改供词。再就“坏人”这个名词讲一下，这不是法律上的名词。有人说坏人犯罪，我看坏人不一定都犯罪，当然坏人犯罪比较多。好人有时也会犯罪的。好心好意，动机也好，但在某件事上办坏了。我们

不能以好人坏人判罪，主要是看事情的结果。“欲加以罪，何患无辞”，我们不能采取这种方法。“坏人”“坏事”是社会上流行的名词，不是法律科学上的名词，不能有“这个人是坏人，整他一下子”的想法。对被告不利的东西留下来，有利的东西排除掉，这是不全面的。这种想法和作法都是不正确的，都会出错的。如果我们把这些错误的思想反掉了，我们的审判工作就能够大大提高一步。

党的领导问题。党是我们国家的领导核心，我们一切工作都是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的。但党的领导不是每个具体案件都要党委管，如果这样，那还设法院这些机构干什么。党是依靠机关里的党组来领导。整个工作的原则、方针、政策，那是党委应该考虑的，法院如何把政策应用到具体工作中去，那就应该向党委请示，请党委考虑。对党的领导有丝毫动摇都是不好的。

惩罚机关在司法系统中还有公安机关（公安工作不完全是司法工作）。检察、法院、公安机关是分工负责，互相制约，共同对敌。检察院是监督机关，不管哪一机关犯了法，它都可以提出来。公安机关维持社会秩序，它特别注意同反革命作斗争。公安机关捕人，要经检察院批准，没经批准就逮捕人，是违法的。检察院本身没有判决权，人逮捕起来以后（有些轻微的刑事案件，也可以不捕人），就要侦查，如果认为应该判刑，就向法院起诉。判刑或不判刑是法院的职权。法院在审判过程中如果认为需要捕人时也可以捕人。法院审判不合法，检察院可以抗议；公安部门发现法院判错了，可以经过检察院来抗议。这叫

做分工负责、互相制约。

关于院长、审判委员会、合议庭的相互关系。按照人民法院组织法，审判委员会的任务是总结审判经验，讨论重大的或者疑难的案件和其他有关审判工作的问题。审判委员会讨论重大、疑难的案件，从最高人民法院来看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由合议庭审查了案情，认为是重大、疑难的案件，经审判庭再经院长，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另一种是院长发现本院判决的案件在认定事实或适用法律上有错误，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究竟哪些人组成审判委员会呢？这在法律上没有规定。根据我们的经验，审判委员会由法院院长、副院长、庭长、副庭长和审判员等人组成。书记员不能成为审判委员会的成员。按照人民法院组织法的规定，检察长有权列席法院的审判委员会。

审判委员会与合议庭的关系。我们最近听到有的人说，审判委员会的决定，合议庭可以不执行。合议庭是审判庭下面的一个组织，它是以特定的案子临时组成的，而且合议庭的重大、疑难案件要经过审判庭提交院长，再由院长提交审判委员会的，所以，合议庭对抗审判委员会是不合理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的经验是这样的：承办案件的审判员可以参加审判委员会陈述意见，审判委员会有责任听取他们的意见。虽然承办审判员不一定是审判委员会的委员，但他有发言权，只是没有表决权。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开会的时候，一般不采取少数服从多数的表决方式，如果有了不同意见，我们是慎重的，让大家再考虑。当合议庭的审判员已经在审判委

员会上陈述了自己的意见，审判委员会已经就某一案件或某一问题作出了决议，这时候合议庭就不能对抗审判委员会的决议。如果审判委员会讨论后，合议庭又发现了新问题，合议庭可以报告院长，院长再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而不是对抗审判委员会。合议庭认为不是重大、疑难的案件，可以不提交审判委员会，自己决定了也就算了，如果有错误，院长可以提出纠正。这个问题，大家应该有清楚的认识。

制约审判工作有几个方法：一是公开审判，辩护人出庭辩护，检察长出庭支持公诉；二是当事人对第一审判决不服提起上诉；三是检察长提起抗议；对于已经发生法律效力判决，如果发现错误，本法院院长、上级法院、检察院都有监督权。党委如果发现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确有错误，可以提交检察院或法院院长依法纠正。这不是党的规定，是我个人的意见。中央要开会讨论司法工作，我准备建议中央讨论这个问题。作为司法工作人员，不能因独立审判对党闹独立，一切方针、政策都需要党的领导，要向党请示报告，请示党检查工作。

关于处理申诉问题。处理申诉案件，是法院与群众密切联系的形式之一，是实行审判监督的重要方法之一，应该认真做好。现在你们有许多的申诉案件没有处理，希望你们领导上下个决心，想办法清理一下。首先要分类排队，分别轻重缓急处理，大概也不困难。不过要和同志们说清楚，原来判决错误的就要改，并且从中接受经验教训，来改进我们的工作，不要在这一问题上追究责任。

对被告人是劳动人民的申诉要首先清理，对监管中的疾病老弱犯人也要尽快清理。有错误的就要改，该放的要放，当然不能轻纵。这是一项很重要的工作，必须以既严肃又慎重的态度把它做好。

根据《董必武选集》刊印



# 中共中央关于处理 罢工、罢课问题的指示

(一九五七年三月二十五日)

(一)在最近半年内,工人罢工、学生罢课、群众性的游行请愿和其他类似事件,比以前有了显著的增加。全国各地,大大小小,大约共有一万多工人罢工,一万多学生罢课。这种现象值得我们严重地注意。这类事件在最近时期发生得比过去为多,有一些临时性的原因,但是这种现象决不应该认为只是暂时的。从根本上说来,在人民推翻了共同敌人,消灭了剥削制度以后,我国人民已经形成了新的伟大的团结。党和人民政府同人民群众之间,整个地说来,存在着广泛的密切的联系。人民群众从党和人民政府的政策和各项建树中,认识到党和人民政府是人民利益的代表者,是人民群众前进的向导。人民群众和领导者的根本的利害关系是一致的,因此,在正常情况下,人民群众一般是拥护他们的领导者的。但是这不是说人民群众和他们的领导者之间没有矛盾。必须了解,社会主义社会虽然消灭了过去的矛盾,但是它本身又包含着新的矛盾。由于国内的敌我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人民群众和他们的领导者之间的矛盾,就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显露出来了。人民群众是直接参加生产劳动(主要

是体力劳动)而一般地难于直接行使管理权力的,他们容易着重于从当时当地的局部情况去观察问题,容易重视目前利益和局部利益,而比较难于了解建设中的困难;人民群众的领导者直接行使管理权力而一般地难于参加体力劳动,他们一般地比较能够看到长远利益和整体利益,而比较容易疏忽各部分人民群众的具体情况 and 切身要求。这两部分人之间是必然有矛盾的,但是这种矛盾是根本一致中的矛盾。人民群众的领导者愈是注意联系群众,保持和发扬实事求是的群众路线作风,随时发现和解决人民群众中的问题,这种矛盾就愈小;如果脱离群众,染上官僚主义的习气,不解决或者不正确地解决人民群众中的问题,这种矛盾就愈大。但是从根本的性质说来,人民群众和他们的领导者之间的矛盾,属于人民内部的非对抗性的矛盾,而不属于敌我之间的对抗性的矛盾。经验证明,人民内部的矛盾一般地都可以和应该在民主集中制的范围内,用“团结——批评——团结”的方式解决,也就是说,应当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因此,一般地说,为了解决人民内部的矛盾,不需要采取罢工罢课游行请愿一类的方式,采取这种方式,一般地是不符合于人民利益的。因此,我们不但不提倡这类事件,而且应该力求防止这类事件。事实上,凡是我们的工作作得较好、对群众的联系较好、群众的觉悟较高的地方,这类事件就很少发生。这类事件的发生,首先是由于我们的工作没有作好,特别是由于领导者的官僚主义。在某些特殊情形下,如果领导者的

官僚主义极端严重，群众几乎没有任何民主权利，因而无法通过“团结——批评——团结”的正常方式解决问题，那么，群众采取罢工罢课游行请愿等类非常方式就会成为不可避免的，甚至是必要的。党对于这种现象，必须从全面的认识出发，采取正确的方针和办法。从最近情况看来，不少地方和部门对待这类事件的方针和办法基本上是正确的，但是也有许多地方和部门的领导者对待这类事件的方针和办法却是错误的。他们不了解或者不愿意承认官僚主义和工作中的错误是造成这些事件的主要原因，而且往往混淆了两种性质不同的矛盾，用类似处理敌我矛盾的方法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以至造成了一些不好的结果。为了从根本上避免这类事件的发生，而在发生事件后避免采取错误的方针和办法，中央认为，在这个问题上，有引起全党注意和统一全党认识的必要。

(二)为了防止罢工罢课一类事件的发生，根本办法是随时注意调整社会主义社会内部关系中存在的问题，首先是克服官僚主义，扩大民主。

为了使人民内部矛盾能够通过“团结——批评——团结”的正常方式得到解决，必须及时地了解 and 正确地处理群众对领导的意见和要求。官僚主义的领导者不但不注意去了解群众的意见和要求，而且在群众向他们提出意见和要求之后，也是拖延敷衍，不去积极解决那些必须解决和可能解决的问题，甚至采取欺骗办法和压迫办法。这种官僚主义现象必须坚决克服。克服官僚主义需要加强由上而下的领导，同时需要动员群众的力量，实行由下

而上的监督。在工厂和学校中扩大民主，是依靠群众克服官僚主义的有效的步骤。

在工厂方面，应该在实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的同时，实行和加强党委领导下的群众监督。党委应该领导工会、青年团积极反映群众的意见和要求，并且领导和督促工厂行政部门正确地、迅速地处理和给群众以答复。各地应该在企业中积极试行常任的职工代表大会制度，作为群众参加企业管理和监督行政的权力机关。它的职权大致可以初步拟定如下：

(1) 听取和讨论厂长的工作报告，审查和讨论企业的生产计划、财务计划、技术计划、劳动工资计划和实现这些计划的重要措施，定期地检查计划执行情况，并且提出建议。

(2) 审查和讨论企业奖励基金、福利费、医药费、劳动保护拨款、工会经费以及其他有关职工生活福利的经费开支；在不违反上级机关的指示、命令的条件下，可以就上述范围作出决议，交企业行政部门或者其他有关方面执行。

(3) 在必要的时候，向上级管理机关建议撤换某些企业领导人员。

(4) 对上级管理机关的规定有不同意见的时候，可以向上级管理机关提出建议。但是如果上级管理机关经过研究仍旧坚持原有决定的时候，就必须贯彻执行。

党委必须正确地处理国家、人民的整体和长远利益同本单位群众的局部和暂时利益的关系，应该正确地表

现职工群众的意志，又要力求使它不致作出错误的、不能执行的决议。如果职工代表大会作出的决议是错误的、不能执行的，应该由上级领导机关采取适当的方法加以纠正。

在学校方面，虽然不能由学生会和学生代表大会执行监督的任务，但是学生会、教职员工会、青年团组织和党的支部会议都应该能够充分地自由地对学校工作提意见。在有民主党派的学校，应该尽量吸收他们参与学校的管理工作，并且注意随时征求他们关于改进校务的意见。为使听取群众意见的方式成为固定的制度，各学校可以在每学期指定一定的时间专门让学生和教职员提意见。对于群众所提的意见，学校行政当局和党委应该迅速加以讨论，迅速给予答复。凡是应作而又可能作的，应该接受执行；凡是不应作和不能作的，应该向群众公开解释，不要随便许愿；凡是自己不能解决的，应该向上级报告请示。

上级组织在调查工厂学校情况的时候，除了听取行政当局和党委的意见以外，必须注意听取职工、教师 and 学生的意见。职工和学生为了促进问题的解决，推派小型的代表团到任何上级组织去请愿，或者向上级组织派来的人员请愿，应该认为是完全合法、完全正常的行动，不得作为“闹事”看待。

(三)为了防止罢工罢课一类事件的发生，除了扩大民主以外，还必须加强群众中的思想政治教育。这也是反官僚主义的任务之一。思想政治教育近年受到忽视，

这种情况必须加以改变。不少官僚主义的领导者在工作中不努力提高群众的政治觉悟，不作群众工作，不了解群众的情况和情绪，单纯依赖行政力量的强制和物质利益的刺激。我们必须彻底地批判和纠正这种官僚主义态度，切实加强在群众中的思想政治工作，密切地注视群众的思想动态，认真解决群众中的思想问题。

由于我们在工人群众中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薄弱，而工人队伍又增长很快，一部分工人忽视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倾向有了发展。在学生和知识分子中，埋头业务不问政治、斤斤计较个人生活地位和其他不正确的倾向也逐渐抬头。应该针对这种情况对群众进行教育，使群众深刻了解我们的工作和学习都是为了一个崇高的目的——建设社会主义和准备实现共产主义，而为了达到这个远大的目的，就必须经过一个艰苦奋斗的过程。应该通过生动的事实教育群众，使群众觉悟到我们现在的生活比过去一般地说来已有相当大的改善。但是由于我国长期落后，不可能在短期间把一切问题都解决，只有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求得解决。本单位的领导人员和高级机关的领导人员都必须经常向群众作报告，同群众谈话，讲解为群众所关心的当前问题。在这些讲话中，必须采取老实态度，对群众说真话，不要夸大事情的有利方面而隐瞒事情的不利方面。不要随便许愿，使群众在诺言不能兑现时感觉失望受骗。应该把困难的情况、原因、性质和解决办法告诉群众，领导和动员他们共同克服困难，使他们对困难有准备，对前途有信心。应该使群众了

解，我国目前还处在由落后的农业国逐步变为先进的工业国的过渡时期，国家财力有限，干部经验有限，生活中的许多困难和建设工作中的许多错误缺点是不可避免的。如果认为在全国解放后的短短几年内，什么事情就都可以做得十全十美，社会 and 个人的各种需要就都可以完全满足，这纯粹是一种没有根据的幻想。而且就是在社会主义社会建成以后，生活也仍然会有困难，工作也仍然会有缺点，人民内部也仍然会有矛盾。但是这种困难和缺点本质上不同于剥削制度，它们是完全能够在社会主义基础上克服的，人民内部矛盾本质上不同于敌我矛盾，也应该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为了便于教育和动员群众，为了加强同群众的团结，领导人员必须认真注意同群众同甘共苦，在艰苦奋斗方面起模范作用。

经验证明，尽管很多工厂和学校的条件都有困难，工作都有缺点，但是只要领导人员注意发扬民主，注意及时解决群众中的迫切问题，注意思想政治工作，这些地方的群众的意见就比较少，闹事的现象就更少。由此可见，绝大多数群众是信任和拥护党和人民政府的，他们是愿意为了将来的理想而忍受暂时的困难的。如果各个单位认真克服官僚主义，扩大民主，加强教育，我们就一定能够避免罢工罢课等类事件的发生，我们同群众的联系就一定可以不断地巩固起来。

(四)但是如前所说，在全国的领导人员中，不愿意接受教训改变作风的官僚主义分子总是有的。他们既不联系群众，又不给群众以享受民主权利、按照正常方式提出

批评建议的机会；群众中有了问题，他们既不解决，又不解释，甚至采取种种错误办法对待群众。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就会把群众逼到非闹事不可的地步。因此，就全国范围说来，少数的罢工罢课和群众性的游行请愿一类事件的发生还是完全可能的。在发生这类事件的时候，党的方针应该是：（1）允许群众这样作，而不是禁止群众这样作。因为第一，群众这样作并不违反宪法，没有理由加以禁止；第二，用禁止的办法不能解决问题；第三，有些理由不充足、有违法行为的群众闹事，固然是坏事，同时也是好事，因为党可以利用闹事的过程教育干部，克服官僚主义，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并且帮助群众分清是非，提高觉悟，从而使人民内部矛盾得到一种调节。如果群众中有坏分子从中煽动，也可以使这种坏分子在斗争中暴露和孤立。至于理由充足、没有违法行为的那些群众罢工罢课游行请愿，从根本上说来，则不是坏事，而是好事。（2）因此，群众既然要闹，就应该让他们闹够，不要强迫中止，以便使群众在闹事的过程中受到充分的教育，作为补偿平时思想政治教育缺乏的一种手段。但是必须劝告群众不可采取违法行动（如打人、关人、破坏公共财物等）。如果发生违法行为，应该采取适当方法加以制止，防止扩大。但是除非发生重大破坏行动或者其他严重违反刑法的行为，不得捕人，不得以军警包围或者以其他方法使用暴力。（3）对群众在事件中提出的要求，应该同群众按正常方式提出的要求同样对待，即是接受其中正确的可行的部分，对目前作不到的要求进行解释，对不



正确的要求加以批判。既不要因为群众闹事就不承认他们的合理要求，使闹事的原因继续存在；也不要因为群众压力就接受不应该接受和不能实现的东西，或者使闹事者特别占了便宜，给他们以别人在同等条件下所不能得到的待遇。对行为极端恶劣、引起公愤的官僚主义分子，应该给予应得的惩戒。（4）在事件平息以后，应该认真地对干部和群众进行教育，一面健全民主生活，一面提高群众觉悟，以达在新的基础上增强人民内部团结的目的。凡是犯了错误的都应该指出他们的错误，使他们得到教训。但是一般地不要挫伤广大群众的情绪，也不要挫伤好干部的情绪。对于闹事群众中的领导分子，如果行动合理合法，当然不应该加以歧视，即使犯有严重错误，一般也不应该采取开除办法，而应该将他们留下，在工作和学习中教育他们。对于抱着恶意煽动群众反对人民政府的坏分子，应该加以揭露，使群众彻底认识他们的面目。对这些分子中犯了严重错误的人应该给以适当的处罚，但是不应该开除他们，而应该不怕麻烦地教育他们，帮助他们改正错误。至于确实查明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和严重违犯刑法的凶犯，则应该分别情况，依法办理。

在群众闹事的问题上，党委和党员应该遵守以下原则：（1）无论行政负责人是否党员，党委对于行政方面的意见都应该用正常的方法提出，并且应该向群众宣传按照民主集中制和“团结——批评——团结”的方式提出和解决问题。党委和党员个人都不允许主动地领导群众用闹事的办法反对行政当局。（2）在群众已经非闹事不可

的时候，党委应该指定一部分党员甚至全体党员参加，以便掌握领导，联系群众和教育群众，不使群众被坏分子引向错误道路。党员应该积极支持群众的真正合理的要求，而不要为官僚主义分子的恶行和上级的错误措施辩护。但是党员不应该提出无理的要求。如果群众中有人提出无理要求和反动口号，应该加以批评和驳斥。（3）党员在群众闹事的过程中，必须遵守党的组织原则，随时向党的领导机关报告请示，按照领导机关的指示行动。如果违犯纪律，应该分别情况，慎重处理。一般地着重教育，除情况特别严重者外，不要轻易开除他们的党籍。以上原则也适用于团委和团员，但是对于团员错误的处理要更加从宽。

（五）各级党委，特别是省、市和自治区一级的第一书记，对于了解工厂、学校以及报纸、刊物的思想政治动向，加强思想政治工作，解决这些方面的具体问题等项任务，应该立即抓起来，并且教会地委、县委两级和城市区级第一书记抓起这些工作。不应该只委托宣传部长、文教部长、教育和文化厅、局长这些同志去做而自己不去管它们。

（六）为了总结经验，取得教训，各地应该将最近时期所发生的各种罢工罢课游行请愿等事件的起因、经过和处理情况写成材料，加上评论，发给干部阅读讨论并报告中央。

根据中共中央文件刊印

# 在社会主义建设中， 活一点有好处\*

(一九五七年四月六日、十二日)

周 恩 来

—

大煤矿，国家开办；小的，合作社、私人可以开。由陈郁搞个具体办法，把过去的规定改一下，这样有好处。

主流是社会主义，小的给些自由，这样可以帮助社会主义的发展。工业、农业、手工业都可以采取这个办法。我看除了铁路不好办外，其他的都可以采取这个办法。如三轮车、摊贩等都可以采取自负盈亏的办法。加入合作社的占总数的百分之九十六，其余的个体就让他个体。有些私人办的小学，也可以让它办下去。大概工、农、商、学、兵除了兵以外，每一行都可以来一点自由，搞一点私营的。文化也可以搞一点私营的。这样才好百家争鸣嘛！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搞一点私营的，活一点有好处。

---

\* 这是周恩来在国务院全体会议第四十四次和第四十六次会议上讲话的节录。

## 二

盐场封闭问题，由食品部〔1〕狄景襄同志负责研究一下。小盐场让其开放，应该马上开放，可以搞个类似小煤窑的办法，不要因噎废食。一切东西都靠国家生产不行，各方面都应该有百分之几的自由活动，太死了不行。不仅商业方面如此，工业方面也可以如此。资本主义复活不了。

根据《周恩来经济文选》刊印

### 注 释

〔1〕 食品部，即食品工业部。一九四九年十月设立，一九五一年一月撤销。一九五六年五月重设，一九五八年二月再次撤销。

# 中共中央关于研究有关 工人阶级的几个重要问题的通知

(一九五七年四月七日)

各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中央各部委，国务院各委、各办、各部党组，全国总工会和全国妇联党组，青年团中央：

如何调动工人阶级的积极性，充分发挥工人阶级在国家政治经济生活中的积极作用，是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个极关重要的问题。几年来，全党根据一九四九年七届二中全会指示的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恢复和发展生产事业的方针，在各方面都作了许多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和丰富的经验。但是，必须指出，领导经济建设工作，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新的工作，现在还处在摸索前进的过程中，因而在许多方面，例如在工业管理、工人生活、工人教育的政策、制度和做法方面，以及党、工会、青年团的工作方面等，都还存在着不少的缺点和问题。最近各地连续发生的一些工人罢工、怠工等事件，表明我们的国家机关和企业、事业单位的领导上存在着严重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的作风；同时又表明我们在职工群众中的思想政治工作薄弱，更没有随着工人阶级队伍的迅速壮大，新工人成分大大增加的情况而加强起来，因而各

种非工人阶级的思想意识就逐渐明显地暴露出来，并且有逐渐滋长的趋势。如果我们满足于已有的成绩，不重视各方面工作中的缺点，让这些缺点继续发展下去，就会障碍工人阶级积极性的发扬，而且还可能造成党和国家逐渐脱离工人群众的严重危险。为了总结几年来的工作经验，克服各方面存在的缺点，进一步发扬广大职工群众的积极性，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的艰巨任务，中央准备在今年内召开的中央会议上，对有关工人阶级的下列几个方面的问题加以讨论：

（一）关于职工群众参加企业管理问题。实行党的第八次大会所决定的党委集体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和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就必须扩大企业管理工作中的民主，扩大职工群众参加企业管理的权利，发挥职工群众对于企业行政的监督作用。因此，应当结合企业的实际情况和最近几年来的经验，规定适当的制度和组织形式，扩大企业管理方面的民主，保证职工群众能够切实参加企业管理和对行政工作实行有力的监督，以使工人群众不仅通过本阶级的政党和自己的代表实现对整个国家的领导，而且通过他们参加企业管理和自下而上的对企业的监督，体现工人阶级国家主人翁的地位和作用，充分发挥社会主义企业的优越性。

根据企业中的情况和几年来工作的经验，目前在这一方面比较容易实行的有效措施，就是把企业中现行的由工会主持的职工代表会议改为职工代表大会（在较小企业中为全体职工大会），并且适当地扩大它的权力。这

些权力大致可以初步拟定如下：

(1) 听取和审查厂长的工作报告，审查和讨论企业的生产计划、财务计划、技术计划和劳动工资计划及实现这些计划的重要措施，定期检查计划执行情况，并且可以提出建议。

(2) 讨论和审查企业奖励基金、福利费、医药费、劳动保护拨款、工会经费以及其他有关职工生活福利的经费开支；在不违背上级机关的指示、命令的条件下，可以做出决议，交企业行政或者其他有关方面执行。

(3) 在必要的时候，向上级管理机关建议撤换某些企业行政领导人员。

(4) 对上级管理机关的规定有不同意见的时候，可以向上级管理机关提出建议。但是如果上级管理机关经过研究仍旧坚持原有决定的时候，就必须贯彻执行。

职工代表大会采取常任代表制，代表向选举他们的职工负责，职工群众有权随时撤换不称职的代表。工会委员会应当负责准备和召开职工代表大会并且监督行政对职工代表大会有关生产行政工作决议的执行。但是，生产管理的指挥，必须由行政领导者负完全责任，职工代表大会和工会委员会在自己的工作中，不要妨害厂长在企业行政上的负责制，所有职工必须遵守企业规章和劳动纪律，服从行政领导者的命令和指挥。至于工会委员会在这一方面的职责范围应当如何规定，工会本身的民主应当如何扩大，工会工作应当如何改进，工会负责干部应当如何调整和加强，才能负起这样的责任，以及党委在

企业中建立这样的组织以后应当如何改变领导方法等都是需要仔细研究解决的问题。

有些同志不赞成职工代表大会由工会主持，主张由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企业管理委员会，执行参加企业管理和监督的权力。这种办法的好处是可以避免工会与行政混淆，减少工会工作的困难；这种办法的缺点是可能使企业中发生机构重迭、会议繁多和工会执委会同企业管理委员会职责不清的现象。对于这种办法，如果各地认为有必要的时候，也可选择几个企业试行，以便总结经验，加以比较，作出最后决定。

同时，为了使职工代表大会成为企业中真正具有一定权力的机关，必须适当扩大企业的权力，因而也就必须联系研究如何适当地改变国家管理工业的体制，特别是有关工业企业的财务体制、计划体制和组织体制。在研究这些问题的时候，要注意把中央和地方之间、国家和企业之间、企业和职工之间的利益正确地结合起来，把国家的统一性和企业的相对独立性正确地结合起来，以便进一步发挥职工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和企业的主动性。

此外，关于如何进一步吸引职工群众参加国家政治经济生活问题，特别是参加对国家经济管理机关的监督及城市政权工作问题，也请你们联系加以考虑。

(二)关于职工生活问题。这方面最根本的问题就是如何正确地实现“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改善工人生活”的原则，如何正确解决职工生活水平与全体人民特别是农民生活水平的关系，如何使工人阶级整体利益与职



工的个人利益、工人阶级的长远利益与当前利益正确的结合起来。几年来在这方面的工作中有不少经验和教训,需要从思想上、政策上、制度和作风上进行认真的检查,对于那些正确的好的经验应当加以肯定和推广。对于那些错误的违反上述原则的东西则必须加以纠正,并且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提出对有关职工生活各方面问题的政策、制度和办法以及如何调整和改进的意见。目前显得特别重要需要根据轻重缓急分别加以研究和逐步解决的问题,有工资、奖励制度,职工住宅,日常生活福利(如生活必需品的供应、食堂、交通、困难户救济等),劳动就业,疾病医疗,改进劳动保险制度,改进劳动保护工作和有关工人生活的其他问题。

(三)关于工人阶级内部的团结和教育问题。最近几年来,工人阶级的队伍发展很快,新参加到工人队伍中来的,有农民、青年学生、转业军人、城市贫民,并且还有少数出身于资本家、地主和无业游民的分子。在一些新的工业城市和新建的企业中,工人队伍中这种新成分占着绝对的多数。由于工人阶级队伍组织的这种变化,经过长期生产锻炼和阶级斗争锻炼的老工人成分相对减少,新参加进来的成分又多半带有各种各样的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对工人阶级的政治觉悟、组织性、纪律性就不能不发生各种不良的影响。这种新的情况,尖锐地提出了必须加强对职工群众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任务。不仅要注意加强时事政策教育,而且要结合实际情况,进行系统的深入的共产主义教育,才能提高职工群众的主人

翁觉悟,发挥他们在企业工作中的积极作用。因此,对职工的政治、文化、业务、技术教育工作,应当进行全面的考虑和合理的安排,克服目前存在的片面强调文化教育,忽视思想政治教育的缺点,使思想政治教育得到经常的重视,以便达到把工人阶级队伍不仅在文化技术上武装起来,而且在政治上思想上武装起来的目的。

我们还必须清醒地认识,在工人阶级队伍这样迅速壮大,新的成分大量增加以后,关于工人阶级内部团结方面,除了原来存在的各种问题(如工人和技术人员,青年工人和老年工人,男工和女工,先进职工和落后职工等相互关系问题)以外,又带来了一系列的新的复杂问题。例如对新参加工人队伍的成分如何加强团结和改造工作的问题。在新工业基地中,调来了大批老工业城市的工人,如何搞好外地工人和本地工人之间的关系问题。在新建企业的工人队伍组成上,如何适当配备老工人骨干和如何尽可能吸收本地工人的问题。有些工业基地建立在少数民族地区,吸收了不少少数民族的职工,又产生了汉族工人与少数民族工人之间的关系问题。这些都是在我们工业化的过程中将会长期存在的问题,需要进行仔细的研究,采取正确的政策、妥善的措施,才能把工人阶级队伍紧密地团结起来。

此外,如何改进工农关系、增强工农团结的问题,也应当注意研究解决。

(四)关于企业中党、工会和青年团组织的工作问题,必须在总结已有经验的基础上,适应新的情况,在各方面

有所改进。这里最基本的是健全党委的领导，研究如何加强党的思想政治工作，贯彻执行群众路线，巩固党和群众的联系，提高党的领导作用。应该研究如何加强党委对于企业行政的领导，正确贯彻执行党的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相结合的原则，既要防止企业行政领导人员脱离党的集体领导的偏向，又要防止党委特别是书记包办代替企业行政工作的偏向；同时还要防止在职工代表大会建立以后，在企业管埋上发生极端民主化和实际无人负责的现象。应当研究党委如何正确地领导职工代表大会的活动，对于职工代表大会的议题，既不要事先作出硬性的决定，影响党员在会议中的主动性，或者助长党员的强迫命令的作风，以便使会议能够无拘束地表现职工群众的意志，同时，党委又要对于会议中讨论的重大问题，有明确的方针，并且要通过党员的积极活动，加强对于会议的思想领导，使会议不至作出错误的不能执行的决定。应该研究如何培养工会独立活动的的能力，加强和扩大工会和青年团在群众中的组织、教育活动，使广大职工群众团结在党的周围，形成一支有觉悟、有组织、有纪律、有文化技术的战斗队伍，保证更好地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任务。

研究有关工人阶级的这些重要问题，是一项复杂的工作任务，必须全党动手，进行准备、讨论和解决。因此，中央有关各部委，全国总工会党组，青年团中央，全国妇联党组，国务院有关各委各部党组，各地党委，都应当重视这一问题，指定一个主要负责同志，组织专门力量，按

照上述各项问题进行系统的调查研究工作，并且根据研究的结果，向中央写一个有情况、有分析、有具体意见的综合报告，或者关于某一两方面问题的报告；同时还应当各按自己部门工作的性质，选择其中若干专门问题作更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工作，并且提出关于解决这些问题的具体方案和意见。各种报告都限于今年八月底以前报送中央。在进行调查研究的同时，各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应当协同国务院有关各部党组，慎重选择几个企业，就工人参加企业管理和扩大企业权限的问题，有计划、有领导地进行试点工作，不要过于铺广，并且将试点经验及时加以总结报告中央。在没有比较成熟的经验的时候，各地在报纸上的宣传工作，必须特别慎重。为了避免引起不必要的混乱，决定暂时由新华总社负责统一报导。

一九五七年四月七日

根据中共中央文件刊印

# 今后的主要任务是搞建设\*

(一九五七年四月八日)

邓 小 平

我们前一个阶段做的事情是干革命。从去年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时起，革命的任务也就基本上完成了。今后的任务是什么呢？革命的任务还有一部分，但是不多了。今后的主要任务是搞建设。我们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的任务，就是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调动一切力量，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国而奋斗。这就是我们今后很长时期的任务。这个任务不知道要多少年才能完成。搞建设这件事情比我们过去熟悉的搞革命那件事情来说要困难一些，至少不比搞革命容易。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全党还是小学生，我们的本领差得很。搞革命不能说我们没有本事，我们把革命干成功了，搞建设我们还说不上有多大的本事。

不能否认，过去几年我们在各方面的成绩，包括建设方面的成绩，都是伟大的。我们国家发展得确实很快，气

---

\* 这是邓小平在西安干部会上所作报告的一部分。

象一新。西安，我是一九五二年底来过的，那时和现在就不能比，现在好多现代化的工业企业建立起来了。其他一些大城市也是这样。去年一年我们做了很多事情，有些事情是搞多了搞急了。因为搞多了搞急了，使得我们今天甚至明天还会有些被动。但是总的来说，去年一年的成绩是最突出的。去年基本上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建设也发展得很快，农业遇到了那样严重的灾荒，由于实现了合作化，顺利地渡过了灾荒。总之，过去几年我们各方面的成绩是很大的，不看到这一点是不对的。

但是，切不可过分夸张自己的成就，切不可把我们的事情说得太美满了。说得太美满，看得太简单，这一点反映到了我们的宣传工作上，就是把我们的国家描绘得如何漂亮，好像现在什么困难也没有了，剩下的就是享福了。有些干部脑子里想的是，我革命这么多年，国家现在也建设起来了，应该满足我的要求了。实际上我们的困难很多，我们面临的问题比过去更加复杂。要看到，尽管我们的成绩很大，工农业生产发展得很快，在工业建设方面打下了初步的基础，建设了不少企业，但是一直到现在，我们的国家还是一个贫穷的国家，落后的国家。要把这么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先进的工业国家，需要长期的刻苦的努力。这就是说，需要有勤俭建国的本领。因为你穷嘛！如果在贫穷的基础上不懂得勤俭建国，这个国是建不好的。我们党，我们中国人民，过去在阶级斗争中的本领是不错的，否则怎么能把革命干成功了呢？从整个来说，阶级斗争这门科学，我们党、我

们的干部是学会了。但在改造自然方面，这门科学对我们党来说，对我们干部来说，或者是不懂，或者是懂得太少了。当然我们也还有一些人才，但这些人才是很少的，很不够用的，我国的科学技术水平还是很低的。从过去几年的建设来看，证明我们的知识很少，还没有学会勤俭建国的本领。毛主席说，我们过去干革命是花了二十几年的时间才学会的，并且其中犯过大错误。所谓二十几年，即从一九二一年建党起，到一九四五年的七大。当然就我们党的中央来说，如何革命的问题，遵义会议就解决了。从一九二一年到七大共二十四年，这个期间我们党犯了一次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三次“左”倾机会主义错误，特别是第三次“左”倾机会主义错误，差不多把我们的革命力量搞光了，革命根据地有百分之九十垮了，受了很大的损失，花了很大的代价。毛主席说，现在我们搞经济建设，是不是可以不要花二十几年的时间而花更短一点的时间学会，并且不犯大错误，不栽大跟头。这个话的意思是说，如果我们不好好搞，在建设问题上也会栽大跟头，犯大错误。社会主义国家在建设问题上犯大错误，栽大跟头，并不是没有先例的，以为在建设问题上不会栽跟头的想法是不符合实际的。如果不好好学习，不总结经验，我们也会在建设问题上栽跟头。

我们要在比较短一点的时间内学会建设，而且在这中间不犯大错误，不栽大跟头，可能不可能呢？应该说是可能的。因为我们国家搞建设的条件是好的，比起十月革命后的苏联，困难要少一些。首先，国际形势给了我们

一个有利的环境。其次，有苏联和其他兄弟国家的经验。我们这几年搞得比较快，原因之一就是苏联的经验，有苏联的帮助。当然不是说苏联在帮助我们过程中，每一件事情都是对的，没有缺点。但总的来说，没有他们的帮助，我们不可能有这样大的成绩。我们要继续学习苏联，还要会学。学习苏联好的东西对我们用处很大，借鉴苏联错误的东西，对我们也有很大的益处。我们要善于接受苏联的经验教训，这样就可以少受损失。当然我们也要学习世界上一切先进的经验，世界各国，包括美国在内，有先进的东西我们也要学。但首先是学习苏联，因为现在只有苏联和其他兄弟国家帮助我们，美国对我们搞禁运嘛！

同时，我们自己也有了一些建设的经验。我们搞建设已有七年多一点时间，有的地方如东北还搞得更早。这几年的经验也很重要，不要小看。这是我们自己走出来的路，真正总结起来，对我们来说，益处更大。这几年的建设，大量的成功的经验，也有不少的错误。我们既要接受成功的经验，也要接受犯错误的教训；既要善于学习国际的经验，也要善于学习自己的经验。

我们国际国内的条件是好的，现在的问题是我们能不能善于利用这个形势，能不能花很少的钱办更多的事，能不能不断地总结经验，发扬成绩，克服缺点，避免犯大错误。关键在于党的领导。过去的革命问题解决得好不好，关键在于党的领导，现在的建设问题解决得好不好，关键也在于党的领导。也就是说，关键在于党是不是善



于学习，学习得好就可以避免犯大错误，就可以少花一点钱办很多的事；关键在于党能否依靠群众，不断地克服自己队伍中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革命当中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会使我们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在建设中如果犯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也会使我们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会使我们不能达到勤俭建国的目的，会使我们不能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来搞好建设。

过去几年，我们的建设成绩是很大的，各党各派和全国人民的工作都是有成绩的，我们共产党员的工作也是有成绩的。这是主要的，是首先要看到的，不看到这一点我们会丧失信心。但同时也要看到，建设中暴露出的严重缺点，特别是最近一两年来，脱离实际的主观主义，主要是教条主义倾向，是值得引起我们严重注意的。比如在我们同志的头脑中，对建设总是贪新贪大，这种脱离实际的形式主义的思想使我们吃了亏。新的大的东西要不要呢？肯定要，而且新的大的是我们建设的骨干，像鞍钢及西安一些大的企业就是骨干企业。不搞新的，没有这样的骨干企业，更高级的技术问题就解决不了，今后还要搞一些大的新的企业。但是不能什么都是大的新的，尤其不能认为凡是新的就好，凡是大的就好。不一定。讲到形式问题，形式也要，凡是能够注意的就应该注意，但不能陷入形式主义，不能因为讲形式而浪费国家的资金，不能因为讲形式使工作不利。

现在我们的企业，特别是中央搞的大企业，浪费现象

是很严重的。如果我们会搞的话，完全可以节约很多资金，用比较少的钱，同样建设这样新这样大的企业，同样有这样高的技术水平。我们有些企业规模很大，占地很多，每一个工厂，都有一个很大的厂前区，一个办公大楼。没有这些是否可以呢？是否简陋一点也能指挥生产呢？很多钱是花得不适当的。有一些中央企业起了带头作用，气魄大，牌子大，公子少爷的味道足，把一些地方工业带坏了。比如原来是省上的一个煤矿，成本低，交给中央的煤炭管理局后，成本就高了。在地方上还算一算帐，归了中央管理，帐也不算了，认为反正亏本不碍事，国家贴得起。苏联并不是这样的，美国、法国等资本主义国家也不是这样的，甚至国民党也是不敢这样搞的。国民党贪官污吏多得很，但是办企业比我们好。中国的民族资本家很多都是艰苦奋斗出来的，他们办企业比我们高明。上次我到这里来，听说有十三个公私合营厂，他们厂房是旧的，职工宿舍是旧的，厂长住的也很简单，我建议市委组织国营企业的同志去看一看。我向省委同志建议，最好去上海看一看，那里有些企业确实是艰苦奋斗出来的，搞得既经济又实用，参观后可以改变一下观念，那里可是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效法的宝贵经验。大企业，首先是中央企业，需要注意的是不要脑子发热，一脑袋的贪新贪大，追求堂而皇之的形式，脱离中国的现实。要提倡因陋就简，经济节约，艰苦奋斗。我看真正讲节约的应当是社会主义。我在兰州见到一个工厂，设备极简陋，厂长的办公室很朴素，一切都很简单，但是生产出来的产品并不

差。当然我并不是说所有的企业都要这样办，但是用这样的精神办企业，是值得学习的。

城市规划中的问题也不少。规划是必需的，不规划是不妥当的，问题是怎样规划。规划也有指导思想问题，规划得不好会造成大的浪费。据说现在西安市城市规划的图纸上已摆得满满的，实际上里边空的地方很多，不知道哪一年才能填起来。我看到一些纱厂和二机部的一些厂子，每一座厂房相隔很远，厂内占地很大，建设要花很多的钱。

在“骨头”和“肉”的关系问题中，对解决“肉”的问题也是求新求大。过去我们在城市规划中对“肉”重视不够，应该办商店、理发馆等服务性行业，没有注意办，这是事实。现在这个问题必须解决，不解决不妥当，这是一个制度问题。但是应当着重指出，过去在这方面花的钱并不少，就是用得不适当，今后我们要花更少的钱解决更多的问题。在中央来说，是对于“肉”的问题注意得不够，恐怕在地方来说，对于钱用得不适当的问题应该引起注意。这次我看了很多地方，有的花钱多没有解决问题。如果不客气地说，我们在兰州的印象比在西安好。在兰州我看到很多简易的东西，戏院还可以放电影，座位也不错，这样的戏院盖起来只花十万元，有的花钱更少就解决问题。事实上，那些大的漂亮的少盖一个，就可以盖很多个小的简易的，分布也会更匀称一些。我们国家大，搞一点富丽堂皇的东西，以表示我们的新气象，我不完全反对，但是不应该搞得太多。现在已经感到搞多了，今后无论

如何不要再搞了。我们如果本着这样的精神，今后搞一些简陋的东西，“肉”的问题是可以解决的，可以把钱用到最急需的方面去，如修下水道等。西安的电影院戏院并不少，但是在工业区一个也没有，要看戏的人找不到戏院，有戏院的地方没有多少人去看戏，这个布局显然是不适当的。西安的城隍庙，有很多简易的商店，工业区为什么不多搞几个城隍庙呢？现在不是说交通困难吗，如果我们的城市建设布局适当，在人多的地方多建一些简易的商店、理发馆等，交通就不会那么紧张了。有群众的地方就要修学校，少建一些大型的校舍，就可以多建一些简易的学校。总之，这些都是关系到城市规划的指导思想问题，也是处理“骨头”和“肉”的关系的指导思想问题。

我们在建设方面的指导思想应该是：

一、面对国家的现实。我们不要脱离国家的现实。什么叫教条主义呢？教条主义就是脱离自己的现实。经验本来是好东西，如果不善于学习，就会变成坏东西。苏联的许多经验是好的，但是如果采取教条主义的方法去学习就坏了。我们的国家很穷，很困难，任何时候不要忽略这个问题。不是讲增产节约吗？就是因为我们的穷。我们要面对国家的现实，在建设当中考虑经济、实用、美观。这个问题周恩来总理在一九五三年就讲过。有些同志讲美，美当然是好的，大家都是愿意美的，但是应该在经济实用的条件下，在可能的情况下照顾美观，实在不大美也就算了，等到将来富裕了再来讲美，今天主要讲经济讲实用。

二、面对群众的需要。我们考虑问题常常忽略了群

众的需要。现在有各种观点，追求这个化那个化，连共产主义化也有了，就是缺乏群众观点，容易解决的问题不去解决，宁肯把更多的钱用在不适当的地方。对于花很少的钱就可以解决群众需要的问题，甚至有些不花钱也能解决的问题，却注意得不够。我们的建设工作应该面对群众，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修建学校如此，修建文化娱乐场所如此，解决“骨头”和“肉”的关系问题也是如此。

应当说我们党领导建设事业过去是做得好的，近几年来有些削弱，在花钱方面没有面对国家的现实，也没有面对群众的需要。我们的宣传也总是讲我们国家多么漂亮，多么阔气。有些青年学生、青年工人闹事，就是因为总觉得国家给他们的太少了，不能满足他们的要求，国家对不起他们。干部也有这种情绪，在城里工作后，就不愿意下乡了。我们本来很穷，但却装潢得很富裕。所以我建议西安有意识地搞一些简陋的东西放在高楼大厦周围，可能对于教育青年有所帮助。总之，我们搞建设，不要脱离实际，不要脱离群众的实际生活水平。从现在来看过去，第一条，我们的成绩是伟大的，今后要搞得更好一点。第二条，缺点也是难免的，我们不是消极的批评，不要灰心。错误不是哪一个人的问题，要说错误的责任首先在中央。我们花钱要买到经验，经验这个东西很贵，今后还要花钱买经验，要力争花很少的钱买更多的经验。

根据《邓小平文选》（一九三八——一九六五年）刊印

# 关于中小学毕业生 参加农业生产问题\*

(一九五七年四月八日)

刘 少 奇

解放以后，我国的教育事业有了很大的发展。一九四九年只有小学生二千四百多万，中等学校学生一百二十六万，高等学校学生十一万多；而目前已经有小学生六千三百多万，中等学校学生约五百九十七万，高等学校学生四十万以上。但是由于我国各种条件的限制，现在还没有可能实行普及中学教育。至于高等教育，本来不属于普及教育的范围，它的发展当然要受更多的限制。因此，小学毕业生和中学毕业生都要有很大的部分转入生产。这是一个现在全国人民普遍关心的问题。

有人问：今年有许多高小毕业生和中学毕业生不能升学，是正常现象还是不正常现象？是长期现象还是暂时现象？是好事情还是坏事情？今后不能升学的学生会比今年更多还是更少？他们说教育工作方面犯了错误，他们责备政府今年的教育计划订得过低。

\* 本文是根据刘少奇一九五七年三月二十二日在湖南省长沙市中学生代表座谈会上的讲话整理的，经刘少奇审定后作为《人民日报》社论于四月八日发表。

是的，去年在教育工作上是有缺点和错误的，其中一项重要的错误就是去年多招了一部分学生，给工作带来了不少的困难。但是，不能说，去年不多招一部分学生，今年就可能招更多的学生。我们认为，今年高中毕业生大部分升学、小部分不升学，初中和高小毕业生小部分升学、大部分不升学的情况，是正常现象。而去年和前几年，高中毕业生几乎全部升学，初中毕业生大部分升学、小部分不升学的情况，却是一种临时性的现象，是中等教育赶不上高等教育发展需要，高中毕业生数量增长未能适应高等学校招生需要的特殊条件所产生的一种特殊现象。情况的变化，表明我国的教育事业已经开始转入比较正常的状态。因此，今年新出现的这种情况，今后还会有所发展，这种情况将是长期现象，而不是暂时现象。我们今后的任务，是首先逐步普及小学教育，使学龄儿童全部入学。如果达到了这个目的，全国约有一亿小学生，每年就将有一千多万小学毕业生。在逐步普及小学教育的同时，我们将继续发展初中教育、高中教育和大学教育。但是，在今后一个很长的时间内，总的趋势将是有更多的小学和中学毕业生不能升学，必须参加生产。在今后，一方面，将一年比一年有更多的小学毕业生、初中毕业生、高中毕业生升学；另一方面，又将一年比一年有越来越多的小学毕业生、初中毕业生、高中毕业生投入生产劳动。这表明什么呢？表明我国的知识分子将愈来愈多，我国人民的文化水平将逐步有所提高。毫无疑问，这对于国家、对于人民、对于教育事业本身，都是好事情，而不是坏

事情。

现在，全国各地今年应届毕业的学生情绪都很紧张，他们正在集中精力准备升学的考试，各校教师也在努力帮助学生准备升学的考试。这种努力是完全正当的。各校当局和党政领导都应当帮助、而不应当妨碍他们的这种努力。但是应届毕业的学生，以及他们的教师，特别是他们的家长，对于他们的出路都应当有升学和不能升学两种打算。能够升学，那很好。而如果不能升学，也应当有充分的精神准备，要看作是普通的事情，不要看作是“不得了”、“不能见人”的事情。对于不能升学的学生，不应当有任何歧视，而应当积极安排他们的出路。安排不能升学的毕业生的出路，在目前是一个比较繁重的任务，各个毕业生的家庭都应当认真同国家合作，国家也应当认真同这些家庭合作。我们的国家对全国所有的人都实行“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方针，因此，各地党政机关和青年组织对于当地不能升学的中小学毕业生，采取负责的态度，分别情况，作好统筹安排，是完全必要的。

问题是：如何安排？安排他们做什么？采用城乡人民集体办学等办法，再办一些小学、中学，或者采用自学小组和补习班等办法，组织学生自学，为日后参加生产劳动或升学准备条件，这是一种安排。但是这究竟只能解决极少数人的问题，而且无论自学，或者进民办的中小学，以后也还是要就业。因此，最主要的办法还是帮助不能升学的学生就业。那末，就什么业呢？大家知道，国家机关、事业机关和企业单位现在都在精简机构，调整人



员，一两年内，这些机关和单位虽然可能从复员军人、中等专业学校和一部分高中毕业生中招收一些职工，一部分企业可能招收一些学徒，但是数量不会很多，而是很少。此外，某些城市里的服务行业（例如理发、成衣、饮食等）和某些手工业，还需要增加一小部分学徒和职工。但是，就全国说来，最能够容纳人的地方是农村，容纳人最多的方面是农业。所以，从事农业是今后安排中小学毕业生的主要方向，也是他们今后就业的主要途径。因此，在这篇文章里，我们准备着重地讨论一下这一方面的问题。

有人担心我们的农村劳动力过剩，担心学生回到农村无事可做。事实证明，合作化基本实现以后的农村，在地多人少的东北、西北，以及一切还有较多荒地的农村，固然需要劳动力；就是在其他一般地区的农村中，只要哪里开始进行了农业的技术改革，开始组织了农村的多种经营，哪里就会感到有文化的劳动力的缺乏。有人也许看到过去几年，有大批小学毕业生和中学毕业生投入工业生产，而投入农业生产的只有大批小学毕业生，很少初中毕业生，甚至没有高中毕业生，因而认为农业方面只需要小学毕业生，不需要中学毕业生。这种看法也是不对的。因为事实上不是农业方面不需要中学毕业生，而是因为当时的中学毕业生数量少，只能首先满足高等学校和工业生产的需要，还不可能给农业方面安排中学毕业生。现在情况不同了。中学毕业生增加了。我们在安排中学毕业生就业的时候，已经有可能兼顾工业生产和农

业生产的需要，并且在一定时期内有可能着重地照顾农业生产的需要了。

客观上有需要，也有可能，那末，中小学毕业生特别是中学毕业生，下乡种地，参加农业生产，是不是没有问题了呢？不，还是有问题的。问题在于思想，在于学校中的政治教育和思想工作存在着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缺点，没有引导学生去切实地充分地认识这种客观上的需要和可能。过去教育行政部门对劳动教育重视不够，对中小学学生毕业后应当参加工农业生产的教育重视不够，一九五三至一九五四年虽然曾经一度加强，但以后又有些放松。即在一度加强劳动教育的时候，也是一般道理讲得多，具体实际联系少。因而学生思想上有许多问题没有得到解决，错误观点没有受到批判，正确观点没有真正树立；因而现在相当多数的学生对下乡种地在情绪上是有抵触的，他们的态度是消极的。当然，只要思想工作做得好，这些又都是可以改变的。

首先，有人说，下乡种地“丢人”，“没出息”。有些青年口头上承认劳动光荣，可是让他们去从事种地这种具体劳动的时候，就认为是“丢人”。最近又有人在说“农民生活苦”，可是要他们自己或他们的子弟下乡，去帮助农民发展生产、改善生活的时候，就说是“没出息”。说种地“丢人”，“没出息”，就是说种地“下贱”，“不光荣”。这种说法是完全错误的。许多青年学生的父母是种地的，难道能说他们的父母丢了人吗？许多人祖祖辈辈是种地的，难道能说他们祖祖辈辈丢了人吗？全国农业人口共五亿

多，难道能说他们丢了人吗？这不是侮辱全国的五亿多农民吗？全国共有六亿人民，说其中五亿多人民的劳动是“丢人”的，“下贱”的，“没出息”的，“不光荣”的，这还了得吗？这是一种什么观点呢？是劳动人民的观点吗？是无产阶级的观点吗？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吗？都不是。这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观点，是封建士大夫的观点，是封建贵族的观点，也是资产阶级的观点。

由于有这种观点，或者受了这种观点的影响，许多青年的思想发生了很大的混乱，他们的言行出现了很多不一致的地方。他们口头上重视劳动，实际上却只重视脑力劳动，而不重视体力劳动；口头上说看得起劳动者，实际上却只看得起脑力劳动者，而看不起体力劳动者。他们抽象地背诵劳动创造物质财富和精神文明，劳动创造人类和人类历史的论点，实际上却不承认或不了解人类的体力劳动是脑力劳动的基础，不承认或不了解人类的生产活动是最基本的实践活动，是决定其他活动的东西。他们也把劳动和劳动者分成等级，认为脑力劳动比体力劳动“高一等”，脑力劳动者“应当”站在体力劳动者之上。所以，他们想做脑力劳动者，不愿做体力劳动者。如果这个目的达不到，他们将就着去做大工业的工人，不愿做学徒，不愿做手工业工人，不愿做理发工人、缝衣工人、厨师，尤其不愿做农民。

大家知道，在不久的将来，我国就要普及小学教育，并且实现扫除文盲的任务。以后，我们还要用更多的时间来普及初中教育，以至高中教育，使全国人民的文化水

平普遍地提高到初中以至高中毕业的程度。苏联经过四十年的努力,已经完成相当于我国初中的普及义务教育,现在正在开始实行高中的普及义务教育。东欧有些社会主义国家,以及有些资本主义国家,也都实现了初中的普及义务教育。在这些国家内,比较年青的工人和农民,比较年青的理发工人、缝衣工人、厨师等等,都是中学毕业生。那末,能不能设想,在我国人民都成了初中毕业生、高中毕业生以后,人人都去做脑力劳动者,不做体力劳动者,不当工人和学徒,不当农民,不当理发工人、缝衣工人、厨师呢?大概谁也不能这样设想吧。既然苏联现在的中学毕业生,我国将来的中学毕业生,除开一部分人升学以外,都要做工人和农民,那末为什么我国现在的中学毕业生,却只能全部升学,而不能小部分升学,大部分去做工人和学徒,做农民,做理发工人、缝衣工人、厨师等等呢?

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是阶级社会里面长期存在的事实。在苏联,早已消灭了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对立的经济基础,因而消灭了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我国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以后,也基本上消灭了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对立的经济基础以及两者之间的对立。苏联、中国和全世界的伟大前途,是共产主义。可以设想,到那个时候,人人都将受到大学教育(将来的大学同现在的大学不会完全一样),人人都将是大学毕业生,人人都将是脑力劳动者同时又是体力劳动者。但是,能不能说,在消灭了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基本差别以

后，就不再需要劳动的分工，不再需要工人农民，不再需要理发工人、缝衣工人、厨师等等呢？不能这样说。既然共产主义社会都还需要这些劳动分工，共产主义社会的大学毕业生去做这些事都不“丢人”，那末，我们现在按照社会所必需的劳动分工，安排中学毕业生去种地，去理发，去缝衣服，去做饭，为什么就认为是“丢人”、“没出息”呢？

不少青年读书读到初中毕业或高中毕业，就看不起工人和农民，看不起理发工人、缝衣工人、厨师，就认为自己比工人、学徒和农民“高一等”，比理发工人、缝衣工人、厨师“高一等”。他们读了几句书，不是更谦虚，而是更骄傲；不是更尊重体力劳动者，而是更看不起体力劳动者。有个女同学来信说：“要年轻白嫩的姑娘去种地，去担土、挑大粪，太不像话。”劳动人民用他们的劳动把自己的子女养大起来，送到学校去读书，而子女读了书，就说种地、担土、挑大粪“不像话”。这样去培养青年，对劳动人民有什么用处呢？少教出一些抱这种错误态度的人，对劳动人民的事业不是更有好处吗？这些现象充分说明，由于中国文化落后，知识分子少，特别是由于学校里的政治教育薄弱，脱离实际，现在的青年学生还远没有摆脱中国知识分子历来就有的那种骄傲自大的劣根性的影响，以至他们在新中国的学校里受了多年教育，还不懂得尊重劳动和劳动人民，甚至还在劳动人民面前摆架子。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的：

“有许多知识分子，他们自以为很有知识，大摆其知

识架子，而不知道这种架子是不好的，是有害的，是阻碍他们前进的。他们应该知道一个真理，就是许多所谓知识分子，其实是比较地最无知识的，工农分子的知识有时倒比他们多一点。”

因此，毛泽东同志“劝那些只有书本知识但还没有接触实际的人，或者实际经验尚少的人，应该明白自己的缺点，将自己的态度放谦虚一些。”

因此，现在已经得到了一定书本知识的中小学毕业生，应该毅然决然地、愉快积极地投入到生产劳动中去，特别是投入到农业生产中去，获得生产斗争的实际知识，使书本知识和实际知识结合起来，促进自己的提高和发展。

为此目的，就必须首先去掉上述各种错误的观点和想法，改变上述错误的态度和作风。自己有这样的观点，自己首先改正，别人有这样的观点，帮助别人改正，这才是进步青年追求进步的应有态度。自己有这样的观点去向别人宣传，或者听到别人宣传这样的观点而不坚决反驳，这就是思想落后、政治落后的一种表现。学校中的党政领导人员、教师职员和青年工作者，学生的家长，特别是身为国家工作人员的学生家长，如果听到这样的观点在青年学生中到处传播，到处泛滥，而不组织辩论，不进行教育和批评，那就表明自己的思想工作薄弱和政治认识不高。最近各地都已经重视劳动教育，当然，这是好的。但是，如果不结合马克思主义的劳动观点，着重地解决“种地丢人不丢人，有出息没出息”这个根本性质的问

题，如果还是像过去那样抽象地背诵原理原则，而不联系实际，那是肯定不能解决什么问题的。我们的同志常说要加强青年的思想工作，常说要使思想教育联系实际，但是，如果不把学生中普遍存在的“种地丢人不丢人，有出息没出息”这样大的实际问题和政治问题，好好地联系起来向学生进行教育，那不是“南其辕，而北其辙”吗？

其次，有人说，下乡种地，“没有前途”。这种说法一方面是轻视劳动、轻视农民的另一种表现；另一方面，在很大程度上，又同他们对农业在国民经济中占着什么地位、农民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起着什么作用这些问题缺少了解，有很大的关系。

工业是国民经济各部门的领导力量，而农业发展则是工业发展的基础。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指出：“农业对于工业化事业有多方面的极其重大的影响。农业的发展不仅直接地影响着人民生活的水平和轻工业发展的速度，而且也影响着重工业发展的速度。”因此，我们必须努力地大大地发展农业生产。而要发展农业生产，就必须对农业进行社会改革和技术改革。在全国农业合作化基本完成以后，社会改革方面还有一些工作要做，但是，这些工作不久就可以做完。今后的主要任务，就是要把农业合作社经营管理好，逐步地而又适当地进行技术改革，大大地发展农业生产。必须懂得，管理一个几百户的农业生产合作社，比管理一个几百人的工厂是不会更容易些的，要把全国几十万个农业合作社管理好，要实现我国农业伟大的技术改革，我们还必

须进行很多的艰苦工作。

农业发展纲要草案，是我国进行农业技术改革和农村建设的长期规划，它在全国人民面前展示了我国农业发展的第一个伟大的远景，它已经成为全国农民极大的鼓舞力量。这个纲要实现以后，我们将继续实行第二个、第三个类似的纲要，实现我国农业的机械化、电气化、科学化。现在二十岁的青年，是完全有可能看到我国的农村变成真正富裕、真正幸福的农村的。

土地改革和农业合作化，是我国农村两个历史性的根本改革。合作化以后的农村是新的农村，农民是新的农民，但是，现在的农村和农民都还缺少文化。为着搞好农业合作社的经营管理工作，为着逐步地进行农业的技术改革，农村迫切需要文化，农民自己需要提高文化，同时也需要有文化的人去当农民。除开大批小学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以外，如果从今年开始，每年有近百万以至一百多万的中学毕业生下乡，五年以内有四百万至五百万中学毕业生去参加农业生产，并且以后一年比一年有更多的中学毕业生下乡，同农民群众在生产劳动中亲密地结合起来，那末，可以肯定，农业合作社的经营管理工作和农业的技术改革就将得到一个极大的推动力量，就将促进我国农村实现另一个根本改革——技术改革，促进我国农业生产空前地向前大发展。

有些同学愿意下乡工作，但是要当干部，不愿种地。现在的农村和农业合作社需要一些干部，例如会计、文书等等，这是事实。但是，我们劝告下乡的学生，最好在开



始的一个时期不要去做会计、当干部，也不一定去学那些特种农业技术，而要先去种地，老老实实、勤勤恳恳地去种地，向有经验的老农学习，经过三年到五年的时间，学会全国最普遍、最大量的一种农业生产知识——种地知识，真正成为一个光荣的劳动农民，把现在一般农民能做和会做的事情，全部都学会。要知道，刚下去的学生虽然是有文化的，可是他们还不是真正的农民，还没有农民的本领，还没有取得农民资格。他们真正学会了最大多数农民所知道的农业生产知识，再去学农业特种技术知识，或者去当干部，就要比较好些。否则，他们将缺少一种最基本、最大多数农民都知道的知识，而不利于他们以后的发展。

同时，我们劝告一切下乡的青年学生，要用心地搞好自己同农民群众的关系。为此，就不要采取对乡村“一切都看不惯”、对一切都乱加指责的傲慢态度。下乡以后，应当处处想到帮助别人，在同别人相处的时候，不要占别人的便宜，不要怕自己吃了一点点亏，要使自己真正成为农民的朋友。要采取学习和帮助的态度，去对待乡村干部。对他们的缺点和优点要多看看，要看全面；对那些已经看准了的缺点，要善意地帮助他们克服，使自己成为干部的朋友。

这样，下乡的学生和原来的农民才会结成一体，打成一片；他们的书本知识和实际知识才能互相结合，相互为用。到那个时候，讲种地，他们和原来的农民一样；讲文化，他们比原来的农民更高；讲政治，他们和其他农民群

众的关系很好。这样，他们自己就会真正成为中国第一代有文化的新式农民，农民群众就会信任他们。大家知道，国家机关和合作社的管理机关都是民主选举的。那个时候，只要真正是为人民群众所信任和拥护的并且是有能力的人，他就有可能由人民群众选出来当人民代表，当合作社的干部，当国家机关的干部。而这样的干部才真正是群众中涌现出来的，而不是从上面硬安下去的。当然，我们的劳动是为了整个社会的进步，而不是为了替个人挣得某种地位，例如做干部等等。做干部也同做农民一样，是为人民服务，不过这究竟只是极少数人的工作，而且不是一种可以终身不变的职业。但是无论如何，各级国家机关和事业机关的老一代的人总是要被年轻人代替的。那些真正从工人、农民出身，能吃苦，有文化，有工作能力，又取得人民群众信任和拥护的年轻人，就是说，那些德才兼备的年轻人，当然最有可能来接替老一代的人。

据说在一部分学生中，因为想到不能升学，要下乡种地，已经发生了学习上的消极情绪。他们说：“下乡打土块，学文化有什么用？学几何三角有什么用？”这种情绪是不好的，这种说法是不对的。前面说过，农村迫切需要有文化的人，文化知识愈多，对农村的用处就愈大。中学教育是普通教育，它使人得到一种普通的知识，谁掌握了这些知识，谁就打下了进一步学习的基础，他以后就可以经过自己的努力，一步一步地提高自己的文化技术水平。几何三角，物理化学，这些方面的知识虽然对种地不见得

马上就都直接用得上，但是学了这些科学，就比较容易接受新的农业技术，而且这些科学常识在以后的学习和实际工作、实际生活中，还经常要使用。一般地说，掌握初步的科学常识，不但使人的知识广博，使人的头脑得到锻炼，使人的思维和语言更加准确，更加有条理，而且可以使人养成科学的唯物主义的 natural 观，脱离对自然现象的迷信状态。因此，一切在校学生，不论当年毕业的或不毕业的，不论能升学的或不能升学的，都应当继续努力学习，认真学习，学好一切功课，一直学到毕业，拿到文凭，或者升学，或者进工厂，或者加入某种行业学手艺，或者高高兴兴地下乡去。而在参加生产以后，也要利用业余时间 and 农闲时间，继续进行学习，按照各人的不同兴趣和国家的不同需要，学习不同的科目。可以学马克思列宁主义，可以学科学技术，也可以学文学艺术。学习的组织形式，可以多种多样。有的个人自学，有的成立互助小组，有的组织业余学校，有的进夜大学或函授学校，将来有的还可以进训练班，入了党的还可以进党校，生产好，学习好的还可能进大学。因此，青年人在参加工农业生产以后，决不要停止自己的学习。

有人说，不进大学，下乡种地，再不能当专家了。这也不一定对。问题主要不是在大学或在农村，而是自己的态度是否正确，自己的努力是否顽强。大学毕业生并不每个人都是科学家，科学家也并不每个人都是大学毕业生。米丘林是个大农业科学家，但他并没有进过大学；高尔基是个大文豪，他只上过一两年小学。著名的科学

家、文学家和政治家富兰克林，著名的物理学家法拉第，都是学徒出身。著名的发明家爱迪生和诺贝尔，都只进过很短时间的小学。这样的例子，还可以举出很多。因此，我们的中学毕业生下乡种地，只要他顽强努力，坚持自学，他还是有可能成为专家或科学家。至于说到政治家或政治工作人员，那末可以说，下乡种地，或者进工厂做工，或者加入不同行业做手艺，只会更有可能锻炼成为优秀的政治家或政治工作人员。例如，中国共产党的中央委员和各级领导人员，只有少数人是大学生，绝大多数人都只进过中学或小学，有些人连小学也没进过。因此，能不能说，中学毕业生进大学的前途一定比下农村的好呢？不能这样说。能不能说，下农村去所能学到的东西一定比进大学少呢？也不能这样说。

人们知道，我党中央和各级地方党委，除开城市党委和个别省委以外，是把主要力量放在农村的。现在全国各地各级正在精简机构，抽调干部，层层下放，深入农村。成千成万的干部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有的县长背粪筐，有的县委书记挑大粪。人们也知道，全国五亿多农民正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辛勤劳动，积极生产，为争取今年的大丰收，为建设社会主义的新农村而努力奋斗。难道全国从上到下，从领袖到群众，这样重视农村工作和农业经济，都是在做着没有前途的事业么？不，他们都是在做着具有伟大前途的事业。农村既然有伟大的前途，为什么说下乡学生没有前途呢？在新社会里面，每件有益于人民的事业都有前途，每个忠于人民利益的人也

有前途。中国第一代有文化的新式农民，这就是下乡种地的学生的前途，这个前途是光明的、伟大的，然而必须经过艰苦的努力和锻炼，才可能达到。种地是要流汗的，是要吃苦的，它比口头讲劳动光荣困难得多，它给人民带来的好处，却比任何好话大得无法比拟。

其次，有人说，他们愿意去种地，但必须去外县外乡，不愿回本县本乡。他们说，社会上有一种压力，使他们难于在本乡本地生活下去。他们的父母兄弟，他们的亲戚朋友，他们的老师同学，现在都还在不同程度上带着轻视农业、轻视农民的观点，不愿意要自己的子弟回家种地。他们也认为读了十几年书，还背个锄头，跟在牛屁股后面，是“没出息”。他们的冷言冷语使下乡种地的学生不能忍受。农民自己看不起自己，这是几千年来封建统治阶级压在他们身上的一个包袱，我们有责任帮助他们解除这个包袱。只要解除了这个包袱，也就解除了学生回乡种地的社会压力。因此，我们在向广大青年学生进行思想教育的同时，在城市、在农村，必须着重向学生的家长和师友，向广大的农民和干部，进行广泛的深入的宣传教育工作，使他们对农业生产、对农民群众、对学生回乡有正确的认识，使他们采取热情关怀的态度，鼓励学生回乡，欢迎学生回乡，使下乡学生能够安于农村，安于种地。

这里必须指出：人们的思想可以改变，但不是一朝一夕能够改变得好的。下乡的青年应当在精神上有所准备，要站稳脚跟，坚定认识，不怕讽刺讥笑，不怕冷言冷语。别人说种地“丢人”，自己就应当理直气壮地说种地

不丢人；别人说种地“没出息”，自己就应当说这对国家对人民大有出息，要耐心地向人作解释，讲道理，既不动摇，也不傲慢。用自己的行动来说服人，影响人，长年累月，始终不懈，人们就会信服你们，尊重你们。

最后，有人说，不能升学，要去种地，这是“吃了亏”。近来确实有一些人过分地热衷于个人名利，追逐着钱多、待遇好和较为轻松的事情干，而不愿干工资较少、待遇较薄或者较为困难的事情，即使这些事情对国家和人民都十分需要的。这是一股歪风。它确实吹倒了一些人，也还正在吸引着一部分人。国家为了调节社会各部分人民的生活，对某些人的待遇不够合理的地方，应当加以调整。但是，我们希望青年在这股歪风面前，能够站得稳，不要跟着这股歪风跑。

中国革命胜利以前，中国共产党员和许多革命者，不怕杀头，不怕坐牢，他们离乡别井，东奔西走，不计名利，不图享受，唯一想到的是国家的存亡和人民的祸福。他们为了革命事业的胜利，英勇牺牲，艰苦奋斗，前面的人倒下去，后面的人立即跟上来；革命失败了，马上重振旗鼓，继续战斗。这些具有伟大的革命气魄和自我牺牲精神的人，在过去，曾经被反动统治者看作“大逆不道”的“叛逆”，也曾经被一些只顾个人利益、不顾人民利益和只问个人前途、不问国家前途的所谓“聪明人”看作“傻子”。但是，历史的结论是公正的。革命依靠这些“傻子”和广大人民的努力在全国胜利了，反革命被推翻了，那时的“聪明人”有的由于事实的教训后来站到人民方面来了，有的

被人民抛弃了。而一切在革命中牺牲了的先烈，现在得到了全国人民的尊敬，并将千秋万代地受到人民的景仰。

那末，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还需要不需要这样的“傻子”呢？我们的理想是美丽的，我们的途程又是艰难的。祖国建设的各方面需要更多的这类“傻子”，需要更加发挥这样的“傻劲”。值得注意的是在我们一部分干部和一部分青年中，近来渐渐地遗忘了这种优良的传统，在他们中间出现了一些所谓新时代的“聪明人”。这些人在分配工作的时候，首先想到的不是祖国的需要，而是个人的前途；他们遇到困难的时候，不是首先自己想办法克服，而是向国家伸手提要求。他们对工作不负责任，拣轻怕重，把重担子推给别人，自己挑轻的。一事当前，先替自己打算。他们斤斤计较个人地位和个人待遇，不是同别人比艰苦、比工作，而是比高低、比阔气，有的甚至发展到了争名夺利、唯利是图的地步。这些人灵魂深处的六个大字是：贪便宜，怕吃亏。

我们要劝告一切干部和一切青年，不要向这些“聪明人”学，而要向那些“傻子”学，不要怕吃苦，不要怕自己吃了一点亏。必须懂得，光想占便宜，生怕吃亏的人，是思想上、政治上不健康的人，是不值得信任的人。而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不怕自己吃亏的人，才是高尚的、有道德的、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才是真有理想，能够站得住脚、能够得到人民信任的人。从长远说来，前一种人在最后是要吃大亏的，而后一种人则最后将得到他所应得的待遇。必须懂得：要和群众的关系搞好，就不能占便宜，就

不要怕自己吃亏。要完成任何伟大的事业，都必须有吃苦耐劳的精神，都必须有意识地把较为艰苦和困难的工作担当起来。这样做一次两次，人家也许还不注意，做十次八次，人家还可能把他看作“傻子”，十年，二十年，长期地这样做下去，人家就会说他是好人，就会信任他，拥护他。吃苦在前，享福在后，这是取得党和人民群众信任的基本条件。我们希望青年都能够向着这个方向锻炼自己，把自己锻炼成为具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种美德的人。青年人要有理想，我们希望一切青年人都有这样高尚的理想。

根据《刘少奇选集》下卷刊印



# 外出视察的报告\*

(一九五七年四月十八日)

朱 德

我这次路经湖北到广西、广东(海南、湛江、广州)、云南、四川、陕西等地走了一趟。沿途看到农业生产搞得都不错,除广西因去年旱灾严重,粮食未增产外,其他各省粮食都有相当大的增产。农业合作化成绩很大,百分之七十五到九十的社员增加了收入。地方工业、手工业都有发展。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也收到了显著的效果。这几个省去年的工作是有发展、有成绩的,但同时也存在一些有待解决的问题。除以前分别向中央电告过的以外,现再就以下问题说一点个人的意见。

## 关于对外贸易问题

几年来,两广、滇、川等省的对外贸易是有发展的,局面已经打开,出口物资的品种和金额逐年增长。一九五六年四省共完成出口任务十亿二千二百万元,今年出口

\* 这是朱德视察广西、广东、云南、四川、陕西等地后给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报告的一部分。

任务还可增加一些。两广、滇、川等省气候温暖，物产丰富，交通也便利，应当作为对外贸易的重要基地。

当前对外贸易最根本的问题是货源困难。这分两种情况：一种是生产虽有增长，但国内市场的需要也在增长，因而发生矛盾，如粮食、油料、肉类等；另一种是由于组织货源的工作没有做好，在价格、税收等政策上有毛病，经营环节过多，对发展山区经济重视不够，使许多有用物资运不出来，并不是货源真正缺乏，如土特产、药材、皮毛、杂品等。

粮食、油料、肉类等出口物资，在今后几年内还是紧张的。但因为紧张就尽量压缩出口也不是唯一的办法，这会造成对外贸易工作的被动和困难。解决的办法，只有从发展生产、适当节约消费、寻找代用品等方面着手，以便尽量挤出东西来出口。粮食方面如果今年农业大丰收，就可以解决一些问题。油料方面可以寻找代用品，如木本油料作物单广西就有九十种，其他各省也不会少，可以大大发展。猪肉的问题，经过今年养猪业的发展，紧张情况将会逐步缓和。因此，在这几方面尽量挤些东西出口还是可能的。为了补偿因粮食、油料、肉类等出口减少所造成的外汇损失，今后应注意发展矿产品，如煤炭、食盐、稀有金属和石棉等物资的出口。这方面的工作如果做得好，前途是可观的。例如煤炭和食盐可出口日本等国，应有计划地大量发展各地小煤窑，以节约开滦煤和抚顺煤供出口。海南岛的莺歌海可以搞机械化的大盐场，投资不多，获利很大。稀有金属和石棉各地也不少，出口

的利润很大。这些，都应预先作好计划和组织工作，以便从速扭转出口物资不足的局面，并且逐步做到使工农业产品出口比重各占百分之五十。

对于药材、皮毛、杂品及其他土特产等出口物资，主要是把组织货源的工作进一步做好。要减少经营管理环节，允许产地基层单位直接同外贸系统挂钩；纠正收购工作中的多收少不收、干收湿不收的不合理现象；有计划有领导地组织行商走贩收购山区物资；恢复过去的山货行栈和重点建立加工整理部门；适当地调整价格和税收政策；通过地方和内外贸易系统投资以及发动群众来修筑道路，改善交通运输状况，从各方面想尽一切办法来扶助和发展山区的生产。这样，山区的物资就可以源源运出来，并且还可以不断增加。这不但使对外贸易的货源有了着落，解决了国内某些工业生产原料的缺乏，同时更重要的是搞活了山区经济，改善了山区人民的生活。目前山区人民的生活是很苦的，山区问题是全国性的问题，单靠农业贷款和民政部门救济还不能解决问题。应该看到，通过外贸系统从价格政策和各个方面来使山区经济获得发展是当前解决山区问题的一个重要手段，这方面的工作做好了是可以收到双重利益的。

我国是一个大国，气候温暖，物产丰富，人口众多，劳动力便宜，手工业产品的价廉物美闻名于全世界，加之我国在国际事务中所起的作用越来越重大，无论是为了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或是为了加强国际交往，我国的进出口贸易必须大大地加强和发展。要扩大出口，必

须手头上有一大批东西。如果发展了煤炭、食盐、稀有金属、石棉等物资的生产，发展了山区经济，再加上全国农业生产的发展，出口物资就有了保证，从而就能摆脱目前对外贸易工作中只搞农产品出口的被动和困难的局面。我这次出去转了一趟，对出口物资摸了摸底，觉得并不悲观，只要采取有效的措施，把各方面的工作做好，物资出口就不会有多大的困难。今年出口五十八亿元的指标，仍应想办法超过。从第二个五年计划起，出口物资逐年应有相当大的增长，到一九六二年，最低应达到一百亿元。这样，我们就能换回大批的进口物资，我国的建设速度就能加快，政治和外交影响也会更加扩大。

## 关于工业问题

这次看到的最突出的问题，是兵工生产如何同民用生产相结合的问题。这个问题不仅在重庆、成都、云南、广州等地存在着，而且是一个全国性的问题。一般说来，兵工厂的特点是投资大、厂房好、职工多、设备新、技术水平高、生产能力大。这些厂去年就吃不饱，今年情况较去年将更加严重。现在有些厂就到处揽活自寻门路，有些厂还没有想到办法，只得让一部分设备和人员闲着。长此下去，损失很大。看来兵工生产在和平时期兼产一些民用物品或同民用生产相结合的问题，迟早非解决不可。我认为这个问题要及早解决，否则损失更大。当然，这个问题牵涉的方面很广，比较复杂，需要作通盘的考虑和筹

划。但是时间不允许我们再拖下去，拖延并不能解决问题。需要先从原则上确定下来，比如是否可以先考虑以下两个方案：一个是把二机部同一机部、电机部合并，设备和人员统一调度，平时可以多生产些民用品，战时主要生产军用品。今后一机部应尽量少建新厂，外贸系统也应尽量少进口机电设备，由二机部所属厂的多余力量担负新厂和机电设备的生产，使它们现有的设备力量尽量利用起来。一个是把二机部的范围划小，把剩余的生产能力分出来转向民用生产，二机部今后专搞原子武器等特种兵工生产。这两个方案不一定可行，顶好请计委、经委、建委同有关部门从速共同研究一个合理而又可行的方案，报中央讨论确定。总之，要想办法做到能够把二机部所属各厂的设备充分利用起来，使其在国家建设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第二个问题是如何更有效地利用矿产资源的问题。据两广、云南、四川了解到的材料看，这几个省的矿产资源是比较丰富的，有金、银、铜、铁、锡和其他稀有金属，问题是国家对这些资源统得太死，地方和群众都没有活动的余地。对于藏量大、宜于利用现代化设备进行开采的矿山和特种稀有金属等，由国家统一计划开采是必要的和正确的，是符合国家和人民利益的。但是对于藏量不大的、分散的、国家又无力开采的矿产资源，我认为应当允许地方有领导有计划地开采，但必须保证国家矿山资源不被破坏和浪费。或者由地方政府组织手工业、农业和供销合作社的多余劳动力和资金来开采，由企业部门

或地方向它们订合同收购成品或半成品，有些东西如煤炭等还可以酌情开放一点自由市场，以满足各方面的需要。这样做，资源就能够更有效地得到利用，煤炭、稀有金属、石棉等出口物资也可得到一定的保证，同时又合理地利用了劳动力，养活了一部分手工业者和农民，国家也可以减少一部分投资，好处很多。如四川全省原有小煤窑一千二百个，由县、专经营的煤窑每吨煤炭成本三元（群众经营的更低），由省经营的七元，由煤建公司统销的十二三元，地方上为了照顾国家的利益，不得不停掉一千个小煤窑，现在全省煤炭十分紧张，只好又重新开放。又如会理一带（西昌以南），原是产金子的地方，据说解放前后，群众每年要挖二万两金子进贡给当地土司。现在这一带经过民主改革，不再需要向上司进贡金子了，但是金子也就不挖了。如果仍然让群众挖，并加强组织领导，每年挖上几十万两金子，就是一笔很大的财富。由此可见，合理地利用分散的矿产资源，让地方政府和群众去开采，这对国家对社会都是有好处的。

第三个问题是中央对地方的机械工业不宜统得太死，不要把稍微像样的机械厂都收归中央管理。现在广西、云南、四川的地方工业，没有一个稍微像样的机械制造厂，因此不能满足地方工业、手工业和农业生产的需要，有时要进行必要的机器修理也发生困难。我认为应给每个省下放个把像样的机械制造厂，以便为本省生产工业、手工业、农业所需要的产品，并做一些机器修理工作；或者把某些中央管理的机械制造厂划出一部分任务

交地方支配,根据地方工农业生产需要进行协作,这样才能解决地方工业发展中的困难。

根据《朱德选集》刊印

# 国务院关于消灭 血吸虫病的指示

(一九五七年四月二十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委员会，国家经济委员会，财政部，商业部，水产部，化学工业部，轻工业部，农业部，农垦部，林业部，水利部，文化部，卫生部，新华通讯社，广播事业局，中国科学院，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国务院第二、五、七办公室：

## 一

血吸虫病在我国流行已久，对于人民的危害是极其严重的。病害流行地区遍及江苏、浙江、湖南、湖北、安徽、江西、四川、云南、广东、广西、福建和上海等十二个省(市)的三百五十个县(市)，患病人数约有一千多万，受到感染威胁的人口则在一亿以上。据典型调查，在病人中约有40%左右已经有了症状，他们的劳动力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损害；约有5%到10%是晚期病人，他们大部分丧失了劳动力，并且已经受到死亡的威胁。患病的儿童影响发育，患病的妇女多不生育。由于病害的影响，在病区普遍出现了人口减少、生产下降的严重情况。在极少数



病区甚至发展到田园荒芜，家破人亡的境地。如江西省丰城县白富乡梗头村，百年前有一千多户，到1945年只剩下两人，其中死于血吸虫病的有90%。安徽省贵池县棠溪乡碾子下村，百余年前有一百二十户，现在只有曹金雨一户四口人，其中三人仍患血吸虫病。湖北省孝感县东山乡大河湾王腊春家，十五年前一家十口，现在除本人患血吸虫病外，其余都死于这一病害。又据四川省绵竹县东北乡的调查，耕牛感染血吸虫病的达94%。这些事实充分地说明了血吸虫病已经成为我国现有流行病中危害最大的一种病害，它严重地影响着病害流行地区的农业生产，如果任其继续蔓延下去，势将危及我民族的健康和繁荣。因此，消灭血吸虫病已成为我们当前的一项严重的政治任务，必须充分地发动血吸虫病流行地区的广大群众，坚决地为消灭这一病害而斗争。

## 二

我国人民同血吸虫病作斗争是有悠久历史的。由于历代反动统治阶级对人民的疾苦漠不关心，人民同血吸虫病的斗争始终是自发的、分散的，民间流传的许多有效的防治经验没有集中起来加以提高和推广，因而就无法制止病害的发展。解放以后，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对于防治血吸虫病作了一些工作，积累了一些经验，但是由于当时农村的社会改革任务尚未完成，不可能发动广大群众来进行全面的反复的斗争，因而也就不可能取得更

大的效果。自从中共中央提出了《一九五六年到一九五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和全国农业合作化基本完成以后,在党、政府和流行地区人民群众的共同努力下,近一年来的防治工作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和新的经验:

第一、党和政府对防治工作的领导大大地加强了。中央和流行地区县以上党的组织以及大部分乡以上党的组织,都已经建立了防治血吸虫病领导小组。在大部分地区乡以上的各级人民委员会都建立了防治委员会。各省(市)卫生部门,也充实和建立了一千四百多个防治所、站、组,训练了一万三千多个防治干部、八万四千多个农业生产合作社保健员和二万五千多个区乡干部,组成了一支防治队伍。有五个省(市)已经基本完成了调查摸底工作,其他各省也进行了不同程度的调查工作,大体摸清了病害流行的情况,普遍地进行了试点工作。

第二、发动了群众,动员和组织了科学技术力量,开展了群众性的防治运动。据不完全的统计,各省(市)已经在一亿五千多万平方公尺的钉螺地区进行了灭螺工作。参加灭螺工作的不仅有流行地区的农民,而且还有非流行地区的农民、学生和解放军官兵。凡反复三次进行灭螺而合乎规格的地方,钉螺死亡率一般都达到95%左右,而且有六个乡消灭了钉螺。此外,在发动群众管理粪便、保护用水安全等方面,也取得了许多成绩。各有关方面的科学技术力量,都积极地参加了防治斗争,建立了全国血吸虫病研究委员会(包括卫生、农业、水利和兽医等各个方面的专家一百二十余人)。许多科学工作者深入

病区，了解病害流行情况，加强了防治工作的技术指导，总结和提高了群众的防治经验，在充分发动群众和科学技术相结合、在科学技术和实践相结合的原则下，科学研究工作已经取得了不少的成就。一年中治疗病人在四十万以上，相当于解放七年来治疗十五万病人的 266%。

第三、在组织领导、发动群众和防治的技术上，取得了一系列的有效经验。通过实践，使大家认识到防治工作是一项艰巨复杂的任务，必须进行反复的斗争；明确了防治工作是广大流行地区农业增产的一项重要措施，必须统盘规划，统一部署并和农业生产密切结合进行。在湖沼洲滩地区创造了结合兴修水利围垦种植、冬耕种植早熟作物灭螺的新方法。在一般地区创造了煤气火焰喷射灭螺的方法，发现了茶子饼、闹洋花等灭螺药物。在治疗上，经过临床试验，肯定了对治疗早期或晚期病人有疗效的若干中医药方。在西医方面，也肯定了锑剂三日疗法，这一成就，对于减轻病人经济负担、提高治疗一千余万病人的速度和恢复劳动力，都有重大的作用。此外，还肯定了阿托品和针灸对减低锑剂反应的效果。在贮粪灭卵和个人防护方面，都创造了许多新的经验。

从一年来防治工作所创造出来的成功事例看来，无可争辩地说明了血吸虫病是可以预防，可以治疗，可以由逐步消灭到全部消灭的。经过一年的防治斗争，我们基本上摸清了情况，初步发动了群众，组织了防治队伍，积累了许多有效的防治经验，树立了榜样，坚定了斗争的信心和决心。只要我们充分利用这些条件，继续努力，坚持

到底,就可以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在七年内完成基本消灭血吸虫病的伟大历史任务。

### 三

一年来的调查摸底、科学研究和大规模防治斗争的实际经验证明:由于血吸虫病疫区大、病人多、感染易、复发率高,为着根本消灭这一病害,取得最后的胜利,就必须实行积极防治的方针,采取综合性措施,切实掌握充分发动群众和科学技术相结合,防治工作和发展农业生产、兴修水利相结合坚决进行反复的斗争。

#### 第一、关于治疗病人。

目前全国约有一千多万病人,绝大多数是种植水稻地区的农民。其中约有五十万到一百万是晚期病人,如不及时治疗,可能有大量死亡的危险。又有约四百万左右是有症状的病人,劳动力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损害,严重地妨碍着农业生产和农民的生活。其余约六百万左右的早期病人,如不及早治疗,病势必将逐渐转重。而且这一千多万病人每天又排出大量带有血吸虫卵的粪便,成为不断扩大感染的病源。鉴于这种严重的情况,就必须采取积极治疗的方针,以求配合积极预防工作,使病人年年减少,这是逐步达到全部消灭血吸虫病的一个重要方面。如果只片面地强调预防的重要和治疗的困难忽视治疗工作,就无法抢救死亡,保护大量的劳动力,从而脱离病区广大群众。并且由于病源不能根绝,不断扩大感染,防不

胜防。因此,单纯预防,忽视治疗的观点是错误的。

对于早期病人和晚期病人必须兼治。有症状的病人,应当尽先治疗。只治早期病人,忽视有症状病人的治疗是不对的。鉴于目前西医西药和中医中药治疗早期病人和晚期病人,各有所长,在治疗上中西医更应该密切合作。

由于目前病人多,病情有轻有重,农业生产任务很繁重,而各地的医疗力量在数量上和质量上又不平衡,各地在治疗工作中必须紧密地依靠农业生产合作社,按照医疗力量的具体条件,实行病情排队、生产排队、病人的思想状况和经济条件排队,从而有计划地安排治疗工作,防止窝工或拥挤现象发生。各省(市)人民委员会应当按照当地的具体情况 and 条件,订出逐年治疗病人的规划,积极组织力量,坚决加以完成。

现有的其他各种确有疗效的西药和中药,应当按照各地的具体情况,慎重地加以推行。对现在已经肯定了疗效的锑剂三日疗法,凡是有条件的地方,都应当有步骤地积极加以推广。但根据现在农村的生产条件和农民的经济条件,要在今后几年内逐步完成治好全部病人的严重任务,必须力求花钱少,便于病人治疗,如在农村中可以进行巡回驻社治疗,在城镇中可以试行门诊治疗。反对在治疗设备上讲排场、求形式,造成铺张浪费现象。

## 第二、关于预防工作。

血吸虫病流行的主要特点之一,是感染容易,蔓延很快。由于大量虫卵每天随着病人粪便排出,进入水中发

育成为毛蚴，又进入钉螺分裂成为尾蚴，大量尾蚴由钉螺排出水中，在人体和有尾蚴的水接触时，尾蚴进入人体，形成病害；而流行地区多是江河湖沼密布的水稻作物地区，人民的生产和生活无一天不和水接触，所以受到感染极为容易，但又不易察觉，到了症状明显时，已成为中期病人，不仅治疗困难，而且病者本身又成为新的病源；如此辗转循环，就造成了流行地区逐渐扩大的趋势。这一特点充分地说明：对于血吸虫病既要积极治疗，又要积极预防，由控制感染到逐年减少感染，同时配合治疗以便最后达到消灭血吸虫病的目的。这是逐步达到全部消灭血吸虫病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如果只片面地强调治疗的重要，忽视预防工作，就势必造成感染无法控制，预防和治疗脱节，一面治疗，一面感染，治不胜治。因此单纯治疗、忽视预防的观点也是错误的。

预防工作的各项措施，不论消灭钉螺、管理粪便、积肥灭卵、保护用水安全和个人预防感染，都必须订出全面规划，采取综合措施，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如灭螺工作，应当由近到远，由点到面，由局部到全部。在实行这些预防措施的具体办法上，各地已经有了许多经验，应当因时因地制宜。在每个预防工作中，各级领导上应当注意加强技术指导，力求合乎规格，讲求效果。反对在灭螺工作中只求多和快不注意质量，反对在粪管工作中草率从事、不按期封存、不讲求灭卵效果，以及厕所搭棚中的铺张浪费现象。今后，在预防工作中，应当积极组织科学技术力量，进行科学研究，总结群众经验，在实践中不断地创造

新的办法，力求花钱少、人力省、收效大。

第三、充分发动群众和科学技术相结合。

防治血吸虫病是千百万群众对病害的一场严重斗争。既要依靠广大群众群策群力，又要依靠科学技术的正确指导，必须使两者密切地结合起来，才能取得应有的效果。当前最重要的一环在于把现有的科学技术为群众所掌握，成为同血吸虫病战斗的武器。这就必须经常地、反复地向群众进行广泛深入的宣传教育和思想动员，用真人真事、现身说法、诉病苦等方法，运用无人村、寡妇村等严重事例，提高群众对血吸虫病危害的认识，引起群众对钉螺、虫卵的痛恨，树立对防治病害的信心和决心，使群众自觉地投入运动。注意克服重病区、重病患者的悲观情绪和轻病区、轻病患者的麻痹思想，还要向群众传播通俗的防治知识和科学常识，打破群众的迷信思想，说明灭螺、管粪灭卵、用水安全和个人防护的道理和标准，使现有的各种防治经验为群众所掌握，说明不按规格、不讲效果的害处，让群众自己根据标准要求，大家讨论和确定具体办法，发挥其创造性。必须充分地说明消灭血吸虫病是一个长期的反复的斗争过程，使群众有充分的思想准备，树立牢固的必胜的信心，防止产生自满情绪和前紧后松的现象。

为了使现有的防治经验为群众所掌握，提高群众对防治斗争的技术水平，必须加强科学技术指导。这就需要各级党政领导继续贯彻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和百家争鸣的方针，发挥科学家的积极性，加强对科学研究工作的

政治思想领导,积极地帮助和支持科学家的研究工作,有计划地组织他们深入现场,以加强实际工作的指导,并教育他们重视从群众斗争和防治工作的实践中发现新事物的萌芽,加以研究和提高。还应当随着防治工作的发展,经常地向科学家提出防治工作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目前需要科学技术研究工作解决的主要问题是:钉螺生态、更好的灭螺灭卵药物、口服药剂或其他新的药物、中医验方等等。我们热忱地盼望着各有关科学家们团结合作,加强研究试验,尽早做出成绩,以便及时地指导群众性防治斗争的发展和提高。

第四、防治工作必须和发展农业生产、兴修水利相结合。

血吸虫病已经成为当前流行地区农业生产的严重障碍。防治工作的直接目的,就是为着抢救人命,保护劳动力,给进一步发展农业生产创造条件,这是增加农业生产的一项重要措施。

据湖南省岳阳防治所三个乡的典型调查,在病人中轻度患者劳动力损失 16—18%,中度患者劳动力损失 50—57%,重度患者劳动力损失 70—78%,平均损失劳动力 40%左右。由此可见,治好病人,作好预防工作,消灭血吸虫病害是和增加生产的根本利益一致的。但生产和防治工作有着不同的具体内容和要求,加之农村生产任务十分繁重,如果领导上不把生产和防治工作统一地安排好,在具体工作上也是会发生矛盾的。因此,必须反对只要生产不要防治工作,或者只要防治工作不要生产的片面



观点。这两者可以结合进行而且必须结合进行。防治工作和发展农业生产相结合的关键，是依靠从省（市）到乡的各级党政领导的统一安排，把防治工作的各项措施尽可能地和发展生产的各项措施结合起来进行。各地干部和群众在这些方面都已有了许多好的经验，例如：疏通沟渠铲草灭螺可以堆肥，减少生产成本，便利灌溉，减少洪水灾害，还可以结合清除各种虫卵，减少危害人民和农作物的害虫；粪便管理可以提高肥效和增加积肥；围垦种植既可灭螺，又可增加耕种面积；治疗病人既可以恢复身体健康，又可以增加劳动力。这一切都是完全可以和农业生产、兴修水利结合起来的，是一举两得，事半功倍的事，希望有关部门努力以赴。

#### 第五、必须坚决进行反复斗争，坚持到底。

由于目前治疗条件解决血吸虫病复发率问题尚有困难，加之钉螺、尾蚴和虫卵分布极广，不可能一次消灭，因此不论治疗和预防都必须进行反复的斗争，决不能存在一次解决问题的速胜思想，或者前紧后松而无坚持到底的精神。防治血吸虫病工作的特点，要求我们必须在思想上和组织上有充分的准备，坚决进行长期的反复的斗争，坚持不懈，有始有终，决不能半途而废。有些地区的干部和群众见到灭螺未能一次全面歼灭或者因为消灭不彻底，又有少数孳生，即产生悲观情绪，对战斗胜利失去信心，这种思想，必须坚决予以克服。各地人民委员会应当用愚公移山的精神，顽强坚毅的思想，把广大干部和群众武装起来，反复进行，战斗到底，不彻底消灭血吸虫病

害,决不罢休。

#### 四

加强党和政府对防治血吸虫病工作的领导,是消灭血吸虫病害的基本保证。现在流行地区有许多地方对于防治工作是重视的、有决心的、抓得紧的,因而那些地方各有关部门就配合得好,防治工作的困难及时地获得了解决,干部和群众有斗争信心。有些地方对于这一斗争抓得不紧,也不及时总结经验,因此,那些地方的防治工作就是一阵风,有头无尾,或者推一下动一下,不能坚持下去,防治工作中一系列的矛盾问题没有获得解决,干部和群众信心不足,防治成绩也不大。有个别地方对于这一严重的斗争还没有引起重视,竟把防治工作看成一种额外负担。有些轻疫区还有慢慢来的思想,不了解越早防治就越有利,以致防治工作迟迟未认真进行。上述后三种地区,都应当采取积极措施,加强对防治工作的领导,把现存的不良情况,坚决地改变过来。

流行地区乡以上各级人民委员会,凡是尚未建立防治委员会的,均应当迅速建立起来,从省(市)到县的各级防治委员会都应当吸收农业、卫生、水利、文教和其他有关部门的负责干部参加,以便把这些部门组织起来,密切结合各部门的业务工作,环绕每个时期的防治任务,协同作战。

为了把广大群众动员起来,积极参加防治斗争,流行

地区各级人民委员会必须首先对全体干部进行广泛深入的教育，务必使他们充分地认识到血吸虫病的严重危害性，克服麻痹思想；充分地认识到这一斗争关系着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和国家的根本利益，提高全体干部高度的责任心。

为了保证防治工作不致被当前农村中各项繁重的任务所挤掉，流行地区各级人民委员会在规划每个时期的农村工作任务时，应当把防治血吸虫病工作列入生产规划，提出具体任务，同农村生产统一布置，统一检查贯彻执行。国务院和流行地区各级人民委员会的农业、卫生、水利等各有关部门，也应当根据每个时期防治工作的统一要求和各部门的业务情况，把有关的防治工作列入自己的工作计划内，认真组织执行。有防治任务的乡人民委员会，应当根据每个时期生产和防治工作的具体情况，领导农业生产合作社，统一地安排生产和防治工作的具体任务，及时地解决生产和防治工作安排上的具体矛盾，并妥善地处理病人在治疗中的工分问题。在病害严重的地区，农业生产合作社和生产队应该有一个副职干部专门领导防治工作。采用以上各项措施，就可以从组织上保证做到生产和防治工作两不误。

鉴于在血吸虫病流行地区中，有一部分地方还兼有其他严重的病害流行。因此，流行地区各级人民委员会在防治血吸虫病工作中，应该准备条件，逐步结合防治其他危害严重的疾病。

在血吸虫病流行的少数民族地区，布置和推动防治

工作时,必须充分地照顾到他们的生活、生产习惯和宗教风俗特点,耐心地进行宣传教育,稳步地进行防治工作,在经济上和技术上给予他们大力的帮助和支持。

国务院有关部门、流行地区各级人民委员会应当根据这一指示的精神,对本地的防治血吸虫病工作进行一次检查和讨论,制定1957年防治工作计划,认真地贯彻下去。国务院有关部门、流行地区省(市)人民委员会讨论这一指示的情况及今年防治工作的计划,望报告国务院。今后,各省(市)人民委员会应当每半年将防治工作向国务院作一次专题报告。

总理 周恩来

一九五七年四月二十日

根据国务院文件刊印

#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

(一九五七年四月二十七日)

## (一)

我们的党一九四二年开始的第一次整风运动，取得了伟大革命胜利的结果。现在，我们的国家已经从革命的时期进入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时期，正处在一个新的剧烈的伟大的变革中。社会的关系根本变化了，人们的思想意识也在随着变化。我们的党和工人阶级要能够进一步地更好地领导全社会的改造和新社会的建设，要能够更好地调动一切积极力量，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并且将消极力量转化为积极力量，为着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目标而奋斗，必需同时改造自己。但是，党内有许多同志，并不了解或者不很了解这种新情况和党的新任务。同时，又因为党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处在执政的地位，得到了广大群众的拥护，有许多同志就容易采取单纯的行政命令的办法去处理问题，而有一部分立场不坚定的分子，就容易沾染旧社会国民党作风的残余，形成一种特权思想，甚至用打击压迫的方法对待群众。几年来，在我们党内，脱离群众和脱离实际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有了新的滋长。因此，中央认为有必要

按照“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的方针，在全党重新进行一次普遍的、深入的反官僚主义、反宗派主义、反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水平，改进作风，以适应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

## (二)

这次整风运动应当以毛泽东同志今年二月在扩大的最高国务会议上和三月在中央召开的宣传会议上代表中央所作的两个报告为思想的指导，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作为当前整风的主题。毛泽东同志的这两个报告已经在广大的干部和知识分子中传达，以后还要继续在全体党员和人民群众中传达。这两个报告的传达引起了党内党外的热烈讨论，就我们党来说，实际上，这就是整风运动的开始。各级党委必须组织关于这两个报告的学习，按照这两个报告的基本思想，并参考一些其他有关的文件，总结和改进行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的工作。在学习中，对于各级领导机关和干部，主要的是要检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情况，检查对于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和“勤俭建国”方针的执行情况，检查那些脱离工人群众、农民群众、士兵群众、学生和知识分子群众的官僚主义现象，检查那些不从团结六亿人民出发、不从团结各民族各党派和广大的党外群众出发、不从团结全党出发的宗派主义现象，检查那些

不从实际情况出发的主观主义现象，而真正地贯彻执行中央关于“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指示。对于一般党员，主要的是要求他们懂得：为人民服务；有事和群众商量；吃苦在前，得利在后；实行批评和自我批评。对于知识分子党员，除了上述各项要求以外，还要着重要求他们联系工农群众，分清无产阶级立场和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立场，克服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倾向，加强党性。为了克服思想方法上的主观性和片面性，领导干部和知识分子党员还必须在今后的适当时期进行唯物辩证法的学习，关于这一方面学习的计划，将来另行规定。

### (三)

这次整风运动，应该是一次既严肃认真又和风细雨的思想教育运动，应该是一个恰如其分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运动。开会应该只限于人数不多的座谈会和小组会，应该多采用同志间谈心的方式，即个别地交谈，而不要开批评大会，或者斗争大会。不论在座谈会、小组会上，进行批评的时候，或者个别交谈的时候，都应该放手鼓励批评，坚决实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原则，不应该肯定自己的一切，拒绝别人的批评。同时，对于批评者要提倡实事求是，具体分析，以免抹杀别人的一切，使批评变成片面的过火的批评。每个人都应该虚心地听取别人的意见，积极地向别人提意见，但是不得强迫被批评者接受他所不同意的批

评。对于一些带原则性的争论，可能的时候应该作出必要的结论，但是必须容许保留不同的意见。对于在整风运动中检查出来犯了错误的人，不论错误大小，除严重违法乱纪者外，一概不给以组织上的处分，并且要给人以积极的、耐心的帮助，这样来达到“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目的。

非党员愿意参加整风运动，应该欢迎。但是必须完全出于自愿，不得强迫，并且允许随时自由退出。

#### (四)

为了加强党同广大劳动人民的联系，彻底改变许多领导人员脱离群众的现象，在进行整风运动的同时，应该在全党提倡各级党政军有劳动力的主要领导人员以一部分时间同工人农民一起参加体力劳动的办法，并且使这个办法逐步地形成为一种永久的制度。我们党的领导干部在历史上长时期是同工农兵群众同甘共苦的，这种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是保证中国革命胜利的基本因素之一。但是近几年来，有许多同志在这一方面是退步了。目前党的任务，除了进行整风学习，提高党内思想认识，改正工作中的缺点错误以外，还要在实际生活中完全保持和发扬我们党的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并且着手进一步建立党和国家的领导工作人员的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相结合的根本制度，使领导者同群众打成一片，使人民内部的关系面貌一新，使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老爷架子，大大减少。党和国家的领导工作人员的脑力劳



动和体力劳动相结合的办法，应该先从党内的少数人员作起。这种体力劳动，哪怕很少一点也是好的。待取得经验之后，经过适当步骤，再有计划地逐步地普及到凡能多少从事劳动的党政军领导工作人员和经济、文化组织中的主要管理人员。关于这个问题，需要规定一些具体办法，中央将另作专门指示。

### (五)

这次整风运动，应该首先从县级以上、军队团级以上的党的组织以及大的厂矿和大专学校的党的组织开始，并且应该首先从检查领导干部的思想作风开始。各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可以同时选择若干基层党委进行整风学习，以便取得典型经验，逐步推广。

在进行整风运动的时候，各单位应该组织领导小组。党委的第一书记必须亲自负责，抓紧领导。整风计划应该贯彻整风和工作两不误的原则，并且必须使整风运动的进行同工作的改进结合起来，同人民内部矛盾的具体解决结合起来，防止关门整风，妨害工作。整风的组织领导办法和具体工作计划，由中央直属党委、中央国家机关党委、总政治部和各省（市）委、自治区党委自己规定实行，并且希望于收到本指示以后两星期内能够将这种具体计划报告中央。

根据一九五七年四月二十七日  
《人民日报》刊印

# 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一九五七年四月二十七日)

刘 少 奇

最近,我到河北、河南、湖北、湖南、广东跑了一下,同这五个省的领导同志谈过一些问题,也找一些工人代表、学生代表、民主人士座谈过。当前的问题,就是如何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这个问题,毛泽东同志作过报告<sup>(1)</sup>,你们也正在讨论。现在就我所感觉到的,以及同志们提出来的一些问题,讲一讲。

## 一

有很多同志在讨论这个问题:现在国内的主要矛盾到底是什么?是敌我矛盾,还是人民内部的矛盾?

现在我们国内是不是敌我矛盾是主要矛盾?不能这样讲。现在国内除台湾外地主阶级早已消灭了,官僚资产阶级也已消灭了,反革命也基本上消灭了,还剩下一点残余,剩下一点尾巴,所以不能说现在我们国内敌我矛盾

\* 这是刘少奇在中共上海市委召开的党员干部大会上的讲话,收入《刘少奇选集》时第二部分有删节。

还是主要的。当然，也还有少数反革命分子，对于这些人要提高警惕，他们还可以作乱，还可以进行破坏活动；地主阶级的残余也还在农村里面，也有些人还是要进行破坏活动的，不看到这一点，对这些人丧失警惕性，麻痹大意，是不对的。但是，他们作为阶级已经消灭或基本上消灭了。此外，经过社会主义改造，资产阶级作为阶级也基本上消灭了，虽然他们之中有一小部分人还是不服气的。所以，我们说国内主要的阶级斗争已经基本上结束了，或者说基本上解决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中国人民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矛盾是主要矛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特别是在土地改革以后，主要矛盾就转了，帝国主义赶走了，地主阶级经过土地改革也消灭了，官僚资产阶级也消灭了，主要矛盾就变成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公私合营以后，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也基本上解决了。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讲了这个问题。这些矛盾都基本解决了，那末现在什么矛盾是主要的？就提出了这个问题。应该讲，现在人民内部的矛盾已成为主要矛盾。

有人说，今天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思想与非无产阶级思想的矛盾。那末什么是无产阶级思想？非无产阶级思想在哪里？有的人大概是这样想的：我们领导者是无产阶级思想，非无产阶级思想都在群众那里。如果这样想，我看就错了。无产阶级思想与非无产阶级思想的矛盾，首先表现在我们党内。我们党内有很多问

题,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是无产阶级思想?争名夺利是无产阶级思想?评级的时候升了两级,还躺倒了不起来,是无产阶级思想?所以,如果讲无产阶级思想与非无产阶级思想的矛盾,在今天是一个很突出的问题,是我们大家必须研究解决的问题,那末,首先要在共产党内部解决,而且要首先在共产党的干部中间解决。要把我们共产党干部中间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以及本位主义、个人主义等等搞得少一点,越搞越少才好。因此,在我国今天的情况之下,就是说在帝国主义已经赶走、地主阶级已经消灭、资产阶级已经基本上消灭的条件之下,无产阶级思想与非无产阶级思想的矛盾表现在人民内部,而且也表现在共产党内部,表现在我们共产党的干部中间。所以,这个矛盾也是人民内部的矛盾。那末,这个矛盾是不是有阶级性?当然有阶级性。非无产阶级思想中有农民阶级思想、小资产阶级思想、资产阶级思想,还有地主阶级思想。但是,那是反映过去这些阶级的思想,不是或者大部分不是反映今天的。今天的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是新的了,是合作化了的农民和小资产阶级了,今天的资本家是公私合营了的新式资本家了。如果我们讲到非无产阶级思想,讲到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思想,讲到资产阶级的思想,讲到地主阶级的思想,那是反映过去这些阶级存在的时候的思想。所以,这里面当然也有阶级性的问题,但是这些思想现在主要反映在人民内部。

有人说,今天在我国国内,工人阶级与农民的矛盾是

主要矛盾。如果说工人农民有矛盾的话，也应该是人民内部的矛盾。因为工人阶级是人民，农民也是人民。而且今天的农民，刚才讲了，已经不是过去的农民，已经在起变化而且基本上起了变化，已经是合作化了的新式农民。所以工农矛盾也是人民内部的矛盾。

有人说，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是主要矛盾。刚才已经讲过，曾经有一个时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公私合营以前，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是国内的主要矛盾。但是，这个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了。在公私合营以后，资本家已经把工厂交出来了，除开极少数的分子以外，他们不反抗社会主义，有很多人已经接受社会主义了。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本来是对抗性的，但可以转化为非对抗性的，转化为人民内部的矛盾。

还有人说，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矛盾是主要的，或者说先进与落后的矛盾是主要的。但这个矛盾是什么矛盾？这个矛盾也是人民内部的矛盾。今天的上层建筑是什么？就是共产党领导的国家，包括政治、法律、文化等，这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你能说是敌我矛盾？今天的生产关系是什么？生产关系包括所有制与分配关系。今天的所有制主要是全民所有制与集体所有制。这两种所有制决定今天的分配关系。现在分配关系里面表现的矛盾最多了。那么，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是不是人民内部的矛盾？这是社会主义所有制内部的矛盾，是全民所有制内部的矛盾，是集体所有制内部的矛盾，也是人民内部的矛盾。先

进与落后，这也是人民内部的先进与落后的矛盾。过去的上层建筑是反动的上层建筑，生产关系是反动的生产关系。过去是反动阶级代表落后，而革命阶级代表先进。所以，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先进与落后的矛盾，曾经表现为敌我矛盾。但是现在这个情况变了，国内形势有了根本变化，反动的统治阶级已经被消灭，资产阶级也基本上被消灭。现在的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先进与落后的矛盾，不是表现在反动者与革命者之间，而是表现在人民内部。所以，这些矛盾现在已成为人民内部的矛盾。

还有人说，人民群众与领导者之间的矛盾，人民群众与官僚主义者之间的矛盾是主要的，或者说矛盾大量或集中表现在人民群众与领导者之间，表现在人民群众与官僚主义者之间。那末，人民群众与领导者之间的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还是敌我矛盾？如果是敌我矛盾，就发生谁是敌人这个问题，是人民是敌人，还是人民群众的领导者是敌人？显然，这是人民内部矛盾。至于人民群众与我们领导机关的官僚主义者之间的矛盾，可不可以这样讲：一般说来，基本上是人民内部的矛盾。所谓基本上，所谓一般说来，是除开了一种特殊情形，除开了少数特别恶劣的、顽固的、反人民的官僚主义者以外，一般犯了官僚主义错误的，还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对这些同志，还是要从团结出发，经过批评，达到团结才好。不然就不好办。我们共产党的每一个干部都值得检查一下，到底自己有多少官僚主义。说“我没有官僚主义”的人，你不

要相信他，恐怕那种人官僚主义还更多。当然，恶劣的、顽固的、与人民群众完全对立的官僚主义者还是少数。但是某些情况比较严重的、已经引起人民反对的官僚主义，现在不是很少，而是相当多，在各个方面都有。

另外还有人问，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矛盾是什么矛盾？是不是对抗性的矛盾？从思想上讲，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矛盾是对抗性的，两个主义的体系是不能调和的。一个是真理，一个是谬误，一个是是，一个是非。因此我们说要辨明是非，不能混淆是非，要寻找真理，去掉谬误。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真理与谬误，是与非，这些矛盾从思想上讲是不可调和的，是对抗性的。这些矛盾，以前往往表现在阶级之间，表现在敌我之间。而今天，帝国主义已经赶走了，地主阶级已经消灭了，资产阶级问题也解决了，那末，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真理与谬误、是与非这些矛盾表现在什么人中间？不是表现在敌我之间，不是表现在敌对阶级之间，而是表现在人民内部。人民内部有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两种思想，人民内部有真理有谬误，人民内部有是有非。因此，这些矛盾，表现在人民内部是非对抗性的，是人民内部的矛盾。

当着这些矛盾表现在敌对阶级之间的时候，我们采取对抗的办法，打倒的办法，“一棍子打死”的办法。而当着今天这些问题表现在人民内部时，就要采取和风细雨的办法，小民主，小小民主的办法。采取粗暴的态度来解决人民内部的思想问题，解决党内的思想问题，那是错误的。过去我们党犯过这个错误。在教条主义统治的时

候,在我们党内的斗争中是采取“一棍子打死”的办法。现在我们有些同志总想搞一个敌我矛盾是主要矛盾才好,以便于“一棍子打死”。那末,唯心主义在你们脑子里有没有?主观主义是什么?教条主义是什么?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就是唯心主义嘛!你们有教条主义的时候我们就“一棍子打死”,你们有经验主义的时候也“一棍子打死”,你们赞成吗?当着你自己脑子里有唯心主义的时候,你不愿意人家采取粗暴态度来对待你,那末当着别人脑子里有唯心主义的时候,你也不要采取粗暴的态度去对待别人。推己及人嘛!我看这样比较好。如果解决思想问题采取“一棍子打死”的办法,结果打来打去,打得一塌糊涂,问题还是解决不了。

由此可见,矛盾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对抗性的矛盾,另一类是非对抗性的矛盾。因此,处理矛盾的方法也有两种。处理对抗性的矛盾是一种方法,而处理非对抗性的矛盾又是另外一种方法。如果把对抗性的矛盾当作非对抗性的矛盾来处理,那是错误的。如果把非对抗性的矛盾当作对抗性的矛盾来处理,也是错误的。

因此,首先是认识矛盾,对矛盾的性质要认识清楚,要具体研究,具体审察,具体分析。问题来了,要看这种问题是对抗性的矛盾还是非对抗性的矛盾。如果确定它是对抗性的矛盾,是一种处理方法;确定它是非对抗性的矛盾,又是一种处理方法。认识矛盾的性质,而后决定处理的方针和方法。对矛盾的性质认识不清楚,矛盾的性质确定错了,在处理方针上就要犯错误;方针错了,那在



一系列的具体办法上都要犯错误。

人民内部矛盾一般讲来基本上是非对抗性的矛盾，因此，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不能采取处理对抗性矛盾那样的办法。如果采用处理对抗性矛盾那样的办法来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那是在根本方针上面犯错误。当然，事情是复杂的，这两类矛盾是可以互相转化的。对抗性矛盾在一定条件之下会转化为非对抗性的矛盾，非对抗性的矛盾在一定条件之下也会转化为对抗性矛盾。矛盾转化了，处理的方针也要随之转化。如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者同我们党的矛盾曾经是非对抗性的，是可以在党内解决的。我们党内有很多曾经犯过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同志，后来改正了。但是，也有那么一部分人犯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还死硬不改，并且在党里面进行分裂活动，组织特殊的派别。那就变为对抗性矛盾了。张国焘的错误在党内也曾经是非对抗性的，后来张国焘跑到敌人那里去了，就变成对抗性的了。这是非对抗性的矛盾，可以转化为对抗性的矛盾。原来是对抗性的矛盾，也可以转化为非对抗性的矛盾。例如，中国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从根本上讲是对抗性的矛盾，但是在一定的条件之下，它也可以转化为非对抗性的矛盾。

当着矛盾表现为对抗性的时候，要去解决矛盾，就要强调斗争。当着矛盾表现为非对抗性的时候，我们就不采取斗争的办法而采取“团结——批评——团结”的办法来解决。我们共产党人不是斗争的嗜好者，我们在主观上没有必要去故意地、人为地使斗争激烈化，使斗争紧张

起来，似乎非要斗一下我们才舒服，不斗一下就不过瘾。但我们也不害怕斗争，在需要用强硬的斗争的办法来解决矛盾的时候，我们是不吝惜斗争的。我们采取什么方针和方法来解决矛盾，不是凭主观愿望决定的，而是由客观矛盾的性质决定的。只在必要的时候才采取强力的办法、压服的办法。凡是可以采取说服、教育、团结的办法来解决问题的时候，我们都是采取说服、教育、团结的办法。因此，有人说，现在提人民内部矛盾是主要矛盾是不是有危险，是不是就会斗得一塌糊涂了，那是不会的。因为人民内部矛盾是非对抗性的矛盾。我们就是主张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要用和风细雨的办法，要用小民主的办法。

## 二

人民内部的矛盾，现在是大量地表现在人民群众同领导者之间的矛盾问题上。更确切地讲，是表现在领导上的官僚主义与人民群众的矛盾这个问题上。虽然有些矛盾问题不在领导方面，但是我们是在领导国家，站在领导的地位，社会上一切不合理的现象，一切没有办好的事情，领导上都有责任。人民会来责问我们国家、党、政府、经济机关的领导人，而我们对这些问题应该负责任。因此人民群众跟领导机关之间的矛盾，现在是突出地表现出来，而真正的矛盾产生在领导机关犯了官僚主义。如果领导机关不犯官僚主义，问题就可以解决了，矛盾就缓

和了。即使群众中间有过高的要求,有不合理的要求,有错误思想,领导上如果没有官僚主义,也可以而且应当解释清楚,矛盾就不会紧张起来。

人民内部矛盾还特别表现在分配问题上。不是讲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矛盾吗?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矛盾表现在什么地方?我看是大量地表现在分配问题上。农民说工人分多了;小学教员说青年工人分多了;你房子住多了,我没有房子;评了你升级,不评我升级,这都是分配问题。我建议同志们要好好研究这个分配问题。例如整个国家的分配,积累占多少,消费占多少,军政费占多少,文教费占多少,这个工业部门那个工业部门各占多少,生产人员和非生产人员各占多少,还有小学教员分多少,青年工人分多少,干部分多少,等等。总而言之是个分配问题。这些问题都属于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水平。我们现在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分配的原则是按劳取酬,公平合理。如果不按劳取酬,不公平合理,就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如果按劳取酬贯彻得比较好,分配得公平合理,大家满意,就会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很多人都想在全民所有制中多分一点。但是,如果是不应该分的你多分了,谁看了也反对。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是全民所有制,东西是大家有份的,群众敢于讲话,有权利讲话,有权利对分配问题提出意见。这就是社会主义民主的物质基础。所以,人民群众不仅在政治上关心社会主义的民主,而且在经济生活、生产上也关心社会主义的民主。这关系到他们自己的生活水平,关系到

他们自己的命运，是不能不管的。

在这里，人民群众对我们领导机关的某些领导干部，是有些不满意的。就是说，我们有些领导干部是不是多分了一点，生活待遇太高了，房子住得太好了。也确实有这样的事。在乡村里面，合作社主任劳动日多记了一点，自己的亲戚朋友本来不该记劳动日，也记了几个。工厂里厂长、党委书记、青年团书记奖金分多了，此外还有把亲戚朋友送进厂等等。这样群众就反对，对这个分配关系就不满，而且最后就闹事。有很多闹事的基础是我们领导机关领导者自己打下的。我参观了一些工厂，厂长、总工程师或者党委书记住的房子是一幢幢的公馆，是新盖的，处长又是一幢房子，科长又是一幢房子，其他干部又是一幢房子，工人宿舍是另外一幢房子。等级分得很清楚，甚至厂长、处长、科长的办公室里面，住的宿舍里面，几个台子、几个沙发、几个凳子都有等级。我看在这个地方是不是开始萌芽了一种等级制度，社会主义之下的等级制度。等级制度是一种封建制度，我们抄袭了封建制度。如果有这种制度开始萌芽，我看应该废除。那些生活待遇上要求很高的人我看是危险的，将来会跌交子。这方面我看应该有所改变。

人民内部之间的矛盾激化起来就可能闹事。我研究了一些地方的闹事，几乎全部是为了经济性质的切身问题。政治性质的罢工、罢课、游行、示威，很少发生，也不容易发生。但是人民群众内部有不少的政治思想问题。如果我们能够及时地加强政治思想教育，解决这些问题，

是不会发生闹事的。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加强政治思想教育。政治思想教育有些地方在加强，但有的加强得不好，群众有很大的反感。说是教育群众，实际是整群众，只批评群众，自己不作自我批评。如何加强政治思想教育，很有必要改善方法。

群众闹事中间，反革命分子是可能参加的，但是在今天，反革命分子只能够利用群众中的切身经济问题和政治思想问题来鼓动群众闹事。反革命分子不可能用反革命的纲领和反革命的口号来鼓动群众闹事。所以群众闹起事来，即使有反革命分子参加，也要当人民内部问题处理。先把群众的问题处理了，使群众安定下来，然后，才能处理反革命分子的问题。不解决群众的问题，就不可能肃清反革命分子。

群众闹事中间提出的要求，我研究了一些，大部分是合理的，是可以实现的，一小部分是不合理的，是不能实现的。这一小部分不合理的不能实现的要求，经过认真的解释，向群众讲清楚道理，群众也并不坚持。所以，群众是有相当高的觉悟的。当然群众觉悟不高的也有，但是经过解释，可以讲清楚。

群众闹事大体上经过这样几个阶段：先是提意见、提要求；然后是派代表交涉；如果交涉没有结果，就开会，向北京告状，或者出墙报，向《人民日报》写信；如果还没有效果就请愿，就闹事。大体上都不是突然闹起来的，往往是经过了几个月，经过了半年，采取了各种办法，官僚主义者不理，解决不了问题，最后才来请愿、闹事、罢工、

罢课。大部分闹事，开始只是群众讲闲话。所以劝告同志们要听闲话，群众的闲话不可不听。刚刚有了闲话，你听了，感到有问题，就去处理，这就比较好，解决了问题就可以不闹事。因此，应该允许群众提意见，提要求，派代表交涉，开会，向北京告状，出墙报，向《人民日报》写信。要允许这些事，要听闲话，就是说允许小民主。不允许小民主，势必要来个大民主。

闹事的原因，据工人讲有这么几个：第一个叫说话不算数，合同不兑现。招工的时候答应了的，许过愿的，结果不能兑现。第二个是调动工作不讲清楚道理，不要的时候一脚踢开。有的劳动调配、人事部门就是采取这种办法。第三个是厚此薄彼，待遇不公平。就是刚才讲的对干部比较厚一些，对工人比较薄一些；对这部分人厚一些，对那部分人薄一些；对自己的亲戚朋友厚一些，对其他的人薄一些。还有一些工人的合理要求，领导机关长期不解决，这也是一个原因。所以，总起来讲，领导机关的官僚主义是引起闹事的原因。

官僚主义，上面有责任，下面也有责任。凡是要中央负责的，部里面负责的，局里面负责的，应该把责任担负起来。但是还有很多事情不是部里的，不是中央的，是下面做的，工厂、基层单位应该负一定的责任。

对付闹事要有正确的办法。我们一些领导干部，没有闹起来时不理，闹起来以后又惊惶失措，一惊惶失措就采取压制的办法。这是不能解决问题的。

我们有些同志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上面，有

几个基本观点是错误的。

第一个观点，就是站在人民之上的观点。我们有的领导人把本单位的群众看作是属自己管的手下人。他的话是这样的：“我是管你们的，而你们是归我管的；你们应该听我的话，而我可以不听你们的话；我有权力命令你们，你们没有权力命令我。”这个态度是什么态度？我想这个态度是官僚主义的态度，是根本错误的态度。他已经不把自己看作是人民的一分子，而把自己放在与人民对立的地位，与人民群众对立起来。这个观点，不是无产阶级观点，不是群众观点，而是剥削阶级观点、官僚主义的观点。恩格斯讲过，要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我们党、政府、国家、经济机关的领导人，本来是人民群众的公仆，社会的公仆。现在我们有的同志已经变为老爷，把人民群众当作仆人，自己还不自觉。这是错误的。我们所有的领导人都是为人民服务的，是人民的公仆，是人民的勤务员，没有权利当老爷。因为不这样，他就不能把群众当作跟自己一样的人来看待，处理人民群众内部的事情，就不能把普通的工人、普通的农民、普通的学生与我们党员和干部一样看待。我们要信任群众，群众才会信任我们。不信任群众，群众是不会信任我们的。

第二个观点，就是只去分清群众的是非，而不分清领导上的是非。不是讲人民内部问题是是非问题吗？分清是非，分清谁的是非呢？有的领导人只分清别人的是非，而不分清自己的是非。自己不分，别人去分他的是非，他又

不准。他分群众的是非时，只讲群众非，说群众错了，群众还有什么好的地方，他就不讲了，抹煞群众中的是。而讲到自己，讲到领导上，就只讲自己的成绩，不讲自己的缺点，只讲自己的是，不讲自己的非。结果就是这样：非的就是群众，是的就是“老子”。这是很片面的，是不符合事实的。应该首先分清领导上的是非，检查领导上有哪些错误，然后再去分清群众中的是非。分清群众是非的时候，不只是说群众中的不好，好的地方也要讲。这样才全面，人家才会服。

第三个观点，是以力服人，不是以理服人。有的领导人处理群众问题是用力量去压服，而不是用道理去说服。群众中间闹起事来，他不是想尽法子使群众闹事解消，使矛盾缓和，不是强调团结，强调统一，而是强调斗争，不讲道理，使矛盾激化起来。这是违背上面所讲的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针的。人民内部的事情应该缓和，应该妥协解决。

第四个观点，就是把人民内部的矛盾当作敌我矛盾来处理。凡是群众中间闹起事来，有的领导人就去分群众的界线，问人家的动机，查人家的历史，当作反革命事件来处理。如果把人民群众当作敌人，这就根本错了，实际上是自己当作人民的敌人了。当然，对待犯官僚主义错误的人，群众里面也有过分的，也需要教育。除开特别恶劣的、顽固的官僚主义者以外，对于一般犯官僚主义错误的人，还是应该从团结出发，经过批评，达到团结。

现在我感觉到，各个地方，各个工厂、学校里面，都积



累了很多问题，你们这里也是一样。积累的这些问题要集中解决。以后是不是可以每年集中解决一次或者两次，就是要群众提意见，要工人开小组会，学生、机关职员开小组会，号召他们把意见和要求都提出来。提出来之后，综合起来，集中解决。能够办到的就要办，不能办到的就要向群众解释。如何解释法，市委、区委好好讨论一下。这样集中解决问题，不要好久，就可以使人民中间积累起来的那些问题主动解决了，而不至于闹事。

根据《刘少奇选集》下卷刊印

## 注 释

〔1〕 指毛泽东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这个讲话当时即在党内外干部群众中广泛进行传达和讨论，后来经本人整理、补充，一九五七年六月十九日在《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 关于香港问题\*

(一九五七年四月二十八日)

周 恩 来

我们不能把香港看成内地。对香港的政策同对内地是不一样的,如果照抄,结果一定搞不好。因为香港现在还在英国统治下,是纯粹的资本主义市场,不能社会主义化,也不应该社会主义化。香港要完全按资本主义制度办事,才能存在和发展,这对我们是有利的。香港的主权总有一天我们是要收回的,连英国也可能这样想。

香港是自由港,原料来得容易,联系的范围很广,购置设备可以分期付款,成本低,有市场,技术人才容易训练出来。所以,香港发展生产具备很多有利条件。我们在香港的企业,应该适应那里的环境,才能使香港为我所用。我们不是要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吗?香港应该化为经济上对我们有用的港口。

现在国内的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基本完成,私营企业已经全部公私合营,对其在香港的企业则不要去变动它。

---

\* 这是周恩来在上海工商界人士座谈会上讲话的节录。

但过去已经公私合营的，如南洋烟厂，再转回私营也不必要。没有合营的不要合营，否则在原料、市场、销路上反而吃亏。保持和扩展香港这个阵地有好处。至于将来怎么办？我们不会来个七反八反的，不会像“三反”、“五反”那样的搞法。我们这样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经过几十年的工业化，经济力量会更加强大。所以在香港的人，一般不要回来，在那里发展这个阵地有好处。香港的企业家是我们的朋友，他们搞的是资本主义，不是帝国主义。过去我们同民族资产阶级合作过，将来同香港的企业家还是可以合作的。港澳的同胞不要担心前途。他们当中如果有些人主动坚决要求回来，可以同意。但不要动员他们回来，要让他们留在那里经营自己的企业。我们可以同他们内外合作，不使人家吃亏。至于有些人一时还不相信我们，对我们的政策有怀疑，可以让他们再看一看，看一二十年都可以。我们不要歧视他们，责怪他们。如果内地有一些人想出去，也是允许的。毛主席说，这一条我们过去就是不放心。现在应该是来去自由，不加歧视。香港的生活方式，当然是资本主义的生活方式，带有腐化性。有些朋友想要出去过一阵也可以，我们不要抓得那么紧，但也不是主动去号召。不要强留一些人在内地，有些人在外面过一阵还会回来的。凡有爱国心的人，我们就欢迎。对他们不要强劝回来，也不强留。

我们过去对有些事情处理方法上有些问题，但不能说大的方面做错了。有偏差可以纠正，如对外贸易，应该管制，但不能管得太严。现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基

基本上胜利了,要进行社会主义建设,香港可作为我们同国外进行经济联系的基地,可以通过它吸收外资,争取外汇。我们要打开局面,就得对香港的民族资产阶级讲清政策,使人家有利可图。过去我们搞得比较死,但总的说是对的,否则上不了轨道。现在既上了轨道,有些政策就要根据实际情况有所改变。

根据《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刊印

# 中共中央关于继续组织 党外人士对党政所犯错误缺点 展开批评的指示

(一九五七年五月四日)

上海局,各省委,直属市委,自治区党委,中央各部委,国家机关和人民团体各党组:

最近两个月以来,在各种有党外人士参加的会议上和报纸刊物上所展开的,关于人民内部矛盾的分析和对于党政所犯错误缺点的批评,对于党与人民政府改正错误,提高威信,极为有益,应当继续展开,深入批判,不要停顿或间断。其中有一些批评得不正确,或者在一篇批评中有些观点不正确,当然应当予以反批评,不应当听任错误思想流行,而不予回答(要研究回答的时机并采取分析的态度,要有充分说服力),但是大多数的批评是说得中肯的,对于加强团结,改善工作,极为有益。即使是错误的批评,也暴露了一部分人的面貌,利于我们在将来帮助他们进行思想改造。现在整风开始,中央已同各民主党派及无党派领导人士商好,他们暂时(至少几个月内)不要表示态度,不要在各民主党派内和社会上号召整风,而要继续展开对我党缺点错误的批判,以利于我党整风,否则对于我党整风是不利的(没有社会压力,整风不易收

效)。他们同意此种做法。只要我党整风成功,我党就会取得完全的主动,那时就可以推动社会各界整风了(这里首先指知识界)。此点请你们注意。党外人士参加我党整风座谈会和整风小组,是请他们向我们提意见 作批评,而不是要他们批评他们自己,此点也请你们注意。如有不便之处,则以不请党外人士参加整风,而由党邀请党外人士开座谈会请他们畅所欲言地对工作上缺点错误提出意见为妥。请你们按当地情况斟酌处理。

中 央

一九五七年五月四日

根据中共中央文件刊印

# 关于高级党校学员 整风问题的谈话\*

(一九五七年五月七日)

刘 少 奇

## 一

我最近去各地，对于党校的学习，听到一些反映。有的同志说：到党校学习，读了点书，得到了不少益处。有的同志说：有的人虽然读了一点书，但思想问题解决得不好。有个同志对我说：有一同志到党校学了马列主义，反而背上了包袱，倒是更不好办了。这是很值得注意的问题。

读书的同时必须要改造思想。我们干部读书是有必要的，过去不是读得多了，而是读得少了。但读书必须对工作有所帮助，读书不改造思想，对工作没有帮助，就是教条主义。

对有毛病的干部，不要舍不得批评，对原则性的问题，必须以原则对待，要尖锐地提出问题，坚持原则，弄清

\* 这是刘少奇在听取中共中央高级党校校长杨献珍、副校长侯维煜汇报党校学员开展整风运动情况时的谈话。

是非，但是批评的态度必须要好。要知道，同志之间的矛盾，必须以同志式的态度去解决。所谓态度要好，就是要真正从团结的愿望出发，从爱护同志出发，经过同志式的批评，划清是非界限，划清正确与谬误的界限。对违背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违背人民利益的思想，是不能妥协的。对无产阶级和非无产阶级的思想矛盾，是不能搞调和主义的，调和主义就是非马克思主义。不能搞调和主义，但也不是板起面孔，故意搞得那么紧张，把矛盾扩大了。

是非问题一方面表现在敌对阶级之间，另一方面，也表现在人民内部和同志之间。就是非讲，是不要调和主义的，而就同志间的关系讲，却要调和，要团结。这就是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同志间矛盾的辩证方法。

在党校的学习中，一定要注意解决思想问题，进行思想改造。学校领导在学员开始学了一个时期后，要收集一些问题，抓住几个重要问题，提到原则上，向学员清楚明白地指出来，对他们讲清道理。即便有少数人不接受，也算是已经尽到学校的责任了。你们想想，看这样做好不好。你们在这方面可能做得弱了一些，不够有力量。所以，好人读了书，就更好了一点；有毛病的人读了书，没有整顿思想，出了党校，反倒更不好办了。

思想问题要提得尖锐，原则问题原则对待，是则是，非则非，原则上是不能让步的；但在解决问题的方式上，却要灵活，不能强迫人家承认错误，不能伤害同志的自尊心，不能使人没有发言权。要真正从团结的愿望出发，以同志式的爱护的态度，提出意见，互相批评，弄清是非，



达到团结。要允许讲不同的意见，人家没有想好，没有讲完，就要让人家好好睡觉，睡好了再讲。要采取这样的方法，有力地抓住问题，弄清原则问题，纠正错误问题，使人感到在党校整风学习中能真正得到益处。

解决思想问题、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式，就是既要团结同志，又要分清是非。在执行中存在的偏向，往往是有了这一头，就没有那一头。既分清是非，又团结同志，这是很大的艺术，这要有点本事，我们的同志一定要学会这个本事。可是很多地方一直没有搞好，有很多同志一直还没有学会这个本事。我们以后一定要把这两头都搞好，只有一头是不行的。

关于学习和整风的矛盾问题，你们准备把整风和理论学习结合起来，这样好。要力求两不误，既读了书，又整了风。只读书不解决思想问题，不整风，就是教条主义；只整风不读书，就可能犯经验主义。我们过去整风，读书少了一些，有的甚至没有读书，是个缺点。这一条是值得今天注意的。

既要读书，又要整风，两者如何兼顾？这要发动大家想想办法，努力做到两不误。

整风整什么？认真学习文件，联系实际，讨论问题，检查自己的思想。经过学习、研究和讨论，检查一下你自己是否把人民内部矛盾当成敌我矛盾？是否把敌我矛盾当成人民内部矛盾？是否不从六亿人民利益出发，搞宗派主义？就是要整这个风，联系个人思想问题，认真进行自我批评。在讨论中也要互相批评，彼此熟悉的同志，更

可以进行同志间的互相帮助和互相批评。

## 二

整风学习中研究讨论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问题是必要的。

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在过去表现为敌我矛盾，上层建筑和基础的矛盾也是如此。在今天社会主义社会里，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就表现为人民内部的矛盾（过去是资本家、地主、富农占有生产资料，现在是人民占有生产资料）。这种矛盾是非对抗性的，但处理不好，可以转化为对抗性的。社会主义社会的上层建筑不关心基础，不为基础服务，反而伤害基础，就是官僚主义。总是搞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势必搞成人民和官僚主义集团的矛盾，直到这种矛盾转化为对抗性的矛盾，人民就要起来推翻这个上层建筑。

现在，社会主义所有制基本上建立起来了，但还有问题，必须调整，经过调整，逐步巩固。那么，巩固了的社会主义所有制还有什么矛盾呢？也就是说，新建立的生产关系巩固之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还有什么矛盾呢？我想，这矛盾主要就表现在分配问题上。

社会主义所有制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全民所有制，一种是合作社集体所有制。这两种所有制虽然都是社会主义所有制，但有区别。分配是个很大的问题。两个集体的分配，可以有差别，比如这个合作社和那个合作社，这

个分配得多些，那个分配得少些，这问题不大；但在一个集体内，花费等量劳动而在分配上有差别就不行。全民所有制就更不同了，分配得稍微不好，就闹起来了。新工人、青年工人工资高了，老工人不满意，这部分生产力不满意，就不能促进这部分生产力的发展。积累和分配搞得不适当，势必阻碍生产力的发展。积累多了不行，少了也不行；分配多了不行，少了也不行。分配得不妥当也不行，工人、农民分配不当，就要闹事。非生产人员多，分配得多了，工人不满意，这种不满意就表示分配不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反而起阻碍作用。干部得奖金多了，工人不满意，这是分配问题；行政费开支多了，人民不满意，这也是分配问题；评级高低、工资多少不满意，不能就业、不能升学不满意，这些都是分配问题。其中，特别有一个问题，就是国家的领导人员分配过多，享受太多，形成特殊，人民不满。正因为是社会主义所有制，所以谁也想多分一点，可是谁也不能多分，多分了就不行，连我们这些人也包括在内，老资格也不行。管理国家财产的国家干部，本来是社会的公仆，可是不知不觉就变成了社会的主人。如果没有一定的限制，自己分配多了，享受高了，这至少是不尊重社会主义所有制，甚至可以说是违背社会主义所有制，以至破坏社会主义所有制。如果一个厂长、一个合作社的主任宣布这个厂、这个社是我的，这是不行的，要彻底动摇社会主义所有制是动摇不了的，破坏不了的。但是，自己多分一点，多享受一点，这实际上就是违背了或破坏了社会主义所有制。不实行全民所有制，就不了

业，升不了学，没有好房子住，没有车子坐，都没有话说，反正是因为你有钱，我没有钱。可是实行了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就必须统筹兼顾，适当安排，不这样便不行。当然，社会主义的总原则是按劳分配，但总要有道理可讲，才能说服群众。

社会主义所有制、社会主义分配，这个经济基础反映到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就是必须要有社会主义民主，让大家讲话，要大家满意，才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人民为了关心自己的经济生活，就一定要过问工资、住房、吃饭、坐车这些事。这就表现出社会主义社会人民民主的积极性高了。过去农民从来没有过问这些问题，可是现在全国农民都在过问这些问题，过问你国家干部、工人为什么比我收入多、生活好？社会主义所有制也有我们农民一份，为什么你们生活好，我生活不好？所有制最后是要表现到消费资料的占有上的，你分得多了，占得多了，这是不是侵犯全民所有制？这要大家好好想想。

以上所说的这些问题，在苏联教科书上是学不到的，我们要研究总结我们自己的经验。

研究社会主义经济，还要特别注意一个问题，就是使社会主义的经济，既要有计划性，又要有多样性和灵活性。苏联在这方面的教训是很值得我们注意的，他们只有社会主义经济的计划性，只讲究计划经济，搞得呆板，没有多样性、灵活性。

只注意社会主义经济的计划性，而不注意社会主义经济的灵活性和多样性，这怎么行呢？社会经济是各行

各业、多种多样的，只搞计划性，没有灵活性、多样性是不行的。我们的经济，就要求既有计划性，又有多多样性、灵活性。我们一定要比资本主义经济搞得更多样，更灵活。如果我们的经济还不如资本主义的经济灵活、多样，而只有呆板的计划性，那还有什么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呢？我们一定要使社会主义经济的多样性、灵活性超过资本主义，使我们人民的经济生活丰富多彩，更方便、更灵活。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请你们用较大的力量来研究好不好？

用什么办法达到这个目的？采取什么办法避免苏联那样只有计划性而没有灵活性和多样性，使经济生活丰富多彩，越搞越好呢？一个管理国家经济的总机关，要计划这样丰富、灵活的经济，要有什么办法呢？一个办法是要利用、限制自由市场。现在搞自由市场，私商钻社会主义的空子。不只商业上有自由市场，还有地下工厂，另外，农业上还有家庭副业、自留地。资本主义商业、工业和地下工厂会钻空子，当它一钻出空子的时候，我们社会主义经济就立即跟上去，它钻了空子搞这一样，我们跟上去也搞这一样，它钻几十万样，我们社会主义经济也跟上去搞它几十万样。自由市场可以补充国家市场的不足，对国民经济有好处，但也有破坏性。因此，就要采取利用和限制的政策，利用它搞社会主义经济的多样性，同时要限制它的破坏性。

另外，就是计划问题。不只中央搞计划，地方也要搞计划。每个省、县、乡、合作社，每个市、厂矿企业都要搞计划，甚至个人也要有计划。一定要有下面那样多的

小计划，和中央的计划互相调整。但只是计划调整还不行，还要利用价值规律。

所以说，社会主义经济的多样性、灵活性是个很大、很复杂的问题。我们要接受苏联的经验。苏联的社会，一去就可以感到经济生活中明显地缺乏多样性、灵活性。希望同志们好好地研究这个问题：要社会主义经济既有计划性，又有灵活性、多样性，丰富多彩。你们回去要大声疾呼地提倡大家注意这个问题，研究这个问题。整风学习中要把这些经济问题搞清楚后，再搞思想政治问题。

### 三

思想政治方面，最重大的问题就是共产党和群众的关系问题，就是共产党和工人、农民、学生、解放军战士、知识分子、各民主党派和少数民族等七方面的关系问题。要认真研究党和各方面的关系，学会正确地、妥当地处理这些关系。

这些问题，一般说起来，好像大家都懂得，没有争论。什么依靠工人阶级啰，依靠人民群众啰，什么有事和群众商量啰，什么群众路线啰，这一切，一般说起来，都好像没有什么争论，没有什么问题，但一到实际工作中，有些人就什么也没有了。特别是我们有一些部长啦，省长啦，县长啦，厂长啦，校长啦，乡长啦，往往是站到群众头上，什么依靠群众，和群众商量办事，都没有了。一听到讲闲话，就不满意。特别是有些工厂，搞一长制，一听到群众的闲

话就不高兴，就紧张，就追查，不但不采取倾听闲话、积极解决问题的态度，反而把矛盾扩大了。群众讲了闲话，你不解决问题，他进一步就登报、上书，还不解决问题，他就开会闹事。所以说，一个好的领导者，要善于听闲话。一听到闲话，就赶快要求群众正式讲话，使这种背后的闲话合法化。听了这些话，采取积极态度，分析是非，正确处理，就不会闹事。有些不正确的意见，不合理的要求，经过解释说服，群众还要闹事，还要请愿，也不要阻止。但我们可以和群众讲，你们请愿可派代表去，不要去这么多人。另外，你们要去，我们也陪你们去，一起到北京去讲道理。这样做不是就可以缓和地解决矛盾吗？否则，一开会就与群众处于对立的地位，听不得闲话，一听闲话就对立，一直发展到闹事，这样就使领导者自己把自己放到与群众对立的地位，把自己放到反人民的地位。

当然，群众的过高要求，不合理的要求，是不能应允、不能解决的，要耐心地向群众讲道理，说服群众。例如，所有工人都要房子住，包括家属，这是无法实现的；所有临时工都要变成正式工，这也是不行的。这样一些要求是不合理的，必须加以说服。要统筹安排，合理解决。下乡种地、等候就业，这都是安排，应向群众耐心地解释清楚。对群众的过高要求，只要做了工作，是会讲通的。例如，正定的地质部技工学校，招生时和学生订了合同，毕业后分配工作，可是到毕业时却又无法分配工作，结果闹出事来。先有合同，分配工作，后又不经过协商，废除合同，不分配工作，这样群众怎么能够满意呢？做不好工

作，群众自然要闹。像这样的问题，我们就要向群众解释，采取尊重群众的态度：一方面，要求群众体谅国家困难，不能把几十万技工都分配工作；同时又要向群众诚恳地承认错误，指出过去订了那样的合同，不经过协商便废除合同是错误的。这样做，一切问题便都解决了。

可是有些同志一遇到这样的问题，什么群众路线、人民民主，都没有了，就只有“老爷”。现在我们实际工作中，群众路线越搞越少了，特别是有一些厂长，还有一些学校的校长，搞一长制，搞得群众路线、人民民主都没有了。河南鲁山县一个中学的青年团干部提出“三同”（同吃、同住、同活动），搞得效果很好，密切了团和群众的关系。以后推广这个经验，又搞成“四同”（同吃、同住、同活动、同学习）。据说有些学校就接受不了，不愿意搞“四同”，只愿意坐在办公室。凡是坐在办公室里不愿意搞“四同”的，就会脱离群众，滋长官僚主义。所以说，党和群众的关系，是很重要的问题。整风就要大讲这些脱离群众的事实，要大家想一想。好多同志对这样一些脱离群众的事实熟视无睹，看一看就过去了。要学会听闲话，有的同志听不得闲话，特别是听到告状一类的事，就沉不住气了。看到茅房写了标语就去追查，当反革命问题搞。这样一些问题，都要在整风时想一想，检查检查。整风中就是要注意研究检查党和各方面群众的关系。

总之，两类矛盾——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对抗性矛盾和非对抗性矛盾，性质是不同的，解决矛盾的办法也是不同的。处理对抗性矛盾、敌我矛盾，是要采取你死



我活的办法来解决的；处理非对抗性矛盾、人民内部矛盾，就不需要采取你死我活的办法，可以采取妥协的办法。对这两种不同性质的矛盾和不同性质的处理矛盾的方针是不能混淆的，乱用了，用错了，就要犯错误。社会民主党、机会主义者就是用非对抗性质的方法去处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抗性矛盾，也就是说，用妥协的办法去处理敌我矛盾；而教条主义者则用对抗性的方法去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把人民内部矛盾弄成敌我矛盾。这样一个方针，我们不少同志是不懂得的，你们就要在这次整风学习中，运用辩证法好好研究这个问题。

学习了辩证唯物主义，就要运用辩证法，好好研究检查处理矛盾的方针，研究矛盾的斗争性和同一性，研究内因和外因。要知道外因的作用，在一定条件下，加上我们主观的力量，可以加强某种矛盾的斗争性，或者加强其同一性。凡是党内的矛盾，都是非对抗性的，但如加上挑拨离间、破坏党的活动，也可以把这种矛盾搞成对抗性的。所以说，矛盾虽然是客观存在，但我们的主观力量可以影响它，使它按照我们所需要的方向去发展。

在党校整风过程中，同志们不论有什么意见，都可以讲。对中央和中央各部门有意见可以讲，对地方有意见也可以讲，可以放手批评。但一定要从团结的愿望出发，实事求是，和风细雨，注意态度。不管有什么意见，这总是人民内部的矛盾，是同志间的矛盾，不应采取对立的态度，而应采取商量的态度，彼此爱护的态度。

根据《刘少奇论党的建设》刊印

# 中共中央关于各级领导人员 参加体力劳动的指示

(一九五七年五月十日)

今春以来，许多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干部纷纷参加田间劳动，若干地方的县区干部，有些省、市、自治区的负责同志和高级中级军官，也开始这样做。这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个有重大意义的事件。干部们参加生产劳动之后，并没有减弱领导工作，相反地，由于领导者参加生产劳动，同群众打成一片，有利于及时地、具体地发现和解决问题，有利于改进领导工作，从而可以比较容易地避免和克服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的许多错误，并且有利于改变社会上所存在的那种轻视体力劳动的观念。现在已经很少有人怀疑农业生产合作社干部参加田间劳动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但是有一些同志对于县、区、乡和县级以上的干部直接参加一部分生产劳动，还存有疑虑，认为会耽误领导工作。事实证明：这种疑虑是没有根据的。中央认为：不仅县、区、乡的干部，而且县级以上的各级党委的主要领导人员、在政府和人民团体中工作的党的主要干部，包括党的中央委员在内，凡是能够参加体力劳动的，都应该每年抽出一部分时间参加一部分体力劳动。县级以上的主要干部参加体力劳动的办法，可

以有多种多样。现在看来，大体上可以采取以下的一些办法：

(一)按照各机关和本人的各种具体条件，经常联系一定的生产单位或建设单位(农业生产合作社、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工厂、矿山、作坊、工地、商店、食堂，等等)，取得该单位的同意，在农民、工人、手工业者以及各种业务人员的指导下，自然地而不是勉强地，参加一些可能胜任的体力劳动，主要的是一些辅助性的简单劳动，例如，锄草，收割，拾粪挑粪，挑水挑土，清洁卫生，搬运材料，清理物资，等等。各项业务机关(包括企业在内)的主要管理人员，可以在本行业的基层单位参加。参加这些劳动，都应当遵守各该单位的劳动纪律，不要妨碍劳动者的劳动，不要影响生产的正常秩序；也都应当不领取任何报酬，不要影响劳动者的正常收入。

(二)到下面做考察工作的党的干部应当尽可能地~~可能~~在当地的一定生产单位参加体力劳动。由外地回家探亲的干部，也要尽量就地参加。

(三)在当地党政机关的领导下，同群众一起，参加一些公益事业的义务劳动，例如，清除街道，植树造林护林，修堤筑坝，修路，挖沟，清理废墟，等等。

(四)在本机关中参加种菜、喂猪以及其他可能从事的生产劳动或服务劳动。

以上办法由各级的党的少数主要干部首先做起，而后有次序地再组织较多的干部实行。年老体弱的干部都不要勉强地参加这些劳动。

党的领导人员参加体力劳动的活动，必须注意不致影响本机关的日常领导工作，不致拥挤在一时一地，不致增加基层单位的麻烦，不致增加国家财政的支出。因此，各级党委必须根据当地和本机关的具体情况，反复研究，同时必须同有关的生产单位和建设单位，充分协商，以便提出切实可行的方案，按人数、时间和具体的工作条件，分批分期地合理安排，力求避免形式主义和时冷时热的现象，并且随时总结经验，不断地对实施的方案加以修正和补充，使这种活动能够长期地坚持下去。

关于机关的一般干部、军队的干部和战士、学校的教职人员和学生参加体力劳动的问题，因为人数很多，牵涉较宽，须由行政部门、军队政治部和教育机关加以研究，拟出办法，但不要盲目地、无计划地推广，而是应当经过一部分人首先试行，取得经验，继续在自愿的基础上，逐步开展。

党中央委员会唤起全党同志注意：我们的党在三十多年中，同群众在一起，艰苦奋斗，赢得了伟大革命的胜利。现在大规模的群众性的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我们面前的艰巨的任务，是要把我国建成为一个伟大社会主义的具有现代工业和现代农业的国家。要实现这个任务，就必须继续发扬我们党联系群众、艰苦奋斗的传统。各级的领导干部参加一部分体力劳动，使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逐步结合，就是发扬这个优良传统的一个制度，也是当前整风运动要求达到的一个目的。在1927至1936年的十年内战时期，我们的党的干部和工农红军的指挥

员、战斗员，有许多人都曾经用一部分时间参加生产劳动。在抗日战争时期，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的部队、机关、学校曾经进行了群众性的生产运动，许多主要干部有的参加了农业劳动，有的参加了手工业劳动。这种生产运动大大地改善了领导者同群众的关系，加强了广大干部和广大知识分子的劳动观念，促进了当时各解放区人民的生产。现在有不少同志受旧社会剥削阶级的思想影响，忘记过去的这种优良传统，看不起体力劳动，滋长了一种贪图名利地位的习气，并且有一部分人只希望脱离生产，而在脱离生产以后即不愿意再回到生产中去。这是非常危险的倾向。党必须同这种倾向进行坚决的斗争。由于目前全国脱离生产的工作人员数量较多，不可能一下子全部参加体力劳动，除了全体基层干部需要立即积极地参加以外，在开始的时候，县级以上的单位还只能限于少数领导人员。但是，就原则上说来，一切共产党员，不论职位高低，资格新老，都应当把自己放在同普通劳动者的一样的、同等的地位；除了年龄太大、身体有病的以外，都应当准备将来参加能够胜任的一部分体力劳动。同时，党中央认为：在全国基层的生产单位、建设单位和党委、政府、人民团体的基层组织中，脱离生产人员的数目应当限制在真正需要的范围以内，凡是超过需要的，应当尽可能地减少。有许多单位（例如农业生产合作社）和组织（例如某些中小企业的党、团和工会这类基层组织），应当力求逐步地、有准备地做到没有完全脱离生产的人员，而在这些单位中的一切不需要脱离生产、但是已经脱离

生产的人员都应当回到生产中去，或者成为半脱离生产的人员，参加一部分可能的劳动。在基层以上的机关中的多余人员，能够回到生产中去的，应当回到生产中去，暂时不能回到生产中去的，也应当创造条件，在以后逐步回到生产中去。这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共产党员能否为党的总任务而奋斗的一种重大的考验。党中央委员会相信全党同志是能够经得起这种考验的。

根据一九五七年五月十五日  
《人民日报》刊印

## 事情正在起变化<sup>〔1〕</sup>

（一九五七年五月十五日）

毛 泽 东

对立面的统一和斗争，是社会生活中普遍存在的。斗争的结果，走向自己的反面，建立新的统一，社会生活就前进了一步。

共产党整风，是一个统一体两种作风之间的斗争。在共产党内部如此，在整个人民的内部也是如此。

在共产党内部，有各种人。有马克思主义者，这是大多数。他们也有缺点，但不严重。有一部分人有教条主义错误思想。这些人大多是忠心耿耿，为党为国的，就是看问题的方法有“左”的片面性。克服了这种片面性，他们就会大进一步。又有一部分人有修正主义或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思想。这些人比较危险，因为他们的思想是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他们向往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否定一切，他们与社会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几个月以来，人们都在批判教条主义，却放过了修正主义。教条主义应当受到批判，不批判教条主义，许多错事不能改正。现在应当开始注意批评修正主义。教条主义走向反面，或者是马克思主义，或者是修正主义。

就我党的经验说来,前者为多,后者只是个别的,因为他们是无产阶级的一个思想派别,沾染了小资产阶级的狂热观点。有些被攻击的“教条主义”,实际上是一些工作上的错误。有些被攻击的“教条主义”,实际上是马克思主义,被一些人误认作“教条主义”而加以攻击。真正的教条主义分子觉得“左”比右好是有原因的,因为他们要革命。但是对于革命事业的损失说来,“左”比右并没有什么好,因此应当坚决改正。有些错误,是因为执行中央方针而犯的,不应当过多地责备下级。我党有大批的知识分子新党员(青年团员就更多),其中有一部分确实具有相当严重的修正主义思想。他们否认报纸的党性和阶级性,他们混同无产阶级新闻事业与资产阶级新闻事业的原则区别,他们混同反映社会主义国家集体经济的新闻事业与反映资本主义国家无政府状态和集团竞争的经济的新闻事业。他们欣赏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反对党的领导。他们赞成民主,反对集中。他们反对为了实现计划经济所必需的对于文化教育事业(包括新闻事业在内的)必要的但不是过分集中的领导、计划和控制。他们跟社会上的右翼知识分子互相呼应,联成一起,亲如弟兄。批判教条主义的有各种人。有共产党人——马克思主义者。有括弧里面的“共产党人”,即共产党的右派——修正主义者。有社会上的左派、中间派和右派。社会上的中间派是大量的,他们大约占全体党外知识分子的百分之七十左右,而左派大约占百分之二十左右,右派大约占百分之一、百分之三、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依情况而不



同。最近这个时期，在民主党派中和高等学校中，右派表现得最坚决最猖狂。他们以为中间派是他们的人，不会跟共产党走了，其实是做梦。中间派中有一些人是动摇的，是可左可右的，现在在右派猖狂进攻的声势下，不想说话，他们要等一下。现在右派的进攻还没有达到顶点，他们正在兴高彩烈。党内党外的右派都不懂辩证法：物极必反。我们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他们越猖狂，对于我们越有利益。人们说：怕钓鱼，或者说：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现在大批的鱼自己浮到水面上来了，并不要钓。这种鱼不是普通的鱼，大概是鲨鱼吧，具有利牙，欢喜吃人。人们吃的鱼翅，就是这种鱼的浮游工具。我们和右派的斗争集中在争夺中间派，中间派是可以争取过来的。什么拥护人民民主专政，拥护人民政府，拥护社会主义，拥护共产党的领导，对于右派说来都是假的，切记不要相信。不论是民主党派内的右派，教育界的右派，文学艺术界的右派，新闻界的右派，科技界的右派，工商界的右派，都是如此。有两派最坚决：左派和右派。他们互争中间派，互争对中间派的领导权。右派的企图，先争局部，后争全部。先争新闻界、教育界、文艺界、科技界的领导权。他们知道，共产党在这些方面不如他们，情况也正是如此。他们是“国宝”，是惹不得的。过去的三反，肃反，思想改造，岂有此理！太岁头上动土！他们又知道许多大学生属于地主、富农、资产阶级的儿女，认为这些人是可以听右派号召起来的群众。有一部分有右倾思想的学生，有此可能。对大多数学生这样设

想，则是做梦。新闻界右派还有号召工农群众反对政府的迹象。

人们反对扣帽子，这只是反对共产党扣他们的帽子。他们扣共产党的帽子，扣民主党派左派中派和社会各界左派中派的帽子则是可以的。几个月以来报纸上从右派手上飞出了多少帽子呢！中间派反对扣帽子是真实的。我们对中间派过去所扣一切不适当的帽子都要取掉，以后也不要乱扣。在三反中，在肃反中，在思想改造中，某些真正做错了事，都要公开改正，不论对什么人的。只有扣帽子一事，对右派当别论。但是也要扣得对，确是右派才给他扣上右派这顶帽子。除个别例外，不必具体指名，给他们留一个回旋余地，以利在适当条件下妥协下来。所谓百分之一、百分之三、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的右派是一种估计，可能多些，可能少些。在各个单位内情况又互相区别，必须确有证据，实事求是，不可过分，过分就是错误。

资产阶级和曾经为旧社会服务过的知识分子的许多人总是要顽强地表现他们自己，总是留恋他们的旧世界，对于新世界总有些格格不入。要改造他们，需要很长的时间，而且不可用粗暴方法。但是必须估计到他们的大多数，较之解放初期是大为进步了，他们对我们提出的批评，大多数是对的，必须接受。只有一部分不对，应当解释。他们要求信任，要求有职有权，是对的，必须信用他们，必须给以权责。右派的批评也有一些是对的，不能一概抹杀。凡对的就应采纳。右派的特征是他们的政治

态度右。他们同我们有一种形式上的合作，实际上不合作。有些事合作，有些事不合作。平时合作，一遇有空子可钻，如像现在这样时机，就在实际上不想合作了。他们违背愿意接受共产党领导的诺言，他们企图摆脱这种领导。而只要没有这种领导，社会主义就不能建成，我们民族就要受到绝大的灾难。

全国有几百万资产阶级和曾为旧社会服务的知识分子，我们需要这些人为我们工作，我们必须进一步改善和他们的关系，以便使他们更有效率地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以便进一步改造他们使他们逐步地工人阶级化，走向现状的反面。大多数人一定可以达到这个目的。改造就是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之手段，达团结之目的。斗争是互相斗争，现在是许多人向我们进行斗争的时候了。多数人的批评合理，或者基本上合理，包括北京大学傅鹰教授那种尖锐的没有在报纸上发表的批评在内。这些人的批评目的，就是希望改善相互关系，他们的批评是善意的。右派的批评往往是恶意的，他们怀着敌对情绪。善意，恶意，不是猜想的，是可以看得出来的。

这一次批评运动和整风运动是共产党发动的。毒草共香花同生，牛鬼蛇神与麟凤龟龙并长，这是我们所料到的，也是我们所希望的。毕竟好的是多数，坏的是少数。人们说钓大鱼，我们说锄毒草，事情一样，说法不同。有反共情绪的右派分子为了达到他们的企图，他们不顾一切，想要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刮起一阵害禾稼、毁房屋的七级以上的台风。他们越做得不合理，就会越快地把他们

抛到过去假装合作、假装接受共产党领导的反面，让人民认识他们不过是一小撮反共反人民的牛鬼蛇神而已。那时他们就会把自己埋葬起来。这有什么不好呢？

右派有两条出路。一条，夹紧尾巴，改邪归正。一条，继续胡闹，自取灭亡。右派先生们，何去何从，主动权（一个短期内）在你们手里。

在我们的国家里，鉴别资产阶级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政治上的真假善恶，有几个标准。主要是看人们是否真正要社会主义和真正接受共产党的领导。这两条，他们早就承认了，现在有些人想翻案，那不行。只要他们翻这两条案，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没有他们的位置。那是西方世界（一名自由国家）的理想，还是请你们到那里去吧！

大量的反动的乌烟瘴气的言论为什么允许登在报上？这是为了让人民见识这些毒草，毒气，以便锄掉它，灭掉它。

你们这一篇话为什么不早讲？为什么没有早讲？我们不是早已讲了一切毒草必须锄掉吗？

你们把人们划分为左、中、右，未免不合情况吧？除了沙漠，凡有人群的地方，都有左、中、右，一万年以后还会是这样。为什么不合情况？划分了，使群众有一个观察人们的方向，便于争取中间，孤立右派。

为什么不争取右派？要争取的。只有在他们感到孤立的时候，才有争取的可能。现在，他们的尾巴跷到天上去了，他们妄图灭掉共产党，那肯就范？孤立就会起分

化,我们必须分化右派。我们从来就是把人群分为左、中、右,或叫进步,中间,落后,不自今日始,一些人健忘罢了。

是不是要大“整”?要看右派先生们今后行为作决定。毒草是要锄的,这是意识形态上的锄毒草。“整”人是又一件事。不到某人“严重违法乱纪”是不会受“整”的。什么叫“严重违法乱纪”?就是国家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受到严重的损害,而这种损害,是在屡戒不听一意孤行的情况下引起的。其他普通犯错误的人,更加是治病救人。这是一个恰当的限度,党内党外一律如此。“整”也是治病救人。

要多少时间才可以把党整风任务完成?现在情况进展甚快,党群关系将迅速改善。看样子,有的几星期,有的几个月,有的一年左右(例如农村),就可完成。至于学习马克思主义,提高思想水平,那就时间要长些。

我们同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的又团结又斗争,将是长期的。但有两三个五年计划,估计也就差不多了。共产党整风告一段落之后,我们将建议各民主党派和社会各界实行整风,这样将加速他们的进步,更易孤立少数右翼分子。现在是党外人士帮助我们整风。过一会我们帮助党外人士整风。这就是互相帮助,使歪风整掉,走向反面,变为正风。人民正是这样希望于我们的,我们应当满足人民的希望。

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提供的原件刊印

## 注 释

〔1〕 这是毛泽东写的一篇文章,题目原为《走向反面(未定

稿)》，署名为“本报评论员”。在审阅第一次清样稿时，毛泽东将题目改为《事情正在起变化》，署名改为“中央政治研究室”。六月十二日，此文印发党内。毛泽东在看已经印发的这篇文章时，又将署名改为“毛泽东”，时间定为一九五七年五月十五日。此文后来编入《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于一九七七年四月第一次公开发表。

# 中共中央关于对待当前 党外人士批评的指示

(一九五七年五月十六日)

各省委、直属市委、自治区党委，各中央直属部委首长，各国家机关和人民团体的负责同志：

自从展开人民内部矛盾的党内外公开讨论以来，异常迅速地揭露了各方面的矛盾。这些矛盾的详细情况，我们过去几乎完全不知道。现在如实地揭露出来，很好。党外人士对我们的批评，不管如何尖锐，包括北京大学傅鹰化学教授在内，基本上是诚恳的，正确的。这类批评占百分之九十以上，对于我党整风，改正缺点错误，大有利益。从揭露出来的事实看来，不正确地甚至是完全不合理地对党外人士发号施令，完全不信任和不尊重党外人士，以致造成深沟高墙，不讲真话，没有友情，隔阂得很。党员评级、评薪、提拔和待遇等事均有特权，党员高一等，党外低一等。党员盛气凌人，非党员做小媳妇。学校我党干部教员助教讲师教授资历低，学问少，不向资历高学问多的教员教授诚恳学习，反而向他们摆架子。以上情况，虽非全部，但甚普遍。这种错误方向，必须完全搬过来，而且越快越好。无论文教界和其他方面，凡态度十分恶劣，已为多数群众所不信任的同志应当迅速调动工作，

以党外资历深信誉好的人员充任，或以胜任的党员充任，以利团结党内外，改进工作。最近一些天以来，社会上有少数带有反共情绪的人跃跃欲试，发表一些带有煽动性的言论，企图将正确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巩固人民民主专政、以利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方向，引导到错误方向去，此点请你们注意，放手让他们发表，并且暂时（几个星期内）不要批驳，使右翼分子在人民面前暴露其反动面目，过一个时期再研究反驳的问题。这一点，五月十四日我们已告诉你们了。为了研究问题，请你们多看几种报纸。有些地方例如上海党外批评相当紧张，应当好好掌握形势，设法团结多数中间力量，逐步孤立右派，争取胜利。

中 央

一九五七年五月十六日

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提供的原件刊印



# 中共中央批转李富春、薄一波 《关于解决目前经济建设和文化 建筑方面存在的一些问题的意见》

(一九五七年五月十九日)

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央各部，国家机关各党组，军事各部门：

现将李富春、薄一波同志《关于解决目前经济建设和文化建筑方面存在的一些问题的意见》的报告，发给你们，请你们认真地加以研究。中央认为这些意见很重要。我们要在今年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并且为第二个五年计划作好准备。过去四年中，在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方面，虽然取得了很大成绩，但是暴露的严重问题也很多。报告中所揭发的各种不合理现象，在全国带有普遍性，如建设用地过大，建设标准过高，各搞一套，等等。这些巨大浪费的现象，必须坚决加以纠正。请你们在目前展开的整风运动中，发动各地方、各企业、事业基层单位的职工群众和党内外的技术人员，彻底揭发各种不合理的和严重浪费的现象；同时，还应组织力量，抓住重点，进行系统的检查，改变当前大多数单位迟疑不决、不敢动手的状

态。报告中所提出的各项建议,都可参考。有些意见应立即实行,如退还多余建设用地,降低建筑标准,停止扩大中等技术学校等。有些意见,需要慎重研究以后,才能定出办法,如训练工人办法,工人休假制度,加强基层领导力量等问题。请你们将检查的结果,作出总结,报告我们。

中 央

一九五七年五月十九日

## 关于解决目前经济建设和 文化建筑方面存在的一些 问题的意见

(一九五七年五月一日)

中央并主席:

我们在西安、成都期间,同有关方面接触中,看到各种建设事业蓬蓬勃勃地发展景象,非常兴奋。但同时也发现在经济建设和文化建筑方面普遍存在以下一些问题,须要加以解决。

(一)建设用地过大。例如,西安在最近几年间共拨出建设用地七、二〇〇公顷(一〇·八万亩),等于解放前西安市区面积的五·五倍。由于“人防”标准规定的不适当,厂与厂之间的距离一般是六〇〇公尺,工厂和住宅区之间的距离则在数百公尺到一公里以上。在厂区建设方

面，建筑物占用的土地一般只有百分之二十五左右，个别的只占百分之四·六；其他则为绿化地带和预留地带；有不少工厂，不仅预留了近期发展余地，而且预留了远期发展余地；不仅整个工厂预留了发展余地，而且许多车间也预留了发展余地；以致在厂区内车间和车间之间的距离也摆得太稀。甚至一些国防工厂还在厂区周围圈出所谓“警戒地带”“松土足迹检查地带”等等，很明显，这是适用于对付敌我矛盾的设施，而不适用于人民内部。根据第二机械工业部的检查，该部在西安地区的工厂，如按原设计的建设用地计算，约有一半左右是多余的。在学校和其他部门的建设用地方面，也有严重的浪费现象，用地标准高，而且也留有发展余地。如重庆有一个专科学校，学生只有一、〇〇〇人，而占地则达二四〇亩。在住宅区的建设用地方面，西安城市远景规划采用的定额是每人居住面积九平方公尺，用地面积每人平均七十六平方公尺，其中绿化用地十五平方公尺。在我们这样一个地少人多的国家里，这样的标准，不仅现在是不适当的，在将来肯定也是不适当的（这些标准定额许多都是中央有关部门规定或者批准的，应予审查修改或者取消）。此外，在建设中任意荒芜土地的现象，也很严重。例如，四川省委最近检查了十四个建设单位用地的情况，其中多征少用，早征迟用，征而不用，荒芜浪费的土地，即占全部征用的建设用地的百分之四十。一般说来，建设用地都是当地最肥沃的土地，浪费建设用地，不仅减少农业产量，引起农民群众的严重不满（农民说：“土地像豆腐，他们（指建设

单位)像菜刀,想切那块,就切那块”),造成国家与农民争地的很大矛盾。而且增加厂内厂外,校内校外,上下水管道、道路以及城市其他公用事业的建设投资,增加将来生产和管理的费用,并给居民生活带来种种不便。

(二)建设标准过高。国外设计的工厂,厂房建筑的高度,一般不低于六公尺,厂房前的生活间占用的面积过大。有的厂房过大,机器安得很稀,生产面积的利用率很低。设备过多、过好,有些设备一年只用几小时(如西安飞机发动机附件厂有一台精密磨床,一年只用三、五次,而购买这台磨床的费用则是十六万元)。在大学建设方面,常常是按数千人、甚至一万人的规模建设,每个学生平均占用的建筑面积,高达四十平方公尺以上(成都电讯工程学院学生一、八三八人,建筑面积达七六、二一五平方公尺)。学校的设备也太好。中等技术学校、技工学校 and 医院的建筑面积和设备也普遍偏高,偏多。在住宅建设方面,每平方公尺的造价从五十元到九十元不等,甚至在丛山峻岭穷乡僻壤的矿区,也是如此。高出当地居民住宅的造价达十倍左右。只看到成都工具厂的简易办公室和宿舍,每平方公尺的造价是八元到十二元,可用十年,这是请当地农民帮助盖的,一般印象颇好。据厂长说,这些建筑物,原来计划要拆掉重建的,但在中央提出勤俭建国方针,特别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报告后停下来了。这种住宅,在目前是很少的,应该大量提倡。同时,在建设住宅的时候,不区别集体宿舍或家属宿舍,齐头并进地建设,而且过多地修建了职工家属住宅,特别是去年。把上

人家属完全包下来并实际奖励一齐搬进城来的办法，肯定是错误的：1、促进城市人口猛烈增加；2、减少农村劳动力，变劳动者为消费者；3、大量消耗国家建设资金。这种情况是难以为继的。我们拟另外提出意见。不少工厂还没有开工生产，工人还没有达到设计定额，而家属已经将宿舍挤满了。因此，城市住房问题，愈来愈加严重。例如，建筑工程部所属企业本是流动性较大的，而且有不少是临时工人，但该部西安工程局的五·一万职工中，即有二·三八万户带有家属，并由公家解决其住房问题。

(三)每个建设单位都要求“全能”“单干”，真是“机器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其中最突出的是都建设同样的辅助车间和试验室。例如，第二机械工业部在西安建设的十一个工厂，都有近代化的木工车间和机修车间，仅木工车间所占的厂房面积相加，即达七万平方公尺，生产能力根本不能充分利用。又如，重庆和成都地区的机械加工能力，在目前本有剩余，但是在这里的森林、地质、石油、冶金部地质局和其他部门，还在不断地建设修配工厂（其他地区都有同样情况，我们还未看）。在试验室的建设方面，有些生产单位不利用当地科学研究机构和大专学校以及有关生产部门的试验室和技术人员，而另搞一套的做法，也是很普遍的。

(四)中等技术学校发展过多和建设标准过高。例如在西安市即有三十八个中等技术学校，中央很多部门都在那里设有技术学校。以二机部为例，他们的技术学校，一般都是“占地十公顷，投资四百万，设备一百台”（有的

比这个规模还大),规模宏大,浪费很多。至于工业各部所设的技工学校,浪费也是很大的。如二机部在成都的两个无线电工厂的技工学校(即闹事闻名的两个学校,我们去访问了),同大学的建筑和设备相差无几,而教学质量则很差,教员多是二、三级工人,学员是初中毕业生,学生们反映:在技工学校学习了两年,还不如在初中一年所学的东西多,学校的教职员则比初中多得多,既浪费了国家的资金,又浪费了他们的青春。我们看到学生是好的,这样的领导确实成问题。干部领导不了学生,加上摆老资格,官僚主义,使得问题无法解决,学生则学不到本领,这就造成很多矛盾。

新的电影院、商店等也修建过多过大,标准过高,均远远超过国民党时代的建筑标准,而最不合理的是把许多电影院、剧院、商店等都建筑在远离工人住宅区的城市中心(如西安),利用率很低。

(五)经济部门,特别是工业企业的基层干部过弱,如西安的两个航空附件工厂,各有职工五千人左右,设备是完全现代化的,在苏联目前也很少有这样的企业。但是这两个工厂的厂长都是小学毕业。这些同志,虽然都经过十多年革命战争的锻炼,但是,他们缺乏必要的科学知识,缺乏组织现代化大生产的经验,缺乏对工人生活习惯的了解,在工作上感到很吃力。而工厂的党委书记,一般比厂长还弱一些。像这种情形,在其他经济部门的基层单位中也是存在的。如不改变这种状况,加强企业的领导力量(主要是厂长和党委书记),就不可能在根本上改

善经济工作的领导。

根据上述情况,我们建议:

(1)严格控制建设用地。今后在城市规划、建筑设计和建筑用地管理等方面,必须严格注意节约土地。各建设单位多占的和占而不用的土地,必须立即退还农民耕种;预留的“发展余地”,能转交农民使用者,也应一律退还给农民。鉴于目前各城市所拟的城市规划草案,普遍存在规模过大和标准过高的缺点,必须加以修订,才能再拨新的基建用地。在新的城市规划未定之前,某些单位急需建设用地时,则由当地人民委员会在现有的建筑空地中拨给。但是,建设单位在提出用地计划时,必须根据节约原则,用多少征多少。可用可不用者,决不征用。暂时不施工的,也不征用。分期分批施工的,则分期分批征用。对于被征用土地的农民,要充分地进行教育,并在生活上和工作上给以妥善的安置。

(2)适当降低建设标准。在以建设中、小型企业为主,并以自力设计、自力制造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下,适当降低厂房的建设标准,压缩设备数量,和降低自动化、机械化的程度。在住宅建设标准方面,在城市原则上应降低到当地居民一般的住宅水平,在矿区,原则上应降低到同当地农民的住宅水平差不多。

(3)在城市的住宅建设方面,应集中力量解决职工的集体宿舍,职工的家属宿舍,则原则上不再兴建,由现有的城市住宅中适当调剂。为了减少职工家属进城居住,并动员现在城市居住的职工家属下乡,请考虑是否建立

职工的定期休假制度（在不增加人员和不降低劳动生产率的条件之下）修改或改变某些刺激职工家属进城的劳保福利制度（如房租补贴、困难户的补贴等等），适当提高房租。与此同时，应把目前由各企业、事业单位分别建设住宅的办法，改由各地方政府统一建设，统一出租；多建一些适合职工生活的旅馆和公寓，以便职工家属到城市探亲者临时租用；并且还可以组织职工自建一些住宅。鉴于目前在全国范围内统一调配职工的办法，不仅在调遣上造成许多浪费，而且是造成职工家属向城市集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在今后除某些地广人稀的新工业区，和某些特殊的技术干部和工人视情况可由全国统一调配之外，一般应尽可能实行地方化。

（4）今年各单位计划建设的修理厂，机修和木工等辅助车间以及试验室等，凡未动工者，应一律停建。已经动工的，应改作它用。所有这些修理厂、辅助车间和试验室所需的设备，应调剂给更急需的单位使用。这些单位的机修、木工和试验的任务，则由当地的党委和政府组织有关部门现有的生产能力和试验机构协作解决。今后，只有在当地或者附近地区没有同类辅助车间和试验机构可资协作时，才得建设这种项目，但须经国家经委和当地人民委员会批准。

（5）现有的中等技术学校和技工学校一律停止扩大；未动工的一律停止建筑；某些学校，因受劳动计划限制，减少或停止招生的，应将多余校舍拨给当地大学或中学使用，或改为小型工厂，并建议劳动部迅速研究从明年



起停止用技工学校训练工人的办法。

(6)加强经济部门基层组织的领导力量。下决心抽调一部分现在集中在北京的副部长、部长助理、司局长、副司局长,到大的工厂、矿山、地区管理局、大的公司、和大的商店担任厂长(经理)或者党委书记,在这方面,地方党委下放干部的工作是做得较多的,而财经部门是相对的落后了。

(7)城市的公共和服务性的建筑(包括商店、电影院、旅馆、银行、邮电局等等)应该大大的降低建筑标准,因陋就简面向群众,如果须新建的时候,亦应注意分布均匀,不要完全建在市中心,而应分别建筑在工厂区域。

总之,目前各个建设单位虽然都在开始考虑如何执行党的勤俭建国的方针,但是由于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作祟,真正行动起来的还是不多。大多数单位是想动而又迟疑不决,生怕本部门、本单位缩小建设规模、降低建设标准和削减某些辅助性的生产车间之后吃了亏。他们不是同外国的最高标准比,就是同别的标准更高的部门比,而不从当前我国经济的实际情况和人民当前的迫切需要出发。他们对那些因陋就简、艰苦奋斗的工厂、企业、学校、事业(主要是过去私人经营留下来的和地方的工厂、企业、学校、事业)是不在话下,瞧不起,也有一些同志不顾中国实际情况,尽量抄袭外国,甚至外国还在讨论或尚未实行的东西,也搬来了。总是规模愈大愈好,标准愈高愈好,设备愈是外国的愈好,投资愈多愈好。花钱非常慷慨,不精打细算,动辄提出百万元、千万元

的投资计划,至于几千元、几万元,是根本看不上眼的。这种对人民流血流汗积累起来的建设资金漠不经心、随意滥用的“大少爷”作风,是勤俭建国的大敌,是工业化的大敌,是当前经济建设各部门干部中存在着的一种极端危险而又相当普遍的思想,它不仅腐蚀着一部分干部的思想,而且加深着人民内部的矛盾。对于这种错误思想,应当通过整风运动,在总结经验,教育干部的基础上,加以严肃地批判和纠正。

李 富 春

薄 一 波

一九五七年五月一日

根据中共中央文件刊印

# 中共中央关于组织力量 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sup>(1)</sup>

(一九五七年六月八日)

上海局，各省委、市委，内蒙古自治区党委：

省市级机关和高等学校大放大鸣的时间，大约十五天左右即足。反动分子猖狂进攻。党团动摇分子或者叛变出去，或者动摇思叛。广大党团积极分子及中间群众起而对抗。以大字报为战斗武器，双方在斗争中取得经验，锻炼人才。反动分子人数不过百分之几，最积极疯狂分子不过百分之一，故不足怕。不要为一时好似天昏地暗而被吓倒。反动分子将到本机关本学校以外的工厂学校去活动，要预作布置，实行挡驾。要召集工厂主要干部及老工人开会，说明有一些不好的资本家，不好的知识分子及社会上的反动分子正在向工人阶级及共产党猖狂进攻，要推倒工人阶级领导的政权，切记不要上他们的当。有人煽动，实行挡驾。街上贴反动标语，动员群众撕毁。工人要看清大局，不要闹事情。在此期间，不要提出福利工资等问题，一致对付反动派。请你们注意各民主党派中反动分子的猖狂进攻。要组织每个党派自己开座谈会，左中右的人都参加，正反两面意见都让其暴露，派记者予以报道。我们巧妙地推动左中分子发言，反击右派。此

事很有效。每个党报均要准备几十篇文章，从当地高潮开始跌落时起，即陆续发表。注意组织中左派写文章。但在高潮未落前，党报正面文章少登（可以登些中间派文章）。大字报必须要让群众反驳。高等学校组织教授座谈，向党提意见，尽量使右派吐出一切毒素来，登在报上。可以让他们向学生讲演，让学生自由表示态度。最好让反动的教授、讲师、助教及学生大吐毒素，畅所欲言。他们是最好的教员。到了适当时机，则立即要组织党团员分组开会，分别那些是建设性的批评，加以接受，并改正自己的错误缺点。那些是破坏性批评，予以反驳。同时组织一些党外人士讲演，讲正面话。然后由较有威信的党的负责人做一个有分析有说服力的总结性演说，将空气完全转变过来。整个过程，做得好，有一个月左右就够了，然后转入和风细雨的党内整风。这是一个伟大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只有这样做，我党才能掌握主动，锻炼人才，教育群众，孤立反动派，使反动派陷入被动。过去七年，我们形式有主动，实际上至少有一半是假主动。反动派是假投降，中间派的许多人也不心悦诚服。现在形势开始改变，我们形式上处于被动，实际上开始有了主动，因为我们认真整风。反动派头脑发胀，极为猖狂，好似极主动，但因他们做得过分，开始丧失人心，开始处于被动。各地情况不同，你们可以灵活运用策略，灵活做出部署。总之，这是一场大战（战场既在党内，又在党外），不打胜这一仗，社会主义是建不成的，并且有出匈牙利事件的某些危险。现在我们主动的整风，将可能的匈牙利

事件主动引出来，使之分割在各个机关各个学校去演习，去处理，分割为许多小匈牙利，而且党政基本上不溃乱，只溃乱一小部分（这部分溃乱正好，挤出了浓疱），利益极大。这是不可避免的，社会上既有反动派存在，中间分子又未受到现在这样的教训，党又未受到现在这样的锻炼，乱子总有一天要发生。现在国内形势很好，我们能够巩固地掌握工农党政军及大多数学生。国际形势很好，美国处在困难地位。

中 央

一九五七年六月八日

根据中共中央文件刊印

## 注 释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党内指示。对反右派斗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作了这样的论断：“在整风过程中，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鼓吹所谓‘大鸣大放’，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放肆地发动进攻，妄图取代共产党的领导，对这种进攻进行坚决的反击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但是反右派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了，把一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内干部错划为‘右派分子’，造成了不幸的后果。”一九五九年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分期分批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指示，到一九六四年，先后五批给被划为右派分子的大多数人摘掉了右派帽子。一九七八年四月中共中央决定全部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从同年九月至一九八一年年底，基本上复查改正了被错划为右派分子的案件。

## 这是为什么？

（一九五七年六月八日《人民日报》社论）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委员、国务院秘书长助理卢郁文因为5月25日在“民革”中央小组扩大会议上讨论怎样帮助共产党整风的时候，发表了一些与别人不同的意见，就有人写了匿名来信恐吓他。这封信说：“在报上看到你在民革中央扩大会议上的发言，我们十分气愤。我们反对你的意见，我们完全同意谭惕吾先生的意见。我们觉得：你就是谭先生所指的那些无耻之徒的‘典型’。你现在已经爬到国务院秘书长助理的宝座了。你在过去，在制造共产党与党外人士的墙和沟上是出了不少力量的，现在还敢为虎作伥，真是无耻之尤。我们警告你，及早回头吧！不然人民不会饶恕你的！”

在共产党的整风运动中，竟发生这样的事件，它的意义十分严重。每个人都应该想一想：这究竟是因为什么？

卢郁文在5月25日的发言中讲了些什么呢？归纳起来，一是告诉人们不要混淆资产阶级民主和社会主义民主，不要削弱和取消共产党的领导；二是说国务院开会时应该有事先准备好的文件，以便讨论，免得像资产阶级国家的议会一样每天争吵，议而不决，不能说就是形式主义，就是不让大家讨论；三是说他自己同共产党员相处得

很融洽，中间没有墙和沟；如果有些人和党员中间有了墙和沟，应该“从两面拆、填”，双方都要主动；四是说共产党人对某些批评可以辩驳，这种辩驳不能认为是报复打击；五是对党外人士如何实现有职有权的问题提供了一些具体意见。我们和许多读者一样不能不问：发表这样实事求是、平易近人的意见，为什么就是“为虎作伥”，“无耻之尤”？为什么要“及早回头”，否则就“不会饶恕你”？

把卢郁文的发言说成“为虎作伥”，共产党当然就是写信者们心目中的“老虎”了。共产党在领导中国人民对中国人民的死敌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作战的时候，的确和老虎一样勇猛，没有任何力量可以使它畏惧，屈服。但对中国人民来说，共产党却是最好的朋友：它帮助人民推翻了压着人民身上的反革命势力，帮助人民收回了土地、工厂等生产资料，使人民摆脱了剥削阶级的残酷压榨，把自己的历史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现在正朝着人民富裕、人民幸福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远大目标迈进。最广大的人民从来没有像在共产党领导的时代这样充满光明的希望和生的乐趣。共产党也犯过错误，也有缺点，共产党的整风运动正是要整掉这些错误和缺点。一切对党和社会主义事业抱有善意的人们，都在积极地提意见帮助共产党整风，以便加强社会主义事业，巩固党对于人民群众的领导。在这样的时候，却有人把维护社会主义民主、维护共产党的领导权的言论称为“无耻之尤”，“为虎作伥”，把共产党人比作可怕的吃人的“老虎”。这种人的政治面目，难道还能不引起人们的警惕么？这些人警告卢

郁文“及早回头”，请想想他们所说的，究竟是向什么地方“回头”？当然，这些人在另外的地方，口头上也会说他们怎样才是真正拥护社会主义，拥护共产党云云。但是，难道还能相信对劳动人民的先锋队如此仇视的人们，是在那里帮助共产党整风，是在那里拥护社会主义事业么？

我们所以认为这封恐吓信是当前政治生活中的一个重大事件，因为这封信的确是对于广大人民的一个警告，是某些人利用党的整风运动进行尖锐的阶级斗争的信号。这封信告诉我们：国内大规模的阶级斗争虽然已经过去了，但是阶级斗争并没有熄灭，在思想战线上尤其是如此。革命的老前辈何香凝先生说得好：“今天是新时代了，在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我们走上社会主义。难道在这个时代，也就一切都是清一色，再也不会再有左、中、右了吗？不会的。”她指出，有极少数人对社会主义是口是心非，心里向往的其实是资本主义，脑子里憧憬的是欧美式的政治，这些人就是今天的右派。在“帮助共产党整风”的名义之下，少数的右派分子正在向共产党和工人阶级的领导权挑战，甚至公然叫嚣要共产党“下台”。他们企图乘此时机把共产党和工人阶级打翻，把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打翻，拉着历史向后倒退，退到资产阶级专政，实际是退到革命胜利以前的半殖民地地位，把中国人民重新放在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反动统治之下。可是他们忘记了，今天的中国已经不是以前的中国，要想使历史倒退，最广大的人民是决不许可的。在全国一切进行整风运动的地方，这些右派分子都想利用整风运动使共产党



孤立，想使拥护社会主义的人孤立，结果真正孤立的却是他们自己。在各民主党派和高级知识分子中，有少数右派分子像卢郁文所说，还想利用辱骂，威胁，“装出‘公正’的态度来钳制”人们的言论，甚至采取写恐吓信的手段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但是这一切岂不是做得太过分了吗？物极必反，他们难道不懂得这个真理吗？

非常明显，尽管有人叫共产党“下台”，有人向拥护共产党的人写恐吓信，这些决不会使共产党和人民群众发生任何动摇。共产党仍然要整风，仍然要倾听党外人士的一切善意批评，而人民群众也仍然要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坚持社会主义的道路。那些威胁和辱骂，只是提醒我们，在我们的国家里，阶级斗争还在进行着，我们还必须用阶级斗争的观点来观察当前的种种现象，并且得出正确的结论。

## 不平常的春天<sup>〔1〕</sup>

（一九五七年六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社论）

1957年的春天，对于我国的政治界和知识界说来，是一段不平常的时间。

2月27日，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作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演。这篇讲演虽然到现在才发表，但是它的内容早已在社会各界人士中间传布了。这篇讲演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阐明了我国在所有制方面基本上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以后所面临的一系列根本问题。它对于提高我国人民的觉悟，巩固我国人民的团结，推进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健康的发展，无疑将产生深刻的久远的影响。我们且不说遥远的将来，只从2月底到6月中这短短一段时间来观察一下，就已经可以看出它所提出的方针的威力来了。

由于系统地提出了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针，由于透彻地说明了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方针，由于在这个基础上开始了党的整风运动，我国的政治生活在过去一个时期内进行得特别活泼起来了。在一方面，人民群众对于党和政府的工作，提出了大量的积极的批评和建议，促使党和政府积极地采取步骤改进自己的工作，加强自己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在另一方面，某些对社会

主义事业心怀不满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也竭力利用党所提出的口号，来扩张自己的影响，争取自己的地位。三个多月的发展，比平常状态下的三年还快；三个多月给予人们的教训，比平常状态下的三年还丰富。

如果群众有意见不能够畅所欲言，党和政府怎么能够这样迅速地发现和克服自己的缺点呢？同样，如果人们的错误的以至反动的思想得不到充分表露的机会，群众又怎么能够这样清醒地识别他们的面貌，怎么能够起来纠正他们，批驳他们呢？

对于毛主席代表党中央所提出的方针，各种人的反映是不同的。广大群众热烈地拥护这个方针，因为它支持了群众在社会主义事业中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使得党和群众的联系加强了。党的联系群众的有政治远见的骨干分子坚决地执行这个方针，他们懂得这个方针将大大地促进党的工作的改善，保证党取得真正的主动，保证党对于大多数群众的团结。但是党内也有一部分人曾经怀疑甚至反对这个方针，他们害怕这将要引起天下大乱，或者因为他们沾染着比较浓厚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的习气，害怕受到群众的攻击。这一部分人落到了客观事物运动的后面，只是依靠党的教育改正了自己的错误观点，才能跟上历史的脚步。

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是另一种情形。他们对于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是不甘心的。匈牙利事件加强了他们的一种想像：在所有制方面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基础的国家，仍然可以推翻，可以变质。同人民群众相反，他们不

但不把毛主席的讲演看作是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武器，而且想入非非，以为可以利用它来作为削弱社会主义制度的工具。为了削弱社会主义制度，他们的第一个步骤是削弱共产党对于国家工作的领导。因此，他们要求共同领导，或者要求共产党在某些范围内退出领导。他们竭力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口号解释得适合于他们的目的，并且积极地在民主党派、知识分子、工商业者和青年学生中收集他们的支持者。5月间，共产党开始整风，而且要求党外人士帮助党的整风。他们认为机会来了。他们在帮助党整风的名义之下，不但夸大党的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造成一种只许讲缺点错误、不许讲优点成绩的空气，而且把官僚主义说成是社会主义的产物和代名词，把宗派主义说成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产物和代名词，把主观主义教条主义说成是马克思主义的产物和代名词，向社会主义制度和党的领导展开了猖狂的进攻。党根据群众的革命觉悟应该在斗争的风雨里培养而不应该在温室里培养的原则（这个原则在毛主席的讲演中反复宣布过），决定暂时不给予回击，让群众充分认识他们的面目，以便增长见识，得到教训。这样，他们的头脑更热了。在他们看来，简直到处都在反对党！简直就是匈牙利事件的前夕！简直非请他们出来挽救危局或者收拾残局不可！

结果如何呢？

同害怕者的预料相反，也同高兴者的预料相反，天下并没有大乱。向社会主义进攻的人们发现，被群众包围

的并不是共产党，而是他们自己。在这里，事情本来是非常清楚、毫无奥妙的，因为在全中国，拥护社会主义的本来是绝大多数，社会主义运动本来是绝大多数人的运动，向绝大多数人挑战怎么能不身陷重围呢？资产阶级右派先生们，你们把中国人民几十年的革命史看作儿戏，把中国人民八年的建设史看作儿戏，把党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和党在人民群众中的高度威信看作儿戏，而且在估计力量对比的时候，连人口中占1%的人和占99%的人究竟哪一边人多力量大，都算不清。你们这样怎么能不犯错误呢？

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犯了错误，是不是由于没有事前的警告？不是如此。我们且不说人民为了选择社会主义道路，选择共产党的领导，曾经经历过多么严重的斗争；且不说宪法怎样确定了我们国家的性质；且不说匈牙利事件的结局是怎样的，以及中国共产党人从匈牙利事件得出了怎样的教训（《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对于这一点已经说得够详细了）。就在毛主席的讲演里，也明明说着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本来是对抗性的矛盾，如果资产阶级不接受工人阶级的政策，两者之间的矛盾仍然会变成敌我之间的矛盾；也明明说着我们必须拒绝资产阶级民主制和无政府主义，必须坚持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民主，坚持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也明明说着否认肃反工作的巨大成绩是完全错误的，否认农业合作化的胜利和农民生活的改善是完全错误的；也明明说着资产阶级分子还有两面性，还需要继续改造；也明明

说着知识分子还需要继续改造，还需要加强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教育；也明明说着对于错误的意见必须批判，而马克思主义也必须在同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作斗争中间得到发展。所有这一切，难道不是十分明白确定的吗？难道有什么人说过，社会主义的原则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原则可以推翻，错误的意见和反社会主义的意见可以不加批判吗？但是右派分子对于不合他们心意的话，竟一概充耳不闻。对于他们说来，“大鸣大放”也好，“帮助整风”也好，这原不过是一种触媒，一种由头。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右派“鸣放”，意在攻击社会主义制度、推翻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既然如此，工人阶级、劳动人民和革命知识分子就不能不坚决地进行反攻。有人说，党不是在请别人帮助自己整风吗，怎么整到别人头上来了呢？不错，党还将继续请广大群众帮助自己整风，这是毫无疑义，必须坚持到底，也必然会坚持到底的。但是难道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反动言行，也可以受到保护，不受批判吗？如果各界革命领导人物对于反社会主义的言论行动（不管它们假借什么神圣的名义）不知道警惕和识别，不知道迎头痛击，这样的革命者对于人民的事业还有什么责任心？

还有人说，本来讲的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已经基本上结束，怎么现在又讲起阶级斗争来了？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基本上结束了，这是事实，但是在政治战线上，在思想战线上，阶级斗争还将继续存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这也是事实。大家看到，这一次斗争并不是工人阶级挑动起

来的。古人有云：树欲静而风不止。风为什么不肯止呢？让我们回顾一下历史。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是和平进行的。为了准备社会主义革命，虽然经过思想改造运动和“三反”“五反”运动，但是前者重在划分敌我，后者重在反对贪污、盗窃，对于资本主义道路和社会主义道路何去何从，孰吉孰凶，实际上还没有认真地彻底地展开过辩论。资产阶级右派的政治活动家，资产阶级右派的知识分子，虽然也混在群众中迎了新，送了旧，但是他们是并不同意的。他们既然不同意，他们的反社会主义的风就不能止。现在已经有了许多事实证明，某些人老早就另有企图的，他们不但是不赞成社会主义革命，而且也早就不赞成反帝反封建的彻底的民主革命。因此，无论如何，一场争论是不可避免的。本来有争论，而且是根本性质的、不容含混的争论，掩掩藏藏暗地进行好呢，摊开在桌面上好呢？显然，前者不好，后者好。表面上躲开这场争论，决不会帮助我们平稳地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相反，经过这场争论，弄清了人们的真面目，就将教育广大群众。这样，就将使政治界、知识界以及社会各界对于社会主义的认识大大得到提高，人民内部的团结将比以前更为加强，而社会主义制度也将比以前更为巩固。

历史是在斗争中前进的，人们的思想是在争论中前进的。整风是不可避免的争论，对资产阶级右派的批判也是不可避免的争论。现在有争论，将来还会有争论。毛主席的报告是提倡团结的报告。他所提倡的团结不是貌合神离、同床异梦的假团结，而是经过争论达到的真团

结。因此，毛主席的报告也是提倡争论的报告。所谓百家争鸣，正是要争。在目前的争论中，有些人难免又会想到天气的寒暖。虽然立场之说还不能人人同意，但是立场不同，政治气候的寒暖之感也不同，这却是一个客观的事实。在我们社会主义者看来，目前的天气确实确实是一个大好春光的艳阳天。是的，这是一个不平常的春天，它之所以不平常，就是因为广大的工人阶级、劳动人民、革命知识分子和一切真正愿意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社会人士的政治觉悟，广大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政治觉悟，都将在争论中迅速地成长着，成熟着，用一种不平常的速度。

#### 注 释

〔1〕 这篇社论发表前，经毛泽东修改。



# 政府工作报告\*

(一九五七年六月二十六日)

周恩来

各位代表：

从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闭幕以来，已经整整一年了。这是伟大的转变的一年。在这期间，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取得了基本胜利，使我国社会生活发生了历史性的深刻变化；社会主义建设也获得了巨大成绩，使我们有可能在今年完成和超额完成发展我国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而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我们取得了许多宝贵的经验和教训，使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继续发展更加有了保证。这一年，就是以这些伟大光辉的成就载入我国史册的一年。

关于一年来的政府工作，国务院决定由我向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作报告。我的报告，是依据毛泽东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所提出的方针，

\* 这是周恩来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的报告。

来检查一年来政府的工作，并且解答各方面对政府工作提出的意见。这个报告分为五个部分：（1）关于社会主义革命；（2）关于社会主义建设；（3）关于人民生活；（4）关于国家基本制度；（5）关于国内外团结。

## 一、关于社会主义革命

1956年，我国基本上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在生产资料私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一亿二千万农户和五百多万个手工业者的个体经济已经变为集体经济。七万户的私营工业企业已经变为公私合营企业，将近二百万户的私营大中小商店，已经变为公私合营商店、合作商店、合作小组或者直接变为国营商店。这是把几千年来的生产资料私有制变为公有制的社会主义大革命。由于各种条件的成熟，由于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正确领导，由于全国人民的努力，在这样一个大革命的过程里，社会财产没有遭到损坏，社会秩序没有发生混乱，社会生产没有下降。恰恰相反，我们在这个大革命取得基本胜利的第一年，就在各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绩。

1956年的自然灾荒，不仅是我国解放以来最大的一次灾荒，也是几十年以来我国最大的一次灾荒，被灾田地约二亿三千万亩，受灾人口约七千万人。在全国实行农业合作化的第一年，我国农业就经历了这样严重灾情的考验。在党和政府的积极领导和支持下，全国农民发挥了农业生产合作社的优越性，实现了增产的要求。1956

年,全国农业总产值约为五百八十三亿元,比1955年增加了二十七亿四千万,接近了第一个五年计划最后一年的指标;粮食(不包括大豆)的产量为三千六百五十亿斤,比1955年增加了一百五十四亿斤,超过了第一个五年计划最后一年的指标。在合作化的高潮中,由于大家忙于组织合作社和积肥造肥以及兴修水利等基本建设,并且把主要注意力集中在增产粮食方面,因而使某些地方一部分农村副业的发展一度受到影响。1956年,棉花和油菜籽受灾最重,产量比1955年减少了。但是,在实现合作化的第一年,全国除了灾情严重的地区以外,就有百分之七十五以上的农户在不同程度上增加了收入,减少收入的农户只占百分之十左右。对于灾区,政府去年用于防汛、抢险、堵口、复堤、救济等项的支出和发放生产救灾贷款的款项共达八亿六千万,从去年七月到现在,向灾区调运的粮食,增加了七十亿斤,而农业合作社的集体救灾和生产互助,更起了大的作用。

1956年,由于城市和乡村的基本建设和生产同时增长,生产资料的需要骤然增大,因而使各种器材,特别是建筑材料和五金材料的供应出现了紧张情况。可是,尽管如此,1956年手工业和公私合营企业的生产和营业,也都得到了发展。这一年,手工业总产值达到一百一十七亿元,较1955年增长了百分之十六;公私合营企业的工业总产值达到了一百九十一亿元,较1955年这些企业的总产值增加了约百分之三十二。1956年,公私合营商店、合作商店和合作小组的零售总额达一百一十亿元,较1955

年这些企业的零售总额增加了百分之十五以上。在全行业实行公私合营还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政府已经完成了给私方定股定息的工作，对私方人员也作了大体安排。

人们知道，当小生产一旦变为社会主义的集体经济以后，资本主义就失去了它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可以这样设想，在农业合作化和手工业合作化的高潮中，在社会主义经济的大发展中，如果政府对私营工商业不采取一视同仁、合理安排和进行改造的方针，或者私营工商业者不参加公私合营而拒绝改造的话，那么，二百多万户私营工商业的生产和营业不仅不能得到发展，并且必然会处于被削弱以至被淘汰的地位，而私营企业的职工和一部分从业人员就会遇到失业和转业的困难。这不仅对国家和人民不利，对工商业者更加不利。党和政府从开国以来，就把私营工商业放在国家的统筹安排之内，实行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政策。而私营工商业者就在1956年大势所趋人心所向的形势下，接受了全行业公私合营的办法，从而使全国私营工商业基本上完成了在生产资料私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

我国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三大社会主义改造能够同时基本上完成，并不是偶然的，而是我国的历史发展所准备好了的。1949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全国范围内取得胜利后，我国革命就进入了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接着，我们先后进行了土地改革、抗美援朝、肃清反革命、三反五反和思想改造的五大运动。土地改革彻底摧毁了封建基础。抗美援朝击退了美帝国主义对新

中国的挑战，破除了我国一部分人的特别是许多知识分子的亲美、崇美、恐美的思想。肃清反革命运动相当彻底地打击了各种反革命分子，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三反五反，击退了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创造了对私营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有利条件。思想改造运动，批判了许多反动思想，初步解决了大多数知识分子为谁服务的问题。显而易见，如果没有这些运动的胜利，便不可能在新中国成立不久的短短时间内，就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胜利。这些运动都是在党的领导下以群众性的斗争形式进行的，因为不采取这种形式，便不可能把广大人民群众动员起来取得运动的胜利，同时也不能使群众在运动中得到锻炼，提高觉悟，为三大改造铺平道路。由此可知，对于五大运动无论就其成绩来说，也无论就其进行的形式来说，都是不应该怀疑的。五大运动的胜利保证了三大改造能够顺利地进行。三大改造本身也是有准备有步骤地进行的。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经过了从互助组到低级合作社再到高级合作社的发展过程。对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经过了从供销小组、分散生产联合经营等低级形式到手工业合作社的高级形式、从小规模的手工业合作社到规模较大的手工业合作社的发展过程。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经过了从加工订货、统购包销到部分的公私合营再到全行业的公私合营的发展过程。同时，三大改造又是相互联系配合起来进行的。了解了上述五大运动和三大改造的历史发展过程及其相互关系，就可以了解在涉及六万万人民生活

的历史大变革后的第一年，工农业生产不仅能够正常进行而且能够获得很大发展的根本原因。

在上述巨大的群众性运动中，在具体工作上发生过一些偏差和错误的。政府对于这些偏差和错误，有的已经作了检查和处理，有的正在检查。我们欢迎全国人民继续提出批评和建议。当然，我们在检查偏差和错误的时候，要分析主观的和客观的原因，要分析在当时那些偏差和错误是可以避免的，那些是不能完全避免甚至是无法避免的。这样，我们才能判明这些偏差和错误的性质、程度和范围。对于那些在当时条件下确实可以避免的偏差和错误，我们必须引以为戒，坚决纠正；对于在运动中受到不应有的损害的人，我们应该公开向他们道歉；在运动中没有处理完毕的问题，现在应该由有关机关迅速予以处理。

但是，历次运动中发生的偏差和错误，是掩盖不了当时产生这些运动的客观需要和历次运动的基本成绩的。以思想改造运动来说，由于这个运动也是以群众运动的形式进行的，某些问题的处理是比较粗糙的，因而损伤了一些从旧社会来的、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的自尊心。但是，通过思想改造运动，确实帮助了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基本上渡过了社会主义革命这一关。在这次整风运动中，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都表示赞成社会主义，就是证明。再以肃清反革命运动来说，在政府历年来处理的反革命分子中，计有以下四类：（一）因积恶累累民愤极大而判处死刑的占百分之十六点八，其中绝大多数是从解放后

到1952年判处的，这在当时是绝对必要的；（二）实行劳动改造的占百分之四十二点三，其中已经刑满释放或者安置生产的占百分之二十五点六，现在在押实行劳动改造的占百分之十六点七；（三）实行管制的占百分之三十二，其中已经解除了管制的占百分之二十二点九，现在仍管制的占百分之九点一；（四）逮捕后宽大处理、教育释放的占百分之八点九。由此可知，在这些反革命分子中，有百分之五十七点四是经过劳动改造或者宽大处理而得到释放和撤销了管制的，他们已经获得了重新做人的机会，其余仍在劳动改造或者管制中的，只要他们认罪守法，老老实实地接受改造，也将会得到重新做人的机会。根据政府的初步检查，对这些反革命分子的处理，有偏差的是极少数，而绝大多数是完全正确的。有人认为肃反的偏差竟达到百分之九十以上，这是完全没有根据的。毛泽东主席已经提出还要对这一运动进行一次检查，我们相信，检查的结果会继续证明这一点。

过去进行的五大运动，或者是民主革命的彻底完成，或者是社会主义革命的组成部分。因此，决不能拿革命运动中个别的乃至部分的错误来动摇革命运动的成果。即使在个别单位甚至个别地区发生的错误比较严重，也依然不能否定这些运动的成果。党和政府每当提倡一种运动的时候，都是根据客观的迫切需要，经过慎重研究和典型试验才提出的，而每次运动又动员了广大群众参加并且得到他们的拥护。这样就保证了运动的成绩是基本的，偏差和错误是个别的。有人认为，如果我们说这些运

动的成绩是基本的，偏差和错误是个别的，这就是“教条主义”，这就是“公式”和“新八股”。实际上，这些人提出反对“教条主义”、反对“公式”和“新八股”等等口号，就是为了夸大错误、抹煞成绩，引导一些立场不稳或者不明是非的人把这些个别性质或者部分性质的偏差和错误，看成是这些运动的根本性质或者全面性质的错误，以达到他们动摇革命运动成果、反对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

我们说社会主义革命基本上胜利了，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上结束了，但是这并不是说，阶级斗争已经结束了。我们现在着重地提出要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但是这并不是说，现在就没有敌我矛盾了。应该指出，目前在国内还有阶级存在，地主阶级、官僚资产阶级虽然已经早被消灭，但是这些阶级的分子，还正在劳动中、生活中改造着，而他们固有的阶级思想和阶级感情，还不可能完全改变。私营工商业者的绝大部分虽然参加了公私合营，但是由于他们还拿定息，对工人阶级还有剥削关系，因而资产阶级的两面性依然存在。例如，有人主张或者赞成把股息延长到二十年，有人想要把二十年的股息一次付清，有人说股息不是剥削，仅仅是“不劳而获”，说资产阶级分子和工人阶级分子已经没有本质的差别，甚至说“官僚主义是比资本主义更加危险的敌人”。这些谬论都是由于资产阶级的唯利是图、贪得无厌的剥削思想的一面在作祟，都是为资本主义复辟的企图打掩护。有少数资本家主张公方代表退出公私合营企业，更是拒绝社会主义改造的一种露骨的表现。这不是



明明白白地表明资产阶级还存在着两面性吗？这不是明明白白地说明资产阶级分子还有继续改造的必要吗？对资产阶级分子的社会主义改造，就是要他们进行自我批判，逐步改变资产阶级的立场和思想感情，也就是要他们得到“脱胎换骨”的本质改造。要作到这一点，又非经长期的改造功夫不可。这对绝大多数愿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工商业者来说，又有什么不好呢？现在不是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工商业者认识到了这一点吗？由上述情形看来，在人民内部矛盾中，目前还存在着资产阶级同工人阶级对抗的一面，还存在着严重的阶级斗争，更不必说在人民内部之外，还存在着我们同国内的反革命分子和国外的帝国主义的敌我矛盾了。正如大家已经明白看到的，在这次整风运动中，有思想斗争，也有政治斗争。因此，当我们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时候，绝不能无视还有阶级斗争的存在，也不能无视还有敌我矛盾的存在。巩固社会主义革命的成果，继续进行和彻底完成社会主义改造，还是我们今后的一项重要任务。

## 二、关于社会主义建设

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是同社会主义革命同时进行的。在我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中，我们已经正确地规划了建设和改造相结合的步骤。而1956年，伴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的到来，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有了一个跃进的发展，经济事业和文教事业的发展规

模和速度，都大大地超过了五年计划的前三年，有些甚至超过了前三年增长的总和。

现在我举出一些数字说明这个情况。

我国的工业总产值(不包括手工业产值,下同),在五年计划的前三年共增加了一百七十七亿元,而1956年这一年就增加了一百三十九亿元。正是由于这种迅速的发展,1956年的工业总产值达到了五百八十六亿元,超过了五年计划所要求的1957年的指标。从主要工业产品看,钢产量前三年共增加了一百五十万吨,而1956年就增加了一百六十一万吨。金属切削机床的制造,前三年由于调整设备和改变型号的原因,虽然在台数上比1952年没有显著的增加,但是在新的品种增加和质量的提高方面,都有了很大的发展,到1956年,在这一新的基础上,又比1955年增加了一万二千二百多台。此外,如电力、煤炭、石油、化学肥料、水泥等重工业产品,1956年的产量比前三年的年产量都有较多的增加。喷气式飞机、载重汽车、大型发电设备和单轴自动车床等重要新产品也都是在这一年制造成功的。轻工业生产由于1955年农业丰收的有利条件,增长速度很快。例如,棉纱产量前三年共增加了三十五万件,而1956年就增加了一百二十七万件;棉布的产量前三年共增加了二千零五十万匹,而1956年就增加了四千三百万匹;食糖产量前三年共增加了十六万吨,而1956年就增加了将近十一万吨。

1956年,我国的农业在严重的自然灾害中,如前所说,总产值仍然增加了二十七亿四千万元,超过了前三年

平均每年增加二十三亿八千万元的水平。1956年，在国家和农业合作社的通力合作下，农业建设有了很大的发展。前三年共开垦荒地三千六百万亩，而1956年就开垦荒地二千九百万亩；前三年扩大的灌溉面积共四千一百多万亩，而1956年就扩大了一亿多亩。

1956年全国完成了将近一百四十亿元的基本建设投资额，等于五年计划规定的投资总额的三分之一，因而改变了前三年基本建设投资只完成五年计划一半稍多的情况，使前四年完成的比重达到百分之八十六，这就保证了第一个五年的基本建设计划能够超额完成。1956年新增加的钢的生产能力，就有一百四十二万吨；新建和修复的铁路，就有三千一百零八公里。

同生产和建设的迅速发展相适应，1956年在运输方面和贸易方面，也都有很大的发展。全国现代运输工具前三年的货运量共增加了一亿一千二百万吨，而1956年就增加了九千三百万吨；商业机构零售总额前三年共增加了一百一十三亿元，而1956年就增加了六十二亿元。

1956年文化教育事业也有了很大的发展。

显然，1956年的建设成就是极其巨大的。这就使国家有比较充足的力量来支援新生的合作社经济和公私合营经济，从而加强了社会主义经济的阵地，巩固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同时，又保证了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各项指标有可能比较顺利地完成和超额完成，从而准备了实行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有利条件。

1956年政府对国家建设工作的安排，总的说来是正

确的，但是也存在着不少的缺点和错误。这些缺点和错误，将要在李先念、薄一波两位副总理代表国务院分别作的关于国家预算的报告和关于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中详细指出。1956年预算开支中的某些项目和国民经济计划中的某些指标，是大了一些。从财政方面说，执行国家预算的结果，当年支出超过当年收入十八亿三千万元，动用了历年财政结余十六亿五千万元，并且从银行透支了一亿八千万元，银行发行货币也多了一些，因而动用了库存物资大约二十亿元。从经济和文教方面说，基本建设投资多了十五亿元到二十亿元，同时，职工的人数增加多了，高等和中等学校的新生也招多了，一部分职工的工资也增加得多了一些。因此，虽然1956年我国生产资料工业的产值增长了百分之四十一，生活资料工业的产值增长了百分之二十二，但是这两种物资的供应都较紧张，并且减少了国家的物资后备力量。在造成物资供应紧张的原因中，主要是基本建设投资额大了一些，“摊子”铺得多了一些，这样就多增加了财政的开支，多增加了职工人数和工资总额，也就多增加了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消耗。

对于1956年的基本建设工作，我们应该进行具体的分析。由于许多建设项目在前三年已经完成了土木建筑工程，需要在1956年进行大量的设备安装工程，另有许多项目已经完成了设计和施工准备工作，需要在1956年开始大量施工，并且还由于设计和施工力量的壮大，设备自给能力的增长，需要在1956年安排一些新的项目，这

样，就使基本建设的项目大大地增加了。现在从建设项目来看，大多数是安排得恰当的，有小部分动工过早了，或者进度过快了，也有个别项目，是安排得不恰当的。不恰当的项目，显然是错误的。那些动工过早和进度过快的项目，在当年确实造成一些损失，但是，对于长远的建设事业还是需要的。同时，有一些项目，主要是一些非生产性的项目，由于建筑标准过高，造成不少浪费。这些，都应该引为教训，今后力求避免。

由于基本建设投资多了所造成的某些物资供应紧张的情况，我们在1956年的第二、三季度就已经开始察觉，并且采取了一些措施，制止了供应紧张情况的继续发展。以后在编制1957年的国民经济计划草案和国家预算草案的时候，我们就吸取这个教训，缩减了一部分基本建设投资，适当地增加了国家的后备。

这次提交大会审议的1957年度的国家预算草案和发展国民经济计划草案的各种数字表明，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是以既积极又充分可靠的步骤向前发展的。1957年的国家预算收入比1956年增长近百分之二；为了避免像去年那样在财政上出现赤字的现象，国家预算支出比1956年减少百分之四。1957年的工业总产值比1956年将增长百分之四点五，达到六百零三亿元。农业总产值比1956年将增长百分之四点九，达到六百一十一亿元。基本建设投资缩减为一百一十一亿元，它虽然比1956年减少百分之二十，但是比五年计划原定的1957年投资还多十四亿元，五年合计，仍然超过五年计划原定数约五十

亿元。在1957年已经过去的五个多月时间内，预算和计划的执行情况，一般地是良好的。如果全国人民能够厉行增产节约，贯彻执行勤俭建国方针，争取农业丰收，而不遭受大的自然灾害，那么我们就能够顺利地完成1957年的各项指标，也就能够保证完成和超额完成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从而奠定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关于我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了建议，国务院接受了这个建议，并且正在由有关部门具体制订中。

应该指出，我国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中所已经取得和将要取得的伟大成就，是同苏联人民和苏联政府的援助分不开的。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苏联帮助设计和供应设备的共有一百五十六个建设项目，苏联给我国提供了大量的长期的优惠贷款，并且派遣了大批的技术专家帮助我们进行各项建设工作。这种真诚的援助，值得我们再一次向苏联政府和苏联人民表示衷心的感谢。现在还有人企图抹煞苏联对我国真诚援助的巨大意义，这显然是在有意挑拨中苏友谊，破坏国际团结，从而破坏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对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最近一个时期，有些人却有着不同的看法和估计。

有人认为，我国的发展国民经济计划在1956年全面冒进了，在1957年又全面冒退了。很明显，这种意见是不正确的。我国1956年的计划，是在改造和建设的高潮中拟定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胜利，大大鼓舞了劳动人

民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他们纷纷要求增加生产，提高工作定额。1955年农业的大丰收，又为国民经济的发展准备了物质条件。同时，基本建设发展到了五年计划的第四个年度，也确实有扩大规模的必要。这些情况，都说明我们不但需要而且有可能加快建设的速度。1956年的计划就是适应这种情况，采取了跃进的步骤，而且在各方面取得了如前所说的巨大成就。不错，某些指标是大了一些。但是，这是属于局部性质的缺点。即使以基本建设投资多了十五亿元到二十亿元来说，也只占去年全部支出的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六，仍然是局部性质的缺点。因此，决不能说1956年的建设是全面冒进。1957年，由于去年农业收成的情况不好，同时国家的财政和物资的后备力量也有减少，在这种情况下，适当地放慢建设的步骤，积蓄力量，准备今后更好地前进，是完全必要的，这决不是全面冒退。我们应该懂得，任何事情都不会是直线发展的。随着客观条件的变化，发展速度总会有快有慢，并且常常会出现不平衡。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也是这样。尤其是像我们这样人多且穷的国家，由于农业的比重很大，自然灾害时常发生，要求国民经济年年都毫无起伏地按照同样的速度向前发展，这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想法。

有人认为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搞坏了，这是完全错误的。无论从工业生产、农业生产、基本建设、文化教育或者财政收支那一方面来看，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都是成功的，是搞好了而不是搞坏了。以1957年的计划数字

同1952年的实际数字作比较,我国的工业总产值增长一点二倍,即增加三百三十三亿元。以钢的产量来说,第一个五年合计将达到一千六百三十万吨,而旧中国包括日本侵略时候的东北在内,从1900年到1948年,四十九年合计的钢产量不过七百六十万吨。当然,拿目前我国钢的产量同工业发达的国家的产量来比还是很低的。因此,优先发展重工业同时充分注意发展农业和轻工业的方针,今后仍然应该继续坚持。我国1957年的农业计划如果完成,农业总产值比1952年将增长百分之二十六,即增加一百二十七亿六千万元。以粮食和棉花来说,1952年到1956年五年间的实际产量合计,粮食为一万六千五百八十亿斤,棉花为一亿三千万担,而旧中国从1932年到1936年五年间是我国解放前农业收成比较好的年份,粮食产量合计只一万三千万斤,棉花产量合计只六千零五十万担。不要忘记,在1952年到1956年这个期间,还有两个大的灾荒年。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内,我们开工建设的有八百多个限额以上的工业企业,许多水利工程和铁路工程以及长江大桥工程等等,规模都比较大,技术都比较新,其中由苏联帮助设计和供应设备的一百五十六项建设工程,在技术上都是头等的。这些建设工程对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事业和农业生产的发展,不仅在第一个五年内已经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而且在今后将要发挥更大的作用。这些建设工程,多数都是旧中国时代所不能想像的。第一个五年期间铁路共新建八千五百公里,而国民党政府在二十二年的统治期间只修建了二千六百多



公里。我国的文化教育事业在这期间也有了巨大的发展，例如高等学校的毕业生，第一个五年合计为二十八万人，这就为新中国培养出大批的建设人才，而旧中国从1912年到1947年，三十六年合计不过二十一万多人。拿财政的情况来说，第一个五年合计的财政收支各为一千三百六十九亿一千四百万元，收支是平衡的。其中国外借款收入三十一亿元，只占国家预算收入的百分之二点三。这充分地说明了我国基本上是靠内部的积累进行了大规模的建设的。五年的财政支出，用于国家建设事业的约占百分之六十以上；经济建设事业和社会文教事业的支出的比重是逐年增加的，行政和国防支出的比重是逐年降低的。这就充分地证明了我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是和平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计划。我国在进行大规模建设的同时，由于生产的发展，人民生活有了相应的改善，这一点，我将在报告的下一部分加以说明。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伟大成就，是无可否认的。那种说第一个五年计划搞坏了的人，他们对社会主义事业抱着敌对的态度，故意抹煞全国人民辛勤劳动的成果。这样的人，他们最不高兴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而向往资本主义经济。但是，他们的困难是，全国广大人民并不站在资本主义那一边，而是坚决地站在社会主义这一边。

有人认为统购统销糟透了，这是直接地攻击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在中国是为六万万人的生活着想的，这同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只顾少数人发财享受不顾多数人死活，是根本不相同的。我国人口

众多，经济还很落后，生活消费品的供应因而不能很充足；我国的农业，有时丰收，有时歉收，并且往往这里丰收，那里歉收，为了照顾这种不平衡情况，必须在丰收的年份和地区照顾到歉收的年份和地区，并且还必须准备应付特别严重的自然灾害和其他意外；我国的工业和运输业的建设正在大规模地进行，城市人口也在不断增加；这种种情况，说明了在我们这样的国家里，如果不对粮食和其他主要生活消费品实行统购统销，进行合理的分配，那么，广大劳动人民的生活就无法保证，社会主义建设的事业就无法顺利进行。因此，对于粮食和其他主要生活消费品的统购统销，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在分配方面的一项重要政策。四年来实践证明，这个政策保证了城乡人民都能够得到他们所最必需的价格合理的生活消费品，免受私商的剥削，即使在发生灾荒的年份和灾害严重的地区也是如此。这个政策支援了工业建设，保证了市场的稳定，从而有助于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顺利发展。怎么能够认为统购统销糟透了昵？抱有这种观点的人，不是贪图少数人的自由享受，便是迷恋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想达到个人发财的目的。我们批判这种错误观点，并不是否认在统购统销方面存在着某些缺点。例如对粮食的统购统销工作，一度曾经因为供应过宽，不得不增加收购，在某些地区就发生购粮过多、留粮过少的现象。又如，对棉布的统销工作，去年棉布增产较多，供应宽了一些，今年棉布减产，不得不减少供应。这都是由于政府在工作中瞻前顾后和统筹安排不够所产生的缺点。对于各

种缺点，政府将继续注意检查和改正。

有人反对学习苏联经验，甚至认为我国在建设工作中发生的缺点和错误，也是学习苏联的结果。这是一种极端有害的看法。我们认为，向苏联学习是完全必要的，问题在于我们自己如何学习。如果学习得不好，责任完全在于我们。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建成社会主义的国家，有着丰富的先进经验，我们从事社会主义建设，不向苏联学习，难道向美国学习建设资本主义的经验么？事实上，正是因为我们认真地学习了苏联的先进经验，才使我们的建设工作少走了许多弯路，获得了很大的成绩。当然，我们不应该硬搬别国的经验，即使是他们成功的经验，也必须有所选择，并且在运用的时候，还必须同本国的具体情况结合起来。我们正在做前人所没有做过的事业，当我们还没有经过实践的时候，对别国的经验要选择恰当并不容易，要做到同本国的具体情况相结合就更不容易。提高选择能力和学会正确运用，不但要有一定的时间，而且可能要付出一定的代价。如果学习得好，可以缩短时间，也可以少付代价。因此，我们必须继续努力，批判和克服教条主义的学习方法。同时，我们又必须批判那些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苏联的先进经验都当作教条而加以否定的修正主义观点。而在目前，正当右派分子用修正主义反对社会主义的时候，我们反对修正主义就有更重要的意义。应该肯定，在今后我们还要认真地向苏联学习，向一切社会主义国家学习。当然，其他国家一切对人民有益的知识 and 经验，只要有可能，我们也都要加

以学习。

下面我想对于教育改革和向科学进军两个问题讲一些意见。

### 关于教育改革问题

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并且是为这种政治和经济服务的。旧中国的教育，主要是推行奴化教育、封建教育和资产阶级教育，是为帝国主义和国内少数统治阶级服务的。新中国的教育与旧中国的教育根本不同，必须反映社会主义的新政治、新经济，必须为广大劳动人民服务，必须适应我们国家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因此，我们就有必要对接收过来的旧教育作根本性质的改革。几年来，我们作了这样的改革，并且有了很大的成绩。这是必须肯定的。今后随着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我们还应该继续进行某些必要的改革。过去，教育部门在实行教育改革的时候，也发生过若干偏差，主要是否定了旧教育的某些合理的部分，对解放区革命教育的经验没有做出系统的总结，加以继承，并且在学习苏联经验的时候同我国实际情况结合不够。这些缺点今后应该改正。但是，如果有人因为教育改革中有这些缺点，就否定教育改革的成绩是基本的，甚至根本否认教育改革的必要性，企图使今天的教育走回到旧中国教育的老路上去，那是完全错误的。

在教育改革中比较突出的一个问题，是高等学校的

院系调整 and 教学改革的问题。旧中国的高等学校，由于要适应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统治的需要，畸形地集中在沿海大城市，而且大多数院系庞杂重复，培养目标笼统模糊。各科中工科所占的比重很小，教学内容绝大部分是袭用资本主义国家的一套。旧教育的这种情况根本不能适应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的需要。同时，在解放后头几年的国际形势和内地新工业基地的建设，又要求有一部分学校实行内迁。在这种情况下，教育部门和各个高等学校几年来进行了院系调整和教学改革的巨大工作，使我国高等教育的面貌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大体上能够适应培养社会主义建设人才的需要。但是，教育部门在进行调整和改革的过程中是有缺点的，例如，对某些学校安排不当，对老教师的意见和经验重视不够等等。我们应该很好地总结这些经验，肯定成绩，克服缺点。今后应该力求保持高等学校的稳定，以利于教学质量的提高。并且要更好地结合我国的实际，稳步地改进现有的专业设置、教学计划和教材。

从最近整风运动暴露出来的情况看来，我们应该特别加强学校的思想政治工作。首先，学校教师是培养下一代的灵魂工程师，他们应该在过去思想改造的基础上，根据自愿的原则，继续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过去教师的思想改造是有成绩的，但是这次整风运动证明，要使教师们掌握无产阶级的思想武器，能够在阶级斗争的风浪中站稳立场，明辨是非，引导学生朝着正确方向前进，是不容易的。因此，他们应该继续努力，逐步地学好

马克思列宁主义,使自己具备正确的政治观点,加强自己的劳动观点,逐步地同工农打成一片。其次,各级教育部门和学校教师要针对着学生的思想情况,加强对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培养他们成为忠实于社会主义事业的、勤劳朴素的、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相结合的国家建设人才。政治教育的教材和方法,过去有脱离实际的缺点,今后应该总结经验,加以改进。几年来,学校的政治教师作了不少的工作,今后他们应该继续努力,提高自己的水平,发挥更大的力量。

现在我来谈谈学生毕业后参加劳动的问题。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要求工农劳动人民的文化水平不断提高,要求大批有文化的知识青年参加劳动者的队伍。解放以来,我国小学、中学和高等学校都有了很大的发展。由于要适应国家对高级和中级建设人才的迫切需要,高等学校和中等专业学校招生较多。这样,就造成了近几年来高中毕业生几乎全部升学、初中毕业生大部分升学、只有一小部分参加工农业生产的现象。特别是去年,高等学校和中等专业学校都多招了一部分学生,初中和高中毕业生的升学率就更加增高了。但是,应该指明,这种现象却是暂时的和不正常的现象,经过国家的妥善安排以后,它将逐渐地转入正常的状态。今年高等学校和中等专业学校都将根据计划少招一些学生,今后我国的各级教育都将在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上稳步地发展。因此,今后,一方面每年将会有更多的小学、初中、高中的毕业生升学;另一方面,每年又会有越来越多的小学、初中、高中的

毕业生投入生产劳动。这才能使我国有文化的体力劳动者日益增加，知识分子的队伍日益扩大。这才是正常的和健康的现象，也将是今后长时期内存在的现象。

旧中国的教育是为地主资产阶级所垄断的，从小学起，特别是从中学到大学和出国留学，劳动人民是很少有份的。新中国的情形就根本不同。我们的教育是属于劳动人民的。近几年来，我国劳动人民的生活逐步改善，他们想把子弟送进学校学习的要求更加迫切了。因此，尽管我国的各级教育事业几年来的发展在速度和规模上都超过我国历史上的任何时代，但是，总不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要求。我们的教育事业只能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逐步地发展，而不可能把好事在一天之内办完。

我们今后的教育方针，应该是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身体健康的劳动者。过去这个方针是不够明确的。我们的中小学学生毕业后除了一小部分升学以外，多数都应该参加工农业生产。高等学校中也应该加强劳动教育，学生毕业后一般地应该参加一定的体力劳动，今后应该对此定出一些制度，逐步实施。过去教育行政部门对劳动教育重视不够，没有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同时社会上特别是一部分干部中还有“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学而优则仕”的剥削阶级思想的残余，因而造成了不少青年学生轻视体力劳动，轻视工农劳动人民，毕业后不愿参加工农业生产劳动的不健康现象。我们应该向所有的青年学生确切地讲明，我们的国家就是因为有劳动人民当家作主，才有着无限光明的前途。在我们

的国家里，劳动是最光荣的事情，工人和农民是最有前途的人。青年学生都应该把参加工农业生产劳动看作最大的光荣，同时又应该认识，参加工农业生产劳动是有困难的。新中国的青年应该不怕艰苦，下定决心吃苦，老老实实地劳动。全国学生的家长们和社会舆论都应该鼓励学生参加生产劳动，特别是农业生产劳动，要继续批判一部分家长和干部轻视体力劳动，阻挠学生参加工农业生产劳动的错误思想和行动。教育部门应该根据上述教育方针，在过去几年教育改革的基础上，对现行的教育制度、教育内容和教学法，彻底地稳步地加以改进。

我还简单地谈谈派遣出国留学生的问题。七年来我国派遣了七千多人出国留学，派遣的标准一般是按照政治、业务和体格三个条件，这是对的。为了培养忠实于社会主义事业的高级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革命基本胜利以前，我们对于派遣出国的留学生，曾经特别着重政治条件的审查，这是完全必要的。值得引为教训的，是当时在审查政治条件的工作中有形式主义的缺点，因而还有个别政治品质不好的学生也被派出去了。同时，对留学生的业务和体格条件也有注意不够的地方。我们决定今后一般不派高中毕业生，只派大学毕业生和研究生去学习国内所缺的专业。选派留学生，在任何时候都应该重视政治条件的审查，而且要克服上述的各种缺点。有人认为过去派遣出国的留学生中，革命干部的子女占多了。事实怎样呢？根据已有的统计材料，从1952年到1956年，我们派出留学生六千四百三十五人，其中革命干部的子女



还不到百分之三点五。由此可知，那种说法是完全不符合事实的。

### 关于向科学进军

以往一年，在“向科学进军”的号召下，我国科学事业有了重要的发展。1956—1967年科学发展远景规划已经制订，并且已经作为试行草案，付诸实施。在自然科学方面，已经试制了1957年的年度计划。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已经成为常设机构。各方面科学研究机构有了较大的发展，科学工作者的队伍也有了扩大。科学工作体制的原则已经确定。科学工作中的协作制度，已经开始推行。关于图书仪器等科学工作条件的问题，已经或者正在拟定方案，逐步加以解决。有些重要的科学实验设备正在建设中。苏联帮助我国建设的功率为七千千瓦的重水型原子反应堆和能产生二千五百万电子伏的 $\alpha$ 粒子的回旋加速器，正在加紧建设中。科学研究，一年来也有不少成就。所有这些，都鼓舞了广大科学工作者向科学进军的热情，同时，各部门、各地方对科学事业也表现了很大的积极性。

在广大的爱国知识分子向科学进军的热潮中，却有人说，中国科学事业在解放后比国民党时代落后了，甚至有人说，今后十二年不是赶上国际水平的问题，而是补过去十二年课的问题，好像从解放以来，我们在科学方面不仅没有丝毫成绩，而且是倒退了一样。我们能够同意这种说法吗？请看事实：第一，现有科学事业的规模，虽然

离我们国家建设的需要还很远，但是，无论在研究人员、机构、经费和设备各方面，都比国民党时代大得多。第二，在科学技术的水平方面，也不是国民党时代所能比拟的。首先是许多老的科学研究机构在研究工作有了新的的发展，同时，许多新的学科建立起来了，特别是发展了一些与工业建设和国防直接有关的学科和新技术。高等学校也开设了大批新的专业。第三，新中国科学事业的特点，是科学和生产的密切结合。生产对于科学是基本的推动力量。在国民党时代，由于工农业生产的衰落，科学家们虽然也作了些研究工作，但是无法在生产上发挥作用。解放后八年来，随着生产的发展，生产部门向科学研究部门提出了大量的要求，我们科学家们在这方面就有了充分的机会来发挥他们的才能，而且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我们的科学研究力量，还远远不能满足生产的需要。第四，全国社会科学的研究，在马克思主义正确方向的指导下，在批判资产阶级社会科学的斗争中也获得了新的发展。这样的发展，在国民党时代是完全不可能设想的。社会科学有强烈的阶级性，在革命胜利以后，我们对资产阶级社会科学采取批判的态度，是完全必要的。第五，科学队伍也在迅速壮大中。老科学家们经过思想改造和工作实践，他们的政治觉悟和业务能力一般地都提高了。留学生陆续回国，增强了各门学科的力量。大批高等学校学生毕业，为我国科学的发展准备了雄厚的后备力量。根据以上种种，怎么能说新中国的科学事业比国民党时代还落后呢？还要补过去十二年的

课呢？我们这样说，并不是否认中国科学家在国民党时代非常困苦的条件下所做的努力和获得的成就，而且我们从来就把他们这些得来不易的成就作为中国科学财富的组成部分。说新中国科学落后于国民党时代的人，无非是否认我们科学家八年来的成就，否认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罢了。

对于科学规划，有人表示怀疑。他们认为科学事业不可能作全国性的长期的规划，只能由科学家自发地分散地进行。在社会主义革命取得基本胜利以后，在知识分子向科学进军的热潮中，为了推进社会主义建设，我们邀集了几百个科学家，集中他们的智慧，制出我国科学发展的初步蓝图，使我国科学事业的发展有了大体的轮廓和途径，这是十分必要的。科学技术研究的基本任务，是为了发展生产，同自然界做斗争。如果不把我国现有的科学力量适当地组织起来，密切地联系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作出比较全面的和长期的规划，那么，我国科学事业的发展，就没有了方向，就不可能收到我们预期的效果。当然，这个规划，以后必须根据各种新的情况，不断地加以补充和修正，甚至可能有很大的改变。即使如此，也不能否定这个规划的必要性，因为没有今天的初步蓝图，就不可能有将来日益完备的科学工作计划。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经济，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服务的科学事业，也必须是有计划的。在国家规划之外，无疑也应该允许科学家从事他们自己所专长的某些研究工作，以便充分发挥科学家的潜力。但是，反对科学研究工作的

计划性，使科学事业陷于无政府状态中，这对社会主义、对科学事业本身都是不利的。

为了有效地发展我国科学研究工作，必须贯彻协作的原则。各有关部门必须协调地进行工作。政府今年在医学、农学和机械等方面，已经制定较好的协调方案，并且已经部分地付诸实行。这种作法，为国家节约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并且加速了科学工作的开展，以后应该加以推广。有人只赞成本部门科学工作的发展，不赞成甚至要求限制其他部门科学工作的发展，他们往往反对协调工作，甚至拒绝国家对人力和物力的合理调配，这是一种严重的本位主义作风，应该加以批判。全国科学研究力量，应该统筹安排，一方面是适当分工，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密切协作；一方面要提倡“百家争鸣”，另一方面也要反对因门户之见而妨碍协作。我国的科学研究工作系统，应该由中国科学院、高等学校、中央各产业部门的研究机构和地方的研究机构四个方面组成。在这个系统中，中国科学院是全国学术领导和重点研究的中心，高等学校、中央各产业部门的研究机构（包括厂矿实验室）和地方所属的研究机构是我国科学研究的广阔基地。这是组织我国科学队伍的原则问题，我们要求有关部门的负责干部认真地提倡协作精神，推行协调方案，迅速克服本位主义的不良作风。

新中国科学事业的发展，是中国科学家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领导下努力的结果。有人认为，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不能领导科学工作，目前许多领导人都不

是科学家，“外行”不能领导“内行”。有人甚至认为，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的存在是不信任中国科学家的表现。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从来就教育自己的干部不断地在工作中学习自己所不熟悉的事情，逐步提高自己的业务能力，做好工作。对于科学事业的领导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学术领导，另一方面是政治思想上和行政上的领导。对于学术问题，我们从来不主张用行政命令进行干涉，我们的领导方针是“百家争鸣”，就是通过科学界的自由争论和客观实践来解决学术问题。对于科学工作中的政治思想、方针、政策、计划等方面，更需要党和政府的领导。八年来的事实，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就是管理科学事业的方针、政策、计划和重大措施的机构，它负责统筹安排中国科学院、高等学校、中央各产业部门的科学研究机构和地方的科学研究机构四个方面的工作。十二年科学规划，是几百位中国科学家集体劳动的成果，科学规划委员会的委员大部分也是科学家，这怎么能说是不信任中国科学家的表现呢？如果“外行”不能领导“内行”的说法意味着只有本行才能领导本行，这不仅否定了政治对于科学的领导，而且实际上也否定了科学研究工作中的统一领导的任何可能，因为学术上的专业是分门别类的，而世界上同时精通各种科学专业的科学领导干部是不存在的。这种理论，对科学队伍只能起瓦解作用，是不利于科学事业的发展的。

### · 三、关于人民生活

解放以后随着我国工农业生产的迅速恢复和发展，广大人民的生活也得到了显著的改善。首先，让我们来看占我们国家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农民的生活状况。解放以来，我国的农业生产总值是逐年上升的。1949年全国农业生产总值是三百二十六亿元，1956年上升到五百八十三亿元，比1949年增长了百分之七十九。随着农业总产值的增长，农民的购买力也大大提高了。1950年全国农民的购买力是八十一亿元，1956年上升到一百九十一亿元，比1950年增长了百分之一百三十六。国家供应给农民的消费资料也随着增长了。1956年比1950年，棉布供应增加了两倍，胶鞋增加了一点九倍，食盐增加了将近一倍，糖增加了二点三倍，煤油增加了十一倍，香烟增加了一点四倍。在五万万多的农民中，生产和消费的增长这样大，是旧中国从来没有过的。我们再来分析一下占全国人口第二位的职工的生活状况。1949年末，国家机关、公私企业和事业共有职工大约八百万人，1956年末增加到二千四百万人，其中有私营企业转为国营和公私合营企业的人员和乡村干部共约三百万人。在七年中间，我们解决了约一千三百万人的就业问题，这是旧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1952年全国职工年平均工资是每人四百四十六元，1956年提高到六百一十元。在四年中间，提高了将近百分之三十七。这样的工资增长速度，也

是旧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有的人对新中国人民生活的这种显著变化熟视无睹，说解放后人民生活水平下降了。工人和农民是人民的最大多数，他们的生活改善了，怎么能说人民的生活水平下降了呢？应该承认，有少数高级知识分子和少数职工，他们的生活虽然比解放以前的几年有了改善，但是还没有恢复到抗日战争以前的水平。但是，考虑到广大工农生活水平还比较低的情况，他们的生活水平也不能提高得太多太快。至于占人口极少数的旧社会的剥削者，他们的生活水平比解放以前降低了，这是完全应该的。在剥削阶级统治的社会里，少数剥削者过着挥霍无度的奢侈生活，而创造社会财富的广大劳动人民却处于贫困的半饥饿状态。只有社会主义的新中国，才能够为全体人民的利益着想，首先保证最大多数劳动人民的生活需要，同时也照顾到其他阶层的合理需要。那些说解放后人民生活水平下降了的人，如果他们不是把个别的局部的现象不加分析地当作普遍的整体的现象来下断语，那就是在他们心目中只想到极少数的剥削者而没有看到广大的劳动人民。

我们是经济和文化落后的农业国，人口多，耕地少，底子穷，因此，人民生活水平比起工业发达的国家来说是很低的。解放以后，工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是快的，但是，按全国人口计算的平均产量，却增长得相当慢。生产的发展和社会财富的增长是改善人民生活的物质基础。人民生活改善的速度，决定于生产的发展速度，而其中消费资料生产的增长速度，在我国目前的条件

下，又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决定于农业的增长速度。我们是六万万人口的大国，如果每个人每年增加一元钱的购买力，全国人民的购买力就增加六亿元，国家也就必须相应地增加六亿元消费资料的供应。如果人们用来买吃的，就需要增加六十亿斤粮食的供应。如果人们用来买穿的，就需要增加两千万匹的棉布供应，也就是要增加两百万担棉花的生产。从1952年到1956年，我国消费资料的生产，平均每年大约增加三十多亿元。扣除小量的储备和每年人口增长所消费的部分，可以用于改善人民生活的，每人每年只有四元左右。这些数字表明每年人民生活的改善是有一定限度的。超过一定的限度，就会出现消费资料供应紧张、购买力和物资供应不平衡的现象，就会影响市场物价的稳定。因此，六万万人民生活的水平只能在本国生产发展的基础上逐步提高，不可能要求太快。有些人不从我国上述的实际情况出发，以为一进入社会主义，人民生活水平马上就能够有很大的提高，而不懂得必须经过长期的辛勤劳动和艰苦建设才能逐步提高人民生活的道理。过去我们对于这些道理向全国人民说明得不够，宣传得不够，这是有缺点的。但是另有一种人，他们天天埋怨中国人民生活水平太低，口口声声称道美国生活方式，他们是在幻想把中国拖回到半殖民地的老路上去，重新过那极少数剥削者的生活。

有人说，现在工农的生活太悬殊了。这种说法是否合乎实际呢？应该承认，工农的生活是有差别的。但是，当我们把工农的生活加以比较的时候，必须考虑到工农生



活不同的历史条件和城乡不同的生活条件。在旧中国的农村，广大的贫苦农民过着衣不蔽体、食不饱肚、糠菜半年粮的生活。解放后，经过土地改革和合作化运动，目前我国农民大体上有百分之二十到三十过着略有积余的生活；有百分之六十左右过着有吃有穿的生活；有百分之十到十五过着少吃少穿的生活，这一类人还需要国家和农业合作社的帮助。全国平均起来，每个农民一年的农业生产净收入，大约有七十元左右，合到每个农户一年的收入大约有三百元左右。这里所说的农业生产净收入，不仅包括农民从生产合作社分配到的收入，同时也包括农民个人经营的农业生产的收入。当然，全国各地农民的收入是不平衡的，贫瘠地区每个农民的收入比七十元的数目低，富庶地区每个农民的收入比七十元的数目高。1956年职工全年的平均工资是六百一十元，比农民一家人的全年平均收入高一倍多。如果只从收入的货币数字比较，似乎工农生活确是很悬殊。但是，如果将城乡不同的生活条件估计在内，情况就不同了。在农村维持有吃有穿的生活水平，从全国来看，大约每人每月的平均开支只需要五元，在城市维持同等的生活水平，却需要十元。因此，我们认为，工农生活水平虽然有差别，但是并不过分悬殊，而且工人的劳动生产率比农民高得多，因而在工农生活之间保持一个合理的差别，也是应该的。在过去几次工资改革中，我们对于壮工、杂工、学徒工和一部分临时工的工资标准规定高了一些，这是很大的缺点，应该改正。农民对这部分职工的工资过高表示不满意，也是

有理由的，但是，这同那种故意夸大工农生活悬殊，借以挑拨工农关系、破坏工农联盟的恶意攻击，是没有丝毫相同之点的。今后对于这部分职工的工资标准，必须因地制宜地结合当地农民生活情况，分别加以规定，使他们的生活水平和当地农民的生活水平大体上保持平衡。我们还应该向工人群众进行教育，使他们懂得，工业是不能孤立地发展的。工业的原料和工业产品的市场，职工生活消费资料的供应，很大部分依靠农业的增产和农民的支援。在广大农民生活水平还不能很快提高的情况下，工人对于生活的改善也不应该提出过高的要求。

有人说，高级工作人员和低级工作人员的待遇也悬殊太大了。如果这个意见是指目前我们的国家还很穷，工农的生活水平还很低，因而高级工作人员和低级工作人员的待遇也不宜差别太大，那么，这个意见是对的。如果这个意见是指不同性质的劳动不应该在待遇上有一个合理的差别，那就不对了。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同社会生产力的水平相适应的分配原则是按劳取酬。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对于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国家所付给他们的报酬还应该有一定的差别。取消这种差别，对于提高劳动生产率和提高业务、技术水平都是不利的。因此，我们既要反对悬殊太大，又要反对平均主义。在去年工资改革的时候和工资改革以后，为着适当地缩小高级工作人员和低级工作人员的工资差距，国家对于企业领导人员和国家机关高级工作人员的工资标准，曾经先后采取了控制或者降低的措施。今后对于高

级工作人员在工资方面、在住房和医疗等方面以及供给制残余的不合理现象，将继续采取措施，逐步地加以调整 and 解决。至于有人故意夸大高级工作人员和低级工作人员待遇上的悬殊，甚至把领导人员说成是“剥削者”，如果他们不是极端幼稚无知的话，那便是别有用心了。

下面我想对于劳动就业、工资制度、学徒制度、人民文化生活等几个问题讲一些意见。

### 关于劳动就业问题

解放以来，经过逐年的努力，如前所说，全国职工增加了一千三百万人，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失业人员已经基本上得到了安置。关于高级知识分子的招聘工作，去年进行了登记，今后将按照他们的学识专长和他们的生活情况，分年逐步地加以安排。解放以后，人民的生活安定了，社会的医药卫生工作加强了，社会救济和职工福利的事业发展了，因而人口的增殖率有很大的增长。但是，我们的工业还很落后，国家机关和工业企业的职工已经增加过多，今后每年只能根据生产和事业发展的需要，吸收必要的人员。因此，在很长的时期内，劳动就业的主要方向仍然是参加农业劳动。手工业和服务性行业也将是劳动就业的一个辅助方面。最近上海、江苏、广东等地方劳动部门因地制宜地积极帮助将近一万多失业人员参加了手工业、服务性行业和各种社会辅助劳动，这是一个好经验。今后还应该提倡由社会团体和群众自己想出各种办法，扩大就业范围，协助国家解决劳动就业问题。在社会

福利事业方面,也应该发挥社会团体和广大群众的力量,提倡社会团体和群众之间的互助,举办各种社会福利事业。最近全国职工家属代表会议所介绍的各种群众性的互助互济办法,是有成效的,应该提倡和推广。

### 关于工资制度问题

工资问题是一个极为复杂的生产和分配的问题。它体现着工人阶级内部、产业之间、地区之间、各类人员之间的关系,也体现着工农之间、积累和消费之间、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之间、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之间的关系。这些方面的关系需要合理的安排,而旧的不平衡和旧的矛盾解决了,又会出现新的不平衡和新的矛盾,这就必须不断地加以调整 and 解决。

解放初,我们国家的工资制度是十分混乱的。旧中国遗留下来的工资制度,是轻重倒置、高低悬殊、极不合理的,它反映了旧中国半殖民地经济的畸形发展,也反映了旧中国各派经济集团和统治集团之间的相互竞争。同时,许多老干部和工作人员还实行着老解放区的供给制度。工资制度上的这种混乱状态对于统一的国家机关和国营企业、事业是完全不相适应的。经过1950年、1952年、1956年几次的工资制度改革,我们已经初步地建立了大体上适合我国情况的工资制度。但是,它还很不完善。在工资等级制度、计件工资制度、学徒制度、津贴制度、奖励制度方面,在劳动保险、公费医疗、福利费等等职工福利待遇的规定方面,都还有不切合实际和不够合理的地

方,需要我们继续加以改进。在工资改革工作中,也还存在着不少缺点。我们在学习社会主义国家先进的工资工作经验的时候,结合我们国家的实际情况不够,对待中国原有的工资制度中有用的经验,还缺乏慎重的研究,甚至采取简单的否定态度。这是应该引为教训的。

### 关于学徒制度问题

对于解放前的学徒制度,它的封建性的陋规是应该否定的,但是,关于学徒学习的期限、学习的内容、学徒的待遇以及酬师制度等方面,有许多好的经验,我们却应该慎重地加以研究和吸取。现在所实行的短期技工训练班和短期培训学徒的办法,值得我们重新研究,并且加以改革。经验证明,短期培训出来的技术工人,大都技术知识很窄,缺乏多方面的独立的作业能力。同时,由于学徒期间待遇过高,学习期满后升级太快,升级考试制度不合理,因而容易造成青年工人忽视生产实践经验的倾向,甚至在一部分青年工人中间滋长着骄傲自满的情绪。他们把掌握生产技术知识看成是轻而易举的事情,不尊重老工人在长期生产实践中刻苦钻研得来的技术经验,不虚心地老工人请教学习,这种现象已经影响到新老工人之间的团结和师徒之间的合作关系。我们必须耐心地教育青年工人,使他们懂得,多方面的熟练的生产技术绝不是在几个月甚至几年中间能够学到的,必须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间,经过不断的勤学苦练才能够逐步地掌握。老工人是我们国家的宝贵财富,不仅他们的技术经验是丰

富的宝贵的，而且他们的政治经验和生活经验也是丰富的。他们曾经长期在旧社会里过着被压迫和被剥削的生活，他们也亲身体会了新社会的平等的幸福的生活，因而他们最懂得应该怎样珍贵和保护革命的胜利成果。青年工人是我们社会主义建设的接班人，是未来的美好生活的创造者。但是，他们还年青，他们的政治经验和生活经验还很少，因此，向老工人学习，在生产实践中锻炼，是今后青年工人提高阶级觉悟和生产技术知识的主要方法。同样，在农民中，也应该教育青年农民尊重老农，虚心学习老农的生产经验和政治经验。在知识分子中，应该教育青年知识分子尊重老科学家、老教育家、老工程师、老医生、老作家、老艺术家，虚心地学习他们多少年来经过刻苦钻研所积累的学识和经验。

### 关于人民的文化生活问题

我们国家的文化水平是落后的，文盲大约占人口的百分之七十以上。解放以后，我们就积极地推行扫盲和普及教育。在校的小学学生已经从1949年的二千四百多万人增加到1956年的六千三百多万人。从1949年到1956年，全国扫除文盲二千二百多万人。从1951年到1957年，国家用于普及教育的经费将近四十九亿元，占全部文教经费的百分之二十四强，占全部普通教育经费的百分之五十四强。这样的发展是相当迅速的。但是，仍然不能满足学龄儿童按时入学的要求。除了国家办学以外，我们应该积极提倡集体办学，个人办学，充分地发挥社会集

团和群众的力量，以补充国家力量的不足。过去在扫盲工作上，有过忽起忽落的毛病，在小学和幼儿教育上，有过部分待遇过高的错误。这些，现在都在改进中。我国人民的文化生活也有了很大的改善，今后我们应该在“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下更加充分地发挥文化艺术工作者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创新性和积极性。国家只能集中地举办少数的示范性的文艺和体育事业，并且引导他们走向自给。对于大量的各种文化艺术事业，应该提倡文化艺术工作者自力经营。经验证明，过去完全由国家包下来的想法和办法是不妥当的。更重要的是在广大群众中广泛地开展业余的文艺和体育活动。国家举办、自力经营、群众业余这三个方面的文艺和体育活动队伍，应该通过实践相互学习和提高，以逐步地满足人民对于文化生活的需要。

在改善人民的卫生保健状况和防治疾病方面，我们这几年也取得了不少成绩。我们的医药卫生队伍已经迅速扩大，城乡的环境卫生和个人卫生已经有了显著改善，几种对人民危害最大的疾病，例如鼠疫、霍乱、天花等，已经能够基本上加以控制。但是，卫生部门在领导群众性的卫生运动方面，还有时紧时松的毛病；在医疗制度方面，还有许多不合理和不便于群众的地方；在医药、卫生工作人员中间，还存在着不团结合作和彼此不尊重的现象，今后应该坚决克服上述这些缺点，坚决贯彻群众路线，彻底改善卫生医药工作，更好地发挥中医的力量，加强医药卫生人员的团结，以保证进一步提高人民的健康

永平。

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目的是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生活，使社会主义社会中的一切劳动者都能够共同享受富裕的有文化的幸福生活。这是多少年来我国劳动人民所向往的伟大理想。但是，我们的国家还很穷，我们的文化还落后，我们的困难还很多，我们的经验还不够，要使我们国家从根本上摆脱贫困和落后的状态，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化工业和现代化农业的社会主义国家，使我国的人民能够享受幸福美好的生活，这是一场长期的艰巨斗争。取得这场斗争的胜利，不是几年而是需要几十年的时间。我们必须自上而下地提倡勤俭朴素作风，继续发扬艰苦奋斗的革命优良传统。我们的老一代人，要教育年青的一代，使他们懂得美好的生活是必须用自己的辛勤劳动去创造的。

#### 四、关于国家基本制度

我们的国家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在我们的国家里，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是人民行使权力的机关。在这些机关和其他国家机关里实行民主集中制。这些就是宪法规定的我们国家的基本制度。我们的国家制度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关系的上层建筑。正是因为有了这种国家制度，才保证了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胜利，今后还必须依靠这



种国家制度,才能保证在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社会。因此,对我们国家基本制度的任何动摇都是不能容许的。

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们国家制度的一切方面都已经是尽善尽美,而不需要任何改进和发展了。恰恰相反,这种改进和发展是经常需要的。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在我国还只是初步建立起来,各种旧的生产关系的残余不能不在我们国家的某些制度中有所反映。毫无疑问,这些旧生产关系的残余是一定要一天天消亡下去,而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是一定要一天天更加巩固、更加发展起来。因此,我们国家基本制度的某些组织形式和运用方法,必须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政治情况的变化而不断改进。同时,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时间还很短,我们的经验还很不够,只有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中,逐步积累经验,才能使我国国家基本制度本身更加健全和完善起来。

至于根据我们国家的基本制度所制定的有关政治、经济、文化等等方面的各种制度和组织形式,更是必须随着情况的变化而不断改进的。例如,在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上,在解放初期为了工作的便利,建立了大区军政委员会或者行政委员会。到了1954年,为了适应在计划经济下加强统一管理需要,我们撤销了大区军政委员会。近两年来,为了纠正中央在某些方面集中过多、统得过严的缺点,我们又研究了体制问题,现在政府正准备适当地扩大地方权力,以便在中央的集中领导下,充分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创造性,推进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所有这些改变,显然是必需的,正确的。这个例子可以说明我们各方面

的制度和组织形式必须随着客观情况而不断改进,否则,就不能同经济基础相适应,不能为经济基础服务,甚至起阻碍经济发展的作用。

就目前而言,我们各方面的制度的确有许多还是不够完备的,有缺点的。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有些制度在制订的当时是合理的,正确的,但是,当情况发生变化之后没有及时地加以改变;另一方面是由于有些制度在制订的时候,就缺乏深入的调查研究,因而不完全符合于客观情况,甚至是错误的。还有一些制度上的缺点,是由于学习社会主义国家先进经验的时候,没有很好地结合我国的具体情况所造成的。在现行的各种制度中,凡是有缺点和错误的,国务院有关部门都应该吸收各方面提出的有益的意见,分别加以修正、补充或者废除。

我在这里要说一说许多人表示关心的法制问题。我国今天的法制,的确还没有完备,但是也并不像有些人所说的“完全无法可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们在颁布宪法前后,已经制订了许多重要的法律,如工会法、劳动保险条例、土地改革法、农业合作社示范章程、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选举法、婚姻法、兵役法、惩治反革命条例、惩治贪污条例、逮捕拘留条例等等。同时政府根据工作需要,还制订了许多单行条例和规章,发布了许多决定和指示,这些在实际上都起了法律的作用。在国家建立之初,特别是在过渡时期,政治经济情况变动很快,在各方面都制订带有根本性的、长期适用的法律是有困

难的。例如民法、刑法，在生产资料私人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没有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所有制没有完全确立以前，是难以制订的。在这种情况下，国家颁布暂行条例、决定、指示等等来作为共同遵守的工作规范，是必要的，适当的。只有在这些条例、决定、指示行之有效的基础上，才可以总结经验，制订长期适用的法律。就是资本主义国家的法律，在初期也是不完备的，也是经过很长时期才逐渐制订出来的。现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所有制已经确立，国家在各方面工作的实践中也取得了一定经验，这就使我们有可能在总结过去经验的基础上，在整理过去已有法规的同时，制订社会主义的各种法律，例如刑法已经有了初步草案，民法和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也在由有关方面草拟中。

现在有些右派分子借口帮助共产党整风，发出了许多破坏性的言论，其中有不少是直接向我们国家的基本制度进攻的。他们从资产阶级民主的观点出发来攻击我们的国家制度；他们诬蔑人民民主专政制度是一切错误和缺点的根源；他们企图用否定成绩、夸大缺点的办法来诋毁我们的国家制度。他们企图在我们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外，另外成立某种国家权力机关，例如所谓“政治设计院”、“平反委员会”之类，他们的目的不外是想使我们的国家政权离开工人阶级和它的先锋队——共产党的领导。他们把这些破坏性的言论加上各种伪装，企图迷惑那些还看不清楚他们面目的人。这种反对社会主义的言论当然不能同善意的批评相提并

论。批评缺点和错误是为了健全和发展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这是我们所欢迎的。而右派分子实质上是要把我们的国家从社会主义的道路拖到资本主义的道路上去。这是广大人民所决不容许的。

我们的国家有民主和专政两方面的职能。有人认为，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取得基本胜利以后，专政这方面的任务就已经没有了。这种看法是错误的。这是因为在我们国内还有一些残余的反革命分子，他们仍然在伺机而动。在原来的剥削阶级分子中，也还有进行破坏社会主义建设活动的人。此外，在社会上还有一些盗窃犯、诈骗犯、杀人犯、放火犯、流氓集团和各种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坏分子。尤其不要忘记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集团还经常对我们进行武装挑衅，并且不断派遣特务、间谍来进行破坏活动和颠覆活动。因此，我们决不能削弱我们国家的专政的职能，我们必须改进专政机构的工作，继续巩固国防，保卫我们的祖国，保卫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

根据我国的宪法，我国公民享有广泛的民主自由权利。随着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这种权利日益扩大并且日益得到更充分的保障。在资本主义国家里，只有少数剥削阶级分子才能享受自由，而广大劳动人民，是没有真正的自由可言的。与此相反，我们社会主义国家保证了广大人民行使宪法上所给予的自由权利，而对于那些少数反革命分子，必须剥夺他们的自由权利。右派分子说，在我们的国家里，自由权利太少了，好像是对于反对宪法中所规定的国家基本制度、反对社会主义的一切言

论和行动，国家都要给予便利和保证，才叫做有了自由。显然，人民是不会同意给予这种自由的。

右派分子还攻击我们的选举制度。他们认为，只有像资本主义国家的选举才是最民主的。其实，有些资本主义国家虽然实行了所谓普遍、直接的选举，但是资产阶级统治者总是用各种方法特别是金钱和行政手段控制选举，来保障他们的统治地位。在我们这里，恰恰相反，选举制度首先是要保障工人、农民和其他劳动人民的民主权利，同时又照顾在全国人口中占极少数的资产阶级分子和其他爱国人士，使他们在国家权力机关中也有一定比例的代表。目前我国在基层实行直接选举，在县以上实行间接选举。这种选举制度是适合于我国当前情况的较好的民主形式。但是，这并不排除在条件成熟的时候逐步地在县以上的各级也实行直接选举。在进行选举的时候，由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协商提出联合的候选人名单，事实证明这是适当的。至于候选人的名额问题，过去在联合提出的候选人名单中，候选人数和当选名额相等，这是各方面协商的结果。今后在这个问题上的具体作法，也仍然要经由各方面协商决定。总之，我们国家的选举制度是为了真正保障最广大人民的民主权利，并且在社会主义基础上把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团结起来，而不是用虚伪的形式欺骗人民，保护少数人的利益。

选举是人民享有民主权利的一个方面，我们国家的民主生活还有更丰富内容。宪法中规定：“一切国家机关

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经常保持同群众的密切联系，倾听群众的意见，接受群众的监督。”我们国家机关就是根据这种群众路线的方法来进行工作的。许多重要的法律，在制订过程中，都经过群众的充分酝酿和讨论；国家的经济计划，也由国家有关部门提出控制指标或者草案交给基层生产单位的广大群众讨论，然后加以确定；为了发动广大职工积极参加企业管理和对企业行政领导工作进行监督，我们在企业中正在推行职工代表大会制度；在农业生产合作社里，也根据民主办社的原则，建立了社员代表大会和社务委员会。我国公民，经常通过人民代表、监察机关、人民团体、报纸刊物对政府各方面的工作提出批评和建议，也常常直接用来信来访的形式向各级领导机关申述意见。我们的国家机关，正是通过这些办法，经常听取群众的意见来改进自己的工作。政府领导机关对待人民批评、建议、来访和来信的工作还做得不很好，我们应该迅速加以纠正，并且要求各级政府机关十分重视这种工作。正在进行着的整风运动，也是我国民主生活的一个显著的表现。发动群众来公开揭发和批评我们的国家机关和工作干部的缺点和错误以便加以克服，这是任何号称自由民主的资本主义国家所不会做，而且也不敢做的事情。

但是应该指出，在我们国家各级行政管理机关中还存在着，甚至是严重地存在着官僚主义的习气。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还只是初步建立起来，旧社会的影响，特别是资产阶级的思想，还经常在侵蚀我们国家机关的工作

干部；人民的文化水平还不高，因而他们行使参加国家事务的管理和监督的权利，还不免受到一定的限制。所以在我们的国家机关中，官僚主义就有可能滋长起来。同时，我们国家的管理制度上的某些缺点，例如机构庞大，层次过多，有些事权过于集中等等，也助长了官僚主义。官僚主义习气的存在，妨碍着我们的国家机关同人民的联系，给工作带来了很大损失。我们必须继续扩大民主，依靠群众的监督，不断地进行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

我们国家机关实行民主集中制，就是要把广泛的民主和高度的集中互相结合起来。我们不是为民主而民主，我们之所以要有广泛的民主，是为了团结一切力量来共同建设社会主义，发展社会生产力。如果只有民主，没有集中，就不可能使全国人民在一个共同的方向、统一的计划下进行有组织共同斗争，也就不可能达到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目的。民主集中制的具体运用，是要根据客观情况的变动而有所不同的。大家知道，过去在进行革命战争的时期，在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时期，我们对于民主和集中这两方面比较着重于集中，但是，即使在战争和革命的时期，集中仍然是建立在广泛民主的基础上的，因为不如此，就不能适应战争的需要，不能保证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到了社会主义革命取得基本胜利以后，我们就有可能进一步扩大民主。近两年来，在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上，在经济管理工作上，民主的扩大都是很明显的。但是在任何情况下，决不能因为民主的扩大而根本否定集中的领导。小资产阶级从他们自发的无政府主义

倾向出发，常常向往于所谓“绝对民主”，也就是不要集中领导的民主。这种“绝对民主”只能使人民陷入散漫的、无组织的状况中，不能用集体的力量来保障人民的利益。所以，反对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特别喜欢这种“绝对民主”的观念，企图利用这种观念来涣散劳动人民的意志，瓦解劳动人民的组织性和战斗性。为了击败右派分子的阴谋，我们必须坚决地保卫我们的民主集中制度，不让那些所谓“绝对民主”的观念来侵蚀我们的队伍。

中国共产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领导地位是宪法明文肯定了的。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共产党的领导，就是体现工人阶级的领导。中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已经取得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次伟大胜利。在建设社会主义的事业中，同样必须有共产党的领导，因为建设社会主义，就是要用工人阶级的世界观来改造社会。共产党坚定不移的方针就是要领导全中国人民建成没有剥削、没有阶级的繁荣幸福的共产主义社会，也就是中国人民历来所憧憬的大同世界。难道除了共产党以外，还有别的党派能够领导中国人民实现这样伟大的理想吗？有些右派分子把共产党对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领导地位说成是什么“党天下”，这完全是恶意的诽谤。事实上，正是在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广大人民才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人，才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的力量来建设新的生活。北京工人说“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就是工人阶级的天下，就是人民的天下”。这是对于这种“党天下”的叫嚣的最好的回答。所谓“党天下”的说法，也就是把共产党当成一个



脱离群众与群众对立的宗派，所以有些右派分子又说，共产党就是宗派主义的根子，这是完全违反事实的谰言。事实上，中国共产党从来都是反对宗派主义的，在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共产党都坚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因而才形成了全国人民的革命大团结。在社会主义革命取得基本胜利以后，中国共产党又主动地提出了愿意同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而它的最终目的又是要实现消灭一切阶级、从而使一切政党，包括共产党在内，都趋于消亡的共产主义社会。这样的党同宗派主义是绝不相容的。共产党总是教育党员要时时刻刻注意加强党和群众的联系，绝不容许党员用宗派主义的态度来对待党外人士。中国人民大众之所以信任共产党的领导，也就是因为他们根据事实看清楚了中国共产党是一个真正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工人阶级政党。

在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事业中，工农联盟是基本力量，但是同时必须团结其他一切拥护社会主义和愿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阶级、阶层。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就是全国人民革命大团结的具体表现。有了这样的统一战线，就能够更好地联系和团结广大人民群众，反映各方面人民群众的意见和要求，使国家能够及时地采取适当措施来调节他们的利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同时，通过团结在这样的统一战线之内的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就能够更好地进行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和社会主义改造工作，推进社会主

义建设事业的发展。共产党提出的同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的作用和目的就在这里。广大人民所希望于各民主党派的就是坚定地站在社会主义立场上，注意进行思想改造，以充分发挥他们在国家生活中的积极作用。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必然还要进一步地巩固和发展。任何怀疑统一战线政策的意义，低估统一战线的作用，轻视统一战线工作的思想都是错误的。

但是，必须肯定，共产党是统一战线的领导力量和核心力量，社会主义是统一战线的政治基础，也就是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目标。这些不可动摇的原则，是参加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各民主党派所必须遵循的轨道，离开这个轨道，就是自外于统一战线。

我们国家的权力机关，是在共产党领导下由各民族、各阶级、各党派、各人民团体的代表人物组成的。国家的大政方针都是由各方面通过各种形式事先协商然后提交有关国家机关讨论和制定的，而在执行这些方针的机关中，又有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代表人物参加。这种在共产党领导下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共同参与国家管理工作的办法，能够更好地团结全国人民，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来建设社会主义。这正是表现了我国国家制度的优越性。资本主义国家所标榜的两党或者多党轮流执政的办法，只是资产阶级各派集团欺骗劳动人民的虚假民主罢了。现在有些右派分子所梦想的，就是要把这种资产阶级的多党政治和“各党派轮流执政”的办

法，搬到中国来代替我们的人民民主制度。

1954年我受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委托组织政府的时候，就是根据宪法规定的以共产党为领导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基本原则提出国务院组成人员名单的，当时共产党以外的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参加政府的成员约占四分之一以上，后来增加政府成员的时候，大致也是根据了这个比例。这种安排是根据当时情况确定的，现在看来也是适当的。

要保证政府各方面政策的正确执行，就必须在机关、学校、企业和团体中都有共产党的坚强的核心领导。共产党必须领导一切的原则主要是从政治上来说的，并不等于一切具体工作都要由共产党直接管理；相反的，许多专门业务工作应该由专家负责。这里所说的专家，自然也包括共产党员专家在内。至于体现共产党领导的具体组织形式和工作方法，可以而且应该因时因事有所不同，以求更好地发挥党的领导作用，使领导和被领导、共产党员和非共产党人士都能够充分发挥积极性，更好地合作共事。许多人在这方面提出的善意的批评和建议是应该仔细研究的。但是，右派分子提出的“中共组织退出机关、学校”、“共产党不在知识分子中发展组织”、“党不要在政权之外再搞一套党的系统”、“请共产党下台”等等狂妄要求，却与前面说过的“官僚主义是比资本主义更加危险的敌人”、“政治设计院”、“平反委员会”、“党天下”、“各党派轮流执政”等等谬论同出一辙，互相呼应，目的都是要使人民政权脱离工人阶级政党的领导，以便按照他们的资

产阶级面貌来改变我们国家的性质。

有些人批评现在有党政不分现象。对这个问题要加以分析。党对于人民群众直接发出政治上的号召和政策性的决定，对于政府工作不但没有妨碍，而且有很大的帮助。有些带有政治号召和政策指示性质的决定或者带有群众运动性质、需要党政一齐动手的工作指示，由同级党政机关联合发布；有些工作的检查，由相应的党政机关联合进行；有些政府机关的会议邀请共产党和其他民主党派的有关负责人参加；事实证明，这些办法对于推进工作是有好处的，今后还应该继续采用。但是，在某些机关中，共产党的组织包办代替行政工作，或者对于某些具体业务不通过行政而直接干预，这些现象对于政府工作和对于党的工作都是不适当的，应该加以纠正。

有人提出在国家机关、学校、企业中非共产党员的负责人有职无权的问题，这是有一定事实根据的。但是，如果对这个问题加以具体分析，便可以看出存在有各种不同情况。一种情况是共产党员和非共产党人士合作得很好，彼此之间无墙无沟；另一种情况是有些共产党的组织和党员干部对非共产党人士的职权不够尊重，甚至对他们采取歧视、排斥的态度，这是严重的宗派主义性质的错误；第三种情况，是有些非共产党人士，对自己的职务尽责不够，并且对共产党的组织和党员采取疏远和猜疑的态度，而有关的共产党的组织和共产党的负责干部对他们的接近和帮助也往往不够。后两种情况应该引起我们严重注意，积极加以克服。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首先在

于共产党的组织要教育自己的党员，切实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克服宗派主义思想，善于在工作中尊重、团结和帮助党外人士，虚心倾听他们的意见和批评，学习他们的专长和经验，不断地提高自己，改进工作。对于某些影响团结、增加隔阂的工作制度，应该加以改变。同时，非共产党人士也应该勇于尽职尽责，消除对于工农干部的抵触情绪，消除对于共产党员的猜疑隔阂，开诚相见，对于工作中的缺点随时提出批评和建议，并且加强学习，提高自己的思想和认识，以期达到双方亲密合作、和衷共济的目的。在非共产党人士中有一些人对于社会主义还抱着对立的情绪，他们尤其需要努力改造自己，清除这种对立情绪。

中国共产党正在进行着的整风运动，同时也就是在我们的国家机关中的一次整风运动。这次整风运动的目的是为了有效地克服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对于这些错误的思想和作风的任何积极的批评，那怕态度有些偏激，内容不够全面，所根据的个别事实还有出入，我们都应该抱着欢迎的态度加以考虑，采纳其中有益的意见，来改进我们的工作。有些右派分子硬说，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根源就是无产阶级专政，或者在指责我们的国家机关中的毛病和缺点的时候，把我们的国家机关和剥削阶级的国家机关相提并论，这些谬论必须加以驳斥。在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里，国家机关是资产阶级压迫和剥削广大人民的工具。这种国家机关是同广大人民的利益根本对立的。在这种国家机关中，官

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不仅是不可避免，而且是不可克服的。我们的国家机关完全是另一回事。社会主义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全体人民的共同事业，社会主义国家必须而且能够吸引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来参加国家事务的管理和监督。所以社会主义国家从根本上说来，是同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不相容的。我们一定要、也一定能够战胜这一切病菌，我们国家的基本制度本身所具有的生命力，就是我们能够战胜这一切病菌的保证。

## 五、关于国内外团结

各位代表，我们大家都可以看到，我国人民已经在很短的时间内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取得了基本胜利；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正在稳步前进；人民生活水平正在逐步地提高；适应于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国家基本制度已经建立起来，这种国家制度正在对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起着巩固和推动的作用。我们究竟是依靠了什么力量，才能够不断地从胜利走向胜利呢？就国内来说，我们是依靠了各族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大团结。就国外来说，我们是依靠了我国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依靠了我国同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的团结。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是比过去更艰巨、更伟大的任务。为了胜利地完成这些任务，我们应该进一步加强全国人民在社会主义基础

上的大团结，批判一切反对社会主义的思想，继续肃清公开的和暗藏的残余反革命分子；在国外，我们应该进一步加强社会主义阵营的大团结和全世界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的大团结，孤立帝国主义侵略集团，争取世界持久和平和不同社会制度各国的和平共处。

谈到全国人民大团结的问题，首先应该说明人民的界限。在现阶段，人民是指拥护社会主义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和各方面的爱国人士，也就是说按照宪法享有公民权的一切人。同社会主义对抗、同人民对立的敌人是反革命分子，反动的势力和集团，和目前还在受着管制和劳动改造的分子。经过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胜利，敌我之间的矛盾虽然还存在，但是国内的敌人却大大减少了，这就使得人民内部的矛盾突出起来。正是因为这样，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的报告中，特别指示我们要善于分辨敌我之间的和人民内部的两类性质不同的矛盾，并且提出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针和办法。但是，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并不是没有互相转化的可能的。目前还在管制中的分子，经过劳动改造重新做人以后，可以取得公民权，成为人民的一部分。而目前属于人民内部的一些人或者某种集团，如果他们坚持反对社会主义的立场，抗拒社会主义改造，破坏社会主义建设，他们就有可能从人民方面转化到人民的敌人方面去。

处在目前中国社会大变革的时代，在人民内部，一部

分人对于新的社会主义制度会暂时感到不习惯，另外一部分人甚至会感到严重的抵触。在社会向前发展的过程中，人们在思想和立场上常常表现出进步、中间和落后的不同状态，常常有左派、中间派和右派的分化。这是由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和人们思想发展的客观规律所决定的，而不是人为地划分出来的。工人阶级要用自己的世界观来改造社会，这也就包含着改造其他阶级分子的立场和思想，使他们能够适应于社会发展的要求。

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虽然置身于人民的队伍之中，但是却站在反对社会主义的立场上，甚至采取不利于社会主义事业的行动。因此，我们必须在政治上和思想上同右派分子划清界限，对这种人进行必要的坚决的斗争，使绝大多数真正爱国的人认识到右派分子的立场和行为的错误。右派分子一旦处于完全孤立的地位，他们本身就会发生变化。我们希望，经过外力的推动、生活的体验和自己的觉悟，右派分子能够幡然悔悟，接受改造。社会主义改造的大门对他们开着。但是，也可能有极少数右派分子坚持反动立场，抗拒改造，甚至采取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行动，那么，他们就将自绝于人民。

全国人民在社会主义基础上的巩固团结是一个长期的奋斗目标，我们要不断地通过两方面的斗争来达到这个目标。一方面要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严肃认真地克服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思想和作风；另一方面要彻底批判右派分子反对社会主义、反对我们国家基本制度、反对共产党领导和破坏国内外团结的言



论，使得在这些最根本问题上的是非更加明确起来。我们相信，全国绝大多数的人民是真正爱国的，是愿意站在社会主义方面的。共产党所进行的整风，政府对本身工作的检查，都会使人民内部的矛盾得到不断的解决，使工作中的错误得到纠正。那些企图利用我们人民内部矛盾和共产党进行整风的机会，在我们人民内部挑拨是非、企图破坏我们社会主义事业的阴谋是不能得逞的。相反地，这个阴谋的揭露，一定会教育全国人民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共产党的周围。

有了国内的团结，我们就更有力量巩固我们和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巩固我们和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的团结。

一年来，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侵略集团的扩军备战政策经常威胁着世界的和平。但是，不断壮大的和平力量终于推动着国际形势在总的方面朝着有利于全世界人民争取持久和平、反对战争的方向发展。

帝国主义侵略集团曾经企图在匈牙利打开缺口，然后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各个击破。但是，匈牙利人民击退了帝国主义者的进攻，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也从匈牙利事件中吸取了深刻有益的教训。结果，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不是削弱而是加强了。不久以前，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同志和捷、波两国总理对我国的访问和最近一个时期以来社会主义各国领导人员之间一系列的互相访问，都对巩固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起了重要的作用。事实证明，建立在无产阶级国际主

义的和民族平等的原则基础上的社会主义国际团结，是任何挑拨离间所不能破坏的。

一年来，苏联对于重大国际问题所提出的一系列合理建议，例如关于裁军、禁止使用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停止试验核武器、取消在外国的军事基地和撤走在外国的武装部队、举行大国首脑会议等等建议，也推动了国际局势走向和缓。为了维护中近东的和平，苏联还提出了各大国保证中近东国家的主权和独立、不干涉它们内政的建议。苏联的这些建议，也是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的共同主张。这充分证明，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决不会侵犯别人，也决不容许任何国家侵犯我们，我们坚决主张世界各国和平共处。

英勇的埃及人民击退英法侵略、维护苏伊士运河主权的伟大胜利，标志着反殖民主义斗争的新的高涨。这一斗争同时也是维护世界和平的斗争。一年来，印度、缅甸、印度尼西亚、锡兰、埃及、叙利亚等亚非民族主义国家在维护世界和平的事业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日本人民反对美国军事占领、争取独立自由和维护世界和平的斗争，也有了很大的发展。所有这一些，都是促使国际形势趋向和缓的重要因素。但是，美国却利用英法被削弱的形势，竭力夺取英法在中近东、北非和世界其他地区的殖民地和势力范围，加强对当地人民的奴役和压迫。这是美国的新殖民主义政策。由于这个政策带有更大的欺骗性，由于某些国家的人民还缺乏斗争的经验，美国殖民主义者的阴谋在某些国家，例如在约旦，一时得逞，使

这些国家人民的民族独立斗争遭到暂时的挫折，是完全可能的。但是，争取民族独立、反对殖民主义的运动，正像任何人民运动一样，是不可能镇压下去的。美国越来越露骨的干涉和越来越残酷的奴役和压迫，一定会使这些国家的人民更加觉醒，更加清楚地认识美国殖民主义的真面目。在差不多所有被美国控制的国家里，要求摆脱美国控制、采取和平中立政策、反对侵略性军事集团的呼声日益高涨，就证明了这一点。争取民族独立、反对殖民主义的斗争是一个长期的、复杂的、反复的、但是一定要胜利的斗争。每一次挫折和每一个困难都会教育各国人民，提高他们的觉悟，使他们能够终于找到把斗争引向胜利的正确道路。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甚至在美国侵略者严密控制下的中国领土台湾，也发生了大规模的人民反美运动，而这次反美运动又正是发生在美国在台湾建立了导弹基地以后。现在美国又片面地宣布废除朝鲜停战协定第十三款卯项，准备把新式武器运进南朝鲜。美国这样作，一方面是为了继续阻挠朝鲜的和平统一，威胁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加剧远东的紧张局势，另一方面也是为了镇压南朝鲜人民，加强在南朝鲜的殖民统治。这就说明，美国正在步老殖民主义的后尘，不得不日益依靠刺刀来维持它的新殖民主义。可以肯定，美国的新殖民主义绝不会比老殖民主义有更好的下场。中国政府完全同意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提出的召开有关国家广泛参加的国际会议的建议，强烈谴责美国破坏朝鲜停战协定的片

面行动。

美国夺取它的同盟国家的殖民利益和侵犯这些国家的主权,引起了这些国家对美国日益明显的离心倾向。在美国的主要同盟国家中,争取摆脱美国的经济和政治的控制,愿意同社会主义国家达成和解、进行互利的来往的趋势正在一天天发展。同时,包括美国人民在内的世界各国人民,展开了规模日益宏大的和平运动,这就充分表示美国侵略集团的扩军备战政策越来越不得人心。

战争的危險依然存在。我们在任何时候都不能放松对美国侵略集团的警惕。但是,由于社会主义阵营的壮大和团结,由于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的队伍日益扩大,由于美国人民要求和平的呼声的增长和美国侵略集团处于日益孤立的地位,如果我们能够团结国际上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坚持斗争,我们就有可能推动国际局势继续走向和缓,并且迫使帝国主义战争集团接受和平共处的原则。

各位代表,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国际条件是有利的。我国人民根据毛泽东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光辉指示,正在通过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通过揭露和批判反社会主义的右派的胜利斗争,达到更巩固的团结。只要我们继续努力,加强国内外团结,贯彻执行增产节约、勤俭建国的方针,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挡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胜利前进。

根据一九五七年六月二十七日

《人民日报》刊印

# 中共中央关于在一两个月后 吸收一批高级知识分子 入党的通知

(一九五七年六月二十八日)

各省(市)委、自治区党委、中央各部委、中直党委、国家机关党委：

过去几年来，我们对于在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的工作注意得不够，特别是对于在高级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的工作更注意得不够。现在看来，这种情况已经被资产阶级右派野心分子所利用。右派野心分子企图在教育、科学、文艺、卫生、技术、新闻等工作中夺取领导权，作为夺取全国领导权的第一步，因而他们在知识分子中特别在高级知识分子中大量发展组织，并把反动分子和不满我党的分子放在领导地位，利用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提出推翻党的领导的主张，提出资产阶级的路线来同党的路线对抗。这些情况在最近的“大放大鸣”的过程中暴露得极为突出。我们为着加强对于教育、文化、科学、卫生等部门的党的领导，为着进一步团结和教育知识分子，同时给反共派一个有力的答复，就必须继续在高级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必须唤起各级党委充分地认识到党

的组织工作的方针应该同党的团结知识分子的政治方针相符合,应该是向知识分子开门,而不是向他们关门。经过这次“大放大鸣”,在高级知识分子中已经大致分清了左、中、右,这是发展党员工作的极为有利的条件。因此,中央认为有必要在一两个月之后,首先接收一批在这次运动中表现好的左派高级知识分子入党。对于那些已经参加了其他民主党派的高级知识分子,在吸收入党时,除了极个别的关系全国的重要分子须报请中央批准以外,一般按照普通党员入党手续办理,不须报请中央批准。他们入党以后,不要退出原来的民主党派,不要改变他们的社会地位(例如,原为人民代表的,仍为人民代表),并且要保证他们仍有充分的时间进行自己的业务工作,而不是入党之后就荒疏了自己的业务。他们入党时,不必一个一个地登报,但可在征收告一段落的时候,作一次综合的报道。

你们接到这一通知以后,应立即进行准备工作,并在半月内把你们的具体计划上报。

中 央

一九五七年六月二十八日

根据中共中央文件刊印

# 关于一九五六年国家决算和 一九五七年国家预算草案的报告\*

(一九五七年六月二十九日)

李先念

各位代表：

现在，我代表国务院提出《关于一九五六年国家决算和一九五七年国家预算草案的报告》，请予审查。

## 一、一九五六年国家决算

一九五六年国家决算收入二百九十七亿五千四百四十四万四千元，为预算的百分之一百点四。其中，本年收入二百八十七亿四千三百四十万零六千元，为预算的百分之一百点四二；上年结余收入十亿零一千一百零三万八千元，为预算的百分之百。一九五六年国家决算总支出三百零五亿七千四百一十三万八千元，为预算的百分之一百零二点六六。将一九五六年同一九五五年作比较，剔除不可比的部分，即在收入中剔除这两年的上年结

\* 这是李先念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 议上的报告。

余收入和国外借款收入，在总支出中剔除一九五五年决算时用结余拨付的银行信贷资金和地方预算周转金，则一九五六年收入实际增长百分之十五点八二，支出实际增长百分之十七点九九。

一九五六年收支相抵，当年支出大于当年收入十八亿三千零七十三万二千元。除去使用了一九五六年预算所列的上年结余收入十亿零一千一百零三万八千元以外，预算赤字为八亿一千九百六十九万四千元。为了弥补这个赤字，中央财政动用了一九五四年决算时在银行存储备用的结余款项五亿零四百三十九万六千元，地方财政动用了以前年度中央拨给地方作为周转之用的结余款项一亿三千四百九十九万九千元，其余一亿八千零二十九万九千元是从银行透支解决的。

这里所说的收支数字，是按照已经降低的重工业产品内部调拨价格换算出来的。我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关于一九五六年国家预算的报告中，曾经说到，一九五六年要降低国营工业主要生产资料产品的内部调拨价格，国家预算收支数字须要在执行中加以换算和调整。这个报告里所用的数字，除了同以前年度作比较的地方，仍然按照原来的老价数字计算以外，都是重工业品降低调拨价格以后经过换算的新价数字。

一九五六年各类收入完成的情况如下：

(一)各项税收共收到一百四十亿零八千八百二十九万九千元，为预算的百分之一百零一点九四。其中，工商税一百亿零九千八百三十六万六千元，为预算的百分之



一百零二点九四；农业税二十九亿六千五百四十万零一千元，为预算的百分之九十八点一九。

(二)企业和事业收入共收到一百三十四亿二千六百三十九万八千元，为预算的百分之一百点三四。其中，工业各部门收入五十四亿四千六百八十一万九千元，为预算的百分之九十六点一二；铁道、交通、邮电等部门收入二十一亿三千一百七十三万三千元，为预算的百分之一百零一点九二；商业、粮食、对外贸易等部门收入四十四亿一千三百八十七万二千元，为预算的百分之一百零三点三五。

(三)债务收入共收到七亿二千三百九十五万四千元，为预算的百分之九十七点五四。其中，公债收入六亿零六百五十三万五千元，为预算的百分之一百零一点零九；国外借款收入一亿一千七百四十一万九千元，为预算的百分之八十二点五五。

(四)其他收入共收到五亿零四百七十五万五千元，为预算的百分之七十四点零八。

一九五六年各类收入同一九五五年相比，各项税收增加百分之十一点九五，企业和事业收入增加百分之二十五点五八，债务收入(不计算国外借款收入)减少百分之二点零六，其他收入减少百分之四十二点零四。

一九五六年国家决算收入比上年有不小的增长，主要收入项目一般是完成得较好的。完成较好的原因：第一，一九五五年农业大丰收，为一九五六年轻工业生产提供了较为充足的原料，城乡经济都比较活跃，增加了财政

收入。第二，一九五六年动用了历年财政结余，扩大了基本建设的规模和国家各方面的支出，这样，虽然引来若干紧张情况，但是也增加了当年的税收和企业利润。第三，一九五六年许多轻工业品的产量增加很多，从国外进口的高级消费品也较往年为多。这些轻工业品和高级消费品，有的税率较高，也为国家多提供了一部分财政收入。

一九五六年也有一些项目没有完成预算所规定的收入。农业税因为去年夏季部分地区小麦受灾，产量减少，质量降低，减少了收入。工业收入因为有的部门增加人员过多，工资增长也有一部分超过了原来的计划，加大了成本，减少了利润，再加上工作中还有其他一些缺点，因而没有全部完成利润上缴任务。国外借款收入因为是根据拨付的物资结算的，一九五六年这些物资没有按计划全部运到，或者运到较晚，没有在年内办理结算，所以没有完成预算收入。其他收入也没有完成，主要是因为各种零星收入如清仓物资变价收入、公产出租收入、契税收入、罚款收入等，都较前减少了。

一九五六年各类支出的情况如下：

(一)经济建设费共支出一百五十九亿一千五百一十三万二千元，为预算的百分之一百零四点零九。其中，工业支出八十八亿二千七百五十万零八千元，为预算的百分之一百一十点九四；农业、林业、水利等支出二十二亿八千四百四十二万二千元，为预算的百分之一百零五点三六；铁道、交通、邮电等支出二十七亿八千二百一十八万一千元，为预算的百分之一百零一点零七；商业、粮食、

对外贸易等支出九亿三千九百七十九万六千元，为预算的百分之一百一十点五一。

(二)社会文教费共支出四十五亿九千五百九十万零四千元，为预算的百分之一百一十八点二七。其中，文化、教育、科学、卫生等支出四十亿零二千零七十七万九千元，为预算的百分之一百一十五点六七；抚恤、社会救济等支出五亿七千五百一十二万五千元，为预算的百分之一百四十点三四。

(三)国防支出六十一亿一千六百五十六万九千元，为预算的百分之一百零二点三四。

(四)行政管理支出(包括公安、司法、检察费)二十六亿五千九百六十四万一千元，为预算的百分之一百一十一点三二。

(五)债务支出七亿二千一百八十九万元，为预算的百分之九十六点三。

(六)对外援助支出四亿零四百万零二千元，为预算的百分之九十一一点九。

(七)其他支出一亿六千一百万元，为预算的百分之六十七点二八。

一九五六年各类支出同一九五五年相比，经济建设支出增加百分之二十二点八一，社会文教支出增加百分之三十九点八二，国防支出减少百分之五点九，行政管理支出增加百分之二十九点六，债务支出增加百分之十点零八，对外援助支出增加百分之二点七六，其他支出增加百分之六十点六。一九五六年支出中，用于各类基本

建设的投资共为一百三十九亿八千六百万元，占决算总支出的百分之四十五点七四，比上年增长百分之六十二。

一九五六年国家各类支出中，除了债务支出、对外援助支出和其他支出三类没有用完预算所规定的数额以外，经济建设支出、社会文教支出和行政管理支出等主要项目都超过了预算。超过的主要原因如下：

第一，一九五六年遭受了严重的自然灾害，国家在有关防汛、排水、堵口、复堤、救济和修复等方面增加了开支；由于灾荒的影响和实际执行中有困难，原来决定由地方在农业税附加中自行解决的一半小学教育经费，也改由国家预算拨款补助了一部分。

第二，一九五六年在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高潮中，各方面的积极性很高，许多事业计划原来就订得不小，在执行中间又超过了计划，增大了支出。

第三，一九五六年企业、事业职工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工资增长的幅度，部分地超过了原来的计划，特别是人员的增加超过计划更多，除了影响企业部门的上缴利润以外，还增大了各种事业费和行政管理支出。

第四，一九五六年降低了国营工业主要生产资料产品的内部调拨价格以后，按照规定，应当相应地减少这些产品生产部门的收入，同时减少这些产品使用部门的支出。但是在实际执行当中，有一部分支出没有完全核减下来，以致发生亏损一亿四千六百万元。前面所说的一九五六年赤字八亿一千九百万元之内，是包括着这笔数字的。

第五，一九五六年在预算管理的某些方面也控制较松，追加了一些不急需或者不很必要的开支。

一九五六年国家预算收支的增长，保证了建设事业的资金供应，促进了工农业生产的发展，有力地支援了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

一九五六年，我国的建设事业获得了极其巨大的胜利。基本建设投资的增长速度，大大超过了以往年度的增长速度。在这一年，我国工业、农业、交通运输事业都有了很大的发展。许多用现代技术装备起来的工厂、矿山和水利工程，已经投入生产或者开始使用，更多的规模巨大的建设项目，已经开始施工或者继续施工。许多我国从来不能制造的重要的现代工业产品，已经从我们自己的工厂里开始制造出来了。一九五六年工业产值比一九五五年增长的部分就有一百三十九亿元，比一九四九年全部工业产值一百零八亿元还多。一九五六年农业生产虽然遭受了几十年来最严重的一次自然灾害，虽然农业生产合作社刚刚建立，组织和领导生产的经验不够，但是，粮食的产量仍然超过了一九五五年，除了棉花、油菜籽等少数农作物的产量低于一九五五年以外，其他许多农作物的产量仍然保持或者超过了一九五五年的产量。一九五六年，国家和农民进行了空前规模的农田水利建设，全国增加灌溉面积一亿多亩，这个数字相当于解放以前我国原有全部灌溉面积的三分之一以上。

一九五六年，我国基本上完成了农业和手工业的合

作化，私营工商业的绝大部分转为公私合营企业，或者组织成为合作商店、合作小组。我国生产关系的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改变，为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极其广阔的前途。

一九五六年，我国就业职工人数增加了二百三十万人，企业职工、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工资，平均增长了百分之十四左右。在农村中，除了灾区和个别工作较差的地区以外，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大多数社员在不同程度上增加了收入。一九五六年文化、教育、科学、卫生事业也有了较大的发展。

一九五六年我国各族、各阶层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社会主义积极性和生产情绪空前高涨。广大的职工、农民、军队官兵、知识分子、工商界人士、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以及其他爱国人士，在各自的岗位上，对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先进生产者和先进工作者运动在各行各业中相继开展，劳动模范和先进人物一批又一批地涌现出来。广大人民群众对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美好前景充满着信心和热望。在我国帮助工作的苏联和其他兄弟国家的专家们，也充分表现了国际主义精神，提供了辛勤忘我的劳动。

一九五六年我国经济、文化工作各个方面的成绩是巨大的，这是无可怀疑的。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和广大群众建设热情的空前高涨，是国家预算收支能够有较大增长的可靠基础；而国家预算收支的增长，又是促进工农业生产和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保证。

一九五六年国家财政工作在取得重大成绩的同时，也发生了一些缺点和错误，这些缺点和错误是应当正视的。现在，就几个重要问题说明如下：

（一）一九五六年预算执行的结果，支出大于收入，出现了赤字。从预算本身的收支数字来看，赤字为八亿一千九百六十九万四千元；从当年收入和当年支出的数字来看，支出大于收入十八亿三千零七十三万二千元。根据历年的情况，每年预算执行的结果，都是当年收入大于当年支出，有一定的结余。国家将这些结余拨给银行或者存入银行，增加银行的信贷资金，以解决各企业部门、农业和手工业生产合作社以及其他经济单位增加贷款的需要。一九五六年年初编制预算的时候，由于对社会主义高潮下的新情况估计不足，仍然根据过去的经验，在预算收入中列了一笔上年结余。这样，一开始就把预算的底子打大了一些，而在预算执行当中，又由于前面所说的种种原因，先后追加了一些支出，以致执行的结果，收入虽然有所超过，但支出超过较多，不仅动用了原列的上年结余，而且出现了赤字，要从银行动用财政的历年结余存款和从银行透支。

（二）一方面，财政上从银行动用了历年结余款项，并且从银行透支了一部分款项，因而增大了银行的支出；另一方面，银行本身发放的贷款不但不能缩减，而且超过了原来的计划。原计划增加农业贷款十一亿二千万，结果增加了二十亿三千万（包括救灾贷款在内）；原计划增加手工业、公私合营企业贷款二亿九千万，结果增加

了九亿四千万元。在银行信贷收入方面，由于商业部门一九五六年销货较多，归还了一部分贷款，城市人民储蓄也超过了计划，使收入有所增加。但是整个说来，银行存款收入增加得少，贷款支出增加得多，收支相抵还有相当大的差额。为了弥补这个差额，国家相应地增加了货币的发行，以适应当时的需要。同一九五五年底比较，一九五六年年底市场货币流通量增加了十六亿九千万元（一九五七年五月底统计，已经回笼了九亿七千万元）。当然，从一九五六年的经济情况看，货币流通量也是需要增加一部分的。因为一九五六年工农业生产发展了，商品流通扩大了，原有的市场货币流通量已经不足以适应新的经济发展的需要；并且由于农业合作化的基本完成，过去农民是以粮食、棉花等农副产品为储存手段的，现在这些农副产品主要由农业合作社集体出售了，农民储存的货币就比过去增加了，货币流通量也应当有相应的增加。因此，一九五六年增加了的货币流通量，分析起来，一部分是生产发展和商品流通扩大所正常需要的；一部分是农村经济情况变化以后农民储存所需要的；只有一小部分在一个时候是超过正常需要的。

（三）财政支出和银行发放的贷款都是要购买物资的。财政收支发生赤字和银行存款放款发生差额，就会引起若干商品供应的紧张和国家商品物资库存的减少。根据有关部门的统计，一九五六年国家商品物资库存总值比上年减少了约二十亿元。商业部门多卖出了这些物资，基本上保证了主要物资的供应，同时也向银行归还了



一部分贷款，抵销了银行的一部分信贷支出。应当说，在一九五六年的具体情况下，为了保证经济建设的加速发展和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进行，动用一部分库存物资，以支持财政支出和贷款的发放，是完全必要的。在我国，仅商业各部门就经常保有二百——三百亿元的周转和库存物资，动用二十亿元的物资并不会影响大局，今后主要物资的供应还是有保证的。

综合上述各点来看，一九五六年财政收支和银行信贷收支都发生了差额，结果，就使货币流通量增加了一些，商品物资库存减少了一些。一九五六年国家究竟多用了多少钱呢？前面所举的几个数字是有交错重复的。我们研究，大约多用了二十多亿元，即：商品物资库存减少的部分，加上货币流通量超过正常需要的部分，就是多用了的数字。

总的说来，一九五六年国家预算和信贷的支出，绝大部分是正确的，只有一部分是用得多了或者用得不适当。一九五六年各方面工作的发展是迅速的，成绩是巨大的，缺点和错误只是部分的。从财政工作来说，成绩也是基本的，缺点错误是次要的。对于一九五六年的工作，作这样的估价是不是恰当呢？我们认为是恰当的。我们还不能忘记，一九五六年建设事业的巨大进展是在遭受严重自然灾害的情况下取得的。国家为了领导人民战胜灾荒，先后拨款五亿七千六百万元（包括有关防汛、抢险、堵口、复堤、救济和修复等费用）；发放救灾贷款二亿八千万元；并且从全国各地向灾区调集了大量的粮食。从去年七月

到今年六月底，国家对受灾省区供应的粮食，同上一个粮食年度比较，增加七十亿斤。这样，经过各方面的努力，除了工作中发生了缺点和错误的个别地方以外，灾区粮食供应未断，国家供应的粮食价格不涨。如果我们回想一下解放以前的几次大灾荒中，灾区物价狂涨、生产停顿、无数灾民流离失所、饿死冻死，而剥削者侵夺土地、囤积居奇、乘机发财的景况，那么，就丝毫用不着怀疑，如果不是在今天的社会主义制度下面，如果没有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没有粮食统购统销的正确政策，要平稳地渡过这样严重的灾荒，是不可想像的；而在这样严重的灾荒情况下，要在建设事业的各个战线上取得这样巨大的成就，更是不可想像的。其次，我们特别不能忘记，一九五六年建设事业的巨大进展是在翻天覆地的社会大变革的情况下取得的。本来，任何社会制度的大变革和社会经济的重大改组，通常总不可避免地要给社会经济生活带来大的波动。但是在我们的国家里，完成这样的大革命，几乎没有引起什么显著的经济上的波动。正是因为一九五六年的灾荒是平稳渡过的，社会变革是进行得很顺利的，人们就往往忽视这些重要情况，不去足够地估计我们曾经是在怎样的情况下进行建设和取得成绩的。总之，对我们的工作应当有全面的、恰当的、实事求是的估价。不正视缺点，就不能认真地总结经验，接受教训，提高工作；但是，不足够地估计成绩，就会看不见主流，就会伤害群众的积极性，使人民群众迷失前进的方向。

一九五六年各方面工作中的经验是丰富的。从国家

预算的编制和执行中，我们取得了这样一条经验，这就是：预算收支、信贷收支、物资供求三者都必须平衡，并且相互结合。这就是：

第一，国家预算收支的平衡，必须同银行信贷收支的平衡结合起来，统一安排。我们国家的资金，是通过国家预算和银行信贷两种方式来分配的。国家预算不仅要保证经济建设和各方面事业开支的需要，同时还要保证银行发放必要的工商业贷款、农业贷款和其他各种贷款的需要。如果只考虑国家预算收支的平衡，不考虑银行增加信贷资金的需要，那么，尽管预算收支平衡了，但从国家整个资金的收支来看，仍然会是不平衡的。

在我国，银行信贷具有怎样一种性质和作用呢？大家知道，在经济事业中，国家拨出基本建设投资，修建了厂房，安装了机器以后，还必须有一定数量的流动资金，用于购买原料及其他周转的需要，才能进行生产。国营商业部门和供销合作社经营采购供应业务，也需要大量的流动资金。所有农业生产合作社和手工业生产合作社，所有其他集体经济单位和个体经济单位，也都需要一定的流动资金和周转资金。一切企业和经济单位所需要的流动资金和周转资金，是分为这样两个部分的：一部分是各企业各经济单位自己掌握使用的资金，就是自有资金；另一部分是需要贷款解决的资金，就是信贷资金，其中主要是用来解决短期周转和季节性周转的资金。这种信贷资金，在我国是由国家银行集中管理和经营，随时贷给各用款单位的。仅有各企业各经济单位自有的流动资金和

周转资金，没有这种信贷资金，或者这种信贷资金没有达到社会经济生活所需要的一定数量，就不可能维持社会的正常生产、正常商品流通和正常的经济生活。

为什么银行发放贷款所需要增加的信贷资金，必须由国家预算加以保证呢？这是因为：一、我国的经济是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社会流动资金和周转资金必须有计划地进行安排；二、我们必须基本上稳定物价，不允许银行任意发行货币，引起物价波动；三、国民经济在不断地发展和扩大，各企业各经济单位对流动资金和周转资金的需要不断地增加。因此，银行的信贷资金必须逐年有所增加，而且需要有可靠的来源。银行的信贷资金从哪里来呢？一个来源是各企业、各经济单位、机关、团体、学校暂时闲置存入银行的资金和城乡人民的储蓄；另一个来源是银行在正常需要的范围内所发行的货币。但是，在我国目前的情况下，银行的信贷资金仅仅依靠这两个来源是不够的。这个不够的部分就是我们所说的信贷收支差额。为了弥补这个差额，使之达到平衡，只能依靠国家预算拨款来解决。因此，银行每年需要由国家增拨的信贷资金，应当看作是国家建设事业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投资，应当由国家预算有计划地给予保证。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国家预算收支的平衡必须同银行信贷收支的平衡结合起来，统一安排。至于银行如何正确地运用信贷资金、企业如何节约地使用流动资金的问题，这里就不多说了。

第二，预算和信贷的平衡，必须考虑物资供应的平

衡。预算的支出和信贷投放，是要用来购买物资的。如果财政收支发生赤字，信贷收支发生差额，最后都要用物资来抵付。因此，财政支出和信贷投放的多少，要根据物资供应的可能情况来决定。如果财政支出和信贷投放过少，就会影响正常的经济周转，影响建设事业的正常发展。如果财政支出和信贷投放过多，就会使社会购买力超过物资供应的可能，造成物资供应的紧张情况，甚至影响市场物价的稳定。所以说财政收支和信贷收支的平衡，必须考虑物资供求的平衡。

一九五六年的经验证明，处理财政问题，不仅要考虑财政的收入和支出，而且要考虑财政同经济的关系。一九五六年国家预算执行的结果，如果单从财政来看，赤字八亿一千九百万元，只占整个预算支出的百分之二点六八，在我们这样的国家，仅仅这个数字，看起来并不算大。但是把预算、信贷、物资三个方面结合起来，就可以看出它对于国家库存物资和市场供应所发生的若干影响。一九五六年我们的缺点在哪里呢？缺点就在于没有根据全面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经济大发展的情况，照顾信贷资金大量增加的需要，没有在国家预算中拨付银行必要的信贷资金，这是一九五六年信贷支出多于收入和商品库存减少的重要原因。一九五六年在财政信贷都有差额的情况下，为什么又没有发生大的问题呢？这是因为一九五六年我们有历年积存下来的较为充裕的物资，所以尽管供求关系有些紧张，仍然保证了物资的供应和市场物价的基本稳定。但是一九五六年的货币流通量是增加得

多了一些。这些多了的货币，有一部分是要在今年购买物资的。这对今年各项事业的安排有一定的影响，需要我们在今年大力增加生产，节约开支，增加库存物资，而只要我们注意了这样做，暂时的困难是不难克服的。

一九五六年工作中的另一条经验，就是国民经济计划和国家预算的编制，除了注意当年的预算收支、信贷收支和物资供求的平衡以外，还应当瞻前顾后，注意年度之间的相互衔接，避免过大的起伏。我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经济落后的农业国，工业原料的很大部分来自农业，国家资金来源的很大部分也直接或者间接同农业有关，而农业的收成是不稳定的，丰收和歉收是很难预料的。一旦发生灾荒，就要增加当年的财政支出，减少当年的财政收入，特别是要减少第二年的工业生产、物资供应和财政收入。同时，我们的国家还处在建设的初期，家底还薄，各种物资的储备较少，今后也只能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逐步增加储备。在这种情况下，年度之间的发展速度有快有慢，是不可避免的，在特殊情况下，大的起伏也难以避免，要求年度之间的发展速度完全均衡是不合乎实际的。但是，年度之间的起伏过大，特别是在发展速度必须减缓的时候，就会给建设事业和人员的安排，带来若干困难。为了减少这种困难，我们在安排国民经济计划和国家预算的时候，应当瞻前顾后，注意衔接。这就是说，决定基本建设的规模，不仅要看本年有多少建筑材料，而且要看以后年度可能有多少建筑材料；决定工业生产的发展速度，不仅要看本年有多少原料，而且要看以后年度可能

有多少原料；决定商品供应的数量，不仅要看本年有多少商品，而且要看以后年度可能有多少商品。进一步说，建设什么项目，生产什么产品，供应什么商品，本年多少，以后年度多少，也应当力求符合实际情况的要求。由于我们的国家有了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制度，就有可能有计划地照顾年度之间的衔接，自觉地调节年度之间的起伏幅度，尽量避免过大的起伏。在一九五六年，由于前几年财政和物资有些结余，一九五五年农业获得丰收，由于许多新建工程经过前几年的准备，勘察设计已经完成，国外设备大量进口，技术力量已有增强，在这些条件下，将基本建设、工业生产和商品供应的增长速度适当地加快一些是应当的，也是可能的。但是现在看来，由于我们的经验不够，增长的幅度有一部分是过大了。假使一九五六年少增长一点，能够多余出若干原材料和商品物资，对于顺利地安排一九五七年的计划是会有帮助的。一九五六年的经验说明，在丰年的时候，应当预计到以后可能的歉收；在有余的时候，应当预计到以后可能发生的不足。这就是说，应当逐步地扩大物资储备，以丰补歉，以有余补不足，保证我们的建设事业顺利地前进，更加发挥计划经济的优越性。

财政、信贷、物资三者必须平衡，编制计划和预算必须瞻前顾后，这都是客观规律的要求。我们应该努力掌握和适应这种规律。当然，现实生活是复杂生动的，我们所说的平衡只能是相对的平衡。客观情况是不断变化的，农业的丰歉和其他预计不到的情况，都会在经济生活

中引起新的问题，我们的工作也不可能没有缺点。因此，计划平衡了，在执行过程中还会出现不平衡。旧的不平衡克服了，还会出现新的不平衡。我们的任务就在于加强计划和预算执行的组织工作和检查工作，克服不断发生的不平衡，推动建设事业的前进。

## 二、一九五七年国家预算的安排

为了巩固一九五六年经济战线上的伟大胜利，超额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并且为第二个五年计划打下良好的基础，一九五七年必须根据财力和物力的条件，适当地安排国家建设的发展规模和速度。一九五七年国家预算草案，就是根据这种精神和一九五七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的指标编制的。

一九五七年国家预算收入为二百九十二亿九千二百九十三万四千元，同一九五六年当年收入二百八十七亿四千三百四十万零六千元比较，增加百分之一点九一；一九五七年国家预算支出也为二百九十二亿九千二百九十三万四千元，同一九五六年决算三百零五亿七千四百一十三万八千元比较，减少百分之四点一九。收支平衡。

一九五七年国家预算同银行信贷计划是互相结合的。一九五七年银行信贷计划，根据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的计算，支出大于收入六亿元，由国家预算增拨信贷资金六亿元来解决。信贷收支平衡。

一九五七年国家预算收入中，各类收入的数字如下：



(一)各项税收一百四十五亿七千零二十万零九千元，为上年决算数的百分之一百零三点四二。其中，工商税一百零五亿元，为上年的百分之一百零三点九八；农业税二十九亿九千零二十万九千元，为上年的百分之一百点八四。

(二)企业和事业收入一百三十六亿六千八百九十六万九千元，为上年的百分之一百零一点八一。其中，工业各部门收入五十八亿八千零七十八万五千元，为上年的百分之一百零七点九七；铁道、交通、邮电等部门收入二十二亿六千四百六十九万二千元，为上年的百分之一百零六点二四；商业、粮食、对外贸易等部门收入四十一亿零一百八十二万六千元，为上年的百分之九十二点八九。

(三)债务收入六亿二千三百三十二万元，为上年的百分之八十六点一。其中，国内公债六亿元，为上年的百分之九十八点九二；国外借款二千三百三十二万元，为上年的百分之十九点八六。

(四)其他收入四亿三千零四十三万六千元，为上年的百分之八十五点二八。

为什么一九五七年各项税收和企业事业收入比一九五六年增长不多呢？从工农业生产的情况看，一九五七年工业总产值将增长百分之四点五，农副业总产值将增长百分之四点九，工业成本也将有所降低，而且增产节约运动正在开展，预算收入似乎应当有相当的增加。但是，由于一九五七年有以下一些情况，就使税收和企业事业

收入不能有相应的增长：

第一，工业总产值虽然将有增长，但各种工业产品的比重发生了变化，国家收入也相应地发生了变化。由于一九五六年农业生产遭受了灾害，原料不足，有些轻工业品的生产增长速度下降了，有些轻工业品的产量甚至比上年减少了。例如按计划产量，棉纱减产六十一万一千件，就要减少财政收入三亿多元，估计实际执行中棉纱减产还不只此数。

第二，一九五七年农业产量将有增长，农业税征收额在继续稳定的原则下稍有调整。但是一九五七年秋季征收的粮食，要到一九五八年才能变成现款纳入预算，因此，一九五七年国家预算所列的农业税收入，还不能相应地增加。一九五七年预算中所列的农业税收入，包括上年秋征公粮的变价款、本年夏征公粮的变价款，还有一小部分本年秋征当中征收的现款。一九五六年秋征，因为灾荒减免较多，减征细粮约二十亿斤，合现款一亿七千万元，影响了一九五七年农业税收入。

第三，一九五七年开始实行了去年已经确定的提高盐税税率的措施，增加收入一亿元；但是，为了鼓励农民养猪，一九五七年降低了屠宰税的税率，提高了生猪的收购价格，减少收入一亿五千万万元。

第四，一九五七年提高了某些高级消费品的销售价格，增加了一部分财政收入；但是，在调整生猪和油菜籽、芝麻等油料的价格当中，收购价格提高得多，销售价格提高得少，减少了一部分财政收入。这部分减少了的收入，

远多于提高某些高级消费品价格所能增加的收入。

第五，一九五七年政府向供销合作社征收的所得税将比去年增加；但是，国营商业部门由于上述价格的调整和国外进口商品特别是高级消费品的减少，减少了一部分收入。

第六，一九五七年工业、交通、建筑、商业等部门由于上年增加的人员过多，使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受到了一些不利的影晌；一九五七年职工全年的工资都必须按照去年提高了的标准和级别发给，而去年是从四月份或者七月份才开始提高的。这样就增大了企业成本，相对地减少了企业利润。

由于以上各种原因，就使一九五七年税收和利润很难有较大的增加。至于商业、对外贸易等部门的收入所以比一九五六年减少，其原因除了上述有关的因素以外，还由于有些地区已经把过去由商业部门向工业部门加工订货的办法，改变为由工业部门向商业部门销售成品的办法，这样，商业部门的收入就要有一部分转到工业部门。虽然这部分转移出去的收入，仍然纳入了国家预算，但预算中所列的商业收入是减少了。

为什么一九五七年债务收入比一九五六年减少了呢？因为一九五六年债务收入中，有国外借款收入一亿一千七百四十一万九千元，而一九五七年债务收入中，国外借款收入只有二千三百三十二万元。这两年的国外借款收入都是过去借款协定中留下来的尾数。开国以来，苏联政府贷给我国的款项，折合人民币共为五十二亿九

千四百万元，其中，一九五二年以前使用的部分二十一亿七千四百万元，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使用的部分三十一亿二千万元。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和建设初期，苏联曾经几次给予我们贷款援助，我们对于这种援助表示衷心感谢。现在，经过几年的时间，应当说，我们已经更有条件依靠国内自己的积累来进行建设了。

一九五七年其他收入的所以减少，是因为各种零星收入减少了。

一九五七年国家预算收入虽然比一九五六年增长得很少，但是把一九五七年和一九五六年两年收入的增长速度平均计算，每年增长百分之十点八一，这样的增长速度，我们认为是不慢的。我们回顾一下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以来各个年度的当年预算收入(为了便于比较，剔除国外借款收入，统按老价计算)：一九五三年二百一十三亿二千四百万元，一九五四年二百五十三亿五千三百万元，一九五五年二百五十五亿四千六百万万元，一九五六年二百九十五亿八千六百万万元，一九五七年预计三百亿零七千万万元。五年收入总数预计共为一千三百一十八亿七千九百万万元，将比五年计划原列国内收入总数一千三百零二亿一千七百万万元超过十六亿六千二百万万元，即超额完成百分之一二八。(五年计划原列综合财政计划收入一千三百五十三亿二千八百万元，其中包括企业提取的大修理基金和企业奖励基金四十三亿八千七百万万元，国外借款收入七亿二千四百万元，扣除这些数字，列入预算的国内收入为一千三百零二亿一千七百万万元。)如果再加

上五年中国外借款收入三十一亿二千万元、一九五二年以前滚存下来的结余收入十七亿六千八百万元、一九五五年和一九五六年动用地方作为预算周转之用的款项一亿四千七百万万元，预计五年收入总数共为一千三百六十九亿一千四百万元。

从预算收入的来源分析，五年来各类经济成分的缴款在预算总收入中所占的比重，起了很大的变化。国营经济和供销合作社、手工业合作社缴款所占的比重，一九五三年为百分之六十五点四，一九五七年将上升到百分之七十九点二；农业生产合作社和个体农民缴款所占的比重，一九五三年为百分之十三点四，一九五七年将下降到百分之十一点二；公私合营工商业缴款所占的比重，一九五三年为百分之一点二，一九五七年将上升到百分之七点二；私营工商业缴款所占的比重，一九五三年为百分之十六点九，一九五七年将下降到百分之一点一；此外，还有很小的一部分缴款，如规费、契税和一般城市居民购买的公债等，很难区分经济成分，这些缴款所占的比重一九五三年为百分之三点一，一九五七年将为百分之一点三。国家预算收入来源的这种变化，反映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也表明我国财政经济的基础是更加巩固了。

一九五七年国家预算支出中，各类支出如下：

(一)经济建设支出一百三十六亿八千三百零五万一千元，占预算支出总数的百分之四十六点七一，为上年决算数的百分之八十五点九三。

(二)社会文教支出四十八亿三千五百二十一万六千元,占预算的百分之十六点五一,为上年的百分之一百零五点三六。

(三)国防支出五十五亿二千三百三十二万元,占预算的百分之十八点八五,为上年的百分之九十点三。

(四)行政管理支出二十四亿四千五百三十一万四千元,占预算的百分之八点三五,为上年的百分之九十一一点九九。

(五)债务支出八亿二千九百零四万四千元,占预算的百分之二点八三,为上年的百分之一百一十四点八四。

(六)对外援助支出五亿零七百八十九万元,占预算的百分之一点七三,为上年的百分之一百二十五点七一。

(七)其他支出二亿七千五百三十四万四千元,占预算的百分之零点九四,为上年的百分之一百七十点零八。

(八)增拨银行信贷资金六亿元,占预算的百分之二点零五。

(九)总预备费五亿九千三百七十五万五千元,占预算的百分之二点零三。

一九五七年经济建设支出中,工业支出八十一亿二千一百二十五万六千元,为上年决算数的百分之九十点零九;农业、林业、水利等支出二十亿零四千四百三十九万六千元,为上年的百分之八十九点四;铁道、交通、邮电等支出二十二亿一千六百四十四万二千元,为上年的百分之八十点一八;商业、粮食、对外贸易等支出二亿五千

六百九十二万二千元，为上年的百分之二十七点二一。

一九五七年经济建设支出虽然比一九五六年减少了，但是在资金的使用上，根据保证重点、保证急需的原则，作了更加合理的分配。在工业方面，着重保证了冶金、煤炭、电力、化学（包括化学肥料）、建筑材料等原材料工业、动力工业以及同农业直接有关的工业的投资；着重保证了那些有原材料、有销路的轻工业的投资；同时对于重工业和轻工业当中生产设备能力有余或者目前并不急需的投资，作了适当的削减。在农林水利方面，着重注意了兴修小型农田水利、推广优良品种、防治病虫害、提高农业技术、防治牲畜疫病等广大农民迫切需要而短期内又容易收效的支出；减少了一部分可以暂时缓办的大型水利工程和增购拖拉机等方面的支出，削减了一些可以节省的开支。在铁道、交通、邮电方面，着重保证了增建铁路复线、加强现有线路和修建几条铁路新线的支出；减少了由于某些新线工程的推迟而在今年可以减少的支出。在商业、粮食、对外贸易等方面，今年支出削减得较多，只能保证修建十分急需的仓库和加工工厂的需要。

一九五七年建设资金的分配当中，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前提下，适当地安排了轻工业的投资。在我国当前的情况下，轻工业的原料大部分是农副业产品，而农副业产品的增长有一定的限度，从国外进口也有一定的限制，并且，现有的轻工业设备，有的还没有充分发挥生产能力。这些情况，在安排轻工业投资的时候是必须加以考虑的。一九五七年农林水利支出总额比去年减少了。减

少的原因，除了上述大型水利工程和增购拖拉机的支出有所削减以外，主要是由于去年水灾较大，中途追加了较多的防汛、抢险、堵口、复堤经费，今年这方面的开支减少了。如果扣除这笔数字，今年国家预算中工业支出同农业支出的比例，实际为三点九七比一，同一九五六年的四点一九比一相比较，农业支出的比例是略有提高的（这里所说的工业支出和农业支出，都包括基本建设投资和各种事业费）。此外，一九五七年国家发放的农业贷款，最高发放额将达三十九亿元，除去到期收回的部分以外，年末余额将由去年年底的三十亿零三千万元增加到三十三亿三千万元。这笔资金只要运用得合理，将对支援农业生产和巩固农业合作化发生重大的作用。

一九五七年社会文教支出中，初等和中等教育支出二十二亿六千九百三十三万元，为上年决算数的百分之一百一十二点七五；高等教育支出六亿三千六百六十五万六千元，为上年的百分之一百零一点六四；科学支出三亿二千七百一十四万二千元，为上年的百分之一百三十三点九一；文化支出一亿七千二百三十五万一千元，为上年的百分之九十点八五；卫生支出四亿六千九百零六万七千元，为上年的百分之九十五点九四；抚恤和救济支出五亿八千三百四十万零四千元，为上年的百分之一百零二点六六。

一九五七年初等、中等教育支出和高等教育支出是增加的。但是因为：第一、中小学和高等学校支出中，教职员的工资占着很大的比重。第二、一九五六年各级学



校招生较多,这些学生是在下半年入学的,只需要开支半年的教学费用,一九五七年却需要开支全年的教学费用。因此,一九五七年教育事业还只能根据提高质量、稳步发展的原则来安排。在这种情况下,大中学校招生人数将比去年有若干减少。对于这个问题,需要在社会上和中小学毕业学生中间进行解释说服工作,提倡不能升学的中小学毕业学生参加农业生产和其他可能参加的劳动。同时还要提倡由人民群众自己出钱,集体地或者个体地办学。只要依靠群众,办法是有的。

一九五七年科学研究事业支出和抚恤救济支出也是增加的,只有文化、卫生支出有所减少。文化和卫生事业因为去年有了较大的发展,今年在财力增长较少的情况下,把发展的速度减缓一些是可以的。

今年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同去年迅速发展来的情况来比较,速度虽然减缓了一些,但是由于今年的发展是在去年大大扩展了的基础上进行的,所以事业的规模,仍然有相当的扩大。比如一九五七年各级学校的在校学生人数同一九五六年比较,还将有不少的增加。高等学校学生将由四十万人增加到四十四万人;中等学校学生将由五百一十六万人增加到五百五十七万人;小学学生将由六千三百四十六万人增加到六千五百八十一万人。

一九五七年国防支出比一九五六年作了较大的削减。近年来,我国的国防支出和它在预算中的比例是一再减少的。国防支出的数字,一九五五年为六十五亿元,一九五六年减为六十一亿一千七百万元,一九五七年再

减为五十五亿二千三百万元；国防支出在预算支出中所占的比例，一九五五年为百分之二十二点一，一九五六年减为百分之二十，一九五七年再减为百分之十八点八五。

一九五七年行政管理支出也比一九五六年有较大的削减。一九五七年行政管理支出中，人员的工资开支比一九五六年仍然是增加的。一九五七年行政管理支出的减少，主要是大大降低了机关公用费标准的结果。一九五七年年初已经适当地降低了一部分高级干部的工资。在乡村的基层经济单位、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和乡干部，他们的工资去年有些地区提得过高了一些，今年准备由地方根据具体情况适当地降低一点。这样做，就减少的支出来讲，数字不大，但有利于这些人员在生活上更加接近群众，更加便于团结群众，做好工作。

一九五七年债务支出比一九五六年增加了一亿多元，主要是因为国内公债还本付息的支出比去年增大了。

一九五七年对外援助支出比一九五六年增加了一亿多元。一九五七年的其他支出包括补发转业军人复员费、民兵业务费、少数民族地区补助费等，也有一些增加。

一九五七年增拨银行信贷资金六亿元，这是一九五六年所没有的。这笔资金实际上也是国家预算用于经济建设方面的支出。它对于满足国民经济各部门贷款的需要和保证信贷收支的平衡，有重要的作用。

一九五七年总预备费比一九五六年少列一亿九千万元。但是，一九五六年确定预算的时候，有一部分支出，比如增加工资等约四亿元，已经预定要在总预备费内

开支。今年预定要在总预备费内开支的，只有准备调整某些农产品购销价格将发生的亏损大约一亿元。一九五六年预算中列有上年结余收入，今年则相反地在支出中增拨了银行信贷资金。今年预算中所列的物资储备支出和去年预算比较虽然有所减少，但比去年决算中的物资储备支出却增加不少。因此，今年预算的后备力量，实际上是比去年充实一些的。

以上是一九五七年国家预算草案中各类支出的主要情况。从各类支出的分配上看，国防支出和行政管理支出在国家预算支出总数中所占的比重，进一步降低了。五年来，用于经济、文化建设的费用和用于国防、行政的费用在国家预算当中所占的比例，已经起了显著的变化。国防和行政管理支出所占的比重，一九五三年为百分之三十六点三，一九五七年下降为百分之二十七点二；经济建设支出和社会文教支出所占的比重，一九五三年为百分之五十五点九，一九五七年上升为百分之六十三点二二。这说明国防和行政管理费用的降低，使国家有可能将较多的资金用于各方面的建设事业。其次，从有关人民生活方面的支出来看，一九五七年职工工资标准虽然不拟提高，但是，由于一九五六年增加工资和提升级别是从四月和七月开始的，今年则是按全年计算，这样，绝大部分职工今年全年的工资收入实际上是比去年增加了。一九五七年农业税负担基本稳定，农产品价格提高较多，只要没有较大的灾荒，农民的收入也将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进一步提高。一九五七年人民的购买力将比去年继续增

长，国家供应的商品总值也将比去年有所增加。有些商品的供应量虽然比去年减少了，但是同一九五五年以前各年比较起来，仍然是增加得不少的。如棉布的供应量（包括各种用布），一九五三年为一亿三千零三十四万匹，一九五四年为一亿二千八百七十万匹，一九五五年为一亿二千八百八十五万匹，一九五六年为一亿七千四百零五万匹，一九五七年预计为一亿五千一百万匹（一九五七年是按第二期布票折扣供应的数字计算的）。这说明国家在调整建设规模和速度的同时，还是尽可能地注意了有关人民生活方面的需要。最后，从国家预算支出总数来看，五年支出总数将达到一千三百六十九亿一千四百万元，比五年计划原列五年预算支出总数一千三百零九亿四千一百万元超过五十九亿七千三百万元，即超过百分之四点五六。这说明五年的财政支出保证了国家建设资金的需要，情况是良好的。

一九五七年上述国家预算的各类支出数字，是按照各种支出的门类，也就是按照预算所列的支出科目划分的。各类支出数字中，包括用于基本建设的支出、事业费支出和其他方面的支出在内。如果单就基本建设投资来看，一九五七年各类基本建设投资额（包括经济、文教、国防、行政方面的基本建设在内）共为一百一十一亿元，为一九五六年基本建设投资额的百分之七十九点三七。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以来历年基本建设的数字是：一九五三年六十五亿零六百万元，一九五四年七十四亿九千八百万元，一九五五年八十六亿三千二百万元，一九五

六年一百三十九亿八千六百万元，一九五七年预计一百一十一亿元。一九五七年基本建设投资虽然比一九五六年减少了，但如果把一九五七年和一九五六年两年投资增长的速度平均计算，每年增长百分之二十七点七，速度还是不小的。

一九五七年经济建设支出和基本建设投资，在资金分配当中削减了可以不办或者可以缓办的部分，保证了必须保证的项目和开支；在照顾必要的服务性和辅助性建设投资的条件下，削减了非生产性建设的投资，增加了生产性建设的投资；只要执行当中能够努力进一步改善设计和施工，那么，较少的投资，可以发挥较大的效能。国家建设的规模仍然是巨大的，前进的速度仍然是相当快的。一九五七年基本建设计划执行的结果，五年基本建设投资额将达四百七十七亿二千二百万元，比五年计划所规定的四百二十七亿四千四百万元超过四十九亿七千八百万元，超过百分之十一点六。

上述国家预算的各类支出数字，包括中央预算和地方预算在内。按中央预算和地方预算来划分，一九五七年中央预算支出二百零七亿三千二百三十一万五千元，占国家预算总支出的百分之七十七点七八，比上年决算数减少百分之四点五六；地方预算支出八十五亿六千零六十一万九千元，占国家预算总支出的百分之二十九点二二，比上年决算数减少百分之三点二八。一九五七年地方预算支出中，经济建设支出为二十八亿四千三百零二万五千元，占地方预算支出总数的百分之三十二点七一，

为上年的百分之八十六点四三；社会文教支出为三十三亿九千六百二十三万一千元，占总数的百分之三十九点零七，为上年的百分之一百零六点一三；行政管理支出为二十亿零七千八百五十四万四千元，占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三点九一，为上年的百分之九十二点四二；其他支出为一亿二千四百一十六万一千元，占总数的百分之一点四三，为上年的百分之一百一十点六六；地方预备费为一亿一千八百六十五万八千元，占总数的百分之一点三七。一九五七年地方预算支出虽然比上年略有减少，但是，中央预算支出减少的比例还要大一些。从五年的情况来看，五年来在国家预算支出总数中，中央预算支出和地方预算支出所占的比例发生了相当的变化。中央预算支出占国家预算支出的比例，已经由一九五三年的百分之七十五点八四，下降为一九五七年的百分之七十点七八；地方预算支出占国家预算支出的比例，已经由一九五三年的百分之二十四点一六，提高到一九五七年的百分之二十九点二二。这种比例的变化表明，近年来地方建设事业有了较多的发展。同时也表明，原来由中央各部门管理的事业，有一部分已经开始划交地方管理了。今后还将有步骤地继续下放一些企业和事业，这是有利于发挥因地制宜、因事制宜的效果，从而有利于国家建设事业的发展的。

一九五七年地方预算支出中，各少数民族地区的预算支出共为九亿三千七百六十九万七千元，占地方预算支出总数的百分之十点九五。过去几年来，对少数民族

地区有照顾不够的地方，但是少数民族地区的支出在国家预算和地方预算支出中所占的比重，还是有所增长的，并且增长的速度超过了其他地区的增长速度。

以上一九五七年国家预算收支的安排，已经在可能范围内照顾了各部门、各地区事业发展的需要。我们要将落后的农业国变成先进的工业国，并且要在进行建设的同时，逐步改善人民的生活。我们的国家还穷，能够积累的资金是有限度的。有些同志希望自己的部门和地区多分配一些，使事业能够发展得更快一些，这是可以理解的，从一个部门和地区来看，也可能有道理。问题是国家必须兼顾资金积累和人民消费，钱只有这么多，只能权衡轻重缓急，适当加以安排。一九五七年国家预算收支，从全面来看，可以说是恰当的，也是大体合理的。

一九五七年国家的预算，收入和支出是平衡的，并且注意了预算收支、信贷收支和物资供求的平衡，注意了年度之间的安排，只要在执行当中加强努力，做好工作，不但可以完成，而且有可能做到收多于支。一九五七年预算收入，虽然有上年农业灾歉的影响和其他不利因素，仍然比一九五六年稍有增长；一九五七年预算支出，虽然比一九五六年有若干减少，仍然保证了国家建设事业迅速发展的需要。所以我们认为一九五七年的国家预算是可靠的，也是积极的。

一九五七年已经过去几个月了，这里简要地报告一下一月到五月国家预算收支的情况。一月到五月，国家预算收入共为一百二十七亿三千七百万元，完成年度预

算草案数的百分之四十三点四八，相当于去年同期的百分之一百零九点一四；国家预算支出共为一百零七亿八千五百万元，为年度预算草案数的百分之三十六点八二，相当于去年同期的百分之九十七点六六。五个月收支相抵，收大于支十九亿五千二百万元，而一九五六年同期收大于支六亿二千六百万。在收入方面，除了某些工业部门利润上缴的情况较差以外，一般完成情况是比较好的。在支出方面，基本建设共拨款四十七亿二千一百万元，按照原定的计划给予了充分的保证；行政费及其他可以节减的开支，则有了显著的降低。由于收支相抵暂时有了一笔为数不小的余数，已经减少了一部分市场货币流通量，增加了一部分库存物资，对物资的供应和市场情况，开始发生了有利的影响。所有这些情况说明，几个月来国家预算的收支情况基本上良好的。但是也应当看到，目前农业收成还不能确定，还有发生自然灾害的可能；同时，尽管由于机关、团体的公用开支大大减少，有关物资的供求情况有了显著的缓和，但是，人民所需要的若干种日用品的供求情况仍然比较紧张。因此，必须继续兢兢业业，加强工作，不能放松努力。

### 三、一九五七年工作中应当注意的几个问题

国家财政是国家各方面经济活动和各方面工作的集中反映。为了保证国家预算的完满实现，不仅要进一步



改进财政管理工作，而且要依靠有关经济工作的加强。现在，我就执行一九五七年国家预算应当注意的几个问题，提出如下意见：

第一，必须普遍深入地全面地开展群众性的增产节约运动。

中共中央、国务院已经分别作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指示，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也作了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号召。开展这一运动的关键，在于使全体经济工作人员、国家工作人员和全国人民深刻地认识增产节约、勤俭建国的重大意义。增产节约、勤俭建国是扩大社会主义积累、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方法。我们要把落后的农业国尽可能快地变为先进的工业国，要在进行建设的同时逐步改善人民的生活，就需要有大量的建设资金，需要合理有效地使用财力物力，这只有依靠全国人民辛勤劳动，艰苦奋斗，克勤克俭，精打细算，才能逐步得到解决。一九五七年由于我们要克服各种建设事业在前进当中若干暂时的困难，要进一步缓和部分物资的供应紧张，在这种情况下，从各个方面努力增加生产，厉行节约，就具有更为重大的意义。并且，根据毛泽东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指示，增产节约运动的开展，还有利于改进工作人员的工作作风和生活作风，使他们更加接近群众，同群众共甘苦，以便加强全国人民的团结，调动一切力量，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因此，增产节约不应当看作是临时性的措施，而应当看作是国家建设上长期的根本的方针；不仅具有重大的经济意

义，而且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勤俭建国，勤俭办企业，勤俭办合作社，勤俭办一切事情，应当是每一个经济工作人员、国家工作人员和全体人民牢牢记住的格言，一时一刻也不应忘记。

我国人民历来是勤劳朴素的。我们的革命队伍，从来就有着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开国以来，我们在各项建设事业中继承了这种传统，基本上是以勤俭的精神来建国的。今天的政府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能够领导人民勤俭建国的政府。过去几次开展增产节约、反对铺张浪费的运动，都曾经取得重大的成就。但是，应当看到，在建设事业和各方面的工作中，浪费现象还是不少的，还必须厉行节约，反对浪费。

从一九五七年的情况看，国家经济活动的各个方面有没有增产节约的潜力呢？我们认为潜力是很大的，门路是很多的。一九五七年各部门基本建设投资将有一百一十一亿元；工业各部门的生产成本费用仅中央十三个工业部就有一百一十二亿元；商业各部门的商品流转费用将有七十多亿元；国家各部门的各种事业费总数将有五十亿元（其中经济各部门的勘察设计、科学研究、技术推广和人员培养等事业费二十亿元；文化、教育、卫生、社会救济的经费三十亿元）；国家机关、军队、团体和企业、事业管理机关的公用开支和管理用费（不包括工资开支）将有三十七亿元左右（其中办公杂支、会议费、邮电费、差旅费、家具购置费等项公用开支约有二十多亿元）。上述各项数字是从几个不同分类的角度来说的，这些数

字之间有交错重复的地方。但是从这些数字可以明显地看出，在这样巨大的经济活动当中，增加百分之一的收入或者节约百分之一的支出，就是一个可观的数额。问题在于能否把潜力发掘出来。只要我们在基本建设方面能够改善设计，改进施工的组织和管理，深入动员内部资源，在保证质量的条件下降低造价；只要在工业生产方面能够根据原料和销路的可能条件，积极增加生产，提高质量，增加品种，降低成本；只要在商业方面能够合理地调整商业网，减少商品流转环节，克服商品调运中的不合理情况，努力降低商品流转费用，减少商品损耗；只要国营经济各部门和供销合作社能够在使用流动资金方面减少不必要的积压，节约地使用资金；只要在各种事业费方面能够克服许多事业单位由于人员编制和开支定额缺乏严格管理而造成的某些浪费现象；只要机关、团体和企业、事业管理单位能够认真精简机构人员，节约公用开支和管理费用；只要这样，所有以上任何一个方面的增产节约，都将有重大的意义，都能够为国家积累巨大的财富或者节减大量的开支。关键在于发动和提高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依靠群众的智慧，发掘潜力，开辟门路。

近几个月来，增产节约运动已经在许多地方和许多部门变成了广大群众的实际行动，并且开始获得了显著的成效。许多事实有力地说明，在基本建设方面，一个工业区内根据可能的条件，统一规划、协作建厂，就可以统一使用人力物力，减少分散重复，为国家节约大量资金，并且加快施工的速度。一个建设单位，适当地调整和改

进厂房工程设计，合理地降低辅助性建筑的标准，精打细算，就可以只用较少的投资，达到原定的工程建设要求。许多事实说明，企业单位发动广大职工和工程技术人员，千方百计地想办法，就可以在保证质量的条件下，大大地增加生产。例如煤炭工业部系统，一月到五月原煤的产量超过计划一百三十二万吨。冶金工业系统，一月到五月钢材的产量超过计划十一万吨。有些企业单位曾经认为经过多次的生产竞赛，已经是“潜力挖尽、生产到顶”了，现在又大大地发掘出新的潜力，突破了原定的计划。几个月来，机关、部队、团体和企业、事业管理机构的公用开支普遍降低了，例如全国行政机关的公用开支标准比去年降低了百分之三十一，而行政管理工作和业务活动并没有受到什么大的影响。勤俭节约、艰苦朴素的优良风气也正在增长，这是人民群众所欢迎的。所有以上事实有力地说明，只要发动群众，把群众的智慧集中起来，就可以用同样多的钱，办更多的事，就可以大大地增加生产，节约开支，为国家建设事业带来巨大的利益，加速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

但是应当指出，增产节约的重要意义并不是所有部门、所有单位、所有工作人员都已经了解了的。现在，还有少数人员甚至有一些单位的领导人员，还怕本部门、本单位降低标准、减少投资吃了亏，还在不加区别地追求高的标准，看不起那些因陋就简、艰苦奋斗的企业和事业。他们有的还在只图自己方便，不愿意和同一地区其他单位共同协作，互相支持。此外，也还有少数人仍然在讲求

排场,追求享受,比生活、比待遇。以上这些作法,不仅浪费国家资财,腐蚀一部分干部的思想,而且会加深人民内部的矛盾,应当进行必要的批判和教育。

在增产节约运动中还应当防止和克服这样一种想法,就是有些同志认为一九五三年和一九五五年已经进行过增产节约运动,今年还是那一套;有的甚至片面地强调过去增产节约运动中发生过的缺点,怀疑增产节约运动的积极意义。我们说,增产节约确实是“旧事重提”,但是在建设社会主义这一伟大而艰巨的事业中,却一时一刻也不能离开这一条平凡浅近的真理。过去的增产节约运动,尽管发生过若干缺点,那些缺点应当作为经验教训,用来改进今后的工作,但是不能因噎废食夸大缺点,动摇增产节约这一根本的方针。

在增产节约运动中还要防止和克服这样一种想法,就是有些同志认为今年的计划所规定的增长速度较低,任务比较容易完成,于是能多做的不多做了,能做得快的做得慢了,能做得好和省的不去积极争取了。一定要说清楚,在规定全面计划的时候,应当强调把计划放在充分可靠的基础上,但在具体执行当中,则应当充分地发挥积极性,力争完成和超额完成计划所规定的各种指标。用同样的钱,办较多的事,用同样的原材料,生产出更好的产品,注意产品的数量,同时注意产品的质量 and 生产安全,依然是一切生产和事业中应当积极努力的目标。正是因为一九五七年调整了建设规模和速度,在具体执行中反对消极松劲的保守思想就更为重要。

目前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在已有的基础上把增产节约运动推广到所有的部门、所有的单位去。要认真检查这一运动开展的情况，结合整风运动，克服各种思想障碍，进一步把群众发动起来，把运动深入下去，并且坚持下去。现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快要结束了，我们已经有了—些经验教训，应当认真地接受这些经验教训，纠正缺点，改进工作，才能使增产节约运动收到更大的效果，把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引向新的胜利。

第二，为了完满地实现一九五七年国家预算，还必须继续稳定市场物价。

在我们的国家里，价格是调节国家积累和人民生活的—重要杠杆之一，在一定的限度内价格对生产和消费起着影响和调节的作用。近几年来，我国市场物价基本上是稳定的。所以说基本上稳定，是因为粮食、布匹、棉花、煤炭等大多数生活必需品和多数工业品都没有涨价，或者基本上没有涨价。就是在去年那样严重的灾荒下，这些商品的价格也还是基本上稳定的。这些主要商品的价格的基本稳定，保障了人民生活的安定，并且为国民经济的顺利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但是应当承认，去年下半年以来，有一部分商品的价格上涨了一些，这些商品是：若干副食品、某些高级消费品、食盐和若干手工业品。这些商品的涨价，有以下几种情况：

(—)国家为了扩大油料作物的种植和鼓励养猪，提高了菜籽、芝麻等油料和生猪的收购价格，同时也适当地提高了食油和猪肉的销售价格。

(二)为了有助于平衡商品供应同社会购买力之间的差额,并且适当地增加一些财政收入,国家提高了呢绒和高级纸烟的价格,提高了盐税的税率和食盐的销售价格。

(三)开放了国家领导下的自由市场以后,自由市场上若干手工业品和小土产品,由于供不应求,有的还由于成本增加,价格提高了。

(四)有些城市由于去年蔬菜生产遭受了自然灾害,由于今年春寒,上市季节推迟,也由于城市人口增加很快,蔬菜产量赶不上需要,因此,蔬菜的价格上涨了,有些地方在缺菜季节上涨的幅度是相当大的。

以上这些价格的变动,可以总括为这样两类:一类是属于国家主动调整的。其中,有的是为了更好地发展生产,以便逐步增加产品供应,保证价格的稳定;有的是为了在不影响广大人民生活或者对广大人民生活影响不大的条件下,适当地调节供求关系,增加财政收入。国家对于这些商品价格的调整,是有计划和经过计算的;调整的幅度和范围是有控制的;调整了价格的商品,在全部商品中只占很小一个部分,大部分并没有变动。国家在有些价格的调整中,固然增加了一部分财政收入;但是在另外一些商品价格的调整中,却减少了财政收入。整个说来,减少的财政收入大于增加的财政收入。另一类物价的变动是自由市场上价格的变动。自由市场上的价格在很大程度上受着价值规律的支配,某些商品价格的上涨,对于刺激生产,充裕货源,使价格趋向稳定,有一定的作用。近来自由市场上有些商品上市量已经增多,就说明了这种

作用。但也正是由于这样，自由市场上的物价会有一时的一定幅度的摆动，这是早已说过的。总起来说，这个时期许多主要的商品没有涨价，国家对若干商品价格的调整基本上也是必要的；自由市场上若干商品价格的变动是不可免的，在一定意义上也有积极的一面。观察物价问题，决不能忽视当时的具体条件，试想，在一九五六年灾荒的情况下，假使像旧社会那样听由市场涨落，没有国家的有力掌握和在地区间和季节间作大力的调节，那么，今天的市场物价将会是什么样子呢？当然，由于这个时期若干商品销售价格的上漲，职工的生活是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影响的，但是，在去年增加工资以后，职工支付能力也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他们的生活还是有所改善的。农民由于若干农产品提高了收购价格，增加了收入，他们的所得也大于所失。

关于这个时期物价的调整和变动，从工作上来检查，是有缺点的。第一，由于一九五六年人民的购买力增加过多，购买力同商品供应量之间发生了一定的差额，这种差额对商品供求关系所发生的作用，在自由市场上表现得较为明显。第二，由于一九五六年基本建设使用的物资多了，在原材料的分配当中，对于一般为市场服务的生产、主要是手工业生产所需要的原材料，照顾不够，分配较少，使这些生产受到一定的限制，产品数量不足以供应市场的需要。第三，国家领导下的自由市场开放以后，工作一下子还跟不上去，管理和组织都还不够；手工业合作化的初期，由于经验不足，有些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管理费：



用和公共积累多了一些，特别是自由市场上手工业原料的价格也在上涨，因而增大了成本，我们在这方面的努力是不够的。第四，蔬菜品种零星复杂，需要保持鲜嫩，由国家全部经营有困难，但有一个时期国家有关主管机关对于蔬菜的生产和供应，确实有注意得不够的地方。这也是某些城市蔬菜价格上涨的一个原因。第五，也还有少数商品，价格虽然没有变动，但是由于生产和经营管理方面有缺点，商品质量降低了，消费者是有意见的。上述几种主要由国家经营的商品的价格，大都是在今年三、四月份调整的，加上这一个时期自由市场上若干手工业品、副食品、小土产品和蔬菜的价格上涨，这样，就容易在人们中间造成一种印象，觉得物价提高了很多。这也是近来各方面对物价问题反应较多的一个原因。

当前在物价管理上，国家应当采取怎样的方针呢？我们认为应当采取继续稳定物价的方针。对于主要由国家经营的商品，除了个别不合理的以外，一般不再调整商品价格。这样做，是有利于国民经济计划和国家预算的顺利执行的。对于自由市场，国家应当通过必要的经济的方法和行政的方法，加强领导和管理，尽可能地避免价格摆动过大的情况。国家有关部门应当在可能范围内增加手工业生产所需原材料的供应，使手工业能够逐步增加生产，降低产品成本，以便适当地稳定手工业品的价格。各城市和工业区的有关部门应当切实注意对蔬菜生产和供应的领导，增加产量，改善供应，并且由国家经营必要数量的蔬菜，以便运用经济力量，积极影响和调节蔬菜价

格。当然，某些手工业品的价格，由于今年原料还不充裕，自由市场上手工业原料的价格还高，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的管理还需要逐步积累经验，所以短时期内还难有较大的回落。自由市场上副食品、小土产品和蔬菜的价格，还需要在努力增加生产和适当加强市场管理当中逐步加以稳定，这是要有一定时间的。今后的物价，还会有若干小的摆动，完全没有摆动是不可能的，我们的责任在于控制和调节这种摆动的幅度。关于物价问题，还应当说到，在目前情况下，个别地区，个别商品提高收购价，降低销售价是可能的。但是要求普遍地进一步提高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或者不适当地降低工业品的销售价格，是不现实的。因为这种做法要增加社会购买力，而这种社会购买力的增加，又要受消费物资供应的限制。在不能供应更多的消费物资的情况下，这样做的结果，就会扩大人民购买力同物资供应之间的差额，影响市场物价，人民还是得不到实际的好处。

第三，为了完满地实现一九五七年国家预算，还必须进一步加强财政管理，改进财政制度。

加强财政管理，是帮助企业、事业、基本建设单位和国家行政机关改善组织管理、实行经济核算、实行节约制度的一个重要方法，也是国家推动增产节约、克服因循落后、反对贪污浪费的有力武器之一。一九五六年由于某些方面放松了管理和监督，因而助长了若干资金分散和浪费的现象，一九五七年应当克服这些缺点，在继续发挥各地方、各部门积极性的同时，加强财政管理，厉行财政

监督。

一九五七年国家预算批准以后，在执行当中根据实际情况作必要的调整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在必须有所追加和追减的时候，应当坚持这样的原则：追加支出，必须考虑有无资金来源；追减收入，必须考虑相应地减少支出。一九五七年在预算执行当中，应当给予各地方和各主管部门相当的灵活性。在支出指标的范围内，在各个不同项目之间，除了下列限制以外，各地方和各主管部门可以依照规定，进行调剂，机动处理。这些限制是：基本建设支出不能调作一般支出；主要工程的支出，不能调作次要工程的支出；救灾、防汛、修复等费用，不能调作其他无关的支出。一九五七年基本建设工程的拨款，根据国家的定额和标准进一步核减下来的部分，可以由主管部门另行安排使用。但是基本建设不能挪用生产资金；不能把基本建设费用摊入现有生产的成本，或者用其他减少利润的方法，扩大基本建设的投资。基本建设工程的年终财务结算办法须要研究改进，以便配合计划领导和经营管理的改进，克服年终赶工和下年年初窝工的现象。一九五七年在预算执行过程中，各种预算收入必须按照规定及时地缴入国库；各种预算支出，必须按照事业的进度和工程的进度及时拨款；企业部门的流动资金必须进一步核实，加速资金的周转。目前从国家使用的全部流动资金来说，数目是不算多的，但有些企业流动资金过多，有闲置和浪费的现象。事业单位的各种费用必须进一步核减，并且核实定额，节约使用。企业和事业单位的

管理费用和公用开支，凡是能够和国家机关的开支标准统一起来的，应当按照当地国家机关的开支标准执行。在工资开支方面，国务院已经确定的一九五七年不提高工资标准、一般不提升级别和控制人员增加的规定，应当严格遵守。一九五七年国家的农业贷款，基本上应当在计划指标的范围内合理发放，农产品预购定金也应当按照计划加以控制。

应当指出，加强财政管理，厉行财政监督，是为了推动事业的发展，而不是妨碍事业的发展。严格的财政监督和单纯的财政观点是两回事。管理得过严过多，因而限制各地方、各部门的积极性是不对的；放松应有的管理和控制，因而使国家的资金分散和浪费也是不对的。我们的财政工作，检查起来，对于一些大的方面还没有很好地管理起来，而对于若干小的方面却有管得过多过细的现象。这是财政工作中一个重要的缺点，今后应当切实地加以改进。

为了加强财政管理，提高财政工作，有必要考虑逐步改进有关的财政制度。

财政制度是保证财政活动正常进行的重要工具。制度规定得合理，就能够充分发挥各方面的积极性，更好地推动增产节约，促进生产的发展和建设资金的积累。反之，就要影响各方面的积极性，不利于生产的发展和资金的积累。我们现行的制度，有的是有缺点的，有的原来适用，现在情况变化了，不适用了。现在看来，有些制度作些必要的修订还是可以继续使用的；另外一些制度，如财

政体制和企业财务管理制度，则必须考虑加以改变。

关于财政体制，一年多来已经作了多次的讨论，并且已经在某些具体问题上作了一些改进。这方面的问题，主要是必须划分中央财政同地方财政的权限和责任，将目前地方财政基本上由中央财政统收统支的办法，适当地加以改变，使地方可以在一定范围内自行安排收支，即是：给地方划定收支的范围，使地方有固定的收入来源，可以根据国家的政策和统一的计划，安排本地区的收支。这样才能使地方在既经划定的范围以内，在事业发展而收入增加的时候可以多支一些；这方面节约了，那方面可以多支；这一年有了结余，下一年可以继续使用；使用得越合理，可以办的事情越多。这样作，就可以将中央的统一领导、统一计划同地方的因地制宜、因事制宜结合起来，使财政工作更好地适应地方的实际情况，并且有利于进一步发挥地方组织收入、节约支出的积极性。

关于企业财务管理制度，应当考虑改变现行的收入全部上缴、支出全部另行拨款的办法，实行利润分成的办法，适当地扩大企业部门和企业单位在财务管理上的权限，使企业部门和企业单位能够以分得的一部分收入，解决自己一定的投资和其他必要的开支。这样作，就可以把企业的支出同企业本身的收入结合起来，把国家对企业的统一领导同每个企业在业务经营上的独立性结合起来，以便发挥企业部门和企业单位的主动性、积极性，使他们从物质利益上关心本部门本单位的财务情况，努力提高生产，降低成本，增加收入，节约开支。

此外，现行的税收制度也需要根据新的情况，进行必要的修改。关于工商税制，主要的问题是应当改变现行的多种税、多次征的办法，根据社会主义改造取得决定性胜利以后的新情况，简化税制，简化纳税手续，以便推动企业更好地加强经济核算，并且使国家的收入更加均衡和及时。关于农业税制，主要的问题是应当改变以户为征收单位和一部分地区实行累进税、另一部分地区实行比例税的办法，采用以农业社为征税单位，并且考虑统一实行比例税制的办法，以适应农业合作化以后的新情况。

过去的各种制度，是根据当时的具体情况制定的。前几年，在财政体制和企业财务管理制度上，集中管理较多，对于有力地统一全国的财政经济、平衡收支、稳定物价、支援抗美援朝战争以及开始进行有计划的经济建设，起了重大的作用。工商税制和农业税制对于保证国家建设资金的需要，调节各阶层人民的收入，配合社会主义改造，也起了重要的作用。问题是情况已经变化了，原来制度中合理的规定，已经不合理了，或者不完全合理了。对于这些制度，近年来我们也曾经作了一些修修补补的工作，但是现在仅仅这样做已经不够了。这些问题都是关系到很多方面的重大问题。从去年开始，我们对于这些问题，已经作了若干研究，拟订了若干个方案，有的正在进一步研究比较，有的准备选点试办，我们希望能够在一九五七年或者一九五八年逐步地解决这些问题。

以上是一九五七年工作当中应当注意的几个问题。

各位代表！一九五七年国家预算反映了我国人民进

一步发展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要求，反映了我国人民和平建设的强烈愿望。这个预算的实现，将要胜利地结束我国的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把国民经济引向新的高涨。在执行一九五七年国家预算的过程中，我们将遇到一些比较复杂的问题。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席的领导下，是无往不胜的，是没有什么困难不能战胜的。政府决心依靠全国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共同努力，顺利地完成一九五七年国家预算，实现国家建设计划。希望全国职工、农民、军队官兵、知识分子、工商界人士和其他爱国人民，一致行动，为完满地实现一九五七年国家预算而奋斗！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史料》第二辑  
《国家预算决算》(1950—1981)刊印

# 在科学规划委员会第四次 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五七年六月)

聂 荣 臻

一

从中共中央提出“向科学进军”的号召后，到现在已经一年半了。这个期间，中共中央又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个发展科学艺术的方针，并提出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指示，学术思想已渐趋活跃；国家在一九五七年给予科学事业以更大支持；中国科学家们在制定了十二年科学发展的远景规划<sup>〔1〕</sup>之后，又制定了一九五七年全国科学技术研究的年度计划。总的说来，我国科学事业正在全国规模上开始前进。科学家们的积极性是很高的。虽然，我国科学工作中还有不少的缺点和问题，需要及时采取措施加以解决，但是，以建设社会主义和繁荣科学文化事业为目的的向科学进军的时代，是已经开始了。

为了促进科学的发展，我们必须及时地解决科学事业发展过程中所提出的各种方针、政策和重大措施问题。



一年多来，科学界曾经反映出许多重大问题。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对这些问题都给予了密切的注意，并且已经或正在逐步解决这些问题。

正如大家已经知道的一样，繁荣科学艺术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正在大胆放手地积极贯彻执行中。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在根据广大科学家的意见领导科学家们制定了发展科学的远景规划之后，又决定了使科学规划委员会成为常设的机构。进一步的问题是：（1）远景规划应如何分年度实行起来；（2）科学队伍如何很好地组织起来，就是如何合理地解决中国科学院、高等学校、中央各产业部门研究机构和地方研究机构之间的分工合作问题，也就是要解决科学工作体制问题；（3）如何解决科学研究工作的条件问题，即图书、仪器、化学试剂、情报资料和科学家的时间等问题；（4）如何解决高级科学家的安排、使用和进修以及青年科学干部的培养问题；（5）怎样合理分配、管理和使用科学经费（包括科学基金）；（6）如何加强国际学术交流等。从去年十二月到现在这半年中，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集中力量加以研究的是一九五七年科学技术研究的年度计划，科学工作体制和科学研究工作条件三个问题，也是科学规划委员会第四次扩大会议上要讨论的三个主要问题。最近闭幕的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的讨论中，也表示出科学界是非常关心这些问题的。至于其余的问题，准备在今后逐步加以解决。

我现在仅就一九五七年全国科学技术研究计划、科

学工作体制和科学研究工作条件问题,说明基本情况,并提出解决这些问题的意见,请大家讨论。

## 二

首先谈一九五七年全国科学技术研究计划问题。

对科学技术的发展,作全国性的和相当长期的规划,对于我们是完全新的问题,作全国性的科学技术研究的年度计划也是一个新问题。从实践的经验看来,对全国的科学技术研究工作,在远景规划的和各部门现实要求的基础上每年作一次安排,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

今年年初各部门所提出的一九五七年研究题目,是很庞杂的。有些课题有过多的人去研究,有些必要的课题又没有人或过少的人去研究。一面是重复浪费,一面又有遗漏。因而,在人力、物力的使用上有很多不合理的现象。经过协调之后,突出了重点,除可以重复的以外,对不必要的重复则加以合并。虽然各个专业小组对于选择重点的尺度不尽相同,但经过协调以后的题目的情况有了较大的改善。当然这不等于科学家在选择研究题目时,只能按统一安排,没有必要的灵活性。凡是不能列入国家计划的,只要有可能,科学家仍有选择题目的自由。

有人曾经怀疑十二年科学技术远景规划的正确性。认为科学技术本身太复杂,而且十二年太长,变化太大,很难规划得准确;如果机械地加以执行,就有脱离实际的危险。这种疑虑是有一定道理的。我们对于这个远景规

划，是作为大体的方向来看的。在执行年度计划时，则根据实际情况加以必要的改变，应加的就加，应减的就减，应提前的就提前，应推迟的就推迟。因此，在一九五七年全国科学研究计划中，我们把五十七项重大科学技术任务中的一整项“西藏高原和康滇横断山区综合考察及其开发方案的研究”推迟了，增加和提前了九个中心问题，减少和推迟了七十五个中心问题，至于中心问题下的研究项目，则有相应的变动。

我们所进行的全国性的年度安排，是按照国家建设所急需的重大科学技术任务和基础学科，把中国科学院、中央各产业部门和高等学校的研究力量，按专业联系起来考虑的（地方研究力量，因情况还不甚了解，今年计划中未全面考虑）。这样的安排，自然地比较容易打破三方面的界限，统筹三方面的研究力量，并且兼顾研究、生产和教学三个方面的需要。我们这样做，虽然还缺乏经验，年度计划的质量也很不平衡，有些项目也还缺乏物质条件的保证，但现在看来，这还是较好的办法。

年度计划工作，促进了科学研究机构的调整。我国现有科学研究机构，有不少是比较有基础的；也有一些是基础不巩固，甚至于没有什么基础的；有些虽然也有些基础，但机构重叠，浪费人力物力。现在，研究任务既然有了比较合理的安排，某些太不合理的研究机构就应当跟着任务的变化作必要的调整。今年对医学、农学和机械三个方面，都有比较大的调整方案，也有比较大的收获。但整个说来，应当协调还没有协调好的单位还有一些，今

后还需要继续努力。不过，科学研究工作，需要有长期的稳定的环境，不必要的组织变动，应当避免。而且协调工作必须用协商方法进行。

今年年度计划的另一个收获，是进一步摸索了专业小组的作用。这样的专业小组有两个特点：首先，这种小组包括了中国科学院、高等学校和产业部门三方面的科学家；其次，这种小组中，除科学家外，一般还有有关部门的少数领导干部。由于有这两个条件，专业小组所提出的问题一般比较全面，使科学研究比较容易和生产、教学工作相结合，研究计划容易得到有关部门的支持，研究成果也比较容易推广。同时，这种专业小组，并不负责科学规划委员会的日常行政工作，小组的成员也不脱离原工作岗位，而只是在一定专业的范围内，对科学研究的方针、政策、计划和组织措施等提出建议，经过科学规划委员会或国务院批准后，即由有关部门负责去执行。对于自然科学的基础学科和哲学社会科学的专业小组的经验，还须进一步摸索。

但是，必须指出，今年的计划还只是一种尝试，有些方面做得较好，有些方面的收获还不大，还有不少的缺点和问题。还必须进一步总结经验，以指导今后的工作。

### 三

上述的协调工作虽然解决了不少问题，但要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科学院、高等学校、中央各产业部门研究机构

和地方研究机构之间的分工合作问题，还必须对于科学工作体制有一些原则性的规定。因为科学体制问题，不仅是目前的人力、物力的分配问题，它的更根本的意义，在于使全国的科学技术研究力量能在全中国科学研究工作系统中，按照合理的分工合作的原则，有计划地而又密切协作地进行工作。这是顺利完成国家的科学技术研究任务的一个重要保证。

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在一九五六年上半年已注意科学工作体制问题的研究，并已列为十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草案)中的一章。今年三月开始又根据毛主席的指示，进一步加以研究。各方面对于科学体制问题曾有争论，我们曾广泛地征求了各方面的意见，最后取得了大体上一致的认识。

当然，怎样才是最好的科学工作体制，国内外科学界现在还有不少争论。但从中国今天实际情况出发，参考各国经验，我国科学研究工作体制，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是可能作比较合理安排的。我国统一的科学研究工作系统，是由中国科学院、高等学校、中央各产业部门的研究机构和地方研究机构四个方面组成的。在这个系统中，中国科学院是全国学术领导和重点研究的中心，高等学校、中央各产业部门的研究机构(包括厂矿实验室)和地方所属的研究机构则是我国科学研究的广阔的基地。

我国有一个拥有必要的科学研究机构的中国科学院是完全正确的，是合乎世界科学发展总的趋势的。中国科学院不仅是科学家的荣誉组织和全国学术领导的中

心，而且是实际从事重点科学研究工作的地方。中国科学院现有研究机构，有些历史是比较长的，解放以来又有了较大的发展，作了不少工作，取得了不少成绩。中国科学院研究工作今后的发展方向，主要应注意重大科学基础理论问题、世界最新技术以及综合性的科学问题的研究。同时，应密切注意全世界和全国的学术活动，加强学部对全国科学研究工作的学术领导作用。特别要注意各门学科新的发展方向。在目前，条件还不够的研究机构，应首先研究生产建设中提出的一些当前的问题，逐步培养干部，积蓄力量。对于我国还没有的，而在外国已经研究出来的成果，凡是我们需要的，应首先加以掌握和应用。

国家必须在中国科学院所担负的重点任务上，积极予以支持。使中国科学院逐步形成一支坚强的科学队伍，使它在科学的若干主要的部门内，真正担当起突破阵地，开拓新的科学领域的任务。当然，并不是全国各方面比较有成就的专家都应该调到科学院的研究机构。

农学和医学是科学研究的两个方面，我国在这两方面的科学研究力量也比较大，应当积极发挥他们的作用。中国农业科学院已经成立，一个全国统一的医学科学院也正在形成中，必须逐步培养它们成为两个坚强的专业的科学院。

高等学校的科学研究工作，必须积极提倡，大力加强。教学和科学研究同样是高等学校的基本任务，两者不可偏废。这不仅是科学研究工作本身的需要，而且是

提高教学质量的基本方法。高等学校应同时注意基础学科和当前生产实践中所提出的科学问题的研究。各个院校必须根据各自的情况，分别作出具体安排，创造条件，努力使自己在某几门或某一门科学的领域内，逐步成为全国科学研究的中心或中心之一。高等学校的研究工作一般在教研室和实验室中进行，也可以逐步成立独立的研究室和研究所。除高等学校中特设的研究机构外，教师一般适宜于担负研究工作量较小和完成期限较宽的工作。

我们还必须大力加强中央各产业部门的科学研究机构，使它们能够结合生产需要，解决较专门的问题，使科学的新成果引用到生产中去，并根据生产中的新经验，进行科学的总结，来发展和丰富科学的理论。除各部建立的直属科学研究机构外，首先应十分重视厂矿的中心实验室。中央各产业部门的科学研究机构，在有关科学技术领域内，应努力使自己成为全国的研究中心。

各省、市、自治区必须重视科学技术的研究工作。在全国科学事业中，地方应密切结合本地区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需要开展研究工作，并应组织本地区可能组织的力量进行一些不是本地区直接需要的研究工作，以充分发挥本地区科学家的作用。地方的科学工作应充分依靠现有的研究机构和科学技术人才，多采取委托、合作等方式进行，只有在十分必要，而又有充分的条件，特别是有高级研究人员的条件下，才设立新的机构。中央各科学研究机构和高等学校，应为地方培养科学干部，特别

应注意培养少数民族的科学干部。

科学研究工作必须有适当分工,但更重要的,是必须强调协作。中国科学院必须经常关心高等学校、产业部门和地方的科学研究工作。中国科学院所担任的重点研究任务,除自己直属的研究机构所担负的主要任务外,也应采用委托研究的办法,充分利用高等学校和产业部门的研究力量。产业部门也应把自己所需要的研究工作,除自己的科学研究机构所担负的以外,尽量委托给高等学校。产业部门应积极支持科学院和高等学校的研究工作。地方也可以委托高等学校和中央各部门所属的研究机构进行研究工作。委托应经过双方协商同意,采取合同方式,在合同中应规定委托部门给被委托部门的物质和人力的支持。此外,还应该鼓励产业部门和科学院与高等学校合作,把规模较小的研究机构附设在高等学校内;在科学院高级研究人员中,应逐步推广在高等学校兼任教学、讲学和指导研究的风气,也应鼓励高等学校教师兼任科学研究工作,提倡理论结合实际,这对于发展生产、培养干部和科学研究,都是有益的。我国科学技术力量,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都是缺乏的,科学研究领导力量,更为紧张。应尽可能使现有的科学研究领导力量,同时兼顾生产(包括国防)、研究和培养干部三方面的任务。这应当是长期的方针。

新设的科学研究所,应先经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批准。新设的独立的研究室可以分别由科学院、中央各部门及省、市、自治区人民委员会批准,但应报国务院科



学规划委员会备案。

专门学会及其联合会和科学普及协会对于科学工作的发展有重大作用，政府应予以积极的支持。

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是掌管全国科学事业的方针、政策、计划和重大措施的领导机关。国务院交给科学规划委员会的任务有七个：(1)负责监督十二年科学技术远景规划的实施，特别是重点任务的实施；(2)负责汇总平衡全国科学研究工作的长期计划和年度计划，成为国家计划的一部分；(3)负责各系统间重要的协调工作；(4)管理国家重点研究任务的科学基金；(5)负责高级专家的安排、培养、分配和使用的计划；(6)负责研究和组织解决科学研究工作的条件问题(如图书资料、情报、仪器、化学试剂等)；(7)统一安排科学技术方面的国际合作工作。

根据目前已有的经验，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是依靠两种组织来进行工作的。一是专业小组，一是中国科学院、国家技术委员会、教育部和有关各部门。专业小组是按五十七项重大科学技术任务和基础学科来组织的。五十七项任务的实施，则是分别根据各项任务的内容，决定了主要负责单位。主要负责单位对于所负责的任务一般担负着较大的研究责任，并且负责这一方面的初步规划和协调工作。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对于中国科学院、国家技术委员会、教育部、第三机械工业部、国防部、农业部和卫生部，在上述七个任务范围内，实行统一归口管理。

各省、市、自治区有必要时应在人民委员会下设立科

学工作委员会。地方的科学工作委员会受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指导。它的任务主要有四个方面：（1）监督和帮助全国科学远景规划和年度计划中有关本地区部分的实施，协助管理中央各部门设在地方的科学研究机构；（2）结合本地区的需要和可能，对未列入全国科学规划的项目进行地区性的规划（年度的或二、三年的，不要太长）；（3）组织各有关方面的协调工作；（4）设法解决科学工作条件问题，开展服务性工作。由于各地情况不同，各地的作法，可以有些不一致。地方的科学研究经费应列入地方预算。

上面所讲的科学体制问题，主要是按照自然科学方面的情况讲的，但其中的主要原则，也适用于哲学、社会科学方面。关于哲学、社会科学方面的问题，另有专门发言。

#### 四

关于科学研究的条件问题。政府现在把科学研究工作的条件问题作为一个重要问题，系统地同时也是逐步地加以解决。

图书资料和科学情报工作，几年来是有所改善的。但工作还存在不少的缺点和问题。

几年来国家在图书方面支付了大量的经费和外汇，一九五六年仅购买资本主义国家的书刊所支出的外汇即为一百八十万英镑，一九五七年为一百五十万英镑。但是

这些图书的分配情况和使用情况是不能令人满意的。现在国际书店的订户达一万多户，订户十分分散，也有新设的机关、学校只有极少数能使用外文图书的人，动辄订购外文期刊数百种以至数千种，给国家造成很大的浪费。

图书馆的发展还缺乏全面的规划，目前国内较大的图书馆大体上分属于三大系统，即文化部、教育部和科学院，彼此还缺乏密切的联系与协作，藏书分散而又重复。大家都要求全，又都不可能全。都感房屋不足，人力缺乏。科学研究所需要的图书馆，是比较集中的和收藏丰富的图书馆，或是收藏质量比较高的专业的图书馆。我们打算在北京和上海根据现有的收藏条件，把几个较大的图书馆首先组织起来，形成全国中心图书馆。并在几个大城市组织地区中心图书馆，为全国科学工作者服务，并负责指导和帮助其他图书馆的工作。

目前图书的积压是很严重的。仅文化部系统的图书馆就有二千万册以上的图书尚未整理。另外有些城市还有积压在仓库里的图书，几年来无人过问。希望有关部门迅速组织力量，整理这些图书。图书馆之间应开展馆际互借工作。全国图书目录，应早日开始分批编辑。

去年科学院已经成立了科学情报研究所，经过将近一年的努力，已出刊了十一种科学情报和文摘。今后除应继续扩大出版外，还应密切注意当前世界科学发展动向，组织为科学研究服务的科学情报工作。各有关部门都应注意科学技术情报工作。

关于资料的供应，一年来虽然有些改进，但目前仍然

存在不少问题，主要是保密制度的修改和资料的管理办法还没有很好解决。当然，国家的机密必须保守，过去的问题是保密范围过大。今后应严格限制在有关国防、外交及少数重要经济技术的范围内。凡是研究工作需要的一般资料，应一律由有关部门供应，使用人员只要有所在单位负责人的介绍就可以了。资料多的部门应有专职人员负责进行整理、编目等工作，供给科学和教学工作者使用。目前，资料的整理和管理工作，各部门都应加以注意。国家技术委员会、国家建设委员会、农业部、地质部和国家统计局等单位应特别注意早日加强资料工作。国家档案局对于资料的供应和管理应与有关各部门协作，拟定全面计划，分期分类加以推行。当然，大家对于资料工作都是缺乏经验的，应开始去摸索经验，逐步加以改进。

关于仪器和化学试剂，首先是供需之间的矛盾。生产、修配及国外进口都还不能满足需要，例如商业部门所经营的化学试剂，一九五〇年不到二百种，一九五六年已经达到四千多种；仪器进口一九五六年也有一点三八亿元，但还不能满足需要。其次是自从去年对私营工商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以后，原有的供应之间的关系被打乱了，新的关系又未建立起来。又因并厂等原因减少了品种的生产或拒绝担任修配任务，就扩大了这个矛盾。去年第四季度以来，天津、上海等市都分别采取了措施，解决了不少问题，紧张的状态才略为改善。

要解决科学仪器和化学试剂的问题，根本之道是发展生产。国内已能生产而数量不够的要增加产量，不能

生产的要进行研究和试制。这一方面需要有关工业部门的努力,同时也需要各科学研究机构、高等学校和科学家们的大力支援。

仪器的修配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工作,因品种多,规格复杂,所需原材料特殊,一般地说生产工厂是不大欢迎修配业务的。为此,必须采取可能的措施,做出适当的规定来满足这一方面的需要。例如规定谁家生产的仪器谁家负责修配,生产工厂应留出一定力量接受修配任务,指定某些厂专门负责修理或是建立修配车间、工厂等。同时应向工厂职工说明修配业务的重要,不仅可为国家节省大量的物资和外汇,帮助科学研究的发展,而且通过修配业务还可以提高仪器工业的技术水平。

科学仪器和化学试剂的进口和供应问题也必须很好地解决,因为仪器和试剂一般是品种多,需要量小,临时需要多,业务又很专门,经营部门往往有很大的困难。再加上订货手续繁多,更易增加供需失调的现象,为此必须简化手续,改善业务。

为改善仪器、材料的供应、修配等业务,拟首先在北京、上海、天津、沈阳和广州五市成立服务机构,沟通供需关系,为全国科学研究机构和高等学校服务。这种服务机构,在其他重要城市也应逐步建立。

对于某些不利于科学研究工作的财务制度,应加以变更。

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指出仪器和化学试剂的浪费情况也是相当严重的。往往同一地区,甚至同一机构内

的各部分，都要各搞一套。像电子显微镜这样贵重的仪器，在北京就有五台，使用率很低。因此，必须提倡以勤俭建国的精神来办科学事业，反对本位主义，反对浪费。

科学规划委员会决定成立图书、资料、仪器、化学试剂四个小组负责指导这方面的工作。

很明显，科学家目前最迫切的要求之一，是研究工作的时间。周总理在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中着重指出要努力使科学家们有六分之五的时间进行业务工作。一年多来大部分科学工作者的时间保证一般是有改善的，对于少数担任领导工作较多或社会活动过多的科学家，时间问题还没有很大的改进。毫无疑问，有些科学家因为负责了一定的领导工作，有些重大问题的讨论和必要的社会活动是必须参加的，但减少一些不必要的兼职和社会活动，也是必要和可能的。这可以由兼职过多和社会活动过多的科学家们自己来安排，提出减少某些兼职的建议，各领导机关应予以积极的支持，减轻他们的不必要的负担，这对于加强科学研究工作是一个重要的措施。

## 五

同志们！我们前进道路上的问题是很多的，每一个问题的解决，都将推动我们前进。我们将和全国科学家合作，和有关部门合作，为中国科学事业的迅速发展而共同奋斗。

祖国的建设事业正日新月异的前进，祖国要求我们

的科学技术事业有效地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中国科学家们面临着光荣而艰巨的战斗任务。我们的士气是旺盛的，骨干也是有的，年青的科学技术队伍也是相当大的，国际合作的条件也是良好的，特别是苏联对我们大力的援助，是我们科学技术发展的一个重要条件。在“向科学进军”的号令下，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领导下，在全国人民热情的支援下，在我国科学家的辛勤努力下，我深信，中国科学事业一定能胜利前进，在向科学进军的道路上不断取得新的胜利。

根据国防科工委办公厅编的  
《聂荣臻讲话》刊印

## 注 释

〔1〕 一九五六年三月十四日，国务院成立科学规划委员会，开始制定一九五六年至一九六七年全国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十二年长期规划。在周恩来、陈毅、李富春、聂荣臻等人的领导下，根据知识分子会议的精神，于八月下旬至十月下旬召开了科学规划委员会扩大会议，对自然科学方面的科学规划工作作了全面深入的讨论，拟定了《一九五六——一九六七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修正草案）》，提出了国家建设所需要的五十七项重要科学技术任务和六百一十六个中心问题，提出了各门学科的发展方向。十二月二十二日，中共中央同意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党组关于征求《一九五六——一九六七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修正草案）》的意见的报告。一九五七年六月二十六日，周恩来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说：“一九五六——一九六七年科学发展远景规划已经制订，并且已经作为试行草案，付诸实施。”

# 关于一九五六年度国民经济计划的执行结果和一九五七年度国民经济计划草案的报告\*

(一九五七年七月一日)

薄 一 波

各位代表：

我谨向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提出《关于一九五六年度国民经济计划的执行结果和一九五七年度国民经济计划草案的报告》，请予审查。

## 一、关于一九五六年度国民经济计划的执行结果

1956年度国民经济计划的编制，是在以下的条件下进行的。1955年下半年开始形成了我国对于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这一高潮大大地推动了社会主义建设的高潮，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空前高涨，要求提前完成五年计划。1955年农

\* 这是薄一波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的报告。



业的大丰收，粮食和棉花的产量是近三年来增长最多的一年。在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前三年中，财力上有了一定的结余，物力上有了一定的储备，技术力量有了一定的成长，基本建设的设计、设备、施工组织都有了较好的准备。1956年度的计划，适应了这种新的形势，从而在财政经济上保证了社会主义改造的伟大胜利，并且保证了社会主义建设的顺利发展。计划中所规定的各项指标，都是很积极的。应该说，这个计划基本上是反映了人民群众在大革命、大建设的高潮中的愿望的。

全国人民对于1956年度国民经济计划执行的结果，都很关心。现在，根据对计划执行结果的检查，我们可以向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报告说：1956年度我国国民经济计划的各项指标，绝大部分都已经完成或者超额地完成了。

1956年是我国社会制度大变革的一年。在全国组织起来了75.6万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入社的农户占全国农户总数的96.3%，其中加入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农户占全国农户总数的87.8%。在全国组织起来了约10万个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和生产合作小组，参加的人数达到500多万人，约占手工业者总数的92%。在全国的资本主义工业中，占产值99.6%和占职工总数99%的工业企业，转变为公私合营企业；在全国的资本主义商业中，占总户数82.2%和占从业人员总数85.1%的商业企业，转变为国营、合作社营、公私合营企业和合作商店、合作小组。由于这一伟大的变革，我国就基本上解决了个体经济同社

会主义工业化之间的矛盾，基本上解决了资本主义所有制同社会主义所有制之间的矛盾，从而基本上结束了我国几千年来阶级剥削制度的历史，建立起社会主义的社会经济制度。这样，在我国实行改变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公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就基本上完成了。

在社会主义革命的高潮的推动之下，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也获得了很大的发展。

全国工业总产值 1956 年完成了 586.6 亿元，比上年增长 31%，这是近年来工业生产增长速度最快的一年。在工业总产值中，生产资料的生产为 291.7 亿元，比上年增长 41.7%；消费资料的生产为 294.9 亿元，比上年增长 22%。机器制造业的生产为 57.6 亿元，比上年增长 90.2%。手工业的生产为 117 亿元，比上年增长 16%。

按工业总产值计算，已经提前一年并且超额 9.5% 完成了五年计划（即五年计划所规定的 1957 年的指标，下同）。在五年计划所列的 46 种主要工业产品中，已经有生铁、钢、钢材、烧碱、纯碱、硝酸铵、青霉素、氯霉素、各种磺胺、汽车外胎、蒸汽锅炉、汽轮机、水轮机、内燃机、发电机、电动机、变压器、金属切削机床、双轮带铧犁、谷类播种机、客车、自行车、机制纸、水泥、棉纱、棉布、麻袋等 27 种产品的产量，提前一年完成或者超额完成了五年计划。1956 年我国试制成功的新的工业产品，根据九个工业部的统计，即达 1,200 多种，其中喷气式飞机、载重汽车、15,000 千瓦的全套水轮发电设备、12,000 千瓦的汽轮机和汽轮发电机、单轴自动车床、耐高温合金钢等，都是运

用了世界上新的技术在我国第一次生产的产品。现在，这些产品不仅已经试制成功，并且已经投入生产了。各工业部门的主要技术经济指标和主要工业设备的利用率，都比上年有了显著的提高。1956年各工业部（不包括森林工业部）所管理的工业企业，生产成本比上年降低了10.7%，扣除降低调拨价格的因素，比上年降低了7.9%（原计划降低8.4%），没有完成计划。生产工人的劳动生产率，比上年提高约26%（原计划提高18.6%）。应该指出，按生产工人计算的劳动生产率，不能反映工业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全面情况。因为在工业企业中，除了生产工人以外，还有不少的非直接生产的职工。目前我国工业企业中的非直接生产的职工过多，一般要占生产工人总数的一半左右，这种不合理的情况，应该逐步改变。工业劳动生产率怎样计算才更合理，我们也正在研究改进办法。

全国农业和农副业总产值1956年完成了582.9亿元，为计划的96%，比上年增长4.9%。1956年我国遭受了最近几十年来最严重的一次自然灾害，某些农作物受到很大的损失，受灾的农田面积约2.3亿亩，受灾的人口约7,000万人。但是，由于农业合作化的胜利和《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的公布，在全国农民中掀起了热火朝天的农业增产运动，在扩大农田灌溉面积、增加农田施肥数量、精耕细作、推广优良品种等各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受灾地区的广大农民，同灾荒进行了搏斗，缩小了灾荒所造成的损失，因而使主

要农作物如粮食、大豆等的全国总产量，仍然有所增加。1956年粮食总产量为3,650亿斤，比上年增加了154亿斤，增长4.4%；大豆产量为204.7亿斤，比上年增加了22亿斤，增长12.2%；棉花产量为2,890万担，比上年减少了147万担，下降4.8%；猪的头数年末达到9,780万头，比上年增加了988万头，增长11.2%。1956年农业和农副业的总产值，已经接近完成五年计划；粮食的总产量则已经超额完成了五年计划。

全国基本建设投资额有很大的增长。1956年完成了139.9亿元，为计划的99.9%，比上年增加了53.6亿元，增长62%。这是解放以来，投资额增长最多的一年，也是基本建设计划完成得最多的一年。1956年和前三年所完成的基本建设投资额累计计算，已经完成五年计划投资总额的86%左右。这样，超额完成五年计划中的基本建设计划就有充分的保证了。1956年施工的限额以上的厂矿企业建设单位共计625项，已经全部投入生产的有89项，其中主要的有：煤矿20项，电站21项，黑色和有色冶金3项，建筑材料4项，金属加工和机械制造21项，棉纺织和制糖等轻工业12项。1956年铁路铺轨3,108公里，其中：新建1,747公里，恢复285公里，新建和恢复复线210公里，新建企业专用线866公里（仅系铁道部负责修建的，下同）。宝成线和鹰厦线已经全线临时通车。1953至1956年铁路铺轨累计为7,532公里，其中：新建4,387公里，恢复324公里，新建复线356公里，恢复复线420公里，新建企业专用线2,045公里。新建铁路铺轨总数已经超过五年

计划规定的铺轨总数 303 公里。基本建设计划执行的结果,各部门新的生产能力的增长,在我国历史上也是空前的,1956年一年中新增加的炼钢能力,就超过了解放前全部的炼钢能力。旧中国几乎没有的机器制造业,完全没有的汽车制造业和飞机制造业,现在都建设起来了。近代化的国防工业,也开始建设起来了。

随着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和基本建设规模的扩大,交通运输事业也有很大的发展,1956 年全国铁路货运量完成了24,605万吨,超过计划 11.6%,比上年增长 27%;货物周转量完成了 1,203.5 亿吨公里,超过计划11.6%,比上年增长22.6%。都提前一年完成了五年计划。

在经济事业发展的同时,全国文教卫生和科学研究事业在 1956 年也有很大的发展。高等学校招生 18.5 万人,超过计划 5.2%;中等专业学校招生 43.3 万人,为计划的97.4%;初级和高级中学招生 234.3 万人,超过计划 9.6%;初级和高级小学招生 2,345.3 万人,比上年增长 35.6%。各级学校的学年初在校学生人数都比上年有很大的增长,中等专业学校、中学和小学的学年初在校学生人数都提前一年超过了五年计划。

1956年中国科学院所属科学研究机构达到 66 所,研究人员(包括研究员、副研究员、助理研究员和研究实习员)达到 4,475 人。各高等学校的科学研究工作,比以前加强了。各部所属科学研究机构达到 105 所,研究人员(包括工程师和技术员)达到 10,307 人。同时,在国务院的领导下,由科学家们初步制定了中国科学发展的远景

规划(草案)。

1956年摄制影片176部,超过计划37.5%。电影放映队达到6,233队,为计划的97%。报纸发行243,942万印张(即对开报纸,下同),超过计划2.2%。杂志出版76,343万印张,为计划的89.3%。图书出版435,613万印张,超过计划16.2%。以上各项,都比上年有很大的增长。此外,图书馆、博物馆也都有所发展;艺术有了进一步的繁荣,民间艺人得到进一步的安排。

1956年卫生部门所属的医院和研究所的病床总数达到214,673张,超过计划2.3%,比上年增加了40,980张。对于危害人民健康的各种慢性病的防治,特别是对于消灭血吸虫病的斗争,已经开始取得成绩,治疗了患者40万余人。为了继承和发扬祖国的医学遗产,并且发挥中医的作用,已经吸收了大约3万名中医参加公立卫生机构的工作。此外,在卫生防疫、医疗预防、妇幼卫生等各方面,也都进行了很多的工作。

随着经济、文化建设事业的发展,1956年包括在国家计划以内的全国国营企业、合作社营企业、公私合营企业、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和文化、教育、科学、卫生部门的工人职员总数(以下简称包括在国家计划以内的职工总数)年底达到2,240万人;年平均人数(全年每日实有人数的累计数,除以365日,即得年平均人数,下同)为2,117.9万人,比上年增加了535.7万人,除去由私营工商企业等转变为国营、公私合营企业的人员和乡干部305万人以外,实际比上年新增加了230多万人。这是几年来就业

人数增加最多的一年。如果将包括在国家计划以内的职工和不包括在国家计划以内的职工合在一起计算,那么,1956年底就是2,417万人,比计划以内达到的2,240万人多177万人。

1956年包括在国家计划以内的职工的工资总额比上年增加了约27亿元,职工的年平均工资(全年职工的工资总额除以年平均人数,即得年平均工资,下同)增长了接近14%。农民的收入也有所增加,根据许多地区的调查,凡是沒有受灾或者受灾不大的地区,约有80%左右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增加了产量,约有75%左右的农户增加了收入。受灾地区虽然减产或者收成很少,但是经过农业生产合作社组织生产自救,加上政府的大力援助,除了个别工作不好的地区以外,受灾地区农民的生活也一般地得到了保障。

1956年社会购买力达到约465亿元,比上年增长15.6%,这是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人民物质生活有所改善的具体表现。

总之,我们在1956年的工作是获得了极为巨大的胜利和成就的。这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全国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各民族、各民主党派、工商界人士和其他爱国人士团结一致、共同努力的结果。1956年我国社会主义改造事业的伟大胜利和经济建设事业的巨大发展,为我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超额完成,奠定了可靠的基础。

毫无疑问,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所获

得的伟大的胜利和成就，将给我国今后国民经济的发展带来深远的极为有利的影响；但是，也给我们带来了某些困难。这些困难的发生，有的是由于客观的原因，有的则是同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分不开的。

现在看来，1956年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有以下几点是应该着重指出的：

第一，1956年国家对本建设的投资额多了约15亿元到20亿元。由于基本建设的投资额过大，因而造成了这样的情况：基本建设投资额增长的速度超过了生产资料生产增长的速度，特别是超过了建筑材料和某些机械设备生产增长的速度，从而就引起了钢材、木材和若干种机械设备供应的紧张情况。应该说，这是1956年计划工作中的一个错误，但是我们当时并不了解或者不完全了解，而是在后来才了解的。由于历年来的基本建设计划总有5%左右不能完成，在编制1956年的基本建设计划的时候，我们也以为会发生同样的情况。但是1956年基本建设计划执行的结果却完成了99.9%，因而就更加显出1956年的基本建设投资额是定得过大了。

第二，1956年银行信贷计划，农业贷款增加11.2亿元，手工业和公私合营企业贷款增加2.9亿元。但是执行的结果，对农业的贷款却增加了20.3亿元，对手工业和公私合营企业的贷款却增加了9.4亿元。两项共计29.7亿元，超过计划15.6亿元。为了从财力上保证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增加这些贷款是完全必要的。这几项贷款的原定计划显然是小了。在执行过程中增加了这些



贷款的数额，绝大部分是正确的。但是，如果撙节地加以使用，也可以少贷几亿元。在执行中有一小部分应该少贷的而没有能够少贷，是我们工作中的缺点。

第三，1956年计划新增加工人职员84万人，但是执行的结果增加了230万人，超过计划146万人。由于经济的发展和许多事业的扩大超过了原定计划，在执行劳动计划的过程中稍稍超过原定计划也是必要的，但是显然超过得太多了。这是我们控制不严和有些部门轻易招收职工的结果。此外，在1956年增加了职工的工资，这在基本上是正确的，但是也有一部分人增加得多了一些。

第四，1956年教育事业计划的招生指标有一部分定得过高了，在执行过程中又有某些方面超过了原定的指标，结果，就使有些学校招生的数量超过了师资、校舍和设备供应的可能条件，给师生在教学方面和生活方面带来了一些困难。

由于以上的缺点和错误，在我国财政收支方面，出现了赤字；在银行信贷收支方面，也出现了差额，多发行了一部分货币；这两者又集中表现为过多地使用了几年来国家所积蓄的商业库存和物资储备。这样，就给1957年经济工作和文教工作的安排，带来了某些困难和不利的影晌。

应该说，为了保证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为了保证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超额完成，为了顺利地渡过1956年的大灾荒，适当地使用国家的后备力量，是完全应该的，不使用是不正确的。这样做，虽然给我们今后的工作带

来一些困难，但是这些困难只是暂时的和局部的，在今后的工作中是能够逐步克服的。我们还应该了解，历史上任何一次大革命，通常都是要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引起大波动的。我们为了争取民主革命的胜利，曾经忍受了不知多大的牺牲和困难，而今天，我们在取得社会主义大革命的胜利的斗争中，并且在同时又取得大建设的胜利和渡过很大的灾荒，只引起这样一点小小的波动和困难，难道能够说我们的情况是不好的吗？应该说总的情况是很好的。由于我国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优越性，我们对于在大革命中所引起的社会经济生活的某些波动，可以自觉地在1957年及其以后的计划中加以调节。我们的物价基本上还是稳定的，国家若干后备物资在1957年就可以部分地得到补充，人民生活也还可能争取有所改善。这就是说，在1955年到1956年我国人民所取得的社会主义大革命的胜利，真是一次和平革命，我们最大限度地避免了在革命中可能引起的破坏和损失，这对于全中国的人民是极为有利的。

## 二、关于一九五七年度国民经济计划草案的说明

在1956年度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我们编制了1957年度的国民经济计划草案。如前面说过的，1956年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取得伟大的胜利，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进展很快，第一个五年计划的主要指标，有些已经提

前完成,有些接近完成。这些是安排 1957 年度国民经济计划的有利条件。但是,1956 年我国遭受了解放以来最严重的一次灾荒,对于 1957 年国民经济的各方面都有不利的影响;由于前面说过的 1956 年工作中发生的缺点和错误,使得经济工作和文化工作的某些方面,出现了一些迫切需要解决的矛盾。这些是安排 1957 年度国民经济计划的困难条件。根据上述有利条件和困难条件,在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瞻前顾后,综合平衡,增产节约,勤俭建国,发扬成绩,纠正缺点的方针下,我们编制了 1957 年度国民经济计划草案。

大家知道,年度计划的编制必须做到既能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又要有充分可靠的物力、财力的保证,并且保留必要的后备。1957 年度国民经济计划的安排,是尽可能地使基本建设的增长同生产资料生产的增长相适应;使社会购买力的增长同消费资料生产的增长相适应;使文化、教育、科学事业的发展同劳动工资的安排同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发展相适应;使国民经济各部门在上下年度之间能够比较平衡地向前发展。在安排消费同积累的关系的时候,首先保证必要的消费;在安排生产同基本建设所需要的物资的时候,首先保证必要的生产上的需要;在安排基本建设的时候,尽量地注意到各部门投资比例的适当,并且发挥投资的经济效果,力争使用同样数量的钱能够办更多的事。

1957 年度国民经济计划草案,已经印成专册,发给各位代表,其中详细数字,我不拟在这里重复了。现在,我

仅就工业生产、农业生产、基本建设、运输事业、商业、文教卫生和科学研究事业、劳动工资等计划方面的一些主要问题，分别加以说明。

### (一) 工业生产

1957年工业生产的总产值计划安排为603.4亿元，比上年增长4.5%（这是按包括在国家计划以内的工业企业的总产值在1956年为577.2亿元进行比较的）。1956年工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31%，为什么1957年计划安排的工业生产的增长速度比上年降低这么多呢？

在这里，除了生产资料中的新式畜力农具、锅驼机、水车等农业机械因为1956年生产过多，1957年计划基本上停止生产，机械制造工业的其他若干产品因为1957年计划安排的基本建设投资减少，它们的产值也将相应地有所减少以外，最主要的原因是1957年计划安排的消费资料的生产比1956年增加很少。消费资料生产在我国全部工业生产的总产值中所占的比重，1956年为50.3%，1957年计划为48.4%；而在消费资料生产中，纺织工业和食品工业产值所占的比重又最大，1956年为77.7%，1957年计划为77%。由于棉纱的产量1957年计划比上年减少61.1万件，使棉纺织工业的产值将减少14.4亿元，仅此一项，就使全部工业总产值的增长速度降低约2.5%。1957年计划安排的全部食品工业的产值比1956年增加2.2亿元，增加也很少。1957年的工业生产计划，由于纺织工业的生产下降，食品工业的生产增加很少，这样不仅使整个

消费资料的生产计划只比上年增长1.1%，并且把1957年全部工业生产计划的增长速度也拉下来了。

但是，把生产资料 and 消费资料生产的计划增长速度分开来看，情况是各不相同的。1957年计划安排的生产资料的生产为311.3亿元，比上年增长8%；消费资料的生产为292.1亿元，比上年增长1.1%。

1957年计划安排的生产资料主要产品的产量和增长速度如下：

电力：188.6亿度，比上年增长13.7%。

原煤：11,727万吨，比上年增长10.7%。

原油：150万吨，比上年增长29%。

生铁：555.4万吨，比上年增长16.3%。

钢：498.7万吨，比上年增长11.7%。

钢材：447.8万吨，比上年增长17%。

烧碱：17.8万吨，比上年增长13.8%。

硫酸铵：49.9万吨，比上年增长11.8%。

水泥：680.7万吨，比上年增长6.5%。

蒸汽锅炉：4,019.7蒸发量吨，比上年增长33%。

汽轮机：14.35万千瓦，比上年增长19.1%。

发电机：28.4万千瓦，为上年的98.9%。

电动机：125.1万千瓦，比上年增长17.7%。

变压器：359.8万千伏安，比上年增长26.4%。

金属切削机床：22,640台，比上年增长2.7%。

载重汽车：7,000辆，比上年增长324.8%。

原木：2,506万立方公尺(包括手工业生产量)，比上

年增长21.9%。

从上列计划安排的生产资料主要产品的生产增长情况中,可以看出,绝大多数产品的产量,1957年比上年增长在10%以上,一半以上产品的产量,1957年比上年增长在15%以上。在1956年生产资料的生产比上年增长41.7%的基础上,还能够保持这样的发展速度,应该说是不慢的。这说明,我们在安排1957年度工业生产计划的时候,继续坚持了优先发展生产资料生产的原则,这对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无疑是有利的。

前面说过,1957年计划基本上停止新式畜力农具、锅驼机、水车等农业机械的生产,1957年计划安排的基本建设投资额比1956年有所减少,这就限制了机械制造工业生产的增长速度。1957年机械制造工业的产值计划安排为54.9亿元,相当于上年的95.6%。而1956年机械制造工业的生产则比上年增长90.2%。这样也就不能不影响到1957年生产资料生产的增长速度。如果把机械制造工业的产值从生产资料生产的总产值中剔除出去加以比较的话,则1957年计划安排的生产资料生产的增长速度就不是8%,而是11%以上。

1957年计划安排的消费资料主要产品的产量和增长速度如下:

棉纱:463.5万件,为上年的88.3%。

棉布:50亿公尺(包括手工业生产量),为上年的85.3%。

麻袋:7,814万条,为上年的99.3%。

面粉：503万吨（包括手工业生产量），比上年增长0.2%。

食糖：87.4万吨（包括手工业生产量），比上年增长8.3%。

1957年计划安排的消费资料工业的生产，有些产品比上年增加很少，有些产品还比上年减产，这是什么原因呢？这主要是由于去年农业遭受灾害，主要的工业原料作物的生产，没有完成计划。1956年由于上年棉花丰收，同时进口的棉花也比较多，因此棉纱的生产比上年增长32.2%，但是，这样高的增长速度是难以为继的。因为我国农业的丰收或者歉收，在很大程度上是受自然条件的影响的。接连几年的丰收是少有的，在丰年之后，往往是平年或者是歉年。全国解放以来，我国农业有三年是丰年（1950、1952、1955），有两年是平年（1951、1953），有三年是歉年（1949、1954、1956）。在过去几年中，农业的丰收或者歉收，曾经多次地影响我国轻工业生产增长速度的起伏。农业的丰歉，影响到国民经济的波动，在我国目前的条件下是难于避免的；但是剧烈的波动，对于国民经济的发展是很不利的。因此，对于粮食、棉花和其他一部分工业原料作物，在可能的条件下，要有必要数量的储备，以调剂歉年之后的生产和消费，减轻社会经济生活的波动。今后我们在编制计划的时候，应该充分地注意到这一点。

在手工业生产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原材料的供应比较紧张。我们在分配原材料的时候，对手工业生产

的需要已经给予适当的照顾。例如：1957年棉布总的生产水平比上年下降15%左右，但是对于手工织布业的生产，则计划维持上年生产水平的90%左右；在钢铁材料的供应方面，除了手工业自己生产的土铁归他自己使用，各地回收的废钢铁首先满足手工业生产需要以外，国家还从统一分配的钢铁材料中给手工业调剂了一部分。采取这些措施以后，1957年手工业生产的总产值，估计可以维持1956年的水平或者略高一些。

为了保证手工业生产的顺利进行，手工业管理部门和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应该继续调整生产组织，大力整顿社务，开展增产节约运动。在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内部，目前存在着盲目地追求半机械化、机械化的倾向，变手工业生产合作社为国营工厂的倾向，应该加以纠正。同时，还应该扶助个体手工业者，不得加以排斥。

## (二)农业生产

1957年农业和农副业总产值计划安排为611.5亿元，比上年增长4.9%。

粮食(不包括大豆)总产量计划安排为3,820亿斤，比上年增加170亿斤，增长4.7%。

棉花总产量计划安排为3,000万担，比上年增加110万担，增长3.8%。

目前，我国农业的发展大大地落后于人民生活的要求，落后于轻工业发展的要求。因此，必须继续贯彻执行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贯彻执行勤俭办社、民主办社



的方针，逐步地解决国家同合作社之间、合作社同合作社之间、以及合作社内部的矛盾，想尽一切办法，促进粮食和其他农作物的增产。国家对于农业的发展，一向采取积极支持的政策，为了保证继续提高农作物的单位面积产量，今后还将特别注意发展化学肥料工业，以增加肥料的供应量。开垦荒地需要投资较多，但是为了增加农业生产，根据国家的财力、物力的可能条件，增加一些投资，扩大耕地面积，也是必要的。

前面说过，棉花和其他工业原料作物的增产，对于工业生产的增长影响很大。目前，我国轻工业有较大的生产能力，棉纱锭子已有700多万枚，每年可纺纱560万件以上，其他某些轻工业企业也有多余的生产能力。人们会问，为什么不可以多生产一些工业原料作物以充分发挥轻工业生产的能力呢？主要原因是由于我国人口增加很快，耕地面积增加有限，粮食的增加还满足不了人民消费增长的需要，在现有的耕地中不能更多地增加工业原料作物的种植面积。几年来，由于工业原料作物的种植面积逐年扩大，粮食作物的种植面积虽然也有所增加，但是，它的种植面积在各种农作物的种植面积中所占的比重，已经逐年有所下降。1957年各种农作物的种植面积计划安排为239,989万亩，比1953年增长11.1%，其中，工业原料作物为23,071万亩，比1953年增长31.9%；粮食作物为184,972万亩，比1953年增长7.9%。粮食作物在各种农作物种植面积中所占的比重，1953年为79.3%，1957年下降为77.1%。为了保证全国人民的粮食供应，为了

保证工业所需要的原料，必须适当安排粮食作物同工业原料作物种植面积的比例。在我国还不能大量开荒和大量扩大耕地面积以前，从现有的耕地中不适当地扩大工业原料作物的种植面积是不对的，但是，缩小现有的工业原料作物的种植面积，也是不利的。棉花、糖料、油料等主要工业原料作物，应该保持1957年的种植面积，不再减少，还应该有小量的增加，并且必须进一步加强精耕细作和采用优良品种等有效的措施，以提高单位面积的产量。

猪的增产也是大家很关心的，因为它不仅关系到城乡肉食的供应，而且养猪积肥也是当前农业肥料的重要来源之一。为了缓和城乡肉食供应的紧张情况，并且适应农业增产对于肥料的需要，必须提高猪的生产数量和质量。1957年猪的头数，年末计划达到1.1亿头，比上年增加1,220万头。完成这个计划，有没有保证呢？由于各级领导机关对于发展养猪业十分重视，生猪的收购价格全国平均提高了14.26%，农民养猪比较有利了；饲料的来源增多，国家给农民预留的精饲料也比上年增加了；再加上适当地增加农民的自留地，以利于农民自己解决蔬菜和牲畜饲料。这些都是完成计划的有利条件。另一方面，1957年计划安排的猪的头数，比产量最高的1954年还要超过1,000万头，现在不少地方猪的质量还不高，因此，需要作很大的努力，才能完成计划，并且提高猪的质量。但是，由于采取了上面的措施，目前商业部门收购的猪，数量已经开始增多，部分猪的质量也比上年肥大，可见农民对于养猪的积极性，已经有所提高，完成计划是有可

能的。

造林面积1957年计划安排为4,500万亩,比上年减少500万亩。为什么1957年计划造林面积比上年减少了呢?这是由于1953至1956年平均每年造林2,744.5万亩,面积不少,但是成活率比较低,根据典型调查,过去造林的成活率一般在60%左右。因此,必须在保证成活率确实能有显著提高的前提之下,努力完成今年的造林任务。在木材采伐方面,地方林区,过去一般在路远山深的地方采伐得少,在交通比较便利的地方采伐得多,这对于水土保持和林区迹地更新都有不利的影响。今年增加了地方木材采伐的投资,主要用在修路方面,以便增加深山的采伐量,逐步改变某些不利于水土保持和林区迹地更新的采伐情况。

### (三)基本建设

1957年基本建设投资额计划安排为111亿元,为上年的79.4%。1957年的基本建设投资额的确定,在材料供应方面和财政方面,都进行过反复的平衡计算。经过多种方案的比较研究,我们采取了111亿元的方案。因为这个方案,既能够使1957年的基本建设保持适当的规模,保证超额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建设任务;又有利于1958年计划的安排;既能够使1956年造成的某些原材料和某些机械设备的供应紧张情况缓和下来,有利于生产的发展,又可以尽量地减少建筑力量的窝工损失和设备的积压。111亿元的基本建设投资额同1956年的基本建设投

资额相比,是显得少了。但是,同五年计划原来所规定的1957年投资额相比,还超过了14亿元;如果把前四年实现了的投资额和1957年计划安排的投资额合起来计算,则超过五年计划规定的五年投资总额的49.78亿元。

根据上述的基本建设投资额,在项目的安排方面,适当地调整了若干部门的投资比重,加强了薄弱环节。主要是:减少了非生产性建设的投资比重,增加了生产性建设的投资比重。减少了纺织工业、食品工业、机械制造业等设备能力暂时还有多余的部门的投资比重,增加了煤炭、电力、冶金、化学、森林等生产能力不足的工业部门的投资比重。保持了农林水利部门的投资比重。增加了地方投资的比重,相应地减少了中央部门的投资比重。例如:非生产性建设的投资额占投资总额的比重,由1956年的22.4%,下降为1957年的20%左右。又如煤炭、电力、冶金、化学、森林等五个工业部1956年的投资额共为34.5亿元,占工业各部投资额的50%;1957年投资额计划共为37.1亿元,占工业各部投资额计划的59.1%。又如原材料、燃料、电力工业同金属加工、机械制造业的投资比例,由五年计划中的1957年的1.9比1,改变为1957年计划的3.3比1。地方投资占全国投资总额的比重,由五年计划中的1957年的13.7%,提高到1957年计划的18.8%。

在编制1957年度国民经济计划的时候,我们还认识到:在生产资料的生产方面,我国的原材料、燃料、电力工业的发展,落后于其他工业部门发展的要求;冶金工业的

发展,落后于金属加工、机械制造工业发展的要求。在积极发展我国的原材料、燃料、电力工业方面,除了应该继续建设若干起骨干作用的大型企业以外,还应该特别注意多发展一些投资少、收效快的中、小型企业,和有计划地发展小煤矿、小铁矿、小的有色金属矿和非金属矿,以增加原材料和燃料的产量。在金属加工和机械制造工业方面,除了发展一些重型的和精密的机械工业企业以外,应该在平时和战时相结合、专业化和协作相结合、制造和修理相结合的前提之下,对各机械工业部所管理的企业、非机械工业部门和地方所管理的机械工业企业,统筹安排,以充分发挥我国金属加工和机械制造工业的潜在力量。这些工作,我们在1957年度计划的安排中,已经开始予以注意,今后还必须进一步解决这一问题。

按照上述投资安排,1957年计划施工的限额以上的厂矿企业建设单位共计591项,其中计划竣工的219项。各工业部1957年计划施工的限额以上的厂矿企业建设单位共计486项,其中计划竣工的177项。在计划竣工的项目中,主要的有:煤矿58项,电站21项,黑色和有色冶金14项,建筑材料和木材加工9项,金属加工和机械制造32项,纺织、造纸、食品等轻工业20项。这些企业投入生产达到设计能力以后,每年的生产量是:原煤1,080万吨,发电量33.6亿度(发电设备容量67.3万千瓦),原油32.5万吨,生铁81万吨,钢材48.9万吨,焦炭157万吨,硫酸4万吨,硝酸铵9万吨,水泥108万吨,运出木材315万立方公尺,棉纱69.3万件(纱锭71.5万枚),棉布64,602万公尺(织布机

21,325台),机制纸13.6万吨,机制糖8.7万吨,等等。但是,实践证明,新建企业在投入生产以后,经过一定时间,它的年产量,很多是会超过设计能力的。

在农业基本建设方面,1957年农林水利各部和地方农业投资计划共为9.7亿元,比上年减少1.9亿元。主要是减少了中等技术学校、试验研究机构等建设单位的投资,和减少了拖拉机的增加数量。水利部1957年计划施工的限额以上的建设单位共计26项,其中有水库工程10项,黄河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今年正式开工。地方兴修的限额以上的水利工程32项。农垦部兴建的限额以上的农牧场3项;地方兴建的限额以上的农场93项。1957年的基本建设投资额,在农业方面和工业方面都有减少,但是为了照顾农业发展的需要,我们在分配投资额的时候,已经注意到使农业方面少减一点,工业方面多减一点。

1957年铁路计划铺轨1,860公里,其中:新建535公里,恢复152公里,新建复线533公里,专用线640公里。在新建铁路铺轨中:包(头)兰(州)线铺轨329公里,福建的南(平)瑄(头)线铺轨63公里,内蒙古的牙克石森林线铺轨45公里。交通部1957年计划施工的公路有7条,其中主要的是新建新藏公路和改建青藏公路;计划新增加的公路里程为1,125公里。邮电部1957年除了重点建设部分市内电话和增加必需的邮运设备以外,计划架设京汉、京沪、京沈、京西(安)、西(安)兰(州)等长途电讯干线的十二路载波电话和改善省内线路。

商业各部1957年计划施工的限额以上的建设单位共

计17项,其中主要是肉类联合加工厂和冷藏库,计划新增加日宰猪1.1万头的生产能力和冷藏库容量5.15万吨。

文教各部1957年计划施工的限额以上的建设单位共计37项,其中主要的有:高等学校(高等教育部和教育部直接管理的)11项,电影制片厂和洗印厂7项,医院4项;计划新建、扩建高等学校可以容纳新生3.3万人,新建医院增加床位1,420张。

在1957年基本建设投资的安排中,根据勤俭建国的方针,在保证工程质量的前提下,修改了某些过高的和不适当的设计标准,尽可能地照顾了各个部门之间、各个工厂之间的专业分工和协作配合,减少了非生产性建设的投资,削减了非急需的项目和缩小了某些企业的规模,并且尽可能地就地取材,降低建筑造价。采取这些措施以后,就节约了资金,提高了投资的经济效果。为了进一步贯彻执行勤俭建国的方针,需要对原定的设计和规划作必要的修改,这是一件复杂细致的工作,做得好就可以大量节约,做得不好还可能造成新的浪费。因此,必须节约一切可能节省的投资,同时反对偷工减料,用各种办法提高工程质量。不久以前召开了全国设计工作会议,已经开始对原定的各项设计和规划进行全面的审查修改工作。我们相信,在全国职工、全国勘察设计和建筑安装工程技术人员积极努力之下,一定会把勤俭建国的方针进一步地坚持下去,为国家节省大量的资金,把建设事业办得更好。

#### (四)运输事业

1957年的运输计划,是适应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和基本建设的规模来安排的。

在铁路运输方面,货运量计划安排为25,600万吨,比上年增长4%;货物周转量计划安排为1,265亿吨公里,比上年增长5.1%。

1953至1956年新建的铁路,沟通了我国西北地区、西南地区、中原地区和沿海地区相互之间的联系,这对我国经济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可是,随着生产和建设的发展,随着新线的通车和运量的增加,旧线的负担也大大地加重了,以致有些区段如京汉、石太、同蒲、陇海西段等线路的通过能力,在1956年就感到严重不足,曾经发生了堵塞的现象。为了改变这种现象,1957年适当地增加了加强旧线的投资,加强旧线的投资额在铁道部投资额中所占的比重,由1956年的26.4%,提高到1957年的39.4%,计划在京汉、石太、陇海等线的某些区段修建复线533公里。经过采取了这些措施和加强运输的组织工作以后,预计铁路运输的通过能力将有所增加。

在水路运输方面,长江的运输能力,过去四年增加了船舶230,620载重吨,1957年计划增加32,600载重吨,五年合计超过原计划2,520载重吨。这对保证四川省的粮食及其他农产品的外运和各地工业品运进西南各省,有很大的作用,从1956年下半年至1957年上半年已经由水路运出了40余亿斤粮食,支援了受灾地区和缺粮地区。但



是，长江的运输特别是川江的运输情况还是很紧张的。这是由于港口的建设落后于船舶运输能力的增加；中、下游的运输能力的增加，没有同上游运输能力的增加相适应。为此，1957年计划加强重庆、汉口等港口的建设，并且建造拖轮以增加长江中、下游的运力。在运输管理工作中，也已经开始注意加强港口管理，注意港口、航行和修船工作之间的协作配合。

西南各省是我国人口众多、物产丰富的地区，它有许多农副业产品可以用来支援全国，同时全国各地也必须用许多工业品支援西南。目前最大的困难就是运输能力不够，虽然增加了长江的船舶，新建了宝成铁路，还不能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因此，除了继续加强水路运输以外，还必须着手进行新的铁路干线建设的准备工作。

由于我国目前石油生产落后，液体燃料供应不足，因此，在今后一定时期内，不可能大量发展汽车运输。为了适应工农业生产和建设事业发展的需要，在充分发挥铁路和水路现代运输工具的运输能力的同时，应该注意发挥各种民间运输工具的作用。现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根据当地的具体情况，组织利用各种民间运输工具，已经起了很好的作用，今后还应该继续加强这方面的工作。

为了保证1957年运输计划的完成，一切运输部门都必须加强运输的组织领导工作，提高运输设备的利用效率。在各运输部门之间，应该推行联运制度，签订运输协作合同，做好运输的协作配合工作。各产、销部门和运输部门应该大力贯彻执行合理运输和统一送货制度，并且

注意平衡运输。

### (五) 商 业

1957年社会购买力估算约为473.2亿元,比上年增加8.2亿元,增长1.8%。这个社会购买力的计划,一方面是估算了农民在农业生产正常的情况下可能增加的购买力,估算了职工工资总额的增加部分,两项合计,居民的购买力计划比上年增加约18亿元;另一方面,由于压缩了机关、部队、企业、人民团体等社会集团的购买力,计划比上年减少9.8亿元。这样,增减相抵,1957年社会购买力计划比上年增加8.2亿元。

在商品供应方面,1957年社会商品供应总额估算约为463.5亿元。商品供应同社会购买力之间,虽然有一些差额,但是经过认真地开展增产节约运动,尽量开辟原材料的来源增加消费品的生产,有计划地组织一部分商品的进口,并且加强商品供应工作,加上今年春季对于若干种商品价格的调整,这样就可以使社会购买力同商品供应接近平衡,市场物价就可以继续保持稳定。

在1956年农业遭受严重灾害之后,国家从丰收的西南地区调运出来50.8亿斤粮食,支援受灾地区和缺粮地区,仅仅河北一省就调入36.3亿斤,使广大受灾地区的农民免于饥饿,使缺粮地区的粮食供应得到保证,同时避免了粮食价格的上涨。由于棉花遭灾减产,1957年棉纱产量计划比上年减少约61.1万件,以致棉布的销售量将比上年减少2,300万匹左右,不得不把1957年5月份至8月

份通用的第二期布票一律对折使用。这样，虽然减少了棉布的供应量，但是也避免了棉布价格的上涨。国家在大力稳定粮食、棉布等主要商品价格的同时，主动地提高了若干种商品的价格，作为平衡社会购买力的方法，从全局来看，我们认为这种措施是合理的和必要的。

这里，简单地谈一下 1957 年对外贸易计划的安排情况。

1957年计划安排的进出口贸易总额，约相当于1956年进出口贸易总额的 91.6%。在出口计划方面，主要是减少了粮食、食油、猪肉的出口数量，以照顾国内的需要。例如，1957年计划出口粮食(包括大豆)38亿斤，比上年减少10.8亿斤；计划出口猪肉(包括活猪)7.7万吨，比上年减少8.5万吨。在进口计划方面，主要是减少了一般机械和运输机械的进口数量，以促进我国机械制造业的发展。

我国的对外贸易，过去几年，在出口总额中，农产品和农产加工品约占 75%左右，矿产品和机械等约占 25%左右。在进口总额中，机器和各种设备约占60%左右，黑色金属和有色金属约占 10%左右，其他工农业生产资料 and 消费资料约占30%左右。这种出口和进口中各类产品所占的比重，随着我国工业的发展和人民消费水平的提高，将逐渐发生变化。在出口总额中，农产品和农产加工品的出口额所占的比重，将逐年下降；矿产品和其他工业品的出口额所占的比重，将逐年上升。在进口总额中，机器设备的进口额所占的比重，将逐年下降；工农业生产所

需要的某些原材料和人民生活需要的某些消费资料的进口额所占的比重,将逐年上升。这种变化,在1957年对外贸易计划的安排中,已经有所表现。当然,为了适应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要求,这种变化也只能是逐渐的。

### (六)文教卫生和科学研究事业

在教育事业方面,由于1956年学校招生有一部分过多,以致师资和校舍建筑、教学设备都赶不上发展的需要。1957年根据师资和财力、物力方面的可能条件,适当地缩减了各级学校的计划招生人数,使学校能够有较多的精力,进行整顿,提高教学质量。

1957年各级学校的计划招生数和学年初在校学生人数(以下简称在校数),安排情况如下:

初级和高级小学招生1,616.9万人,在校数达到6,581.4万人,比上年增长3.7%。

初级和高级中学招生184.3万人,在校数达到556.6万人,比上年增长7.8%。

中等专业学校(包括中等技术学校和中级师范学校)招生15.8万人,在校数达到77.5万人,相当于上年的水平。

高等学校招生10.7万人,在校数达到44.3万人,比上年增长10%。

1957年各级学校的计划招生数,虽然比上年减少了,但是学年初在校学生人数都还有不少的增加。在解决由于上年招生过多所发生的问题和今年在校学生人数增加

以后的问题上,还有很多的困难,教育部门 and 各级学校应该努力克服这些困难。社会各方面的人士,也应该帮助教育部门克服困难。

应该指出,教育事业只能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逐步发展。我国普通教育的目的,主要的是培养忠实于社会主义事业的、有相当文化水平的、身体健康的体力劳动者,其次才是为培养专门人才打好普通知识的基础。从现在起,我们就应该强调并且逐步实施脑力劳动同体力劳动相结合的制度。一方面,应该鼓励脑力劳动者参加一部分可能参加的体力劳动;同时,还应该动员现在机关中工作的青年知识分子,离开机关工作岗位,到农村中、工厂中种几年地、做几年工,以学习和掌握生产知识,并且熟习工、农劳动人民的生活、感情和思想。另一方面,应该加强工农群众的业余教育,逐步地提高体力劳动者的文化水平;同时,还应该经常从工、农劳动人民中,有计划地挑选与群众有密切联系的、并且有一定的文化水平和工作能力的人,到机关中工作,以便加强机关工作人员同工、农劳动人民的经常联系。现在还有许多学龄儿童不能入学,这在目前还不可避免。不能入学的学龄儿童,只好晚一些入学。小学、中学毕业生的大部分不能逐级升学,应该参加体力劳动,这是一种正常的合理的现象。不能升学的中、小学毕业生,已经到达劳动年龄的,凡是家在农村的,应该说服和支持他们回农村参加生产;家在城市的,如果在城市安排不了,也应该尽可能地动员和安排他们到农村从事农业劳动。这是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

内所必须采取的方针。

在我国人民生活逐步提高的情况下，除了合理地使用国家办学的力量以外，群众办学的方法应该积极提倡。机关、团体和企业的职工，可以自己出钱集体办学（不由机关、企业拨款）；农民和城市居民也可以组织起来，集体办学；知识分子可以合作办学；热心教育事业而又有条件个人办学的人，也可以个人办学。总之，小学和中学教育，应该采取多种多样的办法来进行。国家用于教育事业的经费将逐年增加，计划所安排的中、小学招生数，也将逐年有所增长。但是，国家的物力、财力有限，因此，教育经费和招生人数每年不能增加很多。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可以根据本地区的情况，在不增加国家拨款的限度内，组织各方面的力量，集体地或者个体地来办小学、中学或者其他的学校，是能够多招收一些学生进行学习的。

今年中等专业学校，除了中级师范学校将继续在初中毕业生中招收新生以外，中等技术学校计划从现有企业的职工中招收新生。

高等学校今年在校学生人数的增长还是不小的。我们要求巩固已有的成绩，克服缺点，努力提高教学质量。

在卫生事业方面，继续贯彻执行预防为主方针，继续开展群众性的爱国卫生运动，仍然是1957年卫生工作的中心任务。乡村医疗工作，应该进一步发挥基层卫生组织的作用，更多地组织门诊、出诊和巡回医疗；城市应该注意发挥联合诊所的作用和适当地增设联合诊所，合

理地改进公费医疗制度,以便腾出更多的医疗力量,来照顾城市一般居民的治病要求。不论乡村或者城市,都应该进一步地发挥中医的作用。

在科学研究事业方面,1957年全国科学研究计划草案,已经科学规划委员会制定。在自然科学方面,我国第一个研究原子核的功率为7,000千瓦的重水型原子反应堆和能产生2,500万电子伏的 $\alpha$ 粒子的回旋加速器,正在加紧建设中。1957年中国科学院将着手建设几个重要学科的研究所,如电子学、计算技术、半导体、自动化、核子物理、力学等研究单位,为今后新技术的发展建立科学研究的基础。中国科学院、高等学校、各部和各地方的科学研究工作,应该在科学规划委员会的领导之下,统筹安排,分工协作,以合理地使用科学研究的人员和设备,提高科学研究的质量,促进科学研究事业的发展。

在文化、出版事业方面,应该给地方以较大的机动权限,1957年文化事业的各项计划指标,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可以根据分配的经费和基本建设投资,因地制宜地进行调整。

在体育事业方面,应该继续开展群众性的体育运动。

### (七)劳动工资

1957年包括在国家计划以内的职工总数,年底计划达到2,226.2万人,比上年减少约14万人。1957年的年平均人数,计划安排为2,216.8万人,比上年增长4.7%。

为什么1957年年底计划达到的职工总数要比1956年

年底的实有人数减少呢？这是因为我们在年度计划的执行过程中，存在着这样的缺点，即建筑安装部门的许多单位第四季度赶工，生产部门和商业部门的许多单位第四季度赶任务，大量增加职工，而到下一年的第一季度就要窝工。我们初步接受了这些经验教训，1957年要尽可能地克服这一缺点适当地减少职工人数。这一缺点的造成，是同劳动计划控制不严，年度计划下达时间过晚，财政上的年终结算制度执行有缺点等等分不开的，因此，今后应该合理地安排计划，提前下达任务，纠正执行财政上的年终结算制度的缺点，以便使各经济单位有可能均衡地进行生产和均衡地完成计划。同时，一切企业和事业单位，除了经上级批准的，需要赶工或者赶任务的个别特殊的工程或者企业、事业单位以外，都不得在第四季度赶工或者赶任务。过去不少单位用增加人员、加班加点以及其他不正当的手段来超额完成任务，甚至以此贪图奖金，这不仅浪费人力、物力，同时使工程质量、产品质量和工作质量下降，这种做法是错误的，应该坚决纠正。1956年第四季度增加了100多万职工，其中一半以上是临时工和季节工。根据不完全的统计，今年第一季度已经有不少万人回乡进行农业生产去了。这就证明，1957年年底达到的职工总数，比上年减少约14万人，是合理的，也是可能的。

我国人口多，劳动资源丰富。目前我国厂矿企业的职工已有多余，而工业又只能逐步地发展，不可能每年都大量招收职工。因此，今后劳动就业不能只在工业方面



打主意，而要更多地<sub>在</sub>农业、农副业和手工业方面打主意。

1957年包括在国家计划以内的职工的工资总额，计划安排为141.2亿元，比上年增长12.1亿元，增长9.4%。其中：（1）1956年增加的工资是从四月一日或者七月一日起发给的，只发了两个或者三个季度，1957年要发四个季度，再加上某些正常的升级，这一项比上年增长约5.7亿元；（2）1956年各个月份陆续增加的职工，1957年都要支领全年的工资，连同1957年人数增减相抵以后，这一项比上年增长约6.4亿元。

以上所说的七个方面的问题，就是1957年度国民经济计划中的一些主要问题。

各位代表！1957年是我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最后一年。1957年度的国民经济计划完成以后，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执行结果将会是怎样的呢？现在，对于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可能完成情况作一些预计，我想是有必要的，也是全国人民所欢迎的。

1957年的工业总产值计划安排为603.4亿元，超过五年计划12.7%。这样，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工业生产增长的速度，平均每年的递增率将是17.4%，比原定的14.7%的增长速度加快了。生产资料的生产和消费资料的生产的比重，将由1952年的39.7比60.3，变为1957年的51.6比48.4。我国钢的生产量，将由1952年的134.9万吨，提高到1957年的498.7万吨，为解放前最高年产量的5.4倍。由于我国新的工业企业不断地投入生产和技术

力量的不断地成长，已经出现了许多新的工业生产部门和新的工业产品。在1953至1956年，我国已经试制成功并且开始成批生产的最重要的新产品有：喷气式飞机、载重汽车、6,000千瓦和12,000千瓦的全套火力发电设备、10,000千瓦和15,000千瓦的全套水力发电设备、31,500千伏安的变压器、日产160吨钢的平炉、滚筒直径4公尺的电动卷扬机、多种型式的自动车床和机床、矽钢片、优质薄板、无缝钢管、50公斤的重轨、大型工槽钢、铝材、高纯度的苯胺和磷甲苯胺等等。1957年我国计划继续试制和开始试制的主要新产品有：72,500千瓦的全套水力发电设备、25,000千瓦的全套火力发电设备、40,500千伏安的变压器、2,500吨的水压机、700公厘的全套轧钢机、80吨(车身重)的电机车、载货量5,000吨的沿海货轮、载油量4,500吨的沿海油轮、40马力的拖拉机、四轴自动车床、组合机床和铟、硒、碲、锗、镓、钴稀有金属产品等等。

1957年的农业和农副业总产值计划安排为611.5亿元，超过五年计划2.5%。这样，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农业和农副业生产增长的速度，平均每年的递增率将是4.8%，比原定的4.3%也将超过。我国粮食的产量，将由1952年的3,088亿斤，提高到1957年的3,820亿斤，而在1949年只有2,162亿斤。我国棉花的产量，将由1952年的2,607万担，提高到1957年的3,000万担，而在1949年只有888万担。

1957年的基本建设投资额计划安排为111亿元，超过五年计划的1957年投资额14%，加上前四年已经实现了

的投资额,预计可以达到477.22亿元,比原定的五年投资总额超过11.6%。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施工的限额以上的厂矿企业建设单位将达到825项,比原定的694项超过131项。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竣工的限额以上的厂矿企业建设单位将达到448项,比原定的455项减少7项,主要是因为有些建设单位的规模扩大了,有些建设单位的进度延迟了。各工业部五年预计竣工的限额以上的厂矿企业建设单位共计350项,其中主要的有:煤矿94项,电站37项,炼油厂和油矿7项,黑色和有色冶金20项,化学工业10项,建筑材料和木材加工13项,金属加工和机械制造108项,纺织、造纸、食品等轻工业45项。五年预计新增加的生产能力,按每年的生产量计算,主要的有:原煤4,528万吨,发电量104.7亿度(发电设备容量209.4万千瓦),天然石油和人造石油126.5万吨,生铁309.4万吨,钢217万吨,钢材114.9万吨,水泥239.3万吨,棉纱161万件(纱锭166万枚),棉布14.1亿公尺(织布机46,552台),机制纸21.5万吨,机制糖15.5万吨。这些都是按设计能力计算的,前面说过,很多企业的实际生产能力,是会超过设计能力的。

1957年包括在国家计划以内的职工的年平均人数,计划安排为2,216.8万人,社会就业面比五年计划扩大了。职工的年平均工资,计划比1952年增长约37%左右,超过原定增长33%的水平。绝大多数农民的收入,在生产增长的基础上,也有相当的增加。高等学校、中等专业学校、高级和初级中学、高级和初级小学,计划安排的

学年初在校学生人数，比五年计划超过2%到18%。

因此，实现了1957年度的国民经济计划，除了个别的建设项目、个别的产品和某些事业的发展指标以外，绝大多数的建设项目、绝大多数的产品和绝大多数的事业的发展指标，都可以超额地完成我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

现在，我们完全可以这样说，我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将要完成和超额完成了。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将要建立起来了。我国基本上已经能够用自己制造的设备，建设自己的电站、采矿企业、中型冶金企业、金属加工企业、化学工业企业和轻工业企业了。我国已经开始用自己制造的机械，装备自己的运输部门、农业部门和加强国防了。我国也已经能够用自己生产的金属材料，来满足规模不断扩大的建设事业的大部分需要了。我国人民知道，这些成就，是同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兄弟国家对我国的援助分不开的，我们应该对他们的援助再一次表示深切的感谢。

### 三、为实现一九五七年度的 国民经济计划而奋斗

为了保证1957年度国民经济计划的完满实现，必须在全国范围内贯彻执行勤俭建国的方针，进一步开展增产节约运动。

增产节约，勤俭建国，是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扩大社会主义积累的基本方法。它不仅是保证1957年度国民经

济计划实现的根本措施，而且是一个长期的带有战略意义的方针。

关于在国民经济各部门和机关、部队、学校、团体中贯彻执行勤俭建国的方针和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问题，中共中央和国务院都已经发出指示，政协全国委员会也向全国发出了号召，不再重复。这里我只想着重地说一说在基本建设的各个方面，如何进一步地贯彻执行勤俭建国的方针的问题。因为基本建设的问题，是我国现阶段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中头等重要的问题。而在建设事业中如果能够从各方面很好地贯彻执行勤俭建国的方针，就可以保证我国在三个五年计划或者更多一点的时间内，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

大家都可以看得见，过去几年我国的建设事业获得了巨大的成就。许多新的工业企业建设起来了，许多新的工业城市出现了，许多原有的城市的工业大大地发展了，许多消费城市开始改变为生产城市。但是，应该指出，由于我们缺乏建设的经验和国家机关的有关领导部门工作中发生的缺点和错误，使我国的建设事业，还存在着不少的缺点，使国家有限的财力、物力，没有能够充分地发挥作用。例如，在工业建设方面，对于新建和改建企业项目的安排注意较多，而对于合理地利用我国原有的中、小型企业和手工业注意不够。在工业的技术政策方面，某些地方不适当地强调了大规模、现代化和高标准，而对于建设中、小型的企业，很好地利用我国劳动力多的优点，则注意不够。在工业建设的设备供应方面，有些可

以用自己能够制造的设备而不愿意用，要求从国外进口同类的设备。在工业建设的相互配合方面，不注意组织生产的协作，而要建设全能的工厂。建筑的安全、卫生、防空、防火、防洪标准偏高，城市规划过大，办公楼、招待所、休养所、大礼堂等盖得过多，在这些方面或多或少地存在着一种脱离实际、脱离群众、追求豪华、铺张浪费的不良现象。所有这些缺点，都给我国的建设事业造成了一些损失。我们应该好好地总结经验教训，纠正这些缺点，使我国建设事业的发展更加适应于我国经济落后、人多地少、农业比重大和人民生活水平低的现实情况。为此目的，我们准备有步骤地采取以下各项措施：

第一，新工业企业的建设，应该充分考虑现有工业、农业、手工业的生产能力及其相互关系，统筹兼顾，适当安排，以便迅速地增加生产，相互促进其发展；而避免相互排挤，阻碍生产的发展。

第二，在工业建设中，应该采用适合于我国经济条件和工业水平的技术装备。为着我国的工业化，必须建设一批用最新技术装备起来的现代企业作为骨干。但是，其他企业的建设，应该提倡最新技术同一般技术相结合，机械化、半机械化同手工操作相结合。

第三，大型企业的建设，要同中、小型企业的建设相结合，并且今后应该多建中、小型企业。

第四，除了某些我们自己还不能设计的、技术水平最先进的企业的建设，必须请苏联和有关社会主义兄弟国家帮助设计和供应设备之外，一般中、小型企业和中等

技术水平的企业的建设，应该努力自行设计和自行制造设备。只要是自己能够制造的设备，即使质量差一点，也应该采用。

第五，以市或者一个地区为单位，尽可能地统一安排企业的协作，临近的工厂，力求共同使用辅助车间、附属车间和实验室。

第六，降低建筑标准。生产性建筑的标准，包括厂房在内，应该在能够保证建筑的质量、保证生产顺利进行的原则下，力求节约，而不应该追求过高标准。宿舍的建筑标准，不论城市或者乡村，一般应该同当地居民的住宅水平看齐或者稍高一些。现在采用的防空、防火、防洪、卫生等标准，应该适当降低。

第七，关于住宅建设。国家主要应该解决职工的集体宿舍，也可以建设一部分标准较低的公寓。同时，应该鼓励职工自建家属宿舍。职工家属宿舍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是不能完全解决的，只能是一部分、一部分地逐步解决。城市职工宿舍的修建、管理、分配和租金等问题，是关系到城市建设和职工生活的重要问题，应该全面地深入地进行调查研究，并且同职工进行讨论，以制定正确的政策和合理的制度。

第八，在今后若干年内，一般不再建设办公大楼、招待所、休养所和大礼堂。某些城市必须增加一些公共建筑和服务性的建筑（如学校、商店、医院、邮电局、旅馆、影剧院等等）的时候，也应该因陋就简，面向群众，合理分布。

第九，严格控制城市规划的规模，合理地降低城市建设的各项标准，节约投资，节约用地。在建设工厂和学校的时候，应该充分利用原有的城镇。

第十，今后所有建筑安装单位，在进行基本建设的时候，应该尽可能地利用正式工程的建筑物，少建或者不建临时性的建筑物。在必须建设某些临时性的建筑物的时候，也应该只限于那些必要的工棚和现场性的加工场，一般地不再建设永久性的建筑基地。现有的永久性的建筑基地，在建筑任务完成之后，它的全部建筑物，包括办公、住宅、福利等建筑物在内，应该逐步地改作他用。

我们相信，采取上述措施，就可以在基本建设方面合理地节约国家的建设资金，就可以用同样数量的钱而能够办更多的事，使我国的建设事业真正能够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地向前发展。

各位代表！

1957年度的国民经济计划草案是比较积极的和充分可靠的。这个计划在进一步地深入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条件下，在全国人民的一致努力下，是可能超额完成的。根据今年一月份到五月份计划执行情况的检查，在工业生产方面，总产值累计已经完成年度计划的41.4%，比1956年同期增长了11%左右；几种主要的工业产品比1956年同期增产的数量是：电力13.6亿度，原煤517万吨，钢材65万吨，水泥26万吨。生产资料供应的紧张状况，已经有所缓和。在农业生产方面，冬播作物小麦的产量比上年略有增加，油菜籽的产量则比上年有较多的增产；春



播、夏播作物的种植情况，一般良好；水稻、杂粮的种植面积都比上年扩大，而棉花的种植面积，则有所缩小；猪的饲养头数，也较上年有所增长。如果没有特大的自然灾害，农业生产可能完成计划。在基本建设方面，到五月底止，投资额累计已经完成年度计划的25.1%，略低于1956年同期水平。在市场方面，供应市场的生产资料已有增加；消费资料，特别是副食品的供应，也开始有所好转。在交通运输方面，主要线路的紧张状态，也在逐步改善。总之，1957年度的计划，过去几个月的执行情况是比较好的。但是，农业的收成目前尚难断定，还应该预防各种可能发生的自然灾害。工业生产中，有些产品的品种过少，有些产品的质量不稳定或者有些下降，还应该积极地增加产品品种，提高产品质量。某些轻工业产品由于原料不足，在下半年的生产中还会遇到一定的困难。特别是由于棉花不足，棉纱、棉布的产量比计划还要减少。同时消费资料的供应，虽有某些好转，但少数商品仍然比较紧张；生产资料的供应虽有改善，但总的说来还感到不足。因此，全国人民必须深入地开展增产节约运动，千方百计地挖掘潜在力量，努力克服困难，加强计划执行过程中的监督检查工作，为全面地完成1957年度国民经济计划而奋斗，为更多地、更好地超额完成我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而奋斗。

根据一九五七年七月二日  
《人民日报》刊印

# 军事建设概况\*

(一九五七年七月十六日)

彭 德 怀

国防委员会自从上一次开会以后，已经很久没有开会。毛主席指示，要我将这一时期在军事建设上所做的工作，向国防委员会作一概括的汇报。为了便于研究起见，拟分做以下六个问题来讲：一、军事建设的方向和步骤；二、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三、军队建设；四、如何解决平时养兵少、战时用兵多的矛盾问题；五、国防工程建筑<sup>(1)</sup>；六、军事科学研究工作。

## 军事建设的方向和步骤

关于军事建设的情况，我想先从军事建设的方向和步骤谈起，因为这是我们进行工作的总前提。在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是从以下两方面的情况出发的：第一，是我国武装力量的任务；第二，是国际和国内形势的发展情况。就是说，既要考虑到需要，又要考虑到可能。

---

\* 这是彭德怀在第三次国防委员会全体会议上的汇报。

我国武装力量的任务，宪法上规定的很明确，就是“保卫人民革命和国家建设的成果，保卫国家的主权、领土完整和安全”。为了完成这个重大的任务，在军事建设上，我们就需要把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原有的基础上，建设成为一支优良的现代化的革命军队，就需要把旧中国没有防御设施的情况，逐渐改变成为一个具有充分防御设施的国家。这样的军队建设和防御设施，就是我国军事建设的方向。这个方向是必须要实现的。

怎样实现，需要经过什么步骤，问题就比较复杂了。就建设现代化的军队来说，在装备上如果想达到现在苏联军队或美国军队的标准，就是很不简单的事情。拿美国来说，他们在一九五七年度的直接军费预算，就是三百六十亿美元，折合人民币将近九百亿元，相当于我国一九五七年国防费用预算的十六倍。很明显，建成这样一支现代化的军队，目前我国的财力、物力都是办不到的。再就国家防御设施来说，我国面积这样大，海防线和边防线这样长，要想在海防、边防和内地把防御现代武器的设施都搞起来，在短时间内也是不可能的。

不仅如此，从我国当前总的情况来考虑，也不应当将过多的财力、物力用在军事建设上。道理很简单，虽然从一九四九年建国以来，各方面建设的发展都很快，人民生活也有显著改善，但是我国目前在工农业生产水平上，毕竟还很落后，我国人民的生活，毕竟还很不富裕。这是一个根本问题。<sup>14</sup>这个根本问题得到适当的解决，军事建设就有了巩固的基础。这个问题如果解决得不适当，现代

化的军事建设搞得过多过急,同国家经济建设不相适应,反会害多利少。当然,只注意经济建设,根本忽视军事建设,也是有害的。

从国际形势来说,我们是从各方面努力争取国际形势走向缓和的。我国处理国际事务的根本出发点,就是要制止新的大战爆发,使全人类能够免于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浩劫。我国的这种和平外交政策,是和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一致的,也是和许多爱好和平的国家和各国人民相一致的。帝国主义内部存在着严重的矛盾,对于发动新的世界大战,在认识上也有分歧。只要我们继续加强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努力执行和平外交政策,团结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力量,新的大战是可能制止的,至少是可以推迟的。当然,我们绝不能只看到这一面,还要看到在帝国主义阵营中,某些国家和某些人物对发动战争很有兴趣,并且在实际上准备着战争。因此,我们就应当看到帝国主义发动战争的可能性,就应当有随时应付突然事变的准备,应当在可能的范围内积极进行军事建设的工作,不能放松应有的警惕。如果不够地估计到这个方面,也是非常危险的。

在这样复杂的情况下,采取适当步骤和分期完成的办法,来实现我国军事建设的方向,是比较妥当的。首先搞一些迫切需要的建设,然后有条件时搞那些比较需要的建设,发现帝国主义完成战争准备确有征候向我国进攻的时候,再适时地集中力量,扩大军事建设。这样的步骤,既可以保证我国能够有一定力量随时应付突然事变,

又可以不致影响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正常发展。这几年来，各方面的工作，基本上就是按照这种精神进行的。但在建国初期，由于我们经验不足，特别是由于朝鲜战争的影响，对于改进军队装备曾经有一段时间要求过多、过急。这种情形，到一九五四年就已经发现，并已获得改正。

## 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

战略方针是关系到军队建设、军队训练和战争准备的根本性质的问题。这个问题，全国革命在大陆上胜利以后，在抗美援朝战争当中就已经明确了，我国在军事上应当是战略防御的方针，而不是发动战略进攻的方针。但是这种防御，不应当是消极防御，而应当是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

为什么我国的战略方针应当是防御的？我们是这样考虑的：确定军事上的战略方针，必须根据军事服从于政治的原则，不能单纯从军事方面来考虑，必须从我国的根本性质和根本政策来考虑。我们的国家，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国家，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国家。在我国已经基本上消灭了生产资料私有制度，基本上消灭了依靠战争和掠夺殖民地发财的资产阶级，因而我们的社会制度和经济制度，根本不会产生侵略别的国家的因素。我国当前的总任务，是要团结全国人民，加强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争取一切国际

朋友的支持，努力保卫国际和平和发展人类进步事业，争取一个相当长期的国际和平环境，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因此，我们不需要对别的国家发动战争。我国的和平外交政策，主张和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和平共处，主张以著名的五项原则来建立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主张以谈判的方式而不是用战争的方式来解决国际间的各种争端。国际间的问题，只要有和平解决的可能，我们就决不主张用战争的方式解决。我国的性质、任务和外交政策，都很清楚地说明，我们的战略方针只应当是防御的。首先发动战争去进攻别的国家，是和我们国家的性质、任务和外交政策根本相违背的。

为什么我们采取积极防御，而不能采取消极防御呢？因为消极防御在战争爆发之前，既不从积极方面设法制止战争的爆发或推迟战争的爆发，而在战争爆发之后，他们也不善于在战役和战术上采取积极的行动去打破敌人的进攻，只是企图用消极防御或者单纯防御的方法来阻挡敌人的进攻，其结果则只有到处招架、到处挨打，使自己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这种消极防御的战略方针，我们是不能采用的。与此相反，我们一贯执行的是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例如在朝鲜战争爆发以后，美帝国主义首先霸占我国的台湾，不顾中国人民一再警告，大举北犯，越过“三八线”，进逼鸭绿江，威胁我国东北的安全。我国人民即适时地组织志愿军，开赴朝鲜同朝鲜人民军共同抗击侵略军。这不仅是“以战止战”的英明措施，而且也是积极防御的实际运用。又如我国给予某些兄弟国家

和其他中立国家经济上的帮助和支持,对于扩大“五项原则”的影响,抵抗帝国主义的侵略,维持国际和平,制止战争,也是有重要意义的。这些正义和友好的行动,对于那些在政治上有狭隘民族主义情绪的人们,在军事上有消极防御思想的人们来说,是不容易理解的。但是,对于真正爱好和平的人们来说,就非常容易理解。

对于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我们是这样理解的:就是说,在战争爆发之前,我们要不断地加强我国的军事力量,继续扩大我国的国际统一战线活动,从军事上和政治上来制止或推迟战争的爆发。当帝国主义不顾一切后果向我国发动侵略的时候,我们要能够立即给予有力的还击,并在预定设防地区阻止敌人的进攻。在实施这个战略方针的时候,就是要在沿海重要地区构筑坚固的工事,要制定歼灭敌人的战役和战略空降的计划,要加强侦察手段,争取能够预先发现敌人发动战争和使用大规模杀人武器的征候,以便减少敌人突然袭击所加于我们的各种破坏和损失,并且保证我军第一线和纵深的部队能够适时地进入战斗,掩护全国由平时迅速转入战时状态。就是要在战略部署上掌握强大的机动部队,能够在战役和战术上适时地组织反攻和进攻,配合沿海守备部队消灭和消耗敌人,歼灭敌人的空降部队,完成战略积极防御的任务。只要在战争开始时期的三至六个月内,我们能够顶住敌人的几个连续进攻,能够将敌人的进攻限制在预定地区,把战局稳定下来,迫使敌人改变速战速决的战略方针,同我们进行持久作战,我们就可以逐渐剥夺敌人在

战略上的主动权,使我军逐渐掌握战略上的主动,然后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的进攻。

在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下,可否先发制人呢?就是说,当我们发现敌人立即要向我国大举进攻的时候,我军是否可以首先出动到敌人领土上去打击敌人呢?我们认为这是不可以的。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本来敌人是发动战争的祸首罪魁,只要敌人挑起战争,就会立即引起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反对。如果我们不等敌人先动手,就首先打进敌国的领土,那么,我们保卫祖国战争所具有的正义性,就很难取得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谅解,就有利于帝国主义把发动战争的罪名加到我们头上,使我们失去广泛的同情和支持,使敌人获得政治上的资本。这是得不偿失的。而且首先动手,也不是战争胜败的决定因素。战争的胜败,最终还是由国家的政治制度,生产力发展的程度,人民对战争的态度,以及军队的士气、军队质量和数量、军队指挥人员的组织能力等等的总和来决定的。历史上的战争,特别是德、日、意法西斯集团的覆灭,都是很好的证明。当然,由于原子武器、氢武器等新式武器带来的高度毁灭性,在战略上采用先发制人的手段所给予对方的破坏和困难,毫无疑问是大大地增加了。在这方面,我们应当有充分的估计。不过还应当认识到,这些新式武器,虽然可以大量地破坏对方的军事设施、国防工业和经济中心,甚至可以破坏对方的深远后方,但是仍然无法毁灭对方的一切潜在力量。特别是对于大国,对于具有充分的现代战争准备的国家,更不可



能依靠这些新式武器和突然袭击的手段去达到迅速结束战争的目的，何况氢武器也不是帝国主义阵营所独有的。以上这些，只是从战略范围来说的，至于敌人向我国发动侵略战争之后，在战役上和战术上，我们不仅不反对采用隐蔽突然的进攻方式坚决打击敌人，而且还要提倡这种作战方式。这是不能和战略问题混淆的。

## 军队建设

根据我军保卫祖国的任务和战略方针，我军应当建设成为一支强大的现代化的革命军队。但是正像前边说过的，目前国家更需要的是发展经济建设，不但不应当用过多的财力、物力来搞军事建设，而且今后的军事费用在国家总支出的比例中还要缩小。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合理地使用有限的军费，保证军队建设任务的完成，就是我军所面临的一个问题。解决这个问题可以有两个办法，一个是维持军队的原有数量，把有限的国防费用平均地使用在日常生活的消耗上，结果形式上看来是有一支数量庞大的军队，实际上将使我军装备技术水平长期得不到改善，战斗能力长期得不到提高。另一个办法是减少原有军队员额，把军费用于重点建设，加速改善我军的技术装备，加强训练，提高战斗能力。显然，我们只有采取后一种办法才是正确的。所以，我们对军队建设，就采取了裁减数量、加强质量的方针。

从军费开支来看，一九五六年我国军费的开支是六

十一亿一千六百万，占国家总支出的百分之二十。在这里边，用于吃、穿、训练、装备修理、办公杂支、工程建筑、动员复员的费用，占去了大部分，而用于装备购置费用的只占一小部分。在这种情况下，显然想迅速提高军队的装备质量，是很困难的。一九五七年度的军费预算是五十五亿二千三百万元，较一九五六年度减少将近六亿元。在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前两年中，还要准备进一步减少。因此，我们针对这种情况，从今年开始，准备进一步裁减军队的数量。准备裁减的人员，主要是各种平时没有迫切需要的勤务部队，是些可办可不办的过多的学校，是些工作任务重叠或者可以合并的机关部门，并且在保持足够战斗单位的骨干的原则下，把战斗部队的战时编制转为平时编制。

在加强军队质量方面，首先来谈一谈如何提高军队的装备水平。在这个问题上，由于军费的限制，我们只能采取重点加强的方针。根据我军战略方针的要求，在陆、海、空三军建设的比重上，需要首先加强空军，因为它在未来战争中，对于有效地配合陆、海军作战，掩护后方组织动员和生产运输工作具有重大作用。我国的空军现在已经拥有一定数量的飞机。今后随着国家航空工业的发展，将还会获得进一步的加强。海军，作为主要装备的舰艇，今后仍以潜艇和鱼雷快艇为主，加强建设，以便在战时打击敌军海上运输和配合沿海防御作战。在未来战争中陆军仍将是战场上的主体。现在我国的陆军，步兵师已经基本上完成了改装，各特种兵也建立了相当的基础，

坦克和各种制式火炮已有一定的数量。今后对于陆军中的特种兵(如炮兵、坦克兵、防化学兵、通信兵等)的建设,还将随着国家工业的发展相应地加强。经过一定时间之后,我军机械化的比重就会大大提高。另外,为着应付可能发生的突然事变,陆军装备还进行了一些储备,第一个五年计划结束时,可以储备相当数量的步兵通用武器。第二个五年计划中准备再储备相当数量的武器。储备这些武器,对战争初期扩建部队和补充作战消耗,无疑是十分必要的。

近几年来,我国的国防工业建设,由于职工同志、科学技术人员的积极努力,由于苏联兄弟般地帮助,已经取得了很大成绩。目前,我国不仅能够生产陆军的各种常规武器,而且已经能够生产飞机、潜水艇、鱼雷快艇和驱潜艇等技术装备。远射程的大口径火炮和坦克,在一两年内也将投入生产。国防工业方面的这些成就,为军队提高装备质量的工作,提供了重要的物质基础。

加强军队质量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军队人员的训练。我们在一九五四年就提出了平时军队训练是军事建设的中心,而干部训练又是中心的中心。几年来在部队训练方面,已经取得了不少成绩,各军种、兵种的战术、技术水平,都有显著的提高。在培养训练干部工作上,除了组织在职干部学习或集训以外,还举办了专业军事院校一百零八所,其中包括军事学院、军事工程学院、后勤学院、政治学院、各级步兵学校和各兵种学校等。另外还有预备学校五十四所和文化学校七十三所。总共是二百

三十余所。高等军事学院，海、空、炮、装甲学院，正在筹建中。已建成的这些学校都已开办了数年，培养出来不少合成军队的军官和专业军官。目前在部队中，已有相当数量久经战斗锻炼的军官经过学校深造，尚有一批经过战斗考验的骨干在校学习。对于保留有战斗经验的干部，一般地是注意到了。同时也开始注意了培养特殊地区的军事干部和少数民族军官。从军官的数量来讲，目前在部队的军官不是太少，而是太多。对于多余的军官，除了为着保留有战斗经验的骨干，准备在军内储备十万到十五万名以外，其余的军官准备逐步转业，退入预备役。

### 如何解决平时养兵少、 战时用兵多的矛盾问题

解决这个问题，首先应当研究一下实行什么样的兵役制度。宪法规定的精神，我国是要实行义务兵役制。最近，有些委员和有些同志提出，应当恢复志愿兵制或者募兵制。当然，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现在我把这方面的情况介绍一下。

义务兵役制已经实行了三年，共征兵二百万人左右。从征兵的情况来看，是比较顺利的。虽然在要求上是征兵制，但在做法上仍贯彻了政治动员、说服教育的精神，所以广大青年都能在自觉自愿的思想基础上报名应征。原则上做到了三方满意：即群众满意、地方满意、军队满意。在开始推行工作中，虽然也有个别地区因宣传不透，

强迫命令引起个别群众逃避兵役的现象，但偏差不大，并且一年比一年有所改善。到目前为止，可以说定期征集工作在人民群众中基本上已经习惯。缺点方面是，每年都要征集和复员，给地方工作增加了一些麻烦；特别是这三年来，义务兵役制度开始推行，又加上每年复员的都是长期在军队服务的志愿兵，安置就业比较困难，显得工作有些紧张。再有，就是这几年对于第二类预备役登记的年龄过多，进行的面太宽，手续过于繁杂，群众感觉不便。县、市兵役机构编制过大，有些干部只搞自己业务，没有主动协助复员军人的工作和参加地方的中心工作。对于新兵就地征集，就地补入部队的原则贯彻不够，新兵调运过多、过远，有些浪费。这些缺点，是必须纠正的。但是，这些缺点并不是征兵制度本身的问题，只是工作方法问题。

如果改变征兵制度，恢复志愿兵制，就有下列问题需要考虑。例如恢复志愿兵制，无非是为了志愿兵服役的年限可以长一些；但是一个十八岁或二十岁的青年入伍，服务七八年或十来年，复员时已将三十岁，脱离生产过久，没有专业技能，又超过了学习年龄，安置就业比较困难。志愿兵在军队服务过久，婚姻问题也难处理。在待遇上如果低于农民或工人的平均收入，征募志愿兵入伍和巩固部队都有困难。志愿兵制的好处是，在军队服务较久，士兵的战斗技能比较熟练，一旦国家有事，便于扩充军队充当干部，也可以减少每年动员和复员的麻烦。

选择兵役制度，主要应当考虑如何解决平时养兵少，

战时用兵多的矛盾问题。志愿兵制是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同时,我国兵役法公布前反复征求过人民的意见,实行三年以来人民群众一般是拥护的,经我们考虑暂时不加改变为好,但具体执行工作中的缺点必须改正。

兵役法公布后,对于预备役士兵的登记和训练,已经开始试行。一九五五年冬,先由总参谋部颁发了一个《预备役军士和兵的登记暂行办法(草案)》。对当年复员的士兵,当年征集多余的应征公民,以及对十八岁到三十岁的男性公民和具有专业技术的女性公民,试行了一次普遍登记。一九五六年全国共登记了三千三百二十七万余人。其中复员军人一百四十一万人。试行的结果,发现登记的年龄太多了,手续复杂,预备役士兵迁居时办理转移手续不便。这些缺点,需要加以改进。

对预备役士兵训练,为了节省经费和照顾群众生产,采用不脱离生产的方法,一九五六年在农村进行了试点工作。在全国二十七个省市中,选择了三千五百一十八个乡,有四十万四千余人参加了训练。实弹射击,有百分之六十七点二的人及格,成绩还不算坏。训练的时间都在十天左右,在农闲季节进行,对生产影响不大。训练经费,每年每人平均需要三元五角(包括伙食补贴、办工杂支等)。此外,个别区乡在当地驻军的帮助下,还进行了炮兵和防空兵的预备役训练。根据试行的结果看,在有驻军的地方,采用不脱离生产的办法,也可以进行技术兵的预备役训练。

实行预备役登记训练以后,地方军事部门放松了对

民兵领导，致使不少地区的民兵组织有些涣散现象。现在全国民兵还有三千八百一十一万余人，其中基于民兵一千零八十九万余人，有长短枪一百三十二万余支。他们具有革命的战斗传统，对于执行三大任务，即：（一）保护生产；（二）维持社会治安；（三）捕捉空降和海、边防偷潜特务，都起着重要的作用。一旦遇到外国军事侵略，民兵不仅可以辅助和配合正规军作战，并将成为扩编正规军的重要基础。因此，这种人民群众的武装组织，必须很好地加以重视。

为了改进预备役士兵登记和训练工作，为了发扬民兵组织的革命传统，已经研究了改进这一工作的办法，就是把预备役登记工作、训练工作和民兵工作合而为一，实行民兵即预备役的办法。也就是以复员军人为骨干，结合青年组成基于民兵；其余年龄较大而又适合预备役条件的人编为普通民兵。基于民兵进行定期训练（一般地利用农闲时间进行十天，至多十五天），普通民兵可以不进行定期训练，视情况进行某些必要的训练。因此，预备役的登记范围可以大大缩小，今后只登记当年复员的士兵和参加民兵的青年。基于民兵中除了复员军人以外，如果还有十八岁到二十五岁的青年参加，则全国的预备兵员可以经常保持两千万左右。这样做就基本上解决了平时养兵少，战时用兵多的矛盾。

对于预备役军官的登记和训练，从一九五六年三月开始，在大连、保定、苏州、昆明四个城市的机关、企业、事业单位中进行了试验。到一九五六年底，共登记八万九

千四百四十五名，其中退出现役的军官有四万六千四百八十四名，在退伍的军士和老兵中挑选的预备役军官四万二千九百六十一名。根据试点的结果来看，预备役军官的登记，有必要也有条件继续进行。但登记的主要对象，应当是退出现役的军官和复员、退伍的优秀军士。在可能的条件下，可以对复员、退伍的优秀军士，有计划地组织短期训练，使之成为预备役军官。

## 军事科学研究工作

我国军事建设已由初级阶段进入高级阶段，在军事学术和军事技术方面提出很多新的问题。同时，由于现代科学技术的最新成就广泛应用到军事方面，大量毁灭性武器的出现，未来战争的方法和形式都有很多新的特点。为了适应我国军事建设发展的需要，为了摆脱我国军事技术装备上的落后状态，为了有效地保卫祖国安全，必须积极地展开军事学术和技术研究工作。

建国以来，我们的军事学术研究工作，主要是比较系统地介绍了苏联的军事科学，编写和改进了我军的共同条令，总结了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的作战经验，初步整理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各个战争时期的战史资料，收集了一些帝国主义国家的军事材料。但在全军开展军事学术研究工作中，出现过两方面的偏向。前一时期，由于认识落后于现代化军队的发展，对军队由初级阶段向高级阶段过渡的复杂性预见不够，对于学习苏军先进经验



有些抵触情绪。这个问题，经过一九五二年和一九五三年的宣传教育，很快得到了解决。在介绍和研究苏军先进经验方面有了很大开展之后，又产生了某些脱离我国我军实际的教条主义偏向，对于系统地总结我军的经验，结合我国我军的实际情况，继承和发扬我军的优良传统，则注意不够。上述两种偏向，主要是由于思想方法的片面性，没有真正了解，学习别国的经验，继承和发扬自己的经验，都只有一个目的，这就是为了依据我国我军当前实际情况，更好地解决建军和将来作战问题。离开我国我军当前的实际情况，抽象地学习外国军事经验和我军过去的经验，都是没有实际意义的。因此，吸收别国经验和继承自己过去的经验，都必须采取批判的态度。既不应当否定一切，也不应当生搬硬套。只有如此，才是真正科学的态度。

因此，我军今后军事学术研究工作的任务，可以归纳为：继续系统地介绍苏军先进经验，系统地总结我军的军事工作和政治工作经验，研究和编写我国我军的战史资料。并以毛泽东同志的军事著作作为指针，参考苏军先进经验，以我国我军现实装备、制度、自然条件为主，照顾我军最近将来装备可能发展的情况，编写自己的军事教范和条令，把我军历史的经验在新的条件下加以恰当地应用和发扬，使之能够贯彻到全军并保持下去。同时，为了战胜敌人，还必须研究帝国主义，主要是美帝国主义的战争潜力、备战措施、战略战术及其特点等。为此，我们已准备成立一个军事科学院，专门从事这方面的工作。

在军事技术研究方面，我们应该研究、学习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的各种成就，研究资本主义国家包括美、英等帝国主义国家在内的各种技术发明，同时还应与全国工业和科学系统很好的分工合作，以争取在几种重要的技术方面，尽快赶上或接近先进国家军队的水平。中国人民解放军在这方面的的工作是，已初步建立了航空研究院，电子科学研究院，军事医学科学院，化学防护研究所，军械研究所等。但都是刚刚建立起来，各方面的条件比较简陋。至于核子武器，已准备积极着手研究。在我们尚未掌握这些新式武器以前，需要特别注意研究在使用核子和化学武器条件下的作战防护问题。军队医务部门需要着重研究在敌人使用核子武器、化学武器、细菌武器等条件下的战场救护和治疗问题。此外，对我军常规武器、器材、被服、装具的研究也需要加强，力求不断改进，以适应新的战争情况。

根据《彭德怀军事文选》刊印

## 注 释

- 〔1〕 国防工程建筑问题，收入《彭德怀军事文选》时已略。

# 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

(一九五七年七月)

毛 泽 东

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和人民的矛盾是敌我矛盾，是對抗性的不可调和的你死我活的矛盾。

向工人阶级和共产党举行猖狂进攻的资产阶级右派是反动派、反革命派。不这样叫，而叫右派，一是为了便于争取中间派；二是为了便于分化右派，使一部分右派分子有可能转变过来。

最后不能转变的那一部分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是死硬派，只要他们不当特务，不再进行破坏活动，也给他们一点事做，也不剥夺他们的公民权。这是鉴于许多历史事件采取了极端政策的后果，并不良好。我们应当看得远一些，在几十年后看这个事件，将会看到我们这样对待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对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会有深远影响和巨大利益的。

\* 这是毛泽东一九五七年七月在青岛召开的省市委书记会议期间写的一篇文章，在这个会议上印发过，同年八月，又印发给党内领导干部阅读。

我们的目标，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以利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较易于克服困难，较快地建设我国的现代工业和现代农业，党和国家较为巩固，较为能够经受风险。总题目是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和正确地处理敌我矛盾。方法是实事求是，群众路线。派生的方法是党内党外在一起开一些有关大政方针的会议，公开整风，党和政府的许多错误缺点登报批评。民主党派，教育界，新闻界，科技界，文艺界，卫生界，工商界，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各阶层、手工业工人和其他城乡劳动者，都应当进行整风和社会主义教育，分期分批逐步推行。其中，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使他们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问题；小资产阶级（农民和城乡独立劳动者），特别是富裕中农，也是使他们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问题；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基本队伍，则是整顿作风的问题。这是性质不同的两个社会范畴的问题。既然有这样的不同，为什么通用整风这个口号呢？这是因为整风的口号较易为多数人所接受。我们向人们说：共产党和工人阶级尚且进行整风，难道你们不应当整风吗？这就十分主动了。整风的方法是批评和自我批评，摆事实，讲道理。整风的目的是把斗争方向引导到端正政治方向，提高思想水平，改正工作缺点，团结广大群众，孤立和分化资产阶级右派和一切反对社会主义的分子。这里所说的资产阶级右派，包括混入共产党内和青年团内的一些同党外团外右派分子政治面

貌完全相同的人，他们背叛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向党猖狂进攻，因此必须充分揭露，并把他们开除出去，借以纯洁党团组织。

必须坚定地信任群众的多数，首先是工农基本群众的多数，这是我们的基本出发点。即就商、学两界而论，在右派猖狂进攻时期，多数人可以被蒙蔽，发生动摇。几个星期以后，反击右派展开，多数人也都清醒了，都过来了。所以，这两界的多数人，最后也是可以信任的，他们是可以接受改造的。对无产阶级力量估计过低，对资产阶级右派力量估计过高，不少同志曾经犯过这种错误。现在地县区乡及工厂干部中还有许多人是这样，应当好好说服他们，不要低估了自己方面的力量，不要夸大敌人方面的力量。农村中，地主、富农正在被改造；其中，一部分人还在捣乱，必须对他们提高警惕。富裕中农，多数愿意留在合作社，少数闹退社，想走资本主义道路。我们应分别对待。在农村中，必须注意阶级路线，必须使原来的贫雇农在领导机关占优势，同时注意联合中农。我赞成迅即由中央发一个指示，向全体农村人口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批判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想，批判某些干部的本位主义思想，批判富裕中农的资本主义思想和个人主义思想，打击地富的反革命行为。其中的主要锋芒是向着动摇的富裕中农，对他们的资本主义思想进行一次说理斗争。以后一年一次，进行坚定的说理斗争，配合区乡干部的整风，配合第三类社整社，使合作社逐步巩固起来。农村中也要先让农民“鸣放”，即

提意见，发议论。然后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批判之。这应当在上级派有工作组协助当地干部主持农村整风的条件下，逐步推行。和城市一样，在农村中，仍然有或者是社会主义或者是资本主义，这样两条道路的斗争。这个斗争，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取得彻底胜利。这是整个过渡时期的任务。农村中，勤俭持家应当和勤俭办社并提，爱国、爱社应当和爱家并提。为了解决勤俭持家问题，特别要依靠妇女团体去做工作。最近几年，三百五十亿斤征粮和五百亿斤购粮，必须坚决收到，不能短少。按照年成丰歉，可以有所调节。农村中，因为逐年增产，缺粮户逐年减少，因此销粮应当逐年减少。城市销粮过多之处，也应酌量减少。这样，国家的粮食库存才有可能逐年增加，以备可能发生的紧急之需。如果八百五十亿斤左右的粮食收不到手，则将牵动市场物价，牵动整个国民经济计划的顺利进行，并且无法应付紧急情况，这是很危险的。今年秋收以前，必须在农村中进行一次反对不顾国家利益和集体利益的个人主义和本位主义的斗争。

有反必肃。杀人要少，但是决不废除死刑，决不大赦。对刑满释放再犯罪者，再捉再判。社会上流氓、阿飞、盗窃、凶杀、强奸犯、贪污犯、破坏公共秩序、严重违法乱纪等严重罪犯以及公众公认为坏人的人，必须惩办。现在政法部门有些工作人员，对于本来应当捕处的人，也放弃职守，不予捕处，这是不对的。轻罪重判不对，重罪轻判也不对，目前时期的危险是在后者。禁止赌博。认真

贯彻取缔会道门。右派学生首领应予彻底批判，但一般宜留在原地管教，并当“教员”。以上各点，适用于过渡时期，都由省市委、自治区党委负责。在不违背中央政策法规的条件下，地方政法文教部门受命于省市委、自治区党委和省、市、自治区人民委员会，不得违反。

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一个总题目。大谈特谈，习以为常，也就见怪不怪了。把人民内部矛盾想通，说开，正确处理一批问题，收了效果，得了经验，再也不怕了。

再说一遍，所谓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就是我们党从来经常说的走群众路线的问题。共产党员要善于同群众商量办事，任何时候也不要离开群众。党群关系好比鱼水关系。如果党群关系搞不好，社会主义制度就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制度建成了，也不可能巩固。

军队多次整风，实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实行军事、政治、经济三大民主，战时班上建立互助组，实行官兵、军民打成一片，禁止打人骂人，禁止枪毙逃兵。因此士气高涨，战无不胜。手执武器的军队能够这样做，为什么工厂、农村、机关、学校不能够发扬民主，用说服的方法而不是用压服的方法去解决自己的问题（矛盾）呢？

帝国主义都不怕，为什么反而怕老百姓呢？怕老百姓，认为人民群众不讲道理，只能压服，不能说服，这样的人不是真正的共产主义者。

除了叛徒和严重违法乱纪分子这两种人，在整风中保护一切党团员，用大力用诚心帮助他们改正错误缺点，

改善工作方法,提高工作能力,提高政治水平,提高思想水平。共产党员一定要有朝气,一定要有坚强的革命意志,一定要有不畏困难和用百折不挠的意志去克服任何困难的精神,一定要克服个人主义、本位主义、绝对平均主义和自由主义,否则就不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共产党员。有一些丧失朝气、丧失革命意志和坚持错误的人,在屡戒不改的情况下,党委应当予以正当处理,重者绳之以纪律。

省市委、自治区党委的第一书记(其他书记也是一样),在半年到一年内,要求亲身研究一个合作社,一个工厂,一个商店,一个学校,取得知识,取得发言权,以利指导全般工作。地县区的党委书记也应这样做。

这一次批判资产阶级右派的意义,不要估计小了。这是一个在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单有一九五六年在经济战线上(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够的,并且是不巩固的。匈牙利事件就是证明。必须还有一个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共产党在民主党派、知识界和工商界的一部分人(右派)中当然不可能有领导权,因为他们是敌人;在多数人(中间派)中的领导权不巩固;有些文教单位还根本没有建立党的领导。必须建立对中间派的巩固的领导权,并且尽可能早日巩固起来。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共产党不心服,他们中的右派分子决心要同我们较量一下。较量了,他们失败了,他们才懂得他们的大势已去,没有希望了。只有在这时,



他们中的多数人(中间派及一部分右派)才会逐渐老实起来,把自己的资产阶级立场逐渐抛弃,站到无产阶级方面来,下决心依靠无产阶级吃饭。少数人至死不改,只好让他们把他们的反动观点带到棺材里去。但是我们应当提高警惕。要知道,他们一遇机会,又会耍兴风作浪的。这个斗争,从现在起,可能还要延长十年至十五年之久。做得好,可能缩短时间。当然不是说,十年至十五年之后,阶级斗争就熄灭了。只要世界上还存在着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我国的反革命分子和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活动,不但总是带着阶级斗争的性质,并且总是同国际上的反动派互相呼应的。目前的斗争,在一段必要时间之后,应当由急风暴雨的形式转变为和风细雨的形式,以便从思想上搞得更深更透。第一个决定性的战斗,在过去几个月,主要是最近两个月内,我们已经胜利了。但是还需要几个月深入挖掘的时间,取得全胜,决不可以草率收兵。要知道,如果这一仗不打胜,社会主义是没有希望的。

大辩论,全民性的,解决了和正在解决着革命和建设工作是否正确(革命和建设的成绩是不是主要的),是否应走社会主义道路,要不要共产党领导,要不要无产阶级专政,要不要民主集中制,以及我国的外交政策是否正确等项重大问题。很自然地要发生这样一次全民性的大辩论。苏联在二十年代曾经发生过(同托洛茨基等人辩论一国能否建成社会主义),我国在五十年代的第七年发生了。我们如果不能在这次辩论中取得完全胜利,我们就不能继续前进。只要我们在辩论中胜利了,就将大大促

进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造与社会主义建设。这是一个伟大的带有世界意义的事件。

必须懂得，在我国建立一个现代化的工业基础和现代化的农业基础，从现在起，还要十年至十五年。只有经过十年至十五年的社会生产力的比较充分的发展，我们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才算获得了自己的比较充分的物质基础（现在，这个物质基础还很不充分），我们的国家（上层建筑）才算充分巩固，社会主义社会才算从根本上建成了。现在还未建成，还差十年至十五年时间。为了建成社会主义，工人阶级必须有自己的技术干部的队伍，必须有自己的教授、教员、科学家、新闻记者、文学家、艺术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队伍。这是一个宏大的队伍，人少了是不成的。这个任务，应当在今后十年至十五年内基本上解决。十年至十五年以后的任务，则是进一步发展生产力，进一步扩大工人阶级知识分子的队伍，准备着逐步地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必要条件，准备以八个至十个五年计划在经济上赶上并超过美国。共产党员、青年团员和全体人民，人人都要懂得这个任务，人人都要努力学习。有条件的，要努力学技术，学业务，学理论，造成工人阶级知识分子的新部队（这个新部队，包含从旧社会过来的真正经过改造站稳了工人阶级立场的一切知识分子）。这是历史向我们提出的伟大任务。在这个工人阶级知识分子宏大新部队没有造成以前，工人阶级的革命事业是不会充分巩固的。

中央、省市两级，在整风、批判右派和争取中间群众

这三个任务方面,取得了经验,是一件大事。有了这个经验,事情就好办了。今后几个月内的任务是教会地县两级取得经验。从现在起,到今冬明春,是逐步教会区乡两级取得经验。城市是教会区级、工矿基层和街道居民委员会取得经验。这样一来,豁然开朗,群众路线对于许多人说来就不是一句假话了,人民内部矛盾就比较容易解决了。

省市委、自治区党委的第一书记和整个党委,必须把这个伟大斗争完全掌握起来。必须把民主党派(政治界),教育界,新闻界(包括一切报纸和刊物),科技界,文艺界,卫生界,工商界的政治改造工作和思想改造工作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各省、市、自治区要有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自己的科学家和技术人才,自己的文学家、艺术家和文艺理论家,要有自己的出色的报纸和刊物的编辑和记者。第一书记(其他书记也是一样)要特别注意报纸和刊物,不要躲懒,每人至少要看五份报纸,五份刊物,以资比较,才好改进自己的报纸和刊物。

批判右派这件事,整个民主党派,知识界,工商界,震动极大。应当看到他们中的多数人(中间派)是倾向于接受社会主义道路和无产阶级领导的。这种倾向,各类人程度深浅不同。应当看到,现在他们对于真正接受社会主义道路和真正接受无产阶级领导这些基本点虽然还只是一种倾向,但是,只要有了这种倾向,他们就从资产阶级立场到工人阶级立场的长距离路程中开动了第一步。如果有一年整风时间(从今年五月到明年五月)就可以跨

进一大步。这些人在过去，并没有参加社会主义革命的精神准备。这个革命，对于他们，是突然发生的。共产党员中，也有一些人是这样。批判右派和整风，对于这些人，对于广大人群，将是一个深刻的社会主义教育。

大字报，除商店的门市部、农村（区乡）、小学、军队的营和连队以外，都可以用。在我国条件下，这是一个有利于无产阶级而不利于资产阶级的斗争形式。怕大字报，是没有根据的。在高等学校，在中央、省市、地、县的机关和城市的大企业，大字报、座谈会和辩论会，是揭露和克服矛盾、推动人们进步的三种很好的形式。

在整风中，任何时候都不应当耽误生产和工作。各地整风，不应当在所属一切单位同时并举，而应当分期分批地推行。

不要怕惊涛骇浪，硬着头皮顶住。就一个单位来讲，大约两三个星期，洪峰就过去了，就可以转到反击右派的新阶段。在两三个星期内，各单位的领导者对于右派的猖狂进攻，硬着头皮，只听不驳，聚精会神，分析研究，聚集力量，准备反攻，团结左派，争取中间派，孤立右派，这是一套很好的马克思主义的策略。

大鸣大放阶段（边整边改），反击右派阶段（边整边改），着重整改阶段（继续鸣放），每人研究文件、批评反省、提高自己阶段，这是中央、省市、地、县四级整风的四个必经阶段。还有城乡基层整风。这样整一次，全党和全国人民的面目必将焕然一新。

八月，请省市委、自治区党委一级和地委一级的第一

书记，抽出一段时间，摸一下农村中整社、生产、粮食等问题，以备九月中央全会之用。四十条农业纲要，请你们逐条研究一下是否需要修改。

根据《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刊印

# 关于我国民族政策的几个问题<sup>\*</sup>

(一九五七年八月四日)

周 恩 来

各位同志：

听说民族工作座谈会开得很好，大家交换了许多意见，也提出了许多问题，有些问题已得到了解决。我想讲一讲我国民族政策的几个原则性的问题，和大家交换意见。一、关于反对两种民族主义的问题，就是反对大民族主义主要是大汉族主义和反对地方民族主义的问题；二、关于民族区域自治的问题；三、关于民族繁荣和社会改革的问题；四、关于民族自治权利和民族化的问题。

## 一 关于反对两种民族主义的问题

我们反对两种民族主义，就是既反对大民族主义（在中国主要是反对大汉族主义），也反对地方民族主义，特别要注意反对大汉族主义。这两种民族主义都是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表现。一方面，如果在汉族中还有大汉族

<sup>\*</sup> 这是周恩来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族委员会召开的民族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主义的错误态度的话，发展下去就会产生民族歧视的错误；另一方面，如果在兄弟民族中存在地方民族主义的错误态度的话，发展下去就会产生民族分裂的倾向。总之，这两种错误态度、两种倾向，如果任其发展下去，不仅不利于我们民族间的团结，而且会造成我们各民族间的对立，甚至于分裂。这个问题怎样解决呢？我们认为，除了极少数人的问题以外，在民族问题上的这两种错误态度、两种倾向问题，是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应当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原则来解决，就是运用毛主席提出的公式，从民族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斗争，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我们各民族间进一步的团结。

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从民族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斗争，要在一个什么新的基础上，达到我们各民族间进一步的团结呢？我想对这个问题多讲一讲。

这个新的基础，就是我们各民族要建设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国家。建设这样的祖国，就是我们各族人民团结的共同基础。我们反对两种民族主义——大汉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的共同目的，就是建设社会主义的祖国大家庭，建设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个社会主义国家，不是哪一个民族所专有，而是我们五十多个民族所共有，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全体人民所共有。

全国解放后，经过八年来的努力，我们把全国各民族都团结在一起。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了各民族所共同遵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宪法规

定我们要把独立了的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国家，就是要把我们拥有五十多个民族、六亿人口的大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强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是代表六亿人民意志的大宪章，我们必须同心协力，努力奋斗，争取实现宪法的要求。我们各民族必须在为了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祖国这个新的基础上来达到新的团结。因此，我们就必须反对两种民族主义。大汉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都是妨碍我们在新的基础上加强民族间的团结的。

我们反对两种民族主义，必须从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祖国这个共同目标出发。如果没有这个共同目标，就反对不了这两种民族主义。比如说，站在人口最多的汉族方面批评兄弟民族中的地方民族主义倾向时，如果不想到这个共同目标，就很容易发生一些民族歧视的错误。因为兄弟民族多数是处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状态，汉族同志在批评时，就容易去指责这些客观存在的落后现象，这就变成民族歧视了。如果从为着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祖国的共同目标出发，就会想到那些落后状况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不是什么错误的倾向，而是经济、文化不发达的现象。应该去帮助各兄弟民族实现经济文化的发展，不能把这些客观现象当成兄弟民族中的地方民族主义倾向。就是有一些地方民族主义的倾向，也要研究它的来源，其中很多是有客观原因的，如果把这些客观原因改变了，这些倾向就会不存在了。比如说，处在边远地区的兄弟民族，他们对内地的情况不了解，对一些进步和发展的现象不认识，因而发生一些怀疑，不晓得汉族到底对



兄弟民族的态度怎样。尤其是因为历史上汉族的反动统治者压迫少数民族，剥削少数民族，少数民族免不了带着怀疑的眼光看汉族，这是很自然的。因此，不能把这些由于历史、社会、经济的原因而产生的一些怀疑和不信任，都说成是地方民族主义倾向。不应该简单地去批评某些地方民族主义倾向，而是应该诚恳地帮助兄弟民族了解产生这些倾向的根源，去掉他们的怀疑。当然，要去掉产生这些倾向的历史的、社会的、经济的根源，不是一天就能做到的。要在建设社会主义祖国的共同目标下，经过长期努力，发展全国各民族的经济、文化，这样才能从根本上去掉这种怀疑。这需要时间，需要工作，而不应该简单地不加分析地批评，只是简单的没有分析的批评，有时甚至会引起误会，造成错误。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站在少数民族方面批评汉族中的大汉族主义时，如果不从共同目标出发，也容易造成对立。因为历史上遗留下来的经济、文化方面事实上的不平等今天还存在，历史上反动统治压迫的后果也还存在。少数民族如果对汉族只注意这些历史痕迹，就很容易在少数民族中产生民族对立的倾向：我不信任你，你人口多，总是对我们不利，因为你是多数，经济、文化发展一些，总是会利用发展的优势继续过去的歧视和压迫。这样，怀疑的心理就增加了，甚至觉得和过去差不太多，这就容易助长民族分裂、不团结的倾向。因此，我们希望少数民族的同志也一定要在共同目标下批评汉族中的大汉族主义。就是说，要把我国各民族经济、文化事实上不平等的现状逐

步加以改变，为共同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祖国而努力，这就需要各民族互相团结，从团结的愿望出发来批评。汉族同志中如果确实有大汉族主义倾向和民族歧视的错误，就批评具体的人和具体的事，而不要简单地、不加分析地指责，不要对汉族的整体产生怀疑、不信任。不然就会助长民族分裂的倾向，不能达到民族间的团结。

我们的国家在历史上就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但在古代又是不完全统一的，甚至各民族彼此作战，不是你侵犯我，就是我侵犯你。民族间的互相侵犯，在我国的历史记载上是很多的。在各民族互相侵犯中，如果算总帐，汉族侵犯兄弟民族的次数多、时间长。虽然历史上汉族也被一些兄弟民族多次侵犯过，被统治的时间也不算短，如：北朝、辽、金、元、清。但从整个历史来看，还是汉族侵犯兄弟民族的时候多。站在兄弟民族的地位来想，总会想到历史上的这些痕迹。因为汉族在历史上经济、文化发展一些，就有条件向各方面发展，以致兄弟民族被挤到边远寒苦地区，生活就更困难，经济、文化也就更不容易发展。这种历史痕迹在兄弟民族中的印象是很深的。各个兄弟民族如果不想到建设社会主义祖国的共同目标，就很容易产生地方民族主义倾向，这对民族间的团结不利，对祖国的统一和发展不利。因此，各兄弟民族也必须想一想，尽管历史给我们遗留下这些痕迹，但这总是过去的事情了。这些事情在新中国诞生以前是存在着的。而在新中国诞生以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我们的宪法上，在国家的政策中，规定了民族平等。在平等友爱的民

族大家庭中建设社会主义的强大的祖国，这是大家的共同目的。为着这个目的，我们要把历史上的痕迹消除掉，要把各民族在经济、文化方面事实上的不平等状况逐步消除掉。当然这不是短时间所能做得到的，需要共同努力。

在现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若不强大起来，不建成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国家，就要受帝国主义的欺侮。当然，解放以来，我国人民已经站起来了，不受欺侮了，但是，这并不能保证我们永远不受欺侮，必须把社会主义祖国真正建设强大了才有保证。处于帝国主义现在还存在的世界上，虽然我们社会主义的事业发展了，但是帝国主义还不死心。它一有机会还要用各种办法来捣乱。这就要求我们提高警惕，更要着重强调我们各民族间的团结，以利于共同努力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祖国。不如此，我们这个多民族的国家站起来以后，还会栽跟头，还会是一个落后的、贫困的、受欺侮的国家。

应该认识清楚，如果不把我们的祖国建设成为一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国家，是不能摆脱贫困落后的状态的。要摆脱这种状态，只有我们五十多个民族，大家合作起来，共同发展，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国家。要建设这样的国家，不能单靠汉族。汉族人口多，经济、文化比较发展，但是可开垦的土地已经不多，地下资源也不如兄弟民族地区丰富。兄弟民族地区的资源开发是祖国工业化的有力后盾。但是，兄弟民族地区的资源还没有开发，劳动力少，技术不够，没有各民族特

别是汉族的帮助,也不可能单独发展。因此,各个民族必须互相帮助,互相支持,在共同发展的目标下建设社会主义祖国。这样,两种民族主义错误才会逐步减少,民族歧视的倾向和民族分裂的倾向也才会减少。举个例子,要把包头建设成为中国的一个工业基地,就必须把那里的铁和大同的煤结合起来。现在包钢已经开始建设了,将来会成为很大的工业中心。这就必须各个民族共同努力,首先是蒙古族和汉族共同努力。在这个共同目的之下,在积极的建设当中,即使有大汉族主义倾向,或者地方民族主义倾向,也可以逐步地减少。有了共同的、积极的发展目标,就可以克服那些消极的、不满的对立情绪。当然,我不是说有了积极的目标,就不要注意克服消极的因素了,那还是需要克服的。我是说,有了积极的目标,消极的因素才会被积极的因素所代替。同样也可以设想,要在新疆建立起包括克拉玛依油田和乌鲁木齐地区的将来的工业中心,如果没有新疆各民族和内地汉族的共同努力,就搞不成功。首先铁路就修不成。铁路通了,劳动力不够,资金不够,也没有办法来开发。这就必须用全国的力量去支援。我只举这两个例子,就可以看得出其他了。为着一个伟大的共同发展的目的,我们就必须把由于各民族之间的偏见所产生的偏向,逐步地减少下去。

我们想到将来强大的祖国,就必须在今天强调各民族的团结,为建设社会主义共同努力。为了实现这个共同的目的,对妨碍我们团结的、妨碍我们共同努力的两种民族主义错误,都应当批判。我们要从团结的愿望出发

进行批判，以消除或减少民族歧视的错误和民族分裂的倾向。应该把这个问题提到新的认识上来，不要忌讳这种批判，而是要从正面指出这个问题。两种错误的倾向都是对我们社会主义建设不利的。为了祖国的伟大的建设，我们就应当自觉地克服大汉族主义错误和地方民族主义错误。

## 二 关于民族区域自治的问题

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是我们解放以后在民族问题上的一个根本性的政策。这是我国宪法上规定了的。我国为什么要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而没有实行民族自治共和国那样的制度呢？自治的形式在我国叫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还有民族乡，在苏联叫自治共和国、自治省、民族州。这不单是名称的不同，制度本身也有一些不同，也就是实质上有一些不同。不同的地方，不是在自治不自治的问题上。苏联的自治共和国是给民族以自治权利，我们的民族区域自治也是给民族以自治权利。不同的地方，在于苏联的区域划分与我国有很大的不同，苏联的自治共和国的权利、权限的规定也与我国有些不同。这些不同，是从两国的历史发展的不同而来的，部分地也是由于中国和当年十月革命时代的形势不同而来的。

俄罗斯在十九世纪已经发展成为资本主义国家，虽然还有很大的封建性。一方面，它比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落后，另一方面，它已经成为帝国主义国家，拥有殖民地。

那个时候，在俄罗斯周围的一些民族，都是被沙皇这个俄罗斯政权统治着。这是一种殖民统治。而且，当时俄国的各民族多数都是一个一个地各自聚居在一块。

中国的历史同当时俄国的情况却完全不同。中国的民族发展在地区上是互相交叉的，内地更是如此。汉族曾经长时期统治中原，向兄弟民族地区扩张；可是，也有不少兄弟民族进入过内地，统治过中原。这样就形成各民族杂居的现象，而一个民族完全聚居在一个地方的比较少，甚至极少。我们常说，新疆是少数民族比较集中的一个地方，但是新疆也不是一个民族，而是十三个民族。西藏比较单一一些，但这指的是现在的西藏自治区筹委会管辖地区，而在其他地区，藏族也是和其他民族杂居的。我国历史的发展，使我们的民族大家庭形成许多民族杂居的状态。由于我国各民族交叉的时代很多，互相影响就很多，甚至于互相同化也很多。汉族所以人数这样多，就是因为它吸收了别的民族。再如满族，从长白山发源，进入中原的时候，只有几十万人，到清朝最盛时，差不多有四五百万人。清朝亡了以后，满族还是存在的。满族采纳了汉族的文化，首先是文字，以后又逐渐采用了汉族的语言，把自己的语言文字丢了，好像跟汉族没有区别了，实际上还是两个民族。在清朝时候，对汉、满通婚也不是绝对限制的。到辛亥革命以后，通婚的更多了，民族间的界限也就不是不可逾越的鸿沟了。解放以后，承认了满族。在普选进行人口调查时，填表承认是满族的有二百四十万。看来比过去少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因

为有些人和汉族通婚，又算汉族，又算满族，填表就不填满族了。其实，那就看怎样填法了。这是一种同化的现象。如果同化是一个民族用暴力摧残另一个民族，那是反动的。如果同化是各民族自然融合起来走向繁荣，那是进步的。这种同化本身就有推动进步的意义。现在满族和汉族，语言文字相同，就更容易合作。满族同胞是不是主张恢复满族话呢？我看不会的，因为三四百万人从头学满族话，那不太麻烦吗？有些满族话，汉族吸收了没有？我看是有的。有许多满族语汇转为汉语，丰富了汉语。穿衣服也是这样，汉族的妇女在辛亥革命以后穿起旗袍，这还不是满族的服装？汉族吸收满族的文化很多，这也可以说是带点同化的性质。

还可以谈一谈回族的情况。回族是从阿拉伯、小亚细亚来的，并且时代并不太远，据说到现在不过一千多年，可是人口发展到三百五十多万。回族来中国有两条路，一条是从海上来的，一条是从阿富汗来的，要经过南疆，这样就不可能来很多人。但是，现在回族散布到全国，没有一个省没有回族，几乎没有一个县没有，可靠的是三分之二以上的县都有。回族所以这样多，就是因为他能把别的民族成分吸收进去，吸收了就壮大了，这有什么不好？这不也是同化吗？回族聚居的地区在甘肃省的有吴忠、陇东、银川、陇西等地，其他地方也有聚居的。这次成立回族自治区，包括了吴忠、银川和固原等地，但大多数回民还是分布在全国。

汉族同化别的民族，别的民族也同化汉族，回族是这

样，满族是这样，其他民族也是这样。这种情况，越向内地越多。历史的发展使中国各民族多数是杂居的，互相同化，互相影响。中国民族多，而又互相杂居，这样的民族分布情况，就不可能设想采取如同苏联那样的民族共和国办法。因为要构成一个民族共和国，需要构成一个独立的经济单位，绝大多数的民族人口要聚居。

历史的发展使我们的民族大家庭需要采取与苏联不同的另一种形式。每个国家都有它自己的历史发展情况，不能照抄别人的。采取民族区域自治的办法对于我们是完全适宜的。实行民族区域自治，不仅可以在这个地方有这个民族的自治区，在另一个地方还可以有这个民族的自治州、自治县、民族乡。例如内蒙古自治区虽然地区很大，那里的蒙古族只占它本民族人口的三分之二左右，即一百四十万人中的一百多万人，另外占三分之一弱的几十万蒙古族人就分在各地，比如在东北、青海、新疆还有蒙古族的自治州或自治县。即将建立的宁夏回族自治区，那里的回族人口只有五十七万，占自治区一百七十二万人口的三分之一，只是全国回族三百五十多万的零头，就全国来说也是少数。还有三百万分散在全国各地，怎么办呢？当然还是在各地方设自治州、自治县和民族乡。藏族也是这样。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所管辖的地区，藏族只有一百多万，可是在青海、甘肃、四川、云南的藏族自治州、自治县还有一百多万藏族人口，这些地方和所在省的经济关系更密切，便于合作。在成立壮族自治区的问题上，我们也正是用同样的理由说服了汉族的。到底是



成立桂西壮族自治区有利，还是成立广西壮族自治区有利？单一的壮族自治区是不可能有的。因为即使把广西壮族聚居的地方，再加上云南、贵州的壮族地区，划在一起，作为一个壮族自治区，它内部还有一百多万汉族人，而且其中的两个瑶族自治县也有四十多万人，汉族、瑶族合起来有一两百万，所以也不可能是纯粹单一的民族自治区。如果这样划分，壮族自治区就很孤立了，不利于发展经济。在交通上，铁路要和广西汉族地区分割；经济上，把东边的农业和西边的工矿业分开。这是很不利于共同发展的，而合起来就很便利了。所以广西壮族自治区也是一个民族合作的自治区。

从以上几个大的自治区来看，我们就得出一个结论：在中国适宜于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而不宜于建立也无法建立民族共和国。历史发展没有给我们造成这样的条件，我们就不能采取这样的办法。历史发展给我们造成了另一种条件，就是中国各民族杂居的条件，这种条件适宜于民族合作，适宜于实行民族区域自治。一个民族不仅可以在一个地区实行自治，成立自治区，而且可以分别在很多地方实行自治，成立自治州、自治县和民族乡。回族是最典型的例子。这没有什么不好，而是很好。我们根据我国实际情况，实事求是地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这种民族区域自治，是民族自治与区域自治的正确结合，是经济因素与政治因素的正确结合，不仅使聚居的民族能够享受到自治权利，而且使杂居的民族也能够享受到自治权利。从人口多的民族到人口少的民族，从大聚居的民族到小

聚居的民族，几乎都成了相当的自治单位，充分享受了民族自治权利。这样的制度是史无前例的创举。

十月革命时，俄国无产阶级是首先在城市中起义取得了政权，然后才普及到农村和少数民族地区。俄国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这时候打这个擂台是不容易的。同时，它又是在一个帝国主义的国家里进行革命的，所以必须摧毁旧有的殖民地关系。为了把各民族反对沙皇帝国主义压迫的斗争同无产阶级、农民反对资产阶级、地主的斗争联合起来，列宁当时强调民族自决权这个口号，并且承认各民族有分立的权利，你愿意成为独立的共和国也可以，你愿意参加到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来也可以。当时要使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政治上站住脚，就必须强调民族自决权这个口号，允许民族分立。这样才能把过去那种帝国主义政治关系摆脱，而使无产阶级专政的新社会主义国家站住脚。当时的具体情况要求俄国无产阶级这样做。

中国是处在另一种历史情况之下。旧中国虽然有北洋军阀和后来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压迫劳动人民，压迫兄弟民族，但是整个中国则是被帝国主义侵略的国家，成为半殖民地，部分地区则成为殖民地。我们是从这种情况下解放出来的。革命的发展情况也和苏联不同。我们不是首先在大城市起义或者在工业发达的地方起义取得政权，而是主要在农村中建立革命根据地，进行长期奋斗，经过二十二年的革命战争才得到了解放。因此，我国各民族的密切联系，在革命战争中就建立了起来。例如，

在内蒙古也有革命根据地，在新疆也有过反对国民党的革命运动，在我党领导的西南游击区也有各兄弟民族参加，内地许多兄弟民族都参加了解放军，红军长征经过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时，留下了革命的影响，并且在少数民族中吸收了干部。总之，我们整个中华民族对外曾是长期受帝国主义压迫的民族，内部是各民族在革命战争中同甘苦结成了战斗友谊，使我们这个民族大家庭得到了解放。我们这种内部、外部的关系，使我们不需要采取十月革命时俄国所强调的实行民族自决、允许民族分立的政策。

历史发展给了我们民族合作的条件，革命运动的发展也给了我们合作的基础。因此，解放后我们采取的是适合我国情况的有利于民族合作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我们不去强调民族分立。现在若要强调民族可以分立，帝国主义就正好来利用。即使它不会成功，也会增加各民族合作中的麻烦。例如新疆，在解放前，有些反动分子进行东土耳其斯坦之类的分裂活动，就是被帝国主义利用了的。有鉴于此，在成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时，我们没有赞成采用维吾尔斯坦这个名称。新疆不仅有维吾尔一个民族，还有其他十二个民族，也不能把十三个民族搞成十三个斯坦。党和政府最后确定成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新疆的同志也同意。称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帽子”还是戴的维吾尔民族，因为维吾尔族在新疆是主体民族，占百分之七十以上，其他民族也共同戴这个帽子。至于“新疆”二字，意思是新的土地，没有侵略的意思，跟“绥远”二字的意思不同。西藏、内蒙的名称是双关的，又是

地名，又是族名。名称问题好像是次要的，但在中国民族区域自治问题上却是很重要的，这里有一个民族合作的意思在里面。要讲清楚这个问题。

以上这些都说明，我们是根据中国民族历史的发展、经济的发展和革命的发展，采取了最适当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而不采取民族共和国的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单一体的多民族的国家，而不是联邦国家，也无法采取联邦制度。我们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从我国的实际出发，分别情况，成立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或者民族乡，使所有少数民族不论聚居或者杂居都能实行真正的自治。这就有利于少数民族普遍行使自治权利，也有利于民族之间的合作互助。我国各民族的发展是不平衡的，这也是从历史上来的，经济基础是这样，上层建筑也是这样。要想趋向平衡，就要各民族合作互助，不能孤立地讲发展。以新疆来说，那里有石油资源，有各种有色金属资源，有可以开垦的农田，适宜种植棉花，但这只是好的条件，不要忘记那里还有困难。新疆水利不够，要大大地改善水利系统，才能够开发。交通也很困难，不仅要修通从兰州到新疆的铁路，而且要修通北疆到南疆的铁路，才能开发。要开矿、垦田，可以用机械，但最根本的有两个问题：一是要有资金，一是要有人力。即使有了机械，也还要有人力、财力才能得到发展。仅仅依靠新疆一个自治区的五百万人口，不可能积累多少资金，而且人力也不够。必须要靠全国的力量，国家的力量，中央的力量，把我们计划经济中能够积累的资金拿出一部分投资到新疆

增加财力，从内地动员一部分人力到新疆增加劳动力，这样才能使新疆大发展。这就必须民族合作。不能设想，新疆孤立地只靠现有的人力、物力，就可以解决问题。

在中国这个民族大家庭中，我们采取民族区域自治政策，是为了经过民族合作、民族互助，求得共同的发展、共同的繁荣。中国的民族宜合不宜分。我们应当强调民族合作，民族互助；反对民族分裂，民族“单干”。我们民族大家庭采取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有利于我们普遍地实行民族的自治，有利于我们发展民族合作、民族互助。我们不要想民族分立，更不应该想民族“单干”。这样，我们才能够真正在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的基础上，建立起我们宪法上所要求的各民族真正平等友爱的大家庭。

### 三 关于民族繁荣和社会改革的问题

我们这个多民族的大家庭要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在民族繁荣的基础上前进。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能够有民族繁荣，所以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优越，比封建主义更优越。历史证明，过去许多兄弟民族不是走向繁荣，而是走向衰亡。为什么？就是因为过去的反动统治者采取歧视兄弟民族，以至削弱和消灭兄弟民族的政策。两千年来历史上有记载的兄弟民族，有些现在不见了，其中有的可能向远方迁移了，有的可能和汉族或者和其他民族融合起来了。这些变化的情况，还有待历史学家的研究。

上面讲过，满族从几十万人变成了几百万人，吸收了汉族的文化。满族建立的清朝政权，统治了中国近三百年。清朝以前，不管是明、宋、唐、汉各朝，都没有清朝那样统一。清朝起了统一的作用。另一件事就是繁荣了人口。中国人口的增长，在清朝是相当大的。这是它有功的一面。但是，它不是繁荣所有民族的人口。例如在清朝统治下，汉族人口增长了。可是对某些兄弟民族，它的政策则是削弱。如蒙古和藏这两个民族，在清朝的时候人口是减少了的。蒙古民族在最盛的时候据说有四五百万人口，但是到了清朝就减少了。藏民族在唐朝时是很强大的，有很大的发展，曾到过陕西的关中北部、长安附近，到过甘肃的南部，还到过四川、云南，人口据说有四五百万。现在藏族人口合起来不到三百万。这两个民族，显然是在清代削弱了。这说明，封建主义的民族政策是要削弱别的民族的。

帝国主义更是如此。帝国主义统治殖民地，总是把当地的民族搞得很穷困，穷困以后就要衰弱了。大家知道，帝国主义是从西方来的，起初主要是英国和法国，以后是美国。这些帝国主义国家，对任何殖民地的原有民族，都是采取削弱的政策。例如西班牙、葡萄牙、英国到美洲殖民，把原来占当地人口多数的印地安人削弱成了少数。又如英国人、法国人、比利时人到非洲殖民，也是这样做的，他们力图削弱非洲的黑人民族。只有不甘心于做殖民地奴隶、奋起反抗取得胜利的民族才慢慢好了，如埃及、摩洛哥、突尼斯、阿尔及利亚等等。所以，从世界

史上可以看出来，不管是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帝国主义，都是削弱被压迫民族的。反动统治者不仅压迫本民族的劳动阶级，也削弱它统治的其他民族。东方各民族的经济文化比西方落后，曾长期处于被压迫被削弱的地位。只有争得民族独立，他们才能免于被削弱。在民族政策上，我们社会主义国家跟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根本不同。我们要帮助各兄弟民族的繁荣，必要的时候对社会主义国家以外的民族也给予帮助。我们对各民族既要平等，又要使大家繁荣。各民族繁荣是我们社会主义在民族政策上的根本立场。绝不能说这个民族是优越的，那个民族是劣等的，这种想法是完全错误的种族主义的想法。德国法西斯认为日尔曼民族是最优秀的民族，说德国日尔曼血统是最好的血统，这是极端反动的思想。我们认为，所有的民族都是优秀的、勤劳的、有智慧的，只要给他们发展的机会；所有的民族都是勇敢的、有力量的，只要给他们锻炼的机会。世界上所以有些民族比较落后，这是环境造成的，是因为没有给他们发展和锻炼的机会。我们社会主义的民族政策，就是要使所有的民族得到发展，得到繁荣。所以，我们国家的民族政策，是繁荣各民族的政策。在这个问题上，各民族是完全平等的，不能有任何歧视。我们的根本政策是要达到各民族的繁荣。以往的历史发展使有的民族削弱了，人口减少了，有的很落后，生活水平很低，这是反动统治遗留下来的后果。我在前面讲了清朝对西藏的政策，如果讲到北洋政府和国民党时代，那就更反动了。尽管孙中山先生提倡五族共

租，到了蒋介石，首先就不承认回族，把他们叫做生活习惯特殊的人。国民党连民族都不承认，更谈不到帮助各民族发展了。这种对待各民族的反动统治、反动政策，我们历来是反对的。

历史遗留给我们的，是对民族繁荣的很多不利的条件。我们必须把这些不利的条件逐步地去掉。要去掉这些不利于民族繁荣的条件，关键在哪里？关键在于社会改革。各个少数民族过去由于处在反动统治下面，被反动统治者所压迫，经济得不到发展，人口得不到增长，生活得不到改善，使这些兄弟民族不能够发展。我们新中国就是要帮助各民族发展，这就必须实行一个根本性的措施，就是进行社会改革。社会改革是我们中国各民族的共同性的问题。汉族也要经过改革才能够发展。我们所说的社会改革，最根本的是经济改革。为什么要改革？因为要建设社会主义，要人民生活富裕起来。要富裕就要有工业，一个民族没有工业不可能富裕起来。因此，我们中国要工业化，没有工业化，就不可能使生产发展。而要工业化，就得首先在农业上实行改革，把农业上的封建制度、奴隶制度废除。农民得到了解放，才能够使农业经济得到发展，才能有工业发展的基础。农业能够大量增产，才可能积累资金，才可能供给工业原料，才可能解放劳动力参加工业生产。只有建立起工业基地来，这个民族才有发展的基础。所以每个民族都不可避免地要经过经济改革。现在，各兄弟民族地区绝大多数实行了土地改革，有不少兄弟民族进一步实现了农业上的社会主义



改造,组织了农业合作社,这就一定会使农民的生产力得到解放,能够在合作社的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基础上大大增产,这样才能够促进工业的发展。可是还有不少兄弟民族,经济改革或者还没有开始,或者还没有完成。经济改革分两步,第一步是民主改革,即土地改革,第二步是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如果不进行经济改革,维持奴隶制度、封建制度,多数的人民还是奴隶、农奴和封建制农民,生产力就不能够解放。生产的东西大部分被剥削去了,劳动者本身还是穷困的,他们就不可能有增产的积极性。在我们新中国这个社会里,许多地方不但封建制度不存在了,连个体经济制度都不存在了,进到社会主义集体经济了,有些少数民族地区还孤立地处在奴隶制度、封建制度的统治之下,这怎么可能存在下去呢!它是一定要受到外界的影响的。例如,凉山彝族地区的改革,就是受了外界的影响。奴隶娃子起来了,他们要求改革。现在凉山彝族的一些头人也同意改革,愿意放弃剥削。改革以后,他们还可以得到政府很好的待遇,生活得到保障。如果他们不赞成改革,就要被奴隶娃子推翻,什么也得不到。周围环境的影响是很大的。西昌坝子实行了土地改革,就不能不影响凉山。大家都是在一个民族大家庭里,土地改革也好,社会主义改造也好,浪潮起来了,都会互相影响。不可能设想,某一个地方能够长期地永远地孤立在一个地方“单干”。我们要对现在还处在剥削者地位的兄弟民族上层分子说清楚这个问题:如果他放弃剥削,他所得到的好处,比反对这个改革所得到的要多得多;如

果他抗拒改革,被群众起来推翻了,他就得不到好处,或者得到的少了。如果他赞成改革,国家和政府会照顾他,群众可以对他宽大些。这是一点。另一点,如果从长远来看,他继续长期剥削,在我们这个社会主义国家,孤独地搞下去,终归要失败,而且剥削越维持得久,他将来失掉的越多。谁要幻想在中国这个社会里长期地保留他的剥削,甚至于过那种极度豪华的生活,那是绝对办不到的。全中国都不那么豪华,少数人要那样豪华是不能允许的。我们主张,各个兄弟民族的人民,包括他们的上层分子,觉悟到需要改革的时候,再去改革。某些地方推迟改革,是为了将来更好地改革,更和平地改革,更有准备地改革,但总是要改革。一定要把奴隶制度、封建制度和个体经济制度改革成为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所以改革只是一个先后问题,缓急问题,而不是改革不改革的问题。不改革,民族就要贫穷。我们中国这个民族大家庭是要大家幸福,包括兄弟民族上层分子也要得到真正的幸福。改革就是使大家都幸福,不是少数人幸福。当然我们也要承认,改革后的一个时候,上层分子不能像过去那样生活便当,用钱也不那样方便了,因为收入是有一定数额的了。但是,前途是有保障了。将来工业更发展了,他们的生活水平也会更提高。这一点,我们要对所有兄弟民族的上层分子也讲清楚。

前面已经讲过,建设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国家,是任何民族都不能例外的。我们不能设想,只有汉族地区工业高度发展,让西藏长期落后下去,让维吾尔自治区长期落

后下去，让内蒙牧区长期落后下去，这样就不是社会主义国家了。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是要所有的兄弟民族地区、区域自治的地区都现代化。全中国的现代化一定要全面地发展起来。我们有这样一个气概，这是我们这个民族大家庭真正平等友爱的气概。我们不能使落后的地方永远落后下去，如果让落后的地方永远落后下去，这就是不平等，就是错误。

这种改革，不仅是经济制度的改革，也会影响到别的方面。因为经济基础变动了，上层建筑也要受影响，就是说，政治上、思想上也要受影响。政治上的制度要适合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也要改革，要改革成为民主集中制。又有民主，又有集中；又有自由，又有纪律；又有个性的发展，又有统一意志。思想也要适合这个社会主义制度的要求，大家要学习马克思主义，要爱护社会主义制度。

有的宗教界朋友担心，既然经济基础的改革会影响到思想方面，那么，是否也会影响到宗教呢？经济基础的改革对思想方面有影响是必然的。但是，思想方面的变化，不会像政治制度的改革那样发展。思想变化的过程是最慢的。信仰宗教的人，不仅现在社会主义的国家里有，就是将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是不是就完全没有了？现在还不能说得那么死。现在我们只把宗教信仰肯定为人民的思想信仰问题，而不涉及政治问题。不管是无神论者，还是有神论者，不管是唯物论者，还是唯心论者，大家一样地能够拥护社会主义制度。我们共产党内有很多农民党员，他们拥护社会主义制度，参加合作社，干得很

积极。他们的经济是社会主义的集体经济，在组织上是按合作社的章程办事，并且许多人是乡政权的干部。他们在政治上、思想上都适合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要求，但是，一到了晚上，有的就怕鬼。你说所有的共产党员都不怕鬼，我就不相信。人的思想有各种各样，只要他不妨碍政治生活，不妨碍经济生产，我们就不要干涉。宗教是会长期存在的，至于将来发展如何，要看将来的情况。但是，只要人们还有一些不能从思想上解释和解决的问题，就难以避免会有宗教信仰现象。有的信仰具有宗教形式。有的信仰没有宗教形式。宗教界的朋友们不必担心宗教能不能存在。按照唯物论的观点，当社会还没有发展到使宗教赖以存在的条件完全消失的时候，宗教是会存在的。现在应该担心的不是宗教能不能存在，而是民族能不能繁荣。

民族繁荣是我们各民族的事业，对此不能有任何轻视。只有改革才能使民族繁荣。经济改革是各民族必须走的路。走这条路才能工业化、现代化。工业化、现代化了，经济生活才能富裕，民族才能繁荣，各族人民才能幸福。这里要顺便说一下，就是有些兄弟民族还需要增加人口，但汉族人口增加得太快了，所以汉族地方要提倡节制生育。

#### 四 关于民族自治权利 和民族化的问题

肯定地说，民族自治权利必须受到尊重。凡是宪法上规定的民族自治权利，以及根据宪法制定的有关民族自治权利的各种法规、法令，统统应该受到尊重。在这方面，从中央政府一直到地方政府，有的时候是注意不够的。我们应该多检查，多批评。同时，在这方面，因为汉族人数多，容易忽视少数民族的自治权利，大汉族主义的缺点也是比较容易发生的。忽视民族自治权利的倾向，多半是从大汉族主义来的，应该批判。

另一个问题，就是民族化问题。既然承认各民族的存在，而我们又是多民族的国家，民族化问题就必须重视。因为经过民族化，民族自治权利才会被尊重。例如，民族的语言文字，就要尊重它。没有文字的，要按照本民族的意愿帮助他们创造文字。在民族自治地方，主要民族的文字应该成为第一种文字。既然是民族自治，就要培养民族干部。既然承认民族，各民族的风俗习惯就要受到尊重。这些就是民族化。如果不重视这些民族化的问题，就不符合我们建立社会主义民族大家庭使各民族共同繁荣的政策。

对以上两个问题，国家、行政机关、汉族应当负更多的责任，因为最容易忽视。关于干部方面的民族化，就是民族干部应当有一定的比例。在汉族人多的地方，容易

忽略少数民族干部的一定比例。即使少数民族人口少，也必须照顾这一点。所以民族自治权利问题、民族化问题，政府机关要多注意。

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的行政机构，是不是一定要跟省、专区、县一样？这个问题还值得研究。过去太求同了，不那么妥当。各省之间都不应当完全一样，自治区与省，自治州与专区，自治县与县，就更不应当一样，应当因地制宜。

在每个民族自治地方，民族干部应该做负责工作。当然不是所有的负责人都不能由汉族干部担任，但是民族干部总要负更多的责任。因此，就应当有步骤地有计划地培养民族干部，要派好的干部到中央、省来学习，也要多把好的干部派回去，这才有利。这一方面，以后中央和省应当多注意些。另一方面，也应当派汉族干部去帮助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的工作。有些地方汉族多，更不能不要汉族干部。像内蒙，汉族那样多，在人民代表大会、政府机关、企业机构，当然要有汉族干部。广西也是这样。将来宁夏回族自治区也是这样。就是少数民族占多数的地方，像新疆、西藏，也不可能没有汉族干部。在那些兄弟民族占多数的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派汉族干部应当少而精，就是要派好的、得力的干部，不能多而滥。领导干部很关重要，不论是党的还是政府的，都要照顾两方面，要力求合作。如果干部问题解决不好，一切政策就都没有人实施。如果干部闹对立、包办、单干、歧视、分裂，则一切都搞不好。

我们的宗教信仰是自由的。在中国存在有宗教信仰的人和没有宗教信仰的人，就是有神论者和无神论者。这两类人应该彼此相处得很好。我们从来不像有些国家那样在宗教问题上争执得那么厉害，甚至被帝国主义者挑拨引起战争。信仰各种宗教的人，本来是可以合作的。我国信佛教的最多，第二是信伊斯兰教的，第三是信天主教的，第四是信基督教的。我国信仰各种宗教的人，向来就是合作的。不信仰宗教的人应当尊重信仰宗教的人，信仰宗教的人也应当尊重不信仰宗教的人。不信仰宗教的人和信仰宗教的人都可以合作。信仰不同宗教的人也可以合作。这对我们民族大家庭的团结互助合作是有利的。

民族的风俗习惯比宗教信仰还要广泛，因为一个民族不一定都信仰一种宗教。有很多民族是信仰多种宗教的，也有几个民族是信仰同一种宗教的，如回族和新疆几个民族是信仰同一种宗教的，蒙古族和藏族也是信仰同一种宗教的，但风俗习惯常常是一个民族一种，因此，风俗习惯也同样应该受到尊重。如果不尊重，就很容易刺激感情。比如我们对回族和新疆的各个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不吃猪肉的风俗习惯就要尊重。另一方面，对于反映在文化方面的风俗习惯，不要随便加以修改。现在有些文工团到兄弟民族地区学习音乐舞蹈，特别是舞蹈，常常拿汉族的想法来修改，兄弟民族对此很不高兴。这是强加于人，不尊重人家的风俗习惯。有些汉族人总觉得他自己的都是好的，人家的是落后的，这是资产阶级民族

主义思想。人家的风俗习惯是建立在自己的生活条件的基础上的。风俗习惯的改革，要依靠民族经济基础本身的发展，不要乱改。

以上我一共讲了四个问题。这些问题还要继续研究，今天我只是把原则性的问题讲一讲，供大家参考。

根据《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刊印



**中共中央同意中央组织部、  
宣传部《关于为抽调干部加强  
大、中学校及科学研究机关的  
领导向中央的报告》**

(一九五七年八月五日)

各省市委、自治区党委，中央国家机关各党组，党中央各部门：

中央同意中央组织部、宣传部《关于为抽调干部加强大、中学校及科学研究机关的领导向中央的报告》，请你们依照实行，下决心抽调一批合格的优秀的同志到文教战线上去工作。

中 央

一九五七年八月五日

# 中央组织部、宣传部《关于 为抽调干部加强大、中学校及科学 研究机关的领导向中央的报告》

(一九五七年八月一日)

中央：

为着执行中央关于从中央机关抽调干部加强大、中学校及若干科学、文教单位工作的指示，我们在六、七月内听取了北京、上海、江苏、广东、陕西、湖北、四川、甘肃、内蒙古等十六个省市有关高等学校现有领导干部情况的口头汇报。同时另有浙江、江西等八省送来书面报告。以上二十四个省市共有高等学校二一四所（占全国总数二二七所的百分之九十四以上），现有正副校、院长六〇五人，其中党员四四一人，民主党派一〇二人，无党派六十二人。每校（院）平均虽有正副校（院）长将近三人，但仍有四十三所学校没有正校（院）长。现有专职党委正、副书记一七九人，平均每校不到一人；党委书记多系兼职，目前尚有一六一校缺专职党委书记。

经过各省、市委这次初步摸底排队的结果，除北京外，在二十三个省、市一八五所学校中，由于不宜在高等学校工作，需调出的计有正副校、院长六十六人（占现有正副校、院长总数五〇四人的百分之十三），党委正副书记四十八人（占现有正副书记总数一四七人的百分之三十二·六）。调出原因有的是由于作风不好不宜在学校

工作(二十七人),有的体弱多病不能坚持工作(十五人),有的文化水平太低或工作能力太低不能胜任工作(五十四人),也有少数长期不安心工作或其他原因需要调出的(十九人)。少数学校的领导干部需作很大调动,个别学校则需逐步地全部加以调换。

在汇报中反映高等学校的中层政治工作干部也很弱,普遍的是文化程度很低,不能适应工作需要。马列主义课程师资,则多系青年助教,只有少数讲师,有极少数教授也是解放前的政治、文史教员,政治思想复杂。解放后我们派去的政治课教员中有的文化知识太少,极不称职,讲话中笑话百出。如南京大学马列主义教研室副主任,原系警卫员出身,在讲话中将“可歌可泣”说成“可歌可拉”,“莎士比亚”说成“莎士比亚”等等。这虽然是少数的情况,但一般的说水平都是不高的。

上述二十四个省、市这次提出的要求是需要补充正副校长、院长二〇〇人,正副党委书记一三八人,校、院长助理八人;需要配备中层政治工作干部(包括学校党委部长、总支书记、人事处长等)五四五人;政治课师资五三五人(其中包括教研室主任九十一人);教务长、总务长及其它行政干部一三七人。以上合计,二十四个省、市的高等学校即需配备一千五百余人。此外,有些省、市委这次也要求配备所在地区的科学研究机关、卫生机关和省、市文教部门的干部,共需一百六十余人。两者合计约需一千七百人。全国还有七百多所中等专业技术学校及将近六千九百所中学,对这些学校的情况这次未作专门了解,但据

我们所知也急需加强干部配备。

在抽调干部方面我们也进行了若干工作。中央原决定从中央党政系统中抽出一、〇〇〇名条件适合的干部分配到高等学校和其他一些文教单位去工作，经我们同各有关单位研究，一致认为应当十分强调干部的质量问题，因此，在一千名干部中估计只能包括司局长以上的干部五分之一即二百人左右，其余八百人左右则为中层领导骨干。所有抽调的干部都必须具备政治上强、思想水平高、作风好、有领导能力、善于团结知识分子等条件，一般的都要具有高中以上的文化水平，身体健康能坚持工作的。只有派出这样优秀而得力的干部，才能真正加强党对文教工作的领导。但从数量上说，这个数目还远不能满足各地提出的需要。因此，如何使用这一千名干部，我们有以下意见：

(一)在中央抽调的一、〇〇〇名干部中，确定应有司局长以上(包括部长)干部二〇〇名，这二百名干部以一五〇名左右派往高等学校担任党政领导工作(正副校、院长，正副党委书记)；以五十名左右分配到科学研究机构和其他急需的文教单位担任行政领导工作。另外八百名左右的中层干部，以三〇〇名左右派到高等学校做政治工作或教学工作；其余五百名左右主要派到重要城市的大型中学担任领导工作(校长、副校长或少数教导主任)；少数派到大医院或其它重要的文教基层单位去担任领导工作。

(二)使用的方向在于加强各单位的领导骨干，因此，

这次抽调干部时必须作认真的挑选，保证质量。派出后如发现不适合条件者，应由抽调部门负责调换。

(三)根据各地需要的急缓情况，我们计划采取分批选派重点配备的办法。即挑选一批，抽调一批，就配备一批；配备重点是首先照顾到国防、工业、师范院、校和综合大学的迫切需要。这项工作拟于年底以前全部完成。

(四)这一千名干部既然不能满足各地要求，因此，除中央抽调者外，建议中央责成各省、市委、自治区党委应就所属地区大、中学校及其它重要文教单位所需干部情况，作出通盘计划，下决心自行解决。中等技术学校所需干部，则由国务院各业务部门负责配备。在配备大、中学校的行政领导干部时，应当注意配备一定数量(一般的可占一半左右)的真正拥护社会主义、有学识、有经验、孚众望、作风正派而又有领导能力的非党人士(或新入党的高级知识分子)担任校、院长，这样更便于团结党外人士，并有利于改善教学工作。

(五)估计从中央各机关抽调干部到学校和其它文教单位工作，可能在干部思想中遇到一些抵触情绪，因此应由各部、委党组帮助我们做好动员说服和挑选工作。要使干部了解目前如果不加强学校和文教单位的党的领导，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就不能在思想领域方面取得决定性的胜利。

(六)各地均有一些干部不宜继续留在学校工作，这些干部应由省、市委加以慎重处理。凡是确实不宜继续留校工作的，应当坚决调离学校；凡是本人具备了基本条

件,只是由于某些缺点或错误而引起群众某些不满的,应帮助他们检讨和改正,不宜轻易调动。不能留在原校的,也可考虑调换一个学校。所有调离学校的干部,一律由各省市市委加以妥善安置。此次由中央分配到各地工作的干部,其爱人多系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这些人的工作一律请各省市市委负责解决。

此外,关于马列主义政治课师资问题,此次还不能得到解决,应作为专门问题进一步加以研究。

以上意见,如中央同意,请批转中央国家机关各党组及各省、市、自治区党委遵照办理。

中央组织部

中央宣传部

一九五七年八月一日

根据中共中央文件刊印

# 中共中央关于向全体农村人口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的指示

(一九五七年八月八日)

在目前农村中，有必要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教育的中心题目是：第一，合作社优越性问题；第二，粮食和其他农产品统购统销问题；第三，工农关系问题；第四，肃反和遵守法制问题，等等。教育的方式是：利用生产间隙和休息时间，在全体农村人口中就这些中心题目举行大辩论，提问题，提意见，摆事实，讲道理，回忆、对比解放前后和合作化前后农民生活的变化。为着辩论的方便和通俗化起见，各合作社还都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分别提出一些具体的对比问题。秋收以前的辩论，要着重统购统销问题，适当地结合当时当地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对于这些问题的辩论，实质上是关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辩论。这种辩论在不少乡村已经开始进行。辩论的结果是：帮助了广大农民群众和乡社干部进一步地弄清国家和农村中的大是大非，说明了当前国家所实行的各项根本政策的正确性，说明了资本主义道路只能使极少数人发财，使大多数人贫困和破产，而

社会主义才是劳动农民共同发展和共同富裕的唯一出路。部分富裕中农留恋资本主义道路，不满意国家所实行的某些根本政策，但在辩论中，也觉悟到他们中间如果在旧社会里面靠投机倒把、能够侥幸发财的人也不过百分之一、二，而大多数还是不可能成为富人。曾经有不少人怀疑粮食的统购统销政策，但群众辩论的结论却是：这个政策好得很，不这样，就得有很多人在粮食商的操纵下挨饿以至家破人亡。那些继续从事破坏活动的地主富农和反革命分子，在辩论中，进一步地被揭穿，受到群众的打击。对于那些游手好闲、不务劳动的人，群众也主张给以必要的约束。总之，这种辩论大大地提高了农民群众和乡社干部的社会主义觉悟，纠正了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想，发扬了正气，压倒了邪气。我们要巩固合作社制度，加强贫农中农的团结，提高农民群众的更大的生产积极性，改进合作社的工作，巩固工农的联盟，完成国家购粮的任务，保证整个国家经济计划的顺利进行，除了必须在城市批判资产阶级右派的反动言行以外，在农村中展开这样一场大辩论是完全必要的。

中央认为：凡是还没有展开这种辩论的地方，各级党委都必须有准备地、有次序地、自上而下地派遣工作组协助乡社的党组织主持这种辩论，以便有力地批判富裕中农的资本主义思想，反对一切不顾国家利益和集体利益的个人主义和本位主义，使爱国、爱社和爱家的观念在群众中统一起来，并普遍地养成勤俭办社和勤俭持家的风气。辩论会必须吸收全体农村居民（包括单干户）参加，



组织可小可大。一般地在小组或小队的范围内，可以辩论得较为充分和较为深入。但在必要时，也可以举行全体社员或全村农民的辩论大会。辩论时，要让各人畅所欲言，让群众在辩论中，在交换意见中，辨别出那些是正确的和那些是错误的。除了对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的反动的煽动言论必须即时地有力地给以反击之外，对于群众的误解或错误意见，都必须采取很好的态度加以解释和说服，对于富裕中农的错误言论的态度，也应该这样。

这些关系农村两条道路的根本问题的大辩论，是农民群众和乡社干部的社会主义自我教育，是农村的整风。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和地委、县委对于农村中的这场大辩论，必须很好地掌握领导。群众在大辩论中，对于乡社干部作风所提出的批评，各级党委必须认真研究，适当处理，以便改进工作，团结群众。

关于农业生产合作社内外关系的调整、经营管理的改善等问题，中央准备在研究各地整社的经验之后，再发指示。

根据一九五七年八月十日  
《人民日报》刊印

# 国务院关于由国家计划收购 (统购)和统一收购的农产品 和其他物资不准进入 自由市场的规定

(一九五七年八月九日国务院全体会议第  
五十六次会议通过,同年八月十七日发布)

1953年以来,政府陆续规定粮食、油料、棉花为国家计划收购(统购)物资,由国家实行计划收购。计划收购任务完成以后,才允许农民把自己留用的粮食、油料、棉花在国家粮食市场和领导的其他市场上出卖。对于烤烟、黄洋麻、苧麻、大麻、甘蔗、家蚕茧、茶叶、生猪、羊毛、牛皮、土糖、土纸、桐油、废铜、废锡、废铅,集中产区的重要木材,若干种中药材,供应出口的苹果、柑橘,若干产鱼区供应出口和大城市的水产品等等,政府列为国家统一收购的物资,即由国家委托国营商业和供销合作社统一收购。统一收购的办法是国家规定由国家收购的比例(例如收购当地产量的百分之几十),国家收购数量完成以后,其余部分允许在市场上出售。上述两种办法,即计划收购和统一收购的办法,都是为了保证这些重要农产品和其他物资在全国范围内得到统一合理的分配。

实行重要农产品和其他物资的计划收购和统一收购以后，城乡重要物资的交流是畅通的，但是也出现过农村中一部分小土产无人收购，城市的一部分手工业品无人贩运下乡，因而发生城乡交流中“大通小塞”的现象。为了克服这种城乡交流中的阻滞现象，1956年下半年政府决定对农村小土产开放自由市场。农村小土产自由市场开放以后，过去无人收购和滞销的小土产都得到了畅销，刺激了农民在这一方面的生产，这是有利于城乡人民的。但是，因为在开放农村自由市场以前，没有预先规定那些农产品允许进入自由市场，那些农产品不准进入自由市场，因此在开放农村自由市场的时候，许多属于计划收购的农产品进入了自由市场。又因为统一收购的农产品和其他物资，国家只规定收购一定的比例，其余部分允许在市场上出售，因此许多属于统一收购的农产品和其他物资也在国家收购任务完成以前，即已无限制地进入了自由市场。这样就妨碍了国家对于重要农产品和其他物资的计划收购和统一收购，妨碍了对于这些农产品和其他物资的统一合理的分配。这是不利于国家建设，也不利于农民的。

为了切实执行重要农产品和其他物资的计划收购和统一收购的方针，国务院对于重要农产品和其他物资进入自由市场问题，现作如下规定：

一、凡属国家规定计划收购的农产品，如粮食、油料、棉花，一律不开放自由市场，全部由国家计划收购。国家计划收购任务完成以后，农民自己留用的部分，如果要出

卖的时候，不准在市场上出售，必须卖给国家的收购商店。不是国家委托收购的商店和商贩，一律不准收购。

如果某些省区由于当地粮食供求情况比较缓和，认为可以开放国家领导下的粮食市场的时候，经过省人民委员会的批准，可以开放当地国家领导下的粮食市场〔1〕。

凡是决定取消国家粮食市场的地方，当地粮食部门应当尽可能帮助群众解决粮食品种调剂方面的困难。

二、规定下列各种农产品和其他物资属于国家统一收购的物资〔2〕：烤烟、黄洋麻、苧麻、大麻、甘蔗、家蚕茧（包括土丝）、茶叶、生猪、羊毛（包括羊绒）、牛皮及其他重要皮张、土糖、土纸、桐油、楠竹、棕片、生漆、核桃仁、杏仁、黑瓜子、白瓜子、栗子，集中产区的重要木材，38种重要中药材（具体品种，另由卫生部通知），供应出口的苹果和柑橘，若干产鱼区供应出口和大城市的水产品，废铜、废锡、废铅、废钢。这些统一收购的物资都由国家委托国营商业和供销合作社统一收购。不是国家委托的商店和商贩，一律不准收购。农民自己留用部分如果要出卖的时候，不准在市场上出售，必须卖给国家委托的收购商店，这些商店必须负责收购。

对于手工业合作社需要的原材，由有关部门按计划供应，或者由省人民委员会指定地区，限定数量，按照国家牌价由手工业合作社自行收购。

三、不属于以上计划收购和统一收购两类的物资，如：鸡、鸭、鹅、鲜蛋、调味品、分散产区的水产品、非集中

产区的干果和鲜果、不属于统一收购的中药材等等，仍然开放国家领导的自由市场。

如果上述商品中的某些商品，在当地供应紧张的时候，省人民委员会可以命令规定为当地统一收购的物资，按照统一收购物资的规定办理。

凡属允许进入国家领导的自由市场的商品，国营商业和供销合作社也必须根据需要情况，经营一定的比重。当地人民委员会对于国家领导的自由市场应当实行必要的管理。凡属不准进入自由市场的商品，一律不准在自由市场买卖。对于违反这一规定的企业和个人，一般地将其商品按国家牌价予以收购，情节严重的，送人民法院处理。

**四、**对于国家规定计划收购和统一收购的两类物资，国家只委托一定的国营商业部门和供销合作社执行收购任务。其他不是由国家指定担任收购任务的企业、机关和团体，都不准进行收购。既不准派人到农村去收购，也不准在城市中收购私人贩运进城的计划收购和统一收购的物资。对于违反这一规定的企业、机关和团体，当地人民委员会应当给以严格的处分。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法规汇编》  
(1957年7月—12月)刊印

## 注 释

〔1〕 1957年10月11日《国务院关于粮食统购统销的补充规定》中又规定：今后为了加强粮食管理，此种粮食市场应该关闭。

〔2〕 1957年10月26日国务院将核桃列入统一收购物资，其

通知如下：自国务院将核桃仁列为统一收购物资以来，有不少商贩抬价套购核桃，影响了国家对核桃仁货源的掌握。查核桃主要是用来砸核桃仁，国务院原规定统一收购的核桃仁，应包括核桃在内，希各地对核桃亦按国家统一收购办法进行管理。

**中共中央批转**  
**中央手工业管理局、全国手工业**  
**合作总社筹委会党组《关于召开**  
**省、市、自治区手工业改造**  
**座谈会的报告》**

（一九五七年九月一日）

上海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央各部委、国家机关和人民团体各党组、人民日报：

中央同意中央手工业管理局和全国手工业合作总社筹委会党组《关于召开省、市、自治区手工业改造座谈会的报告》，特转发你们，并望结合你区具体情况研究执行。手工业的问题比较复杂，有些问题还没有成熟的经验，各地党委应当加强领导，研究这些经验，解决有关问题，把手工业合作社（组）进一步的巩固和发展起来。

中 央

一九五七年九月一日

# 中央手工业管理局、全国手工业合作总社筹委会党组《关于召开省、市、自治区手工业改造座谈会的报告》

(一九五七年七月十一日)

中央：

我们在三月二十一日到四月二十五日分两批召开了省、市、自治区手工业改造工作座谈会，在初步检查和总结一九五六年工作的基础上，研究了手工业内部以及手工业和其他有关方面的矛盾，部署了一九五七年的任务。

据一九五六年统计年报综合，全国现有手工业社(组)十万四千多个，社(组)员四六三万人(连同非社员在内共五三〇万人)。不论社会主义或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大社、小社和小组，生产都有很大发展。一九五六年全国手工业社(组)的总产值达七十七·八亿元，已提前一年超额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中一九五七年的产值指标；平均每人年产值为一、七〇二元，比一九五五年增加百分之三十三·五。而且产品质量有了提高，品种花色有了增加，成本也有所降低。对缓和去年下半年市场供应紧张和稳定物价等方面，发挥了一定作用。随着生产的发展，全国绝大部分社(组)都有盈余，约有百分之九十左右的社(组)员较一九五五年增加了劳动收入；不少社(组)员的疾病治疗也有了适当的解决。但是在社会生产关系



方面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新的矛盾和问题不断地出现,我们在工作中也还存在着不少的缺点。

会议认为,为解决目前存在的问题和缺点,一九五七年手工业工作的任务,应该是加强合作社的思想政治工作,坚持贯彻“民主办社”和“勤俭办社”的方针,积极地解决手工业生产的原料困难,广泛、深入地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继续调整生产组织形式,改进经营管理,正确地处理国家、合作社和社员之间的收益分配,合理地解决同有关方面的关系,从而进一步发展生产和巩固提高合作社。现将会议讨论的几个重要问题和意见报告如下:

### (一)

一九五七年手工业的原料供应还是比较紧张的。由国家调拨和商业部门直接供应的原料,虽然在数量和价格上较有保证,但是在供应时间和品种方面还有某些脱节的现象,除了棉织、针织、缝纫等行业国家供应的原料较多外,其他行业还有一半以上的原料要向自由市场采购,在数量和价格上还不能完全保证,对于手工业生产和产品价格都会有一定的影响。

会议认为,积极地解决原料困难,是当前搞好手工业生产、力争稳定产品价格的关键。为此,应采取以下措施:

第一、在原料供应上,钢铁、棉纱、木材、毛竹、皮毛等主要原料,中央有关部门已将平衡分配的计划下达,请各

地党委、政府检查、贯彻执行。经由商业部门供应的原料，必须根据“统筹兼顾”的方针，确定供应手工业的数量、时间、品种，防止挤掉或缩减对手工业的供应。竹、木的供应，要尽先满足手工业生产需要。钢铁的供应，要兼顾手工业、日用品工业和小农具生产的需要。麻、生漆除满足大工业需要外，也要照顾手工业。供应不足的原料，都应当贯彻“先生产、后基建”和“产区照顾销区”的原则。手工业联社应当根据已经平衡分配的品种、数量计划，按季提出需要原料的计划。同时还要积极开发原料资源，努力组织可能的原料生产（如土铁等）。应该认识，大力组织自由市场的原料供应，是解决当前手工业原料困难的重点。要求各地商业部门根据以往的物资流转规律和实际情况，积极地组织收购与供应，手工业社也可以自行采购一部分原料。废品废料的收购供应，除国家统购物资外，今后应当由地方上统一安排，手工业社同供销社应当密切合作。凡适合手工业利用的废品废料，除由手工业社自购自用外，供销社收购的也应按照合理价格优先供应手工业利用。

第二、根据不同行业和社（组）的具体情况，进一步开展以提高产品质量和节约原材料为中心的增产节约运动，属于社会有需要、原料供应没有问题的产品，应该尽可能地增加生产，有些产品社会虽有需要而原材料供应有困难的，应当大力节约原材料，扩大利用废品、旧料及代用原料，并改制一些费工较大、费料不多的新产品。至于那些生产任务不足的社（组），应当积极发挥手工业的

灵活性、适应性的特点，妥善地改变生产品种，转移服务方向，开辟生产门路，扩大修旧业务。不论那一种情况，都应切实保证和提高产品质量，尽可能地降低生产成本。对农民所需生产、生活资料的生产，尤应特别注意。修理服务的行业，也应注意利用废旧零件，增加产品的使用价值，提高服务质量。在运动中，必须充分地发动和依靠社员，根据需求和可能，寻找生产窍门，改善劳动组织，建立和健全车间或小组的生产责任制，加强产品质量检验与原料收发、保管及配料工作，并定期进行总结、评比和奖励、树立先进单位和先进人物的榜样，及时地推广先进经验，使运动步步深入和提高。

第三、加强财务管理，杜绝铺张浪费。基层社管理干部应根据实际需要，力争不脱产、半脱产和少脱产。全国基层社脱产干部比例，要求从去年的百分之七点二压缩到百分之六以下。各项修建购置支出，可办可不办的坚决不办，非办不可的也要精打细算，做到少花钱多办事。

## (二)

去年夏季以来，各地对那些集中过大和核算不当的合作社已经进行了一些改组和调整的工作，纠正了某些贪高贪大的偏向。据去年十二月底部分省市排队的结果，大约还有百分之二十——三十的社(组)，还需要继续进行调整工作。综合各地经验，在调整中应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各地手工业合作组织，一般地适宜于小一些，分散一些，特别是不能建立县区、乡一竿子到底的综合社，也不能建立多行业的混合社；应该根据生产特点和社会需要，在统一领导之下，采取多种多样的生产组织形式。比如：某些产品规格单一、能够成批生产，主要接受工商部门加工订货，或者内部分工细，协作关系密切，能够逐步采用机器生产的制造性的社(组)，如果房屋设备等条件许可，社员同意，可以适当集中生产，统一供销，统一计算盈亏。某些产品直接与消费者见面，以及兼营部分修理业务的制造性社(组)（如黑、白铁、竹器等）或者以门市零活加工为主，淡旺季节比较显著的服务性社(组)（如缝纫）亦可分散为小组生产，自购原料，自销成品，各自核算盈亏。这些小组所需要的大宗原料和加工订货业务，仍可由社的理事会统一掌握。在核算上，有的小组只向社交纳一定的管理费，盈亏全部自理；有的小组则将积累交社统一掌握，但劳动分红按小组实际盈余额自行分配。某些分散在家内生产而又接受商业部门加工订货的制造性社(组)（如挑补花、刺绣、各种编织等），则宜于分散生产，统一供销，统一计算盈亏。至于大多数固定设点或串街游乡的修理服务性社(组)以及某些技术简单、适合于就地取材、就地销售的零星制造性社(组)，还可以采取分户生产、自购自销、各负盈亏的形式，各地可以根据具体情况灵活运用。

第二、在调整组织的时候，应该从检查生产入手，坚持贯彻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分别不同行业、不同地区、

不同合作社的情况进行调整,不能强求一律,有的可以把大社分成小社、小组;有的可以根据群众需要适当增设服务点;有的可以把全社统一核算改为按小组分别核算;有的可以从社内分出一部分小组或社员户,实行分散生产、自负盈亏。调整时还应该根据自愿互利、公平合理、有利生产、有利团结的原则,妥善处理人员调配和资财分配的工作。

第三、今后各地在领导工作中,除对大社加强领导外,同时应该紧紧抓住那些大量、普遍而又多种多样的小社、小组和分散经营户,并很好地总结其经营管理的经验。

### (三)

会议还讨论了手工业工作中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工资问题:

1、去年各地执行“先工资、次治病、后积累”的原则后,对合理提高社员收入,解决生活困难,坚定他们走合作化道路的信心,起了积极的作用。但积累是社员集体利益和长远利益的保证,没有适当的积累,扩大再生产就有困难,合作社也就很难巩固。这一道理,以往没有讲清楚,因而有些社出现把积累分光、用光的偏向,应该注意纠正。

2、手工业社(组)的工资水平,在城市一般不应高于当地同行业、同等技术条件的国营工厂;在小城镇和农村

应该照顾原来手工业者和农民历史上收入的比例水平，不应高出农民太多。由于手工业有“以旺养淡”的历史习惯，旺季收入较多是合理的，淡季收入减少也是不可避免的。在衡量工资水平时，应按全年的平均收入计算。手工业社(组)中，目前工资水平合适的应该稳定下来，偏高的应该加以控制，突出偏高的应说服社员进行调整，另一方面，偏低的也要在可能条件下逐步提高。

3、应该在现有基础上，根据“按劳取酬”的原则，逐步改进工资制度，既要注意克服平均主义倾向，又要防止工资高低过于悬殊的现象。目前实行计件工资的合作社，应该加强定额管理和产品质量检验工作，防止只拚体力，不重技术，只求数量，不顾质量，以及浪费原材料等不良倾向。徒工在学艺期间，不应评定技术等级，除管吃饭外，可以酌给少量的生活津贴（具体方案现在正在研究中）。

## 第二、社员的资财折价存社处理问题。

在全部手工业社(组)中，除社员应缴股金外，折价存社的多余生产资料约计二·七亿元，高潮前后已还给社员的约一·一亿元，未还的约有一·六亿元（其中属于四——九人小业主的，约有九六〇万元）。对于这些折价存社的资财，经过与有关方面再三研究，认为应当在既不影响社(组)的生产，又要照顾社员生活的前提下，由省市手工业联社统一提出方案，基层社理事会订出具体办法，经社员大会讨论通过，分期分批地偿还。在没有偿还以前，仍然作为社员的存款，年息按五厘支付；已还的不再

付息。对于存社资财较多的少数户，如果全部还本，对于生产或其他方面影响较大的，可以根据各地具体情况酌情处理，有的可以把归还期限适当放长，有的也可以采用定息办法。

### 第三、对手工业个体户的管理和改造问题。

根据我国的经济情况，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手工业个体户还会存在和发展。为了发挥他们在适应社会需要方面的积极作用，限制他们的偷工减料、哄抬价格以及雇工剥削等自发倾向，今后应该协同当地的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对他们进行登记管理，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对这些个体户既不能放任不管，又不能管的过死。对新开业的个体户，只要供产销问题不大而又为社会所需要的，应当允许他们登记开业；在对合作化高潮中还没有组织起来的个体户，只要是以手工业为主要生活来源的，也要做好登记换照工作。手工业社（组）要团结个体户，帮助他们解决供销困难，逐步引导他们走合作化的道路，但不必急于全部组织起来。特别是对那些串街游乡、流动服务的手工业者，可以在长时期内保持个体经营的方式。这样做，对补充集体经济的不足、活跃市场、以及促使合作社改善经营管理等方面，都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 第四、手工业社和农业社的关系问题。

1、农村中尚未组织起来的手工业者（不包括集镇和集中产区的专业手工业者），可以根据自愿原则参加农业社。有些已经组织起来的手工业社（组），也可以根据自愿互利和有利于生产的原则，经过县以上党委批准，并入

农业社。有些地区手工业社和农业社的关系已经进行调整，生产上没有问题，应该按现状稳定下来，不要再作变动。但有的手工业社(组)坚决不愿意和农业社合并，要求独立经营，或者有的手工业社(组)并入农业社以后，已经影响了生产，都应由当地党委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和自愿原则适当加以处理。

2、加入农业社的手工业者，一般应在农业社的统一领导和安排下，建立专业小组，独立经营，自负盈亏。由于农业社中的手工业者是少数，要求各地党委在处理这一问题时，更多地听取手工业者的意见。

3、农业和手工业生产历来都是互相支援、互相依存的。建议县以下党委对本地区农业和手工业之间的矛盾，进行一次检查，从有利团结和有利生产出发，协商解决各项有关问题。对于原料困难的行业，应当切实贯彻“副业照顾专业”、“农村照顾城市”的原则，城乡手工业产品价格，应当服从当地统一管理，并经常注意防止副业排挤专业的现象。

4、区委、镇委和乡党委对分散在集镇和集中产区的手工业社(组)要加强领导，经常解决手工业的困难和手工业与有关方面的矛盾。

#### 第五、机械化速度问题。

手工业生产小而灵活，产品多样，资金少，用人多，在补助大工业不足和安排社会劳动力等方面，都有一定的作用。同时，手工业的原料供应还有困难，技术力量增长一时还跟不上去，因此，今后手工业社的技术改造，应



该以改进现有的手工工具为主,机械化的速度应当放慢。不顾主客观条件,盲目搞机械化,不仅会使资金闲置,而且会增加生产安排的困难。

#### 第六、向全民所有制过渡问题。

1、手工业社向全民所有制过渡,其目的是为了进一步发展生产力。如果个别合作社的生产关系已经不能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需要,经过省、市批准可以过渡。对生产力发展不受影响的合作社,就应该努力巩固现有的集体所有制经济,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不要过渡。要求各地区、各部门在新建、扩建工业企业时,照顾到原有手工业的生产能力,避免发生互相排挤、妨碍生产发展的现象。

2、从目前情况看,直接过渡为国营企业,只能在国家需要、合作社有条件和社员自愿的原则下,有领导地进行,在目前只应该个别地进行。如果不顾具体条件,成批转厂,盲目地变集体所有制为全民所有制,形成一种运动,就一定要引起社员和社干部不能安心生产,产生混乱,招致损失,应该加以防止。

3、有一些合作社设备多、积累大、生产正常,收入分配已发生困难时,个别地可以转变为手工业联社领导的合作工厂,这对利用合作社自己的集体资金,进行技术改造,扩大再生产是有好处的;这对向全民所有制转变也比较是可靠的。今年以内,专区和省辖市以上联社,没有试办的可选择个别手工业合作社进行重点试办;已试办的,不必忙于推广,应加强领导,很好总结经验。

4、手工业合作社转变为国营工厂或合作工厂以后,

由于改变了企业的性质，社员的股金应该在不影响生产的前提下，一次或分期发还；公积金除拿出一些作为集体福利基金，解决社员困难外，其余都应该随社转厂，不能分掉。同时应该建立基层工会，取消劳动分红。

5、不论转为国营工厂或合作工厂，都应注意保持和发扬集体经济在经营管理上的优点。转厂以后，脱产干部不能轻易增加，品种花色也不能减少。

#### (四)

手工业合作化以后，小生产者的思想改造和合作社制度的巩固，还需要进行长期艰苦的工作。当前手工业社(组)内部的矛盾，主要表现在集体与个人之间、合作社的领导与社员之间、这部分社员和那部分社员之间等方面，合作社与消费者之间也存在着一些矛盾。比较突出的是干部不懂得如何民主办社和发挥社员的积极性，常常采取包办代替，强迫命令的办法，因而引起许多矛盾。为了正确地处理这些矛盾。必须：

第一、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普遍、深入地对社员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和社章教育，使他们懂得国家利益、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长远利益与眼前利益之间的正确关系，提高觉悟，树立“爱社如家”的思想，搞好社内团结。

第二、坚决贯彻民主办社方针：

1、定期召开社员大会（或社员代表大会），讨论和决定社内的一切重大问题，如生产计划、供销安排、组织调

整、收益分配、盈亏情况、以及各项管理制度等。社干应当根据社章的规定，学会有事和群众商量、坚决纠正包办代替、强迫命令的工作作风，没有社章的社（组），应积极制订社章。

2、按期公布财务帐目。让社员了解社内财务收支情况，并积极提出意见。

3、根据合作社的具体情况，适当划分理事会和车间、小组的职权，实行分级管理，以发挥车间、小组的积极性。

4、脱产干部应抽出一定时间，下车间参加生产，领导生产，及时解决生产中的各项问题。

5、定期选举或改选理、监事会。选举时，应经过社员充分酝酿，从手工业工人、独立劳动者和小业主中，选拔他们中间优秀的人物，参加社（组）的领导；女社员和少数民族社员较多的社，应该吸收他们的代表人物参加理、监事会，使理、监事会有足够的代表性。

6、监事会应当充分发挥对理事会的监督作用。

第三、要求各地党委，加强对基层社党、团工作的领导。鉴于目前手工业社（组）中党、团员很少，有不少社连一个党员也没有，建议各地党委在一、二年内，在基层社中有计划地发展一批党员和团员，以提高合作社的政治质量。

## （五）

自去年中央体制会议确定手工业的改造工作和生产

工作,由地方党委和政府直接领导以来,各地已根据地方的特点和需要,有效地加强了对手工业工作的领导,解决了许多困难问题。

为了更好地通盘规划和发展地方工业,有些省(市)已将一部分手工业行业划归工业、商业等有关部门领导,并相应地调整了手工业领导机构。如上海市已将全部行业(工艺美术业除外)划归有关工业、商业部门统一管理(保存专业联社);山西、内蒙、四川、青海等少数省(自治区)的手工业管理局已和工业厅合并,并在工业厅下设手工业管理局。很多县(市)的手工业科和工业科,合并成立了工业科(局)。

会议认为,手工业领导机构和行业领导关系的调整 and 改变,应该注意能达到有利于统一领导、统一安排供产销和进一步发展手工业生产的目。这一问题,目前还没有成熟的经验。因此,建议各地要总结归口管理的经验,并可选择个别行业进行试点,取得经验后,再决定是否归口和如何归口。已经实行归口管理的合作社,要特别注意保存原来的经营管理制度,集体所有制不应改变,原来合作社的花色品种不能减少,便利人民的服务方式不能变更。至于各级手工业联社,无论是全部合作社或部分合作社归口,都应该在精简机构后继续保留,让它代表手工业社(组)对有关主管单位的领导进行监督,并协作解决改造中的各项问题。

各级手工业联社的干部,应该认真学习党和国家的政策,深入基层,参加体力劳动,借以增长生产知识,密切

和群众的联系,克服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官僚主义。同时,各级联社的机构和各种报表,应当在不影响工作的原则下切实予以精简。

## (六)

全国手工业合作总社筹委会于一九五五年一月成立以来,已有两年半。这一时期中,手工业合作化发展很快,变化很大,出现了许多新的问题,急待研究和逐步解决,社章一时也定不下来。因此,适当延长总社的筹备时间是必要的,经过一年多的工作,特别是“八大”以后,手工业的发展方向和许多重要的政策性问题已逐步得到了明确解决,全国手工业合作社代表大会如再推迟召开,对贯彻“民主办社”方针、巩固和提高合作社是不利的。为此,我们准备于今年第四季度内召开全国手工业合作社代表大会,总结工作经验,制订社章,正式选举成立总社领导机构。并要求尚未选出代表的省(市、自治区)抓紧在会前做好选举工作。

以上报告,是否有当,请批示。

中央手工业管理局 党组  
全国手工业合作总社筹委会

一九五七年七月十一日

根据中共中央文件刊印

# 中共中央关于整顿 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指示

(一九五七年九月十四日)

关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大辩论，已经在全国农村中逐步展开。中央认为：各地农业合作社应该在上级党委工作组的帮助下，接着这个大辩论，继续进行一系列的整顿工作。

(一)整顿干部作风。农业合作社绝大多数的干部基本上好的，他们在工作上是积极的，有成绩的。但是在他们中间，有不少的人，在联系群众、经手财政、管理生产、处理人事等问题上存在着某些缺点或错误。至于违法乱纪、错误严重的，则只占极少数。整顿干部作风，就是要帮助他们改正工作上的缺点和错误，改善工作方法，提高工作能力，提高政治水平和思想水平，并把那些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而带有某些缺点和错误的多数干部，同那些违法乱纪、严重错误的极少数人分别开来。各地合作社对于这个整风的部署，可以按照自己的具体情况拟定，但大体上要依序采取如下的做法：第一，先在合作社干部中，在党团支部中，充分说明整风的必要性，说明党群关系好比鱼水关系，使干部们和党团员在精神上有所准备。第二，放手让社员群众在社员代表大会上，生产队

全体会议上，或全体社员会议上，对于干部的缺点或错误提出批评。第三，组织有群众代表参加的小型会议，查清事实，分别缺点错误的大小轻重，分清责任，然后由犯错误的人在一定的群众会议上作自我检讨。属于群众误会的事，应该解释清楚。如果有地主、富农、投机商、反革命分子和流氓分子乘机进行破坏活动，必须依靠群众，在适当场合加以揭穿。第四，党支部和上级工作组要按照惩前毖后（戒于前而慎于后）、治病救人的原则，同群众在一起研究处理的方案。在群众的谅解之下，对错误并不严重而又表示决心改正的干部，不必给予处分，对于错误严重的，处分也要适当，使他们得有改正的机会。第五，合作社干部的改选，应该由社员群众自下而上地层层酝酿，充分协商，提出候选人名单。党支部在选举方面的领导，不能采取指定的做法，但必须注意使合作社的领导成分保持原来贫雇农和下中农的优势，同时注意使上中农也有适当的代表人，以利合作社的巩固和团结。

（二）调整社和队的组织。合作社和生产队的组织，要力求便于经营管理和发挥社员集体劳动的积极性。为此，它们的组织规模大小，应该照顾地区条件、经济条件、居住条件和历史条件，容许有各种差别，而不应该千篇一律。根据一年多的经验看来，在多数情况下，一村一社是比较适当的。有些大村可以一村数社，有些距离较近的小村也可以数村一社。现在各地合作社的组织（包括某些大社在内），凡是业已经过考验，确实办好，而为群众所满意的，就应该稳定下来，不要轻易变动。但是，有一

部分合作社的组织规模是过大的,不适当的,应该根据群众的要求,进行合理的调整,或者把社划小,或者保持联社的形式,由分社(有的叫大队)自负盈亏。生产队是合作社的基本生产单位,一般以二十户左右为适宜,按照各地方的特点,可以有所伸缩,过大不便管理,过小会损害集体劳动的优越性。在调整社和队的组织的时候,必须注意各部分群众的意见和利益,经过充分的协商,提倡互助互让,调解分歧,恰当处理土地、农具、耕畜、水利、林木等等经济问题。在慎重地调整社和队的组织之后,就都应当长期稳定下来,以利生产和建设。

在社、队关系的问题上,应该实行统一经营、分级管理的原则,既要克服某些合作社过分集权的弊病,也要防止生产队权限过大、形成分散主义的偏向。

(三)统筹安排,使全体社员各得其所。合作化后,除了灾区以外,大多数社员在不同程度上增加了收入,有一部分社员还只保持原来收入的水平,但是,也有一小部分社员因为劳动力不足或其他原因而暂时减少收入。对于其中缺乏劳动力的困难户,应该根据互助原则,适当安排他们在社内的劳动,或者适当帮助他们发展家庭副业。对于五保户,也应该根据他们的能力,分配一些可能的轻便的工作,使他们能够得到一定的劳动收入,只在劳动收入不足的情况下,才由社用公益金给予照顾。对于富裕中农,除极少数坚决要求退社的,可以在适当批评之后允许退社以外,应该根据互利原则,按期归还他们入社生产资料(例如,农具、耕畜、果木,等)折价的款项;或者经过协



商和群众讨论,按照不同情况,在不损害贫农、下中农基本利益的条件下,采取比例分红或其他可以妥协的办法,处理他们入社生产资料的遗留问题,使他们得到适当的收入。对于有丰富劳动经验和较高生产技术的老农,要发挥他们的特长,按照他们在生产上的贡献,给以合理的报酬。对于从事手工业、运输业、渔业和其他非农业劳动的社员,应该照顾他们的劳动特点,适当处理有关的各种问题,使他们得到合理的收入。

(四)改善生产管理,拟定生产规划。全体社员生活的改善和提高,只有依靠自己的辛勤劳动,依靠合作社不断地扩大再生产。整社工作必须不误生产。在正确处理内部各种矛盾的基础上,各地合作社应该总结本社的经验,参考其他合作社的经验,根据民主办社和勤俭办社的方针,认真执行中央关于民主办社几个事项的通知,并根据中央关于做好合作社生产管理工作的指示,结合具体情况改进生产管理工作,克服缺点。同时,要发动全体社员,讨论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并且根据本地本社的特点,研究增加农业生产和发展多种经济的措施,实事求是地拟定下年度和长期的生产规划,作为全体社员努力奋斗的目标。合作社拟定生产规划,必须服从国家经济计划和政策的指导,尊重其他合作社的利益,避免本位主义。生产规划应着重利用本社的劳动力,进行农业的基本建设,例如兴修水利,保持水土,改良土壤,植树造林等等,为扩大再生产准备必要的条件。

以上的整社工作,应该从现在起到明年春耕以前,逐

步进行。这是巩固合作制度的重大关键。各地党委必须加强领导,完成这个任务。

根据一九五七年九月十六日  
《人民日报》刊印

# 中共中央关于做好农业 合作社生产管理工作的指示

(一九五七年九月十四日)

几年来的经验证明，农业合作社在增加农业生产上具有巨大的优越性。发挥合作社优越性的主要关键之一，在于做好生产管理工作，充分发挥所有社员的劳动积极性，做到既能够增加社员劳动出勤率，又能够提高劳动生产率。合作社是社会主义的集体经济组织，必须保持统一经营和集中领导。但是，由于农业生产的分散性，受自然条件的限制，从而存在着很大的地区性和季节性，加上目前农业生产主要还是手工操作等特点，因此在生产管理上，又必须保持一定的灵活性与机动性。把合作社的统一经营、集中领导与发挥生产队在生产管理上的主动性、灵活性正确地结合起来，就成为指导合作社生产管理工作的一个基本原则。几年来的实践证明，凡是这样做了的合作社，就能更好地发挥社员的积极性，生产有秩序，生产管理就做得好，生产就增加得快些。反之，生产管理就作得不好，社员积极性就发挥得少，甚至常常发生主观主义和窝工浪费、无人负责等现象，从而影响了增产。为了进一步改进和加强合作社的生产管理工作，建立和健全合作社的生产管理制度，中央认为：

第一、合作社必须在有利于巩固统一领导、发展生产的前提下，建立“统一经营，分级管理”的制度。管理委员会是合作社统一经营的领导机构，凡属全社的生产资料使用、生产计划、基本建设、技术措施、资金筹集、劳力调配、工分定额、分配方案、财务会计制度等，都由管委会根据社员大会或代表大会的决议，统一计划，统一规定。但是，应该认识，这些计划与规定，都要通过生产队、副业组去执行。生产队，是合作社组织劳动、管理农业生产的基本单位。副业组，则是管理副业生产的基本单位。生产队和副业组管理农、副业生产，必须遵守社管委会的统一领导。但是，生产队和副业组在生产管理过程中负有自己一定的职责，因而也就应当赋予它们一定的权限，在服从管理委员会统一的生产计划的原则下，对于某些技术措施的改进，工分定额的临时调整，多余劳力的安排，小量副业的经营等，生产队和副业组都应有一定的伸缩权限，使之便于因时因地制宜，以利生产。各地必须改变社管理委员会集中过多、统得过死的毛病，同时也要防止分散主义、本位主义的倾向。要通过社和队的民主讨论和社员代表大会，明确划分社与队的职责与权限，做到上下合理分工而又相互协作，从而搞好生产。

第二、必须普遍推行“包工、包产、包财务”的“三包制度”，并实行超产提成奖励、减产扣分的办法。这是社队分工分权的一项根本措施。每年的生产计划指标，应该是积极的，可靠的，高于常年实际产量，并且力求逐年有所提高，以推动生产前进；但是在生产队积极完成合作社生产

计划指标的条件下,包产指标应该略低于计划指标,使包产的队有产可超,有成可提,以鼓励所有队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超产部分提成多少,减产扣分多少,各地各社可以酌情自定。

第三、生产队在管理生产中,必须切实建立集体的和个人的生产责任制,按照各地具体条件,可以分别推行“工包到组”,“田间零活包到户”的办法。这是建立生产责任制的一种有效办法。生产队必须加强劳动纪律教育。每个社员都应该保证按时从数量上和质量上完成生产任务,爱护农具耕畜,节约生产成本。要做到每一块耕地、每一件农活都有生产小组和专人负责,在农活完成之后有专人负责验收。只有这样,才能彻底克服现在某些合作社耕作粗糙,土地撩荒,无人负责的现象。

第四、合作社必须坚持集体劳动的根本原则,既要明确分工,又要互相协作,并要合理使用劳力。农业生产上的集体劳动,应力求适合于前述的农业生产的特点。除了按季节按农活分片分块包工,尽力避免临时派工,防止窝工浪费以外,还要按照不同的农活性质,规定那一些农活应该集体进行,那一些农活则可分散进行,即所谓:大活集体干,小活分开干。在实行集体干活的时候,也要划定地块地段,彼此分头进行,实行分工协作。不应该“干活一窝蜂”,以致责任不明,耕作粗糙。在劳动时间上,应按照各地历史习惯,因事制宜,决不可模仿机关、工厂的上下班制度,并应避免出工时互相等待,浪费时间,以致降低劳动效率。

第五、合作社必须充分利用社员的一切劳动力，合理分配社员的工作，切实执行统筹兼顾、逐户安排的方针。社管理委员会，特别是生产队，应该仔细了解每个社员及其家庭成员的特点和特长，做到“用其所长，各得其所”。对一些有特殊技术的社员，如园艺、养鱼、养蚕桑等，应该继续分配他们去担任这些工作。对于过去从事其他专业劳动的社员，如手工业、运输、伐木工人等，合作社应该把他们组成副业组，继续经营。这种特殊技术人员的劳动报酬的计算，应该与农业生产分开，不要混在一起。如果合作社没有条件经营这些生产，可以让他们自己去经营，自负盈亏，合作社只抽取其一定的公积金、公益金，并给以必要的帮助和指导。对于劳动力弱的人，则应当从副业生产、田间管理和包地块等方面，适当安排他们的工作。此外，对于社员参加社内劳动与参加家庭劳动的时间，应当本先公后私、适当兼顾的原则，加以安排。

第六、合作社和生产队的规模大小，对于农业生产管理工作的好坏，关系很大。由于目前农业生产的种种特点，又由于目前农业社的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还不高，几年来各地实践的结果，证明大社、大队一般是不适合于当前生产条件的，也证明中央一九五六年九月指示中规定合作社规模的一般标准，是适宜的。因此，除少数确实办好了的大社以外，现在规模仍然过大而又没有办好的社，均应根据社员要求，适当分小。今后社的组织规模，一般应该以百户以上的村为单位，实行一村一社。有些过小的自然村，相隔又很近的，可以几村办一社。过大的自然村，

可以一村一社,也可以一村数社。山区三两户的小村庄,可以组织合作小组,也可以入社后在经济上自负盈亏。关于生产队的规模,一般应该以居住接近,二十户左右为宜。在社与队的规模调整之后,生产管理上都应该实行两级制,取消原来的三级制或四级制。层次过多,对于深入工作、联系群众和组织生产,都是不利的。

社和生产队的组织规模确定了之后,应该宣布在今后十年内不予变动。

第七、合作社的技术措施和耕作改制,必须强调因地制宜,因时制宜。上级农业部门应该指示方向,积极提倡,典型示范,交流经验,而不应该机械规定计划,强迫合作社执行。新的农业科学技术必须与当地农民经验相结合。必须研究当地农业发展的历史,重视老农经验,而不能割断历史,不听老农意见。合作社的生产计划应该服从国家计划的指导。其办法,由国家规定生产指标,逐步过渡到国家只规定征购指标,合作社在保证完成国家征购指标的基础上,根据国家需要、社员需要和社的可能条件,制定合作社自己的生产计划。

第八、所有的合作社,都必须积极地、在适当增加社员收入的基础上,逐年增加公共积累,不断地扩大再生产,经常设法扩大生产门路,使当年生产与扩大基本建设相结合、目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相结合。为此,所有的合作社,都应该从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要求出发,根据当地具体条件及近年来的经验,发动社员参加讨论,制订合作社五年或十年的生产规划。首先可制订简单的纲要,然

后再逐步具体化。

在贯彻执行上述各项指示的同时，必须加强社员的政治思想工作，务使合作社的生产管理工作，在广大社员的自觉行动和监督之下逐步地加强起来。

根据一九五七年九月十六日

《人民日报》刊印



# 中共中央关于在农业合作社内部 贯彻执行互利政策的指示

(一九五七年九月十四日)

正确执行贫农和中农之间的互利政策，曾是我们实现依靠贫农联合中农顺利完成农业合作化的基本因素之一，也是今后巩固合作社的一个重要保证。

在实现合作化的时候，实行互利政策的重点，主要是合理地处理生产资料入社的问题；合作化实现以后，互利政策的重点，主要是经过合理的生产分工和合理的分配，恰当地调节各社员之间，尤其是贫农和中农之间的收入问题。目前的情况是：贫农和下中农入社以后，由于按劳取酬原则的实行，绝大多数都比入社前的收入增加了，但是也有少数劳力少人口多的困难户比入社前的收入有所减少。上中农和部分非农业劳动的社员入社以后，他们的劳动收入分为三种情况：一部分人增加了，一部分人保持原有水平，一部分人暂时减少了。产生这后一种情况的原因很多，主要的是由于合作社初办时期的生产水平不可能很快提高；同时也还由于部分同志对互利政策的重要性认识不足，执行中存在着一些缺点。因此，有必要在积极地增加生产的同时，认真贯彻执行互利政策，合理地调整合作社内部各部分人之间的经济利益，特别是

做到贫农和中农之间的互利，这对于加强社内团结、巩固合作社有很重大的意义。

为此，根据现有的经验和互利政策的精神，提出如下各点：

一、对于可能减少收入的社员，首先是对于贫农、下中农的困难户，应该在劳动生产分工上（如安排田间管理的零活时）和经营社内及家庭副业方面，给以适当的照顾，使他们能够充分发挥家庭辅助劳力的作用，增加自己的收入。

二、非农业户在入社后减少收入者，应该适当地调整其工作。原来的小商贩，可以经过商业供销部门的同意组织代销代购小组，划归供销社管理。原来有其他生产技术的（如各种手工业等），应尽量利用其生产技术，组织合作社经营的或个人经营的各种手工业生产。如果是由社经营，则应按照他们技术水平的高低，适当地调整劳动工分，使能得到合理报酬，增加收入。

三、某些特殊的生产资料，如鱼塘、苇地、果园、桑园等，原主投入劳力较多，现在收益较大，如果是属于小量的，可以部分或者全部暂不入社，归原主经营。或者入社后，仍然包给原主经营，实行比例分益，在包工包产上给予适当照顾，使原主能增加一部分收入。

四、成片的果树、林木是应该统一经营的。但它是多年的劳动成果，如社员各人的占有悬殊较大者，一般应该由社统一经营，实行比例分红。已折价入社，如社员意见很多者，也可改为比例分红，并且规定直到第三个五年计

划期内维持不变。在山区、丘陵区多数社员的林木占有悬殊不大者，可以折价入社，分年还款。

五、对于入社的耕畜农具等生产资料多余的折价款和社员的投资，应该按期归还，并应付给应得的利息。如果折价过低，社员意见很多的，应按入社时的一般市价作适当的调整，但基本合理者不再变动。在正常年景下，上述款项如果拖延不还，必然会减弱或丧失社员对互利政策的信用，引起原所有主不满，这对于巩固贫、中农的团结，巩固合作社，发展生产是很不利的。如果原来规定的还清期限太短，事实上不能按期还清时，应同原主协商，适当延长。

六、多民族地区的民族联合社，除必须尊重民族的生产、生活和宗教的习惯外，还必须注意在经济利益上的互利，特别是要照顾人数较少的少数民族社员的经济利益。

七、为鼓励发展畜牧业，除了合作社统一经营以外，应该允许社员家庭饲养一定数量的家畜，如牛、马、骡、驴等，完全归自己所有。合作社如要使用社员的耕畜役畜时，应照付适当租金。

八、对于个体农民，要加强领导，教育他们遵守政府法令，争取他们在自愿原则下，逐步地加入合作社。

上述各项在一九五七年六月十四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关于做好夏收分配工作的指示中，已经作了一些规定，应该根据各地具体情况一并研究执行。

所有上述这些调整各社员之间，特别是贫农和中农之间具体经济利益的工作，都必须通过社员群众的讨论

和有关方面的充分协商，使之合情合理地得到贯彻。我们应该教育干部：在合作社内部，首先必须依靠原来的贫农和下中农，坚决保护他们的利益，这是巩固合作社的基础；同时又应该切实注意上中农的利益。我们还应该向贫农、下中农说明，在不损害自己根本利益的前提下，对于上中农合理的经济利益给以适当的照顾，甚至作必要的某些让步，更好地团结他们，求得更顺利地巩固合作社，这是符合于自己的长远利益的。同时也必须教育上中农，为了自己将来更大的利益，他们也应该照顾贫农、下中农的利益，贫、中农团结在一起，坚决办好合作社。应该指出：上中农是劳动农民的一部分，他们占农村人口20%左右，生产技术较高，对于一部分老下中农还有一定的影响，因此，我们应该坚持对他们的团结。但是，他们（特别是入社前有部分剥削收入的老上中农）有较多的资本主义倾向，在社会主义改造时期，是具有动摇性的一个阶层。他们在合作化的高潮时期绝大部分加入了合作社，现在多数愿意留在合作社，少数要退社，并进行一些不利于合作社的活动。因此，我们对待上中农不只有团结的一面，还必须有批评改造的一面（采取说服教育的方法，不许用简单粗暴的方法）。我们在社会主义的方向上，决不许可迁就这些动摇的上中农。我们一定要加强思想领导，批判这些人的资本主义思想。我们如果不这样做，那就会犯右倾的错误。但是在经济上，我们应当适当照顾这些人的合理利益，认真执行互利政策，而不应当损害他们的利益。我们如果不这样做，那就会犯左倾的错

误。总之，我们对于上中农的团结，必须建立在首先巩固合作社内部贫农和下中农的优势，加强对动摇分子的思想改造，和在多数农民与上中农之间坚决贯彻执行互利政策这样三个条件的基础之上。只有这样，才能达到真正团结全体农民、巩固合作社和发展农业生产的目的。

根据一九五七年九月十六日

《人民日报》刊印

#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今冬明春 大规模地开展兴修农田水利 和积肥运动的决定

(一九五七年九月二十四日)

积极广泛地兴修农田水利，是扩大农业生产，提高单位产量，防治旱涝灾害最有效的一项根本措施。多积肥，多施肥，是保证增产的可靠办法。为了更好地迎接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到来，实现进一步发展农业生产的需要，我们一定要在今年冬季，集中大力开展一个大规模的农田水利建设运动和积肥工作。这个运动，应该成为随着目前农村社会主义教育高潮而来的生产高潮的主要组成部分。为了顺利地组织和指导这个运动，中央和国务院认为：

一、必须全面总结过去几年来，特别是1955年冬季和1956年春季水利建设高潮时期的经验教训。应该首先肯定1955年冬季和1956年春季的兴修水利高潮，成绩是很大的，扩大了灌溉面积一亿亩。我们要继续发扬这种成绩。要用生动的由于兴修水利而显著增产的事实，向干部和群众说明发展水利建设的必要性，说明合作化后的有利条件和如何努力克服困难。特别要注意总结和介绍已有的先进经验，表扬劳动模范，鼓舞士气，提高信心，要

鼓起像1955年冬季高潮中那样一股劲头来。同时，对于过去运动中的缺点，也必须适当地指出。1955年冬和1956年春高潮时期的缺点主要是：在规定水利任务计划时，有些地区数字偏大一些，与当时的农、副业生产结合不够，有些地方未充分与当地群众协商，有过某些强迫命令的现象。其次是工程多样性和因地制宜不够，有些地方强调工程的单一化，如过分强调打井，计划定得过死等。此外，对当时的兴修水利运动的具体指导不足，及时总结推广先进经验和纠正缺点不够，因而有些地方曾经产生了浪费劳力，引起群众不满的现象。这些缺点，在今后运动中，应该尽力避免。

二、根据我国农田水利条件的有利特点，必须切实贯彻执行小型为主，中型为辅，必要和可能的条件下兴修大型工程的水利建设方针。在工程的兴建上，还必须注意掌握巩固与发展并重，兴建与管理并重，数量与质量并重，依靠群众，因地制宜，研究历史，多种多样，投资少，收效快等等原则。对已有的水利设施，应该积极整修和扩建，加强管理，挖掘潜力，充分发挥效益。在内涝灾害或者水土流失严重的地区，应该把排水除涝或者水土保持工作，放在首要地位。农村水电工作应结合水利建设，重点试办，在有条件的地区应该积极发展，做到逐步满足必要的机械灌溉的需要。在牧区应该注意逐步解决人、畜饮水问题。

关于1958年的农田水利各项计划指标，已由水利部另行下达。省以下也需要逐级下达控制数字，但不要规

定太死，应允许下面作必要修订。农业合作社的水利计划，必须经过合作社讨论决定。在制定和执行计划的时候，既要反对保守，也不要把计划定得过大，当前主要的还是首先要反对保守思想。

**三、要加强领导。**经验证明，领导重视，党政负责同志亲自动手，是开展工作的一个主要关键。各级党政领导机关，应该根据上级指示和当地条件，及时发布指示，在干部和群众中，进行深入动员。工作指导上既要有一般号召，更要有具体指导，依靠重点，推动全面，及时检查，总结经验，解决问题。县一级水利机构，应该根据工作需要，适当地充实加强。

**四、要根据各地不同条件和现有经验，做好水利建设规划。**务使灌溉与除涝、防洪与防旱、中、小型与大型，都能够做到因地制宜，统一安排。各省、自治区应该积极进行中、小河流域规划和地区的农田水利规划，使两者互相校核，互相结合。这种规划还应该注意与农、林、渔、牧等有关规划相配合。合作社也应该制定水利规划，作为整个农业生产规划的一个组成部分。各级的水利规划，均可采取由粗到精的办法，先作出一个大体轮廓规划，再在工作中逐步充实修正，作出更切实详尽的规划。目前要注意不要因为规划不完整而影响工作的进行。

**五、要正确地贯彻执行农田水利的有关政策。**为了鼓励合作社社员积极参加基本建设，水利工分的报酬应该相当于同等劳动力农业工分的报酬。这种报酬，如工程当年受益者，应该在当年分红；当年不能受益者，或者



当年分红或者以后逐年分红，由各地根据具体情况决定。要根据各地冬季生产条件，注意合理安排劳力。既要保证冬季的农、副业生产，又要保证为了扩大再生产的基本建设的需要。根据这个原则，适当地规定社员在这两方面应该出工的比例，做到能够充分利用冬闲季节的劳动力。在涉及一个合作社以上的工程，应该实行互相支援，实行受益多少、出工多少的原则，在有互助习惯的地区，还可以出一部分义务工，但应该补助伙食。用之于国家的剩余建勤工，也可用之于兴修水利。各省、自治区还可以制定一些必要的奖励办法和召开水利劳模会议，以鼓励干部和群众兴修水利的积极性。

**六、加强技术指导。**各地应该继续采取“以工地为学校、以工程为教材”的方式，积极培训农民水利技术员。对农村中兴修水利有经验的老农和老师傅，要很好的使用，尊重他们的意见，向他们学习，并且注意培养提高他们。各省、自治区均应该下放或临时抽调一批技术干部，到县以下的基层单位，负责进行勘测、设计、施工等技术指导工作，以保证施工质量和施工安全。

**七、水井工作。**华北各省水井灌溉占有很大的比重。过去几年来打了不少的井，也起到了很大的增产和抗旱作用。今后在适当的地区还必须继续积极发展。但是，在1952年和1956年两次兴修水利的高潮中，有些地区的打井工作，曾出现某些盲目性，不顾地区和条件，只重数量，忽视质量和效益的缺点。这个缺点必须注意防止与纠正。发展井灌，一定要根据地形、水源条件，有计划有

步骤地进行,同时要加强技术指导,多打质量好、出水大的井。对浅井、半成井仍应该继续进行改造,并要使平整土地、配置提水工具、传授浇地技术等工作跟上去,保证及时受益。

八、解决与防止水利纠纷。各地应该认真贯彻执行中央的有关指示和国务院批转的《水利部关于用水排水纠纷处理意见的报告》。要强调自觉地遵守纪律,凡是本位主义严重、不按协议和上级裁决执行、因而造成了严重损失的单位和人员,应该受到相当处分。同时,要警惕坏人利用水利纠纷进行挑拨煽动的破坏活动。县与县,专区与专区,省与省交界及其他可能发生水利纠纷的地区,应该于事先做好干部与群众的思想教育工作,发挥互助互让精神,提倡照顾整体,克服本位思想,彼此协商,力求避免纠纷的发生并且保证及时处理。

九、水利经费。工程不论大小,都应该认真贯彻勤俭办水利的精神,少花钱,多办事。群众性的农田水利,主要是依靠合作社的人力、物力、财力,并且鼓励社员积极投资,国家只能作必要的补助。1958年水利经费已有适当增加,应该注意节约,防止浪费。补助费的使用,对于山区、少数民族地区、老根据地和灾区,应该首先予以适当照顾。

十、器材准备。修建工程的器材,应该依靠群众,就地取材。至于必须采购调配的物料,如水泥、钢材、提水工具、机电器材以及打井用的棕皮、麻绳、铅丝、钢管、烧砖用煤等,均应该精打细算,及时提出计划。中央和地方

的有关部门要积极支持,及时供应。

十一、在兴修农田水利的同时,必须同样地大力展开冬季积肥运动。这也是实现农业增产的一项根本措施。各地党政领导机关,必须领导各地农业社,制定可行的积肥造肥计划,采取一切有效的办法和鼓励积极造肥的政策,动员群众,保证如期实现。

十二、开展造林运动,对于水土保持和保护农田水利关系甚为密切。各地务须抓紧季节,采取必要步骤,在同时保证数量和质量的前提下,做好今冬明春的造林工作。

冬、春两季是开展农田水利和积肥工作最有利的季节。1957年计划完成的不够好,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动手晚,错过了兴修季节,应该引为教训。为了保证今冬明春兴修农田水利和积肥运动的胜利,各地应立即动手准备,积极进行。各省、自治区应将进行情况,随时报告中央和国务院。

一九五七年九月二十四日

根据一九五七年九月二十五日  
《人民日报》刊印

# 关于劳动工资和劳保福利政策的意见\*

(一九五七年九月二十六日)

周 恩 来

目前我国正在进行着政治上、思想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深入开展全民性的整风运动。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报告中指出:“我们作计划、办事、想问题,都要从我国有六亿人口这一点出发”,“我们的方针是统筹兼顾、适当安排。无论粮食问题,灾荒问题,就业问题,教育问题,知识分子问题,各种爱国力量的统一战线问题,少数民族问题,以及其他各项问题,都要从对全体人民的统筹兼顾这个观点出发”。

从六亿人口出发,就是要从我国实际情况出发。我国是经济落后的农业国,农民是人民中的最大多数。我国不仅农业落后,工业也很落后,要从根本上改变我国的经济面貌,必须改造落后的农业,要改造落后的农业,又必须首先大力发展工业。这是因为有了一定的工业水

\* 这是周恩来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所作《关于劳动工资和劳保福利问题的报告》的第二部分。

平，才能够为改造农业提供必要的条件。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我们实行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也就是为改造农业创造条件；也正是由于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重工业有了一定发展，我们才有可能在现在和今后提出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基础上实行工农业同时并举的方针。

我国的劳动工资和劳保福利政策，必须从统筹兼顾全国人民生活首先是工农生活、适当安排城乡关系这个基本观点出发，实行合理的低工资制，尽量使大家都有饭吃，并且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使工农生活能够逐步地得到改善。实行合理的低工资制，就是对工资水平的安排，不能单纯从工业生产的增长和工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出发，而必须从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和全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出发。只有实行合理的低工资制才能与我国相当低的工农业生产水平相适应。今后要有计划地安排劳动就业，精简机构和精减人员，鼓励下乡上山，广开就业门路，提倡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相结合，加强对知识分子的改造；要正确地安排生产与生活的关系，逐步地缩小工农生活水平的差别，减少城乡矛盾，巩固工农联盟，逐步调整工人阶级内部的工资关系，使领导者与被领导者、老职工与新职工、地区之间、产业之间、工种之间的关系进一步合理化，加强工人阶级的团结。

实行合理的低工资制，尽量使大家都有饭吃，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三个人的饭，五个人吃”的意思。但是，绝不能将“三个人的饭，五个人吃”误解为可以不根据实际

需要,盲目增添人员,随意扩大编制,把三个人的工作分给五个人做;也不能误解为可以不根据按劳付酬的原则,不加区别地对于复杂劳动和简单劳动,实行一样的工资待遇。如果这样做,不仅不能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劳动积极性,反而会降低劳动生产率和工作效率,不利于发展生产和改进工作。合理的低工资制应该是:适当地保证广大职工必要的物质生活需要,并且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使职工的生活逐步得到改善。我们既要反对脱离农民的城乡生活相差过大,又要反对不合按劳付酬原则的平均主义。

我们在今后必须将劳动就业和精简机构、改革工资制度和逐步改善职工生活、整顿劳保福利和各项生活待遇,这三个方面的问题结合起来统一安排,既要有长远的全面规划,又要有稳妥的实施步骤。同时,在目前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中,就应该经过领导动员群众辩论,将凡是能够由一个地区、一个单位自己解决和改进的问题,实行边整边改,逐步解决。

现在分别就几个方面的问题,提出一些意见。

## 一 劳动就业和精简机构问题

解放以来,由于人民生活的改善、卫生防疫工作的发展、国家救济工作的进行、和平的生活环境四种因素在起积极作用,我国人口的增长是很快的。根据人口普查和公安部历年的人口统计资料,台湾和海外华侨不算在内,

一九五二年全国人口约为五亿七千四百多万人，到一九五七年净增六千六百多万人，达到六亿四千多万人。其中城镇人口九千二百多万人（包括由农村转入城市的人口），农村人口五亿四千八百多万人。城镇人口比例为百分之十四点四，农村人口比例为百分之八十五点六。人口平均每年净增率约为百分之二点二。预计到第二个五年末，全国人口肯定地将超过七亿，到第三个五年末，很有可能接近八亿。这还需要在这个期间努力进行计划生育的宣传、教育和指导等措施，将人口每年平均净增率控制在百分之二点二以内，而不是每年递增百分之二点二，才能办到。我国人多是好事情，但是，由于我国的工农业落后，生活资料增长还比较慢，也给安排劳动就业和改善人民生活带来若干困难和限制。我国旧社会遗留的失业问题已经基本解决，但是，妥善处理新增加的青年劳动人口的就业问题，仍然是一个严重的任务。

初步估算，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城市新增的青年劳动力中包括大学、中等专业毕业生和一般到达年龄的青年在内，需要就业的将有六百多万人。而第三、四个五年计划期间，需要安排就业的人比现在还要多。对于我国人口的这一发展趋势，必须有充分认识，才不致缺乏预见。

根据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各项指标估算，职工总数约需增加五百五十万人。在增加的职工总数中，大约有百分之二十的人，需要从附近农村吸收，这样，约可安排四百四十万城市劳动人口就业。在六百多万需要就业的

城市劳动人口中，大约还有二百多万人必须从各方面采取措施进行安排，主要是面向农村山区，参加农林业生产。

为了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工作效率，为了加强对知识分子的改造，为了今后能够更好地安排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劳动就业，目前在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中，各机关、企业和事业单位首先就应该精简机构和精减人员，合理地安排生产人员和非生产人员的比例，并且将精减出来的机关职员和非生产人员尽量设法下放到农村生产中去，一部分人员可以转为生产工人；如果地方需要的话，一部分人员也可以调到下层机关中工作。以北京市为例，在北京市委统一领导、统筹安排的原则下，已经初步拟订了精简的过渡方案，目前正在对下放人员进行动员和安排的试点工作。北京市所属政府、党群、国营工业、手工业、商业、建筑业、国营农场、高等学校、市政、福利等部门，共有行政管理人員和教职员约十四万五千六百一十人，计划精减四万四千八百八十六人，约占全数百分之三十。各企业、事业单位精减的人员大部分可以留在本系统内自行安排，充实基层生产单位，一部分安排不了的人员可以参加郊区农林业生产；行政、党群系统和高等学校抽调出来的人员，除下放到基层单位以及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和中小学校工作以外，主要是参加郊区农林业生产。最近已下放参加农业生产的有二千四百一十六人，到其他基层单位工作的有八百一十六人。

北京市这种初步的经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可以



仿行。除中央机关应该由中央全面规划以外，凡是分设在各地的中央直属的企业和事业单位，都应该经过所在地党委统一安排，拟订出精简的初步方案，一方面通知中央主管部门，另一方面进行试点工作。如果行之有效，并且又有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工作效率，那么，在那个地方就可以推广。

为了安排城市多余的劳动力，首先是安置从机关、企业、事业单位精减出来的职员和非生产人员，必须从多方面开辟劳动就业的出路。

第一，他们的主要就业方向，应该是下乡、上山，参加农林业劳动。有许多地区反映，目前农业合作社的劳动力还是不足的，大中城市和工矿区附近的农村，劳动力更感不足。根据北京市的计算，全市郊区共有四百多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共约有四千个生产队，每个队约可安置三个人，平均每个社约可以安置三十人。现在全国共有七十五万个社，只要每个社能够安置五个人，全国就可以安置三百多万人。当然，全国各地农村需要劳动力的情况是不平衡的，而且必须有计划地分期地进行，才能安排适当。从现在起，各省市都应该利用整风机会，实行试点，在取得经验后，就应该积极推广。今后全国各地必须采取积极发展农林业生产、巩固农业合作社的方针，大力提倡深耕细作，兴修水利，积肥造肥，发展副业，开发山区，垦荒造林，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实行多种经营。农林业生产发展了，不仅可以减少农民进城，而且可以大量容纳城市多余的劳动力。同时，还需要采取鼓励下乡上山的

各种政策和措施。例如，整顿职工福利待遇，实行请假探亲办法，缩小城乡在油、肉、布供应上的差别，建立高等和中等学校在学和毕业的学生必须参加体力劳动首先是农林业劳动的制度，等等。

第二，贯彻执行退休制度和新学徒制度。根据估算，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超过劳动年龄的职工，绝大部分是城市的职工，每年约占城市现有二千万职工的百分之零点六五，五年大约有六十五万人左右。如果这一部分人大部实行退休，他们所得到的退休金平均约占他们原工资的百分之五十五左右。在实行新学徒制度以后，学徒津贴降低，每个退休职工余下来的工资，可以多吸收一个到两个学徒，这样就大约有一百万左右青年劳动力可以就业。为着鼓励年老职工退休，可以采取在同等条件下，优先吸收他们的子女就业的办法。

第三，扩大城市就业的门路。除了手工业、服务性行业可以容纳一部分劳动力以外，估计实行新学徒制以后，这些行业还可以多吸收一些学徒。此外，还可以组织废物利用、废品回收等方面的生产，安置一部分劳动力。家务劳动是社会劳动的一部分，参加家务劳动也是光荣的。我们应该提倡妇女参加家务劳动，造成一种社会风气。家庭妇女能够勤俭持家，把家务搞好，使丈夫子女能够积极从事各种劳动，同样是对国家和社会的贡献，而丈夫子女所得的工资，也有她们家务劳动应得的代价在内。

第四，控制城市人口的增加。新建的工业和基建项目，应该适当地分布在沿铁路线、沿河流的中小城市，接

近农村，不宜于过分集中在大城市。同样，新建的中学也应该尽量分布在乡镇和农村，不宜过分集中在城市，以便利农民子弟走学。同时，在中小学校中应该加强农林业生产的教育，使学生毕业后容易留乡参加农林业生产。目前我国一百万人以上的大城市已经有十三个，上海已达七百万人口，北京已达四百万人口，今后对于大、中城市的发展规模必须进行研究规划，教育职工尽量将家属留在农村，动员已经进城的家属还乡生产，努力控制城市人口的增长。

第五，在工业建设的方针和技术政策方面，也要考虑到便于安排劳动力的因素，全面计算投资和经济效果。在建设项目的安排上，不能单纯追求大企业，一般应该采取大、中、小结合的方针，并且有些项目应该以中小型为主，自然也有些项目是以大型为主的。这样，既可以在有决定性的企业上采用现代技术，又可以大量建设中小型企业，增加生产，安排就业。在一般的建筑业、交通运输业和中小工矿企业中，不应该追求过高的机械化，而应该充分利用人力、畜力和现有设备的潜力。

劳动就业、精简机构、面向农村山区的问题，将是今后相当长时期的艰巨任务，而改造知识分子成为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又是我国社会主义改造中一项重大任务。在这些问题上，困难是存在的，但是，依靠我国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和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在发展工农业生产的基础上，从多方面开辟就业和改造的门路，这些问题是可以逐步得到解决的。我们相信，只要我们能够合理

地适当地解决这些问题，就一定能够充分发挥我国丰富的劳动力资源的积极作用，就一定能够更顺利地促进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

## 二 工资问题

根据对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工资问题的分析和前面所讲的处理劳动工资工作的原则，现在对于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工资水平和工资制度问题提出下列几个意见。

第一，工资水平的安排。

八大建议〔1〕提出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职工平均工资将增长百分之二十五到百分之三十。但是，根据现在对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工农业生产、国民收入、劳动生产率和生活消费资料的增长指标的综合估算；同时，考虑到目前有百分之二十五左右的职工的工资水平已经偏高，为了调整工农关系、新老关系，这一部分职工的工资只能少增、不增甚至略有下降；加上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增加的新职工绝大多数将实行新学徒制度，新的普通工、勤杂工的工资待遇和新的高等、中等专业学校毕业生参加工作后的工资待遇，因此，全体职工平均工资在今后五年内将不可能达到八大建议中预计的水平。这就是说，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约有五百多万新职工的工资水平将低于现在职工的年平均工资，在现有二千四百万职工中，约有百分之二十的职工不增加工资，约有百分之

八十的职工增加工资。这样做，五年内职工的平均工资，如果增长百分之十的话，那么，约有百分之八十的现有职工的平均工资将可增长百分之二十二左右；如果增长百分之十五的话，那么，约有百分之八十的现有职工的平均工资将可增长百分之二十九左右。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如果大多数农业生产合作社赶上或者超过当地富裕中农的生产水平和收入水平，到一九六二年每一农户年平均收入比现在的年平均收入三百元左右提高三分之一，而职工的平均工资五年内提高到百分之十或者百分之十五，那么，工人和农民的平均生活水平相差的距离就会比现在缩小。究竟如何规定才恰当；将由国家计划委员会在制定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时候，进一步加以平衡后提出。

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在适当增加工资的条件下，应该对工资和福利作全面安排，改进工资制度和福利制度。改进的方向应该在提高工资水平的基础上，逐步增加直接工资的比重，适当减少附加工资和福利补贴的比重。由于约有百分之二十的职工不增加工资，而过高和不合理的福利待遇又必须调整，这无疑地将会影响到一部分职工的收入。因此，对于这些措施，必须采取谨慎的步骤，并且对于职工的全部收入和支出进行全面的计算分析，该增加的增加，该调整的调整。不论增加或者调整都应该进行周密地调查研究，经过群众的充分酝酿讨论，有计划地分步骤地进行。在今后五年内，应该做到现有职工中约有百分之八十的人能够或多或少地增加收入，

有技术的老工人能够有较多的增加。

## 第二，工资制度的改革。

实行新学徒制度，是工资制度上一项比较重大的改革。关于新学徒制、职工退休、请假探亲、普通工和勤杂工的工资待遇等六个文件草案都已经印发了，这里不再多讲。但是，应该说明，这都是草案，请大家提意见，有些标准，还是需要斟酌的。

工资制度是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必须由劳动部组织专门机构进行全面研究，并且争取早日拟出改革方案，提到厂矿职工群众中进行广泛讨论。这里我只讲几个问题。

一、工人的工资等级制度。目前实行的是八级工资制，级别少，而级差较大，好处是可以鼓励学习技术，但是，在不同的产业和不同的工种中，普遍实行八级工资制，是不合适的。改革的方向，应该是根据不同产业、不同工种（先进和落后，复杂和简单）具体规定不同的工资等级，有的需要增加等级（如技术复杂的工种），有的需要减少等级（如技术比较简单的工种），不宜强求统一，级差系数也应该做适当修改。但是，在同一地区，性质相同的工种的工资等级制度应该统一起来。

二、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的干部工资制度。这三方面干部现行的工资制度是不统一的。现行的国家机关干部工资制度，采取一职数级、上下交叉的办法，基本上符合我国情况的。但是，升级制度上有比较严重的毛病，在大鸣大放中职工对去年升级面过大、升级标准不明

确、升级不公平等方面的意见很多，必须加以改进。一九五六年大多数企业干部实行了职务工资制，由于企业、科室分类太多，造成干部工资标准过于复杂，工资标准规定过高，出现了领导干部增加工资过多的偏向，虽然已经纠正了（中央决定厂级干部工资增长不得超过百分之十三，科级干部不得超过百分之二十），但是，在制度上和工资关系上还遗留了许多问题，这些都需要进一步研究和改进。对于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干部的工资制度和工资关系，也应该进行合理的调整 and 安排。

三、计件工资制度。计件工资制度对于提高劳动生产率有积极作用，这是肯定的。但是实行计件工资制度，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如产供销正常、成批生产、便于定额计算等等，那种认为计件工资制推广得越多越好，而忽视必要条件的思想和作法都是错误的。目前实行计件制的企业，有的条件不够，有的计件面过宽，加以定额落后，定额管理工作薄弱，结果产生许多流弊，不仅影响产品质量下降，浪费工资基金，而且助长了职工中个人主义和本位主义思想的发展，影响职工的团结。今后必须具体研究每个企业的条件，凡不宜实行计件工资的就不要勉强实行，实行面过宽的应该缩小，有条件实行的应该加强定额管理工作，克服目前计件工资工作中的各种缺点。

四、奖励工资和各种津贴制度。目前全国实行的各种奖励、津贴制度，有许多对生产起了积极作用，问题在于名目繁多，彼此重复，有不少是与生产无关的，而且奖励、津贴发放的面很广，金额也高，浪费很大。一九五六

年的全国工业工资总额中（不包括附加工资和福利补贴等）标准工资为百分之八十九点四，计件超额工资为百分之二点三，奖金为百分之二点一，津贴为百分之三点七，其他（保留工资，停工工资，生活费补贴等）为百分之二点五。从上述平均数字来看，似乎问题不大，但是，部门之间和企业之间悬殊很大。例如鞍山钢铁公司一九五六年的工人工资总额中，计件超额工资占百分之十五点一二，奖金占百分之四点八六，津贴占百分之五点二，而标准工资仅占百分之七十四点一三；建筑安装和交通运输企业的情况也大体类似，这显然是不合理的。今后应该结合标准工资的调整，全面地整顿各种奖励、津贴制度，取消各种不合理的奖励、津贴，建立确实对于增产节约有鼓励作用而不是助长职工中经济主义倾向的奖励制度。

有许多同志建议建立工龄津贴制度。工龄津贴对鼓励职工安心于自己的职业，稳定老职工的工资收入，照顾老职工的生活，是有好处的。但是实行的范围、津贴的标准等等都需要慎重考虑，在研究整顿各种津贴制度的时候，应该对于工龄津贴问题也进行系统研究，以便会同提出调整方案。

### 三 劳保福利问题

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开展对职工的劳动保险和福利事业是国家的长远方针，今后必须继续贯彻执行。但是，根据前面分析的劳保福利工作中存在的问题，第二



个五年计划期间对劳保福利工作和制度应该着重整顿。整顿的方针是：简化项目，加强管理，克服浪费；改进不合理的制度，适当降低过高的福利待遇；同时提倡少花钱、多办事；提倡依靠群众集体的力量，举办福利事业；提倡用互助互济的办法，解决职工生活中的某些困难问题。

### 第一，劳动保险。

从几年来的情况看，劳动保险制度的建立基本是正确的。但是，制度还很不完善，某些劳保待遇有不切合实际和不够合理的地方。全国总工会已经提出修改的意见，拟将其中考虑比较成熟的部分，首先进行修改，经职工群众讨论后，由国务院发布关于劳动保险待遇的暂行补充规定，付诸实施；同时，进行全面研究，准备修改条例。

总工会建议扩大劳动保险实施范围，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统一实行劳动保险，取消现行的公费医疗和其他各项有关办法，以减少职工中的矛盾。这一建议，将由国务院召集有关部门进行研究后决定。

### 第二，医疗问题。

目前企业享受劳动保险医疗待遇的职工和一部分职工家属，国家机关、文教、事业单位享受公费医疗待遇的职工，加上实行劳保合同的企业、事业单位的职工，总数共约二千五百万人。

一九五七年在国家机关、文教、事业单位享受公费医疗的七百四十万人中，全年共计门诊一亿一千一百万人次，平均每人每年门诊约十五次，而根据十几个较大的城

市调查材料和湖北、河北、四川等省的典型调查推算，在市民中平均每人每年门诊只有三点五次，农民只有二次。每次门诊的医药费平均一点五元，共需经费一亿六千六百五十万元。公费医疗的职工每年平均每千人占用七张病床，共计五万一千八百张。以每床每年利用二百九十六天计算，共计一千五百万天。每天住院费平均三元，共需经费四千五百万元。门诊和住院两项合计共需二亿一千一百五十万元。由于制度不合理，管理不善，公费医疗中的浪费是极其严重的。不仅经费上浪费很大，而且在医疗力量、设备和药品上浪费更大。目前全国共有二十六万张病床（不包括军队），其中劳保医疗和公费医疗共占用十六万七千五百张，军队康复病人占用床位一万多张，精神病和麻风病占用一万四千多张，优抚二百八十八万人占用二万张。以上共计占用二十一万张，仅有五万张病床是供一般市民和农民使用的。

为了改变这种不合理的状况和克服浪费现象，今后卫生医疗工作的方向应该是：

一、为六亿人民服务，城乡兼顾。扩大门诊，举办简易病床。

二、扩大预防，以医院为中心指导地方和工矿的卫生预防工作。医院和疗养院逐步交地方统一管理，党的工作一律交地方领导。

三、降低医院和疗养院的设备标准，适当降低药品价格。劳保医疗和公费医疗实行少量收费（门诊、住院和药品），取消一切陋规（如转地治疗由医院开支路费，住院病

人外出由医院开支车费等),节约经费开支。

四、改革医疗制度,便利人民就医(如实行上午、下午、晚上三班门诊制度)。加强医务人员教育,树立为人民服务的医疗态度。

五、私人诊所,不宜过早过急地实行联营。

第三,职工住宅收费问题。

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国家对职工住宅基建投资四十四亿元,建设职工住宅共约八千万平方米(平均每平方米单价为五十三元)。职工住宅的建设速度这样快,但是仍感不足,到一九五六年底,还有约二百五十万职工要求解决住房问题。发生住宅紧张的原因,从全国情况分析,大致有以下几点:

一、由于职工某些福利待遇过高和规定的不合理,影响职工家属大量涌入城市。

二、在工业企业和城市建设中大量拆除原有房屋,根据国家统计局的调查,仅一九五六年北京、武汉、太原、兰州等一百七十五个城市就拆除旧房二百四十八万平方米。

三、一般房屋造价高了,影响建筑面积的增加。

四、城市房租政策和住宅管理制度很不合理,公房房租偏低,管理不善,制度不严。根据国家统计局一九五六年职工家庭收支调查,住公房的职工平均每户每月负担房租二点一元,占家庭收入的百分之二点四,占本人的工资百分之三点二。国家收回的租金,一般只达应收租金的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左右。

为了缓和职工住宅的紧张，除了整顿各种福利待遇和采取其他措施以加强控制城市人口的增长，并且根据可能适当地增建职工住宅以外，应该提倡由职工自建一些标准低的住宅。为鼓励职工自建住宅，可以由本企业事业单位给以一定数目的贷款，分期扣还。同时，还必须适当地提高职工住公房的收费标准。租金一般地应该包括折旧、维护、管理三项费用。据财政部按照三项费用计算，一般平均每平方米每月应收租金约为零点二五元。按照每户十六至二十平方米的居住面积计算，每月房租四至五元，一般占职工工资收入百分之六至十，平均百分之八左右。调整公房房租办法，拟分步骤进行。第一步，凡未收租的一律收租，收租太少的应该提高，最高不超过平均每平方米零点二元的水平。第二步，达到应收租金的水平，什么时候开始实行，待第一步行之有效一年后再议。对住民房的职工房租补贴，也应该采取措施，逐步取消。关于调整房租的具体做法，可以由各省市人民委员会自己决定。

住房不够的问题，需要经过相当长时期的努力，才能逐步解决。必须制定严格的房屋分配制度和管理制度，并且运用群众路线的办法，依靠群众力量来监督这些制度的贯彻执行。

#### 第四，企业和机关福利费。

目前企业和机关福利费都是按照工资总额的比例提成的。由于企业、机关职工人数和平均工资水平不同，常常有苦乐不均的现象。关于企业、机关提取福利费的办

法：以及企业的其他福利待遇的整顿（如食堂、托儿所、交通费补贴，困难补助等），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需要由有关部门进一步研究，才能提出整顿方案。关于解决福利问题，还应该在职工中提倡依靠集体力量，实行互助互济的办法。

为了便于地方政府统一调剂同一地区各类企业的职工福利待遇，举办地区性的集体福利事业，原则上应该变夏中央各产业部门由企业奖励金中提成的办法，改由地方提成或者分成。至于具体的提成或者分成的比例，将由财政部会同各有关产业部门研究，并且提出方案。

根据《周恩来经济文选》刊印

## 注 释

〔1〕 八大建议是指《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一九五八——一九六二）的建议》，已收入本书第九册。

# 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 的讲话提纲

(一九五七年十月九日)

毛 泽 东

这次会议的评价：

明确方针，交流经验，统一意志。

我们的革命如此丰富，工作进展异常迅速。不论革命工作、建设工作都是如此。

最好每年开一次这样的会议。

整风：

大胆的放，彻底的放，坚决的放。

大胆的改，彻底的改，坚决的改。

一九五七年中国革命创造了一个最革命最生动最民主的群众斗争形式，就是大鸣大放、大辩论和大字报。革命的内容找到了适合自己发展的形式。从此无论大是大非、小是小非的问题，无论是革命的问题、建设的问题，都可以用辩论的形式去迅速地解决。发挥群众的主动性、责任心，克服领导者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领导与群众就容易打成一片了。从此形成传统，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民主，在此基础上建立巩固的集中制，建立巩

固的对反动派和坏人的专政。

农业：

四十条<sup>〔1〕</sup>大约几天之后，即可改好发出，请你们在农村中组织一次很好的鸣放辩论，发扬正气，驳倒歪风。

省、地、县、区、乡、社都要搞农业规划。“全面规划，加强领导，书记动手，全党办社”。

整风生产两不误。又要领导整风，又要领导生产，生产就要有规划。

何时可以做好一个长远规划？已有几年经验了，今冬明春是否可以做好？明年五一以前做好？或者明年做好？只有十年了，要完成“四、五、八”<sup>〔2〕</sup>。

六级规划都要在农村中鸣放辩论，是否要分期分批，不然恐农民吃不消。

粮食有了底了，以后将好办得多，准备对付大荒年。

国家积累外，合作社积累和家庭积累，均很重要。湖南办法：总产值（30亿元）扣20%为生产费（6亿元），其中以20%为基建费（1.2亿元），按照社章抽5%的公积金、公益金和管理费在外。管理费必须缩小到1%。

积累丰歉不同，以丰补歉。

全国每个人都要有大志，远大理想目标。

要将大吃大喝、不善持家的风气转变过来，经过大鸣大辩的方法。

红白喜事中的陋习和浪费，也要经过鸣辩逐步解决，10年改革完毕，是否可能？

振起精神，一定要灭掉四害，乐昌县岐乐社的经

验<sup>[3]</sup>立即推广到全国。两年试点,五年突击,三年扫尾,全国基本上变成四无国。

人口问题:三年试点,三年推广,四年普做,达到计划生育,是否可能?

工农商学的综合计划,完全必要,浙江文件<sup>[4]</sup>,值得一阅。

红安县的经验<sup>[5]</sup>值得注意,各级领导办试验田。我们不但政治要摸底,技术必须摸底,业务必须摸底。

也是十年计划,十年内必须精通工业、农业各种技术业务,将自己和许多人都变得“又红又专”,基本上完成建立无产阶级知识分子队伍的伟大任务。对此,各级均要有计划。“十年树人”极为必要,非此不能建立社会主义。加上过去八年,十八年树人,估计可以基本造成马克思主义的工人阶级的专家队伍。往后是扩大加深,再有十年,到第五个五年计划,形势就更不同了。争取以28年基本上达到苏联40年的水平,是否可能?

在以重工业为中心任务的条件下,实行工业与农业同时并举,逐步建立现代化的工业与现代化的农业。

两种方法:都可达到目的,一种慢一点、差一点,一种快一点、好一点。

实事求是的合乎实际的多快好省,反对主观主义的所谓多快好省。

党委还是促进委员会,不是促退委员会。有些暂时的局部的促退正是为了促进。

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与资本主义道



路的矛盾是主要矛盾。

千方百计，想尽一切办法。

厉家寨〔6〕，每一社。

省、县、地的规划。

每年开一次三级干部会。

黄敬、彭真(只改一个字)、韶关三发言。〔7〕

军队要整风。

将来农业粮食生产要亩产800斤，1000斤，2000斤。21世纪初。

苏联、东欧、中国，主要矛盾。

振作精神，下苦功学习，十年学会马列、技术科学、哲学、文学、艺术学、新闻学、教育学。打纸牌、下棋、看电影、跳舞也要一点，但不可着迷，把主要精力放在工作、学习二件上，玩是需要的，但是第三位。人的脑力能够有很大的发展。肖楚女、齐白石、高尔基、玄奘、惠能、梁鸿、富兰克林为例。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 注 释

〔1〕 指《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四十条，见本册第633页。这个纲要(修正草案)先后在一九五七年十月十三日毛泽东召集的最高国务会议，以及十月十六日举行的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八十次会议和全国政协常委会第四十六次会议联席会议上，进行了讨论和修改，十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公布了这一纲要(修正草案)。

〔2〕《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规定：从一九五六年开始，在十二年内，粮食每亩平均年产量，在黄河、秦岭、白龙江、黄河（青海境内）以北地区，由一九五五年的一百五十多斤增加到四百斤；黄河以南、淮河以北地区，由一九五五年的二百零八斤增加到五百斤；淮河、秦岭、白龙江以南地区，由一九五五年的四百斤增加到八百斤。“四、五、八”是上述粮食平均亩产指标的简称。

〔3〕指中共韶关地委第一书记林铭勋在《一个搞好卫生工作人对两旺的农业社》的发言中介绍的广东省乐昌县岐乐农林生产合作社广泛发动群众，采取各种措施，积极开展爱国增产卫生运动的经验。

〔4〕指中共浙江省委一九五七年五月四日关于从发展农业生产看社会主义建设的协作问题给毛泽东并中央、上海局的报告。报告说，从浙江省的情况看，要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提出的在今后十年内（从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六年）粮食单位面积产量达到八百斤的指标，除主要依靠农业合作社的力量外，还必须从工业、商业、文化教育方面的密切协作中来求得解决。在工业方面，要求解决发展农业生产的化肥问题、农业机械化问题、合作社发展副业门路等问题；在财政贸易方面，要求解决农产品价格尤其是粮价偏低的问题、商业对农业的投资等问题；在文化教育方面，要求解决普及问题尤其是农业科学的研究和普及问题、国家的教育计划按照农村情况作适当调整等问题。这些问题，在浙江有的已经着手解决，有的正在研究解决的办法，有的需要中央在政策和体制上作相应的调整、变化来解决。中共中央办公厅一九五七年十月九日将这个报告印发给参加中共八届三中全会的同志，同时印发了毛泽东对这一报告的两个批语。第一个批语印在报告的封面上：“农、工、商、学四业必须协作，值得一阅。

毛泽东 一九五七年十月九日”。第二个批语印在报告第一页的标题下：“此件是我在华东五省一市一九五七年四月杭州会议上在听了浙江省委的口头报告之后，觉得很有意思，因此请他们写成书面〔报告〕给我。他们就在一九五七年五月四日写成寄来了。毛泽东 一九五七年十月九日。”

〔5〕指中共黄冈地委第一书记姜一一九五七年九月写的《合作化改变了老苏区的面貌，红安县一九五七年获得了社社增产，样样丰收》的报告所介绍的经验。报告说，为了切实领导好农业生产，红安县县区干部深入农业社和生产队，参加生产，领导生产，同时亲手试办高额丰产的试验田，进行典型示范，使领导干部开始懂得农业生产知识，逐渐由外行变成了内行，克服了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改变了过去空谈政治的领导作风；农业技术干部通过试验，也开始学会了走群众路线和农业社的经营管理，更好地推广了农业技术；农民从高额丰产的实验中，也提高了对科学技术的认识，克服了保守思想，积极改进了对农业社的经营管理。总之，通过办试验田，使党的领导、技术改革和农业社的管理三个工作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推动了农业合作社生产的发展。

〔6〕厉家寨，乡名，属山东省莒南县。该乡的大山农业社以同极端恶劣的自然环境作艰苦斗争而闻名全国，被毛泽东称为“愚公移山，改造中国”的一个好例。

〔7〕指国家技术委员会主任黄敬一九五七年十月八日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作的《我国农业机械化问题》的发言，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彭真同日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关于精简、整风、政法等问题的发言和中共部关地委第一书记林铭勋作的《一个搞好卫生工作人财两旺的农业社》的发言。

## 做革命的促进派\*

(一九五七年十月九日)

毛泽东

这次会议开得很好。这样扩大的中央全会，有省委和地委的同志参加，实际是三级干部会，对于明确方针，交流经验，统一意志，有好处。

这样的会，恐怕是有必要一年开一次。因为我们这么一个大国，工作复杂得很。去年这一年没有开，就吃亏，来了一个右倾。前年来了一个高涨，去年就来了一个松劲。当然，去年开“八大”了，也没有时间。再开这样的会议，可以掺少数县委书记和一些大城市的若干区委书记，比如再加百把人是可以的。我建议各省也开一次全省性的三级或者四级干部会议，掺一部分合作社的干部，把问题扯清楚。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讲一讲整风。要大胆地放，彻底地放，坚决地放；要大胆地改，彻底地改，坚决地改。我们要有这样的决心。那末，还要不要加一个反右派，大大地反？可以不加。因为反右派是上了轨道的，有些地方已经结束了。现在

\* 这是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

的重点是基层的放，基层的改，就是县、区、乡三级的鸣放和整改。中央和省市一级，有些部门放还是要放，但重心是改的问题。

今年这一年，群众创造了一种革命形式，群众斗争的形式，就是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现在我们革命的内容找到了它的很适合的形式。这种形式，在过去是不能出现的。因为过去是打仗，五大运动，三大改造，这样从容辩论的形式不能产生。那个时候，从容辩论，摆事实，讲道理，搞它一年，不许可。现在许可了。我们找到了这个形式，适合现在这个群众斗争的内容，适合现在阶级斗争的内容，适合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抓住了这个形式，今后的事情好办得多了。大是大非也好，小是小非也好，革命的问题也好，建设的问题也好，都可以用这个鸣放辩论的形式去解决，而且会解决得比较快。左派不仅同中间派一道鸣放辩论，而且完全公开地同右派一道鸣放辩论，在农村里头同地主、富农一道鸣放辩论。公开登报，不怕出“丑”，什么“党天下”呀，什么“共产党要让位”呀，“下轿”呀。刚刚“上轿”，右派要我们“下轿”。这种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形式，最适合发挥群众的主动性，提高群众的责任心。

我们党有民主的传统。没有民主的传统，不可能接受这样的大鸣大放，大争大辩，大字报。延安整风的时候，写笔记，自己反省，互相帮助，七、八个人一个小组，搞了几个月。我接触的人都感谢那一次整风，说改变主观主义就是那一次开始。土地改革的时候，有事同群众一道

商量，打通思想。我们军队里头，连长给战士们盖被子，同战士很平等地友谊地谈话。延安整风，土地改革，军队里头的民主生活，还有“三查三整”，后头的“三反”“五反”，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等，这中间都有丰富的民主形式。但是，这样的大鸣、大放、大争、大辩，然后还要搞和风细雨，商量，启发，这种形式只有现在这个时候才能产生。找到了这种形式，对于我们的事业会有很大的好处，克服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命令主义（所谓命令主义，就是打人骂人，强迫执行），领导干部同群众打成一片，就容易做到了。

我们的民主传统今年是一个很大的发展，以后要把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这种形式传下去。这种形式充分发挥了社会主义民主。这种民主，只有社会主义国家才能有，资本主义国家不可能有。在这样的民主基础上，不是削弱集中，而是更加巩固了集中制，加强了无产阶级专政。因为无产阶级专政要靠广大的同盟军，单是无产阶级一个阶级不行。中国无产阶级数量少，只有一千多万人，它要靠几亿人口的贫农、下中农、城市贫民、贫苦的手工业者和革命知识分子，才能实行专政，不然是不可能的。我们现在发动了他们的积极性，无产阶级专政就巩固起来了。

第三点，农业。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已经作了修改，不久就可以发出去。请同志们在农村中很好地组织一次辩论、讨论。我问了一些同志，地区一级要不要作农业计划？他们说也要作。区一级要不要作？说也要作。乡要

不要作？说也要作。社也要作。那末，就有这么几级：一个省，一个地，一个县，一个区，一个乡，一个社，六级。请你们注重抓紧搞一搞这个农业规划。规划、计划是一回事，讲成了习惯，就叫规划也好。要坚持全面规划，加强领导，书记动手，全党办社。好像去年下半年就不是全党办社了，书记不大动手了。今年，我们要坚持这样搞。

规划究竟什么时候可以作好？我问了一些同志，有些地方已经作好了，有些地方还没有完全作好。现在着重的是省、地、县这三级，是不是在今冬或者明春可以作好？如果作不好，明年这一年总要作好，而且六级都要作好。因为我们有几年经验了，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也差不多作好了。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省的规划和其他各级的规划，都要拿到农村去讨论。但是，七个规划一起讨论太多了，还是要分期分批拿到群众中去鸣放、辩论。这是讲长远规划。作了，将来不适合怎么办？再有几年经验，还要修改的。比如“四十条”，过几年还要修改。不可能不改。我看大概是三年一小改，五年一大改。有一个规划总比没有好。一共十二年，过去了两年，只有十年了，再不抓紧，“四十条”中规定的三种地区分别达到亩产粮食四百斤、五百斤、八百斤的计划指标，就有落空的危险。抓紧是可能完成的。

我看中国就是靠精耕细作吃饭。将来，中国要变成世界第一个高产的国家。有的县现在已经是亩产千斤了，半个世纪搞到亩产两千斤行不行呀？将来是不是黄河以北亩产八百斤，淮河以北亩产一千斤，淮河以南亩产两千

斤？到二十一世纪初达到这个指标，还有几十年，也许不要那么多时间。我们靠精耕细作吃饭，人多一点，还是有饭吃。我看一个人平均三亩地太多了，将来只要几分地就足够吃。当然，还是要节制生育，我不是来奖励生育。

请同志们摸一下农民用粮的底。要提倡勤俭持家，节约粮食，以便有积累。国家有积累，合作社有积累，家庭有积累，有了这三种积累，我们就富裕起来了。不然，统统吃光了，有什么富裕呀？

今年，凡是丰收的地方，没有受灾的地方，应当提高一点积累。以丰补歉，很有必要。有的省的合作社，除公积金（百分之五）、公益金（百分之五）、管理费以外，生产费占总产值的百分之二十，其中基本建设费用又占生产费的百分之二十。我跟别的省的同志商量，他们说基本建设费用恐怕多了一点。我今天跟你们谈的，都是建议性质，可行则行，不可行则不行，而且各省各县不要一律，你们去研究一下。合作社的管理费，过去有些地方占的比例太大，应当缩小到百分之一。所谓管理费，就是合作社干部的补贴和办公费。要缩小管理费，增加农田基本建设费用。

中国人要有志气。我们应当教育全国城市、乡村的每一个人，要有远大的目标，有志气。大吃、大喝，统统吃光、喝光，算不算一种志气呢？这不算什么志气。要勤俭持家，作长远打算。什么红白喜事，讨媳妇，死了人，大办其酒席，实在可以不必。应当在这些地方节省，不要浪费。这是改革旧习惯。把这个习惯改过来，要通过大鸣



大放，也许是小鸣小放，争一番。还有赌博，这样的问题过去是没有法子禁止的，只有大鸣大放，经过辩论，才能改过来。我看，改革旧习惯也要列入规划。

还有一个除四害，讲卫生。消灭老鼠、麻雀、苍蝇、蚊子这四样东西，我是很注意的。只有十年了，可不可以就在今年准备一下，动员一下，明年春季就来搞？因为苍蝇就是那个时候出世。我看还是要把这些东西灭掉，全国非常讲卫生。这是文化，要把这个文化大为提高。要来个竞赛，硬是要把这些东西灭掉，人人清洁卫生。各省也可以参差不齐，各县也可以参差不齐，将来横直看那个是英雄。中国要变成四无国：一无老鼠，二无麻雀，三无苍蝇，四无蚊子。

计划生育，也来个十年规划。少数民族地区不要去推广，人少的地方也不要去推广。就是在人口多的地方，也要进行试点，逐步推广，逐步达到普遍计划生育。计划生育，要公开作教育，无非也是来个大鸣大放、大辩论。人类在生育上头完全是无政府状态，自己不能控制自己。将来要做到完全有计划的生育，没有一个社会力量，不是大家同意，不是大家一起来做，那是不行的。

还有综合计划问题。刚才我讲的是农业计划，还有工业计划，商业计划，文教计划。工、农、商、学的综合计划，完全有必要，兜起来互相配合。

种试验田的经验，值得普遍推广。县、区、乡和合作社的领导干部，都搞那么一小块田，试验能不能达到高产，用什么方法达到高产。

我们要摸农业技术的底。搞农业不学技术不行了。政治和业务是对立统一的，政治是主要的，是第一位的，一定要反对不问政治的倾向；但是，专搞政治，不懂技术，不懂业务，也不行。我们的同志，无论搞工业的，搞农业的，搞商业的，搞文教的，都要学一点技术和业务。我看也要搞一个十年规划。我们各行各业的干部都要努力精通技术和业务，使自己成为内行，又红又专。所谓先专后红就是先白后红，是错误的。因为那种人实在想白下去，后红不过是一句空话。现在，有些干部红也不红了，是富农思想了。有一些人是白的，比如党内的右派，政治上是白的，技术上又不专。有一些人是灰色的，还有一些人是桃红色的。真正大红，像我们的五星红旗那样的红，那是左派。但是单有红还不行，还要懂得业务，懂得技术。现在有许多干部就是一个红，就不专，不懂业务，不懂技术。右派说我们不能领导，“外行不能领导内行”。我们驳右派说，我们能领导。我们能者是政治上能。至于技术，我们有许多还不懂，但那个技术是可以学懂的。

无产阶级没有自己的庞大的技术队伍和理论队伍，社会主义是不能建成的。我们要在这十年内（科学规划也是十二年，还有十年），建立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队伍。我们的党员和党外积极分子都要努力争取变成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各级特别是省、地、县这三级要有培养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计划，不然，时间过去了，人还没有培养出来。中国有句古话，“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百年树人，减少九十年，十年树人。十年树木是不对的，在南方要二

十五年，在北方要更多的时间。十年树人倒是可以的。我们已经过了八年，加上十年，是十八年，估计可能基本上造成工人阶级的有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专家队伍。十年以后就扩大这个队伍，提高这个队伍。

讲到农业与工业的关系，当然，以重工业为中心，优先发展重工业，这一条毫无问题，毫不动摇。但是在这个条件下，必须实行工业与农业同时并举，逐步建立现代化的工业和现代化的农业。过去我们经常讲把我国建成一个工业国，其实也包括了农业的现代化。现在，要着重宣传农业。这个问题小平同志也讲了。

第四点，两种方法。做事情，至少有两种方法：一种，达到目的比较慢一点，比较差一点；一种，达到目的比较快一点，比较好一点。一个是速度问题，一个是质量问题。不要只考虑一种方法，经常要考虑两种方法。比如修铁路，选线路要有几种方案，在几条线路里头选一条。可以有几种方法来比较，至少有两种方法来比较。比如，大鸣大放，还是小鸣小放？要大字报，还是不要大字报？这两种方法究竟那一种好？这种问题可多啦，就是放不开。北京三十四个高等学校，一个都放不开，没有一个爽爽快快的。因为这是放火烧身的问题呀！要放开，需要有充分的说服，而且要有一种相当的压力，就是公开号召，开许多会，将起军来，“逼上梁山”。过去革命，这种方法，那种方法，这种政策，那种政策，党内有过很多不同意见，结果我们采取了一种比较适合情况的政策，所以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比较从前那几个时期都进

步。建设的方针也是可以这样，可以那样，我们也要采取比较适合情况的方针。

苏联的建设经验是比较完全的。所谓完全，就是包括犯错误。不犯错误，那就不算完全。学习苏联，并不是所有事情都硬搬，教条主义就是硬搬。我们是在批评了教条主义之后来提倡学习苏联的，所以没有危险。延安整风以后，“七大”以后，我们强调学习苏联，这对我们是不吃亏的，是有利的。在革命这方面，我们是有经验的。在建设这方面，我们刚开始，只有八年。我们建设的成就是主要的，但不是没有错误。错误将来还要犯，希望少犯一点。我们学习苏联，要包括研究它的错误。研究了它错误的那一方面，就可以少走弯路。我们是不是可以把苏联走过的弯路避开，比苏联搞的速度更要快一点，比苏联的质量更要好一点？应当争取这个可能。比如钢的产量，我们可不可以用三个五年计划或者更多一点的时间，达到两千万吨？经过努力，是可能的。那就要多开小钢厂。我看那个年产三、五万吨的钢厂，七、八万吨的钢厂要多开，很有用处。再有中等的，三、四十万吨的钢厂，也要开。

第五点，去年这一年扫掉了几个东西。一个是扫掉了多、快、好、省。不要多了，不要快了，至于好、省，也附带扫掉了。好、省我看没有那个人反对，就是一个多、一个快，人家不喜欢，有些同志叫“冒”了。本来，好、省是限制多、快的。好者，就是质量好；省者，就是少用钱；多者，就是多办事；快者，也是多办事。这个口号本身就限制了

它自己，因为有好、省，既要质量好，又要少用钱，那个不切实际的多，不切实际的快，就不可能了。我高兴的就是在这个会议上有个把同志讲到这个问题。还有，在报纸上我也看见那么一篇文章，提到这个问题。我们讲的是实事求是的合乎实际的多、快、好、省，不是主观主义的多、快、好、省。我们总是要尽可能争取多一点，争取快一点，只是反对主观主义的所谓多、快。去年下半年一股风，把这个口号扫掉了，我还想恢复。有没有可能？请大家研究一下。

还扫掉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这个“四十条”去年以来不吃香了，现在又“复辟”了。

还扫掉了促进委员会。我曾经谈过，共产党的中央委员会，各级党委，还有国务院，各级人民委员会，总而言之，“会”多得很，其中主要是党委会，它的性质究竟是促进委员会，还是促退委员会？应当是促进委员会。我看国民党是促退委员会，共产党是促进委员会。去年那股风扫掉的促进委员会，现在可不可以恢复？如果大家说不赞成恢复，一定要组织促退委员会，你们那么多人要促退，我也没有办法。但是，从这次会议看，大家都是想要促进，没有一篇演说是讲要促退的。要促退我们的，是那个右派章罗同盟。至于某些东西实在跑得快了，实在跑得不适合，可以有暂时的、局部的促退，就是要让一步，缓一步。但是，我们总的方针，总是要促进的。

第六点，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

主要矛盾。我们现在的任务跟过去不同了。过去主要是无产阶级领导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那个任务已经完结了。那末，现在的主要矛盾是什么呢？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革命的锋芒是对着资产阶级，同时变更小生产制度即实现合作化，主要矛盾就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概括地说，就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矛盾。“八大”的决议没有提这个问题。“八大”决议上有那么一段，讲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种提法是不对的。<sup>①</sup>我们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全国胜利以后，国内主要矛盾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国外是中国和帝国主义的矛盾。后头没有公开提，但是事实上在那里做了，革命已经转到社会主义革命，我们干的就是社会主义革命这件事。三大改造是社会主义革命，主要是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已基本完成。这是尖锐的阶级斗争。

去年下半年，阶级斗争有过缓和，那是有意识地要缓和一下。但是，你一缓和，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地主、富农以及一部分富裕中农，就向我们进攻，这是今年的事。我们缓和一下，他进攻，那也好，我们取得主动。正像人民日报一篇社论说的，“树欲静而风不止”。他要吹风嘛！他要吹几级台风。那末好，我们就搞“防护林带”。这就是反右派，就是整风。

整风有两个任务：一个任务是反右派，包括反资产阶级思想；一个任务是整改，整改里头也包含两条路线斗

争。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是资产阶级的东西，我们党内存在这三个东西，这个帐要挂在资产阶级身上。一两百年以后，还可不可以挂呢？那个时候恐怕不好挂了。那个时候有没有官僚主义、主观主义？还是有的，那就挂在落后帐上。社会上总有左、中、右，总有先进的、中间的、落后的。那时你犯了官僚主义、主观主义，那你就落后。

整风运动要搞到明年五月一日，还有这么多时间。五月一日以后，是不是又要缓和一下呢？我看又要缓和一下。缓和是不是叫右倾呢？我看不叫右倾。好比开会，尽开，白天开，晚上也开，一连开它半年，我看很多人就不见了。所以，工作要按照情况，有时候紧张，有时候缓和。去年，我们取得那么大的胜利，人家服服帖帖，敲锣打鼓，你不缓和一下，那个时候难得说，理由不充分。我们说基本上解决了所有制问题，并没有说完全解决了。阶级斗争并没有熄灭。所以不是原则的让步，而是情况需要缓和一下。

我看整风搞到明年五月一日，下半年就不再搞了。农村里头明年下半年是不是再搞一次，辩论一次，看那个时候需要不需要，明年再议。后年是要搞一次的。假使我们后年也不搞，几年不搞，那些老右派，新右派，现在出来的右派，又要蠢蠢欲动；还有些中右分子，中间派，甚至于有些左派会要变。世界上有那么怪的人，只要你松松劲，松那么相当的时间，右倾情绪就要起来，不好的议论，右派言论都要来的。我们军队里头要经常进行三大纪律、

八项注意的教育。只要你空几个月不搞，就松松散散了。一年要鼓几次气。新兵来了，要进行教育。就是老兵，老干部，只要你不整风，他的思想也要起变化。

这里顺便说一点我们同苏联的不同意见。首先，在斯大林问题上，我们同赫鲁晓夫有矛盾。他把斯大林搞得那么不像样子，我们不赞成。因为搞得那么丑嘛！这就不是你一国的事，这是各国的事。我们天安门前挂斯大林像，是符合全世界劳动人民愿望的，表示了我们同赫鲁晓夫的基本分歧。斯大林本身，你也要给他三七开嘛！斯大林的成绩算它七分，错误算它三分。这也未必见得准确，错误也许只有两分，也许只有一分，也许还稍微多一点。总而言之，斯大林的成绩是主要的，缺点、错误是次要的。这一点，我们同赫鲁晓夫有不同意见。

还有和平过渡的问题，我们同赫鲁晓夫他们有不同的意见。我们认为，无论那个国家的无产阶级政党，要有两条：第一条，和平；第二条，战争。第一条，共产党向统治阶级要求和平转变，学列宁在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之间那个时候所提的口号。我们也向蒋介石提过谈判和平的问题。这个口号，在资产阶级面前，在敌人面前，是防御的口号，表示我们要和平，不要战争，便于我们争取群众。这是个主动的口号，是个策略性质的口号。但是，资产阶级决不会自动地交出政权，它要使用暴力。那末，第二条，你要打，你打了第一枪，我只好打。武装夺取政权，这是战略口号。你说一定是和平过渡，那跟社会党就没有差别。日本社会党就是这样，它只有一条，就是永远不



搞暴力。全世界的社会党都是这样。无产阶级政党一般地还是要有两条：君子动口不动手，第一条；第二条，小人要动手，老子也动手。这样的提法，就没有弊病，都管到了。不然，就不行。现在有些国家的党，比如英国共产党，就是只提和平过渡的口号。我们跟英国党的领导人谈，老是谈不通。他们当然骄傲了，他说和平过渡怎么是你赫鲁晓夫提的？我早已经提了！

此外，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个方针，苏联同志不理解。我们讲的是社会主义范围的、人民内部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反革命不在内。当然，人民内部可以分化，一部分变为敌人。比如右派，过去是人民，现在这些人，我看是三分之一的人民，三分之二的反革命。是不是剥夺他们的选举权？除开个别的要法办、劳改，那要剥夺选举权外，一般的以不剥夺为好。有的人还可以让他当政协委员，横直政协搞个千把人都可以。右派，形式上还在人民内部，但实际上是敌人。我们公开宣布，他们是敌人，我们同他们的矛盾是敌我矛盾，因为他们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反对无产阶级专政。总之，不合乎六条标准嘛！这是毒草。人民内部不管那一天总要出一点毒草的。

最后一点，我们要振作精神，下苦功学习。下苦功，三个字，一个叫下，一个叫苦，一个叫功，一定要振作精神，下苦功。我们现在许多同志不下苦功，有些同志把工作以外的剩余精力主要放在打纸牌、打麻将、跳舞这些方面，我看不好。应当把工作以外的剩余精力主要放在学

习上，养成学习的习惯。学什么东西呢？一个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一个是技术科学，一个是自然科学。还有文学，主要是文艺理论，领导干部必须懂得一点。还有什么新闻学、教育学，这些学问也要懂得一点。总而言之，学问很多，大体要稍微摸一下。因为我们要领导这些事情嘛！我们这些人叫什么家呀？叫政治家。不懂这些东西，不去领导，怎么行呢？每个省都有报纸，过去是不抓的，都有文艺刊物、文艺团体，过去也是不抓的，还有统一战线、民主党派，是不抓的，教育也是不抓的。这些东西都不抓，结果，好，就是这些方面造反。而只要一抓，几个月情况就变了。罗隆基说，无产阶级的小知识分子怎么能领导小资产阶级的大知识分子？他这个话不对。他说他是小资产阶级，其实他是资产阶级。无产阶级的“小知识分子”就是要领导资产阶级的大知识分子。无产阶级有一批知识分子为它服务，头一个就是马克思，再就是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再就是我们这些人，还有许多人。无产阶级是最先进的阶级，它要领导全世界的革命。

根据《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刊印

## 注 释

〔1〕这段话与原始记录有出入。当时毛泽东是这样讲的：“社会主义革命的锋芒是对资产阶级，同时变更小生产的制度，就是合作化，主要矛盾是这个东西，就是集体主义、个人主义，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概括地说，就是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矛盾，社会矛盾。八大的决议没有提这个东西。但是八大的决议并没有否定阶级斗争，并没有否定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农民需要改造，它是分别在别的地方讲的。在写那一段的时候，讲主要矛盾是先进同落后的矛盾，说是生产力现在落后，同人民要求先进，人民的需要这个矛盾。那个时候有那个时候的原因。我们在二中全会提出国内主要矛盾是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国外是帝国主义同我们（的矛盾——编者）以来，后头为什么没有提了？就是因为事实上在那里做了，因为革命已经转移到社会主义革命了。社会主义革命，我们干的就是这件事，也可以提了，没有提，我们干了革命，没有提，也没有害事。”

# 中共中央关于《划分 右派分子的标准》的通知

(一九五七年十月十五日)

上海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央各部委各党组,中直党委,国家机关党委,总政治部(此件可发至县委和相当于县级的党组织):

自反右派斗争开始以来,不少地方和部门分别拟定了一些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并要求中央予以审查批准。考虑到斗争中的实际需要,中央认为有必要制定一个统一的标准,以免各单位在划分右派分子的时候有畸轻畸重的地方。现在将经过中央讨论通过的《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发给你们,请即下达到一切进行反右派斗争的单位,予以认真研究,在划分右派分子的时候即以此件为标准。同时望注意:

(一)全国反右派斗争一般是进行得健康的,所划的右派分子,一般是适当的,但是也有划多了和划少了的情况。而在运动进到深入阶段,在切实纠正了温情主义右倾情绪以后,一些单位把右派的标准放得宽了一些,以至多划了一部分右派的情况,比较更需要引起注意。无论划多了或者划少了,都应该按照正确的标准及时地实事求是地予以改正。但是在右派划得多了,需要改正的单

位，必须注意保护群众和积极分子的热情和正义感，不要使人产生“反右派斗争过火了”的错误印象。有些中右分子有过不利于社会主义的言行，但是不够右派，如果当作右派斗争了，现在不要当众宣布对他的批判是错了，因为既有错误言行就应该批判。但是应在内部改划为中右分子，按照中右分子对待，并注意多加教育争取，到适当时机可以宣布因情节轻微已有悔改，脱掉他们的右派帽子。

(二)为了正确地划分右派分子，达到既不多划又不少划的目的，除了要有适当的标准，还要有适当的审查批准手续。凡是各单位确定为右派分子的名单，必须报告县一级或县一级以上的党的领导机关审查批准。高级知识分子、重要民主人士中的右派分子和其他有特殊情况的右派分子的名单，必须报告省一级或省一级以上的党的领导机关审查批准。

(三)上级领导机关除必须认真地审查所属单位上报的右派分子的名单外，还必须教育党员和群众十分重视对于实际情况的认真研究和具体分析，力戒浮夸和片面性。同时，还必须经常主动地细心地抽查和调阅所属单位右派分子的详细材料，及时纠正其中偏宽偏严的错误，并且对于极右分子、一般右派分子和中右分子的界限举出具体的人物和材料作为实例，切实帮助下级掌握正确划分的标准。

中 央

一九五七年十月十五日

## 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

### (一)

凡言论、行动属于下列性质者，应划为右派分子：

(1)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反对城市和农村中的社会主义革命，反对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关于社会经济的基本政策(如工业化、统购统销等)；否定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坚持资本主义立场，宣扬资本主义制度和资产阶级剥削。

(2)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反对民主集中制。攻击反帝国主义的斗争和人民政府的外交政策；攻击肃清反革命分子的斗争；否定“五大运动”的成就；反对对资产阶级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改造；攻击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人事制度和干部政策；要求用资产阶级的政治法律和文化教育代替社会主义的政治法律和文化教育。

(3)反对共产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领导地位。反对共产党对于经济事业和文化事业的领导；以反对社会主义和共产党为目的而恶意地攻击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机关和领导人员、污蔑工农干部和革命积极分子、污蔑共产党的革命活动和组织原则。

(4)以反对社会主义和反对共产党为目的而分裂人民的团结。煽动群众反对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煽动工人和农民的分裂；煽动各民族之间的分裂；污蔑社会主义阵

营,煽动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人民之间的分裂。

(5)组织和积极参加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共产党的小集团;蓄谋推翻某一部门或者某一基层单位的共产党的领导;煽动反对共产党、反对人民政府的骚乱。

(6)为犯有上述罪行的右派分子出主意,拉关系,通情报,向他们报告革命组织的机密。

## (二)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应划为极右分子:

(1)右派活动中的野心家、为首分子、主谋分子和骨干分子。

(2)提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纲领性意见,并积极鼓吹这种意见的分子。

(3)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特别恶劣、特别坚决的分子。

(4)在历史上一贯反共反人民,在这次右派进攻中又积极进行反动活动的分子。

## (三)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其错误应予批评纠正,但不应划为右派分子:

(1)在根本立场上并不反对社会主义和党的领导,而只是对于局部性的工作制度,局部性的不属于根本原

则的政策,工作中的问题,学术性的问题,共产党的个别组织,个别工作人员表示不满,提出批评的人,即使意见错误,措词尖锐,也不应划为右派分子;同样,在根本立场上并不反对社会主义和党的领导,而只是在思想意识上有某些错误的人,也不应划为右派分子。

(2)有过类似右派的思想,但是并未发表过或散布过,而且已经认为错误、自动检讨出来的人,或者偶然讲过类似右派的话,现在已经承认错误,而在历史上一贯不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人,不应划为右派分子。

(3)对于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制度或共产党的领导发表了错误的言论,但是并未积极宣传,事实证明不是出于敌意,经过指正表示愿意转变的人,不应划为右派分子。

(4)一度盲目地附和了右派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行,或者一度被蒙蔽参加了右派小集团,或者一度被右派利用;在了解右派错误以后,迅速地站在正确立场,同右派决裂的人,不应划为右派分子。

(5)历史上曾经站在反动立场,现在也没有显著的转变,但是在右派进攻时期并未进行反动活动的人,不应划为右派分子。

(6)凡是界乎右派分子和中右分子之间的疑似分子,在尚未查出足以确定为右派分子的充分材料之前,一概不划为右派分子,并且不用斗争右派分子的方法来对待他们。

根据中共中央文件刊印



# 国务院关于统一管理 农村副业生产的通知

(一九五七年十月二十二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委员会、水产部、交通部、农业部、林业部、中央手工业管理局、全国供销合作总社：

(一)农村中的副业生产，包括副业性的林产、畜牧、渔业和运输业、手工业等等，应该都由农业生产合作社分别情况，合理地利用劳动力，采取大公经营、小公经营和个体经营的方式，加以统一安排，以利于生产的发展。各级农业部门应该负责组织各有关部门，在行政、技术管理和供销业务方面给以指导和帮助。

(二)农业生产合作社可以根据自己集体经营的各种副业生产规模的大小，分别成立副业生产队或者副业生产组，负责经营。农业合作社根据各种副业生产的特点及其与农业生产的关系，应该分别采取不同的经营办法和分配办法，可以由农业社(或者农业生产队)统一经营，统一分配，也可以由副业生产队(组)在农业社统一领导和统一安排下，独立经营，自负盈亏，但在分配时应该向农业社缴纳一定数量的公益金和公积金。实行农业、副业收入统一分配的时候，必须注意到，有些技术性比较高的副业劳动，应该根据按劳取酬的原则，给以稍高于农

业劳动的报酬，以免有些社员因为农业和副业统一分配而减少收入。

某些适合于分散经营的家庭副业，应该在农业合作社的统一安排和帮助下，由社员家庭分散经营，收益全部归个人所有。

(三)农村手工业(城市和集镇的手工业不包括在内)一般是分散的，同农业结合在一起的。在农村中单独建立手工业生产合作组织，并且从上到下集中管理的办法，实行起来，困难较多，和农民的矛盾较多，也不利于生产。因此，农村中尚未组织起来的个体手工业者和兼营手工业的农民，一般地可以根据自愿的原则，参加农业合作社，组成农业合作社的副业生产队(组)，而不要单独建立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农村中已经组织起来的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组)，可以根据自愿原则同农业生产合作社合并，作为农业合作社的副业生产组织，而不再作为县以上手工业联社的基层组织。并入农业社的手工业合作社，它原有的股金和公共积累，应该根据自愿互利的原则，充分协商，妥善处理。此外，有的手工业合作社不便于或者还不愿意同农业社合并，也可以继续作为手工业联社的基层组织。

农村中的手工业合作社，向农业合作社合并以后，它们原来同手工业联社之间，在原料供应和产品销售方面的关系，应该逐步由供销合作社接替。

对于某些技艺性较高的农村手工业，手工业管理局(处、科)仍然有责任给以技术指导。

(四)农业合作社安排副业生产(包括手工业在内)的时候,必须充分考虑到原料的来源和产品销售的可能。副业生产所需要的原料主要靠自己就地取材,属于国家统购和统一收购的物资,应该首先保证完成国家所规定的统购和收购的任务,多余的则作为本社副业生产的原料。副业产品,除了由国家统购和规定统一收购的物资种类以外,可以自产自销,但是必须严格遵守国家关于自由市场的规定;严格遵守国家的经济政策。供销合作社对于农村副业生产的原料供应和产品销售,应该尽可能地给以必要的帮助。

在某些手工业原料的集中产区,当地所生产的某些手工业原料历来就有一部或者大部是卖给外地的,当地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在发展副业生产的时候,不能把自己所生产的手工业原料垄断起来,仍然应该接受国家计划的统一安排,按照国家计划拿出一部或者大部供给外地,以免影响城镇手工业生产。

(五)农村中,有一些服务性质的行业(如理发、缝衣、阉猪、补锅、磨刀和其他零星的铁木竹器修理等等),是个人单独作业的,并不需要、也不便于集体作业。对于从事这种行业的人,他们本人和家属是否参加农业合作社,也和其他农民一样完全自愿。在他们自愿参加农业合作社以后,仍然可以按照原来的方式继续经营,而不必由社统一集中经营,并且允许他们在从事上述业务的时间以外参加社内劳动,取得报酬。至于他们从事上述业务所得的收入,除了经过全社群众协议,认为有必要交付少量公积金

和公益金的以外,其余的全部归个人,不必交社统一分配。

(六) 对于农村中的人力和畜力的运输力量(包括人力车、兽力车和船只等), 农业合作社也应该做统一的安排, 应该在不影响农业生产的条件下, 把农业生产不需要的剩余的运输力量, 投入季节性的或者常年的运输, 发展副业生产。除过去一向专门从事运输并不经营农业的运输力以外, 不要单独组织运输合作社。农业合作社可以把本社多余的运输能力和能够外出运输的季节和时间, 报告给当地的运输站, 以便统一调度运输力量, 避免运输力的浪费和运价的波动; 同时, 使农业合作社的运输力量可以成宗地承揽业务, 避免零星兜揽时的种种麻烦, 这对农业合作社也是有利的。农业合作社也可以直接同托运单位协商, 自由承揽运输业务。

最后, 农村副业生产的领导和管理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 牵涉的方面很多。在农村副业生产由农业合作社分别情况统一安排以后, 各级农业部门以及林业、水产、手工业、供销合作和交通运输等有关部门, 必须分工合作, 根据上述的原则, 随时协商处理所遇到的种种具体问题, 共同努力促进农村副业生产的发展。

以上通知未尽事宜, 各地可以根据当地具体情况, 根据上述原则, 作出若干具体补充规定。在少数民族地区, 更应该根据当地民族的生产特点, 作出具体的补充规定。

国务院

一九五七年十月二十二日

根据国务院文件刊印

# 中华人民共和国 治安管理处罚条例

(一九五七年十月二十二日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八十一次会议通过)

**第一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四十九条第十二项和第一百条规定的精神,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扰乱公共秩序、妨害公共安全、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损害公私财产,情节轻微,尚不够刑事处分,依照本条例应当受到处罚的行为,是违反治安管理行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外国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的违反治安管理行为,都依照本条例处理。

**第三条** 违反治安管理的处罚分为下列三种:

一、警告。

二、罚款:五角以上,二十元以下;加重处罚不得超过三十元。

罚款在裁决后五日内交纳;过期不交纳的,改处拘留。

三、拘留:半日以上,十日以下;加重处罚不得超过十五日。

在拘留期间,被拘留人的伙食费由自己负担;不能交纳伙食费的,用劳动代替。

**第四条** 实行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用具，必须没收的，应当没收。

由于违反治安管理行为所得的财物，应当没收。

上述用具和财物，除违禁物品外，另有原主的，退还原主。

**第五条** 有下列扰乱公共秩序行为之一的，处十日以下拘留、二十元以下罚款或者警告：

一、结伙打架的；

二、扰乱车站、码头、民用航空站、公园、商场、娱乐场、展览会、运动场或者其他公共场所的秩序，不听劝阻的；

三、扰乱国家机关办公秩序，不听劝阻的；

四、拒绝、阻碍国家治安管理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尚未达到暴力抗拒程度的；

五、损毁国家机关尚在发生效力中的布告、封印的；

六、污损名胜古迹或者有政治纪念意义的建筑物的；

七、出售、出租业经取缔的反动、淫秽、荒诞的书刊、画册、图片的；

八、违反政府取缔娼妓的命令，卖淫或者奸宿暗娼的。

**第六条** 有下列扰乱公共秩序行为之一的，处七口以下拘留、十四元以下罚款或者警告：

一、赌博财物，经教育不改的；

二、用抽签、设彩或者其他方法变相赌博，经教育不改的；

三、造谣生事，骗取少量财物或者影响生产，经教育不改的；

四、私刻公章，伪造、变造证件，情节轻微的；

五、印铸刻字业承制公章或者其它证件，违反管理规定的；

六、出售假药，骗取少量钱财的。

第七条 有下列扰乱公共秩序行为之一的，处三日以下拘留、六元以下罚款或者警告：

一、在禁止渔猎的地区捕鱼、打猎，不听劝阻的；

二、在禁止摄影、测绘的地区摄影、测绘，不听劝阻的；

三、在禁止通行的地区，擅自通行，不听劝阻的；

四、损毁或者擅自移动临时性的测量标志的；

五、在城市任意发放高大声响，影响周围居民的工作和休息，不听制止的。

第八条 有下列妨害公共安全行为之一的，处七日以下拘留、十四元以下罚款或者警告：

一、在铁路、公路上挖掘坑穴或者放置障碍物，尚不足以使车辆行驶发生危险的；

二、对火车、汽车、船只投掷石子、泥块或者其他类似物品的；

三、损毁交通标志或者其它交通安全设备的；

四、损毁路灯的；

五、制造、储存、运输、使用爆炸物品、化学易燃物品，不符合安全规定的；

六、制造、购买、保管、使用剧性毒物，不符合安全规定的；

七、违反消防规则，经提出改善要求，拒绝执行的；

八、损毁消防设备或者消防工具的；

九、擅自将公用的消防设备、消防工具移作他用的；

十、未经当地政府许可，烧山、烧荒，尚未造成灾害的；

十一、失火烧毁国家财物、合作社财物或者他人财物，尚未造成严重损失的。

第九条 有下列妨害公共安全行为之一的，处五日以下拘留、十元以下罚款或者警告：

一、未经政府许可，购买、持有体育运动所用的枪支、弹药或者保管、使用这种枪支、弹药不符合安全规定的；

二、未经政府许可，制造、购买、持有猎枪或者开设修理猎枪的工场的；

三、设置、使用民用射击场，不符合安全规定的；

四、安装、使用电网，不符合安全规定的；

五、组织群众性集会，不采取相应的安全措施，有发生人身伤亡危险，经指出不加改善的；

六、渡船超载，或者船身破损有沉没危险，经督促不加修理，继续使用的；

七、在发生狂风、洪水有沉船危险的时候强行摆渡，不听制止的；

八、争先抢登渡船，不听制止，或者强迫渡船驾驶人超载摆渡的；



九、公共娱乐场所售票超过定员可能造成事故，不听劝阻的；

十、公共娱乐场所开放时间内，没有保持出入口、太平门的畅通的。

第十条 有下列侵犯公民人身权利行为之一的，处十日以下拘留或者警告：

一、用猥亵的言语、举动调戏妇女的；

二、殴打他人的；

三、辱骂他人，不听劝阻的；

四、故意污秽他人身体、衣物的。

第十一条 有下列损害公有财产或者公民财产行为之一的，处十日以下拘留、二十元以下罚款或者警告：

一、偷窃、诈骗、侵占少量公共财物或者他人财物的；

二、带头起哄，拿走农业生产合作社少量财物的。

第十二条 有下列损害公有财产或者公民财产行为之一的，处五日以下拘留、十元以下罚款或者警告：

一、伤害牲畜，尚未造成严重损失的；

二、损害田地里的农作物或者瓜田、果园中的瓜类、果实，不听劝阻的；

三、损坏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农具、小型水利设施或者其它生产设备，尚未造成严重损失的；

四、私自砍伐国家、合作社或者他人少量竹林、树木的；

五、损害苗圃中的树苗，尚未造成严重损失的。

第十三条 有下列违反交通管理行为之一的，处十

日以下拘留、二十元以下罚款或者警告：

一、挪用、转借车辆证照或者驾驶执照的；

二、无驾驶执照驾驶机动车辆的；

三、驾驶机件失灵的车辆，或者中途机件失灵不按照规定行驶的；

四、驾驶机动车超载、超速或者违反交通标志、信号的指示，不听劝阻的；

五、指使、强迫车辆驾驶人员违反交通规则的；

六、行人和非机动车驾驶人员违反交通规则，不听劝阻的；

七、在街道上摆摊、堆物、作业，阻碍交通，不听制止的。

第十四条 有下列违反户口管理行为之一的，处五日以下拘留、十元以下罚款或者警告：

一、不按照规定申报户口的；

二、假报户口的；

三、涂改、转让、出借、出卖户口证件的；

四、顶替他人户口的；

五、旅店管理人对住宿的旅客不按照规定登记的。

第十五条 有下列妨害公共卫生或者市容整洁行为之一的，处三日以下拘留、六元以下罚款或者警告：

一、污秽公众饮用的井水、泉水或者其它水源的；

二、在城市内任意堆置、晾晒、煎熬发恶臭的物品，不听制止的；

三、在街道上倾倒垃圾、秽物，抛弃动物尸体或者随

地便溺的；

四、在建筑物上任意涂抹刻划或者在指定的地方以外粘贴广告、宣传品，不听劝阻的；

五、故意损害公园和街道两旁的花草树木的。

第十六条 违反治安管理案件由市、县公安机关管辖。

第十七条 治安管理处罚，由市、县公安局、公安分局裁决；警告可以由公安派出所裁决。

在农村，五日以下拘留，可以由公安派出所裁决；没有公安派出所的地方，警告、五日以下拘留，可以委托乡（镇）人民委员会裁决。为了照顾农村的具体情况，公安派出所和乡（镇）人民委员会执行拘留时，用劳动代替。

第十八条 执行治安管理处罚的程序：

一、传唤违反治安管理的人，使用传唤证；对于现行违反治安管理的人，可以当场口头传唤。

二、违反治安管理行为必须作出记录，由违反治安管理的人签名；如果有证人，证人也应当签名。

三、治安管理处罚的裁决，必须作出裁决书，交给违反治安管理的人。

四、违反治安管理的人不服公安分局、公安派出所作出的裁决，可以在四十八小时内提出申诉；原裁决机关应当在二十四小时内连同原裁决书送上一级公安机关；上一级公安机关在接到申诉后的五日内作出最后的裁决。不服乡（镇）人民委员会作出的裁决，由县公安局接受申诉。

五、违反治安管理的人不服市、县公安局作出的裁决，可以在四十八小时内提出申诉；市、县公安局应当在接到申诉后的五日内进行复查，作出最后的裁决。

六、边沿山区，交通困难，按照第四、第五两项所规定的时间，原裁决机关或者受理申诉的机关确实无法将申诉送出或者作出最后的裁决的时候，可以不受规定时间的限制，但需将超出规定的时间和理由在裁决书内注明。

七、从违反治安管理的人提出申诉的时候起，原裁决暂缓执行。如果违反治安管理的人在当地没有固定住处，在找到保人或者交纳一定数量的保证金后，原裁决才能暂缓执行。

第十九条 违反治安管理行为过了三个月没有追究的，免于处罚。

前款期限从违反治安管理行为成立之日起计算，违反治安管理行为有连续或者继续状态的，从行为终了之日起计算。

治安管理处罚，从裁决之日起，过了三个月没有执行的，免于执行。

第二十条 违反治安管理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从轻或者免除处罚：

- 一、确实不懂治安管理规则的；
- 二、出于他人强迫的；
- 三、自动坦白或者真诚认错的。

第二十一条 违反治安管理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的,从重或者加重处罚:

- 一、后果较重的;
- 二、屡经处罚不改的;
- 三、嫁祸于人的;
- 四、拒绝传问或者逃避处罚的。

**第二十二条** 一人有两种以上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分别确定处罚,合并裁决。但是,拘留合并不得超过十五日,罚款合并不得超过三十元,同时处以拘留、罚款的,同时执行。

一种行为发生两种以上结果的,应当就最重的一种结果处罚。

连续实行同一种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从重或者加重处罚。

**第二十三条** 二人以上共同实行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分别处罚。

教唆或者强迫他人违反治安管理的,按照所教唆、强迫的行为处罚。

**第二十四条** 机关、团体、学校、企业、合作社的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确系出于本单位行政管理负责人的命令的,处罚行政管理负责人。

**第二十五条** 由于不能抗拒的原因而违反治安管理的,不予处罚。

**第二十六条** 不满十三岁的人的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不予处罚;已满十三岁不满十八岁的人的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从轻处罚。但是应当责令他们的家长或者监护人

严加管教。如果这种行为出于家长、监护人的纵容，处罚家长、监护人，但是以警告或者罚款为限。

第二十七条 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时候违反治安管理的，不予处罚；责令他的家长或者监护人严加看管和医疗。如果家长、监护人确有看管能力不加看管以致违反治安管理的，处罚家长、监护人，但是以警告或者罚款为限。

第二十八条 酒醉状态中违反治安管理的，酒醒后给以处罚。

酒醉状态中对酒醉者本身有危险或者使周围的安全受到威胁的时候，应当将酒醉的人约束到酒醒。

第二十九条 因违反治安管理造成的损失或者伤害，由违反治安管理的人赔偿或者负担医疗费用；如果造成损失、伤害的是不满十八岁的人或者精神病人，由他们的家长、监护人负责赔偿或者负担医疗费用。

第三十条 对于一贯游手好闲、不务正业、屡次违反治安管理的人，在处罚执行完毕后需要劳动教养的，可以送交劳动教养机关实行劳动教养。

第三十一条 本条例没有列举的违反治安管理行为，市、县公安局可以比照本条例第五条至第十五条中最相类似的条款处罚，但是应当经过市、县人民委员会核准。

第三十二条 本条例第五条至第十五条以外的各条，适用于其它有治安管理处罚规定的治安管理规则，但是法律、法令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三十三条 已经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民族自治地方，一般适用本条例，自治机关可以根据民族特点制定实施办法。

尚未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民族自治地方，自治机关可以参照本条例的精神，另行制定办法，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施行。

第三十四条 本条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根据国务院文件刊印

# 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 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

(一九五七年十月二十五日)

(这个纲要草案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一九五六年一月间提出的,在实际生活中已经起了积极的作用。现在根据两年来一些事实的变化和工作的经验,作了一些必要的修改和补充,提交农民和全体人民展开讨论,再作修改,准备提交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然后提交国务院讨论通过,最后提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讨论通过,作为正式文件公布<sup>[1]</sup>。估计到今后十年中,一定会有许多新的情况出现,还会要作某些修正的。——中共中央注,一九五七年十月二十五日)

## 序 言

这个纲要是在我国第一个到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为着迅速发展农业生产,以便加强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提高农民以及全体人民生活水平的一个斗争纲领。

社会主义工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领导力量。但是,发展农业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占有极重大的地位。农业用粮食和原料供应工业,同时,有五亿以上人口的农



村，给我国工业提供了世界上最巨大的国内市场。从这些说来，没有我国的农业，便没有我国的工业。忽视农业方面工作的重要性是完全错误的。

发展农业可以有两条道路。一条是资本主义道路：让农民的命运掌握在地主、富农和投机商人的手里，极少数人发财而大多数人贫困和不断破产。一条是社会主义道路：让农民在工人阶级的领导下掌握自己的命运，共同富裕和共同繁荣。这两条道路的斗争在我国过渡时期中将长期地存在，但是，由于农业合作化的基本完成，我国绝大多数农民已经摆脱了前一条道路，走上后一条道路。今后的任务是要尽力巩固合作化制度，同时继续反对农村中的资本主义自发势力。

农业合作化给我国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最广阔的道路。没有农业合作化，在个体经济的条件下，关于在十二年内在全国几个主要不同地区的粮食，除掉某些例外，争取每亩平均年产量分别达到四百斤、五百斤、八百斤的要求，关于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内争取大多数合作社的生产和收入赶上或者超过当地富裕中农在单干时候的水平的要求，这些都是不可能实现的幻想。但是，在农业合作化以后，加上第一个五年计划中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伟大成就，经过今后大家千方百计的努力，纲要所提出的这些要求，便有着实现的可能性。

由于我国一般的自然条件好，农村劳动力多，农民有勤劳节俭的优良传统和精耕细作的丰富经验，农业经济有很大的潜在力量。必须在合作化的基础上，采取各种

积极的合理的措施，并且有准备地有步骤地适合情况地积极推广农业的机械化，充分发掘农业的这种潜在力量，反对保守主义，为着实现纲要的要求而斗争。

农业生产水平和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主要依靠农民自己的辛勤劳动。但是，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政府总是尽可能援助农民的。纲要所规定的许多农业增产措施，今后将逐步得到人民政府的更多的必要的援助。在实际上，这是工农的互相支援，城乡的互相支援。

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工农联盟和工农互相支援，是农民解放的保证。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和封建残余分子为了恢复地主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的目的，极力挑拨工农关系和城乡关系。他们这种卑鄙的挑拨失败了，并且还要继续失败下去。

要教育农民群众把爱国、爱社和爱家的观念统一起来。没有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群众将继续受帝国主义者和地主、富农、投机商人的统治和剥削，就不能有自己的合作社，将继续出现许多家破人亡的局面。要爱家就得要爱国爱社。一切不顾国家利益和合作社集体利益的本位主义和个人主义，都是错误的，实际结果都将是危害自己家庭利益的。

在农业发展的道路上，困难还是会继续出现的。但是，事在人为。对于我们解放了的人民来说，没有什么困难不能克服。不怕困难，是我们劳动人民本来的伟大性格。

本纲要就是就全国的范围提出的。各地方以至各合作社的情况存在着许多的差别。因此，全国各省（市、自治区）、专区（自治州）、县（自治县）、区、乡（民族乡）的党政领导机关和合作社，都应当根据本纲要，按照本地方、本合作社的具体条件，实事求是，经过群众路线，分别拟定本地方的各项工作的分批分期发展的具体规划。同时，国家各个经济部门，各个科学、文化、教育、卫生部门和政法部门，也都应当根据本纲要，重新审订自己的工作规划。

本纲要所述各项任务中，有一些任务，例如绿化，勤俭持家，消灭老鼠、苍蝇、蚊子，消灭危害人民最严重的疾病，提倡有计划地生育子女等，城市居民也应当实行，并且一定要城乡配合进行才能有效地实现。

## 纲 要

### （一）巩固农业合作化制度

我国的农业合作化已经在一九五七年基本完成。今后的任务是：争取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时间内，或者更多一点时间，把所有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巩固起来。

巩固合作社的条件是：（1）在合作社的领导成分中，保持原来的贫雇农和下中农（主要是现在的贫农和新中农中间的下中农）的优势，同时注意使上中农也有适当的代表。（2）贯彻执行民主办社的方针。合作社领导机关要按时公布财务收支，干部要同群众商量办事，参加生产

劳动。(3)贯彻执行勤俭办社的方针。要同一切游手好闲的现象作斗争,反对铺张浪费。(4)根据合作社的经济情况和当地的自然情况,采取各种增产措施,逐步地增加农业基本建设,保证遵守和完成国家的计划,不断地扩大再生产,争取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内,使大多数合作社赶上或者超过当地富裕中农的生产水平和收入水平。(5)合理地处理分配问题,兼顾国家、合作社、社员三方面的利益,在发展生产和正常年景的情况下,使合作社的公共积累和社员的收入逐年有所增加,争取在一九六二年前后,合作社集体经济的收入,加上社员家庭副业收入,按人口平均,赶上或者超过当地富裕中农的收入。(6)加强政治思想工作,不断地提高社员的社会主义觉悟,克服资本主义思想,克服不顾国家利益和合作社集体利益的本位主义思想和个人主义思想;每年应当结合农村干部的整风和合作社的整社,系统地总结本年度的工作,在全体农村人口中集中地进行一次社会主义教育。在多民族的地区,要特别注意民族间的团结和互助。

现有的、数目不多的初级合作社,在条件成熟了的时候,应当引导它们自愿地转为高级合作社。加强对现在还存在的少数个体农民的教育和领导,争取他们自愿地陆续加入合作社;不愿入社的,听其自便。

## **(二)大力提高粮食的产量和其他 农作物的产量**

从一九五六年开始,在十二年内,粮食每亩平均年产

量，在黄河、秦岭、白龙江、黄河(青海境内)以北地区，由一九五五年的一百五十多斤增加到四百斤；黄河以南、淮河以北地区，由一九五五年的二百零八斤增加到五百斤；淮河、秦岭、白龙江以南地区，由一九五五年的四百斤增加到八百斤。其中的沙荒地区、土地瘠薄地区、常年旱涝地区、高寒山区、无霜期很短地区、地广人稀地区、大面积垦荒地区，可以按照情况，另外规定增产指标。

从一九五六年开始，在十二年内，棉花每亩平均年产量(皮棉)，由一九五五年的三十五斤(全国平均数)，按照各地情况，分别增加到四十斤、六十斤、八十斤和一百斤。

在优先发展粮食生产的条件下，各地应当发展农业的多种经济，保证完成国家所规定的纺织原料(棉花、麻类、蚕茧)，油料(大豆、花生、油菜籽、芝麻、油茶、油桐)，糖料(甘蔗、甜菜)，茶叶，烤烟，果类，药材等项农作物的计划指标，还应当积极地发展其他一切有销路的经济作物。华南各省有条件的地区，应当注意发展热带和亚热带作物。

农业合作社应当鼓励社员在自留地上种植蔬菜和饲料。城市郊区和工矿区附近的合作社和国营农场，应当按照国家的计划种植蔬菜，充分地保证城市和工矿区的蔬菜供应。

### (三)发展畜牧业

畜牧业的合作化，应当按照各地情况，分别规定不同的发展计划。有计划地发展国营牧场。

大力保护和繁殖牛、马、驴、骡、骆驼、猪、羊、兔等家畜和适当地繁殖各种家禽。特别注意保护母畜、幼畜和种公畜。建立配种站,改良畜种。

在牧区要保护草原,改良和培植牧草,特别注意开辟水源。牧业合作社应当逐步建立自己的饲料和饲草的基地。推广青贮饲料。

分别在七年或者十二年内,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基本上消灭危害牲畜最严重的病疫,例如牛瘟、猪瘟、鸡瘟、牛肺疫、口蹄疫、猪囊虫、羊痘、羊疥癣等。在一九六二年以前,农业区的县或者区和牧业区的区或者乡,应当建立起畜牧兽医工作站。合作社应当有初级的防治兽疫的人员。充分发挥民间兽医人员的力量,组织和领导他们提高技术,参加防治兽疫的工作。

#### **(四)推行增产措施和推广先进经验,是增加农作物产量的两个基本条件**

增产措施的项目,主要是:(1)兴修水利。(2)增加肥料。(3)改良旧式农具和推广新式农具。(4)推广优良品种。(5)扩大复种面积。(6)多种高产作物。(7)实行精耕细作,改进耕作方法。(8)改良土壤。(9)保持水土。(10)保护和繁殖耕畜。(11)消灭虫害和病害。(12)开垦荒地,扩大耕地面积。

推广先进经验的方法,主要是:(1)由各省、市、自治区收集当地的丰产经验,编印成书,传播推广。(2)举办农业展览会。(3)各级政府定期召开农业劳动模范会

议，奖励丰产模范。(4)组织合作社之间的参观和评比，交流增产经验。(5)在总结先进经验的基础上，组织技术传授，发动农民和干部学习外社外乡外县外省(自治区)的先进的管理经验和知识。

### **(五)兴修水利，发展灌溉，防治水旱灾害**

从一九五六年起，在十二年内，全国水利事业的发展，应当以修建中小型水利工程为主，同时修建必要的可能的大型水利工程。

小型水利工程(打井、挖塘、筑堤、打旱井、开渠、筑圩、修水库、兴修蓄水排水的沟漕畦田台田系统等)，小河的治理，都由地方和农业合作社负责，有计划地尽可能大量地进行。通过这些工作，结合国家大中型水利工程的建设和大、中河流的治理，要求在十二年内，基本上消灭普通的水灾和旱灾。

内涝灾害严重的地区，应该大力进行除涝排水、改造洼地的工程建设。

要求在十二年内，把水田和水浇地的面积，由一九五五年的三亿九千多万亩扩大到九亿亩左右。灌溉设施的抗旱能力，按各地不同情况，分别提高到三十天到五十天；适宜发展双季稻的地方，要提高到五十天到七十天，以保证收成。为了充分利用一切水源，有关部门应当积极进行对地下水的勘察工作，保证水利部门所需要的必要资料。

凡是能够发电的水利建设，应当尽可能同时进行中

小型的水电建设,结合国家大中型的电力工程建设,逐步增加农村用电。

### **(六)大力增加农家肥料和化学肥料**

农业合作社要采取一切办法,尽可能由自己解决肥料的需要。应当特别注意养猪(有些地方养羊)。除了某些不养猪的少数民族地区和因为宗教习惯不养猪的少数家庭以外,要求一九六二年达到农村平均每户养猪一头半到两头,一九六七年达到农村平均每户养猪二头半到三头。要做到猪羊有圈,牛马有栏。还应当因地制宜地积极发展各种绿肥作物,并且把城乡的粪便,可作肥料的垃圾和其他杂肥尽量利用起来。

中央和地方都应当积极发展化学肥料的制造工业,争取到一九六二年生产化学肥料五百万吨到七百万吨左右,一九六七年生产一千五百万吨左右。积极发展细菌肥料。

### **(七)改良旧式农具,推广新式农具**

根据生产的需要,经过地区适应性的试验和改制,积极推广那些适合当地条件的改良农具和新式农具。经常注意农具的保养和修理的工作。加强新式农具使用的技术指导。

随着国家工业化的发展,有步骤地积极地实行农业机械化。从一九五六年起,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机械制造部门和农业部门应当经过广泛的试验研究工作,拟出



一个适合我国条件的农业机械化方案，为推广农业机械化做好准备，随即制造适合各地的机械，供应农民；随时改良，积极推广。

### **(八)积极繁育和推广适合当地条件的农作物优良品种**

要求在一九六二年以前，经过地区适应性的典型试验，普及各种农作物现有的优良品种。对于良种已经基本上普及的作物(例如棉花)，应当加强种子复壮和品种更换的工作。大力培育新的良种，并且注意试种外地和外国的良种。

农业合作社应当建立自己的种子地，加强群众的选种工作，建立农作物良种繁育更换制度。在丰歉经常不定的地区，要注意储备优良品种的种子。中央和地方的国营农场应当成为繁育农作物良种的基地，积极繁殖和推广适合当地的农作物良种。各省(市、自治区)、专区(自治州)、县(自治县)都应当建立种子管理机构。

### **(九)扩大复种面积**

从一九五六年起，在十二年内，按照不同地区的不同条件，把复种指数(包括绿肥作物在内)分别提高到下列的水平：(1)五岭以南地区，达到百分之二百三十左右。(2)五岭以北、长江以南地区，达到百分之二百左右。(3)长江以北，黄河、秦岭、白龙江以南地区，达到百分之一百六十左右。(4)黄河、秦岭、白龙江以北，长城以南

地区,达到百分之一百二十左右。(5)长城以北地区,一般应当尽可能地利用已有耕地,减少撩荒面积,在可能的地方,力争扩大复种面积。

### **(十)多种高产作物**

利用一切可能利用的水源,增加稻谷的种植面积。从一九五六年起,在十二年内,要求增加稻谷二亿五千万亩。根据需求和民食习惯,适当地发展玉米和薯类等高产作物。

### **(十一)积极因地制宜地改进耕作方法**

一切农业合作社都应当实行精耕细作,改进耕作方法,合理地施肥,合理地灌溉,合理地轮作(换茬)、间作、套种和密植。

不违农时,及时播种,及时锄草间苗,加强田间管理,及时收获,细收净打,力求丰产保收。

### **(十二)改良土壤**

农业合作社和国营农场都应当积极改良和利用盐碱地、瘠薄的红土地、低洼地、砂地和其他各种瘠薄的土地。注意防止土地的盐碱化。山地必须有计划地积极地整修梯田。用各种办法把瘠薄的土地变成肥沃的良田好地。

### **(十三)开展保持水土的工作**

在有水土冲刷的地区,应当依靠农业合作社,广泛地

发动群众,结合当地的生产,有步骤有计划地开展保持水土的工作。从一九五六年起,要求在十二年内,在一切可能的地方,显著地收到保持水土的功效,逐步减少水土流失的损害。为使此项工作能够较快地收到效果,农业、林业、水利、牧业和科学研究等有关部门,必须在当地党政机关的统一领导下,密切配合,积极支援。

#### **(十四)保护和繁殖耕畜**

从一九五六年起,要求在七年到十二年的时间内,每一个农业合作社都要有足够数量的强壮的耕畜。为此,必须生产足够的饲草、饲料,种植高产饲料作物。合作社应当根据自己的条件,不断地改进耕畜的饲养管理工作。合作社和政府应当采取正确的措施奖励耕畜的繁殖。

#### **(十五)防治和消灭病虫害**

从一九五六年起,分别在七年或者十二年内,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基本上消灭危害农作物最严重的虫害和病害,例如蝗虫、稻螟虫、粘虫、玉米螟虫、棉蚜虫、棉红蜘蛛、棉红铃虫、小麦吸浆虫、麦类黑穗病、小麦线虫病、甘薯黑斑病等;同时防止其他危险性的病害、虫害、杂草的传播蔓延。各地区应当把当地其他可能消灭的主要虫害和病害,列入消灭计划之内。为此,必须加强植物保护工作和植物检疫工作。

有计划地发展农药和药械的生产,提高产品质量,改进供应工作。同时,加强使用上的技术指导,保证安全

有效。

### **(十六)开垦荒地,扩大耕地面积**

国家应当有计划地开垦荒地。从一九五六年起,在十二年内,要求国营农场的耕地面积由一九五五年的一千三百多万亩增加到一亿亩左右。在有条件的地方,应当组织移民和鼓励合作社组织分社或者派出生产队,进行垦荒。在垦荒的时候,必须同保持水土和发展畜牧业的规划相结合,避免水土流失,避免破坏树林和破坏必需的草原。在树林已经遭到破坏的地方,应当努力恢复。

农业合作社应当充分利用田埂、地角、塘边、沟沿、空闲的场院等一切零星的土地。这些土地可以根据情况,分配给生产队或者社员个人经营。

工矿、商业、农业等企业,文教、卫生、水利、交通、军事等部门和群众团体,在进行基本建设的时候,都必须尽量节省用地,尽量避免和减少占用耕地。

### **(十七)发展山区经济**

按照因地制宜、实行多种经营的方针,发展山区的农业、林业、畜牧业和各种土特产的生产。

在不破坏水土保持的原则下,发展山区的粮食生产。现在还缺粮的地区,应当争取做到粮食自给或者减少粮食调进。

远山区,应当着重发展用材林。近山区,应当着重发展特用经济林、薪炭林、各种果木和土特产。南方的山

区,应当注意发展油茶、油桐、竹子、桑树、茶树等。北方的山区,应当注意发展核桃、柞树、花椒等。

发展药材生产。注意保护野生药材,并且根据可能条件逐步进行部分的人工栽培。

从一九五六年起,在十二年内,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基本上消灭危害山区生产最严重的兽害。保护和发展有经济价值的野生动物。

山区、半山区的专区、县、乡和农业合作社,都应当制定较长期的山区生产规划,合理地使用土地,促进生产的全面发展。国家各有关部门,应当从交通运输、供销贸易、文教卫生、组织移民等方面作有力的配合和支援。

### **(十八)发展林业,绿化一切可能 绿化的荒地荒山**

从一九五六年起,在十二年内,在自然条件许可和人力可能经营的范围内,绿化荒地荒山。在一切宅旁、村旁、路旁、水旁,只要是可能的,都要有计划地种起树来。为此,必须依靠农业合作社造林,实行社种社有的政策。要求合作社自己采集树籽和培育树苗,采取分工负责、包栽包活的办法。同时,鼓励社员在自己的宅旁种树,自种自有。

种树,除了用材林(包括竹林)以外,应当尽量利用一切人力和城乡空地,发展果木、桑、柞、茶、漆、油料等经济林木。

大力加强国营造林。国营林场以营造大片用材林为

主,并且有计划地营造水土保持林、防风林、防沙林和海防林。

铁路、干线公路和大河流两旁、大型水库周围、矿山附近的绿化,由铁路、交通、水利部门和厂矿负责经营,收益归各经营部门;也可以由附近的农业合作社经营,按照有关部门所定的规格造林,收益归合作社。

绿化用地,不应当占用耕地。

要求在十二年内,尽可能地把国有森林全部经营管理起来。国家不便经营管理的小规模的国有林,应当委托合作社经营管理。必须保护和爱惜森林资源,加强防火工作,防治虫害和病害,制止滥伐和采伐当中浪费木材的现象,并且及时更新采伐迹地,恢复森林。

### **(十九)发展海洋和淡水的水产品 生产和水产养殖业**

在海洋渔业中,应当在合作化的基础上,发挥现有捕捞工具的潜力,逐步改进生产技术。应当注意增加公共积累,添置和改良生产工具,逐步发展机帆船和轮船。加强生产的安全措施,争取向深海发展。利用一切可能养鱼的水面,发展淡水养殖业。加强培育优良鱼种和防治鱼瘟的工作。积极发展浅海养殖业,加强鱼类、藻类、贝类的养殖。

### **(二十)办好国营农场**

要求所有的国营农场,团结和帮助周围的农业合作

社，在生产技术方面发挥应有的示范作用。国营农场应当实行多种经营，提高劳动力利用率；不断地改进生产技术和劳动管理，提高劳动生产率。必须厉行节约，贯彻执行勤俭办农场的方针，改善工资制度，既要增加产量，又要降低成本。

### **(二十一)改善农业科学研究工作和 技术指导工作**

根据需求和可能条件，建立和改进农业科学研究工作和技术指导工作的机构，例如农业科学院，区域性的和专业性的农业科学研究所，省的农业试验站，县的示范繁殖农场和农业技术服务站等，使农业科学研究工作更好地为发展农业生产服务。

农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指导，必须同农民群众的生产实践密切地结合起来。必须总结当地农民特别是老农的增产经验，学习其他地方农业生产上的好经验。县的农业技术服务站的工作人员，都应当分别选择重点的农场和农业合作社作为工作的基地，参加农业生产。

从一九五六年开始，在十二年内，要从具有相当生产经验和一定文化程度的农民中间，为农业合作社培养初级的和中级的技术人材，以适应合作经济发展的需要。

### **(二十二)加强气象水文工作**

从一九五六年起，在十二年内，基本上建成气象台站网和水文测站网。加强天气预报，特别是危险天气预报

的工作。建立农业气象预报的工作。各地应当注意收听关于气象的广播,以便预防水、旱、风、冻等自然灾害。

### **(二十三)勤俭办社,勤俭持家**

一切农业合作社都必须实行勤俭办社的原则。勤,就是要发动社员勤劳生产,在可能和必要条件下积极地扩大生产范围,发展多种经济,进行细致工作。俭,就是要厉行节约,降低生产成本,反对铺张浪费。合作社的各种基本建设,都应当尽量利用合作社本身的人力、物力和财力。

应当教育农民勤俭持家,长远打算,有计划地安排各项家务开支。农村中的妇女团体,应当把教育妇女勤俭持家,作好家务劳动,当作自己的一项重要任务。注意介绍农家精打细算、省吃俭用、增加积蓄和积累的模范事例。不作长远打算、不注意家庭积累、随时吃光用光的思想,是错误的。

农村中的红白喜事、人情应酬,应当一切从简,改变原来不合理的风俗习惯。

### **(二十四)提高农业合作社的劳动力利用率和劳动生产率,发展多种经济**

为了充分发展农业和林、牧、渔等副业以及农村手工业,努力扩大生产门路,增加社会财富和农村人民的收入,农业合作社应当提高劳动力的利用率。北方要设法增加冬季生产。同时,还应当积极改进生产技术,改善



劳动组织和劳动管理,不断地提高社员的劳动生产率。

从一九五六年开始,在七年内,要求做到农村中的每一个男子全劳动力每年至少做二百五十天左右的工作。根据妇女的特点,合理地安排和组织妇女劳动力。妇女除了从事家务劳动的时间以外,在七年内,根据不同地区的不同情况,要求做到每一个农村女子全劳动力每年参加农业和副业(包括家庭副业)生产劳动的时间不少于八十天到一百八十天。此外,对于农村中一切具有半劳动力的人们,或者能够从事轻微劳动的人们,合作社应当作好适当的安排,要求他们积极地分别参加适合自己能力的劳动。

### **(二十五)储备粮食**

要求一切农业合作社,除了主要是经营山林或者经营经济作物的缺粮社以外,从一九五六年起,在十二年内,按照自己的情况,定出具体计划,加上社员家庭的粮食储备,分别储积足够三个月、半年、一年或者一年半食用的余粮,以备紧急时候的需要。在丰歉经常不定和交通不便的地区,特别要注意以丰补歉,积谷防荒。

从一九五六年起,在十二年内,国家应当储备足够一年到两年之用的粮食,以应急需。

### **(二十六)改善居住条件**

随着合作社生产的发展和社员收入的增加,农业合作社应当根据需求和可能,鼓励和协助社员,在自愿、互

助、节约开支和节省用地的原则下，有准备地、有计划地、分批分期地修缮和新建家庭住宅，改善社员的居住条件。

### **(二十七)除 四 害**

从一九五六年起，在十二年内，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基本上消灭老鼠、麻雀、苍蝇和蚊子。打麻雀是为了保护庄稼，在城市里和林区的麻雀，可以不要消灭。

### **(二十八)努力消灭危害人民最严重的疾病**

从一九五六年起，在十二年内，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基本上消灭危害人民最严重的疾病，例如：血吸虫病、天花、鼠疫、疟疾、黑热病、钩虫病、血丝虫病、新生儿破伤风和性病。其他疾病，例如：麻疹、赤痢、伤寒、流行性乙型脑炎、脊髓灰白质炎、白喉、肺结核、麻风、沙眼、甲状腺肿、大骨节病、克山病等，也应当积极防治。积极培养医务卫生人员，包括中医在内。

积极开展群众的经常性的爱国卫生运动，养成人人讲卫生、家家爱清洁的良好习惯。讲求清洁卫生的根本精神，是为了消灭疾病，人人振奋，移风易俗，改造国家。

### **(二十九)保护妇女儿童**

对于妇女的生产劳动，坚决实行同工同酬的原则。农业合作社在必要和可能的条件下，可以成立适合需要的临时简便的农忙托儿组织。在分配工作的时候，对于女社员的生理特点应当予以照顾。对于农村儿童参加农忙

时期的辅助劳动，应当根据他们的年龄和体力，做出适当的规定。

卫生部门应当为农村训练助产员，积极推广新法接生，保护产妇和婴儿，降低产妇的染病率和婴儿的死亡率。

除了少数民族的地区以外，在一切人口稠密的地方，宣传和推广节制生育，提倡有计划地生育子女，使家庭避免过重的生活负担，使子女受到较好的教育，并且得到充分就业的机会。

### **(三十) 实行“五保”，优待烈属和残废革命军人，供养和尊敬父母**

农业合作社对于社内缺乏劳动力、生活没有依靠的鳏寡孤独的社员，应当统一筹划，指定生产队或者生产小组在生产上给以适当的安排，使他们能够参加力能胜任的劳动；在生活上给以适当的照顾，做到保吃、保穿、保烧（燃料）、保教（儿童和少年）、保葬，使他们的生养死葬都有指望。

对于缺乏劳动力的烈属和享受残废抚恤金以后仍然不能维持生活的残废革命军人，合作社应当按照国家规定的优待办法给以优待，使他们的生活不致低于一般社员的水平。

应当教育青壮年男女供养和尊敬自己的父母，使年老的丧失劳动能力的人，在生活上得到合理的照顾，在精神上得到充分的安慰。

### **(三十一)扫除文盲，发展农村 文化教育事业**

从一九五六年开始，按照各地情况，分别在十二年内，基本上扫除青年和壮年中的文盲。争取在乡或者社逐步设立业余文化学校，以便进一步提高农村基层干部和农民的文化水平。农村办学应当采取多种形式，除了国家办学以外，必须大力提倡群众集体办学，允许私人办学，以便逐步普及小学教育。

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合作社应当根据可能的条件，按照勤俭建国、勤俭办社、勤俭持家的原则，逐步改进和开展文化娱乐工作。

### **(三十二)发展农村广播网**

从一九五六年起，按照各地情况，分别在七年或者十二年内，基本上普及农村广播网。要求大部分农业、林业、渔业、牧业、盐业和手工业的生产合作社都能收听广播。

### **(三十三)发展农村的电话网和邮政网**

从一九五六年开始，按照各地情况，分别在七年或者十二年内，建立乡和某些合作社的电话网，有些地区可以设置无线报话器。在十二年内，基本上普及农村邮政网，做好邮电传递工作。

### **(三十四)发展农村交通运输**

从一九五六年起,按照各地情况,分别在七年或者十二年内,基本上建成全国地方道路网。在省(市、自治区)、专区(自治州)、县(自治县)、区、乡(民族乡)之间,根据当地运输发展的需要,按照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就地取材、经济适用、不浪费土地的原则,依靠群众力量,逐步修建适应当地运输工具的各种道路。同时作好各种道路的经常养护工作。特别要注意山区道路的修建。

有河道可通的地方,应当在可能的条件下,整理和疏浚航道,以利交通。

### **(三十五)调整农村商业网**

为了适应农业合作化以后的新情况,商业部门和农村供销合作社,应当在最近几年内,完成农村商业网的调整,加强商品的流通,加强初级市场的管理,保证做好农村中的商品供应工作和农产品的收购工作,同资本主义的自发势力作斗争,促进农村生产的发展。

### **(三十六)发展农村信贷合作事业**

巩固农村信用合作社,积极开展农村信贷业务和农村储蓄业务,帮助农业合作社和农民解决短期资金周转的需要。

### **(三十七)发挥复员军人建设社会主义 农村的积极性**

在农村的复员军人应当在社会主义生产战线上保持人民解放军的优良传统,艰苦朴素,联系群众,遵守政策、法令和劳动纪律,成为农业生产中的积极分子。乡人民委员会和农业合作社要适当地安排复员军人的生产活动,帮助他们学习和提高生产技术。各级人民政府要经常关心复员军人的进步,对他们进行政治思想教育。

### **(三十八)提高农村青年的 社会主义积极性**

教育农村青年热爱祖国、热爱农村、热爱劳动和爱社如家,鼓励他们积极地学习文化和农业科学技术,学习老年和壮年农民的生产经验。农村青年应当成为农村的生产建设和科学文化事业中的突击力量。

城市的中、小学毕业的青年,除了能够在城市升学、就业的以外,应当积极响应国家的号召,下乡上山去参加农业生产,参加社会主义农业建设的伟大事业。我国人口百分之八十五在农村,农业如果不发展,工业不可能单独发展。到农村去工作是非常必要的和极其光荣的。

### **(三十九)改造地主、富农、农村中的反革命分子和 其他坏分子,保护农村的社会主义秩序**

过去的地主分子、已经放弃剥削的富农分子和农村

中的过去的反革命分子，按照“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的规定，根据他们的实际表现，可以由农业合作社分别吸收他们入社做社员或者做候补社员。不够入社条件的，可以由乡人民委员会交给合作社监督生产。对于这些人，合作社要分别情况加强教育和加强管理，并且要经常地教育社员和社外农民，提高警惕性，防止他们中间可能发生的破坏活动。已经成为社员的或者候补社员的过去的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和反革命分子，如果表现不好，并且屡教不改，是社员的，可以分别降为候补社员或者监督生产；是候补社员的，可以降为监督生产。如果有破坏行为，还应当给予法律制裁。

严禁赌博，取缔会道门活动。对于盗窃犯、诈骗犯、流氓分子、特务分子和各种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坏分子，都必须依法惩办。

#### **(四十)城市工人和合作社的 农民必须互相支援**

工人应当生产更多更好的工业品，满足农民的需要；农民应当生产更多更好的粮食和工业原料，满足工业和城市居民的需要。城市的工人和合作社的农民，还应当通过联欢、访问和通信等项方法，加强联系，互相鼓励，交流经验，以便有利于工业和农业的发展，有利于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的工农联盟的巩固。

根据一九五七年十月二十六日  
《人民日报》刊印

## 注 释

〔1〕 一九六〇年四月十日，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根据变化了的情况，讨论了一九五七年十月产生的这个纲要（修正草案），通过并公布了《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公布时只将纲要（修正草案）的第二十七条关于除四害的条文改为“从一九五六年起，在十二年内，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基本上消灭老鼠、臭虫、苍蝇和蚊子”。其他各条没有变动。



# 建设社会主义农村的 伟大纲领

（一九五七年十月二十七日《人民日报》社论）

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在昨天公布了。这是建设我国社会主义农村的伟大纲领，它给我国五亿农民指出了今后十年的奋斗目标，规定了实现这些目标的基本方法。我们相信，这个纲要修正草案的内容一定会得到广大农民的热烈拥护，引起他们的劳动积极性的新高涨。

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的内容是极其丰富的。它要求巩固农业合作化制度，要求大力提高粮食和其他农作物的产量，要求从一九五六年开始的十二年内，按照我国不同地区的自然条件和经济状况，把粮食每亩平均年产量分别提高到四百斤、五百斤和八百斤，把棉花每亩平均年产量分别提高到四十斤、六十斤、八十斤和一百斤（皮棉），要求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内大多数合作社的生产和收入赶上或者超过当地富裕中农的水平，要求有关农业和农村的各方面工作在十二年内都按照必要和可能，实现一个巨大的跃进。实现这些目标，我国的农业和农村的面貌将焕然一新。

我们正在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我们的目标是建

设一个既有现代化工业又有现代化农业的社会主义强国。近几年来，我们举国一致、集中力量建设现代工业，特别是重工业，这是绝对必要的。不这样作，就不能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奠定工业化的初步基础。可是，为了更迅速、更顺利地发展工业，在目前必须用更大的力量发展农业。毛主席指示我们：“在第二个五年计划和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如果我们的农业能够有更大的发展，使轻工业相应地有更多的发展，这对于整个国民经济会有好处。农业和轻工业发展了，重工业有了市场，有了资金，它就会更快地发展。”（《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为了推动我国农业的迅速发展，根据两年来情况的变化和工作的经验，把去年1月份公布的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加以必要的修改和补充，作为领导全国五亿以上的农民在今后十年内积极奋斗的指针，显然是十分必要的。

纲要所规定的粮、棉产量提高的速度在我国是空前的，这究竟能不能够实现呢？我们认为，只要把生产潜力挖掘出来，不仅可以实现，在许多地区并且可能超过。大家知道，一九五六年已经有十九个县、市的单位面积产量达到或超过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的指标，估计今年将有几十个县、市达到或者超过指标。这些地区在一两年内已经作到了的，在条件大体相同的其他地区，再有十年的努力，为什么还不能作到呢？

目前我国多数地区的农田单位面积产量还相当低。我国农民不久以前才从小农经济束缚下解放出来，某些陈旧的生产习惯并没有随着经济制度的改变而改变。许

多人惯于根据小农经济的生产条件来看合作化以后的新情况,对过去没有见过的事情,常常是不敢想,不敢作,信心不足,顾虑重重。为了克服各种各样的保守思想,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在农村中以四十条纲要为中心,进行一次生产建设问题的大鸣、大放、大争。

有些人说:“生产已经到顶了。”在大辩论的时候,应该集中力量彻底打破这种保守思想。从全国范围来说,我们已经有了亩产两千多斤水稻、一千多斤小麦、三百多斤皮棉、一万多斤甘薯的高额丰产纪录,比全国平均产量高五、六倍到七、八倍。当然,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并不是任何地区都能达到这样高的生产水平。但是,除开这些高额丰产纪录以外,每个县、区、乡,都有自己的丰产纪录,比当地平均产量高百分之几十到几倍。这是条件大体相同的合作社比较容易达到的。在低产地区,抓住当地的生产关键(如兴修水利、保持水土、改变耕作制度等等),就可以在短时期内迅速提高单位面积产量,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在著名的高产地区,只要继续发挥潜力,采取必要和适当的措施,也能够进一步提高单位面积产量。一九五六年广东汕头专区水稻平均亩产八百一十一斤六两,全专区超过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的指标。最近这个专区的党政领导机关周密地调查研究了全区的生产条件,作出新的规划,争取一九六二年达到平均亩产稻谷一千斤,一九六七年达到平均亩产一千一百斤。大家想想,如果我们都有这种精神,怎么能说生产已经到“顶”了呢?

为了因地制宜地实现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的规

定,各省市、专区、县、区、乡的党政领导机关和合作社,应该在大辩论的基础上,按照当地的具体情况,实事求是地制订和修订自己的长期规划和分批分期发展的具体规划。去年年初,多数地区曾经初步制订了农业合作化和农业生产的长期规划。这对于鼓舞农民群众、指导实际工作和协调各机关、各部门的工作,起了巨大的作用。由于各地都是初次制订长期规划,当然难免有不完备、不具体、不实际的毛病。经过将近两年的生产实践,我们可以看到:有些地区的规划固然因为要求过高和脱离实际,难以完成;但是更多的情况是对生产潜力估计不足,计划落后于现实,或者计划虽然是适当的,但是没有贯彻执行下去。现在大家开始有一些制订长期规划的经验了,在大辩论中出现了许多宝贵的意见,根据这些,我们就有可能订出较完备、较全面、较实际的长期规划了。当前的重大任务,就是一定要利用大辩论的时机,把社、乡、区、县的规划同时订出来,付诸讨论和实行,并在实行过程中,根据实际情况随时加以补充和修改;而不要求全责备,错过农民群众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的良好时机。

能否实现农业发展纲要,关键在于第二个五年计划。明年是第二个五年计划的第一年,在农业生产上,应该为全力争取大丰收,给第二个五年计划做一个良好的开端。今年秋季苦旱,许多地区秋种任务不能完成。我们必须在今冬明春掀起一个农业生产和农业建设的高潮,弥补今年秋旱的损失,给明年的丰收打下坚实的基础。冬季是兴修水利和积肥的好季节,水利是目前合作社最重要

的基本建设，各个地区都应该集中主要的力量，把这些最重要的建设项目抓起来。一九五六年春季有个农业建设的高潮，一年扩大灌溉面积近一亿亩，增加复种面积一亿亩，在很大的范围内推广了优良品种，结果保证大灾荒的一九五六年比大丰收的一九五五年增产一百五十亿斤粮食。因此，在农田基本建设方面，我们现在应该向广大农民提出一个响亮的口号：努力、努力、再努力，超过一九五六年！

农业发展纲要的彻底实现，需要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纲要修正草案的某些内容，如绿化，勤俭持家，消灭老鼠、蚊子、苍蝇等等，要由城乡居民同时动手，配合进行；其余部分主要依靠农民来作，但是工、商、学各界应该大力加以援助。在全国农民辩论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的时候，工、商、学各界也要采取适当的方式参加讨论。面对着这个关系六万万人穿衣吃饭的大问题，大家都应该想一想：我应该怎样为发展农业出一份力量？我能在四十条中作些什么？各级党和政府的农业、林业、水利、畜牧等部门都应该全力以赴；机械制造部门、化学肥料部门、商业供销部门、银行信贷部门、医药卫生部门、气象部门和农业科学研究部门，也应该根据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的要求，迅速安排和改进自己的工作。

邓小平同志在《关于整风运动的报告》中说：“要实现四十条纲要，没有一股劲，不经常同保守倾向作斗争，是不行的。”去年和今年的经验，说明这种论断完全正确。去年水灾奇重而能增产，主要是因为一月间公布了农业发

展纲要草案，在农业合作化高潮的基础上掀起了农业生产的高潮，农民们有了一股劲，在一年当中把多少辈子办不到的事情办到了。另外有些地方由于对去年的成绩和缺点作了不恰当的估计，在去年秋后刮起一阵邪风，放松甚至放弃了四十条纲要的目标，结果是消极因素上升，右倾思想抬头，农业生产就吃了亏。这是值得我们牢牢记住的教训。

我们是在落后的经济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我们已经并且还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和阻碍。没有百折不回的志气，一往无前的毅力，决办不了这种大事。怎样把农民的劲头发动起来？主要是让大家看到光明的前途，看到增产的潜力，看到各种有利的因素。湖北孝感县长风社是个办得很好的合作社，去年全社平均亩产粮食一千零三十一斤，今年预计平均亩产一千一百六十斤。前些日子在讨论农业发展纲要草案的时候，社员们说的好：“千条百条，归总一条——不能离开共产党的领导，我们就是得了四十条的好。”农民看到了好处，劲儿就会更大。各地在大辩论中都应该让农民看到四十条纲要的好处，万众一心地为实现这个伟大纲领而奋斗。

## **国务院关于改进 工业管理体制的规定**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八日国务院全体会议第六十一次会议通过，同年十一月十四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八十四次会议原则批准，自一九五八年施行）

我国是社会主义的国家，我国的建设是有计划的建设，全国各地各企业的生产和建设工作都必须服从国家的统一计划，决不可以违反国家的统一计划。我们现行的工业管理体制基本上符合这种要求的。但是，从目前情况看来，现行工业管理体制方面存在着两个主要的缺点。一个是有些企业适宜于交给地方管理的，现在还由中央工业部门直接管理；同时地方行政机关对于工业管理中的物资分配、财务管理、人事管理等方面的职权太小。另一个是企业主管人员对于本企业的管理权限太小，工业行政部门对于企业中的业务管得过多。这两个主要缺点限制了地方行政机关和企业主管人员在工作方面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在国家的统一计划以内，给地方政府和企业以一定程度的因地制宜的权力，是完全必要的。这种国家统一计划范围内的地方政府和企业的一定程度的机动权力，正是为了因地制宜地完成国家的统

一计划,这是国家统一计划所必需的。为了适当地扩大地方政府在工业管理方面的权限和企业主管人员对企业内部的管理权限,国务院现作下列的规定。

## 第一、适当扩大省(市)自治区 管理工业的权限

一、调整现有企业的隶属关系,把目前由中央直接管理的一部分企业,下放给省(市)自治区领导,作为地方企业。

现在属于轻工业部和食品工业部的企业,除了若干企业必须由中央管理的以外,大部分企业都下放给省(市)、自治区管理。纺织工业先下放一小部分,以后根据具体情况,再定大部分下放的步骤。

重工业各部门所属的企业,凡是属于大型矿山、大型冶金企业、大型化工企业、重要煤炭基地、大电力网、大电站、石油采炼企业、大型和精密的机器、电机和仪表工厂、军事工业以及其他技术复杂的工业,仍旧归中央各工业部门管理。除此以外,其他工厂凡属可以下放的,都应该根据情况,逐步下放。

森林工业部所属的企业,除个别单位需要由部直接管理的以外,其余全部下放。

交通部管理的一部分港口和企业下放。

建筑企业中的土建部分,在许多地区应该逐步下放,由地方统一管理。



中央各有关的工业、交通部门，应该根据上述原则，同地方政府协商，提出下放企业的名单，报告国务院批准以后，实行下放。

一切仍归中央各部管辖的企业，都实行以中央各部为主的中央和地方的双重领导，加强地方对中央各部所属企业的领导和监督。

二、增加各省(市)自治区人民委员会在物资分配方面的权限。

中央各部所属企业、地方所属企业(包括地方所属的公私合营企业)和商业系统这三个方面所需要的物资，不论是国家经济委员会所管的全国统一分配的物资(以下简称统配物资)，或者是中央各部所管的统一分配物资(以下简称部管物资)，仍旧各按原来系统申请和分配。地方国营、地方公私合营企业所需要的物资由省(市)、自治区统一申请和分配。但是，省(市)、自治区人民委员会，对于在省(市)、自治区范围以内的中央企业、地方企业和地方商业机关为本企业生产经营所申请分配的物资，在保证完成国家计划的条件下，有权根据当地的情况和需要的缓急，在各个企业之间进行数量、品种和使用时间方面的调剂；各个系统的企业，都要服从这种调剂。

中央各部所有的供应全国需要的物资，不论是存放在某地企业内的或者是仓库中的，当地省(市)、自治区一般不能调动使用。如果当地政府要求调用，必须取得中央主管部门的同意。军用产品所用的特殊原材料，地方政府要求调用的时候，也必须取得中央主管部门的同意。

省(市)、自治区管理的企业的统配物资和部管物资,如果生产数量超过了国家计划规定数量,超过计划的部分,当地政府可以按照一定比例提成,自行支配使用,但是原定的品种计划不能改变。中央各部所属企业的超过计划的产品,除了中央指定的少数企业和少数产品品种以外,地方政府也可以按照中央批准的比例分成。

各省(市)、自治区要求中央各部所属机械制造企业超额生产时,为了避免盲目增产,其超额生产的品种,如果用于国家经济委员会统一分配或者在部管范围内的,需要得到中央各有关机械工业部门的同意。

三、原来属于中央各部管理现在下放给地方政府管理的企业,全部利润的百分之二十归地方所得,百分之八十归中央所得。

凡是属于第二机械工业部、邮电部、铁道部、对外贸易部外销部分和民航局等部门的企业和大型矿山、大型冶金、大型化工、大型煤矿、大电力网、石油采炼、大型机器和电机的制造等企业以及长江、沿海跨省经营的航运企业,地方政府不参与利润分成;除此以外,所有仍旧属于中央各部管理的其他企业,例如纺织企业,地方政府也可以分得全部利润的百分之二十。

所有地方政府参与利润分成的企业,上述规定的二八分成的比例,三年不变。

凡是属于原来由地方管理的企业,其全部利润,仍旧归地方政府所得。

四、在人事管理方面，增加地方的管理权限。凡是属于中央各部下放给地方政府管理的企业，在人事管理方面，都按照地方企业办理。各省(市)、自治区对仍归中央各部管辖的企业的所有干部，在不削弱主要厂矿的条件下，可以进行适当地调整。但是，国务院管理范围的干部，地方要求调动的时候，应该报请国务院批准。各主管工业部门管理范围的干部，地方调动的时候，应该同主管部门协商。在调动干部尤其是调动高级技术人员的时候，应该注意干部原来的专业，照顾到某些干部在他的工作岗位上要有一定期间的稳定性。

中央各部所属的企业和分驻各地的管理机构，有关编制定员工作，应该受当地人民委员会的领导和监督。

## 第二、适当扩大企业主管人员 对企业内部的管理权限

一、在计划管理方面减少指令性的指标，扩大企业主管人员对计划管理的职责。

在生产计划方面，原来由国务院规定的非经国务院批准不得改变的指令性的指标共有十二个，即：总产值、主要产品产量、新种类产品试制、重要的技术经济定额、成本降低率、成本降低额、职工总数、年底工人到达数、工资总额、平均工资、劳动生产率、利润。现在把国务院指令性的指标减为四个，即：(一)主要产品产量，(二)职工总数，(三)工资总额，(四)利润。其余八个指标，在一般

情况下,都作为非指令性的指标。这些非指令性的指标,在下达计划和上报计划的时候,仍旧和四个指令性指标一样,全部列入计划,作为计算根据,但是,企业在执行中可以依据实际情况进行修改。对于非指令性指标的修改以后的方案,应该报告有关部、局备案。

除了国务院规定的四个指令性的指标以外,各工业部可以根据企业的特殊需要,增加个别指令性的指标,例如新种类产品试制、重要技术经济定额、成本降低率,等等。各省(市)、自治区人民委员会也可以根据当地需要,对自己所属企业增加个别指令性的指标,例如规定在省(市)、自治区范围内平衡的某种产品的产量。

在基本建设计划方面,国务院一九五七年规定的指令性指标是四个,即:(一)总投资额,(二)限额以上项目,(三)动用生产能力,(四)建筑安装工作量。今后仍旧按照这四个指令性指标执行。建筑安装部门的劳动工资指标,仍旧按照过去规定办理。各省(市)、自治区对于地方基本建设投资的使用,在保证完成上述指令性指标的条件下,在国务院核定的地方投资总额以内,可以对建设项目、建设进度等等方面进行调剂。

国家计划只规定年度计划。关于季度、月度计划,那些企业应该由主管的部、局规定,那些企业应该由企业自行制定,都由各主管部门根据具体情况,作出决定。

简化计划编制的程序。由现行的两次下达、两次上报的编制过程改为两次下达、一次上报,就是先由上而下的颁发控制数字,然后由下而上的编制计划草案,最后由上

而下的下达计划。年度计划力求在年前十一月份大致确定，计划下达以后，一般不再修改。坚决精简现行表报。

二、国家和企业实行利润分成，改进企业的财务管理制度。企业的利润，由国家和企业实行全额分成。分成的基数根据各工业部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领取的四项费用（技术组织措施费用、新种类产品试制费用、劳动保护费用、零星购置费用），加上企业奖励基金，再加上百分之四十的超计划利润，把各部所领取的这三笔收入与工业部门在同一时期所实现的全部上缴利润，以部为单位，分别算出比例。例如各工业部所领取的三笔收入共占各该工业部上缴利润的百分之几，就把这个比例分别作为各工业部的固定分成比例。以后年度预算中，国家不再拨付四项费用和企业奖励基金，所有这些费用，统由利润固定分成中解决。分成比例确定以后，三年不变。每年根据实现的利润，计算分成数额。各工业部对于所属企业根据上述原则和具体情况，分别确定各个不同的分成比例，实现国家和企业在利润方面的分成。但是，各工业部可以在自己直属各企业的全部分成所得中集中一部分作为企业间调剂之用。各省（市）自治区的工业管理部门也可以在它直属企业（包括中央下放企业）所得的利润分成中，抽出一部分，作为当地各企业间调剂之用。

国防企业中新种类产品试制费用，以及其他企业的特殊重要的新种类产品的试制费用，如果超过本企业负担能力，由主管部门另行拨付。

因为公私合营企业过去对四项费用、企业奖励基金、

超计划利润分成等等没有像国营企业那样的规定，而且公私合营企业中以中小型企业为多，因此在实行企业的利润分成的时候，应该对公私合营企业的分成基数和分成办法，进行专门研究，定出适宜的办法。

企业在使用分成所得的时候，必须把其中的大部分用于生产事业方面，同时，适当地照顾到职工福利方面。

取消现行的某些不合理的规定，例如大修理不准“变形”、“增值”等规定。企业的事业费在保证完成计划的条件下，可以由企业在事业费总额内的项目之间调剂使用。企业的固定资产在上级规定的权限内，可以由企业增减或者报废。

三、改进企业的人事管理制度，除企业主管负责人员（厂长、副厂长、经理、副经理等）、主要技术人员以外，其他一切职工均由企业负责管理。

企业有权在不增加职工总数的条件下，自行调整机构和人员。

根据国务院文件刊印

## 国务院关于改进 商业管理体制的规定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八日国务院全体会议第六十一次会议通过，同年十一月十四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八十四次会议原则批准，自一九五八年施行)

第一、地方(省、自治区、市、县)商业机构的设置，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委员会根据地方的具体情况决定。当着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商业行政机构合并设置的时候，在财务上可以不实行原来各系统的独立核算，而实行统一核算；但是，在业务方针政策上仍旧分别接受原来所属主管商业部门的指导。地方商业行政机构和企业管理机构，原则上实行合并。例如，把各商业机构改变为行政与企业管理合一的组织形式；取消地方上原有的商业专业公司，合并到商业行政机构内。有些大城市或某些地区，经过研究认为不能合并的，也可以不合并。

第二、中央各商业部门设在生产集中的城市或者口岸的采购供应站(一级批发站、大型冷藏库、仓库)，实行以中央各商业部门领导为主、地方领导为辅的双重领导。省、自治区、直辖市商业行政机构设置的采购供应站(二

级批发站), 实行由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商业行政机构领导为主、所在地政府领导为辅的双重领导。

第三、中央各商业部门所属加工企业, 除了某些大型企业, 地方认为管理有困难的以外, 其余全部移交给地方, 由地方商业部门直接管理。这些下放的加工企业, 有关生产任务的规定、产品的规格标准、生产设备能力的调整和加工工缴费用的规定, 仍旧由中央各商业部门统一管理, 以便平衡全国生产。

第四、商业计划指标, 国务院每年只颁发四个指标, 即: (一) 收购计划, (二) 销售计划, (三) 职工总数, (四) 利润指标; 同时允许地方在收购计划和销售计划总额的执行中, 有百分之五的上或下的机动幅度。但是, 对于中央各商业部门控制的计划商品的数字的变动, 必须经过中央各主管商业部门的批准。对于地方工业生产的超计划的产品, 如果要求商业部门收购的时候, 经过上级主管商业部门的批准, 可以超计划收购。对于全国计划收购的粮食、油脂、棉花的购销数字的变动, 必须经过国务院的批准。如果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委员会在特殊情况下认为必要的时候, 可以先行变动, 再报国务院备案。今后对利润指标拟逐渐只下达到省、自治区、直辖市掌握, 不再下达到各基层企业, 以免基层商店为了勉强完成利润指标而作违反商业政策的活动。但是, 中央各商业部门应该规定办法, 保证各基层企业的利润不能自行降低。因为利润指标只下达到省、自治区、直辖市掌握, 不再下达到基层企业的这样一种措施是一项重大的变动, 不宜在



全国立即全部实行，必须由中央各商业部门先在一、两个省、区内试行，试行有效后，再行推广。

第五、中央各商业部门的企业利润，实行与地方全额分成。粮食经营和对外贸易的外销部分的利润，省、自治区、直辖市不参与分成，但是对外贸易的内销部分仍旧和省、自治区、直辖市分成。供销合作社仍旧实行社员分红、提取公积金和其他基金的办法。现在归地方收入的饮食、服务性行业，仍归地方不变。除了上述几项以外，中央各商业部门的企业利润，都和地方实行二八分成，就是以利润中的百分之二十归地方，百分之八十归中央。

为了生产救灾而要商业部门进行有亏损的收购或者销售的时候，授权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委员会责成地方商业部门办理，如有亏损，可列入企业亏损，由商业利润抵补。

第六、商品价格管理的分工。在农、副产品方面，凡是属于计划收购(统购)和统一收购的物资的收购价格和销售价格，由中央各商业部门统一规定，但是在非主要产区则委托地方政府根据中央各商业部门规定的价格水平来管理，统一收购的废铜、废锡、废钢铁的收购价格也照此办理；对第三类物资的价格和由地方确定为本地统一收购的物资的价格，由地方政府管理，但是应该参照中央各商业部门掌握的价格水平，并且每年由中央规定一次价格升降的幅度。在工业品方面，国家经济委员会统一调拨的物资的收购价格，或者各工业部门所管的统一分配的物资的收购价格，都按照国家规定的调拨价格办理，

除此以外,所有其他工业品的收购价格,按照中央各商业部门规定的原则由省、自治区、直辖市管理;工业品在市场的销售价格,主要市场和主要商品由中央各商业部门规定价格,次要市场和次要商品由省、自治区、直辖市根据中央各商业部门规定的订价原则自行订价,并且注意同毗邻地区协商。中央和地方设立统一的各级物价管理机构,中央每年召开物价会议一次,制定全年的物价水平。

第七、实行外汇分成。为了鼓励地方积极完成国家的出口计划和争取若干工农业产品超额出口,中央将所得外汇,分别给地方一定比例的提成。办法另行通知。

根据国务院文件印

# 国务院关于改进 财政管理体制的规定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八日国务院全体会议第六十一次会议通过，同年十一月十四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八十四次会议原则批准，自一九五八年施行)

为了划定中央和地方财政收支的范围，确定地方财政的收入来源，使地方有一定数量的机动财力来安排自己特殊的支出，进一步发挥组织收入、节约支出的积极性，以推动建设事业的发展，国务院对改进财政管理体制，现作如下规定：

第一、地方财政收入，一般分为下列三种：

一、地方固定收入。原有地方企业收入、地方事业收入、七种原已划给地方的税收(印花稅、利息所得稅、屠宰稅、牲畜交易稅、城市房地產稅、文化娛樂稅、車船使用牌照稅)及地方其他零星收入，全部划归地方。

二、企业分成收入。凡属各省、市用上述地方固定收入解决正常年度支出不足的，划给企业分成收入。企业分成收入就是将中央划归地方管理的企业和虽然仍属中央管理但地方参与分成的企业的利润百分之二十分给企

业所在的省、市，作为地方收入。

三、调剂分成收入。凡属各省、市用上述的地方固定收入和企业分成收入解决正常年度支出还不足的部分，再用不同比例的调剂收入来补足。调剂收入包括商品流通税、货物税、营业税、所得税、农业税和公债收入。

有的省、市，如果地方固定收入很大，已经超过了正常年度支出的，收入超过支出的余额，按一定的比例上缴。有的省、市，如果地方固定收入加上企业分成收入，已经超过正常年度支出的，收入超过支出的余额，按一定的比例上缴。有的省、市，除了地方固定收入和企业分成收入以外，将调剂收入的全部划给地方，仍然不够正常年度支出的，差额由中央另行拨款补助。

第二、计算地方正常年度支出的办法。计算地方正常的年度支出，应该剔除重大灾荒的救济、堵口、复堤和国家计划的大规模移民垦荒等特殊性支出的数字，因为这些支出并不是各个省、市年年都需要的。如果那一年度、那个省、市需要这些支出的时候，由中央另行拨款。地方基本建设的投资，也不计算在地方正常支出的基数以内，因为基本建设应该由中央在地区之间作统一的安排，每一省、市所得的基本建设拨款并不是年年相同的。因此，今后地方基本建设投资，包括中央划归地方管理的企业所需要的扩建改建投资在内，仍由中央统一分配，另行拨款。地方国营企业和地方公私合营企业由预算增拨的流动资金，百分之七十的部分也不计算在地方正常支出的基数以内。今后这些企业需要增加的全部流动资金，

包括定额流动资金和非定额流动资金，百分之三十由地方自行解决，百分之七十由中央拨款或者由银行贷款解决。中央划归地方管理的企业所需要增加的流动资金，全部由中央拨款或者由银行贷款解决。

第三、分成的计算方法和分成比例三年不变。省、市的地方固定收入、企业分成收入，低于省、市正常年度支出的部分，是以调剂收入来补足的。分给省、市的调剂收入的部分，占该省、市当年全部调剂收入的百分比，就是该省、市应得的调剂收入的分成比例，这种比例，三年不变。例如，应当划给该省、市的调剂分成收入为五千万元，而该省、市的全部调剂收入为五亿元，那末，中央划给该省、市的调剂收入分成比例即为百分之十。三年以内，地方每年在调剂收入中可以分得百分之十。因为调剂收入的总数是年年增加的，因此，地方分得百分之十的绝对金额，在三年之内也是年年增加的。

如果省、市的地方固定收入，已经超过省、市正常的年度支出，那末，超过的部分，应该上缴，上缴部分占地方固定收入的百分比，就是上缴的比例，这种上缴比例也是三年不变。

如果税收制度有了改变，企业、事业隶属关系和行政区划有了变更，上述各种收入和支出的计算，也必须作相应的调整。

地方收入和地方支出，统以一九五七年度预算所列的地方收入和地方支出数字为根据。个别省、市如果一九五七年预算执行结果，有不能完成原定收入预算的

情况，可以在一九五七年年底，按照收入预算的实际执行数字重新计算，相应地调整分成比例。

在改变体制的第一年，地方教育支出增长的部分，由中央另外拨款补助，以后年度看情况再定。今后三年以内，工资标准增加的幅度如果一个年度有超过百分之五的情况，其中增加工资百分之五的部分，由地方用自己的财政收入来开支，超过百分之五的部分由中央另外拨款补助。但是地方应当切实遵守国家有关工资的各项规定，不得随意提高工资标准。如果有的地方因为遭受严重灾害，当年和第二年的收入不够支出的时候，在受灾的当年，中央予以补贴；受灾的第二年，中央保证地方正常支出不低于前一年的水平。

第四、地方财政结余的处理和地方预算的编制。地方预算在执行过程中，收入超过支出，地方可以自行安排使用。地方预算的年终结余，全部留给地方，由地方在下年度安排使用。在分配年度预算指标的时候，地方上年结余的部分，不计算在分配的指标以内；中央不因为地方有上年结余收入，或者本年有可能增加收入，而减少对地方应有的基本建设和特殊性支出的拨款。但是，在最后正式编造预算的时候，上年结余收入仍然应当和其他各项收入一样，汇总列入预算，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报告。

地方财政管理制度改变以后，地方原有的各项附加收入，包括工商税附加、农业税附加和城市公用事业附加，一律由地方人民委员会另行管理，不列入预算。关于工商税附加的比例，今后统一改为按四种税收（商品流通

税、货物税、营业税、所得税)的总额附征百分之一。有的城市如果由于工商税附加办法的改变,使收入减少,应当在预算安排上给予照顾。经济作物区的农业税附加可以酌量提高。提高的幅度,另行规定。

地方除了用中央的拨款举办基本建设以外,还可以用自己的收入举办一部分基本建设。为了合理的分配基本建设所需要的物资,并且照顾全国的产供销平衡,地方对于这一部分基本建设投资,应当连同中央对地方基本建设拨款的部分,一并提出计划草案,报经中央主管部门统一审核,综合平衡,纳入国家整个基本建设计划。

第五、地方机动财力收入的限度。地方固定收入、企业分成收入和调剂分成收入等三种收入都是年年增长的,企业分成收入和调剂分成收入所规定的比例三年不变,在同一比例下,收入的绝对金额也是逐年增长的。使地方得到一定数量的机动财力,是这次财政体制改进的主要目的。但是,地方由于改进财政体制而多得的收入,应该有一个限度,它的原则是使地方可以有适当数量的机动财力,同时又能够保证国家重点建设资金的需要。根据这个原则,由于改进财政体制地方多得的收入,三年累计,一般不应该超过二十亿元左右(例如每年递增三亿元,第一年多得三亿元,第二年多得六亿元,第三年多得九亿元,三年累计十八亿元),加上可能的地方结余收入,三年累计十亿元到十五亿元;两项合计,三年以内,地方约得三十亿元到三十六亿元。分给地方这些机动财力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但是由于改进了的财政体制,还未

实行,还没有经验,分给地方的收入,可能多于上述估计数字,也可能少于上述估计数字。因此,原则上应该按照本规定所说的各项分成比例,三年不变。但是,在执行一年以后,如果地方所得比上述估计数字超收过多,或者远不足上述的估计数字,那末,应该根据第一年执行的结果,进行局部的调整。

第六、关于民族自治区财政。为了适应民族自治区的财政经济发展情况,在计算民族自治区正常年度支出的时候,只扣除重大灾荒救济、堵口、复堤和国家计划的大规模移民垦荒等特殊支出,不扣除地方基本建设支出;划给民族自治区的收入,除了地方固定收入仍然全部划给自治区,企业分成收入同样按照全国百分之二十的分成比例,分给自治区以外,在自治区的调剂收入,也全部划给自治区,作为自治区收入。这样划分之后,根据支出基数计算,收入多于支出的部分,按一定的比例上缴中央;收入少于支出的部分,由中央拨款补助。

民族自治区财政管理制度的其他有关事项和民族自治州、自治县财政管理权限的划分,统按国务院即将颁布的《民族自治地方财政管理暂行办法》办理。

根据国务院文件刊印



# 新中国坚持反对 制造“两个中国”\*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五日)

周 恩 来

现在，我要说说美国为什么要转到制造“两个中国”上来。问题的焦点就是美国要把台湾掌握在它手上，以便在远东制造紧张局势。新中国总要被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正式承认的，这是不可避免的趋势，因为中国是存在和发展着的，而且要永远存在、发展下去。美国就想在这一天来到之前搞成“两个中国”，把台湾掌握在它手中。

但是，对美国很不幸的是，不仅新中国不承认“两个中国”，就是蒋介石现在也不承认“两个中国”。为什么蒋介石不承认呢？因为蒋介石如果承认台湾是独立小国，那么，他要代表全中国的幻想就破灭了，跟随他从大陆去的军队和其他人员也就要散伙了，只会剩下一小撮他的追随者。美国就可能随便找另一个人代替他，或是胡适、李宗仁，或是其他人。正是考虑到这种情况，蒋介石就要反对“两个中国”，他叫嚣反攻大陆，就是要表示

---

\* 这是周恩来同各国驻华使节的谈话节录。

他代表全中国。但是，美国怕蒋介石反攻大陆，把它拖下水。蒋介石要派军队反攻大陆，我们很欢迎，正好消灭它。美国如果跟着他干，就会引起大战。在这种情形下，美国要搞“两个中国”，蒋介石要反攻大陆，这就在台湾和美国之间发生了争吵。因为这个原因，美国正在压蒋介石接受“两个中国”的主张，要在国际组织、国际会议上制造“两个中国”的客观形势，特别是想让新中国默认这种形势。如果新中国默认了，美国就可以向蒋介石说：“新中国都承认了，你还不承认？”如果蒋介石那时还不接受，美国就要换掉蒋介石。

从日内瓦中美大使级会谈到这次国际红十字大会，都可以看到美国制造“两个中国”的活动。在日内瓦会谈中，美国要跟我们发表共同声明，其目的是要我们承认美国在台湾的“合法”地位，这是我们决不能同意的。美国提出的声明草案的要点是要中美两国承担不使用武力解决台湾问题。针对这句话我们就问：是不是美国将从台湾撤走一切武装力量？它不能作这个保证。既然不作保证，它的军队留在台湾地区，我们又不能使用武力，那美国就永远呆在台湾了。因此，如果我们同意发表这个共同声明，那就等于承认美国在台湾的地位为合法，我们不能上这个当。

在国际红十字常设委员会里，美国的代表公开说，这个国际组织中既然有两个越南、两个朝鲜，为什么不能有两个中国？据十一月九日美联社的消息，美国国务院发言人也说：既有北越、北朝鲜、东德，为什么不能有“两个

中国”？这都是举例。最直接的证明是美国在国际红十字大会上把蒋介石代表带进会场。这种情形我们是绝对不能容许的。因为中国问题同越南、朝鲜、德国的问题是不同性质的。两个朝鲜、两个德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所导致的结果，而这两个国家的人民也一直在为和平统一而奋斗。越南分为南北的暂时现象是由日内瓦协议承认的，越南人民也在为和平统一而奋斗。中国本来就是一个，我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是战胜国，是反法西斯侵略最早的国家。过去是蒋介石代表中国，但是他挑起内战，人民把他推翻了，新中国代替了旧中国。蒋介石逃到台湾，如果没有美国保护，问题早就解决了。

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六十年前中日战争后被割给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发表的《开罗宣言》规定，台湾应还给中国，日本投降后已经归还中国。这个事实就连美国政府也不能否认。美国著名的艾奇逊白皮书（一九四九年八月）上说，根据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一日《开罗宣言》，台湾应归还中国，一九四五年九月中国军队从日本人手中将台湾的行政管理权接收过来。这是在中国大陆已经解放之后，美国政府所承认的。那时中国政府派去接收的是陈仪，后来他被蒋介石杀掉。陈仪在一九四五年十月二十五日在台湾发表的广播声明中说，“从今日起台湾及澎湖列岛正式重入中国版图”。一九五〇年一月五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又宣布，按照《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台湾已经交给蒋介石委员长。过去四年来，美国及其他盟国亦承认中国对该岛行使主权。

美国对台湾或中国其他领土从无掠夺的野心。现在美国无意在台湾获取特别权利或特权或建立军事基地。美国亦不拟使用武装部队干预其现在的局势。美国政府不拟遵循任何足以把美国卷入中国内争中的途径。”在同一天，艾奇逊又对杜鲁门的声明作解释说：“中国人已统治台湾四年。美国或任何其他盟国从未对该项权力及占领发生过任何疑问。当台湾被作为中国的一个省份的时候，没有任何人曾对此提出过任何法律上的疑难。此举经认为是符合各项协定的。”所以拿美国政府的声明都可以证明台湾已归还中国，并且已成为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中国的一个省，这是无可怀疑的。

中国解放台湾是中国的内政问题，我们和蒋介石的关系也是个内政问题。是美国政府违背了自己的声明，要来霸占台湾，干涉中国内政，这是一九五〇年六月的事。我们在任何时候都不能承认美国霸占台湾这一非法的行为。美国要把台湾变成它的保护国，我们是绝对不允许的。

应当区别两件事：我们愿意和缓国际紧张局势，这是一件事；但是我们不能接受美国的威胁，承认美国侵占台湾和“保护”台湾，这是另一件事。如果美国要以侵占台湾来威胁我们，这不是我们的责任，我们是被威胁的一方。这个问题僵下去，美国要负责任。我们相信这个问题越僵下去，时间对我们越有利，因为台湾总要被解放，台湾总要回归祖国。正因为如此，我们绝对不能容许在国际活动中出现“两个中国”。

我们愿意在此声明：任何国际组织、国际会议、国际活动中，如果出现“两个中国”，即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外还有其他“中国”，不论是用“中华民国”、“台湾中国”、“台湾政府”、“台湾当局”或其他的名义出现，我们宁可不参加。参加了就是默认，默许其存在。

我们懂得，在座的诸位所代表的社会主义国家和友好国家，都希望新中国能参加更多的国际活动，共同致力于和缓国际紧张局势，共同致力于和平和国际合作事业。这一点我们很理解，很感谢。但是，我们应当说明：参加国际活动的方法很多，我们不一定要同蒋介石代表坐在一起参加国际活动。我们可以同蒋介石的代表或同蒋介石本人坐在一起会谈，或者是他派人到北京来，或者是我们派人到台北去，那是为了解决国内问题。这是我们国内的事。但是在国际场合中不能出现“两个中国”的情况。我们应当向在座的亲爱的朋友们说清楚，我们愿意尽一切力量为国际和平和合作而努力，甚至我们也不拒绝和美国代表坐在一起会谈。三年前在日内瓦，我们和美国代表就在一起开过会。现在我们的王炳南大使每月一次在日内瓦和美国代表见面，感谢瑞士政府给我们这个和平的场所。虽然两位大使的会谈打破历史上的记录，已有两年多了，但还是要谈下去。美国大使说要谈多久就谈多久，我们的大使也说要谈多久就谈多久。我们说，两年不够，也许要谈十年、二十年，可以长期谈下去。致力于和平，我们是决不落人之后的，但如果在国际场合中有蒋介石的代表在，我们就决不参加。这一点希望在

座的尊贵的朋友们会了解并转告你们的政府。

这里有个问题要讲清楚。我们是否会提出要求，希望你们的政府也不同蒋介石的代表坐在一起呢？不是这样。因为这同承认是两回事。承认新中国当然不能又承认蒋介石，承认“两个中国”是不友好的。我们认为，一个国家只能承认有一个政府，我们是遵守这一原则的。我们还是承认美国政府是美国的政府。这是一件事。第二件事，在国际组织、国际会议中支持新中国还是支持蒋介石，也是对新中国友好不友好的问题。比如：这回印度政府代表团留在会上斗争到最后一分钟，坚持反对“两个中国”的斗争，这是友好的态度，我们非常感谢。我们现在向在座各位说清楚，在国际活动中如果有蒋介石的代表，我们就不去，但是我们不会提出不合理的要求，要求在座各位的政府的代表也不同蒋介石的代表坐在一起。我们只要求各位所代表的国家在会议上支持我们，不支持蒋介石，这就是友好。我们在国际会议上只支持你们的政府，决不会支持你们国内别的政府。诸位所代表的国家参加的会议，如果蒋介石的代表在，我们就不能去。要请诸位了解我们的情况，也请各位所代表的政府了解我们的情况：我们不是不跟诸位所代表的政府合作，而是我们不能同蒋介石的代表坐在一起，让“两个中国”出现。我们原来打算在去年参加国际奥林匹克比赛，一听到蒋介石的代表去，我们就不去了。考尔夫人说得很好，她说如果知道蒋介石的代表会出席，她就不会让会议在印度召开了，因为印度只承认新中国。我们不参加某些国际

组织和国际会议，我们还可以用别的方法参加国际活动。比如我们可以参加地区活动，单独的往来。诸位在北京看得很清楚，我们各种国际活动往来很多，包括在经济、文化、政治、科学等方面的活动。当然，最好全世界各国在一个国际组织里共同努力，从裁军、禁止核武器开始实现持久和平，这是最理想的。所以印度尼赫鲁总理和梅农先生也说，联合国不恢复中国的席位是联合国的损失，这是一个真理。但是，既然这条路走不通，我们就只好采取别的方法。

附带说一下，有些友好国家担心中国同美国搞得太尖锐，能不能和缓些？我们的回答是，我们为和缓紧张局势作了不少努力，比如在日内瓦会议上，在万隆会议上，在日内瓦中美大使级会谈中，我们都作了不少努力。但得到的结果却是美国要制造“两个中国”。我们必须明确，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能妥协，不能含糊，也不能默认。希望朋友们在这个问题上不要使我们为难。反过来说，也就是不要在这个问题上影响我们的友好关系。这个问题是美国挑起的，因为美国要搞“两个中国”。毛主席常引用中国古人说的话，叫“后发制人”，这是老子的哲学。就是说，这一切事情是美国挑起来的，既然来了，就不能不回答，“来而不往非礼也”，这是两千年前《礼记》上说的。我们是不向人挑衅的，但是对别人的挑衅我们非回答不行。你不回答，他就会说你默认“两个中国”。

今天我在“两个中国”问题上谈得特别多，是要说清楚这个问题。正是因为有了国际红十字大会生动的事

情，所以向诸位把我们的立场说明。我们可以预料这类性质的事情今后会一天天多起来，不仅是国际奥委会的会议、国际红十字大会，还会出现在别的国际场合。以后在别的场合我们采取同样的态度时，诸位所代表的政府就不会感到突然，就会理解我们的立场了。

另外，我还要说一句，新中国坚持反对制造“两个中国”，而美国则向蒋介石施加越来越大的压力，要蒋介石承认“两个中国”，这将有助于把蒋介石推回到祖国来。这个情况是很微妙的。

我占的时间太多了，很感谢诸位光临。希望在座的大使、代办和朋友们转告各位的政府，我和外交部同仁不胜感谢。

根据《周恩来外交文选》刊印



# 必须重视和加强山区建设\*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八日)

朱 德

这次会议讨论的山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问题，是当前十分重要的一个问题。会议开得很好，大家的劲头很大，问题都提出来了，这是值得高兴的。今年上半年我到两广、西南各省和东北三省了解情况时，从同各省负责同志谈话中，从实际的观察中，深深地感到山区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有很大的潜在力量。我是在四川巴山下长大的，亲身体会到山区有山区的好处。我们打游击十几二十年都在山区。千万不要低估了山区的价值。

几年来，山区和平原地区一样，基本上完成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除西藏外)。在这个基础上，山区的经济建设事业有了不小的发展，人民在衣、食、住、行等方面得到了显著的改善。但是与平原地区相比较，山区人民的生活还是困难的。山区的富源还没有开发出来，山区工作中还存在着不少问题。最大的问题是许多同志不重视山区工作，他们不懂得，如果不把山区的富源开发出来，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是有困难的。

\* 这是朱德在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召开的全国山区生产座谈会上的讲话。

山区建设为什么这样重要呢？这是因为山区约占全国面积的三分之二，人口、耕地和粮食产量都分别占三分之一左右，特别是因为山区有无穷的自然财富，不仅有山林竹木、山货药材等产品，而且有各种各样丰富的矿藏，因此，山区的生产潜力是十分巨大的。我先从海南岛说起，那里中部是五指山，周围有些平原，但大部分还是山区。那里的山区属于热带，山上有经济价值极高的林木和藤条，有茂密的灌木林，山脚下有一人多高的野草。如果把这些资源充分地利用起来，既可以制作名贵的家具，又可以做纸浆，还可以利用牧草来养生养羊。其他像咖啡、可可、橡胶、椰子等热带作物，应有尽有。在农作物方面，一年能收获好几季，三九天还能插秧。在矿产方面，有品位极高的铁矿，还有水晶矿。如果把海南岛的宝藏开发出来，好处是很多的。再说广西、贵州和云南这几省，都有很好的山区。这些地方都属于亚热带，凡海南岛能够生长的东西，这里大部分也能够生长。这些地方矿产资源也比较丰富。总之，长江以南各省的山区都是经济价值极高的山区。而且庐山、黄山、莫干山等，风景优美，名闻世界，是很好的避暑和游览胜地。北方几省的山区，条件虽然比较差，如雨量少，气温低，但也可以植树造林和发展土特产的生产。东北的山区也不错。青海、西藏、新疆有些山区虽然长年积雪，不长树木，但是许多稀有矿产都出在那里。

山区的许多产品，不仅国内需要，而且是重要的出口物资。如石棉、云母、硼砂以及一些稀有金属，世界市场

都很需要。根据外贸部门统计,在现有出口物资中,山区产品已占很大比重。这是我们以山区资源来建设山区的最有利的条件。

山区有一个特点,就是地广人稀,这和平原地区的人多地少正好相反。开发山区还可以解决城市和平原地区一部分人的就业问题。我想,加强山区建设这个措施,山区人民一定会拥护的。

发展山区经济采取什么方针呢?《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作了原则的规定:“按照因地制宜、实行多种经营的方针,发展山区的农业、林业、畜牧业和各种土特产的生产。”这个方针是完全正确的。发展山区的经济,当然不限于农、林、牧和土特产,而且还包括采矿业和小型工业,特别是加工业发展前途很大,如酿酒、榨油、碾米、磨粉、制药材以及可以就地取材的工业,乃至化学纤维工业等。许多东西拿到城里去加工,运费就贵得多;如果就地加工,那就便宜得多了。

我要特别说的一点就是:山区的建设方向,应该是从山区原来的自给自足经济发展成为全国统一经济的一部分,同全国经济相交流。山区的建设发展起来了,山区的富源一定会源源不断地开发出来,贡献给全国的建设事业,这正是我们建设山区的远大目标。不看到这个光明的前景,以为党提出建设山区只是应急性的措施,这是完全错误的。

改善山区的交通运输,对动员全国力量支援山区,对利用山区的富源支援全国都有重大的意义。只有山区的

交通运输条件改善了,外边的东西才能运进去,山区的物资才能运出来。山区河流很多,如何利用河流来发展交通运输,交通部门应当好好研究一下。过去有些地方把河运管得太死,不许老百姓的木船走,不许木排上带东西等等,对物资交流很不利,给群众的生活也带来很多困难。此外要修筑好公路、马车路和简易人畜道路,把各种运输工具都利用起来。农业发展纲要第三十四条关于发展农村交通运输的规定,对于山区是特别重要和迫切的,因为山区的交通运输特别困难。在山区的运输中,要尽力避免相向运输的浪费现象。康藏公路上的回头车,常常是空的,不懂得带一点回头货。其实西藏产硼砂,三千元一吨,很值钱,如果带出一些来,无论对国家建设或对地方经济都是有利的。

加强山区商业贸易工作,要特别注意发挥基层供销社的作用。因为山区村落分散,生产规模小,目前专设国营商业机构还不必要。应该使基层供销社既担负起外调、内销、收购、指导土特产生生产的任务,又能组织农村的手工业者和多余劳动力,进行产品的加工和销售。

建设山区不仅是农业部门的任务,也是工业、商业、财政、税收、文教、科学、卫生等各部门的任务,需要各部门做一系列的工作。各部门都要加强整体观念,把支援山区建设的工作认真重视起来,真正依靠广大群众建设山区。这样,山区的建设一定会迅速地发展起来,从而大大地促进全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

根据《朱德选集》刊印

## 国务院关于正确对待 个体农户的指示

(一九五七年十二月十三日国务院  
全体会议第六十五次会议通过，同  
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发布)

农业合作化基本实现以后，在我国农村中，除了部分还没有进行土地改革的少数民族地区外，还有3%左右的个体农户。这些个体农户多数是富裕农民，或者是兼营商贩或手工艺的农户或者是深山远林里居住零散的农户，也还有一部分是缺乏劳力的贫苦农民；另外，还有少数是地主、富农、被管制的反革命分子以及没有正业的游民分子。由于这些个体农户已经为数不多，并且极为分散，又由于乡、镇人民委员会近年来把力量集中在巩固农业合作社方面，疏忽了对他们的领导，加上他们中一部分人资本主义思想严重以及某些地区对自由市场缺乏管理，以致在不少地方出现了个体农户进行投机活动，违反国家的统购统销政策，逃避公粮负担，甚至还对农业合作社进行破坏。这些违法行为对农业合作社的巩固产生了不利的影响。

为了加强对个体农户的团结教育改造和管理，现在

作如下各项决定，各级人民委员会应该根据各地具体情况贯彻执行。

(一)对于个体农户，乡、镇人民委员会可以委托他们所在地或者附近的农业合作社按照他们本人的不同情况分别进行教育和加强领导。农业合作社召开乡村居民各种有关会议的时候，应该吸收个体农户参加，以不断地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并且使他们能及时地了解 and 遵守政府的法令和行政措施。

(二)受委托的农业合作社，有责任对个体农户的生产活动、播种计划、纳税和农产品交售进行必要的监督。个体农户应该把向国家应纳的税款和交售的农产品，交给农业合作社一起向国家交纳和出售。如果有的个体农户无力自己运输而需要由农业合作社代为运输的，则应该由个体农户合理地摊纳实际需用的运费。个体农户如有尾欠或者漏交公粮，或者是存有应售而未售的余粮及其他统购物资，农业合作社得根据乡、镇人民委员会的委托，有权督促其照数补交和出售。个体农户因为生活困难，需要酌情减免公粮或统购任务的，农业合作社应该如实反映，由乡、镇人民委员会根据有关的法令和规定处理。个体农户如果在自由市场买卖国家统一收购和禁止自由买卖的农产品，农业合作社有权加以制止，如果制止无效，应该报请乡、镇人民委员会依法处理。

(三)受委托的农业合作社，有责任对个体农户宰杀牲畜、砍伐树木依法进行全面的管埋。个体农户违反政府规定私自宰杀不应宰杀的牲畜或者乱砍树木，农业合

作社有权加以制止,如果制止无效,应该报请乡、镇人民委员会依法处理。

(四)受委托的农业合作社,可以按照国务院和地方人民委员会的规定,向个体农户摊派义务工;也可以按照全村人民的公约,向个体农户摊派兴修与其本人有关的公共水利建设或者兴办其他公益事业所需要的人工和款项。

个体农户可以同农业合作社共同使用公共的水利建设并且共同负责加以养护。农业合作社自力修建的水利建设,只要水量充足,经农业合作社同意,个体农户也可以参加使用,但是个体农户需要缴纳适当数量的水费并且参加这些水利工程的岁修和养护工作。

(五)个体农户分摊的一切负担,应该比照合作社农户的负担办理,既不要偏轻,也不要偏重,对于贫苦的个体农户,还应该相应地减免。

(六)农业合作社,对于在生产上有困难的个体农户,可以根据自愿互利的原则,组织农业合作社社员和个体农户之间或者是个体农户相互之间的劳动互助,使他们能够继续发展生产。对于生活困难的个体农户,农业合作社、信用合作社、银行和乡、镇人民委员会,应该使他们在贷款和救济方面得到适当的照顾。

(七)农业合作社应该对个体农民加强领导和教育,紧密地团结他们,争取他们自愿地加入农业合作社。凡不愿意加入的,听其自便。

对于散居在深山远林的个体农户,附近的农业合作

社在吸收他们入社以后,可以允许他们在经济上自负盈亏,而在生产上给以指导和扶助,并且加强对他们经常的政治、思想工作。

(八)对于尚未允许参加农业合作社生产的地主、富农和反革命分子,乡、镇人民委员会应该委托农业合作社依照有关法令负责进行监督和改造。

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根据《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

(1949—1957)刊印